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九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九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1)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 罢工策略 刘少奇 (11)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21)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
- 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互济会的领导
给各级党部的信 (30)
(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
首先胜利的决议 (34)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 (45)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
- 改善和加强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 王稼祥 (49)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给湘鄂西分局和省委的信 (56)
——关于湘鄂西党目前组织任务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紧急通知 (74)
- 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民众
自动武装保卫上海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 中共中央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 (78)
-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 中共中央给东江特委的指示信 (80)
-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
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 (85)
- (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
- 中共中央给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信 (89)
-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
-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组织报告 (95)
-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 (129)
-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团工作的决议 (141)
- 听了团书记同志报告后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 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 (151)
-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
- 请看!!!
- 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得到胜利? (166)
- 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 红军抚恤条例 (170)
-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

- 中共中央给江苏省委的信 (174)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
- 中共中央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书 (184)
——反对上海设立中立区，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进攻
工农红军，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信 (188)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的信 (202)
——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瓜分中国与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运动周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 毛泽东关于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
给周恩来的电报 (204)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 毛泽东关于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
给周恩来的电报 (206)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
- 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
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 张闻天 (207)
(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 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
给周恩来的电报 (233)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
- 中共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
给各苏区党部的信 (235)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
宣言 (243)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
宣战的训令 (246)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上海三次暴动宣传大纲”暨
“红五月口号”错误的声明 (251)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
新苏区的决议 (255)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
- 毛泽东关于今后中心任务和新区、白区工作的
意见给周恩来的电报 (261)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 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 刘少奇 (263)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 扩大红军工作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王稼祥 (274)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 毛泽东关于政治估量、军事战略等问题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278)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
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280)
(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
- 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 (282)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给各苏区的军事训令 (285)
(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 (287)
(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
-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
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 (293)
——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
目前中心任务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
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 (310)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为十九路军调闽给福建各级党部的信 (325)
——争取十九路军与红军共同抗日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 反帝斗争纲领 (331)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
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 (338)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北方各省委代表
联席会议基本通过)
- 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
决议 (355)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北方各省委代表
联席会议通过)
- 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 (379)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北方各省委代表
联席会议基本通过)

- 朱德关于各级指挥员应及时准确报告
军情的训令 (390)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
-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当前作战方向问题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392)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 周恩来等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394)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 周恩来关于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信 (395)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和创造北方苏区
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 (400)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肃反问题给湘鄂西分局
与省委的信 (411)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九一八”一周年纪念的通知 (416)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
- 朱德、毛泽东关于消灭乐安之敌的训令 (418)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
-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敌情和我军作战部署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中央的电报 (420)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
-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苏区职工运动
给全体同志的信 (422)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 周恩来关于乐安宜黄战役后的军事部署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信 (439)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 朱德、毛泽东关于打击陈诚部队的训令 (443)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 中共中央紧急通知 (447)
——关于日帝国主义的新进攻
(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
- 中共中央征收党员的九一八号召 (451)
(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
任务的决议 (454)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
- 周恩来关于前线上的地方工作问题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报告 (466)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非苏区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日
运动的决议 (480)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
-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
建议转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电报 (483)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旬)
-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对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问题的
意见转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电报 (485)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旬)
-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目前军事行动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报告 (487)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 周恩来关于亟须解决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问题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信 (489)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 (492)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 周恩来、毛泽东等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讨论
作战行动问题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499)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行动部署与中央局开会
地点问题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501)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 朱德、毛泽东关于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
一时期的训令 (503)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鄂豫皖应选敌弱点
歼其一部的意见的电报 (508)
(一九三二年九月三十日)
- 土地问题 (510)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编)
- 中共中央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
斗争的决议 (527)
(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
- 中革军委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 (535)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失业运动日的决议 (537)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
- 红一方面军建黎泰战役计划 (551)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

-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宁都会议经过的简报 (555)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 中革军委关于节省经费，战胜敌人进攻的
训令 (558)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建宁)
- 中革军委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 (560)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张闻天 (569)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地方党部
紧急动员工作检阅的决议 (575)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关于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 王稼祥 (582)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红一方面军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
紧急训令 (588)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的中央
给鄂豫皖分局的指示 (592)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 (594)
——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张闻天 (600)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 红一方面军关于加强无线电队建设与
管理的命令 (606)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

-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 …… (607)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批准)
- 红一方面军关于军事政治训练的训令 …… (613)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
- 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 …… (616)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
- 周恩来关于集全力引动敌人、求运动战中解决之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 (629)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
地方武装编制问题的密令 …… (631)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检阅的决议 …… (635)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关于选敌弱点进攻、
避免同强敌决战给孔荷宠等的电报 …… (641)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中共中央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华北
给河北省委的信 …… (643)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
全会决议的决定 …… (651)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附：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论中国 …… (651)
(一九三二年九月)
- 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周年纪念的通知 …… (660)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我们的生死关头

全中国的民众现在是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帝国主义列强对于我们的侵掠是日益加紧。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东三省。法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由云南、贵州、广西等省侵入。英帝国主义实际上也已经占有了西藏、西康。帝国主义列强各自运用它们的武力、财力，争着瓜分中国，剥削中国的民众，要把数万万中国的劳动群众放在它们的屠刀下面，永远变成它们的奴隶牛马。

全中国现在是处在深刻的经济的浩劫中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对于全中国民众残酷的剥削与搜刮，对于中国民众身家生命的摧毁与蹂躏，造成了普及全中国的灾荒，使全中国一万万以上的民众落进了无衣无食的人间地狱。工商业的衰落，农村经济的崩溃，已经陷入了悲惨的绝境。千百万的工人、农民相继失地失业。惊惶、不安、怨恨、忿怒与斗争的情绪，紧张到了极点。

整个社会的组织是处在一个大崩溃的前面！

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是一切罪恶的制造者

造成全中国的总崩溃，使全中国千百万大多数民众饥饿、

死亡，使中国民族为帝国主义各国所压迫、侵掠，使全中国民族蒙此奇耻大辱的罪人，当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它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是采取了“无抵抗”、“镇静”与“逆来顺受”的投降政策。它要求国际联盟与美国等来共管中国、瓜分中国，向这些强盗国家的政府奴膝婢颜的去请愿。而对于全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则采取了高压手段与屠杀政策。苛捐杂税，搜括敲诈，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战争流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无所不用其极。这一统治不推翻，中国民众将永远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不得翻身。

一切国民党的派别，都是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压迫与屠杀民众的能手。不论在这一国民党统治中，占优势的是蒋介石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或是最近成立的什么“和平统一”的分赃政府，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东西。我们对于任何国民党派别不存丝毫的幻想，我们要打倒国民党的一切派别！

一切反革命派别都是国民党统治的拥护者

在这一大崩溃的前面，一切在野的反革命的派别表示了特别活跃，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来维持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国家主义派与新月人权派的“国防政府”，改组派的“国民救国会议”，宋庆龄第三党的“行动委员会”，江苏“耆老”派的“国难救济会”，以至陈独秀托洛茨基派的“全权的国民会议”，这许多“救国方案”都是为得要使“民众”参加国民党的政权，实行“官民合作”。换句话说，使民众不去反对整个国民党的统治，而去帮助国民党维持它的统治。这些反革命派别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去“对日宣战”，去“打倒帝国主义”；要求压迫与屠杀民众的刽子手的国民党去“实

行民主政治”，去“保障言论出版的自由”；要求造成全中国经济的劫运的国民党去“振兴实业”，去“改良民众生活”，这当然只是为得要欺骗民众，保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出路在哪里？

一切同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妥协，绝对不能解决目前的紧急问题。只有全中国的民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决的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民众的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我们才有出路。只有革命的风暴，才能扫除一切使中国经济向前发展，使民众生活根本改善，使民众得到自由的障碍物——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高利贷者与一切民众身上的寄生虫。只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者的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我们才能如像快刀斩乱麻一样，迅速的解决造成全中国总崩溃的基本问题。

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是全中国民众 自救灭亡的唯一出路

全中国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所剥削所蹂躏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要解决自己切身的衣食住等问题，绝对不能梦想或等待统治阶级中任何“先知先觉”的“仁人君子”来拯救我们，绝对不要梦想或等待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奴隶忽然会变成主人。拯救我们自己，只有依靠我们民众自己的力量。只有拿我们民众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推翻这一吮血虫与刽子手的统治，使旧日的奴隶变为今日的

主人。

用民众的革命力量去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去建立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这一政权就是工农兵的代表会议（即苏维埃），这一政权是反对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与一切剥削者的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政权，这一政权是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工农群众对于少数剥削者的专政，这一政权将取消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政治权利，将用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镇压一切他们企图恢复旧制度的阴谋与反革命。

只有这种依靠工农武装力量而存在的最大多数民众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我们才能解决一切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

用民族的革命战争去打倒帝国主义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国民党是采取了最无耻的投降政策。希望国民党去“对日宣战”，去“厉行革命外交”，这真无异与虎谋皮。在国民党统治下面，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剥削只有加紧，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的完全统一是永远不可能的。只有全中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把政权拿在我们民众自己的手里，我们才能真正的去举行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的海陆空军驱逐出中国去，把东三省完全收回。

民众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将依靠全中国千百万工农民众的武装力量、全中国数万万民众的拥护，去没收一切它们在华的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与商业机关，收回一切租借地与海关，取消一切外债，把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驱逐出中国去！民众的苏维

埃政府不怕同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宣布革命战争，来争取中国的统一、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给·贫·苦·的·农·民

全中国农民群众的最大多数，在地主、商人、军阀、官僚、高利贷者残酷的重重剥削之下，很快的失去他们生活的泉源——土地，使他们变成了游民、土匪与灾民。国民党所说的“二五减租”，实不过是加租加税的另一名称。全中国广大的工农群众现在应该立刻起来，进行反对乡村中的一种剥削者与夺取土地的斗争。民众的苏维埃政府将无条件的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与他们的生产工具，交给农民、兵士群众，并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苏维埃银行将用低利无利的借贷给贫苦的农民，取消一切高利贷的剥削。

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监·督·生·产 与·工·人·组·织·工·会·的·自·由

在国民党统治下面，只有工作时间的延长与工人生活的恶化，只有失业与饥饿的痛苦。尤其在目前全中国经济总崩溃前面，关厂、开除、延长工作时间、减低工资等更是层出不穷。对于工人阶级的一切斗争，国民党除了颁布禁止罢工的命令，利用军警枪杀压迫外，更组织各种各样的黄色工会欺骗工人，出卖工人的利益，使工人斗争失去领导。一切工人自己的工会都不能公开存在。

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民众的苏维埃政府，必定会迅速的去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苏维埃政府将禁止

资本家的关厂停业，严格限制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并实现工人监督生产。任何违反苏维埃政府法令的资本家，立刻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一直到没收它们的财产。对于失业工人，苏维埃政府将设立劳动介绍与失业津贴。工人在苏维埃政府之下，有完全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的自由。

· · · · · 特别优待革命的士兵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士兵所遭到的待遇，是最惨酷残忍的。他们为了军阀拼着性命去争夺地盘，去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们，然而他们是食不饱衣不暖，他们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如若他们因受不住痛苦而开小差，他们就受到最厉害的毒刑或枪毙杀头。但是在民众的苏维埃政府下面，红军的兵士可以分得最好的土地，红军兵士的家属可以受到苏维埃政府特别的优待。粮食衣服最先要拿来满足红军的需要。红军的士兵到处可以受到工农民众的欢迎与慰劳，到处有妇女的洗衣队与缝鞋队等给他们洗衣做鞋。红军的兵士都能参加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受到教育。

正因为这样，所以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的兵士二万余人最近全部哗变，投入红军。只有投入红军，士兵们才能不去拼着性命为了军阀官僚去争地盘，去无抵抗地受到帝国主义军队枪炮的扫射。只有投入红军，士兵们才真正能为了民众自己的利益，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去争取中国民族的光荣！

· · · · · 同饥饿与灾荒作斗争

对于全中国一万万以上饥饿死亡着的灾民，国民党是丝毫

也不顾的。宣传一时的八千万赈灾公债一钱未发。各种各样的赈灾附加税，没有一个钱落到灾民的手里。二百万吨美麦借款，是充作别用了。民众的苏维埃政府将立刻没收地主富豪的房屋、粮食、耕牛耕具，没收与征发大商店工厂的布匹，利用公债基金等来组织大规模的赈灾运动。

同时在民众的苏维埃政府坚决执行上述政策之下，就会很快的解决造成目前中国总崩溃原因的大半。民众的苏维埃政府将利用帝国主义的以及中国的银行企业，来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利用海关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经过一切苛捐杂税的取消与地主土地的没收来大大的发展农村中的生产力，更利用一切内债外债的基金来开浚河道，修理坝闸，种植森林，以防水旱之灾，并大大的用来改良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与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一切劳动民众的子弟在苏维埃政府下面都将受到免费的教育。

在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之下，中国的经济不但不将趋向崩溃，而且将很快的向前发展，如像苏联的兄弟姐妹们一样逐渐走向社会主义。

保障大多数民众的自由

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之下，什么自由都被取消了。任何对于国民党不利的言论行动，都被目为“反动”遭到严厉的压迫与屠杀。在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下面，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没有这种自由。而且苏维埃政权将以没收来的开会场所、印刷所等给与民众团体，使这种自由不是纸上的，而是实际上的。

在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下面，是全中国大多数民众的自由。在国民党下面，是全中国最少数剥削者的自由。并且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面，工农民众才能真正的参加国家的管理，真正变为国家的主人翁，为自己的集体谋幸福。

· 一 致 的 拥 护 中 国 苏 维 埃 中 央 临 时 政 府 ·

这样的政权，在中国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实现。那里的工农民众在艰难困苦中间，在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流血中间，已经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推翻了国民党在那里的统治，开始执行了上面所说的一切政策。在去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成立的中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当然不只是苏维埃区域的民众政权，而是代表全中国民众的政权，是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红军，现在正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为了中国的统一与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血战着。全中国的民众应该积极的起来拥护这一政权，投到红军中去，帮助这一革命战争在全中国的胜利。

正因为这一政权是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众政权，所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曾经用了数十万大兵去“围剿”苏区与红军，造出种种谣言，诬蔑苏维埃政府。然而正因为这一政权有全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拥护，所以三次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围剿”都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每一从赤区流出来的消息揭破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一切造谣欺骗。如像旭日东升般的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与日暮途穷的反对民众的国民党政权，现在正在决死的斗争中，胜利当然是苏维埃政权的！

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对于一切剥削者是恐怖，是“洪水猛兽”，是人间的地狱，然而对于一切被剥削者是欢喜与幸福，

是美丽的天堂，因为在那里他们是主人！

**苏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一切
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的同盟者**

我们在同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做决死的斗争中间，我们不是孤立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一切被压迫民族都是我们的同盟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五年计划在四年内完成，根本动摇了陷在全世界经济恐慌泥坑中的资本主义的统治，照透了资本主义内部所包涵的一切矛盾。欧美各国的无产阶级正在很快的脱去社会民主党与黄色工会的影响，走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已经很快的觉醒了转来，努力着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斗争。

民众的苏维埃政府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是我们的同盟者。它坚决的拥护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苏联，同它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它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结成最密切的联合战线。同时它承认在中国境内一切弱小民族的自决权，一直到它们脱离中国而完全独立。

为民众的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而斗争呵！

为了中国的统一、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自由，为了大多数民众生活的根本改善，全中国的民众必须坚决的起来，站在中国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

治，为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全中国民众现在是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的统治延长一天，民众的痛苦就增加一成，民众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也就愈益加紧。最近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汹涌澎湃，工农斗争与兵士运动的开展，以及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动摇，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使争取中国革命首先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了全中国民众的前面。

全中国民众在争取中国革命在几个省份的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之下，必须更坚决的组织罢工、罢课、罢操、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游击战争、灾民骚扰、兵士哗变，更普遍更大规模的自动武装起来，加入中国红军的队伍内，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与反国民党的国内战争，去根本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伟大事变的前面。我们要大家起来，为了民众的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胜利是我们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罢工策略*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刘 少 奇

中国经济恐慌继续深入的情形下，资本家日益加紧的向工人生活水平进攻。减少工资，加重工作，进行生产“合理化”，开除工人，缩小生产，改三日班五日班，以至关厂停业等。资本家这样把恐慌的重担压在工人阶级的肩膀上，就必然推动工人群众反对资本家进攻的斗争向前开展和激烈化。资本家在恐慌和阶级斗争的威吓之下，就更加采用暴力来镇压工人阶级的斗争，更加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机关结合起来；黄色工会更加法西斯化，并与资本家、国民党打成一片。他们破坏罢工的手段更复杂了，残酷了。这样又使工人的罢工斗争遇着很大的困难。罢工斗争的失败经常威胁着迫切要求斗争的工人。

取消派和右派在罢工的困难和失败的威吓之下投降了。他们说，在经济恐慌和资本家进攻的严重情形之下不应该罢工，因为罢工也是要失败的。可是工人群众总不能完全服从取消派的“真理”，即使是如何的困难，如何的希望很少，工人群众还是不断的起来斗争的。“左”的立三主义者和取消派相反，他们并不看也不估计目前罢工的困难，他们异常轻率的玩弄罢工，使工人受到悲惨的失败。取消派和立三主义者消灭工人斗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出版的《工运指南》第三期。

争的情绪，是一样的。

经济恐慌使罢工更困难了。可是罢工的推动力更伟大了，罢工的内容更丰富了（现在差不多每个工厂的工人都酝酿罢工，都有群众的巨大的不满和许多迫切的要求），罢工的锋芒更尖锐了（都有一触即发的形势，一经发动就是极残酷以至武装的流血斗争），同时使一切的罢工都带着浓厚的政治性质（任何罢工都是违法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工人“不罢工”，也不是去玩弄罢工，我们是要把广大群众的深刻的的不满表白出来，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广泛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配合各厂工人的发动，准备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斗争的决心，克服一切的困难，去战胜资本家、国民党、帝国主义及黄色工会之联合的压迫，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打开阶级斗争的伟大的顺利的前途。同时我们还要去领导那些群众的自发罢工，使群众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去应战。

赤色工会必须努力求得罢工斗争的胜利结束。因为赤色工会是最忠实的拥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最忠实的为群众切身利益而斗争，这是赤色工会争取群众发展组织所必须拿住的关键。可是怎样才能使罢工胜利？使罢工胜利的条件，是群众的广大的发动，广大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群众勇敢的坚决的有组织的斗争。只有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战术，才能战胜已经联合一致了的敌人。因此学习最近的经验，研究敌人破坏罢工的方法，研究罢工的策略，是目前每个觉悟的工人应有的责任。

罢工的正面敌人，是资本家和国民党（在每次经济罢工中，国民党都成为与工人短兵相接的正面敌人），在准备罢工时就应告诉工人不独是要准备力量来对付资本家，而且要准备力量来对付国民党。帝国主义的巡捕房虽然表示他“不干涉”

工人的“合法罢工”，但无疑的是罢工最坚强的敌人。罢工一实现之后，资本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就必然从各方面来进攻工人。这时候最要紧的就是工人能够回答这一切的进攻，使敌人的每次进攻都受到打击和失败。只有敌人用尽了一切办法还不能破坏罢工的时候，敌人再没有方法来对付工人的时候，敌人才在工人面前屈服，罢工胜利。最近敌人主要是用些什么办法来对付工人的罢工呢？

（一）在罢工还没有发动，工人的准备还不充分的时候，资本家就坚决的向工人进攻，开除积极的工人，封闭工人的团体等；

（二）宣布工人罢工为无理捣乱，要求是无理要求，把罢工的责任加在工人身上；

（三）宣布工人罢工为“不顾国难”，为“摧残本国实业”，为“破坏劳资合作”，这是资本家、国民党压迫工人罢工的理论基础；

（四）宣布罢工是共产党的煽动，或是少数不良工人的捣乱，工人是被威迫或被蛊惑而罢工的，把罢工的责任堆在几个领袖身上，作为逮捕枪杀领袖的张本，并使工人与领袖分离；

（五）宣传工厂待遇工人是如何良善，工厂如何注意改良工人生活，工厂的营业是如何困难，如何不能支持，如何无力来答应工人的要求；

（六）宣布罢工是违法，布告禁止罢工，命令工人复工，颁布各种限制和禁止罢工的法令；

（七）逮捕工人领袖，枪杀罢工工人，宣布军事戒严，直接用武装压迫罢工；

（八）封闭罢工领导机关，禁止工人开会；

（九）用关厂政策对付罢工；

（十）开除全体罢工工人，另招新工，利用失业工人，警察、巡捕保护新工上工；

（十一）收买工贼流氓，组织法西斯队伍，破坏罢工；

（十二）不和工人的代表谈判，不承认工人的代表权，答应工人的经济要求，打散工人的团结，开除工人的领袖（外国资本家用这个办法最多）；

（十三）承认一部分工人的要求，而拒绝另一部分工人的要求，引起工人内部的分裂和冲突；

（十四）布告工人复工，限期工人复工，在发给工资时强迫工人复工；

（十五）指使工头、买办等出来，假意调停罢工，与工人谈判，作不负责任的答应条件欺骗工人；

（十六）请求商会的援助，在报纸上作宣传，在工人中制造各种谣言，作种种威吓动摇工人及其领袖；

（十七）再没有办法的时候，资本家就假意答应工人的要求，骗得工人上工，等资本家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马上宣布取消这些条件，或开除工人领袖。

除开上列各项办法之外，国民党还设立劳资调解与仲裁机关，来罗致工人，使工人放弃罢工的武器，走上国民党调解仲裁的圈套，工人一经走上调解仲裁的圈套之后，工人的手足全被束缚，就保证了资本家的完全胜利。在工人情绪很高涨时，国民党的调解仲裁机关也可以假意的给工人规定一些有利益的条文，使工人“满意的”去复工。当工人复工以后，资本家准备好了，国民党又要资本家否认调解的结果，不履行条件，使工人不能再起来罢工。

资本家和国民党为得消灭工人的斗争，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还需要黄色工会这个工具来加强上列各项办法的效用，来

补充上列各项办法之不足。需要在工人中造成一些能够欺骗工人的破坏罢工的黄色领袖，来拥护上列各项破坏罢工的办法，来执行这些办法。如果这一批走狗不能骗工人了，那末可以换上另一批来，由西山会议派、蒋^[1]派、改组派，以至取消派、右派等，尽可以够资本家、国民党的应用，黄色工会许多次的改组，不过是资本家国民党这种政策的执行罢了。

资本家和国民党、帝国主义与黄色工会用这些“法宝”来对付工人的罢工，工人如果不能制服这一切的“法宝”，罢工的胜利就很少可能。最近许多罢工的失败，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罢工策略，是要一方面能够击破敌人这一切的进攻，组织群众的反攻；同时又要调集群众的力量，向敌人举行进攻。了解客观的形势，庄严的估计群众的情绪，精密的计算敌我两方的力量，了解自己的弱点，选择恰当的时机，寻出敌人的要害并利用敌人的弱点分配群众的力量，拿住一切转变的关头，来领导群众，指挥群众作战。在罢工中要使群众不断的取得精神上战略上的胜利。群众的情绪不断的提高，发动的群众日益广大，罢工的威力不断的震撼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力量的重新组合日益有利于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日益提高，使冲突日益接近统治阶级的营垒，这是运用罢工策略的目的。同时在退却的时候，就应该使群众作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退却，不使群众的情绪消沉，不使群众的组织瓦解并能继续加强，继续的准备下一次的进攻。

资产阶级消灭工人斗争情绪，压迫工人斗争的理论，必须在群众中给以致命的打击。“劳资合作”、“增加生产”、“劳资一致共赴国难”等是资本家、国民党和黄色工会压迫工人斗争的理论基础。不在群众中消灭这种理论，群众不起来公开的抵

抗和反对这种理论，资本家、国民党就会站在这个理论上来打击工人罢工。如果工人在理论上承认劳资合作的原则，那工人就应绝对的担负罢工的责任。罢工与“劳资合作”是完全不能并存的东西。过去我们打击这种理论还是异常不够，我们应详细分析这种理论的危害，使这种理论受到致命的打击。

必须坚决反对黄色工会的群众中的合法观念。现在是一切的罢工以至一切工人斗争，都是犯法的，也是违反劳资合作的，要合法就只有任凭资本家如何来鱼肉工人也不斗争。黄色工会所唱的“合法”、“不作轨外行动”、“防止不良分子的捣乱”等，应无情的揭破。工人在罢工后宣布“严守秩序”（资本家的秩序）、“静候解决”，都是应坚决反对的。黄色领袖用怠工来代替罢工（因为罢工犯法更大），罢工后又维持最重要部分不罢工（怕影响社会治安，实际是怕打击资本家太厉害了，如华电怠工照常供电给电灯电车，天津自来水工人怠工照常供给饮水，秦皇岛玻璃工人怠工照常维持机器间的工作等）。不去扩大罢工，不去请求其他工厂工人以实力援助自己（大东工人怕犯鼓动罢工之罪，不去请商务等实力援助），这些东西是最能打散罢工工人的情绪，削弱罢工的力量及同盟军，助长资本家、国民党的凶焰。最重要的部分不罢工，工人宣布“守秩序”、“不乱动”，工人自己放弃最有力武器，资本家、国民党就包管不着急了。可是工人这样做了之后，工人还是犯法的，资本家和国民党还是用“目无法令，擅自罢工”的罪名来逮捕枪杀工人。我们应该告诉工人：只有使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和所有的武器，去战胜资本家，打击国民党，才能使资本家、国民党让步屈服，使罢工胜利，使国民党不敢逮捕枪杀工人。工人要求得自己的生存，就完全不能“合法”，应坚决与国民党的法律作斗争，工人愈怕犯法，国民党、资本家就愈用法律

来压迫工人，一直压迫到工人完全抛弃自己的武器，不能生存为止。“罢工要合法，就是工人的自杀！”

罢工和打仗一样，正是“你死我活、惟力是视”的时候，工人还要讲点客气，怕破坏了劳资的和平，怕违犯了国民党的法律，怕扰乱了社会的治安，怕使用那些足致敌人死命的武器。可是敌人一点客气不讲，敌人发动一切政府、党部、工贼、走狗、法律、黄色工会，以至军队、警察、监狱和报纸等来对付工人。不是希望罢工失败，不是贩卖工人的黄色领袖，不会有这样的战术。

提出罢工的要求，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一）要是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二）要简单明了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能懂得，而且要是中心的要求；（三）要是资本家多少能够答应的要求；（四）最重要的部分要求。因此工人应注意资本家的企业的营业状况，经常调查原料、生产、工资、货物的销售、各方面的契约等，调查资本家在罢工后有无别的资本家来帮忙？应该选择于工人最有利的时机提出要求，举行罢工。要使群众坚决为这些要求而斗争，只有经过群众来提出，不可由几个领袖包办。过高的包括一切的大要求，在目前是很不适宜于进行罢工的。不是群众最迫切的政治要求，不要强迫群众提出，尤其不要把那些无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口号（如反对合理化！反对白色恐怖！反对失业等）写在要求上。在罢工过程中一定会有些新的要求加上去的，如释放被捕工人等，但这些新的要求不可过多，使工人忘记了原来的要求（罢工是为这些要求发动的）。

罢工必须组织罢工委员会来领导罢工。罢工委员会，由全体罢工工人来选举，包括各部分的积极工人，应拒绝那些黄色领袖及工贼、走狗来参加罢委。罢委中应有中心的领导者，消

极动摇的委员可以由群众随时撤回另选。罢委应经常举行会议（每天一次或隔日一次），应有系统的分工，应吸引一切积极的工人来参加罢工中的工作，应使各种问题的解决和执行非常迅速。最重要的就是罢委不要脱离群众，要与群众有亲密的联系，能够很迅速的调集工人，能够完全了解群众情绪的变动，感觉到群众脉息的跳动。应每日将罢工的消息和经过报告群众，一切的重要问题应经过群众的大会或代表大会的通过。秘密的半公开的罢委会，应有几处和群众接头的公开的地方，委员的一部分应在群众中公开的活动。罢委会应注意资本家、国民党各种破坏罢工的手段，很迅速的设法对付，并应在资本家那里布置侦探（各方面都要），探听各种消息。有健全的罢工领导机关，并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是使罢工胜利很重要的条件之一。指定罢委或由少数人选举罢委，罢委与群众脱离，他找不到工人，工人也找不到他，罢委不能应付罢工中的事变或中途瓦解等，这是罢工中很危险的现象，必须为消灭这些现象而斗争。

应使罢工有广大的发动，应发动一切的力量来援助罢工，应使罢工不断的扩大走上整个产业的同盟罢工。在准备罢工的时候，开始就应将罢工的要求和计划等征得本企业中各部分工人的同意，再进而向同产业各厂工人活动，请求他们的同情、援助和一致行动，以至与罢工有关系的各方面凡是能够帮助罢工的，都应预先有接洽。这样在罢工的准备中就有了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结合。尽可能联合各部分的各厂的工人作一致的发动。在罢工发动之后，罢工委员会就应该向各厂的工人、工会以至革命的群众团体大批派出代表，带着罢工的宣言、传单、刊物和罢委的信，到各方面的群众中去活动，召集他们开会，报告罢工的经过情形，请求他们的援助；要求他们发宣

言、募捐、组织后援会，警告资本家、国民党，以至同情罢工等。罢委会并可召集各厂各工会的代表及新闻记者等，报告罢工经过，请求援助。这样使工人方面的统一战线进一步的组成，并推动各厂各业工人罢工的发动，以至提出共同要求，组织共同的罢工委员会，实行同盟罢工，并可在各厂工人中订立互相帮助的正式的条约（如一致的复工或胜利复工的工人以工资的几分之几援助未复工的工人，共同拒绝国民党来破坏，对于被捕被难工人的共同救济，抵御武装压迫的一致行动，以及其他）。这些工作愈做得充分，愈能动员工人群众及社会的力量来援助罢工。用这种力量来对抗资本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联合压迫，迫使敌人向工人让步。在最近的罢工中群众是不是充分的做到了这些工作？可以说完全没有充分做到。相反的，在黄色工会方面倒是组成了他们破坏罢工的统一战线，他们常常召集代表会，组织后援会，发表联合宣言等，要工人“合法”、“尊重党政机关的命令”、“不要破坏劳资合作”等。罢工工人应反对这种上层职工官僚的破坏罢工的统一战线。这种上层统一战线，是资本家、国民党反革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和补充。

大东罢工中门市部工人没有一致行动，公共汽车罢工中开车没有一致行动，华电职员罢工工人中未一致行动（并有黄色工会的阻碍），中华、民智怠工，商务、大东、世界，未一致行动。研究最近的罢工、怠工，工人的统一战线完全没有自觉的组织起来。即有也不过是精神上的以至物质上的援助。但资本家、国民党就利用了工人的弱点，分裂工人的战线，挑拨工人内部恶感和冲突，削弱工人的力量，再从而制服工人。我们应告诉工人一致的联合起来，这是工人的力量的来源。工人内部的冲突，是完全可以调和的。反对资本家、国民党的挑

拨和分裂政策，揭穿黄色工会破坏工人统一战线的罪恶。我们应在这些问题上教育和引导工人，在阶级的立场上一致团结起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苏区中央局 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一致的认为去年十一月苏区党大会是一般的接受了中央对苏区关于肃反工作的指示。尤其是去年十二月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更明确的给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一个总的估量，并指出了一些正确的办法，现在看来仍然是不够的，且还有些没有估计到的；至对闽西肃反工作的估量则是错误的。因此，特成立下列的决议：

一、苏区党大会尤其是中央局指示信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所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给AB团一个致命的打击，破获了AB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的政权。但是，过去因为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的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了，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

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完全缺乏的是反 AB 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 AB 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特别严重的是不分首领尤其是不分工农分子，都一律同样处置。这种错误的结果表现在：对巩固革命势力的积极工作反没有充分执行，很多革命组织与其机关因为“打 AB 团”而打坍了，群众中甚至于党内引起了恐怖与怀疑，使他们生活落入非常状态，同时肃反机关的职权非常广泛而没有限制，甚至落入过反革命的手中，党及青年团、工会组织甚至于医院以及一切群众团体都可以自由的去“打 AB 团”。这一切估量和批评都是正确的。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中的中心错误，现在应肯定的回答：是在对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斗争的方法的错误，并且更在非阶级路线与非群众路线的错误。这种非阶级路线，不仅表现在不分工农与异己阶级分子都一律同样处置，且表现在不从阶级立场上来观察 AB 团、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而落入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和疯狂心理中，去乱“打 AB 团”，结果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对肃反工作表现不积极。非群众路线则表现在：肃反工作完全没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与争取群众，相反的反在群众中造成恐怖现象，送群众给反革命派来利用。因此，中央局指示信说“立三路线与党缺乏明确阶级路线和充分群众工作的错误，都给 AB 团一个发展的机会”，这是对的，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指出：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不仅不能真正消灭 AB 团与社党，相反的，还直接助长了 AB 团与社党的一时发展。江西 AB 团、闽西社党在一时期内潜入了许多苏维埃政权与党和团的指导机关乃至肃反机关本身，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

党过去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错误及以后工作错误，才使他们能有一时期的“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恐慌和夸大的说，苏区各级党和团的机关都被 AB 团、社党霸占了，仍然是严重的右倾错误。

二、党内对 AB 团的认识所以如此扩大，发生如此恐慌，实有他思想的来源。主要的是没有对于自己阶级的坚信心，不相信革命胜利的力量，反相信 AB 团、社会民主党的异己阶级组织比共产党还要严密，还要广大，还能在群众中起很大作用。结果，还不相信肃反的成功，以为 AB 团是肃清不了的。殊不知 AB 团、社党之所以能欺骗群众、威胁群众，全在于利用党的路线错误、工作错误，并非 AB 团、社党本身的反革命政纲能够吸引群众。不从明确党的阶级路线与加深党的群众工作，来进行群众中的反 AB 团、反社党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以巩固革命的阶级战线，而一味的对 AB 团对社党发生极度恐慌，这是基本认识上的错误。

三、反 AB 团、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如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分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相互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回反革命欺骗影响下的群众，相反的，反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四、过去肃反工作既发生了严重错误，于是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局，在一个时期内竟形成了超党超政权的独裁机关。如各地肃反委员会一般的都没有集体的领导，同时也很少受政权和党的监督和指导。有些地方政治保卫局（如江西）与上级断了关系后，竟不受当地的党和政权

的指导，且他的本身又根本无委员会的集体组织。另一方面在有一个时期内，党、团、政权中其他机关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都可以自由肃反，自由捕人。这一切组织上的错误，都给了 AB 团、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以潜入组织来利用肃反机关摧残革命分子的机会。

五、因此，反 AB 团、反社党的斗争，虽有了他的成功，但过去肃反工作的严重错误，他所造的恶果，除掉中央局指示信中所估量的外，更严重的还有：因为“肃反中心论”在党内一时流行，群众斗争的发展遂受了抑制，因为反 AB 团、反社党的斗争方法的恶化与肃反组织上的错误，党和团的组织一时受了削弱，政权和革命群众团体受了损伤，尤其是因此结合了一些错误倾向的干部，甚至 AB 团、社党的分子，都得因此而潜入党内和政权机关；以致党与群众的关系恶化，政权和党及革命群众团体在一时期内竟变成缺少生气的组织，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便大大发展；扩大红军、发展党与引进积极分子到指导机关来的工作，便因为群众恐惧遇到了极大障碍。这一切情形都证明过去立三路线给予苏区工作的恶果，不但未能完全肃清，且因肃反工作的错误又部分的在另一形式上表现出来，而阻碍着执行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因此，如果认为目前 AB 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已不成问题可以置诸不问，这不仅不认识目前苏区阶级斗争的尖锐形势，不仅是从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又走入另一偏向，并且根本不了解党的路线和工作错误。如没有彻底转变，是最足以助长反革命活动的机会的。

六、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在总前委领导时期，对于镇压富田反革命暴动的处置完全是正确的。但对 AB 团的认识与处置 AB

团的方法，便犯了许多上述的严重错误，种下了肃反工作的错误根基。中央局初成立时，又因为对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的错误，致使许多 AB 团的分子得以乘机潜入党内，这更助长了反革命派的活动。后来中央局扩大会后，虽一般的是向着国际路线转变，且打击了对 AB 团的调和错误，以后又曾指出肃反须依照阶级路线，但对于肃反工作的根本错误并未了解和执行及时纠正，以致上述错误反继续发展和扩大起来。直到党大会尤其是中央局指示信后，才将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揭发出来，并指出了正确的出路。过去这些错误的表现，在地方工作中固然十分严重，即在红军中同样严重。有的以为在第一期红军中采取那种非阶级非群众的路线的办法是对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中央局指示信关于闽西肃反工作的估量是错误的。闽西过去肃反工作虽在最后一时期，注意到工农分子自首自新的办法，但一般错误的严重情形并不亚于江西，并不是“肃反工作中的阶级路线比较执行得正确”。一般的说，只有在党大会后尤其是中央局指示信后，各地肃反工作才开始转变，但这一转变还仅仅限于上级。地方上红军下级部队中，对于这一转变的执行，还很微弱。

七、今后肃反工作要执行彻底的转变，则在中央来信及中央局指示信所指出的：（一）要正确的认识什么是 AB 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要与夸大反革命力量、减弱阶级自信心的右倾作坚决斗争；（二）要坚决反对“肃反中心论”，要懂得只有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方能巩固革命势力，肃清反革命派；（三）要加紧反 AB 团、反社党、反改组派、反取消派、反右倾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要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党内与群众中的自我批评必须尽力发展；（四）要健全政治保卫局的组织等项原则，必须立

即执行下列各项的具体工作：

甲、要在群众中将 AB 团、社党、托洛茨基——陈独秀派一切破坏革命，破坏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破坏党、团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的阴谋活动与反革命的暴动的材料尽量的公布出来，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深切的认识这一些反革命派的罪恶，引起群众深刻的阶级仇恨，自动的起来注意和举发这一切反革命派残余的活动，以根本肃清他们在苏区的组织。这一切材料的搜集，应经过政治保卫局或肃反委员会的帮助，由苏维埃政府负责公布。党更应在思想上揭发这一些反革命派乃至改组派、国家主义派、人权派、右派等等的反革命理论与其政治主张，使群众了解这一切反革命派的思想与主张根本与苏维埃革命不能两立，根本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代言人的作用，而深恶痛恨他们。并且要使群众了解：只有在明白了这一切反革命派的思想主张与活动的策略后，才不会为反革命派所骗。尤其要使群众了解：只有在明白了这一切反革命派的思想主张是反革命的，而加以公开的斗争和反对以后，才能保障群众的革命战线的巩固。这一切在群众中与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和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党不仅在党报上、在宣传鼓动工作上、在出版的小册子上，要加重这一工作，并且在经常的组织工作上、在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上，也都要加紧这一工作。

乙、关于过去反 AB 团、反社党斗争的正确和绝对必要，与在肃反工作中犯了非阶级路线非群众路线的错误，须在群众中作一广大的解释工作，并有领导的发展党内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务使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打破过去党内生活的沉闷与党内外群众的恐怖心理，以肃清过去肃反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但这一解释与批评，绝对要防止专门消极的批评和指

斥过去，不将问题的中心和阶级仇恨放在怎样去做消灭 AB 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上，甚至以为过去工作做错了，现在连 AB 团、社党等也不要反对了，或者以为 AB 团、社党根本便没有这个东西，这都是极严重的取消倾向。尤其要绝对防止一切反革命派利用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向党和革命进攻而重新活动起来。谁要忽视这一点，谁就是有意无意的帮助一切反革命派！同时，谁要仍旧坚持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而不承认错误的，党必须与之坚决斗争。

丙、须加紧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要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及其工作方式。要反对富农路线和侵入党内的农民意识，要反对实际中的机会主义及口是行非的两面派。党只有经常的不断的进行党内的反倾向斗争，即使是很小的没有形成的倾向，也要与之作不调和的斗争，那才能最终的克服 AB 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右派在党内的影响。同时要弄清楚：凡是党内犯有错误倾向或工作做错误了的党员，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他是加入反革命派的暗藏分子外，即使他的错误是接近于反革命派的或易于为反革命派利用的倾向和行动，党也只能个别的给以思想上的斗争一直到组织上的制裁，而不能主观的认为这些党员便是 AB 团、社党、取消派或右派。这种情形在群众中更须分别清楚：反对和肃清 AB 团、社党及一切反革命派是一件事，纠正群众中的错误见解与行动又是一件事，而且这后一工作须用最大的教育力量和发动群众起来与他斗争才能有效。

丁、为根本肃清 AB 团、社党及一切反革命派的组织和活动，苏维埃政府应颁布处理反革命犯条例和加入反革命派的分子自首自新条例，并以明令确立革命秩序与保障革命群众的权利，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不致因 AB 团、社党及一切反革命派

的捣乱与政权对他们的镇压，而发生任何恐慌和动摇。红军中如发觉有反革命派的分子，虽经承认自新，一般的必须开除军籍，以巩固红军的一致。但如果因为过去肃反工作错误而遭受滥捕的，其本人完全系被骗的工农分子，则虽系自新，亦可留在军中。自首分子如不是反革命派的积极分子，可以留在红军中，但这些必须调换他担任不关军事重要的职务来考察他。党内如发生反革命派的自首分子，一般的原则仍应开除党籍。如有工农出身的党员，确系被骗（如并未说出反革命组织，或保险公司等其他名义来骗人的）和被胁迫（在失掉自由时为反革命派强制执行的）而又未参加反革命派任何积极行动的，则自首后可以酌量情节轻重给以组织上的制裁，不一定开除出党。

戊、须加紧执行肃反工作的检查。对过去执行肃反错误路线的分子或机关，如在党大会决议尤其在中央局指示信发表后，仍不更改其错误的，须予以纪律上的制裁。过去负肃反工作同志如发现在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有腐化、营私、贪污以及种种非阶级行动时，党及政府工农检查所必须予以严厉的检查 and 处分。

己、关于暴动区域或红军新占领区域的肃反委员会组织与工作范围，中央局另成立一决议解释之。

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必须系统的建立起来。他的组织原则应是集权的，但须在党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指挥之下由委员会管理工作。下级分局亦均设委员会管理各级委员会，必须有党委负责者之一参加。红军中亦须建立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工作。保卫局的组织纲要应由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之。

八、这一决议，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

行，并将执行的情形于二月（远的省份迟至三月）中按级报告到中央局。

中 央 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互济会的领导 给各级党部的信

(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

各级党部：

互济会是最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之一，是党夺取和教育大多数劳苦群众的组织之一。它的基本工作是反对白色恐怖，援助革命战士。在反白宣传与斗争中，不仅可以使广大劳苦群众认识统治阶级对革命群众的残暴，并且间接即足以揭破他们一切武断宣传的虚伪与无耻。援救革命战士的工作，不仅使革命战士可以得到物质与精神上的援助，并且可以鼓起劳苦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决心与勇气，并且由此可以使广大的群众了解革命者的政治主张与行动。……互济会是一所革命的学校，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将更容易接受党的政治主张与一切革命团体之号召与动员。在过去，互济会没有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是因为它一再的陷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没有执行正确的路线。

自去年中央详细检查互济会的工作，指出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与今后任务之后，济总党团已切实的改正了自己的路线，积极的领导互济会的组织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在反白工作、援救工作、拥护苏维埃工作中都有了相当的成绩，但是互济会的下层组织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机会主义的束缚。这首先表示于他

们不相信群众与畏惧群众的情绪，不敢争取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去动员广大的群众进行反白斗争与援救革命斗争、革命战士的工作。济总正确的领导时常不能在下级组织中准确而迅速的执行。这原因一方面因为互济会缺乏坚强的干部，组织的薄弱，两条战线的斗争犹未能深入于实际的工作之中。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各级党的组织没有切实的领导互济会的工作，相反的在许多地方，我们看到有些党的组织还不十分了解互济会的工作对于革命斗争的意义，还有许多机会主义的观念。如认为互济会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机关，互济会不能作政治斗争，互济会不能单独领导群众起来进行反白及援救革命战士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有些同志认为互济会的工作是“没有意思”的，命令在互济会中工作的党员完全放弃反白及援救的工作。现在白色恐怖正笼罩了全中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屠杀、逮捕、搜查、开除……随地的猖狂着，在监狱里一万以上（只就几个大城市计算）的革命战士正在饥寒疾病之中挣扎呻吟。加紧反白斗争与援救工作对于革命十分迫切的任务，党应用最大的力量来领导互济会的工作。因此，我们号召各级党部切实执行下列的具体工作：

一、各级党部立即详细检查自己领导之下的互济会的工作，在各级党部中应有一人专门负责领导互济会的工作，并须在互济会中成立党团的组织，经过党团去切实领导全个互济会组织的工作。同时，今后党团员及工会会员应尽可能的加入互济会，要绝对消灭过去各种组织对立的现象或甚至“彼此互相夺取群众”。

二、在目前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时期中，各级党部应无情的反对互济会工作人中的“关门主义”与畏惧群众的观念与所谓“群众怕组织”的“理论”。抓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

党屠杀群众与普遍灾荒的环境，领导他们争取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群众去反对白色恐怖（屠杀、逮捕、监禁、开除……），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战争，用群众的力量来冲破白色恐怖。特别要在这些斗争中加紧揭露一切反动派别的欺骗政策与资产阶级的“慈善”机关（如赈灾委员会、红十字会及教会等团体），以具体事实向群众解释，使他们完全失掉对于这些派别的幻想，争取一切革命行动的自由。

三、领导互济会公开或半公开成立各种惨案后援会，筹备广大的群众会议，追悼革命战士，及组织群众去救济革命战士及其家属（如反帝战士，罢工工人，斗争的灾民……），扩大反白的宣传与互济会组织，要使互济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广大群众组织。

四、互济会现在所举行的冬季募捐以及一般的日常募捐，在政治上与实际救济工作上都有极大的意义。党应当消灭各级互济会工作人对于总会的经济上的依赖，因为互济总会的经费是处在万分困难的情形之下，要将救济革命战士工作由广大的劳苦群众来担负，即由他们来捐助。党不仅要领导互济会，并且要动员自己领导之下一切的革命组织（青年团、工会、反帝同盟、文化团体……）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各种各式的募捐，拿募得来的钱或东西直接救济当地的在狱战士与家属，用这种实际工作来兴奋互济会的会员与扩大互济会的影响。

五、互济会因过去一贯的没有充分的教育工作，十分缺乏干部，因此在没有互济会组织或组织十分薄弱不能担负起自己任务的地方，党的组织应立即派有力的干部去建立或加强互济会的工作。但这绝对不是要党包办互济会的工作。互济会工作建立之后，应立即经过中央转给互济会总会，由他们去直接领导。并且在开始建立互济会组织时，绝对不应机械的将几个党

或团员集合起来变名为互济会，而是要详细研究济总的文件，了解互济会工作的性质与内容，吸引同情革命的分子参加，在实际工作中帮助互济会，培养互济会工作的干部。党只能经过党团去实现自己正确的领导。同时党应号召一切同志和领导下的群众进行各种口头与文字的宣传，解释互济会在革命中的作用与意义。

六、各级党部及其领导下面的群众组织，应在工作中尽可能的帮助互济会找寻或注意与在狱战士的关系，打破监牢与外间的隔膜，务使所有在狱战士不致落在无人过问的境况中。

七、各级党部以后报告工作的时候，须详细说明自己对互济会工作的领导与互济会工作的情形。互济会工作之好坏，也将是中央决定各级党部群众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 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一、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民经济的崩溃在全国范围内及一切经济部门内进行着。工业的危机迅速地开展着，丝纱面粉等主要的轻工业部门都处于恐慌与衰落的情况中（上海丝厂开工的仅十分之二，其他各地亦一样，丝厂工人失业者在十万人以上，纱厂方面厚生、三新等厂倒闭，日本厂的纱锤织机迅速增加，面粉业开全工者仅五月）。重工业更加非民族化而处于帝国主义的垄断的状况之中。农村经济的崩溃更是急剧而激烈，地主的高利贷者的奴役与剥削，军阀的搜括与不断的内战，帝国主义的掠夺之外，更加上了空前的水灾，几十万的农民群众被大水淹死，几十万栋房屋为洪水所毁灭，几千万的农民在寒冷的冬天冻饿死亡。十四万万亩以上的土地被水冲荡而失去任何收成。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的奴役与剥削农民造成了空前的水患，但是他们对于这些被灾的饥寒交迫生死不得的农民不曾有任何的救济。他们利用赈灾的名义，发了八千万公债，加了几十种捐税，向美国帝国主义借了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出版的《实话》第三期。

高利贷式的美麦借款，而一点都没有用到灾民身上，相反的更加用工赈急赈的名义奴役农民，在灾区中更增加了许多新的苛捐杂税。资本家更利用广大的失业失地的劳动后备军，来扣减工厂工人不得一饱的工资，来增加他们的工作时间。地主与高利贷者更利用时机来剥削他们。国民经济的浩劫，使无数千万的劳苦工农受到骇人听闻的惨痛、贫困、饥饿、瘟疫与死亡。千百万群众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

二、经济危机的深入直到国民经济总崩溃，无数万工农群众的灾难与痛苦，及他们革命斗争的剧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运动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国民党不但不能消灭甚至不能暂时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三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阀受到悲惨的失败，红军击溃了十五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结果，仅仅在赣南，红军就获得了二万支以上的步枪，五百万发的子弹，一百五十支以上的机关枪，俘虏了二万余人。从第三次“围剿”冲破后，红军更得了许多新的胜利，闽粤赣苏区恢复了杭武永苏区，占领了永定、汀州、连城，发展和扩大到宁化、清流。赣东北区不但与闽北崇安、铅山一带苏区联系一起，并且向着浙皖边发展，占领了常山、婺源等县城。鄂豫皖区扑灭了反革命派破坏红军的阴谋，大大地巩固了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并且占领了英山、霍丘与黄安的县城。湘鄂西区贺龙同志所领导的第三军与九师会合后，更巩固了洪湖根据地，正在与敌人艰苦的战斗中创立襄河北岸的新的根据地。湘鄂赣与湘赣边都一样的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向着蒲圻、嘉鱼及上犹、崇义发展着。中央苏区不但恢复了第一次“围剿”前的区域并占领了赣南会昌、寻乌、安远、信丰各县，并且正在围攻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由于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的全部投入红军（约二万余人），宁都、广昌都重新入于

红军之手，并且占领抚州，吉安已如孤城，反动统治在江西所保持只有南浔路上的八九县。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红军坚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夺取了敌人的武装，武装了自己，向着红军铁军的道路上前进。红军已经成了伟大的坚固的革命的铁拳。由于苏区内部反革命组织的破获，及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毒害坚决的肃清，没收来的土地的重新分配给苦力雇农和基本的农民群众，苏维埃机关的改造与阶级异己分子的肃清，大大地提高了工农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及苏维埃政权在他们中间的威信。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建立给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以总的领导，更能顺利地实行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奋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奋斗。

三、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日渐崩溃，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火、军费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的公开的武力干涉，这便产生了日本的武力占领满洲的事变。同时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企图将满洲变为自己的完全殖民地，变成为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他并且企图经过自己的走狗韩复榘、阎锡山、冯玉祥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国帝国主义完全同意与援助日本的行动，企图实现反苏联的军事冒险与占领云贵。英帝国主义部分的赞助日本的行动，只要日帝国主义者不侵入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帝国主义者，它的企图是将全中国放置在自己的金元势力之下，在事变开始的最初时期取了等待与观望的态度，实际上同样的帮着日本帝国主义来掠夺中国民众及造成反苏联的场地。事变

的开展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与日英帝国主义集团矛盾。目前形势显然是：在反对苏联的战争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国际联盟及美国都一样是掠夺和压迫中国的强盗）。他们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的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冲突与矛盾。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的策略之中心。对于中国劳苦群众的掠夺与瓜分中国是在急剧的进行，红军苏维埃的发展将促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的武力广大武装的冲突的整个历史的阶段是在前面。因之党的任务是：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护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来争取中国的统一。

四、经济危机的加深，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与瓜分中国的急进，这是决定中国目前情势的三个因子，是生长中国革命危机的三支柱石。经济危机深入到国民党经济总崩溃的地步，使得千百万的工农生活极端恶化，失业失地，饥饿寒冻，使得他们的斗争极端紧张，因为他们只能在反抗与死亡中选择自己的出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与红军，成了新的革命高涨的柱石，成了全中国劳苦群众革命争斗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和红军的光荣的胜利，给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劳苦群众指出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道路。满洲的事变警醒了最广大的劳苦群众及城市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的觉醒，激动了他们的仇恨、愤懑与反帝国主义的热忱。国民党统治的必然的投降帝国主义，更促进反帝运动转变成为直接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争斗。

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在高涨着。在工厂中，在矿山中，在铁路上，在轮船上，在苦力与黄包车夫中，罢工斗争不断的爆发着，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接二连三的禁止罢工的命令。罢工斗争大部分是经济的斗争，但是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的密切的联系及罢工的顽强性与坚持性是目目前前罢工斗争的主要的特点。个别的反帝国主义的罢工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已经在个别的城市发展到了总同盟罢工的形势（如太原一天的总罢工），许多产业部门爆发着酝酿着一业同盟罢工（如招商局，上海的纱厂、印刷、市政等）。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与黄色工会的一致的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英勇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在国民党统治总的崩溃的基础上，黄色工会的反革命的面目、反工人阶级的面目亦逐渐被工人阶级所认识。开展着的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正在蓬勃起来。黄色工会的新的欺骗亦层出不穷的积极进行，常常用假的领导来消灭工人斗争，一部分群众还对他们有多少幻想。必须深刻的估计到罢工斗争极大部分是自发的，党和工会对于罢工斗争的领导还是非常薄弱。党和工会还缺乏有耐心的艰苦的准备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罢工战术与策略上的许多错误，使得个别的在赤色工会领导下的斗争不曾能够得到胜利的结束。罢工经验的研究是非常的不够，争取黄色工会中会员群众的问题还没有郑重的提出。赤色工会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还是非常的不充分，它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还是非常薄弱。

反帝斗争吸收了新的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从和平的请愿转变到剧烈的示威与军警肉搏，捣毁国民党部与政府机关。广大的群众在几月来斗争的经验上认识国民党统治的卑鄙无耻与投降帝国主义，感觉到非推翻国民党统治与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不能够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要求政权建立民众政

权的企图在广大的群众中成熟着，并有了初步的尝试（如民众法庭等）。但是这个运动主要的还建筑在学生群众身上，工人群众还没能够成为反帝运动的主力，因之运动还缺乏坚持性、顽强性与清晰的口号。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不能够抓住一切群众争斗的领导，对于一切反革命派的争斗还是不充分。有些党部落在群众的后面，有时有些党部又害怕与学生群众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争斗，有些党部采用了不可允许的关门主义的政策，放弃反帝运动的领导（如陕西），一般的还不能够将反帝运动与工人群众的经济争斗亲密的联系起来。

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广大的农民与灾民争斗日益开展，抗租抗税、抢米分粮、捣毁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及游击战争是这些争斗的形式，甚至发展到地方暴动占领县城（如长乐）。

士兵的争斗、哗变是同样的发展着，二十六路军全部（二万余人）投入红军。各地零碎部队的投入红军与哗变都证明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影响着反革命的军队崩溃与瓦解。同时党在农民群众及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还是非常的缺乏，甚至还剩留着机会主义的消极。

五、红军与苏维埃的胜利的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中高漲着的工农革命争斗，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与互相的把戏花样，将四年来统治中国、出卖中国、压迫劳苦群众、屠杀劳苦群众的军事独裁者——蒋介石的政府推翻了^[1]。继起的新政府，国民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这里面，蒋介石派依然占有重大的影响），依然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在阶级的实质上，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当然不会有任何的变更。新政府中亲日势力的优势，将使它更迅速地完全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屈膝匍匐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面前。同时这一政府只是不稳固、暂时过渡的政府，各派军阀及其幕后的帝国主义者正在积极的准备着新的

军阀战争——这个战争是被全国的反日的怒潮与红军的胜利所阻止着。

在目前形势之下，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广大群众认识了国民党统治的卑鄙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武断宣传与欺骗已经不能使广大的群众相信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积极起来，改组派的“国民救国会议”、江苏耆老的“国难救济会”、第三党的“和平政府”、托陈取消派的“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所有这些主张，他们一致的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他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向国民党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六、估计着目前的形势，必须指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苏维埃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党必须更进一步的巩固工农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及其临时中央政府，执行正确的以工农革命利益出发的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用一切力量开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农革命争斗，加紧反帝运动的领导，加紧对工人自发的罢工争斗的领导，将工人组织到赤色工会中去，争取黄

色工会的会员群众，发动领导农民与灾民的争斗，瓦解反动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

七、在苏区方面：（一）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在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胜利的进行革命的进攻，要求我们要来巩固红军，加紧红军战士的政治训练，改善红军的成分，动员城市的无产阶级到红军中去，提高红军战士的积极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一切反革命派的破坏红军的阴谋。（二）土地问题的正确的解决，在提高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在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上有决定的意义。绝对不允以强力及苏维埃的命令强迫进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必须用发展农民自己的组织创造力与毅力来进行。保护雇农、贫农的利益，反对富农，估计到中农群众的利益是党在平分土地中领导的原则。不得中农的同意，不能够更动他的土地。党必须坚决地进行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与中农。富农（大多数是封建的剥削者）的土地亦在没收之列，但是在他自己耕作的条件之下，他可分得一部坏的“劳动份地”。（三）一切经济政策、租税政策上的过早或妨害基本农民群众利益的办法（如鄂豫皖、赣东北的高税率与不坚决执行免除贫农一切捐税，赣东北的组织苏维埃农庄的企图等），应该立即纠正。（四）坚决的改造下层苏维埃机关，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

子，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进行苏维埃的建设。建设苏维埃机关的一切日常的工作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方法。（五）一切忽视改善工人生活，对于执行劳动保护法的忽视，将给阶级敌人以很大的帮助而妨碍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对于创立苏区中的群众的赤色工会工作之迟缓是一刻也不能忍耐的了，必须立即派选得力的干部来进行组织工人阶级自己的阶级工会的工作。

八、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争斗，领导一切群众的部分的日常的经济的争斗，领导反帝争斗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里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争斗。只有工人阶级的罢工争斗能够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与失业工人争斗以坚定的信念、不折不挠性与革命顽强性。因之，党在工厂中间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会员中间的工作，现在是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急切。小心的准备一切工人阶级部分争斗，领导一切工人自发的争斗，组织与准备工人群众的年关争斗，发展赤色工会，争取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组织工人选举的罢工委员会并转变为工厂委员会，组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共同的争斗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吸收失业工人参加，这是目前的主要的任务。自然，必须将工人阶级的经济争斗善于引导与联系到反帝的争斗、拥护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争斗。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的工作的中心应该集中到工厂中去，到工会工作上去，到领导罢工争斗上去。

党必须抓紧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的暴行、法国的其他各国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的行动（法国侵入云南，英国的占领西康等）及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如不抵抗、订立中日密约、三井

借款等) 来开展群众的反帝斗争的新的阶段。各级党部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地勇敢地去实现国际最近对于加紧领导反帝运动的指示。在一切宣传鼓动之中, 加紧去揭破一切国民党的出卖民族、污辱民族, 加紧去揭破一切反革命派的实际上帮助国民党维持他的反革命的统治。广大的宣传民众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口号, 使广大的群众了解只有苏维埃政权是真正的民众政权。党和苏维埃政权应该号召民众武装起来, 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 并再告诉群众, 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是求得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更进一步的开展反帝斗争, 领导群众的反帝斗争, 组织反帝的罢工, 到处在工厂中、学校中、兵营中、街道上组织群众的反帝组织, 并创立每一个城市的反帝代表会, 组织反帝的示威, 争取反帝示威的自由。加紧的反对一切在野的派别, 在组织上巩固党的政治影响的开展, 这是党在反帝运动中的中心任务。

对于一切灾民的抗捐抗税的斗争、士兵的斗争, 党应该加以坚决的领导, 一切对于这些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应加以最严厉的打击。党应该站在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斗争的领导地位。应该发展这些斗争, 来破坏国民党政权, 来拥护和援助红军的行动, 组织这些斗争成为响应红军的胜利的进攻的浪潮。

在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 准备党的组织与党员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阶级的决战, 是十分重要的。这里必须首先加强党员的政治教育, 提拔新的工人干部, 考查教育旧的干部, 特别应该注意到敌人的破坏党、混入党的阴谋, 而严密党的组织。同时应该广大的征收工人农民及一部分贫苦的革命学生到党内来, 改善一切党的组织的领导的方式, 应该把一切问题集中到

支部去，改善支部的生活，建立在工厂作坊中的党的堡垒。

为执行党面前的战斗的任务，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无情的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上的争斗。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这种倾向在现在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危机紧张的估计不足，对于红军行动的消极、悲观，失望的胡说红军涣散，不愿意利用顺利的形势开展进攻的争斗，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做永远不变的教条，对于工会工作的消极，忽视工人的经济争斗，认为工人争斗在经济恐慌之下是不可能的，在反帝运动中作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等。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左”的倾向危险，由于革命危机迅速成熟，亦逐渐的增长起来，和立三路线复活的企图（如主张号召上海的工人放弃在黄色工会中艰苦的争取他的会员群众的工作，而主张小部分工人自动退出黄色工会等）。对于这种倾向的斗争一分钟亦不能放松。应该反对一切口头上承认决议案的正确而实际抵抗，或不想一切的方法去执行决议案的两面派的态度，艰苦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发展自我批评的与深入两条战线上的争斗。中央坚信各级党部的同志，必定能够完全实现这个决议，而确立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决议，准予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海陆空总司令本兼各职。推选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中共中央关于同苏区内 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

(一) 在立三路线的统治之下，在各苏区内的党实际上执行了十足的富农的机会主义路线。地主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没收；所有土地革命的果实，也完全落到了富农的手里；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等的机关，也很多为地主富农分子把持着，执行着他们的意志。因此，那时在苏区的阶级斗争没有能够扩大与深入，甚至有人以为在苏维埃区域内根本用不到阶级斗争，而主张和平的转变到社会主义。

(二) 自从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传达到了苏区，并且在苏区开始执行以来，苏区的阶级斗争是一天一天紧张起来了。地主与富农分子看到自己地位的根本动摇，便团结他们的力量，利用一切方法与一切机会，在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等内部进行各种反革命工作，企图推倒苏维埃政权，恢复旧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其次，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围剿”，更其帮助他们加紧了这种斗争。所以在最近各苏区内发现了 AB 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与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阴谋，实是不足奇怪的。

(三) 这些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活动的方法，主要的是在利用这些组织的分子所把持的机关，对于党与苏维埃的政策的确

行怠工，或是有意曲解这些政策，造成民众对党与苏维埃的不满意，而反对这些政策。他们更常常利用党与苏维埃所犯的错误，扩大与夸张这些错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此外，他们更直接破坏苏维埃的建设，暗杀党与苏维埃的负责人，散布扰乱民众视听的谣言，串通外部敌人，以至直接举行反革命的暴动。一切民众对于党与苏维埃的不满意，他们都要拿来当作反对党与苏维埃的资料。

（四）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作最坚决的斗争。要从最坚决的阶级立场上，把一切阶级的异己分子从党内苏维埃内与职工会内洗刷出去。要最无情的对付一切反革命团体的领导分子。必须最广大的在民众前面，宣布这些团体的政纲与他们的罪状，在革命法庭前面公开审判他们，把他们依照苏维埃法令治罪。必须用很大的决心，成立政治保卫处，有计划的与有组织的同这种反革命团体作斗争。对于一切推翻苏维埃的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必须最坚决的用武力镇压下去，绝对不容有丝毫的犹豫。

（五）然而，在同这些反革命团体斗争中，我们绝对要防止夸大这些反革命团体的力量，或是把他们看做神秘不可思议的东西，而表示出慌张失措的情绪。对于他们内部的领袖与群众，应该从阶级的立场去处罚他们，应该把主动与被动者严格的分别开来。必须坚决反对把一切反对党与苏维埃政策的分子，把一切对党与苏维埃取反对或不满情绪分子，或对党与苏维埃的指示消极怠工的分子，都看做是同一团体的分子的倾向（如像在中央区、在闽西），对他们采取同一的办法。这种倾向只会夸张反革命团体所有的力量，或是使他们的团体变为神秘不可思议的东西。

（六）应该很明确的了解在苏区内所有复杂的阶级关系。

除了豪绅地主残余、资本家、富农与无产阶级之外，在苏区内还有中农、贫农、苦力等人数很多的许多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因为中国革命中红军所有的特别作用（创造出苏区的作用），所以不一定在每一个苏维埃区域，一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阶层会立刻了解或完全了解苏维埃的政纲与法令，会立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党内“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国际与四中全会路线的曲解与怠工，更会造成这种障碍。无疑的，这种不了解，这种不信任，会给反革命所利用。但对于这种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党只有加紧对于他们的教育工作，发展他们反地主反富农等斗争，使他们在实际经验中知道党的路线的正确，把他们夺取过来。对于他们的任何强制与压迫，只能帮助敌人，反对革命。

（七）不要梦想以党的与苏维埃的一些军事的、刑事的、法律的、组织的方法，会消灭苏区内部的反革命。要达到这一目的，最主要的还是发动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把雇农工会、贫农团、职工会等组织起来，彻底实行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提起广大劳苦群众的积极性，吸收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加入党、青年团，参加苏维埃等的领导工作，来代替那些昏庸腐化的以至一切地主富农的分子。只有这样，才是根本消灭反革命分子的最基本的办法。

（八）反革命分子混进党内（苏维埃内以至红军内），这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但不能把党内的一切消极怠工的分子，在政治上犯有“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分子，都看做是反革命团体的分子。党决不能因为反对反革命团体的分子，而取消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取消党内的一切教育工作。却正相反，正是为得要消灭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党内的影响，所以必须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党内的教育工作。一切机会主义者、消极

怠工的分子客观上必然是反革命分子的帮助者，但不一定每一个机会主义分子都是反革命团体的一分子（在一切其他组织内都是如此）。只有这种斗争，才能把无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洗刷出去，教育一部分尚能改正错误的分子，肃清反革命分子在党内的影响，来巩固党。

（九）最后苏区内的党与苏维埃以至其他组织，必须最严厉的检阅自己的工作，发展自我批评。只有使自己的工作真能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改正一切所有错误与缺点，才能把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吸引到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揭破一切反革命的欺骗宣传。把同反革命团体的斗争，同检阅自己的工作与自我批评的发展对立起来，或甚至借这种斗争为口实，禁止检阅自己的工作与压制自我批评的发展，实际上都是在帮助反革命与反对革命。而且这种方法，也正是党内与苏维埃内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来造成民众的不满意，以反对党与苏维埃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改善和加强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

王 稼 祥

过去苏区内党的工作犯了极严重的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的错误，红军中的党犯得更严重。因为党要包办一切，结果就取消了红军中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取消了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的独立工作，军事指挥员也因此消失了作用。于是军队中参谋、经理、卫生、教育、管理等等一切事务全集中于党部，党部成为处理军队中日常事务的集团，因此在支部生活中就普遍的流行着“不要谈大问题，党的路线和决议不必在小组会中讨论，因为党员政治水平低，不懂得，只要讨论卫生吃饭等生活问题就够了”的极大错误。

这种党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错误的来源，是因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领导作用，以为包办就是领导，不包办就没有领导了。其实包办正是减弱和降低党的领导，因为群众只见到共产党党部是处理事务的管理处，根本模糊了党的政治领导。而且党只忙于部队中的经常事务，自然要忽视和放松党的教育，减弱党的政治宣传鼓动，使党的政治影响不能扩大，党的领导削弱。因为党的领导是要在群众中实现党的主张，提高党的威

^{*} 这是王稼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给红军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党的支部委员会的指示信。

信，把群众吸收到党的周围，积极拥护并执行党的路线。党要在路线策略上来领导革命，在执行路线的工作中来领导群众。所以，坚决的反对党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加强党的自身教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中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

这个转变在红军中的党内是开始了。但是，在这个开始转变中，许多的支部工作又走上了另一不正确的危险道路，即在反对党的包办、反对党的事务主义的口号之下，有些支部竟连部队中教育工作都完全不闻不问不去领导了，连上发生腐化（吃酒、打牌、嫖娼等）、贪污（将土豪罚款作伙食尾子分，将没收土豪的款子私发零用钱）等等极坏的现象，支部好像没有望见一样；至于群众生活、群众情绪，都认作完全是军事机关负责人应注意的事，支部全不加以注意和讨论。因此支部成了党校，小组会也从仅只讨论党的决议变成了政治研究组，把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任务完全放弃了；甚至于有个别党员认为党员有特权，什么事都自己不做，袖手旁观，指挥群众去做，说这就是领导，这都是非常错误的危险倾向。

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组织基础，是党与群众的连环，所以，支部要特别注意本环境中的群众教育、群众情绪，要将党的决议在群众中实现，要积极的在各方面去领导群众，这样才能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巩固党在革命中的领导。

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红军中党的支部是与地方支部有几个极大的不同点：（1）红军中支部工作的独立性较少，它要绝对服从并执行上级指挥员（政委及军事指挥员）及政治机关的一切计划。支部的工作绝对不能超出或违背上级的计划范围，因为红军是一种集中的组织，尤其是它有特殊的任务，所以红

军中党的工作是保障一切计划的实现，巩固红军的战斗力和纪律，使红军很顺利地完成任务，因此支部工作绝不能违背红军中的集中原则。(2) 红军中党团的民主性较小。因为要巩固各级指挥员的威信，要巩固红军的团结力，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方面，都不能妨碍统一指挥的原则，而要保证指挥员的威信。(3) 领导群众的斗争策略与地方支部则完全不同，因为红军中群众斗争的对象是不正确的思想，不努力工作，落后，破坏红军纪律，破坏红军战斗力、团结力及其他一切恶习等等不良现象。党绝不能领导群众反对指挥员（除非指挥员已公开反革命了）。至于白军中党领导斗争的策略和对象则完全与此不同，其他地方支部的工作也与此不一样。这三点是红军中支部与地方支部极端不同的地方，因此红军中党的支部正确的工作应该是：

一、要将党的路线策略等在支部中充分讨论，并必须计划到如何去在群众中实现这种路线策略的具体工作方法，绝对不能把党的决议仅仅当作问题来研究，而不去计划如何实现的具体方法。

二、反对包办，绝对不是说对于党部所在的环境中所有群众问题完全不管，而是说党不要把军事机关的工作都一手包揽过来，而是要从总的方面来领导。反对事务主义，也不是说完全不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而是说党要注意本身的训练，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党不能只限于事务工作。支部必须注意群众生活、群众情绪，并设法来解决群众的生活和情绪，这样才能巩固革命的力量，才能表现领导的作用。

三、部队中训练管理等计划，支部一定要讨论出具体计划，去发动党团员努力保障各种计划的顺利实现。要注意消灭游击主义和军阀习惯的残余，要讨论改善群众的生活和一般情

绪的方法，防止纪律松懈、公共卫生疏忽、腐化及对各种工作怠工消极等不良现象。

四、在各种群众工作中（列宁室、互济会、反帝同盟及地方工作等）应吸收非党群众积极分子来参加，不要全由党员包办，妨碍群众的工作积极性的发展。

五、支部要有计划去训练党员（总支部应办训练班），要从各方面去提高党团员的政治水平。要切实领导和指导党员的工作，提高并发展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要注重对党员个别的训练，以消灭党员比群众落后的危险现象。

六、支部要特别注意党的发展问题。要在各种问题中宣传党的路线、党的政治主张，在各种运动中、各种工作中去考查并训练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把那些成分好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介绍党员时一定先有充分的宣传工作，要使那个人了解入党的意义或有人党的动机而愿意入党，然后才介绍。要坚决反对拉伕式的介绍（如未做宣传工作或未得其同意即填介绍表），同时更要注意，一定要有点工作能力、能有发展希望的人才介绍，不要把过于老实、工作上没有发展希望的人拉进来，影响党的生活死沉下去。

七、要发展自我批评，改造党的思想斗争和工作，但要消灭过去把吃饭睡觉等等无关重要的问题都拿到支部大会及小组会上去互相争辩和斗嘴。自我批评要将那些工作不积极或工作错误以及思想不正确等等大的问题拿出来谈，这样可以纠正同志的思想，推进同志的工作。若只谈无关重要的问题，不但对党的工作没有什么帮助，而且容易造成互相攻击。

八、支部要特别注意小组会的改善。要指导小组会，讨论党的决议时一定要定出实现这个决议的小组工作计划，防

止空泛讨论的危险，要经常帮助小组长领导小组会及小组的工作。

九、支部对连长的工作有意见时，应向政治委员建议。要政委注意批评连长（是党员）的工作，只能在党的大会及小组会上，绝不能在非党的大会上提出。

十、关于各种要发动群众的工作（如纪念周、扩大红军及其他宣传等工作），一定要在党员大会或小组会上先做报告并详细讨论，先使党员对此问题有充分了解和工作把握，然后才易于在群众中去宣传鼓动，推动群众。

十一、政委不兼支部书记，因政委要领导支部，若政委兼书记则政委领导支部的作用又取消了。但政委一定要注意对支部工作的领导，绝不能以为不兼书记，党的工作就对他无关系了。

十二、支部书记不要脱离原有工作，这样防止专门办党的危险，同时因公开工作关系，更易于接近群众，但应减少支部委员在部队中的勤务。

十三、要从支部委员中推选一个副书记，这样不但可以多训练干部，并且当书记不在队伍中时不致使党的工作停顿。

十四、支委要有很好的分工，建立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消灭过去书记一人包办的现象，组织、宣传委员的工作要健全地建立起来。例如发展问题，组织委员首先定出计划，在支委会上来讨论；宣传委员要经常收集材料，计划并指导宣传工作的进行，不要把这些工作都集中在书记一人身上。

十五、支委会议要尽可能有记录，以便检查工作，但支委的决议不必印刷。

十六、每月月终，支委应向支部大会做工作报告，要全体

同志参加讨论，详细检阅支委的工作，这样可以提高党员对党的工作的积极性，又可给支委工作以极大的帮助。

十七、团的工作要实际的建立起来，要有团的大会，列宁青年组要多讨论团的决议和团的工作，要坚决反对取消团的倾向（关于团的工作另有指示）。

十八、团总支委员会是连支部的直接领导者，现在有些团总支委员会不计划、不考查支部工作，只管吸收党员等工作，将团总支委员会变成了党务委员会，使支部成为无人领导的悬空组织，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应该立即纠正。要切实认清总支委员会是支部的直接领导者，要经常考查和巡视支部的工作，给支部以新的工作的指示，使支部工作能在团总支委员会领导之下，更健全地建立起来。

十九、自红军党的组织改变后，政治部即是党的领导机关（政委是党的领导者）。但现在还有政治部不了解这一点的，因此总是忽视对党的工作的领导，这是要各级政治部切实注意纠正的。此外，把师以上的党务委员会认作是党的工作领导者，这又是错误的。党务委员会只管批准新党员，决定处罚党员及解决党内的纠纷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是政治部工作的一部分，政治部决不能忽视党的工作或放松对党的工作的领导。

二十、最后，要特别注意到红军中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是不能分开的。政治部和政治委员要特别加紧对支部工作的领导，同时支部要切实保障各种政治工作的实施。因为各级政治部的工作未能很好开展起来，对本部的工作关系非常薄弱，所以本部得到关于目前各部队实际情形的材料非常之少，上面这些指示自然不能说是完备的，希望各级政治部及政委多提意见到本部来。

各级政治机关要督促各支部将这封信拿到支部中充分的去讨论并切实执行。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给湘鄂西分局 和省委的信

——关于湘鄂西党目前组织任务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中央分局和省委：

四中全会后湘鄂西党的组织状况和对于组织任务的执行，中央虽然还没有接到你们比较完备具体的文件，但根据与你们派来几个同志的谈话中和你们其他一般文件中所零碎叙述的材料中所看得出来的，中央认为有写这封信给你们有必要，希望能引起你们严重的注意与热烈的讨论，采取有力的办法来完成湘鄂西党的组织上及全部组织工作最严重的转变。

(一) 中央认为国际和四中全会的确给予湘鄂西党全部工作转变有力的基础，中央分局在这个基础上所领导的组织上的转变已经获得相当的成绩，这主要的表现在：

(1) 相当的巩固和改造了各地党部的组织，提高了各级党的积极性和党内纪律，改善了党的领导成分，改善了与下级党部的联系，减少了党及各种机关中官僚腐化的现象。

(2) 克服了立三路线及其执行者中夏⁽¹⁾同志的逃跑主义，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巩固与发展了苏区与红军，兴奋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与坚决为巩固和发展苏区而斗争的积极性。

(3) 恢复与重新建立了群众组织和他的工作，如被立三路线所取消的工会、青年团组织已恢复了，在立三路线时代所根本忽视的贫农团已建立起了，这样，使党与群众的联系更密切了，使党动员群众的力量更增强了（如各种纪念节、运动周中）。

(4) 加强了党内党外的宣传教育工作（如建立党报、读报小组……），消灭了立三路线时代所造成的党内党外“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使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增高了一些，在群众中不再发现过去那种所谓“共产党比国民党稍好一点”的观念。

(5) 在反富农路线的斗争中与肃反工作中，初步的改善了党的基础（据说现在湘鄂西党员的成分贫雇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但真正工人与雇农的成分占多少？还不知道），洗刷了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出党，从各种机关中驱逐了一些反革命的派别，开始了提拔与训练干部的企图。

(6) 注意了发展组织的工作，能够利用各种紧急事件、纪念运动等举行征收党员的运动，号召加入红军的运动，并且获得一些成绩。

(7) 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相当的改变了过去那种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通告式的空文，而代以比较切实的领导（建立巡视制度等）。

(8) 开始了白区工作的建立（如建立与加强宜昌、洞庭等处工作），注意了党的队伍随着环境而改编的准备工作（如有些苏区做了些准备在严重条件下转入秘密状态的工作）。

(9) 一般的发展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发展了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执行了红军中集中的军事纪律以及注意了党员要做群众模范者的教育。

(二) 转变中的这些成绩与进步，当然不能过分的估计，

这只是初步的开始，还是非常的不充分，还极端不能令人满意，在这些初步的成绩中还包括许多弱点。在整个组织任务的执行上，还表现不少的缺点与错误。最主要的是：没有把湘鄂西党前面许多严重的组织任务放在全部工作的首要地位，没有建立真正的集体领导、团结党的积极干部，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来从组织上进行最严重的转变。许多组织任务的提出，常常只是原则性的空谈，而没有深刻的了解他的真实内容，没有估计各地具体环境与根据个别具体经验探讨出最明确最实际的办法来给各级党部以指示，没有利用苏区公开的环境组织大规模各种群众的运动。不会艰苦的教育各级党部真正能自动地独立地进行工作，采取强有力的方针来保证党的一切决定不要停留在白纸上而是在实际中彻底的真实的执行，随时检阅执行的程度，吸取工作的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与教训。

这些错误与缺点，主要表现在：

(1) 严格的说，湘鄂西党还没有真正布尔什维克式的集体领导，一个时期中，中央分局与省委工作混淆不好，因省委的薄弱而实际上代替了省委的工作。省委组织不健全，省委委员甚至常委又多是变成了巡视员或者身兼数要职而放弃了省委本身工作，如一个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又兼政府主席再兼军委主席团之一，这样，省委在事实上不成其为一个名符其实的领导机关，更谈不到省委各部工作健全的建立。

(2) 各级领导机关中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还保留许多旧的官僚主义的残余，没有彻底采用新的方式与方法，没有实行科学的分工与个别负责制，不会有工作计划工作日程的进行工作，常表现事务主义的手工业式的现象，没有设法加紧工作的速率，没有经常定期的检阅工作，不会运用革命竞赛与突击队及各种组织动员的方法来兴奋推动工作，对下级不是指导与

帮助工作，而是代替与包办工作。

(3) 党与群众组织还没有建立正确的关系，党与群众组织及其工作没有明确的划分，混淆不分与包办主义的现象依然存在。没有建立健全的党团组织和工作，经过党团去领导与帮助工作。党对群众组织很少经常的指导与帮助，随便调动他们的干部去做别的工作，妨害群众组织独立性。

(4) 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还没有深入到下级党部与支部中去，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常常停留在上级机关中，没有把斗争政治内容与实质作深刻解释与教育工作。对于同志中的错误，没有公开的自我批评，利用每一事实广泛的教育群众，而常常是秘密的采取个人谈话方式来解决。所以反倾向的斗争有时被同志们误解为对人的问题（如有些同志曾认为反对中夏等同志是个人的问题），而模糊了斗争的政治性与原则性。

(5) 没有扩大与巩固党的积极干部，从组织上去巩固党的全部工作。对于提拔新的干部还非常不勇敢，就是提拔了一些干部也多是形式上的，没有必须程度的教育工作使他真正能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与独立性的工作，没有“面向下层”从支部中在日常斗争与工作中去发现新的干部。有些地方，干部的提拔不是根据于阶级的觉悟性与政治上组织上的坚定性，而简单的以“有办法”和“才能”为标准，甚至个人感情及地方主义的关系，没有利用公开党的便利经常的大规模的举办各种人才的训练班与党校，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干部的困难。特别不会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抓住一切事件如各种群众的行动及三军回根据地等机会，很好的团结所有积极的干部在党的路线的周围，使一切机会主义者派别分子孤立起来，有力的给那些反中央分局正确领导的活动与企图以严重的打击！不使一个好的干部受到机会主义的影响，来与党对立和进行反中央分局

的斗争。

（6）还没有在党内进行最严重的教育工作，采取有力的办法来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个别谈话、讨论会、读报小组、识字班等方法没有普遍的不断的去进行，使每个党员都能懂得现时党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及党内许多最基本问题。党内生活与支部生活异常缺乏。

（7）对于党的刊物的扩充，加强党报的政治领导，使党报成为党的组织者的作用，这个工作你们简直没有注意。现有刊物的内容如何，中央现在还没有根据来批评，从你们党报发行的份数（据说是四百——六百份）中，已可看到他在一万二千多党员中的作用是何等微弱，更无从估计他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了，任何借口都不能掩饰这种严重的错误。

（8）巩固与改造各级党部的工作，虽然党员基础上与领导成分上有了相当改变，但还没有使他的全部工作转变，没有充分发展下层创造性与积极性。没有从支部工作的基础上、从领导群众组织与领导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去改变党的全部工作，使各级党部成为名符其实的指导机关。

（9）党的组织的发展还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没有注意经常个别的征收党员，征收党员运动中还有许多缺点，没有讨论更具体的办法，没有注意吸收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会员，没有把征收工作在成分上在数量上所得的结果看成一种战斗任务，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的建立还很少成绩。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的薄弱，依然是湘鄂西党严重的弱点。

（10）巡视制度还没有正确的普遍的建立起来，或者党部的委员离开党部变成巡视员而妨害了集体领导与经常工作，或者是一批官僚式的走马看花的巡视员不能给下级党部以任何帮助，或只执行了交通的任务，事实上巡视员造成了上级与下级

之间的中间组织，使下级党部与上级党部更加隔离起来。

(11) 党在红军中没有足够的党员做红军中的骨干，很少政治工作，特别是在新回来的三军中，没有充分注意苏维埃建设的工作。在苏维埃中很久没有最重要的部门——劳工委员会，或者设一些毫无工作的空机关，下级苏维埃更多是不做事的“打路条”的机关，工会工作仍不健全，贫农团的组织还未普遍的健全的建立，有些贫农团代替了苏维埃的工作，或者让中农甚至富农都放在贫农团里面，忽视青年妇女工作，对团的取消观念仍未肃清，反帝同盟与互济会的组织完全没有去建立起来，对白区中心城市与苏区周围主要农村中工作不了解，工作很少成绩。白军中的工作没有计划的建立，对灾民的组织没有成绩，甚至与他们失却联系，不正确的应用所谓“反水群众”的名词来掩饰自己对白区工作的消极，加深了“赤白区域群众对立”的现象。

(12) 在所谓更进一步的反富农斗争的口号下，有些地方不正确的采用了消灭富农的手段，实际上妨害了与中农巩固的联盟。同时在这一斗争中还没有进行有系统的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处形同虚设，没有建立他的独立工作系统。在苏区内还隐藏不少的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坏，他们正在积极的进行反革命的工作。

(13) 党的组织的实际工作中，没有很好的有系统的去研究工农革命斗争的经验，把每一运动、作战、游击及行动等作为分析的对象，迅速的将这种研究的总结来给各级党部以指示。

(三) 中央认为这些缺点与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需要严格的自我批评来揭发。中央赞许同志们用真正自我批评的精神来

了解与指摘这些缺点与错误并采取有力的方法来纠正，但同时要估计到湘鄂西党困难的环境与工作条件，如党在立三路线创伤以后，中夏同志领导三军脱离苏区的逃跑，敌人严重的“围剿”，空前的水灾，粮食的恐慌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省委及各级党部的不健全，干部的恐慌与不会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以及党内机会主义者派别分子与反革命的活动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困难。因此我们决不能以这些缺点与错误来掩盖转变中的成绩与进步，要坚决的反对那些右倾失败的情绪，不估计到具体环境与工作条件的困难，根本看不到转变中的成绩与进步，找不到工作的前途，将一切罪恶解释为个人的与领导的不好，甚至怀疑中央分局所执行的国际路线的正确，进行反中央分局正确领导的斗争。

估计到这种情形，湘鄂西党目前的中心组织任务是要使整个党的组织系统适合于向前开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健全的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巩固和教育各级党部的工作，团结，巩固，扩大党的积极干部，保证对政府、红军、群众组织的真正领导（不是包办与代替他的工作），整个组织动员去进行改造与扩大红军、保障红军给养、分配土地、反帝、修堤、春耕、肃反等运动和巩固洪湖苏区、发展苏区、创造襄河北岸新根据地的斗争。在两条战线上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右倾和“左”的机会主义，反对悲观主义、失败情绪，反对空谈“路线”和个人的无原则的争论，而放弃或妨碍目前迫切任务的执行，客观上帮助敌人的行为，反对机会主义者派别分子利用目前的困难和党的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进行反党的任何最小的企图，最高限度地发展自我批评，使自我批评成为为中央正确路线而斗争的工具，这样来考验、兴奋、推动党的组织的各种部门的工作。

下面的这些组织任务，应放在湘鄂西党全部工作最主要的

地位，迫切的需要你们采取有力的方法去实现他。

(1) 为着适合于目前革命战争向前开展的需要，更万分迫切的要求党的整个组织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集体指导。首先要求中央分局有这样的集体指导，中央分局的组织是中央在四中全会后加强对苏区领导的一种方式。现在许多光荣的胜利已经证明这种领导方式的伟大成功，同样在湘鄂西亦已表现他显著的成绩。中央分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他代表中央直接指导苏区工作，他在苏区有最高的权力，他应当有经常集体的会议与工作，他的一切决定经过当地最高党部——省委去执行，他是指导当地党部的工作，不是代替当地党部的工作，在不妨害分局集体指导的条件下，分局的个别委员可以兼任当地党、政府、红军中的工作。中央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只有中央分局才能保证湘鄂西党真正去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他无条件是应当而且必须存在。怀疑中央分局的路线与组织的正确性，甚至提议取消中央分局是极端严重的错误，省委与各级党部应当与这种错误作严格的斗争。应当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中央分局的某些个别错误与缺点，并在他的正确领导之下亲密的互相帮助的进行工作。

(2) 省委的组织必须健全起来。应当坚决的勇敢的提拔下级党部中能够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的工农干部到省委来，省委委员必须扩充。省委要有健全的常委能够经常的工作，要有科学的集体分工。建立各部各委的工作，尽量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参加各部各委的工作。要有固定的经常的巡视员，省委常委不能随便的离开省委工作去做巡视员。要改善与下级党部的关系，教育下级党部的工作，要能迅速的反映群众的意识，随时给下级党部以正确的指示，并设法保证这些指示的真实执行。只有这样政治上组织上健全的省委，才能在中央

分局正确领导之下保证湘鄂西党的组织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最近代表大会所选举的省委委员名单履历，须即报告中央审查批准。

(3) 为要适合着领导工人、雇农、贫农各种群众的任务，必须加紧从支部工作的基础上来改造地方党部，不只是形式上个别领导成分的变更，而是要从全部工作与工作方式上去改造。地方党部首先要能组织中心企业与农村的支部，要使主要的中心支部能够独立活动，有自动性的进行工作。整个党应该把支部工作放在党的全部组织工作最主要的地位，使每个支部成为党在企业中、农村中的主要柱石作用，运用各种群众组织的形式工会、贫农团等团结广大群众于支部的周围，使他成为主要组织上的动力机作用。省委应该给下级党部以具体指示，责成地方党部在一定时期内完成几个这样的中心支部。要把这一工作执行的程度为检阅地方党部工作成绩的尺度。

省委应该根据具体情形去改编特委、县委的组织，加强特委、县委的领导，运用中心县委指导附近较弱的县委的方式来减少省委下面许多复杂的单位，应当建立南华安中心县委指导附近岳临、石首、洞庭等处工作，洞庭直属支部交给南华安中心县委去领导。湘鄂边特委要派得力干部去改编，现在那里实际上没有真正共产党的领导。应城、云梦、孝感等处，暂时可以由一个较强的中心县委去领导，如必要时亦可以成立鄂中特委。房县应当去建立健全的县委。

区委的工作应该尽量吸引支部中在业的积极分子参加，较大的区域可以运用较强的中心支部去帮助与领导附近较弱支部的工作，必要时可以调动支部中的有能力的分子去充当巡视员，经常举行各种会议（积极分子会议、支书联席会议、组织会议、宣传会议）来教育支部工作，一般的不需要那种官僚式

的巡视员。

(4) 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必须肃清旧的官僚主义的残余，彻底的采用新的方法，一切指示与决定要具体明确实际化，不仅提出原则而且尽可能规定具体办法，并采取有力的办法保证他的实行，坚决的反对过去那种一纸空文了事的通告式公文式的“领导”。运用科学的集体分工，实行个别负责制，消灭工作中的疏忽、敷衍、不认真的现象，要有计划的有日程的去进行工作，反对手工业式的方式。为着加紧工作的速率，要广泛的切实的提倡在各种运动、各种部门中采用革命竞赛、突击队、轻骑队及各种组织动员的方法来推动工作。要有经常的定期的检阅工作，检阅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指示的执行程度和党的各部门的、群众组织中的党团的工作。在检阅工作中要特别扩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发动下层的建议，使检阅工作成为推动工作之一种方式。

(5) 党的各级组织与政府、群众组织等应当明确的划分，建立党与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消灭党与群众组织混淆不分或者党包办或代替政府与群众组织的现象。党的任务是要组织与健全群众团体中的党团，党团的领袖一定要慎重的选择有威信的能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的同志去充当，肃清一切官僚主义者以及阶级异己分子。党经过党团的领导去帮助与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这是经常的惯例，你们应该立即帮助群众组织建立工作，充实他的工作内容，保障群众组织独立性，不再准许轻易的调动他的干部做旁的工作，同时要预防党团不执行党的指示的任何企图。

(6) 你们对于干部问题的忽视是再也不能容许了。首先要坚决的反对专门倚赖中央，害怕提拔新干部，不依靠自己力量采取积极办法去解决干部问题的错误观念。你们必须立即根据

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讨论出更具体的办法指示各级党部去执行。应该在斗争中团结所有党的积极干部在中央分局及各级党部的周围，不让一个好的积极干部被机会主义者派别分子利用来作反党的斗争。应该大胆地提拔下级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雇农到领导机关中来。提拔干部首先要根据政治上组织上的坚定，反对单纯的以“有办法”和“才能”为标准，反对个人朋友关系的提拔。加紧教育工作，特别是对支部的教育，使支部成为党的干部的泉源。认清只有支部才是干部的正确来源，将“面向上级”改变为“面向下层”的口号，实现到实际中去。应用各种训练教育的方法，如训练班、讨论会、列宁读书班、个别教育等，去加紧训练干部。中央责成你们在二个月内由中央分局直接举办比较长时（三月至半年）、比较大规模的（四十至六十个学生）的党校，责成省委及地方党部逐渐举办各种各式的训练班，如工会工作的、农运的、军事的、苏维埃的、白军兵士运动的、妇女的、党务政治的……等短期训练班，在半年后不但要达到“干部自给”，而且要能准备一部分干部供给中央调到其他区域去发展工作。你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去达到这个目的。

（7）巡视制度从中央分局到区委应该普遍的建立起来。要选择政治上组织上健强的同志做专门的巡视员，党的各级常委不要兼做巡视员（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委员在不妨害委员会本身工作的条件下不能充当巡视员）。巡视员不是“交通”，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中间组织”，他的工作不是官僚式的走马看花了事，他的任务是加强上级党对于下级的活的指导，正确地传达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保证他的切实执行，帮助和检阅下级党部与群众组织、政府等的工作，及时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他不只是听报告看文件，而是要亲自到下级党部与支

部中去，要广泛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巡视过程中及巡视后应向派出他的党部作详细的报告，提出具体意见，党的委员会必须迅速的讨论他的报告给下级以指示。只有这样的巡视制度才有意义。你们过去对于这方面的错误必须立即纠正。你们应当立即根据过去中央巡视条例与具体环境及经验，将巡视员的职权、任务、工作方式与方法，重新更具体的规定出来，并制定各种检查工作大纲（如地方党部工作检查大纲、支部工作检查大纲）作巡视员检查工作的根据。

（8）湘鄂西党的组织的薄弱依然成为严重现象。党应当大开其门，把征收党员的运动做到最高限度，当然不是要让一切志愿者都吸收进来，应该保持无产阶级战斗党的特性，注意党员质量上的改造，特别要防止富农及一切反革命的派别分子混入党的队伍来。要利用每一群众的斗争行动、纪念运动等大规模的征收党员，吸引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新的革命分子入党，造成工人、雇农、贫农的先进分子成为新党员的潮流。加紧个别征收党员的工作，把征收工作当着目前经常的中心任务之一。怎样做征收工作？什么是我们的对象？怎样与新的革命分子发生联系？怎样对他们作宣传鼓动工作（散宣传品、党报、召集会议、个别谈话等方法）？什么是征收的标准与条件？怎样举行入党式……必须规定具体的指示。在征收工作中同时要注意吸收青年团团员、工会会员等去发展群众组织。要把征收党员在成分上数量上所得到的结果看成一种战斗的任务，按时的定期去检阅下级党部执行的程度，把征收新党员、建立新支部、巩固已有组织的成绩，作为地方党部工作成绩的标准。中央责成你们在“五一”时举行征收工作的检阅，将检阅结果报告中央。

（9）应该在党内进行最严重的教育工作。加紧去建设和改

善党的生活和支部生活，有系统的去建立各种小组、学习会议、读报组、识字班等广泛地进行教育工作。特别要加紧对新党员的教育，吸引他们工作，实际的规定一个旧党员应该帮助几个新同志的学习，一个识字的党员应该帮助几个不识字的党员会识字。党的实际工作上，刊物上要最大的注意去研究工农革命斗争的经验，每一战争、游击、示威及行动等应该成为党的组织和每个同志的对象，讨论出具体的教训，来教育全党。要使每个党员都懂得现时党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以及许多最基本的常识，要特别注意去解释党的纪律以及党员应做群众的模范，消灭党员“特殊地位”与官僚腐化等不容许的现象。

(10) 党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刊物必须尽量的扩充，改善他的内容。加强党报的领导，使党报成为党的组织者的作用。党报的文章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具体、明确、通俗，给下级党部以实际的经验和建议。党报上要揭发一切不正确倾向与工作中的缺点，要使党报成为推动、兴奋、检阅党的工作的一种方式。要努力建立各级的党报、工厂农村的小报、墙报，发起党报通讯员，加紧训练通讯员，组织广大的发行机关，使党报不只是每个党员都能经常的看到，而且要散布到群众去。像你们过去几百份的党报，在湘鄂西这样广大的区域，其影响不要说在广大的群众中，就是在一万二千的党员、二万多的团员与二万多的工会会员中亦是微乎其微了。这种情形，是一天也不许继续下去了。

(11) 你们红军中现在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足够的共产党员做骨干，缺乏政治工作。党员在红军中的数量非常少，党员在红军中不能起领导作用。你们现在要用最大的力量消灭过去弱点，使现在的红军改变为真正的工农红军的铁军。目前应

该首先改编新回来的三军，改变红军成分，加强军事政治的领导，在里面进行最深刻的政治教育工作，解释过去领导者的错误，运用联欢会等去兴奋他们，消灭他们失败灰心的情绪。在红军中举行大规模的征收党员运动与个别征收，健全红军中党的组织，使每个红军成为群众的模范，改善与居民的关系，与居民联欢，帮助分配土地、春耕、修堤等运动，使红军的行动积极化。应该努力去扩大红军，动员党、团、工会、贫农团去做扩大红军的工作，规定具体的办法，在一定时期内扩展红军到一定的数量。在红军中应当执行严格的集中军事纪律，任何执行上级指示的怠工与反抗，都要无情的予以制裁，消灭过去在红军中所发现的污点，绝对不准许这种红军耻辱的行为多一天的存在。

(12) 加紧注意苏维埃的建设与苏维埃的改造，使苏维埃成为真正的群众政权机关。首先要在加紧反富农、肃反的斗争中去改造下级苏维埃，改造苏维埃的成分，充实他的工作内容，不许把苏维埃变成为简单的“打路票”的机关。要组织健全的贫农团体，明确的解释贫农团的作用与意义。贫农团不让富农参加。不是代替苏维埃的工作，贫农团应该团结广大的中农群众于自己的周围来作为苏维埃的基础，在苏维埃中起领导作用。党应当经过党团的领导去帮助苏维埃的工作，规定苏维埃的组织、各部门工作及工作方法，不让苏维埃存在一个空架不做事的官僚机关，不让苏维埃中存在一个官僚主义的阶级异己的反革命的分子。省苏维埃的工作应当马上建立起来，各部门都要有经常的工作，吸引下层积极分子来参加，尽可能不要一人兼几个工作，消灭只参加会议不做工作的现象。现在的经济与财政两委员会应当合并，社会保险不要单独设立部门，可以归并在劳工委员会之下设一社会保险局，行政委员会改为内

务委员会。这些组织及工作，你们应该学习鄂豫皖苏区的经验，使每一部门都有明确具体的工作，建立苏维埃自上而下的独立组织系统与工作系统，不要与党混淆起来。

（13）发展群众组织，健全群众组织的工作。首先要根据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的决议，去建立阶级的赤色工会的工作，加紧实行苏维埃区域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赤色工会应领导工人斗争去求得劳动法的实现与生活的改良，加紧巩固扩大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反对轻视工会工作，不准苏维埃政府要工会负责人服役，不准轻易调动工会的领导干部，保障工会组织的独立性。要尽量发展贫农团的组织，使贫农团成为苏维埃的核心。在加紧反帝运动中一刻也不容迟的去建立反帝同盟、分盟、“苏联之友”等反帝组织，反对认为苏维埃区域反帝运动是次要任务的观念。要在加紧反白色恐怖与救济革命战士、援助被难家属的工作中去建立互济会的组织。同样要加紧对青年团的领导，消灭同志们对团的工作的取消观念。加紧去发展青年妇女的工作，组织劳动妇女、青工等代表会议，举办妇女、青工的训练班。

（14）加紧建立白区城市与农村的组织。首先要用一切努力去建立武汉、宜沙、新堤、仙桃、岳口及铁路上的组织，加强宜昌道委的领导，党同时要动员团、工会去建立这些地方工作。同时要加紧去建立白军中的组织。在川军中，中央与四川省委已经派了许多干部打进去，宜昌道委应该有健全的兵委来加强这个工作。其他敌人主要部队中，你们必须设法利用个别关系，组织灾民当兵，动员群众组织的会员打进去。运用前线上与敌军兵士的联欢，优待与鼓动俘虏，使他们回去散布我们的影响。在苏区周围边境的工作亦须加紧去建立，放弃那些不正确的“反水群众”之类的呼声，实际上去消灭“赤白对

立”的现象。

(15) 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进行肃反工作。首先要健全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和**工作**，要选择最有阶级觉悟、最坚定勇敢、对党绝对忠实的同志去领导这个工作，要多多的吸引下层积极分子来参加，使政治保卫局成为一个网一样来肃清反革命分子。中央区、鄂豫皖、闽西等苏区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敌人是如何积极的巧妙的企图从苏区内部来破坏与消灭我们。你们苏区中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AB团、北极会、硬肚会等之类的反革命组织，你们应当唤起苏区群众的警戒心，要发动群众先发制人的迅速消灭这些组织，要很好利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来进行这个工作。

(16) 党的及各种组织的大会与代表大会的举行，必须有很充分的准备工作，规定大会以前应该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如改造党部、苏维埃……准备详细的报告和对大会的提议、代表的选举及其任务，使每一大会得到一定的收获。最近你们在苏大会、党扩大会开过不久，没有充分的准备，便又匆促的召集代表大会是不好的。现在大会已经举行，你们应该很好的利用大会后热烈的环境与群众积极性，规定大会后的具体工作，规定每个代表今后的任务，并须将大会及会后的情形即报告中央。要经常的有系统去做调查统计的工作，把他看成为组织任务之一。

(17) 要执行上述任务，便要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反对一切右的“左”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目前右倾依然成为党最主要的危险，这在湘鄂西党内的具体表现是不去执行目前迫切的紧急任务，不积极的去克服目前的困难来巩固的发展苏区，认为向外发展与创造新根据地是逃跑主义，看不到全国革命危机的成熟、革命运动的高涨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伟大前

途，在困难前面表现张惶失措、失败灰心的情绪，怀疑中央分局路线的正确，提议取消中央分局与进行反中央分局正确领导的斗争。很显然的在这一斗争中包括各种不同的成分，首先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积极进行破坏党与革命的工作，以响应敌人的“围剿”，再是机会主义派别、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两面派等企图利用目前的困难进行反党斗争来证明自己机会主义的正确，他们首先要反中央分局，因为中央分局的存在是他们一切企图的最大障碍，中央分局正确路线的执行将使这些分子失却活动的余地；另一部分是党内不坚定的分子在目前困难中的失败情绪，找不到政治出路，于是便从中央分局的领导不好来求得解释；最后是党内少数积极干部，因党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与不会团结干部使他们受到不良分子的影响，为不良分子利用来作反党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在党内斗争中团结党的积极干部，严密党的组织，加紧肃反的工作，肃清党和各种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中揭破他们的面具，加紧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特别注意那些口头上“同意”党的路线而实际进行反党工作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常常利用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做媒介，利用困难的条件与工作中的缺点来作进行破坏党与革命的工作。要加紧教育说服那些好的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自己工作中的弱点，使反革命的反党的分子孤立起来，给以强有力的打击。动员全党来讨论与执行目前具体任务，不要去空谈路线与无原则的个人的争论。绝对不许放弃工作来讨论中央分局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主要的注意与力量要放在工作上，不要放在个人的无原则的无实际内容的争辩上，因为这样做，正是反革命与机会主义企图，这只对于国民党有利益，对于革命是极大的罪恶。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一致的去进行工作，这是

你们胜利的先决条件！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注 释

〔1〕即邓中夏。

中共中央紧急通知

——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
民众自动武装保卫上海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上海的劳苦群众正处在紧急的生死关头。日本帝国主义者派遣大批的军队来上海，进行着各种挑衅，准备着血的屠杀劳苦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领上海。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完全地投降了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一起来压迫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不惜以血的屠杀劳苦群众来献媚日本帝国主义与出卖上海。情况是十分紧急。党应该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击，应该在“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与“民众自动武装保卫上海的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压迫革命运动”的中心的口号之下，进行最广大的运动。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敏捷、迅速与坚决来实现这两个口号。具体地：

一、在工厂中，在厂门口，在罢工工人与失业工人中，即刻组织各种的露天大会或飞行集会，向工人群众说明目前的紧

急情况，号召工人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无产阶级的回答。号召与组织他们的罢工与立即广大的组织工人的义勇军与纠察队。推派代表即刻组织上海工人反日会。

二、党、团、工会、革命的反日组织及一切文化组织与附属组织，即刻进行最迅速与广大的动员群众去参加民反⁽¹⁾所号召的二十九号的示威，这个示威应该是给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进攻以一个有力的回答。在市民大会与示威中间应该作最广泛的宣传鼓动“总同盟罢工”与“武装保卫上海的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镇压革命运动”的口号。在市民大会上必须决定具体地实现总同盟罢工与武装反抗敌人进攻的方法。

三、经过一切的反日组织与罢工工人去广大的进行士兵中间的工作。这里中心的口号是：士兵与革命的民众一起进行武装保卫上海的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自己的军官，反对不抵抗主义与退让。应该尽量的吸收革命的士兵组织的代表参加民众的反日代表组织。吸收士兵参加一切的市民大会与示威，并领导他们保护民众的集会与民众的革命组织。

四、应该更加努力的进行华捕、印捕与警察中间的工作，将他们中间左倾的分子即刻组织起来，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民众的反日革命组织。提出“与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拒绝警长与探长的命令”、“拥护民众的革命运动”、“罢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等口号。

五、党、团、工会应该立即派选冲锋队到主要的产业部门的工人群众中去（电车、电汽、自来水、沪宁沪杭两路、兵工厂、造船厂与吴淞铁路大厂）进行工作。革命的学生组织、反日组织与罢工工人亦应该派选自己的代表团（人数愈多愈好）到这些工厂与铁路上去要求他们一致的罢工。纱厂工人应该经

过已经罢工的各厂工人去宣传鼓动其他工人的罢工。特别着重地将政治的总同盟罢工与反对取消月偿等经济的要求密切的联系起来。

六、革命的反日组织与罢工委员会及工会必须以极大的力量来进行组织工人的义勇军与纠察队，开始时以原始的武器（刀、棍子、斧头）武装自己，同时即刻进行要枪械的运动，号召群众起来夺取枪械，到兵工厂中去要枪械。应该号召一切学生军与黄色工会下的义勇军立即起来反对日本的占领，进行这些义勇军中队员群众间的工作。

七、必须立即用一切方法，经过群众的反日组织与罢工工人，去进行组织近郊农民及失业工人中的工作，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夺取武装的争斗，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革命的反日代表组织。

八、民众的反日团体应该立即扩大自己的组织，吸收广大的群众的代表参加，变成为工人、失业工人、士兵、近郊农民与革命学生的代表会议的组织。应该将反帝运动争斗及总同盟的领导抓在自己手里，成为一切革命争斗的组织与领导的中心，广泛的宣传与运用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口号。

九、很明显的，在目前的情势中间，应十倍的加紧拥护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宣传，只有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红军是唯一的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武力。

情势是十分的紧急，这个客观的情势要求党员、团员、赤色工会会员及每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战士，以十二分的坚决、敏捷与英勇来完成历史放在他们目前的任务。英勇的工作，广大的动员、组织与领导千百万的工人、失业工人、农民、士兵与学生群众的争斗，将引导到反帝国主义争斗的新的阶段与革命的新的胜利！

*

*

*

各地党部接到此通知后，须更加紧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与一切群众斗争密切的联系，使群众斗争更向前的发展。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注 释

〔1〕即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六日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抗日组织。

中共中央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 告全国民众书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日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占领了热河，现在又想占领上海了。国民党除了不抵抗与投降之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吓之下，现在更将采取积极步骤来对付全中国的反日民众了。国民党政府对于日帝国主义所提出的解散一切民众反日的团体与镇压民众反日运动的要求，实际上已表示了完全的接受。全上海以至全中国的民众，将在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合作之下，遭到空前的屠杀！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只有一致团结起来，我们才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联合进攻。我们必须毫不迟疑的实行罢工、罢课、罢操、罢岗，必须每一个人迅速的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察队，举行兵士与民众的大联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对日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我们才能给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保卫中国不再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蹂躏！

全中国的民众们！形势是十二分的紧迫！必须加速度的活

动起来、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必须更积极的拥护全中国唯一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民众的苏维埃政府，更大规模的投入全中国唯一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工农红军。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苏维埃旗帜之下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直到我们最后的一滴血！

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共同压迫革命运动！

兵士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

武装保护一切民众的革命团体与革命领袖！

武装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

到红军中去，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

以革命的民族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武装保卫民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直到最后的一滴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东江特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广东省委转东江特委：

中央根据中央巡视员关于东江肃反工作的一些事实的报告，认为东江对肃反工作领导的执行，是存在着极严重的错误，是没有适合中央对肃反指导的要求，同时是妨碍苏区的巩固与有力的发展，需要你们立即以极高度的采取大力的纠正。

在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中，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下，苏区的肃反工作十百倍的加紧执行是百分之百的必要和正确的。然而肃反工作的进行，是要从党的正确路线上，从阶级的明确立场上，从发动群众斗争上，依靠着千百万工农群众对于肃反的参加和努力上，才能根本的消灭苏区内的一切反革命团体的存在。

东江特委对苏区内肃反工作的领导，很显然是没有正确的全部的去执行中央关于肃反工作指导的，事实还不够显明吗？“对反革命团体只是在刑罚上去求得解答，对于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是不注意的，敌人借着我们的缺点，制造许多谣言在同志中煽动，使同志互相怀疑，或人人自危的现象”（见粤团省委对东江肃反工作报告的大意）。东江捕杀了成百成千的所谓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的活动仍成为苏区内部的严重问题，甚至最近依据你们肃反的发现，反革命的组织已吸引了李××同

志的参加，发展到 C. Y. 中央巡视员的身上去，而为你们扣留了。东江苏区到今天还不能在便利条件下，取得巩固的发展。这些事实，岂真是反革命团体，是不可思议的神秘东西吗？恰相反的，这是说明你们在肃反工作的执行上，是没有注意如何正确的去执行中央的指导的。

中央曾经很详尽的指出：苏区发现了反革命团体的活动与阴谋，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是利用党与苏维埃政府的一些缺点与错误，扩大而夸张的拿来作反党反苏维埃的资料。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力量，离间与挑拨甚至举行反革命的暴动，造成苏区内的恐怖，进行其破坏革命的阴谋的。但我们绝对要防止对反革命团体力量的夸大，要发动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把雇农工会、贫农团、职工会等组织起来，彻底的执行苏维埃法令，提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吸收积极分子到党内、团内、苏维埃政府内来积极参加工作和斗争，广泛的从政治上思想上教育党内党外的群众，才能肃清反革命的奸细于革命组织以外去，消灭反革命团体在苏区内的存在。同时指出，对于反革命的领袖与群众应该从阶级立场上去处置他们，从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分别开来，不应该将政治上组织上无错误的分子都看成是反革命团体的分子。中央是坚决反对将肃反工作变成为恐怖工作，反对以严刑拷打代替慎重审问，反对为进行肃反工作而取消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抑制党内自我批评，反对企图隐蔽党的错误和缺点，不对党内党外群众作公开的教育工作。然而东江特委的领导，恰相反的，在进行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如东江团以为全校干部十之八九是 AB 团），而张惶失措的“梦想以党的与苏维埃的一些军事的刑事的法律的组织的方法，会消灭苏区内部的反革命”，而采取家长式的独裁制的方式，进行其恐怖政策，这一结果，自然要使“人人自危”帮助敌人进行挑拨煽

动的机会。李××同志的加入社会民主党，C. Y. 中央巡视员有社党的嫌疑等等，这是在说明反革命团体如何聪明的利用你们的错误来进行其破坏党的阴谋，而你们恰好在张惶失措中而走进了他们的圈套，竟扣留 C. Y. 中央的巡视员了。在过去亦不知有多少的群众和党员，在这种敌人的阴谋之下，经过你们的手还代替执行他们的计划呢？

中央不能一刻的再容忍你们的恐怖政策，来代替正确肃反工作的执行了。因为这方式是帮助反革命反对革命的。你们必须最严厉的检阅你们的工作，在国际路线与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改正一切所有的错误。要广泛的在党内党外加紧教育工作，揭发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做广大群众的了解与拥护。在苏维埃政府的系统下成立保卫处，纠正过去党与群众组织的混合，党去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加紧领导和发动苏区内的阶级斗争，依靠广大群众的努力与拥护，来进行肃清一切反革命团体的活动与存在，使肃反工作成为苏区千百万广大群众阶级斗争的主要任务，严厉禁止严刑拷打，改正没有充分证据而任意逮捕杀戮的严重错误，在红军中同样不允许借口军事纪律而任意杀戮与刑讯。对于反革命内部的领袖与群众必须在阶级立场上分别其处理，审慎主动与被动者的处置，要在审问中对工农分子充分的进行教育解释工作，许其自首自新，从反革命的蒙蔽中而挽救到革命方面来。不允许再将政治上组织上错误分子，不分皂白的与反革命分子混作一谈。每一次反革命的破获与解决的经过，必须在广大劳苦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教育工作，揭破反革命的一切欺骗与罪恶，增加群众对党的信任，而回到党的领导之下来。要以最大的努力发动与吸引广大劳苦群众自觉的参加肃反工作，以彻底改正过去党代替与包办肃反工作的现象。

中央要求东江特委很切实的来检查其农工会、贫农团、职工会等重要群众组织工作的领导。必须注意党对这些群众组织工作领导的不足与错误，必须立即发动和吸引真正工农分子来充实这些组织，必须引进工农积极分子去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你们必须注意只有这些群众组织的健强，只有苏维埃政府真正成为工农自己的政权，才能彻底的去实行苏维埃一切法令，才能在实行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斗争任务中，依靠着工农群众的力量，根本肃清一切反革命团体与富农地主破坏苏区的阴谋，才能使苏区的巩固而向前的猛烈发展。

在加紧两条战线斗争中洗刷党内动摇、消极、阶级异己的分子，同时大胆地在斗争中吸引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党的组织以内来，在实际工作中耐心的加紧党内思想上的斗争，去培养工人、雇农干部，以极大坚决性、顽强性去充分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的一切指导，这是巩固党领导苏区工作最重要的前提。东江特委必须注意，现在党内党外的恐怖政策只有涣散党并断送党在苏区中的领导，帮助敌人对苏区的压迫与进攻的危险。需要领导全党严重的转变无情的打击党内肃反工作，而抑止党内自我批评，或隐蔽自己的错误，放松两条战线斗争的任何最小企图。

C. Y. 中央巡视员的扣留，这是绝不可容许的错误。中央派遣出去的巡视员或代表，各级党部在任何时期都没有扣留的权限，除非经过中央的批准。你们应立即送他回到 C. Y. 中央来，如有任何关于他可疑的证据，亦须送到中央来解决。对于李同志和中央 C. Y. 巡视员的问题，不许有任何随意的散播。中央对于李同志的考察，对于你们的怀疑，认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省委不能立时纠正你们，当然同样是错误的。

中央重复的引起你们的注意，你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努

力，去充分的执行中央一切指导，对于此后肃反工作的转变与过去肃反的经过，望做一详细报告来。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 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 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

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历次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全中国反日反帝浪潮的激烈的高涨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有力的打击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四次“围剿”。在全中国革命形势的前面，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只有更进一步的出卖中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加紧对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进攻，来维持动摇崩溃着的中国统治。在集中全国力量抵御外侮的旗帜之下，蒋介石已经同广东、福建、湖南各派国民党军阀分力合作地向着我们中央苏区进行大举进攻了。

这是国民党军阀更残酷的与绝望的进攻，这是国民党军阀在四次“围剿”中的最后奋斗。国民党军阀决定四次“围剿”的胜负的战争，是在我们的前面。在这一决战中间我们是有着完全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已经到了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已经终结的阶段，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革命与战争的新的阶段的过渡期中，并且在全中国已经有着革命的形势。在这一决战中间，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完全有利于我们的。这一决战中我们的胜利，将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前面开展

一个新的局面，将使我们取得一个以至几个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这一胜利将开始我们直接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进行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整个阶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为了争取这一决战的胜利，中央局认为必须立刻执行下列的紧急任务：

（一）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在这一总的目标之下，赣闽两省一二月份扩大红军的数量，必须于二月二十日完成，从二月二十日起到三月二十日止，赣闽两省必须输送一万新战士到前方（赣七千，闽三千）。

（二）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必须迅速按照劳战委员会决定，将赤卫军少先队改编完毕，完全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动员所有模范队、模范赤少队，整营整团的加入红军中去。现在就应该开始宣传，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这样来准备从自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军役制。

（三）独立师团游击队必须按中革军委的训令，以积极的进攻牵制和扰乱敌人，破坏敌人之后方交通，领导白区群众的斗争，进行赤化工作，并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特别在赣南与闽西边区，必须进行最有力的运动防御战。充实独立师团，扩大游击队，改造它们的成分，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必须立刻进行。

（四）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最广泛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蒙、进攻平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切强盗行为。中央政府及中革委会宣言必须更普遍的散布出去，来

揭破国民党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的真相，来争取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民众与革命士兵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之下，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工农的组织。

（五）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借二十万担谷子来帮助革命战争，应该是目前的战斗任务。土地税、公债票必须在规定日期内完全缴清，动员工农群众节省每日一个铜板捐助红军，购买飞机军械，以争得战争的胜利。在三八妇女节以前，必须发动妇女群众，制造五万双草鞋、五万双套鞋运往前方。整顿税收，开发财源，节省浪费，都是充裕战费必须采取的有效办法。

（六）提早春耕运动，增加土地生产力，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为着顺利的执行这一任务，必须完成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从先进的区域，动员大批的查田或分田突击队，去帮助落后的与新建立的苏区。关于春耕运动的具体布置，须依照中央局中央政府的单独指示迅速执行。

（七）用一切力量来发展与巩固苏区。赣闽两省委应以最大努力，立刻加强对于新发展区域的领导，特别是在战略上重要的地区，如像赣之宁都、广昌、宜黄、乐安、南丰、黎川、石城，闽之建宁、泰宁、宁化、连城、归化、清流等县，集中在这些县中创造强有力的中心县委，以领导其他县委。这首先是在肃清残余地主武装，解决土地问题，实现劳动法，建立苏维埃政权。两省委必须对中央局负责，在三月底，在那些区域的工作有显著的转变，同时各级党部必须准备抽调大批干部，随红军政治部建立新胜利区域的工作。对白区工作，必须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始。

（八）修桥补路拆毁城墙工事工作，必须动员群众于二月底以前完结。同时要有断桥断路的技术布置，准备于必要时断

敌前进与后退的交通。作战地区或靠近作战区域的党应领导当地政府及群众组织成立战地委员会，担负清扫战场、处理伤病的战士及白军俘虏等工作，使主力军能够转移战地，连续消灭敌人，而无所顾虑，且不致有所损失。

然而中央局必须着重指出这些紧急任务的能否完成，要依靠于我们是否能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以一切奉献给革命战争，以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热情与兴奋而决定。只有群众动员的深入，只有彻底的实行土地法与劳动法等，以改善民众的生活，来发展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性，才能保障这些任务的完全实现。

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局认为必须开展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使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对于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任务任何动摇与纯粹的防御路线，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打击。同时集中火力向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开火，也是完成这些紧急任务的主要条件。一切决定的执行，必须面向群众，依靠群众，经过群众。党必须用一切方法，来领导与监督这一决议的每一条文的实现。革命竞赛的方法，应该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应该成为先进提拔落后的运动，应该成为全苏区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以布尔塞维克的速度来完成我们目前紧急任务的运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中共中央给上海反帝 大同盟党团的信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

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

外国帝国主义是中国反动统治的最高组织者与支配者，是中国革命主要敌人之一。不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便根本谈不上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最近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指挥和帮助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工农红军苏维埃区域和镇压全国工农兵贫民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采用更露骨更凶暴的殖民地侵略压迫政策——公开的武装进攻政策，来占领中国土地，掠夺屠杀中国民众，直接干涉中国革命，更加紧布置进攻苏联。从去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这种形势更日趋严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以后，又接连进攻天津、青岛、汉口、厦门和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公开进攻中国的炮火已经延长半年之久。关外四省在国民党军阀“不抵抗”、“逆来顺受”投降政策之下，已经完全断送，其他各地侵略暴行亦是有加无已，尤其是上海，自一月二十八日惨变开始以来，现在还在炮火连天之中，千百万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横被践踏屠杀，其惨酷情状已经无法形容。这自然不仅日本帝国主义是如此，其他英美法意帝国主义，亦都同样加紧争相劫掠中国。如英国进攻两广、西藏，法国进占广西云贵，美国则更大派军舰来华，尽量加强侵略中国，他们在

镇压中国革命与进攻苏联的利益上，完全采取一致及互相帮助的政策（例如上海英美法帝国主义以租界帮助日本作军事根据地，一致封闭反日团体，压迫反日及一切革命运动等）。同时他们在瓜分中国、抢夺中国利益上，又很明显刻刻加紧着他们相互间的冲突和矛盾，加紧着布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日美冲突与中国军阀战争，特别是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中国革命与进攻苏联的紧急，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直接的长期冲突更加紧迫。在此严重局面之下，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的出路，只有自己动员、组织、武装起来，在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扩大罢工、罢课、抵货及一切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运动，拥护并加入土地革命及工农红军革命战争，彻底驱逐日本强盗和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根本推翻豪绅地主、军阀、资本家、国民党各派统治，建立苏维埃工农兵民众政权。这种解放中国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运动与革命战争，不但早已开始，而且最近更大大开展起来了！不管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镇压屠杀如何残酷，不管改组派、第三党、人权派、国家主义派、“社会与教育”派、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绞尽脑汁来欺骗民众，千方百计来阻碍革命的发展，但是中国工农革命运动还是猛烈前进。红军进攻的烽火，工人罢工的浪潮，反日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它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藩篱与城堡，而解放出中国民族及数万万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并根本颠覆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

这一形势，不但可以显示我们目前中国革命中反日反帝斗争的严重意义，而且足可说明你们目前的工作条件以及你们反帝大同盟自己所负的重大责任。中央在这一严重局面之下，写这一封信给你们，主要的也就是要唤起你们对于目前的形势与

你们自己所负的责任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对你们自己的工作有更深刻的检查，以便能够切实抽出自己工作的经验与教训，能够具体了解你们反帝大同盟在最近这一时期中的工作现状，看看你们的斗争纲领与工作计划在实际上究竟实行了多少，找出自己工作的真正缺点和错误，以及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真正原因，与讨论出改正这些缺点错误的方法及今后转变工作的具体方针。中央认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最近这一时期中虽然执行了相当的工作，虽然也有些很微弱的收获，然而一般说来，你们的工作是十分不能使人满意的。虽然你们在最近这一时期中相当执行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相当扩张了自己的影响，开始组织了一部分反帝群众在你们自己营垒之内，但是很明显的，你们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多重大的任务没有能够解决，你们的斗争纲领与工作计划还有极大部分没有能够完成，特别是你们自己组织及工作的发展还很远很远落在客观形势与群众积极性之后。最近日本强盗及其他各帝国主义对中国无数的侵略进攻事变，你们都没有能够抓紧来动员群众，许多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工作——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绝交抵货、民众自动武装抵抗等各种重要运动的领导权，都没有真正拿到你们手上来。尤其是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浪潮澎湃汹涌的现在，而你们反帝大同盟整个组织的工作方式还是未能作成群众运动，还多半只局限于狭隘的秘密工作方式，这实在是你们目前工作进程中的致命伤！这一点你们必须要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公开指出你们这种错误，唤起你们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来检查自己的工作，发挥你们最高的斗争毅力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及错误，以彻底转变你们的工作，在目前更有极大的必要。

首先你们根本的工作精神必须要有彻底的转变，必须无情

打击现在这种不可容许的狭隘的秘密工作方式，你们必须充分估计到目前的革命局势与反帝群众的积极性，抓紧目前日本强盗不断扩大对华军事行动及英美法意列强争相劫掠中国的一切严重事变，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极大限度地去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动员极广大的工农兵士劳苦民众起来，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岗，公开号召广大群众夺取武装，创造并加入工农义勇军，号召革命兵士与民众亲密联合，拿起武装瞄准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射击，在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极力扩大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战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以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驱逐日本强盗及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打倒出卖中国民族、污辱中国民族的国民党各派统治，武装保护中国革命与上海劳苦群众。为达到这一重要目的，你们可以而且必须创造并加入民众反日救国会以及其他各种各式更公开更广泛的群众组织，以便经过这些组织吸引群众加入反帝同盟和扩大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运动。这一类组织，一方面既便于吸引较广大的群众参加，另一方面又易于在实际行动上揭穿国民党及其他各反革命派别的“反日”、“反帝”的假面具。在这一方面你们现在必须大大地改善你们对于民反的关系，使你们经过民反的一切活动都能够奔赴着自己的主要目的。

上海现在正在日本强盗直接炮火之下，因此你们更要紧紧抓住群众迫切痛苦的各个问题，例如日本工厂以大炮机关枪对付工人，中国工厂借口“国难”乘机加紧剥削工人，中外资本家都借口战争大批驱逐工人出厂，置失业工人于死地，金融极度恐慌，粮食及日用品价格飞涨，贫苦难民颠连无告等等。向极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及组织工作，组织各种各式的公开的宣传队、讲演队、募捐队、纠察队、义勇军、突击队

等，公开地到马路、工厂、作坊、学校、兵营、近郊农村中去进行各种宣传鼓动、组织募捐的工作，号召广大群众动员、组织、武装起来，用募捐、分粮、占屋等一切紧急方法去援助并实际救济罢工工人、失业工人、贫苦难民与抗日兵士，去吸引更多广大群众加入反帝同盟与参加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运动。

形势一天天更加紧张起来，因此目前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宣传及行动，必须与武装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大战、拥护红军苏维埃等更紧紧地适合地联系起来，必须使中国广大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彻底认识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唯一领袖，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是彻底把中国民族与千百万群众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唯一武器，只有根本消灭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制度，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幸福。同时对于目前像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新生命派、托陈取消派等一切反动的或妥协的派别，必须对他们实行更锐利的斗争，以根本斩毁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开展革命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阵线。

最后，针对着现在反帝同盟的弱点，广泛的去组织反日反帝群众，吸引更多广大的反日反帝群众加入上反与民反，建立上反与民反的下层群众基础尤其是工厂分会，更成为你们当前的紧急任务。首先应该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将工厂、作坊、学校、兵营的分会组织起来，以强固自己的营垒。同时上反、民反在目前斗争的基础上，立刻发起并实际准备在今年“五卅”纪念节召集全国的反日反帝大会，以成立全国的组织。

党团的工作与生活必须有大大地改善，应该坚决克服你们党团中某些政治的动摇，加强政治教育与提拔、培养干部，开展两条战线斗争。中央希望你们有充足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国际反帝大同盟决议与你们自己斗争纲领精神之下，马上进行

一个反帝运动工作的严格检查，规定出更具体的定期的工作计划，并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实行彻底的转变，在最短时间内将中央上述指示全部实行出来。

此致

革命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组织报告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

I 实际工作转变的意义与条件

一九三一年一月所开的四中全会，在吾党的历史上，实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不仅彻底地揭穿了立三路线的实质，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而且向全党提出：坚决执行“实际工作转变”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对于吾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实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立三路线给予吾党的危害，不仅在几个基本的政治问题上，而且全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以及种种实际工作的布置，都受了他很严重的影响，现在要用几句话把他的恶果数个清楚是不可能的，唯其如此，实际工作的转变，在四中全会以后，遂成为吾党执行国际路线的艰苦而迫切的任务。一年来实际工作转变的结果，证明吾党确实获得了以下的主要成绩：(1) 宣布了立三路线的破产，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企图，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相当巩固和改造了主要各地党的领导，团结了党的主要干部于国际路线的周围，开始转变了各方面的工作，因此加速了吾党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2) 巩固并发展了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兴奋了全国工农劳苦群众（特别是苏区的工农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3) 恢复并相当扩大了各种群众组织，加紧了吾党与群众的联系，特别是满洲事变以来，开始相当学会了多数党领导的

艺术，因此加紧了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与夺取群众的工作。这些成绩虽然远不能满足吾党的要求，可是尽够回答一切机会主义者的谰言，如认为“四中路线在实际工作上走不通的”，或把政治与组织对立起来，认为：“路线虽然正确，可是实际工作，完全没有转变”。现在看来这些机会主义者的毁谤，已经被事实击破了，证明了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必须有正确的组织上的巩固，以便保证他能具体化而实现出来。

同时为着正确地检查工作，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四中全会后工作转变的条件：国际路线的胜利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当然给了实际工作转变以很大的便利，但是立三路线给予各方面的深刻损害与其残余，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的障碍，过去没有真正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不注意严密党的组织，以致许多挂名或异己分子留在党内来破坏或曲解党的工作，领导干部的极大恐慌，党员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与许多干部不会做工作，不懂得布尔塞维克的工作方法，党的无产阶级太薄弱，许多重要产业中过去丝毫没有基础，过去一般的支部没有政治生活，群众组织过于微弱（特别工会），敌人加紧压迫与摧残，白色区域的组织一般的不懂得秘密工作，不能适应紧张的环境，以致时常遭受破坏或动摇，凡此种种都与实际工作转变以极大的影响。

II 四中全会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问题

我们要回答去年一年中党是否是在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究竟有些什么严重问题，不能不述一述党的建设中几个基本问题，这不仅为了检阅过去的工作，而且对于目前任务的执行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一、自从四中全会纠正了中央路线改造了中央领导以后，

立即开始巩固和改造各级党的领导（省委、市委□□□以及苏区党的领导）。首先是从政治上来执行这一任务，坚决地与立三路线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从组织上来巩固各地党部对于国际路线的执行，坚决肃清立三路线总行委系统。这一斗争的结果，不仅在苏区和白区内恢复和改造了党的集体领导，洗刷了许多异己或不坚定的分子，引进了许多新的积极干部，而且把许多一时误入歧途的工人同志又重新提回到党的路线上来。虽然在目前看来，仍有一些地方至今保有許多立三路线残余，甚至仍踏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如山西、四川等省及一部分苏区），或者虽经改造，但至今仍没有巩固的领导。这里有的因为一再破坏，一时没有好的领导干部（如河北、山东、广东、芜湖等处），有的因为始终没有忠心可靠的干部，不充分了解国际路线的实际内容，不懂得如何来转变实际工作（如浙江、徐、海、蚌等），有的因为转变中不能团结积极的工农干部，国际路线被阶级异己分子所曲解，以致不能得到转变中很大的效果，甚至造成很严重的局面（如闽粤赣及皖西北）。其次便是实行缩小机关党到群众中去的口号。过去在立三路线时代，所有党的机关特别是党的上层机关是非常庞大的，把许多能够工作的同志都放在机关里面，因此不能与群众发生亲密的联系，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形，自然更谈不到与群众一块来领导群众了，对于群众一切日常的斗争，除掉暴动和示威的空喊以外，实际上是放弃了。自从我们坚决实行这个口号以后，的确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如现在省委只有三四人，连技术人员亦不过七八人），在这方面我们曾遇到许多抵抗和曲解，例如四川至今仍有这样地方以为“县委任务，只在发号施令，须有一个很大的秘书处，至于执行工作的任务，那是支部的事”。这当然对于转变工作是一个很好的讽刺！另外一方面，亦有曲解

这个口号的内容，主张减弱甚至根本取消领导机关的（如过去河南省委、皖西北），自然这些不正确的观念，是影响这个口号的实行的。第三便是改变党的领导方式，肃清过去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如一切死的公文式的领导、命令主义等），促成各地的集体领导与独立工作，养成个人负责的制度。在这方面，因为干部的缺乏与政治水平线的低落，还是很大的困难，同时各地组织与工作人员的时常变换与调动，自然亦给与这种转变以不少的影响。此外便是特别注重于直接的活的领导，首先就是巡视制度的建立与改造，以及中央分局、全权代表、特派员的创立。中央在这方面自然是做了些工作，例如三大苏区中央局、中央分局的设立与巩固，赣东北、满洲的长驻中央代表，为满洲事件的临时特派员以及组织员工作的改造与召集外省来人讨论工作等。至于巡视工作，白区的省份一般的都巡视过一次至两次，苏区虽无中央直接的巡视，但中央局与分局亦曾派人巡视，巡视的结果对于国际路线的传达以及工作的检查与改造（特别是对于福建、安徽、山东、河南等省）的确有很大的效果。巡视的方式也有很大的转变，不过根据最近巡视工作的检查，巡视员的数量必须增加（至少八人至十人），政治的训练与工作方法还须加强与改善，否则是不能保证对于全国的经常巡视工作。至于各省以及中心县委，对于巡视工作虽有些建立，但是实际的效果□□。有的地方因为巡视工作，取消了集体领导（如过去的鄂豫边特、湘鄂西等处）；有的地方根本忽视，以致对各县无法领导或很少领导（如江苏外县）。至于巡视方法的转变，主要的是在团结当地干部于党的路线周围，发展下层的积极性，提拔新领导来巩固和改造当地的领导，同时要注重于实际工作的帮助与指示，“要反对那种走马看花的官僚办法，同时也要反对陕西那种以巡视员来包办地方

工作的主张，自然还有过去工作的残余，以致减少工作的效果或不能帮助当地工作（如去年陕西及山西的巡视）”。为着巡视工作更有成绩，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对巡视员的领导，巡视条件必须重新审查，一切巡视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经常与上级领导机关通信，以便讨论工作，要根本改变过去那种“一次算账”的办法。

二、干部的提拔与培养在四中全会后实在成为万分迫切重要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主要是注重于“领导机关工人化”与“提拔工农干部”两个口号之执行。一年的结果，自然有一些成绩（如苏区肃清富农领导的斗争与白区工人担任或参加领导的，亦有许多地方），可是因为各省的破坏与不注重训练工作，使得许多地方的上级领导，至今仍为知识分子所包办（如两广、四川、陕西、福建等处），同时在执行这个口号时，虽然在口头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对，但是实际上时常与新干部为难，不帮助新的工农干部工作，借此证明新干部的无能，这当然是一种同样对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抵抗。这里必须说到干部恐慌的问题，无论苏区与白区，都是一般的现象，最好的亦不过少向中央要干部，其余总是倒源为流的办法，不但不能源源供给中央以干部，而且“要干部”甚至技术人员几乎成了他们与中央通信或报告中每次不能忘记的问题，所谓“干部自给”与“支部地方党部须负培养干部的责任”只是纸上的空谈，实际能向这方面做的，真是微乎其微。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曾有专门决议与文章，可是还没有引起全党同志充分的注意。我们认为现在必须切实地注意如何把这一决议实现出来，特别是在苏区开办党校与白区内训练支部书记的工作，应该立刻实行。同时在培养新干部的时候，对于一切旧干部的训练亦必须加紧，中央组织员与各省组织员必须彻底转变过去招待的方

式，走向训练各地派来干部与讨论各地实际工作方面去。巡视员在巡视过程中必须进行训练工作。各级党部次要工作人员（如干事之类）应该就是被训练被提拔的对象。此外在苏区内一切领导机关，并可采用“实习生”办法，广泛地吸收新进的工农同志来练习一切实习工作。总之，在今年我们必须着重于训练干部、培养干部的工作，求得在干部的来源上有一个基本的转变。最后关于委派制度的问题自然与干部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目前看来各地负责同志甚至下级领导干部多半还是上级派去的，这里当然不是如个别同志所责备的“中央要发展委派制度”，而是种种客观原因（如白区组织的一再破坏，□地方为□□□执行国际路线，必须派得力同志才有保证等等）以及各地不注意训练当地干部，专门仰赖中央（这也可说是过去委派制度的遗毒）所促成的。因此肃清委派制度的口号，必须与训练干部、提拔干部等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以后中央及省委派往各地的干部主要的只在加强当地的领导和帮助工作、检查工作，而不是代替当地干部甚至包办当地的工作。在干部的调动上，主要的要根据各地的情形与工作的布置，把党的力量给以适当的分配，而不是如目下往往一省的工作完全要别省的同志来担任（这当然不是地方主义问题，可是这种不经常状态对于各省工作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三、征收党员与改造党的社会成分。这里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征服过去党员发展的畸形状态，特别注重于加强党的无产阶级与贫雇农的基础和洗刷一切不良分子。现在全国党员仍没有整个的确实的调查和统计（因为有几个地方根本无统计），据大概的计算，数量的发展（见各表^{〔1〕}）不会比四中全会增加多少（假若那时的统计是正确的，我以为要打很大的问号），在质量上却有相当的进步。特别在苏区去年一年中，的确洗刷了

许多富农（如鄂豫皖、赣东北）及不良分子，即在白区几个大城市中成分也有不少的进步。其次如（1）各地党部能利用各种纪念节与群众运动举行征收党员运动；（2）注意了个别征收工作，有些地方也把个别征收工作看成为经常的工作；（3）在苏区与白区内洗刷了许多挂名党员；（4）开始注意举行入党式及新同志教育的工作。亦可说是转变中的成绩，可是在目前看来，发展组织的中心任务还在质量的改善，这一任务应该比数量的增加还要迫切，许多事实证明给我们看（如合肥一区完全是地主豪绅），这种问题的严重在苏区和农业区域特别明显。我们必须严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原则，不好的分子宁缺勿滥，同时要消灭党与群众混淆的状态。这当然不是说数量的增加不重要，但是我们的增加必须是有计划的有条件的，不是愈多愈好，来者不拒的（如河南以及许多苏区只注意增加数量和平发展的趋势）。现在数量上（同时亦即是质量问题）的严重现象主要的仍在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重要的产业没有打进去，仍然与去年二月间决议案所指的（虽然有一些进步）畸形状态相差不远，因此如何完成该决议案所给予我们的任务，加强我党的战斗力，却是发展组织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我们必须加紧对于党员的检查工作，反对那种忽视统计，或把这种工作只看作无关重要的技术工作。

四、地方党部与支部的工作。在四中全会后地方党部转变的主要方向是在如何领导支部工作，一切工作的布置都要对着这一问题（如吸收在业工人参加领导，团结支部的活动分子）。根据目前的检查，自然上海等地是有相当效果，可是这种转变还是异常迟缓，现在许多地方党部（即上海亦不是例外，这在反帝运动中可以看出）还不能真正推动支部做工作，特别是遇到较大的政治事变时常表现□□□无措的状况，不知

怎样具体运用党的策略，更坏的甚至曲解党的政治口号与策略。这里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地方党部的领导不健全，没有尽量吸引新进的干部，没有很好执行教育支部的工作，同时上级党部对于地方党部工作的检查与了解也是非常不够，因此改造地方党部，转变地方党部的工作方式与加紧检查工作，都是异常重要。至于支部工作，在四中全会以后，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建立产业支部与支部须有政治生活的问题。一般的说，许多地方（如上海、哈尔滨、河南、山东、天津等处产业支部的增加与派人打入生产等）对于建立产业支部是有相当的注意。可是目前主要的缺点还在于：A. 没有计划，还没有抓住重要的产业，各省都只知道要建立产业支部，可是对于如何在敌人的要害建立我们的基础很少注意；B. 没有注意巩固产业支部，不能有持久的历史，时常带着流动性质。至于支部生活，这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般的说全国支部都没有很好的政治生活，即或能够经常开会，但开会做什么事却是一个大问题，一般的都是很少能讨论支部的具体工作，不能教育和推动所有支部同志及其领导下的群众来担任起码的革命工作，支部周围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群众，这些现象差不多成了普遍的缺点。因此建立和巩固重要的产业支部，中央、省委和县委须直接考查支部生活，想出更具体地转变方法，确是组织上很重要的问题。此外我们认为除苏区不成问题外，即在白色区域内，亦必须发展下层组织的德谟克拉西（现在有些白区省委提议在今年马上召集全省代表大会，其实这种大会不仅在环境上成很大的问题，即根据目前组织状况，准备工作也很难有把握的）。首先就是支部干事会和区委改选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现在差不多连支部的领导大半都是指派的居多，这当然有些客观原因，但这种现象对于支部同志的积极性与自我批评的发展都

是有妨害的。因此在今年白区的区委和支部干事会是应当有一次改选，中央与各省委从现在起就应有准备和讨论进行改选的方法，这对于改造党的下级领导，提拔干部，发展下层的积极性，都有很大的意义。

五、加紧工作速率问题。根据最近工作的检查，一般的转变速度还是异常迟缓，虽然去年我们为着加强速度与发展工作的积极性，曾一再提倡革命竞赛和各种督促检查工作等方法，可是在白区内许多地方只是成了一种时髦话，实际上甚至自己签订的条约和通过的决议，过一时也就忘记了（如上海去年曾有三区签订竞赛合同，但过一时大家都忘了。陕西省委甚至认为自己工作计划有三分之二没有完成是中央的错误！）今后要求得真正的转变，必须切实发展自我批评以及各种各式工作检查的方法。各级党部的刊物与一切实际工作，必须反映这种切实检查工作的精神，同时必须估计到一般同志工作能力的薄弱，特别在四中后不懂得新的工作方式，找不出克服困难的方法，以至于费了许多精神，得不到应有的结果，因此如何教育同志使一切工作更能合理化，有计划性，是加紧工作速率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最后，自然对于一切怠工或偷懒的办法，必须与之严厉斗争，甚至采取组织上的制裁。

六、与工作速率有紧密关系的问题，就是新的工作方式运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去年曾提出“革命竞赛”、“突击队”、“共产党礼拜六”、“轻骑队”等等，所有这些方式在白区内当然成绩很少，可是在苏区中已经获得很大的效果，特别是鄂豫皖、湘鄂西等处。根据目前的检查，这些方式的运用在中国党还只是萌芽，去年的一切缺点与错误，一方面固然由于求时髦、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一般同志未能真正了解（甚至根本不懂）这些方式的内容与运用，也未始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

此今后各级党的领导，在刊物上和实际工作中，必须详细解释这些方式，随时批评和纠正已在运用的地方，奖励一般同志特别是下层同志对这些工作方式的兴趣（甚至他们最小的企图），以便启发同志与革命群众来创造更新的工作方式，而限于学习苏联的经验。

七、党的政治水平线，在现在看来还是低落得很，不仅大批新发展的工农同志对于党没有起码的认识，即许多老党员也往往不知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更不必问他是否懂得党的目前策略与口号，想出具体办法来执行了。因此在工作很紧张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不仅不能起很好的领导作用，而且还感觉着自己无事做（最近上海事变便是明证），这样下去，无论数量如何多，也是没有用处的。关于这一点，各省文件和来人的谈话，虽然时常提到这种现象之严重，可是能够想出具体办法切实执行的，还是很少听到。各省做宣传工作的，只在应付一些传单和宣言的工作，做组织工作的又多是只知争求数量的增加。关于党内教育，中央虽然政治讨论和成立列宁小组的规定，可是各省实行得非常之少。刊物的作用特别是党报的作用，现在各地有独立报纸的还不多（即湘鄂西苏区也只出二百份），中央党报在去年一年中也是因种种关系时常间断，在内容上也还未能抓住一切实际问题作及时的解答。出版发行工作对于全国组织还很少帮助，时常出版的东西成为历史的材料，特别是没有注意到巩固和建立秘密印刷和发行的问题。自然除上述的现象外，我们不能否认党的政治水平线，在去年一般的现象是有进步的，这在各地两条战线斗争的发展、苏区工作的进步与最近反帝运动领导艺术的学习，是可以看见的。

八、秘密工作问题，我们只要看了去年白区破坏情形，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了。一般的说各地至今还没有真正懂

得秘密工作的方式，特别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有的地方由于白色恐怖的加紧或“争取公开！”甚至根本不能进行工作（如寿县）。另一方面仍然忽视秘密工作，借口表现他们的勇敢（在上海最近已有不少的例子）致组织不能很好稳定起来，这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中国党过去半公开生活的影响，立三路线的残余，党内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过不惯地下党的生活，不能很深刻的领受党的一切血的教训，党不深入群众，离开社会生活，工作方式的虚浮，得不到社会职业的掩护，没有把党的工作充分建立在群众中，依赖群众的力量冲破白色恐怖，以及秘密技术的落后与缺乏研究等等，所有上述各点，都是今后秘密工作必须注意的问题。与秘密工作不能分离的，必须说到与叛变分子斗争和严密组织的问题。在去年白区党部（特别如河北等处），曾有许多动摇不坚定的阶级异己分子，在被捕后即向敌人投降来破坏组织，这一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统计去年的破坏，由于叛徒的告密，实占很大的数量。对于这类现象中央去年曾用很大力量与之斗争，我们曾遇到许多不正确的解释（如认叛变是“潮流”、有“传染性”、“党内根本无人可信”等等），甚至反党分子借此作进攻的武器（如认为叛变是中央的错误和缺点造成的或“由中央打击同志造成的”）。去年一年中央在克服叛变现象、不正确观念以及反党分子进攻上，确是正确的，现在看来这一任务仍然异常重要。估计到苏区肃反工作的加紧与革命危机的发展，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千方百计企图打入我们的组织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忽视或减轻这种任务，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今后必须看为党的建设中战斗的任务，把这种任务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和检查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必须研究苏区肃反的经验（特别是鄂豫皖的），消灭闽粤赣在肃反中所犯的错误。

九、最后要说到党的纪律的问题。在去年一年中我们发现许多破坏纪律的事实，这里最明显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拒绝或挑选工作，这种现象不仅发现于中央工作中而且在许多省份也常有这种现象。自然这一方面是由于成分不良，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不能过无产阶级纪律生活；另一方面，立三路线的残余和两面派正是用这种方式来抵抗国际路线的实行，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提高党铁的纪律在当下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以上草草的叙述，可见党在四中全会后，虽然在基本上是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可是一切严重现象还急待消灭与斗争。因此除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加紧转变外，必须加紧两条战线斗争，因为这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必须条件。

Ⅲ 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与巩固

一九三一年苏区的发展与巩固，自然是四中全会后实际工作转变的最大成绩之一。在这里，因为时间的短促与材料的缺乏，我们不能把各苏维埃区域作一整个的报告，只能简略地讲到三个问题：（1）苏区的党；（2）苏区的群众组织；（3）中央及白区党部对于苏区的领导和帮助。至于红军及一切群众武装问题暂时从略，苏维埃也只在群众组织方面说一说，并不涉及他的全盘工作。

一、中央区的党。因为没有材料，同时经常处在战争中，故党的建设概况，很难详细知道。1. 据去年欧阳^[2]的报告，因为作战和反 AB 团的问题，一切党的建设都只放在这方面。现在因为红军胜利，区域扩大，以及中央局的加强，自然有新的现象，可惜没有报告，党员的数量大概总在两万人以上。与中央区邻近的湘赣边，虽然有些零碎的来信，但全盘情形亦不

甚清楚。省委的领导是相当巩固的。党员据去年一月间的统计，曾有一万四千余人，现在虽无统计，但因苏区扩大，数量是一定要增加的，自然党员的成分要成很大问题。2. 闽粤赣苏区在去年八九月以前曾时常来报告，不过每次来信的内容，主要的是说社会民主党问题，自从与中央区打通以后，即无报告来。不过据侧面的消息，这一区党的领导是很严重的，省委的同志虽然在分配土地上有一些成绩，可是因为肃反工作的错误，影响了全盘工作，至今形成整个的恐慌状态，干部完全没有，最近甚至省委亦不能形成，其他党的建设问题更可想而知了。中央虽拟派人去，但仍没有很好的对象，闻那里不久要开全省代表大会，想届时可以有更详细的材料来。党员的数量据去年来信说有三千人，现在苏区虽扩大，但因社会民主党问题，恐没有什么新发展。3. 赣东北的党过去富农路线非常利害，自去年中央派了代表去，的确有一些进步，洗刷了不少富农分子，不过对于提拔干部实行两条战线斗争还是非常不充分，特别是至今没有切实的肃反工作，这一问题一定是很严重的。一般说来，这一区直到今天，工作转变的速度还很慢，省委的领导亦不甚健全，党员的数量虽有一万两千余人，可是大多数并不能独立为党工作。4. 湘鄂赣即红军十六军所在的区域，苏区的变动，比较其他苏区特别利害，主要的由于十六军过去作战多属游击性质，因此这一区的党，谈不到什么建设。据去年鄂东鄂南来人的报告，这一区党的工作简直一塌糊涂，领导机关大半为富农、官僚分子所把持，同时还闹着派别斗争，因此该区群众对于红军虽表示极热烈的欢迎，可是对于党及苏维埃却很少兴趣，甚至表示不平的怨声。去年中央局曾派黄火青同志前往巡视，他的报告亦与此相差不远，中央一再要派人去，至今都未成事实，许多派去的人都被留在中央区了。

党员的数量据最近报告有一万六千人，农民占最大的多数。地方党部的工作也是一塌糊涂，支部生活更不必说了，这一区可说还没有真正开始转变。5. 湘鄂西的党，过去因受立三路线的执行者——中夏^[3]同志的领导，不仅不能建立什么党的工作，而且根本把苏区根据地都放弃了，只是由当地干部的积极性，才在艰难困苦中逐渐恢复洪湖一带的苏区。中央在这一区成立的分局，的确做了许多工作，但因去年水灾与军事的吃紧，使党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分局在政治领导上，自然没有离开中央的路线，不过对于目前困难问题（如红军的改编，根据地的巩固，特别是经济粮食等问题），没有很快地来解决（自然亦有种种客观困难），因此遇到很大的难关，而一切反党分子遂乘机进攻分局。最近在中央指示之下，已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并与一切反党分子作斗争。在党的方面，现在主要的是巩固分局与省委的集体领导，团结和提拔工农干部（这一工作过去太忽视了），加紧党内教育工作与自我批评。关于这些，中央最近已有详细指示，在此不多述了，党员的数量约有一万两千余人。6. 鄂豫皖在党的建设上是算苏区最好的了，这里主要的成绩是在改造和巩固党的领导，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洗刷富农和不良分子，并相当做了一些培养干部的工作。地方党部及支部情形，因没有材料，不能详细知道，不过据各种文件中附带谈到的，可以说地方党部的工作还不甚健全，最近分局对这方面曾有很大注意，同时又在进行代表大会的工作，想不久一定可以有更详细的材料。全区党员据去年的报告，有一万二千余人，惟成分与区域的分布毫无统计，现在一定又有很大的增加，党员政治水平线也是很低的。7. 鄂豫边特在去年九月前与中央是没有关系的，自从该区派了代表来，我们才知该区的情形，这一区过去可说完全是在地主富农的领

导之下，没有什么党的工作，自从那次详细讨论以后，我们即派人去改造特委，现在有很多文件来，证明那里已在开始转变中，不过领导干部还需要加强。全区党员约三千人，成分农民要占百分之八十，可是这些农民中，究竟有多少富农和小地主，现在还不知道。总之，苏区党的情形，除湘鄂西比较清楚一些外，其余都不甚清楚。这主要的由于中央过去没有直接派人去巡视，同时各区负责同志又因工作太忙不能做详细报告，因此今年必须设法派两人到苏区去巡视，万一干部缺乏，即派能力较差的同志专门去调查亦可。

二、苏区的群众组织。苏区的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性，的确不能以两三句话来形容的。红军的一再胜利，固然由于红军本身的英勇，但是广大群众的热烈的拥护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组织工作在立三路线时代是很糟糕的，即在目前也还是不能跟上群众积极性的发展，现在大概分述如下：

1. 工会工作，过去是苏区所忽视的，直到如今仍有些地方没有工作。目前最好的是鄂豫皖，这一区现已开过全区雇农代表大会。其次湘鄂西也开过代表大会，建立了工会工作，其他苏区还不详。据职工部的估计，苏区工会会员当在十万以上，但是所起作用如何，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材料可供研究。
2. C. Y. 及一切青年的工作，在苏区中的确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特别是少年先锋队及儿童团的工作，详情见 C. Y. 中央的材料。
3. 反帝的组织，过去许多苏区是没有的，现在已有转变，详情不知。
4. 互济会，过去曾有苏区把他当作收税的机关，现在已有转变，在鄂豫皖互济会多在做着救济灾民的工作，其他区域不详。
5. 贫农团，在苏区中均有，现在已起很大作用，不过有的地方把他代替苏维埃，或者被中农甚至富农混入当然是错误的。
6. 妇女组织，过去曾很发达，但因许多区域解决

婚姻问题有错误，以致影响的此种组织不少，可是她们的积极性还是很大的，如洗衣队、慰劳队便是明证。妇女工作的转变，只有鄂豫皖较好一些，其他均不详。7. 合作社及苏维埃，同时又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机关。过去，苏维埃常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主要的是由于立三路线、富农路线造成的。现在许多地方因为改造了苏维埃，已能吸收广大群众来参加，自然缺点还是很多。至于合作社，现在方在萌芽时代，苏区的注意还不够，更少了解他的组织作用，因此中央必须多供给关于合作社的材料来扩大这类组织。

三、中央与白区党部对于苏区的领导和拥护。去年一年中，可以说中央的确费了很大的力量来注意苏区问题，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大的成功，特别是建立中央局和分局的领导以及改造其他区域党的工作，中央为此曾前后派了三四百干部到苏区去（一部分已统计出）。白区党部亦都在宣传鼓动上来进行拥护苏维埃的工作，不过在组织上虽有“征调工人”和成立“红军之友”等工作，可是具体成绩非常之少。一般的说白区对于苏维埃的拥护最好的还多限于文字口头上的宣传，组织工作是很微弱的，因此今后除加紧宣传外，必须在组织上进行具体的实际工作，在刊物上在工作检查中，必须有经常的注意以便扩大拥护苏维埃的运动。

IV 全国白区党组织一瞥

除掉按照问题的性质，作一概括的叙述以外，我们认为关于白区党的组织现状，特别在四中全会以后，以及目前究竟各省有些什么较严重的问题，值得择要说一说的。这里当然不是把各省的情形作一整个的报告，因为这已有各省文件可供参

考，而只是根据各种文件和巡视谈话的材料作一简单的批评，遗漏自然是不免的，但对于研究一九三一年白区党的组织是有相当的帮助的。

一、江苏的党在白区省份中自然要占着首要的地位。四中全会以后，经过中央改造了省委和加强了领导以后，的确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具体的事实不必赘述）。省委的领导在去年五六月曾有一时期的减弱，这主要是由于干部的调动太多，一时又没有强有力的工农干部填补，以后经中央的帮助，已形成较强固的领导（即现在的省委）。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还不能跟上客观的发展，最近几月，特别在满洲事变发生以后，的确在领导反帝的斗争上有相当的进步，可是对于深入群众还非常不够，特别对于下层组织推动的力量太弱。因此时常在正确的领导之下，不能运用所有的力量，来求得工作上应有的成绩，领导的方式还多陷于事务琐碎，不能及时扼要，特别对于问题缺乏深刻的思索，还不能抓住群众的斗争情绪，很好的准备工作。对于外县的斗争情形，究竟党起了如何作用，自然不能清楚（恐怕得到我们领导的斗争也并不多）。即在上海这样大的工业中心，对于工人斗争的领导，也还是非常不够。全省党员据去年十二月的统计有四千七百三十七人（见第九表），社会成分只有上海较清楚，其他均不甚可靠。上海有同志七百余人，工人同志约在五百左右，同志的政治水平线还是非常低落，大多不能独立为党工作，甚至推而不动。地方党部除上海外，只徐海蚌据说较好一些，其他均不清楚。因为省委过去对外县的领导，除来人及几封指示信外，只有两个巡视员，而且能力并不大。上海各区领导，间日必有省委负责人前往督促，方可进行一些工作（但并不能推动多数支部），独立工作精神还异常不够，还不能把区委工作的中心放在领导支部工作上，

时常发现区委忙得不可开交，但所属支部还有许多不动。这当然许多支部无政治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区委不能设法推动支部，也未始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的说，上海一百多支部虽有许多在名义上能够开会，可是能够切实的有计划的讨论自己的工作，还是寥寥无几。许多产业支部都是流动性的，不能有持久的历史。在支部的周围并无很好群众组织围绕着，这样支部的单位虽多，但是并不能在重要产业中形成党领导群众斗争的堡垒。至于干部问题虽然较其他省份略好一些，可是以江苏所占的地位，那就根本谈不上有很好的注意。直至今今天，我们还没有听到如何有计划的从支部中（特别是产业支部）提拔并训练干部，相反的，我们倒听到有工人同志做了支部书记以后，竟无形的失了自己的党员资格。这当然不是工人同志的罪过，而是没有给他一点基本的训练的缘故。

二、河南的党在四中全会以后，省委曾有一部分同志不同意中央的路线，经中央巡视员曾士廷同志长期斗争，始告克服，后因干部缺乏，曾即留在该地工作。四五月间曾有一次破坏，结果曾同志被捕（现已牺牲），此后中央又派了三个同志（即现在的领导，都是知识分子）去成立省委，这几个同志在政治上都是坚定的，工作也很刻苦，不过领导的力量还很弱，不能充分地抓住当地的客观环境，尽量发展和领导群众的斗争，特别是工人（全省约有两万多产业工人）、灾民（去年被水灾的约有七十三县）、士兵的斗争以及反帝的斗争。据河南负责同志的报告和来信，河南在去年曾有许多自发的群众斗争，我们都没有领导，甚至根本不知道，在几个大的运动节中（五一、八一、十月革命节）除散发几张传单和张贴几张标语以外，都没有较大规模的行动。最近在这方面似乎有了相当的转变（如领导孝义兵工厂斗争和反帝斗争），但是在领导中仍

犯了许多错误和缺点（如机械的把政治口号与经济口号联系、对斗争没有准备等），以致遭到失败或不能获得应有的胜利。在组织上，去年三月间的统计只有两三百人（南阳等县无统计），现已增至两千两百人（见第十表），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质量上有不少的进步（如产业工人的增加，几个中心城市组织的建立与巩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河南的党发展得这样快，可是党员在群众中作用非常微弱，在党的周围，群众组织的薄弱，几乎等于零，这当然由于党忽视群众工作的结果，同时河南党也未真正了解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应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代替群众组织（根据河南党的发展，恐怕还有许多分子还没有做先锋队的资格），也未始不是一个原因。地方党部除信阳特委已划归鄂豫皖中央分局，南阳中心县委已划归鄂豫边特外（不过鄂豫边特对南阳领导也甚困难），其余各县仍然很弱。省委过去对他们的领导，因为机械地了解巡视制度与活的领导，以致一方面减弱了自己的集体领导，另一方面没有充分提拔当地工农干部（这由省委时常向中央提议派干部到各地去可以看见），来建立和加强各地的工作。至于支部生活较四中全会以前却有不少的进步（如模范支部的建立与几个产业支部的巩固），但许多支部（特别是农村支部）仍没有经常的生活。一般的说，河南的党是表现着和平发展的现象（至少在去年十一月以前是这样），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和自我批评不仅不发展，而且很少听到，这当然不是无斗争的对象，而是根本没有切实的注意（虽然在决议案上也常写）。另一方面党内没有进行很好的教育工作（注意：河南的新同志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为什么河南有这样大的组织（在数量上除江苏外，河南要占白区党的第二位，在质量上贫雇农与产业工人约占全党百分之六十）

与好的斗争环境（灾荒与军阀的蹂躏，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剥削），同时又毗连苏区（鄂豫皖），直接受到苏区与红军的影响，不能很好的准备和领导汹涌澎湃的群众斗争。至于中央对于河南党的领导和关系，一般的说是比较好的。去年除河南负责同志曾来讨论工作外，前后中央曾派巡视员前往巡视三次，较详细的指示信也有两次，普通的来往交通和文件都没有断过。

三、山东的党在四中全会后曾派两个负责同志（省委组织部长与青岛市委书记）来中央讨论工作，但不幸在寓被捕，以后中央虽与省委有交通关系（文件亦时常送去），但直至六月以前都没有详细地讨论过该省工作。在五六月间，山东曾有一次破坏（省委虽未受影响，但地方党部如济南等处的确受了不少的损失），结果省委书记张含辉同志不能立足，与武汉负责同志滕应斋对调。这时曾讨论过山东工作，滕同志去后，曾有接受四中路线转变工作的企图，但他在八月间又被捕（闻现已牺牲），结果山东组织一时无人负责，只由几个能力较弱政治上又不坚定的同志维持一时。九月底，中央始派巡视员前往巡视，结果不仅检查了当地工作，而且建立了许多新工作，现在的领导三人（书记决定撤换；宣传是新派去的，有相当的政治认识，不过实际工作较差；另一贫农同志做组织，能力很弱），尚不健全，巩固山东的领导尚为重要的任务。省委对于斗争的领导，在巡视员未去以前可以说没有什么领导。不仅如此，省委负责同志吴亚鲁、张鸿礼（现已撤消工作）且犯了许多政治错误，如对红军与军阀战争的估计以及对满洲事变的观察（认为满洲事件的原因只在张学良叛了日本，投向美国帝国主义）都有错误，至于群众的自发斗争，他们一再都是陷于尾巴主义的泥坑中，根本谈不上领导。自巡视员到后，工作上却有相当

的转变。在青岛、济南与铁路上都有个别的斗争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并得相当胜利（如富士纱厂）。最近济南等处的反日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据说我们在其中亦有很大的作用。自然在领导斗争中，仍有许多错误（如认增加工资是宣传口号），惧怕白色恐怖不敢领导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仍然时常发现，特别是士兵工作至今负责无人，过去张鸿礼同志的军官土匪路线所给予的损害至今仍未恢复。全省的灾民斗争与农民斗争仍没有得到我们的领导。在组织上，去年一月据山东负责同志报告，全省有党员三百三十三人，据八月来信全省只有两百五十人（尚有五十人靠不住），现据巡视员十一月底的统计全省有三百七十五人（内有一百多人未经检查，是靠不住的，见第十一表），数量上是没有有什么发展，不过这里须注意的，以前的统计大都不甚可靠。最近组织的进步是在巩固与质量的变化（如产业工人的增加与中心城市组织的建立）。地方党部如济南、青岛、潍县等处都有相当的进步，其余都很薄弱，甚至有的地方迄今仍为小地主富农所领导（如寿光）。省委对他们的领导，只能顾到两三个地方，巡视工作也没有建立起来，支部工作在几个主要产业区域（如青岛、淄博矿）的确有相当的建立，但经常的政治生活一般的仍然谈不到。至于群众组织，总共合起来不过二百人，青年团与赤色工会微弱到不能再弱的地步，反帝组织根本没有（注意：山东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与满洲相差无几），农民组织没有听到，但另一方面产业工人在山东却占着很大的数量（据巡视员的统计，全省约有十万七千余大产业工人）。以山东这样小而不健全的组织，来领导这样多的工人与农民，当然太不够了，因此巩固党的各级领导，打进主要的产业，提拔并训练当地的工农干部，尽量扩大党与赤色工会的组织，都是山东党组织上很迫切的任务。

四、河北的党在四中后曾有激烈的斗争。当时反对中央的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即以韩连会、张金刃等为领袖的右派）始而在政治上与河北临时省委对抗，继而在组织上破坏党的工作，以至绑票告密（这与河北省委的一再破坏很有关系），什么他们都干，以致河北临时省委在去年春间主要的是忙在与右派斗争，从政治上来巩固河北的组织，对于一切实际工作，虽中央曾巡视一次，临时省委负责同志（主要的都是中央派去的）亦有很大的企图来开展工作。可是天津一次破坏（五六月间），主要的负责人几乎完全被捕，遂使河北工作一时陷于停顿混乱的状况。此后又派几个同志前去整顿省委，但工作未多时，又遭一次大破坏，接着又是廖化平、潘问友、徐兰芝（前省委书记）等的无耻叛变，把许多组织关系都告诉了敌人（特别是士兵的工作），自此以后河北工作实陷于很困难的环境，加着一个临时负责人又继续被捕，更使河北党处境严重。曲计前后破坏被捕的干部约有几十人以上，地方党部最遭摧残的是天津、北平和唐山，其余地方虽未受到直接打击，但长久与省委失了关系，影响工作自然不小。破坏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组织不严密（许多动摇异己分子留在党内），工作方式不好（没有真正懂得地下党的工作），没有切实提拔当地的工农干部。在破坏后，中央与省委虽尽了很大的力量来消灭这些缺点与错误，无如当地组织基础太坏，外地同志又不能马上适应当地的环境，以致不能马上收到极大的效果。这种组织动摇的状况，直至去年十一月才开始恢复与整顿，最近省委已相当巩固（现省委共九人，书记是当地的工人干部，能力较弱，组织与军事都是新派去的，工部是全总派去的，尚缺少一理论较好的宣传人才），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亦有相当的成绩（例如北平的反帝运动与北大南下示威团等）。全省组织状况，在去年

未破坏以前有党员一千七百余（据老表的报告，内有几处不甚可靠），最近较可靠者约七百人（内二百五十人有最近数字的统计，其余四百五十人均在直南特委之下，最近有详细工作报告，组织上有发展，亦未破坏，只可惜没有统计，见第十二表），在数量上似乎减少了一倍以上，不过实际上地方党部遭破坏的主要只是唐山与北平，天津现在还有发展（在春间只有八人），其余各县如京东中心县委（如玉田、滦县）原有二百人，博、蠡县有一百九十人，石庄还有几县不清楚，这些地方至今虽无统计，但仍有相当组织基础，是可以推测的，当然因长久失了省委领导，工作一定是很糟糕的。好的现象，最近在铁路和纱厂工人中都有相当工作之建立，地方党部较好的是北平与石庄中心县委（书记是一工人同志），直南特委虽大，但领导成分很不健全，省委最近对他们不仅有书面指示，并且巡视过。至于支部生活，原来在破坏后已没有生活，最近由于反帝斗争的高涨，因之兴奋了一般同志，特别是北平，最近能与一切反动派别作斗争（注意：北平是取消派国家主义派等很占势力的地方），争取反帝的领导，即其明证。群众组织亦有相当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反帝大同盟现已增至数百人，其他文化团体亦有相当发展。中央对河北的领导与关系，最近能经常送文件，唯巡视工作除去年春间进行一次外，以后两次都忙于应付省委的破坏，未能真正巡视各地方的组织，至于支部更不用说了。

五、山西的党历来是归河北省委指导的，至今尚没有成立省委，只有一个特委。在四中后河北省委先后曾派几人去巡视，一开始特委曾反对四中路线，后来几经斗争始告克服。最近特委工作（特委五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斗争情形，不甚清楚（太原的反帝反国民党斗争大约我们有同志参加，但无集

中领导)。惟据最近材料，有三事必须叙述的：（一）特委的破坏经过情形是一个转信人（同情者）被捕，供出一个同志的家，此人被捕后，即将特委全盘供出，前后逮捕二十余人，其余几人亦不能立足而逃至乡间。特委现在尚未完全恢复，只有一二人在那里找下层关系。（二）（略）。（三）二十四军（红军）的失败，这个红军成立之经过，不用再说。他自从在阜平失败后，即向绥远移动，卷起红旗假装石友三的溃兵。山西特委派人去准备将他拖到陕北去（大约是未找着），但因该军失去领导，在河北、山西交界处即起内部分化。一部分要暂时投降保存实力，一个要到陕北去，结果三百多人被缴械，其余的人一天走一二百里，受陕北地主富农的领导（陕北特委已一年多与中央、陕西省委无听说，都是富农在领导），连粮饷都“不好意思”向地主筹，结果遂完全瓦解（这一报告是去年十一月王忆栋根据刘天章的口头报告）。由以上三事，可见山西党最近领导的情形。至于山西的组织据去年三月的统计，约有两百余人（一百五十七人是士兵），七八月间统计有二百九十六人（见第十三表），后即无统计。现据河北来信，说山西特委虽遭破坏，但下层组织仍保存着，已由他们派人整顿去了。

六、陕西的党在四中后根据中央实话报曾有转变路线的企图，但一再陷入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中，直到三月间，陕西省委负责同志来中央报告，中央才根据这报告去一封指示信，六月间中央曾派巡视员前往巡视，巡视的结果，据省委来信说不仅很空洞，而且有许多错误（如认红军在三次“围剿”中已受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这一决议至今仍未见到原文，其他如八一工作布置以及对分粮斗争、提拔干部等，省委认为巡视员都有错误）。关于这些错误的具体经过和内容，因文件不够，固尚不能做最后之检查，但巡视员的工作虚浮，不切实际，的确有

错误，这是可以大概判断的。由于巡视员的错误和党的基础不好，领导中没有坚定的工农干部，以致陕西党直到去年十二月间，政治路线仍辗转陷于机会主义泥坑中（见十二月七日省委的决议）。最近省委对过去错误已大体认识了，但省委领导仍然极不健全（过去巡视员所提拔的两个农民据省委说不能担任工作，现在省委实际上只有两人，都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政治上有问题，此外只 C. Y. 代表与西安市委书记参加，这一领导自然成问题的）。他们对于斗争的领导，去年虽有几次（如西安日报斗争及蒲城盐车工人斗争），可是报工斗争因支部同志不受市委的领导，结果掀起帮口观念以陕西人反对河南人致被资方利用而失败，盐车工人因组织松懈致遭公安局压迫而没有多大的结果。此外如农民斗争及士兵斗争本有很好的客观环境，但因没有很好的党的领导，不能组织起来。特别是反日运动，他们犯了极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他们认为一切反日会都是反动教员们干的），结果党在反帝运动中完全成了房中的清谈。陕西党的组织在去年三月间统计共有一千四百余人，但这里一千一百人是属于陕北和甘肃的（陕北在地理上很难受省委的领导，中央本决定和山西合并起来成立一个特委，但因河北一再破坏，至今尚未实现），现在仅就省委所辖的地方统计起来共有三百人以上（见第十四表），但在成分上富农军官就有五十个，工人只有七个，兵士却有一百人以上，至今所有领导干部几乎全数是知识分子（大半是地主富农出身）。省委对于提拔工农同志毫未注意，只是以工农同志能力薄弱、提拔困难等来解释。至于地方党部，过去比较上是蒲城、西安等处好些，最近可说退步了，其余还不大清楚，支部也很少有经常政治生活。中央对陕西的领导，除去年巡视一次外前后曾去过三次信，关系最近亦未断过，群众组织 C. Y. 很弱，工会只有一

个附属组织，农民有穷人会四十余人。

七、满洲的党在四中后曾与右派唐鸿经、徐文雅等做很久的坚决斗争，结果克服了右派领袖在满洲的活动。满洲省委过去人数是比较多的，但因不甚注意秘密工作，又在日本侦探密布的环境中，在去年十一月间曾遭一次大破坏，结果主要负责人几乎全体被捕（内中有几人已叛变），现在省委领导已缩小为三人，书记是一个工人同志。对于斗争的领导，过去的省委与现在的省委都很弱，几个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与东满的韩国农民运动都没有很好的领导。特别最近的反帝运动，省委所处的环境完全是日本直接践踏的地方，但是对于反日运动的领导，除了几张宣言传单外，还没有什么大的斗争是在吾党领导之下。满洲党员的数量在去年春间统计约有一千人以上，现在统计约一千三百人以上（见第十五表），成分工人只占百分之三点五，农民却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民族上韩人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可是所谓三大城市、三大铁路、三大矿山，除哈市较好外，都是很微弱，甚至根本没有组织（如抚顺煤矿）。……地方党部目前还是哈市要好些，支部工作在去年本来开始建立了些产业支部的基础，但因满洲事变，目前不知道怎样了，干部的恐慌也不亚于其他各省。因此巩固满洲的领导，严密党的组织，打进主要的产业（铁路、矿山与市政），抓住群众斗争特别是反日斗争，却是满洲组织很迫切的任务。中央对满洲省委的领导，除巡视一次并派有特派员，书面指示也有好几次，交通关系也很密切。群众组织只有哈总与东满农协较大。

八、安徽的党在四中以后原有省委的组织，但实际上只有一个架空的机关，没有什么工作。去年四五月间中央曾派人去巡视，但未久省委即遭大破坏，省委书记及巡视员均被捕牺

牲，以后又派了两个同志去，取消省委，成立芜湖、合肥两个中心县委（即目前的组织形式）。芜湖的党因一贯没有与取消派真正作斗争，以致许多取消派分子混入指导机关一再破坏组织，都是这些分子的告密。同时皖南党内的派别斗争又是闹得一塌糊涂，去年曾为此事来中央闹了很久，并在各地成立小组织。当时中央与巡视员虽与他们作激烈的斗争，无如芜湖党的基础太弱，派去的工人同志又无能力，以致始终不能好好地工作，去年冬季又遭一次小破坏，结果负责人虽大半逃脱，但芜湖组织实已坍台，现在各县较清楚的只有宣城，其余各县正在恢复中。广德红军去年一次失败，闻现亦陷于涣散无组织的状态。至于皖北（除苏区不计外）是以合肥、寿县为中心，合肥组织虽大，但始终没有斗争，成分也大成问题（有一区完全是地主绅士），自巡视员改造以后目前稍有进步，领导是一工人同志。寿县是两次游击失败后，一般走入恐怖状态，全党组织主要的都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把持，弄得不死不活，对于斗争不仅无斗争，而且认为寿县根本无办法，虽经巡视员一次改造，但最近来信仍说一筹莫展。全省白区组织（六霍白区属苏区指导）过去没有真正的统计，最近可以计算的亦不过三四县，其余都不明白。现在能够统计的党员约有五百多人（见第十六表），成分是农民与知识分子占绝大的多数，地方党部只有宣城与合肥好一些，其余都不清楚，支部生活是异常糟糕，党员政治水平线的低落，连对党起码认识也都没有。群众组织，皖南不清楚，合肥有农协两千余人，妇协一百三十人，但都没有多大作用。中央对安徽党的领导，去岁曾有两次长时期的巡视，此外也写过好几次指示信，最近且加强皖北的领导，同时准备替芜湖训练几个干部，以便恢复皖南的组织。

九、浙江的党共有三个小单位直属中央（即温州、台州、

宁波)，宁波一个工人同志在那领导，党员虽有三四十人但没有什么党的工作。温州、台州去年曾来中央讨论一次工作，以后只温州与中央有间断的关系，但最近书记已被捕，工作上究竟影响到什么地步还不大清楚。台州至今很久无报告。这两个地方，过去斗争，大约在立三路线时代，曾有过游击，首领是一个流氓土匪，至今已经涣散了。此外义乌还有一个农民同志（去年春曾在中央党校受训练）在那工作，曾来过两次短信，至今怎样，不得而知。中央目前正在物色浙江干部去加强这些零碎的组织。过去中央对浙江工作的确有些忽视，其实浙江在地域上政治上实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建立和创造此省的工作也是刻不容缓的。目前宁波与温州两处党员共有一百四十五人（见第十七表），台州究有多少，没有材料可供统计。群众组织未详。

十、福建的党在去年三月间曾派负责人来中央讨论一次工作，并写了一封指示信，但所决定派回去的人未到福建，那里即遭破坏，结果一时失了关系。省委剩下的同志只是在等待中央解决而不知自己想办法，直到中区红军冲破二次“围剿”影响闽北的时候，福州同志才兴奋起来要开始工作，当时即在福州成立临时省委办公处，并在厦门设办事处，直至六月间才由巡视员前去改组，取消临时省委，在福州、厦门组织两个中心市委（即现在的领导，成分主要都是知识分子）。对于斗争的领导，据最近巡视员报告以厦门为最好，特别是在这次反日运动中，开始曾犯关门主义的错误至十月革命节即行转变，结果在十一月十六日曾经领导过一次示威运动，以后继续发展直至包围国民党部，用群众力量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结果颇好，与上海等处颇相似。党在这些运动中，不仅打击了统治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别，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而且相当的巩固和发展了

组织。至于福州，最近巡视员才去，尚没有详细报告，据说远不及厦门。福建党员统计在去年三月间为五百零三人，现据巡视员九月的统计，两个中心市委共有党员五百九十三人（见第十八表），成分中仍有富农和绅士的分子。群众组织各种都有一些（如福安有农协会员三千人，厦门最近又建立了几个赤色工会的基础），地方党部好一些的还是厦门，产业支部有些萌芽的基础。但政治生活不详。此外社会民主党恐在党内有暗藏的分子，但至今亦没有很好的检查，尚未具体发现，这一点是值得继续注意的。

十一、两广的党在去年白区也时常遭受破坏，因此香港、广州等地原来是最有革命基础的地方，也不能好好地建立工作，特别是广州几乎成了无组织的地方。省委领导因负责人时常被捕，始终不能健全起来，最近十二月间又有一次破坏，结果只剩几个能力很弱的同志暂时维持工作，有中央巡视员在省委帮助。至于白区各地群众斗争的领导，据去年十一月省委的报告，香港、广州等处都有相当成绩，组织上亦有相当成绩（如打进工厂及建立工代会等），但这些工作恐因最近破坏又不免要受影响。其次占两广工作最多的部分，就是领导苏区的工作，在这方面省委的确有相当成绩（如东江潮普惠苏区能够比较正确执行土地革命，其他苏区也正在进行改造和巩固中）。省委对反帝斗争的领导，还不能抓住当地的具体事实（如承汉路惨案及法兵进广西等）来动员广大群众做反帝反国民党的工作，对于中央在反帝运动中的中心口号与策略，还未充分了解甚至有个别的错误。两广党员只在去年春间有一次大略的统计，以后就没有材料了，大概的计算全省当有一万人左右（见第十九表），但主要都在苏区。地方党部除苏区外，较强的还是香港，其他都是异常弱，支部生活很不好，过去有些老干

部，现在都很消极，不愿做工作，而且时常与新的领导对抗。中央对两广的领导，过去曾派几个得力干部去，但不幸都被捕了。此外交通关系、文件的传达并没有断过。最近且有一个巡视员住在当地帮助工作，不过现在必须派一个得力同志前去主持，不然工作上是不能开展的。

十二、四川的党只在去年六七月间才与中央详细的讨论了工作，从那时起省委的确有转变工作的企图，并且得到相当的部份的成绩（如组织的恢复和巩固，个别工人斗争的领导），但在反日运动中又犯了很大的错误。一开始省委完全采取了关门主义（如反对反日会，认为反日运动是国民党的欺骗，不仅不能领导群众斗争，而且被群众骂为亡国奴），后来一转而入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援助马占山，请求政府出兵，要求司令部保护），完全忘了自己的阶级立场，这一错误因巡视员要负很大的责任，以致至今还未改正过来。省委的领导成分完全是知识分子，全省约有一千二百人（见第二十表），但产业工人只有二十个。地方党部只有重庆与成都较好一些，但是仍有这样地方党部，他们曲解中央活的领导，认为地方党部只要领导而不执行，支部只有执行，因此他们把机关扩大起来，去建立秘书处的的工作，不注意他们下面有没有支部（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事），这简直是对于活的领导的讽刺。支部生活只有城市支部能够开会，农村支部连开会也很难做到。

十三、云南的党的工作在去年春间本在中央讨论过一次，并决定成立临时省委（书记是一个铁路工人），但自他们去后至今仍无关系，党员总数过去统计是三百六十一人（见第二十一表），现状如何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组织总是有的。

十四、湘鄂赣白区组织除归苏区指导者外，现在只有长沙有一个中心市委的组织（最近才由工作委员会改组的），同志

约有四百人（见第二十二表），但有三百人是属于南安，这一组织将来应归湘鄂西苏区指导。党的工作主要只在恢复组织，还无什么成绩可言。武汉去年六月间自从负责同志与山东对调后至今杳无消息。在宜昌、沙市建立一个特委有相当工作，特别是在川军中。南昌去年七八月间亦曾有两个同志来此讨论工作，但去后有一个被捕，另一个最近才有信来，但未说到工作。这些地方组织当然还是有的，只是长久失去领导，当然工作是一塌糊涂，对于这些地方工作的整顿与恢复是目前很重要的任务。

V 群众斗争的开展与我们的组织工作

由于革命危机日渐成熟，群众斗争的发展也呈现着异常蓬勃的现象，群众的革命化与要组织，在最近反帝斗争中是更加明显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无疑的是在扩大得很快，这在几个大城市的示威运动中完全可以看出。可是这种夺取群众的顺利条件并没有在组织上充分地利用，照目前看来，我们的组织工作是落在群众斗争发展之后的。这里主要的错误与缺点，可以概述如下：（1）不会把日常的群众斗争与大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因此不能做很好的有准备的组织动员，时常在大的运动中虽也能吸收许多群众来参加，可是这些群众大半都是偶然的，不是从一定组织中动员来的。（2）不会利用群众斗争的环境来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不会利用群众所创造的各种组织方式来进行组织工作，巩固我党的政治影响，时常很呆板地死守自己所想的组织方式。（3）不懂得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不懂得怎样争取公开，时常在工作中发现狭隘的关门主义与表面的形式上的公开（硬要把我们的群众机关给敌人知道）。

(4) 不了解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联系，机械地把这两种工作对立，因此失了许多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机会。(5) 不会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不懂如何与黄色工会及一切反动派别作斗争，时常因运用这种策略而企图减低我党的政治口号，或者把一切反动派别的领袖与其下层被欺骗的群众一样看待，因此失去许多夺取群众的机会。(6) 没有充分的利用自己已有的组织力量来推动或影响其周围的群众，时常在动员中发现清一色或一半都是我们组织中的人，不知怎样团结无组织的群众。(7) 自己组织的行动不一致，时常发现同为党领导下的组织，而在行动上却各做各的，不能有很好的联系与整盘的计划。(8) 政治上的动摇同样在许多运动中发现。以上种种缺点和错误，自然不能说各地都是一样，而且有些地方已有很大的转变，但是在各时各地总可以找出许多如上述错误与缺点的事实，这是无疑的。因此如何消灭这些现象，却是党夺取群众时不容丝毫忽视的先决条件。

至于具体的各种组织现状，我们不在此一一重复，因这些组织大致已有自己的报告了，概括说一说可以分为下面几点：(1) 工会工作可说是吾党在转变中最大的弱点，现在全国的会员，除苏区外，据大概的估计不过三千人，而且组织上的巩固如何还是成问题的。(2) 青年团及一切青年组织在四中全会后自然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工作的发展一样赶不上革命的客观形势，现在全国团员可统计者约在十万左右，而白区却不到十分之二。关于团的工作我们在此不说，可是有一点必须指出的，就是多数党对于青年团的注意和领导无疑的是不够的。(3) 反帝组织除苏区外直到现在还只限于几个城市（上海、哈尔滨、北平、厦门等处），而且这些成绩也只是在最近满洲事变以来才有的。现在所知道的，民反有一万人（可以影响一万人），

上海反帝大同盟只有一百多人（已大大缩小了，原因是由于学生放假，这当然是可耻的现象），其余河北有几百人，厦门哈埠不详。（4）农民协会差不多各省都有但无确实统计。（5）妇女组织上海有一点附属组织与民反中妇女大同盟（约三十人）。（6）互济会除苏区外全国有一千余人主要都在上海，济总在撤消阿乔领导以后，已有相当转变。（7）文化组织现在所知道的只上海与北平（上海约四百人北平约四五十人）。其余各种零碎组织尚有一些，在此不赘。总合起来，群众组织的微弱，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党加紧对于一切群众组织的领导（特别是工会），扩大群众组织，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最后关于巩固党团领导的问题，各省注意力还非常不够，中央过去也不充分（如工会党团反帝党团等），最近只是全总、上海工联以及民反等党团比较加强了，但许多群众组织特别是下层的群众组织的党团工作不仅不巩固，而且甚至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VI 组织局的工作

组织局的成立还不过两个月，但现在人员可更换了两个。过去的组织部虽有两个人员，有一年的历史，可是由于去年中央组织变动过多，工作人员的实际作用，时常更动，以及能力的薄弱，并不能得着很大的成绩。现在的状况，虽然有一定计划与分工，可是还感觉着：1. 没有很多时间研究全国组织状况，所管理和发生关系的单位太多。2. 不能很注意研究各种党的建设问题，以便指导各地，组部所出之《党的历史》除被出版部遗失四期外，实际只出了七期，八期尚在搁置中。一切情形因为常委同志经常领导，故不一一赘述。组织工作做得不

好，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工作人员能力薄弱、经验不够，所以当研究全国组织状况以及如何加强组织局和改造组织局的工作，也是今后加速转变的先决条件之一。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 原件未附各表。
- 〔2〕 指欧阳钦。
- 〔3〕 即邓中夏。

中共中央为上海事变 给各地党部的信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

各地党部：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满洲之后，北则向哈尔滨与中东路发展，西则向内蒙、外蒙发展，进攻苏联，并完成满蒙的占领计划。南则调动它的海陆空军向中国沿海各口岸进攻，实行镇压全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着的反日运动，占领新的区域与取得新的特权，并以此来恐吓国民党政府无条件的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一切条件。上海的占领完全是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计划的有机的部分。所以虽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对于日本在上海所提出的四大要求（即赔偿日本损失与取缔全国反日团体与反日运动的要求）完全接受，而且日本领事已经表示“满意”，但是就在那一天的晚上（二十八日晚），日军即开始了对于上海的武装行动，轰炸与残杀上海的劳苦群众。

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行动，自然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也日益紧张，尤其是日美之间。日帝国主义海陆空军的调动，不能不使帝国主义列强大大的把它们军舰集中到上海。尤其是美国，自二十八日之后，美军舰应调而集中到上海的已有十九艘之多。这种动员的主要目的，当然同样的是在镇压中国革命运动，尤其是进攻苏区与红军，与瓜分中国。然而同时也正是为

了瓜分中国而发生帝国主义战争的积极准备。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军事行动，却遇到了十九路军士兵的英勇的抵抗。全中国民众反日的斗争，也更因反日战争的发生而更形高涨。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却继续的主张不抵抗，把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同时准备在任何条件之下，向日帝国主义投降，以避免战事的扩大。为得要表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坚决，蒋介石更遣派警卫军第三师到上海监视十九路军，准备解除十九路军士兵的武装，以停止反日战争，表示他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

至于其他国民党的派别，以及许多失意军人与无聊政客，则正在利用十九路军士兵英勇的反日战争与全中国民众反日斗争的高涨，大放“抗日救国”的空炮，积极表示自己爱国的活动与对于十九路军的赞助，以欺骗十九路军的士兵与反日民众，造成革命士兵与革命民众对于他们的幻想，把他们奉为民族革命的英雄，以此来维持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以此来扩张他们的地盘与他们的势力，进行反革命内部的斗争。陈济棠、孙科、张发奎、李宗仁、冯玉祥、陈铭枢等的“抗日活动”，完全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在革命士兵与革命民众的背后，这些反革命派别，正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表协商着如何出卖上海与中国，如何把上海划分为中立区，使十九路军士兵退到“安全地带”以外，或者像蔡廷锴等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以取得“抗日”的报酬。同时，他们同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一样，对于民众的反日运动则利用军事时期的戒严条例，任意压迫。他们解散反日的革命团体，禁止群众武装、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他们逮捕与屠杀革命领袖。他们在援助十九路军的空洞口号之下，调动着他们的军队，不是为了参加反日的战争，而是为了

进攻苏区与红军。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蒋介石之在鄂豫皖和陈济棠之在闽赣边对于苏区与红军的军事布置了。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与屠杀民众的刽子手！

一切在野的派别，如像社会民主派、社会与教育派、国难救济会派以及托陈取消派，也正在这一反日战争中，积极进行欺骗的宣传，使革命民众幻想国民党还能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要全中国的民众不去积极起来反对造成全中国民族奇耻大辱的国民党统治，而起来拥护国民党去“抗日救国”。他们更主张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组织“民众抗日救国政府”或“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实行“官民合作”与“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以取得自己的地位。同时利用种种诡计、阴谋、造谣、诬蔑的方法，并借用帝国主义巡捕房与国民党军警的势力反对与压迫革命运动与革命组织。

但是，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与一切革命民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进攻，给了最有力量的回答。他们罢工、罢课、罢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与国民党的投降。士兵群众更是奋不顾身，拼着性命，在血战中抵抗着日军的进攻。成千成万的工农学生群众，开始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加入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阵线。全国反日运动，正因为日帝国主义的侵掠与国民党的投降，而更其高涨了。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的新的的发展，更给了全中国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群众以更大的兴奋，使广大的民众相信，只有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之下，才能使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得到最后的胜利。国民党统治是正在加速度的崩溃着，做着临死前的最后的挣扎！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之下，我们的党必须最坚决的反对对于任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以为它们可以帮助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冲突，不是为

了要帮助或反对中国，而是为了瓜分中国的不均。必须经常揭破一切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的阴谋，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事实。对于国民党任何派别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也绝对不应有丝毫的幻想，以为它们还能拿着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毫不容情的揭破这些嘴上喊着“抗日救国”的军阀们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压迫民众运动的一切阴谋与事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与一切国民党的派别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在反帝与反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这仍旧是我们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然而把上海目前所进行着的反日战争（同样关于满洲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战争），看做简单的帝国主义与军阀间的反革命战争，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不论这一战争的领导者是如何混蛋与反革命的军阀，然而这一战争的主要动力不是这些军阀，而是士兵群众与反日民众，这一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侵掠，而是为了反对侵掠。所以这一战争虽不过还限制在上海等处，然而它很明显的带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意义。因此，我们党的任务不是抵制这一战争，而是积极的加入这一战争，夺取这一战争的领导，在战争中加紧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宣传鼓动，大规模的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来推翻国民党，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以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

中央检查各地党部的工作，觉得我们的同志对于目前形势还没有这种明确的了解，或者甚至完全不了解。所以在各地的反日工作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两个不能容许的极端。或者是完全的关门主义，不参加任何反日运动；或者是所谓完全的“公开主义”，变为国民党的俘虏。譬如陕西省委，过去对于反日运动完全消极，后来改正了这种错误，即转到了另一极端，

使我们的反日运动变成了和平的公开运动。再譬如四川省委，当广大群众起来反日时，我们主张“反帝不反日”，但后来自知错误，即另趋极端，组织“援马^[1]委员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的保护，并且在刊物上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合作。其他如满洲省委与广东省委等在反日斗争中，对于我们党的阶级路线表示出许多动摇。对于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与动摇，我们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打击。只有在反对这种国民党的尾巴主义与“左”的关门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上，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工作顺利的向前发展！

上海事变后，中央已有一紧急通知（一月二十七日发）告诉各地党部以目前所应该进行的一些具体工作。然而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复杂的形势之下，有几个中心任务必须在这里特别指出的。

第一，必须号召与组织反日的群众大会或群众团体的反日代表大会，通过反日的纲领，公开成立民众反日会与民众反日联合会，公开领导目前开展着的反日斗争。这里所说的公开，不是去向国民党立案，而是经过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力量去自动的公开。这种反日会的委员，决不是立三时代的行动委员会，完全由党所指定的几个同志去包办，而是由广大的反日民众选举出来的，他们不完全是自己的同志，而且要尽量吸收非同志的群众代表参加工作。在已经成立反日会的地方，必须集中力量建立下层的群众基础，利用反日会的公开组织，到工厂、学校、农村、兵营中去建立反日会的分会。尤其要把反日会的领导集中到工人反日会的手里，必须经过党团去领导反日会。

必须再三说明，反日会的公开，决不是把我们的纲领变成灰色，而是依靠群众的斗争力量以争取公开。最主要的口号应

该是“罢工、罢课、罢操、罢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境”，“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口号必须简单明了，必须喊出反日民众的要求，为反日民众所接受，并且依据反日斗争的发展，转变与提高我们的口号。

要把目前一切反帝的斗争拿到反日会手里。经过这一公开的组织来集中反日的领导，使这一反日会的权力逐渐扩大。坚决打击把反日会的工作停顿在和平发展中，以为反日会不必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错误倾向。应该明显的认识反日会是群众斗争的领导机关。尤其在战区内，反日会必须领导广大民众的日常斗争。对于罢工工人、失业工人以及难民贫民等在战争时期生活问题与安全问题等的解决，应该是反日会最中心工作之一。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发动与领导群众抢米分粮、占领公共房屋、包围市商会市政府等要饭吃、要房子住的斗争！只有这样，反日会才能在群众中间提高它的威信与权力！

第二，党除了利用公开路线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宣传队扩大反日宣传以及扩大反日组织、号召与组织飞行集会与示威游行等主要工作之外，必须立刻进行义勇军的组织，来武装工人农民与革命的学生群众。要把义勇军的组织形式，来扩大我们党的群众基础，来武装民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在没有反日会的地方，党可以单独公开组织义勇军，设立义勇军委员会与义勇军办事处。在与日军直接作战的区域内，这种组织是号召群众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的最好的方式。加强义勇军工人阶级的核心，在工人反日会下成立模范的工人义勇军，绝对保证我们党在义勇军中的领导。

我们坚决的反对在有些省委内对于义勇军所有的不正确的

观念，以为义勇军只能帮助国民党军队作战，把义勇军任意的送到前线上当炮灰，结果我们的义勇军领导机关变成了国民党招兵买马的地方。同时把义勇军同民族革命战争完全分开，以为义勇军就是在作战的区域，也不必到战线上去的观念，也是不正确的。只有把义勇军当做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工农自己的武装组织，才是正确的了解了义勇军。因为是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武装队，所以它不拒绝而且积极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是工农自己的武装组织，所以它不受国民党的军官所节制。它是民众反日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宣传者、组织者与保护者。它参加反日战争，是为了要同革命兵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投降帝国主义的一切国民党军阀。

要坚决反对各省委对于义勇军工作的忽视，把义勇军工作限制于形式上的登记，把义勇军同群众斗争完全分开，与在和平状态中去发展义勇军的观念，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党须用最大的力量加强对于义勇军的领导，不然“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海陆空军出境”的口号会变成嘴上的空喊。义勇军必须要有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要利用他们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与保护民众运动。义勇军必须到前线上同士兵在一起，团结与争取革命的士兵到革命的民众方面来。必须利用义勇军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消灭敌人的便衣队，来武装他们自己。此外，在农民中必须成立农民的义勇军，把他们放在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之下。

第三，必须最坚决的执行抵制日货的工作，把抵制日货的领导权拿到我们自己的手里。各地党部对于这一工作过去是完全表示消极。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国民党与资产阶级的抗日会还能继续存在，利用他们的抗日会去欺骗民众，并且利用这一组织使反日运动真正失去领导。关于这一工作，中央有不少

指示给各地党部，然而一直到现在，在许多同志中还表示怀疑与犹豫。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现象。

我们的反日会必须立刻起来领导抵制日货与没收日货的工作。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的，反日会必须动员工人学生群众组织大规模的检查日货队、调查日货队，立刻开始工作。把没收来的日货，拿来救济罢工工人、失业工人、难民与城市贫民。“拍卖没收日货救济罢工工人与失业工人等”这一口号，过去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然而我们始终没有认真的去做，这对于我们实是很大的损失！

在战争区域内，抵制日货的工作必须着重在检查将粮食、日用物件以及一切货物高价卖给日军的奸商。公开号召群众组织通缉奸商私贩货物给日军的队伍，用各种各样的武器武装这些队伍，尤其要这一工作集中在工人阶级的手里。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奸商的财产，来救济罢工工人、失业工人与贫民。同时必须设立民众法庭，公开审判“汉奸”。纠察队更必须注意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不觉悟的工人，要善意的劝告他们勿为日帝国主义所利用。

第四，争取反日士兵的工作（尤其是十九路军的士兵），现在比无论什么时候都重要。必须大规模的公开（同时也可经过反日会）组织慰劳队、看护队、运输队、交通队等到前线去同作战的士兵接近。必须派遣有组织的坚强的工人队伍（可利用工人十人团等名义）到军队中去，实行补充。自动的成群结队的到前线上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参加作战。动员妇女到伤兵中去做慰劳与看护的工作。总之，必须利用一切方法到士兵中去，同士兵接近，宣传与组织士兵。在士兵中必须成立兵士反日会或士兵委员会，加入民众反日的团体，逐渐把对于士兵的领导权拿到我们的手里。

在反日军队中组织兵士反日会或兵士委员会，是党在士兵工作中的中心任务。这种委员会在经济上直接接收一切民众的慰劳物品，自己管理伙食与军饷与一切士兵的日常生活。在政治军事上，一切长官的命令必须经过兵士委员会的许可方能执行。它号召士兵群众反对投降、妥协与退却的军官，它可以在广大士兵群众拥护之下，逮捕、审判与枪决这类“卖国贼”。应该最坚决的反对那些把兵士工作当做同军官周旋的同志（如像在十九路军工作的一些同志），反对对于任何“抗日军官”的幻想。

绝对不要放弃在日本士兵中的工作。打击那些以为在战争期间没有法子进行这一工作的机会主义观点。提出“日本的兵士弟兄们同中国的劳苦民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第五，在我们已有军事力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这种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领导革命斗争与政权的机关，它依靠在斗争的工人、近郊农民、兵士、学生与城市贫民的身上，可由党、团、工会、反日会、义勇军指挥部与兵士委员会（或反日会）组织起来，但必须保证在它里面工人骨干之决定的作用与党的绝对领导。它应该领导保卫中国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在民众与士兵中发展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用它的名义发表宣言、传单与各种刊物，号召革命民众与士兵起来，反对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并且在可能的地方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与“卖国贼”。

如若在各大工业城市中建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取得了对于士兵与工人群众的真实影响之后，我们就应该采取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保卫中国的路线。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依靠它的武装力量与千百万群众的拥护，直接做打倒南京国民党

政府的斗争，并且宣布国民党政权之推翻，与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直接受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领导。

要坚决的反对那些以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当做能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可以生存的观念。要坚决反对那些在目前空谈武装暴动、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放弃目前的中心工作的清谈倾向与机会主义的消极！但同时要十百倍的加紧武装暴动的宣传。

第六，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必须十百倍的加紧宣传苏维埃与红军。在我们的宣传品上与口头的宣传鼓动上，必须在千百万工农民众的前面指出，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没收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大资本家所有的一切银行、工厂、企业、交通工具与一切他们的财产，把它们一起拿来充当民族革命战争的军费。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没收地主、大商人以及富农的一切粮食，拿来充当民族革命战争的军饷。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把全中国所有的武装拿来武装全中国的工农群众，创造出广大的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与千百万的赤卫队与游击队，来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在苏维埃政权下面，全中国将变成民族革命战争的战斗的国家。也只有在它下面，我们才能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广泛的散布用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名义所发表的各种宣言与传单，经常地把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与实际斗争提在广大反帝民众的前面，把反帝的苏维埃政府同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最分明的对立起来。最普遍的告诉全中国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正在中国内地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血战着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组

织者与领导者，是目前反帝国主义最强有力的与伟大的先锋力量。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与一切国民党的派别，这样一致的把苏维埃与红军看做它们在中国统治的最大危险，这样一致的向着苏维埃与红军进攻！

中央不能不严重指出，在目前这样紧张的形势之下，我们工作的速度如若与目前革命发展的速度比较起来，是非常落后了。不少我们的同志还是熟睡在长期的秘密工作的床铺上，没有清醒过来，看一看他们所处的环境，振作精神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去深入群众与领导群众。不少我们的同志还是在他们那一个狭隘的秘密工作的圈套内，利用那些陈旧的工作方法“努力”着，而不知道去利用与创造一切新的工作方式，去适应新的革命环境。在新的环境之下，这种“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实在是破产的了。

中央认为各地党部接到中央这一指示之后，必须最严格的具体的检查在最近时期内他们自己的工作，要张大眼睛看一下自从满洲事变发生到现在的五个月内，党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得到了什么具体的成绩，这些同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比较起来，是否满意。要开展最严厉的自我批评，指出过去工作中不可容许的错误，对于目前反帝形势估计的不足与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必须用最大的力量，转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到新的轨道上，来适应目前新的环境！

中央责成各地党部，把中央这一指示信拿到各级党部尤其是支部中去讨论，去教育支部同志，启发支部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各级党部应该根据中央这一指示信，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形，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并且要自下而上实行个人负责制，来保证工作计划的实现。要给那些定出空洞计划而不去实现的同志，给以最严厉的组织上的制裁。要把那些对于中央的

指示消极怠工，不愿意想出种种具体办法、转变工作方式以适应目前新的革命形势的“老布尔什维克”，送到历史的革命博物馆中去！

最后，在群众工作的开展中，必须大规模的吸收工人、贫农、兵士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入党，发展党的组织。不论我们的群众工作发展到哪里，我们必须创造与巩固我们党在那里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到处建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铁的领导，保障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马占山。

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团工作的决议

——听了团书记同志报告后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 中国的革命危机正在以极大的速度生长着，经济危机深入到国民经济总崩溃的程度，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与瓜分中国的急进，决定了目前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强有力的高涨。工人罢工斗争的澎湃，反帝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蓬勃开始，士兵哗变，灾民与农民骚动的风起云涌，和红军及苏维埃的壮大与发展呼应着。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战争，直接地打击着中国劳苦群众。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强盗战争与他们一致进攻苏联的战争，都威胁着中国的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革命的风暴逼临着中国。经济恐慌的深入，帝国主义直接公开的武力侵略，国民党的卖国与辱国，与革命危机的成熟，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劳苦青年最广大的阶层。一方面，经济危机的铁锤，帝国主义在满洲以及全国的主要工业城市的军事的占领，残酷地打击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劳苦青年群众，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正以一切经济恐慌的重担，加之于劳苦群众的肩上。广大的青年群众正度着非人的奴隶生活，在饥饿、冷冻、死亡的漩涡中挣扎着。资本残酷地向着青工的生活水平进攻（取消月赏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到十五六小时，三日班），开除和关厂使着几千几万青年工

人女工失业（由全国丝厂关厂的结果使不下四万左右的青年女工失业，上海的日本纱厂的关闭使着五六万的青工与女工彷徨街头），加紧着非人的剥削打骂，压迫在业的工厂与手工业作坊的青工群众。水灾与农村经济的破产，使几百万的青年农民失去一切，处于饥饿的状态之中。而地主与高利贷都更利用时机来非人的剥削与奴役青年农民，人口卖买广大流行，将几千几万农村儿童与青年农妇陷于奴隶的生活。青年劳苦群众的生活已痛苦到了极端。另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苏联劳苦青年生活极大的改善，在土地革命胜利了的苏维埃区域中青年的生活得了极大的改善，青年六小时工作，劳动的保护，文化教育的享受，同工同酬，青年农民得到了土地，解除了一切地主高利贷的奴役与束缚，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青年群众的生活开始了大大的改善，大大的提高了他们经济与文化的状况。苏区的青年工农以自己的英勇争斗，给全国的劳苦青年指出脱离饥饿、灾荒、经济浩劫与地主及资本剥削的革命出路，指示了从帝国主义奴役之中解放出来的道路，这便给国民党区域中的青年争斗以极大的刺激。青工的单独争斗的数目是增加了（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上海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有二十八次青工单独争斗），青工参加总的罢工争斗亦是更加积极。在一切反帝运动土地革命及日常争斗中，青年群众都起了重大的作用。青年群众在阶级战斗中的作用与意义是提高了。而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们争夺青年的争斗亦是更加紧了，利用一切民族爱国主义的武断宣传、体育游艺、党化教育、民族文艺、童子军等来笼罩青年，在野的反革命派别更以假的似乎的反帝国主义的反国民党的口号（国家主义派：“打倒一党专政，对日宣战”；社会与教育派：“召集国民大会，进行反日革命战争”；改组派：“打倒个人独裁，建立民主政治”与取消派的“召集

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等等）来争取青年群众。所有这些客观条件，大大的提高了团的任务，要求团用最强的速度在为保护青年工农日常利益而坚决斗争的基础上，在独立的坚决的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的基础上，争取团集最广大的青年群众在自己的周围，去进行领导青年群众参加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拥护苏联，争取中国独立解放与统一，开展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争取中国苏维埃的一省数省的首要胜利及其在全国的胜利。

（二）假如从这个观点来检查团四中全会以后直到目前这一时期中的工作，则不管他虽然有了许多的成绩（恢复了被立三主义所破坏了的组织，在拥护共产国际及党的路线的斗争中提高了团员的政治水平，在苏区领导了青年群众的英勇的斗争，在上海及别的地方坚决地领导着争取街道示威的斗争等等），而一般的情形看来，团的现状是不能满意的。团的工作很大的落后于劳苦青年群众的积极性之后；团争取青年群众的程度和速度，很大的落后于客观条件所要求的程度与速度之后；团对于一切政治事变，缺乏灵活的反响。这特别在目前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面前，是十分危险的，是不能容忍的。造成目前这种落后的原因，首先就是在团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方式与方法的浮泛不切实际，空喊清谈多于具体的行动，工作的不青年化，没有具体的活的领导与工作的检查，两条战线斗争的不深入，干部成分的恶劣及其与群众联系的薄弱，对于工厂工作注意力的缺乏。同样各级党部——特别地方党部的取消主义的残余，缺乏对于团的政治领导及经常的有力帮助，亦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三）党中央号召一切团部及团员群众坚决地起来为着工

作的转变、工作的青年化而争斗，为着工作的速度而争斗，为着改变工作的方法与方式而争斗，为着具体的领导与工作的检查而争斗，为着争取最广大的千百万的劳苦青年群众在党的口号的周围进行革命的进攻而争斗。中央责成各级党部给团以正确的政治领导及实际工作上的一切具体的、经常的、有力的帮助。

党中央着重地指出以下的团的最主要的急须完成的任务：

1. 团必须百倍的加强争取青工群众的工作，这是团的工作的最弱的一环，然而这是最主要的一环。团直到如今还没有真正的开始组织准备领导青年工人的经济争斗，极大多数的罢工中没有显明提出青工的要求，没有在罢工委员会内组织青工委员会，没有一个失业青工委员会，没有一个黄色工会中的赤色青工反对派。在职工会的工作上，四中全会的决议动员二三百团员到工会中去工作，是完全没有实现，青工代表会议、青年女工代表会议还在开始的状况之中，工厂青工的具体的部分要求纲领到如今还没有一个。许多青年工人单独斗争及参加一般争斗的丰富经验，没有加以任何研究和总结。这种机会主义的消极与动摇，应该立时的消灭。必须十倍百倍努力为保护青工日常利益的争斗，在“不准减少工资一文”、“反对开除”、“增加工资”、“反对取消月赏”、“失业津贴”、“同工同酬”等等口号之下，来组织青年的斗争。应立刻：

(a) 立刻在各级团部内——从中央到区委——建立有力的经斗部，以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来充实经斗部的工作，他对经斗工作应完全负责。动员最好的团员到赤色职工会与赤色反对派去担任负责的工作，同样在失业工人中工作。为着下面口号而争斗：“每个青年团员应该是赤色工会青年部的会员或赤色反对派的会员”。

(b) 在最短时期内，订立青工群众的部分的要求纲领，不仅要有全国的某一城市某一产业的而且要有某一具体的工厂的要求纲领。这要求纲领无条件的要在青工群众的会议讨论，要成为真正青工群众的要求纲领，而且必须建立为这纲领而争斗的一切青工下层统一战线，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选举青年斗争委员会与各车间的青年代表，要吸收非党的青年及黄色工会中的战斗的分子参加。

(c) 青工代表会议与青年女工代表会议的运动必须广大地在各工业中心进行，要将这些代表会变成青工群众的战斗的组织，应从一厂或几厂的代表会做起而到召集某一城市的代表会。

(d) 在中央经斗部及江苏省委经斗部的领导之下，召集罢工的参加者来开罢工经验研究的会议，总结青工罢工争斗的经验及准备新的罢工。在某一个罢工之后，应该经常的召集这类会议。

(e) 团必须克服在失业青工中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选举失业工人青年委员会与青年代表，领导要求工作与食粮，反对开除，争取国家及雇主出资的失业津贴的争斗，规定具体的要求纲领，将他们在群众会议上讨论并争取其实现。必须要建立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战斗的联合（在罢工委员会中应有失业工人的代表，失业青工委员会应有在业工人的代表，为失业青工的要求而争斗，吸收失业青工参加纠察队、示威与会议），应即选派一部分同志来专门进行失业工人中的工作。

(f) 开始真正的争取黄色工会会员群众的工作，开始在黄色工会中建立赤色小组。赤色小组应该在青工要求纲领的基础上，团结黄色工会中的青工，为着这个纲领而争斗。每一步以具体的事实来揭破黄色工会领袖的反革命面目，而同时以同志

的阶级的态度来说服其会员群众，经过赤色小组建立赤色青年反对派。

(g) 团必须克服附属组织发展的薄弱、基础的狭隘、工作上的关门主义（在上海有四百多团员而附属组织中仅二百多人!!）要广大的发展附属组织（读书班、俱乐部、足球队等等），要使附属组织有他自己的生生活。

(h) 儿童运动应该立即恢复起来，提拔团员与女团员来组织儿童局，进行这项工作。在一切党团领导的群众组织之中，组织儿童小组（工厂儿童组、报贩组，在俱乐部体育等组织之中的儿童小组）参加全世界反对剥削童工的争斗，组织儿童工人及劳动者为着儿童的经济的生活的文化的状况之改善而斗争。

(i) 在反动区域的农民与灾民中，应该派得力的团员进去工作，为反抗捐税为分粮而争斗，发动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

2. 组织青年群众反对进攻红军与苏区，拥护苏维埃和红军，加强对于苏区的团的领导，考查苏区团的组织，巩固青年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清洗阶级异己的分子，使团在苏区中变为党和苏维埃红军第一个可靠的助手，依然是团的主要任务。在这方面必须具体地实行：

(a) 对于苏区中团的任务，中央认为团中央去年的关于“团在苏区中的任务”的决议必须迅速完成。应特别的注意到肃清隐藏在团内及群众组织之中的反革命派及青工群众的工作。首先是巩固工会青年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

(b) 立即依据少共国际最近关于少先队的指示来总结少先队的丰富的经验，并保证这指示的实现。

(c) 应该继续动员青工到红军去，动员团员及革命的青年

学生到苏区中去进行文化教育的工作，中央应该准备文化与教育的课本和材料来帮助苏区。

(d) 为加紧团在白军士兵中的工作，应再派选一百人到白军中去，在出发前应给以短期的训练。在兵工厂及运输事业中的工作应该特别加紧，应编印一本给兵士阅读的关于红军的小册子。

(e) 在一切反动的武装与半武装的军国主义的组织中，团必须派人进去工作。

(f) 为着使青年工人群众更清楚的了解苏区与苏区青年工农的英勇争斗，编印许多关于苏区及苏区青年争斗的小册子，将劳动法及土地法普遍到青年群众中去。组织某一工厂与一定的苏区的团部与少年先锋队间的经常的通信交换意见，募捐款项购买赠品送给少年先锋队，组织青工苏区参观团与苏维埃运动研究组。

(g) 派选中央代表到鄂豫皖、赣东北、湘鄂赣等区去领导各当地团部的工作，派选得力的巡视员去巡视各地工作，考查和改造各地团部。

3. 领导广大的青工及青年劳苦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出卖中国的国民党，号召与组织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统一，这是团在反帝国主义运动方面的任务。团必须坚决的打击自己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目前的主要危险）的表现，不了解独立领导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以“拥护十九路军”的口号来代替发展独立的群众争斗及号召兵士与民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不服从反革命长官的命令，“不要保护革命组织以免扰乱十九路军后方”的口号，资

产阶级反革命的和平主义的口号“反对战争”，及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孙科派、改组派、国家主义派及取消派之不足等等），不了解在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忽视在青工群众间的反帝工作，害怕提出党的彻底的口号，企图迎合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不敢勇敢地利用公开的可能，害怕将经济战斗政治化。团同样要打击盲动主义的倾向与“左”倾的空话：如过早的分裂政策，空喊暴动等等。在这方面团应该：

(a) 团必须与党的组织一致地努力准备在我们有军事力量的区域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

(b) 广大的组织青年工人及劳苦群众的公开的反帝组织，在每一工厂中、街道上、学校中、兵营中去组织民众反日会一类的支部，组织在这一类组织中的青年部——特别是工人反日救国会的青工部。

(c) 广大组织少年先锋队，可以在各色各种的公开名义之下来组织，积极地开展组织义勇军的工作，在各地各处工厂中街道上建立公开的义勇军招募处。给这些义勇军与少先队以政治的军事的训练，组织他们去进行革命的反日的游击战争，保证每一队青年义勇军中无产阶级的骨干与团的领导。

(d) 在兵士群众中——特别是在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之中的士兵中进行广大的宣传煽动的工作，争取士兵群众，争取士兵与民众的联合，为着士兵群众的日常的部分要求而争斗。在军队中进行士兵委员会的组织，来保护士兵的经济的需要（饷银、衣服、伙食）及政治的权利。

(e) 积极地参加和领导学生的反帝运动，团集学生群众的贫苦的阶层在团的周围，利用学生去煽起反动区域的农民群众，使学生运动与工人的争斗更密切的联系起来。

(f) 开展独立抵货运动，组织纠察队、检查队没收日货，

将没收来的日货分配给罢工工人、失业工人与难民。

(四) 在团的组织问题方面：

1. 在四中全会以后，团的发展是特别不能满意的。团在非苏区中几乎没有发展，甚至还减少了团的数量。在团的干部与工作人员中，很利害的宗派的关门主义的倾向还依然存在。各级团部对于团的发展问题的注意力是十分不够的，特别在大工厂之中青年女工及农民之中，必须即刻在“每一个团员介绍一个新团员”、“在数量上赶上和超过党”、“凡是有党的支部的地方必须有团的支部”的口号下进行经常的争取团的布尔什维克的发展的争斗。在紧张的争斗（罢工、反帝、反国民党争斗）的时候，特别的征收团员运动，尤应注意到在主要工厂与产业中建筑革命的堡垒。

2. 干部的成分的恶劣状况是绝不能忍耐的（在上海，在区委中工人干部的成分不到五分之一）。应该立即采取具体的方法使干部工人化。应该进行新同志的支部书记的短期训练，并开办高级团校来训练与重新训练干部。应该从发展自我批评之中，来进行各级的改造与充实新的工人干部。

3. 为建立活的与具体的领导，必须建立经常的巡视制度。不仅中央省委要有巡视员，而且每一区委之下，应有几个不领生活费的巡视员经常去巡视与帮助工厂支部的工作。

4. 中央应该以更大的注意力去帮助和建立外省的工作，要立即恢复××、××、××、××、××、××、××、××等地的组织。

5. 加紧工作的执行的程度的检查，是执行一切正确的决议的先决前提。应该进行区委每星期的报告省委每月报告的制度。提高个人负责制度，反对一切不负责任分子机会主义的消极。

6. 为着真正的建立大产业支部，团中央局应经常的讨论每个重要的工厂的工作，与给他们以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7. 团中央的机关报《列宁青年》应立即恢复出版，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对于目前团的任务动员和组织的作用，同时应注意到刊载国际青年运动的经验的论文，保证其广大的发行路线。

8. 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团的同志，广大的在这个决议案精神之下来开展对各级团部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露团的工作中一切错误、缺点与弱点，依据团员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上来改正他。发展自我批评与为实现这个决议而奋斗，不能与加深彻底的两条战线上的争斗分开来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于目前时机估计的不足、机会主义的消极，与反对“左”的盲动主义、先锋主义倾向，反对两面派与实际工作之中的机会主义，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两条战线的争斗，是团的工作展开与这个决议案的实现的前提。

中央坚信：中国共产青年团——国际青年运动的最光荣的队伍之一，能够完全的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动员千百万的劳苦青年群众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

四川省委：

听了小元同志关于四川工作报告以后，中央认为四川党自去年八月起虽然开始了接受国际和中央正确路线的企图，提出了转变的口号，个别的工作部分的表现了一些进步，但是中央必须严格的指责四川党的整个政治路线与全部实际工作并没有真正的彻底转变。从满洲事变以来，党表现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的不足，反帝运动陷于“左”右机会主义泥坑中而不能自拔，忽视职工运动在四川工作中的重要，忽视反黄色工会的问题，农村中富农路线，阻碍着梁山虎南区游击战争的爆发，没有提出加紧兵士工作，组织革命兵变到农村中去，创造新的游击队的任务等等，表示不能正确懂得国际路线的真实内容，活泼的运用每个具体问题到实际策略中去。因此使党在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的前面不能去领导和推进革命的高涨，却是相反的，加重了党的尾巴主义的现象。中央对于四川工作，除给你们各种一般的指示外（职运、农运、兵运），在这封信中，扼要的是说到反帝运动、少数民族工作、党三个问题。

一、反帝运动

根据现有材料（小元同志报告和援马三日刊）看来，我们

要首先指出四川党在反帝运动中始终是没有过正确的阶级路线，党在前一时期中是十足的“左”倾关门主义，“转变”以后又表现出充分的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右摇摆的实质则同是机会主义的右倾消极。

(1) 对于满洲事变的估计，省委虽然正确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的主要作用是进攻苏联与进攻中国革命，是瓜分中国的开始，但另一方面，你们认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其接近美国资本威胁了日本在满洲的独占，日本为要打击美国的发展，所以发生占领满洲的行动，这也是满洲事变的原因之一”，这种分析是不正确的。中央认为，“由于空前世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着日本帝国主义，使日本经济危机猛烈发展，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国内群众斗争的紧张与革命化，促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采用更急进的帝国主义政策，加紧殖民地剥削，加紧战争的准备，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大战之中，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详见中央对满变决议）我们并不否认日美在太平洋的对立形势，美国资本是企图而且已侵入到满洲去加深了日美的矛盾，可是照你们这样分析，把日美冲突看为满洲事变中超出一切的原因，这当然是错误的，这客观上是忽视了主要的原则上的矛盾。至于认满洲事变是由于东北民族资本的兴起，这当然是托陈的意见，与我党的主张一点相同的地方也没有。事实上美国最初对于满变是采取等待观望态度，实际同样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民众，造成反苏联的阵地。目前形势，则更明显的是：在反苏联的战争准备上，在进攻中国革命掠夺中国民众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但在瓜分中国问题的四周，发展着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冲突，首先是日美法英的斗争。对于满洲事变，这一个不正确的分析，主要的危险在于掩盖和削弱了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的主要意义。

(2) 满洲事变中，你们还缺乏对于国民党罪恶的认识，因此不能把反帝与反国民党运动联络起来。国民党各派的统治都是一致出卖民族利益，投降帝国主义（济案、汉案、宁案……），而对于民众的反帝运动则实施残酷的压迫。这种反革命统治，是替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做了开路先锋。国民党整个投在帝国主义怀里，帮助了日本武装占领与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动（提议锦州中立区、天津共管等等），同时国民党在满洲事变后，宣布进攻苏联与红军仍是第一等任务，这更是他协同帝国主义共同进攻中国革命的战线，企图维持垂死的统治之表现。

(3) 满洲事变对于中国政局的影响，省委的估量是：“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援助国民党军阀来直接进攻苏区红军，从阶级对比的观点出发，阶级敌人是增加了更强的援队，这对于中国革命不能不是最主要的危险”，这里省委只看到一方面。在革命方面，国民经济的浩劫达到总崩溃的地步，满洲事变像迅雷一般惊醒激发成千百万群众反帝潮流，工农红军冲破三次“围剿”获得一次胜过一次的伟大胜利，工人斗争日益发展，士兵的哗变与动摇，这些条件造成了全国革命危机更进的成熟，使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动，使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更成为吾党现实的迫切任务。这是省委没有估量到的。这里的错误，一方面是省委没有把握着正确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法则，另一方面是表现省委对目前形势估计之不足，这样，尽管省委说对于帝国主义进攻不用害怕悲观，但决不能走上积极的结论。

(4) 日本出兵的刺激，省委认为必然要掀起全国的反帝潮流，这是正确的。但是省委还没有了解这一反帝潮流的真实内容，即是没有估计到满洲事变，首先激动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民

族觉醒。这种民族的觉醒，党不应丝毫害怕，相反的却要大胆去加紧促醒之，以正确的策略引导因反帝斗争更加发展。省委对于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表示着恐惧，和唯恐一提到民族的口号就失去国际主义者的本色，不了解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统一是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号召推翻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国民党统治的民众革命，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民族战争，正是领导群众的民族觉醒走向更高阶段的坚决主张，这并没有将我们变成民族主义者，相反的，却是无产阶级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尤其是错误的，省委把群众的民族觉醒的表示一概武断地指为群众落后意识，把广大群众所要求所参加的反日运动简单指为国民党利用，迎合群众的落后意识而发动的欺骗行动，这样种种将反日运动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

（5）根据这些错误的分析，在反帝运动前一时期中，四川党最中心的错误是：第一，将反日运动和反帝运动机械的割裂对立起来，把党的反帝策略重心借口放在反一切帝国主义上面，没有针对满洲事变，适应民众的民族觉醒，把抓住民众的反日斗争以扩大反帝运动。第二，因此党的口号仅仅提出了反帝国主义一般的基本口号，而不能针对反日运动中每个具体的事变，发出我们的口号与主张，依着形势的变化，而转变我们的口号，来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党不能将群众对日宣战的要求，集合在“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下，来坚决打击揭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要求国民政府宣战的反动派别的欺骗。党不能把群众的经济绝交的要求激发提高起来，发出组织工人学生检查队彻底检查日货的口号，把检查日货运动拿在党的手里，来打击商人自动绝交和国民党经济绝交的欺骗。第三，所以在行动上你们充分执行了群众的反日运

动，分道扬镳的办法。不去利用公开活动的极大可能，组织一切的反日群众组织，不去打入已有的反日组织，夺取他们的领导，转变他们的性质，认为参加反日会、义勇军，就是把群众送给国民党。你们惧怕公开，惧怕群众取消了公开活动的路线，完全只以广大群众还不很了解的基本口号，在狭隘的秘密范围内进行所谓独立号召的反帝运动。这是在“左”倾词句之下，隐藏着不与一切反动派别争取反日运动的领导权，放弃广大群众的机会主义的消极。

(6) 在你们策略上“转变”以后，党所领导下的援马反日运动，它的纲领、宣言、宣传大纲、大会口号都表现取消了党的政治面目，曲解下层统一战线，同样放弃了党在反日运动中的独立领导。你们宣布“真正能与日本作战的，除马占山而外，当无第二人”，所以你们号召援马，“援马是自救的唯一办法”在广大群众中造成马占山是民族战争英雄的幻想，使民众去热望国民党军阀中第二马占山之出现，还不致对国民党完全绝望，这样来代替了党号召只有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动武装起来才能驱逐日帝国主义，要打倒日帝国主义，必须首先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口号。你们号召群众，“请求国府克日出兵，电促中央实行对日宣战，要求惩办放弃东三省的张学良（做了邹鲁的应声虫），并请三军长限期出兵”……所有这些只是表示出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维持在广大群众目前日益破产的国民党统治！党并不使群众认识国民党整个的罪恶，使群众斗争从反帝到反国民党，使群众在切身经验中了解只有民众自己的武装、民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你们集合了一切在野的妥协的反动派别的口号来代替了党在反日运动中的口号与主张，完全取消了党的政治面目，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你们或许以为降低了政治口号，才能求得公开存在和活

动，所以你们给城防部上呈文要求承认为合法团体，而极力维护。不了解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不是依靠合法的保护与国民党的准许，而是要依靠于群众力量的拥护。党绝对不能作合法的幻想，希望不遭受统治者的摧残，而应当坚决号召群众以正确的口号与主张，争取群众在力争反帝运动绝对自由的口号之下，反抗国民党的压迫，这是我们争取公开活动的路线。绝对不能因为要获得公开而与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派妥协，相反的，在一切公开的革命团体中要特别加紧反对这些派别，要把主要的火力集中在他们身上。为着求得合法的存在而降低甚至取消党的政治口号的企图，这决不能形成党对于反日运动的领导权，相反的，是使党堕落到反动区别的队伍中，根本丧失领导。由于党取消独立的政治面目，不了解正确的公开路线，党在反帝运动中的策略与口号很明显的从“左”倾关门主义走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

(7) 中央认为必须彻底揭发这一左右摇摆的根源，才能保证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四川全党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成分可怕的薄弱，小资产阶级占最大多数，这是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内特别是省委没有工人同志参加，使无产阶级的领导在组织上的保证成为不可能。这是：中央认为这是立三路线为什么能在四川扩大推行，而国际路线一再遇到抵抗（虽然不是公开的），党的政治路线发生左右摇摆的最基本的社会根源。其次，不了解列宁主义领导群众的艺术，这是你们的策略上错误的来源。领导群众，必须在群众中随时随地正确的估计到群众心坎中的要求，联结到党的基本任务，而提出口号与主张。四川党直到现在还不了解党怎样在群众中提出适当的口号，不是一些广大群众还不很了解的基本口号，便是采纳了一切反动派别的妥协口号，这都是不能领导群众前进的。前一种，只有使党站在群

众外面，后一种，更使党做了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

(8) 根据上述教训，省委应号召全党，实行策略上的彻底转变循着下列主要的路线去进行反帝运动。

1. 以正确的口号去组织与领导反日运动。在目前形势下，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住满蒙，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没收日本在华一切银行与企业，推翻日本在华一切特权，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反对国民党压迫屠杀逮捕反日民众，力争反日运动的绝对自由，打倒帝国主义必须首先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等等，应当是党在反日运动里的中心口号。党要大胆去促醒群众的民族热忱，细心的估计群众觉悟程度，更加具体化的提出，同时联系到党的基本口号的宣传（拥红、拥苏等）。

2. 党要抓住英国唆使藏军占领西康、法国出兵进占龙州、国联的真相、美国的假面具，以苏联的和平政策与对于中国民众真正的同情、友爱，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英藏军占领西康，反对瓜分中国的机关——国联，联合苏联，拥护苏联等扩大反一切帝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加紧反帝同盟的发展。必须坚决反对把反日与反帝对立割裂的错误，在反日运动中密切联系起反一切帝国主义的任务。

3. 党要坚决执行引导群众从反帝到反国民党的斗争，具体把握着四川军阀对于民众屠杀、压迫、逮捕、剥削等事件，刘文辉对英藏军的无抵抗、出卖西康断送民族利益，刘湘勾结日本保管王家沱的租界等无耻行动，扩大反国民党的斗争。目前时期中，党要针对着日本与国民党一致对反日运动的进攻

（上海、汉口、青岛日领公开要求取缔反日运动，国民党的镇压一切民众的反日运动与解散抗日组织等等），加紧组织检查日货、没收日货的运动，党要组织起工人学生的检查队自动上街检查，冲破商人自动绝交的黑幕。党要加紧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运动，普遍建立工人义勇军和打日义勇军，发动义勇军领取武装夺取武装的行动和义勇军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这些运动是引导群众走上反国民党斗争的实际的道路。

4. 正确的不懈的为争取公开而斗争。要动员支部每个同志去组织公开的群众团体，打入已有的群众的反帝团体，这是党接近广大群众的枢纽。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广大群众，争取群众到党的口号之下，并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另一方面党要成都、重庆、自流井等处建立公开出版的反帝报纸，加紧争取党报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发行，同时要利用一切反动报纸的篇幅，完成这战斗的任务。需要坚决反对秘密范围的关门主义的活动和企图合法公开的幻想，在争取公开斗争中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

5. 加强与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实行正确的下层群众统一战线。党绝对不能丝毫降低政治口号，丧失独立的政治面目，相反的，必须以党的口号与一切妥协口号对抗起来，揭破反动派别的欺骗。在一切宣传鼓动中，在一切群众活动中，毫不放松反对这些在野派别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内容，不仅是简单提出打倒改组派、打倒国家主义派的口号，而是要对反动派别的政治主张作有系统的批评和打击。另一方面党要尽量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反动派别所影响的下层群众。开始实行这种策略，必须注意下层群众共同的要求，择其合于我们或接近我们的主张，与之联络，逐渐引导他们走上我们的立场。不要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某一问题的不同意见，便与之决

裂，同时决不能为着联合而降低，甚至放弃我们的政治主张。

6. 到群众中去学习领导的艺术，这是革命对于四川全体同志的迫切要求！省委要唤起全党来注意研究实习领导群众的艺术，在广大的群众运动中，经常表现出群众各种之一致的步骤。党的任务就是要估计清楚基本群众的共同要求，从群众要求到党的中心口号，这中间需要用领导的艺术去构成各种的桥梁，引导群众过渡到更高的阶段。空喊一些群众还不很了解的基本口号，去取消先锋队的面目，这都是消灭党的领导！应当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的口号之下，给以无情的打击。

二、少数民族运动的工作

少数民族的工作对于四川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无论从川边的康藏问题看来，和四川境内西藏民族的分支——伟大的夷民暴动看来，这一任务都已经日益严重起来。中央认为四川省委虽然在党报上提出了拥护西藏民族自决权的口号，然而整个的提出少数民族的工作，在全川党员面前，这还没有开始。尤其严重的，党内对于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认识，还包含着大汉族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如小元同志对中央的全部提议）。因此给少数民族工作一个原则上的基础是非常需要的工作。

小元同志对于夷民问题的提议是：1. 承认夷民在杨理茂一带的土地权。2. 取消对土司及汉族军队的供养。3. 夷民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打倒土司制度，代以夷民选举的领袖。4. 夷民可以设置自己的民族军队。5. 取消或最大限度减低税捐。6. 在经济上文化上帮助落后民族的发展。随着这一纲领的观点，提出联合土司的策略。这个全部纲领的特点，就是对于已

经暴动起来的夷民群众，不是一部战斗的纲领，恰恰相反，完全是民族改良的政纲。他并不是号召夷民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土司制度的统治，指出夷民群众必须和汉族工农一致联合，打倒共同的敌人——国民党政权，宣布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反对一切对于少数民族的压迫，而主张我们的彻底解放，无条件承认夷民的自决权，一直到与中国的分离自决权；号召夷民群众推翻自己民族中的压迫者土司，为建立自己的人民共和国而斗争，坚决拥护夷民群众对国民党军阀进攻的民族战争，号召全川工农兵士援助夷民的解放斗争，号召进攻夷民的军阀军队，实行革命的兵变与武装夷民共同斗争。小元同志的提议，完全没有这一精神，他只是站在大汉族主义的观点，以允许的口吻（夷民可以什么可以什么）提出一些安慰夷民的口号，这些口号对于暴动的夷民民族，是一部十足的改良主义政纲。中央认为小元同志的意见不是偶然的，唤醒省委必须在少数民族工作的任务上，首先检阅党员群众对于少数民族问题的了解，解释党的政纲和原则（民族问题列宁著作，苏大会关于少数民族决议是最好的标本），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目前的工作：

1. 在党报上，在一切宣传运动上，要提出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

2. 发展党对于西藏民族和夷民民族的宣言，号召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与中国工农兵士共同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军喇嘛土司以及站在达赖喇嘛背后的英帝国主义者，这种宣言要设法译成藏文散播到西藏民族中去。

3. 党要号召进攻夷民的军阀队里兵士群众，实行革命的兵变，联合夷民杀死反动官长，成立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

和建设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

4. 党要在各种报纸上揭破“民族平等”、“五族共和”等等欺骗，反对国民党军阀最残酷的屠杀政策，反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宣传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5. 党要号召全省同志注意找出少数民族的线索，进到少数民族中去。

6. 党要设法团结夷民中先进分子，提高他们阶级觉悟，给以教育与训练，培养出夷民群众的革命部，创造共产党的基础，进行夷民的解放战争。

三、党的问题

(1) 巩固党的领导，首先是省委这一个领导机关。第一，中央号召省委执行自我批评，深刻去认识这一时期中政治上的错误，最主要的是在巨大的历史的满洲事变中，省委做了分析到策略和实际工作的错误。这决不能了解成为政治上个别的动摇，而是还没有真正了解立三路线的实质，还没有懂得国际路线真实内容之结果，只有彻底去进行政治转变，才能踏上正确的道路。第二，中央认为要立刻提拔一个工人同志到省委来参加指导工作（马如龙同志是最适当的对象，你们要设法解决重庆书记问题，把他调来）。同时在成都兵工厂支部中，省组织部要直接去加紧教育训练的工作，把工厂支部中积极的同志、新的力量培养起来，准备经过一定的组织路线和工作学习引进到指导机关来，这是在组织上保证党的路线坚定执行之正确办法。第三，中央同意你们更换干部的提议，最近可以抽调一个常委同志出川来沟通执行国际路线的全国经验。同时中央唤起省委及全省同志注意深刻去研究一切斗争的教训，成功的和失

败的教训，特别是这次又新丝厂罢工的教训，从这些实际斗争中去发现新的工作方法。

(2) 提拔与团结干部。根据巡视员报告，你们对于干部问题还陷于恐慌的情形里面。中央认为四川党还没有了解党内干部的正确来源。党的干部是要从最近的革命斗争中（罢工、罢课、罢操、示威、游战等）涌现出来的新力量去找得，在支部中、在下层工作中找出工人雇农贫农兵士，加以教育锻炼，使之成为思想上组织上坚定的积极干部。因此每个地方党部，每个指导者，每个巡视员，都要经常注意去发现干部，这才能使干部有广大的来源，而改正目前倒源为流的现象。在提拔干部中，一定要把干部的基础建筑在先进的无产阶级身上，艰苦努力去培养工人干部，而随时指导与帮助他解决工作，最大限度发动他学习的兴趣，这才能实际的使指导机关走上工人化的道路，才更能巩固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对于旧干部必须在政治上考查，决不应当有丝毫留恋老干部的心理。要真正用布尔塞维克路线去团结干部，对于犯倾向的阳奉阴违的消极不好的分子，要与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团结起积极干部在党的路线周围，才能保证工作的彻底转变。

(3) 发展党员和改造质量的问题，四川党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不仅是组织数量上减少，特别是党内工人成分产业工人成分可怕的稀少。关于组织上缩小的问题，我们要反对有些同志的观点，他们常常说立三路线时代党员有几千人，现在缩小到一千人了！这种简单的数量对比，曾经做了右倾机会主义估计四川革命低落的论证，这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线时期一切工作不实际、浮夸虚报、党员挂名、不做工作等等严重万分的组织弱点，使这一数目成为极不可靠的统计。我们只能从某些区域某些部队党的组织整个坍台的现象中，来断定党在组织上的削

弱。目前党的组织上形势，因执行立三路线而削弱的情形，已经大部分中而且在成都、自流井、重庆等大城市中有了微弱的新发展。因此党在组织上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在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前面去猛烈的发展党员。要在工农兵士斗争浪潮和反帝运动中，吸收工人、贫农、士兵、小资产阶级贫苦成分入党来，特别要注意在这种发展中造成质量上的转变，努力执行向工人、雇农、贫农尤其是产业工人开门的口号。另一方面省委要号召各地党部和支部，坚决洗刷阶级异己分子（工头、地主、富农的成分）出党，这是加强党的战斗力之两方面的任务。中央认为从现在到五一节，全省党员要有五百人的增加，工人成分要发展到二百人（过去九十人），内产业工人要从二十人增加到五十人。

（4）加强支部生活与改造支部领导。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千党员，个个都是自觉的在支部中为党工作，那么党落在革命运动后面的尾巴现象，一定要大大地改善或消灭了。根据巡视员报告，四川城市支部一般还能开会做工作，但还不是自动开会进行工作。而乡村支部呢？最普遍的现象是支部自己不能集会，只有在上级党部的同志去巡视时才能开会。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全省有半数以上的党员陷于被动的不能工作的甚至挂名的状态。因此，加强支部生活，加强支部工作自动性，完成每个支部都是战斗单位的创造，这是万分迫切的急务。必须注意支部会议与日常工作是支部生活的中心内容，要努力去养成支部自动集会、讨论、检查决定工作。在这里改造支部领导是不可分离的斗争，农村支部中很多农民和知识分子合组的支部，而支部的领导都是落在知识分子小学教员手里，他们不仅无法领导，而且实际上阻碍农民同志可能进行的工作。此外在城市支部中，也有领导上障碍的现象（如重庆又新支部）。因此必

须坚决去改造支部领导，在同志中找出积极的分子（要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来担任。

（5）地方党部的巩固与群众化，这是实际工作转变的关键。自流井县委扩大会的组织决定是一种十足的机关主义与官僚主义，省委必须引起全体同志与这种倾向斗争。地方党部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与领导支部工作，所以他的组织形式一定要适合活的领导及群众化的原则，即是说要把最负责的几个干部分配到中心工作上去，和支部同志生活打成一片，坚决执行新的作风，把最大精力和最多时间放到支部工作和协助支部做群众工作上，肃清那种只做指导工作、不做群众工作的机关活动。要有一定时期切实的工作计划，要建立起直到支部的工作检查制度。最后中央认为，在各地党部中要立刻引进在业工人同志参加常委工作，这是地方党部工人化的道路上前进的步骤之一，不容丝毫的忽视。

（6）全省巡视制度必须确立起来。省委必须实行中央上次的指示，能有经常的巡视员到外县去。同时要立刻督促县委，至少要有一个巡视员或指导员，对于农村支部和外县特区特支等给以活动的领导。

（7）为要加快转变的速度，启发下层党员群众创造性与积极性，你们必须立刻发动工作竞赛冲锋队等方式，你们过去对这些方式犹疑这是不对的。

关于又新罢工中，改造又新丝厂日本资本这一口号是不正确的。在没有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候，党不能提出没收某个产业的口号，党只能宣传没收帝国主义企业与银行这一个整个的政纲。

关于小元同志在四川的巡视，中央认为他不仅没有帮助四川党政治的转变，而且四川党最近所犯的错误的，他要负很大的

责任。

你们的津贴，中央只能每月发给六百五十元。从二月份开始，以前的欠款与特费根本谈不到。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请看!!!

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得到胜利？

——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这次反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不是蒋光鼐、蔡廷锴等一些国民党军阀的领导，而是革命士兵的英勇斗争与革命民众的热烈拥护。国民党军阀们的领导作战，不是为了要使这一战争得到彻底的胜利，而是为了要在“抗日”的招牌之下，利用兵士与民众的反日斗争，欺骗革命的士兵与革命的民众，造成马占山那样“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使革命战争失去领导而失败。这也就是目前反日战争中最大的危险！

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敢侵犯帝国主义的任何特权，而且十二万分的尊重这些特权。他们丝毫不想把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至少是日本的海陆空军驱逐出境。他们丝毫不想乘胜追击日本的军队到租界上，根本消灭日军在陆地上的根据地。他们等待日本军队一师团一师团的送来，枪炮飞机一船一船的装来，让败阵的日本军队整理补充，安排阵线，再向我们进攻。这不但不是要使战争胜利，而是在牺牲十九路军士兵，使战争遭到失败！

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不但不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大规模的武装工人与劳苦民众，把兵士与民众打成一片，而且处处压迫民众运动，封闭民众的反日团体，解散工人与学生的义勇军，禁止士兵与民众发生任何密切的关系。他们惧怕民众，仇视民众，反对民众参加民族的革命战争。然而没有千百万民众的参加，这一战争是必然要失败的！

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不但不设法改良作战士兵的生活与待遇，把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分散给作战士兵与后方的伤兵，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而且直到现在还是克饷不发，侵吞人民的捐款与慰劳品，限制他们言论行动的自由，而使他们觉得他们拼着性命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肉搏，只是为了他们长官们的利益，只是为了维持他们往日牛马般的生活，与长官们套在他们身上的旧的锁链。不彻底了解为了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战争的士兵，决不能使他们的英勇长久地继续下去，使战争得到新的胜利！

最后，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现在正在血战着的革命士兵与革命民众背后，同各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进行着投机的买卖。他们在帝国主义指示之下，早已准备退却，早已答应出卖上海，把上海成为中立区由列强共管。只是因为惧怕士兵与民众的反对，所以他们还勉强支持着。但是，为得要保存他们自己的实力，去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他们现在是准备着失败。他们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给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让士兵失败之后自动退却。在这些帝国主义便衣队的国民党军阀之下，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完全是幻想。

因此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的手里。

因此，我们主张：

（一）十九路军士兵立刻不顾一切长官的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坚决反对“退却”、“停战”，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

（二）民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压迫，自动启封一切革命团体，大批的武装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组织民众的义勇军与游击队，保护自己的革命组织，并参加前线作战；

（三）革命的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直接接收与分配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监视与逮捕一切不抵抗的长官，并且加入民众的革命组织；

（四）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的革命战争；

（五）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商店与交通工具，拿来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用途。并且以同样的办法对付帮助日帝国主义的其他帝国主义！

（六）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腾出一切公共房屋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居住；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筑交给工人与灾民的组织；它从大资本家大商人大批的征发粮食与衣被，分配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它更没收一切帝国主义走狗与投机资本家的财产；它立刻宣布八小时工作制与社会保险，改良失业工人的生活；它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七）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它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

我们以为只有这些具体办法的实现，我们才能把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拿在我们的手里，而不为国民党的军阀所出卖。

也只有这样，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红军抚恤条例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

红军是土地革命斗争中最勇敢最积极的战士，他们不断地同阶级敌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军阀及帝国主义肉搏冲锋，击破了国民党的围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锻炼了铁一般的红军。这种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精神与伟大的胜利，是值得钦佩与赞扬的。尤其这在残酷斗争当中，因伤病而残废和死亡的红军战士，更应为每个战斗员的模范，而必须给以优恤的。本会根据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案，对于疾病、残废、死亡的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特颁布抚恤条例如左：

第一条 为执行红军抚恤条例所规定各项，应组织各级抚恤委员会，其组织与职权如左：

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为决定与执行抚恤条例之最高机关，委员五人，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及参谋、经理、军医各部遴选五人任命之，指定其中一人主任，召集会议并处理日常事宜。主任之下设秘书一人，处理一切文件档案，设干事二人，帮助主任处理一切日常事宜。

二、以军区或军为单位组织一抚恤委员会，定名为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军区或第×军分会。由军区或军的负责人，在军区或军的政治部及参谋、经理、军医各处中，遴选五人为委员任命之，受军区或军的负责人之监督，接受上级委员会之指导与抚恤条例所规定各项执行各该军区或军之抚恤事宜。设主任一人，召集会议并处理日常事宜。设秘书一人，办理各项文件档案。干事一人，帮助主任处理日常事宜。

第二条 凡红军优待条例所规定优待红军办法，皆适用于伤病、残废和死亡战士及其家属。

第三条 在红军服务五年以上，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自愿退职休养者，国家应补助其终身生活，其数目应按照当时当地生活情形而定，但每年不得少至三十元。又本人不愿退伍，愿继续服务者，除给以红军应有生活费外，应另给优待费每年至少二十四元。

第四条 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因伤病必须休养时，则送到红军医院医治或红军休养所休养，其一切用费由国家供给，其生活费应较红军生活费增多二分之一。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受伤罹病，又因工作关系不能到医院医治或休养所休养者，除由医生诊治外，仍须给以医药补助费，一般的每月不能超过十元，以恢复其健康为度。此种补助费之发给与多少，由抚恤委员会决定。

第五条 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因劳成疾不能担任任何工作时，经医生证明，须给以终身抚恤金，以当时当地之生活程度而定，但每年不能少至四十元。如因病而减少其工作能力，只能担任一部分工作时，经医生之证明则给抚恤金，每年不得少至二十四元，以恢复其健康或至死亡为止。

第六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因伤残废不能服务者，则送到红军残废院休养，其生活费应较红军生活费增多二分之一。其

愿回家者，则给予终身抚恤金，其数目以当时当地之生活程度而定。但全残废每年不得少至五十元以下，半残废不得少至三十元以下。

第七条 有左列情形之一，经医生之检查认可者，为全残废。

- 一、两目失明者；
- 二、神经的主要部分失调不能任事者；
- 三、一腿残废者；
- 四、两手残废者；
- 五、内脏损坏一部甚剧而他部不能代偿者；
- 六、口腔、牙床、舌、食道损坏难于饮食者。

第八条 有左列情形之一，经医生认可者，为半残废。

- 一、一目失明者；
- 二、两耳失聪者；
- 三、声带坏不能言语者；
- 四、神经之一部分损坏致感觉行动不敏者；
- 五、下腿因伤而行动不便者；
- 六、一手残废者；
- 七、内脏损坏一部甚轻，而他部尚能代偿者；
- 八、口腔、牙床、舌、食道损坏，尚能勉强维持其作用者；
- 九、生殖器损坏，减退生殖器机能者。

第九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因伤病死亡者，对本人应有左列之抚恤：

- 一、死亡烈士的遗金，除在遗嘱中有特别支付外，应付与其家属；
- 二、死亡烈士的遗物，应保存陈列于革命历史博物馆；
- 三、死亡烈士的功绩，应刊登各报表扬；

四、死亡烈士应择最优美、最巩固之地区举行公葬，并勒碑以资纪念。

第十条 对因劳致病，致损失其一部分工作能力者、残废者、死亡者之家属，须有左列之抚恤：

一、家属无生活能力者，则给予实际上的帮助，如优恤金，帮助耕田耕种、迁移等，以能维持其生活为度。

二、优恤金之多寡，根据地方政府拥护红军委员会之报告、抚恤委员会之调查而决定，耕种、迁移，则由当地政府办理。

三、子女、弟妹之幼小者，送入革命纪念学校，由国家供给其一切费用，以满十八岁，由国家介绍其职业为止。如本人愿意深造，经甄别考试的认为合格时，仍由国家供给其学习之费用。

四、一切职业介绍皆有优先权。

第十一条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应制定左列之证书：

一、患病休养证书；

二、残废证书；

三、死亡烈士证书。

第十二条 右列各种证书，除死亡烈士证书给其家属外，其余皆发给本人，且限于本人有效。

第十三条 以每年一月为发给抚恤金与发给各项证书期间，各项证书皆五年交换一次。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给江苏省委的信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

江苏省委：

虽是中央已有一封信给你们（即“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信”），然而严格检查省委在“一二八”之后所做的工作，中央认为江苏党目前是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中间，若不及早设法补救，江苏党决不能完成国际与中央所给与它的中心任务！

如若不是拿空洞的、官僚主义式的、以一些不切实的数目字自满的态度来检查江苏党的工作，而是真正的能够以深入到下层群众的严格无情的布尔塞维克的态度来检查江苏党的工作，那我们就应该直直爽爽的说，江苏党在最近时期内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完成中央给与江苏党几个中心工作上没有任何可观的成绩！

很显然的，对于中央所提出的“总同盟罢工反对日帝国主义占领上海”这一口号，江苏党是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态度。这一口号始终没有能够深入到党员与工人群众中去。省委也没有能够在这一口号之下组织一个厂以上的罢工。在“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的口号之下，江苏党没有组织起一队真正有武装的义勇军。一直到现在，所有江苏党下面的义勇军，大都是空虚不切实的、散漫的、形式上的、装面子的、登记来的，没有任何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对于失

业工人与难民的工作，没有给以严重的注意。对于士兵工作，动员工人群众到十九路军中去，是完全忽视。对于抵货运动，始终是消极怠工，没有没收任何“东洋货”，没有组织任何“工人检查日货队”。在“一二八”后一个半月中间，没有能够举行过一次比较成功的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党在组织上动员群众的力量是削弱了，党员的数量没有增加，反而缩小，党没有提拔一个新的工人干部到区委与省委中间来担任指导工作……

这表示出我们的工作是完全落在急速发展着的革命形势的后面。这种落后的基本原因，不简单是由于我们的工作犯了“一些错误与缺点”，而是由于党内对于目前的形势估计不足与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左”倾空谈的关门主义，阻止了江苏全党工作的开展。

江苏的党在“一二八”之后，对于国际、中央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口号发生了曲解与修改，而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孟塞维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投降。例如修改与曲解党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为“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民反党团），修改与曲解“兵士与革命民众联合起来”的口号为“拥护十九路军”（闸北党），把“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拿“罢工、罢市、罢课、罢岗、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来代替（民反省委），甚至纯粹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与共产主义没有丝毫相同的立即号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曾经发现在江苏省委的宣言上。纯粹是立三主义盲动主义的“举行上海第四次暴动”的口号也曾经不止一次写在沪西区委的传单上。甚至一部分同志企图在组成游击队的名义之下，偷运立三主义的私货，举行武装暴动（中央军委、省军委、法南区委），并且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曲解为立三时代的行动委员会（同上）。

同时在实际斗争中，不敢揭发改组派与取消派的欺骗，甚至把我们组织起来的群众交给他们（工联）。在十九路军士兵中的工作，变为同十九路军军官周旋的工作，并且惧怕把所有的枪械来武装工人，而交还给保卫团（闸北民反）。在罢工工人与失业工人中，表示出了狭义的经济主义的倾向，做了国民党社会局与资产阶级的尾巴（工反）。甚至整个工联的领导，一直到现在，还落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而不能自拔……

就是省委本身，在有些重要问题上也表示了犹豫动摇与消极怠工（如对于总同盟罢工，武装工人，抵制日货等），没有能够坚决地打击“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工联上反与省委各部的一些工作人员），而把两条战线的斗争限制于纸头上决议上，而没有能够扩大与深入到全党同志中去，以教育全党同志，以彻底转变党的一切工作。

所以中央认为没有最坚决无情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彻底改变江苏党的一切工作，完成国际与中央所给与江苏党的伟大任务，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中央要求省委立刻讨论史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彻底检阅江苏党内所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同这些倾向做最坚决无情的斗争。使每一同志了解，一切对于倾向的自由主义态度或调和态度只会帮助敌人，阻止国际与中央政治路线的彻底执行。

关于省委目前的几个中心工作，中央不再重复在“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信”中所说的一切。关于工·会·工·作的转变，中央有特别的指示给你们。但是中央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省委对于目前工人斗争的领导，很多地方拿“加紧”与“注意”的空谈代替了实际工作。一直到现在，江苏党还没有能够深入到企业中去。“面向企业”的口号，还不过是文章上决议上写写的词句，而不是实际行动的指示。尤其是很多企业方面，我们

还站在外面，完全不知道工人群众在那里干些什么。只有在罢工发生后，反动报纸上登出这类消息时，我们才忙着去找“线索”，然而等到你找到“线索”，罢工也已经过去了。

自从满洲事变后，中央曾经不止几十次的要江苏省委去布置几个日本企业的罢工，但是这些指示并没有得到江苏省委的充分注意。自从“九一八”一直到“一二八”四个月的中间，省委始终没有认真的具体布置与组织内外棉与日华纱厂等的罢工。“一二八”之后，党提出了总同盟罢工的口号，然而这一口号也并没有能够认真的去执行。江苏的党在工人运动的领导方面是非常一般的与马虎的。这里你们缺乏布尔塞维克的坚持性与持久性去建立我们在几个重要企业中（如像邮务、英电、法电、华电、丝厂、纱厂、铁路、兵工厂等）的工作，认真准备与布置某几个中心企业的罢工斗争。

江苏党在建立有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会的工作上是丝毫成绩也没有。一直到现在，在上海我们还没有一个稍有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会。党内同志认为赤色工会的建立是工会工作人员的事，而不是每个同志最主要工作的一部分。赤色小组会员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加，而且减少。省委只是一次两次的在旁边批评工联的工作，然而如何帮助工联、转变工联的工作却始终没有加以注意。

江苏党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是始终没有开始。好几个月以前中央向江苏省委特别提出这一问题，而且省委在每次关于工人斗争的决议中，也似乎注意到这一问题，然而这也只是口头上的与决议案上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完全不了解邮务、商务、出版、法电等几个大黄色工会干些什么？全上海工人自动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我们是置之不理。甚至在大东书局的罢工中，工联的同志在一些“左”的口号之下主张退出黄色

工会！

中央举出上面的几个问题，是要江苏党的全体同志深刻了解，我们在职工运动的领导上是如何的落后。这一落后，主要的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反帝工作始终停留在一些原有的基础上，而且处处表示出我们力量的散漫与零乱。江苏党必须彻底了解，只有把蓬勃发展着的工人斗争拿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我们才有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骨干去团结与领导更广大的千百万劳苦群众，使目前的反帝斗争走到更高的阶段。

中央认为在“江苏省三月至五月底工作计划”中，省委还没有把加紧厂内活动、准备罢工、组织罢工、领导罢工、建立中心产业支部与产业工会，以及在黄色工会中创造革命反对派的工作，当做江苏党目前的战斗任务。在这一计划上，省委以为这些工作是工反、工联与职工部的任务，而不是整个江苏党的任务。

中央认为江苏省委必须立刻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动员全党同志，反对党内忽视工人运动的严重错误。省委对于全省工人运动的领导，必须定出具体的计划。要抓住几个产业中心（如上海、无锡、南京、沪宁路、津浦路），有步骤的在中心企业中发动、准备与领导罢工斗争，创造我们在那里的堡垒。必须把市政的、纱厂的、印刷的产业工会成立起来。在邮务、商务、法电三个主要黄色工会中，进行革命反对派的工作。同工联党团的机会主义领导必须做最严厉的斗争。要最迅速的改组工联党团，提拔积极的工人干部来领导这一工作。只有在工人运动与罢工斗争的领导上，有了彻底的转变，江苏党才能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群众的党！

此外，中央必须特别唤起同志注意的，就是关于领导方式的转变问题。必须指出，江苏党工作的如此落后，还明显的表

示出，江苏省委以及省委下面各级党部过去的领导方式的完全破产。纸头上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也决没有法子使江苏党变为领导千百万群众的党，使江苏党变为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党。也正是这种领导方式，使反倾向的斗争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的主要原因！

中央详细检查江苏省委的工作，觉得一切国际与中央的决议（或指示）虽是省委会议讨论过，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决议（或指示），然而这种决议大多数是停留在省委或区委的机关里，没有深入到支部。国际与中央的决议，照例省委“通知了”区委，区委“通知了”支部，就算完事。至于区委支部是否了解、如何去执行这些决议，那就很少过问。所以决议是很多，但是这些决议大多数是纸头上的，是为了敷衍面子，是为了好看，而不是为了要去执行而写的。甚至常常在决议通过之后，还有很长的工作计划，想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去执行这些决议，但是这些计划也只是为了“要有一个计划”而不是为了实行这计划而写的。计划通过之后，大家就可安心，因此这计划不久也就为大家所忘记了。

当然省委区委等指导机关，近来也开始了工作“检查”，但是这也不过是为了要应付中央或应付省委而检查工作，并不是为了要真正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形，不是为了要检查中央或省委决议执行的程度，推动下层同志去执行决议的每一条文，为决议上的每一条文而斗争。我们的工作检查，照例以区委、党团书记或者至多支部书记的口头报告为满足，采取一些报告中的数目字，就得意地把这些数目字报告到省委或中央，说他们是检查了工作。但是如若我们一问及下级党部如何执行着决议，执行中发生了何种困难，对于我们的决议有何种反应，那我们就要茫然不知了。

这样的工作检查，自然不能使领导机关了解下层的实际情形与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样的工作检查之后，你们当然照例又是通过决议案，指出“许多错误与缺点”。然而这种决议案，同样会停留在你们的机关内，等待你们新的检查与新的决议。这里最明显的例子，是你们对于工联的决议。你们对于工联的决议的确不少，但是这些决议执行了多少，新的决议同旧的决议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工联不去执行这些决议，这许多问题，你们是不管的。“检查了”工联的工作，通过了对于工联的决议，你们就以为完成了你们的任务。经常使工联在每日每时中去执行这些决议的监督与领导，是没有的。一定要等到另一个“检查工作周”，你们于是又去检查，又通过决议，以至无穷。

依照我们的统计，支部同志的意见书传达到省委要半个月。中央要了解支部的实际情形，经过省委简直是没有办法。中央发给省委的十三个问题差不多快要一个月，然而中央所得的答复还是寥寥无几，并且大部分都是敷衍塞责的。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与具体提议，我们是很少听到。“发展下层工作同志的自我批评，与他们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的口号，中央虽是早已提出，而且在省委的文件上也看得很多，但是一直到现在，丝毫的成绩也没有。脱离实际工作的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的斗争，变成了亭子间内的空谈。因此，新的积极干部无法提拔，党的干部也就永远停留在几个“老布尔塞维克”的身上。一个消极怠工的同志可以从常委调到沪西区委，从沪西区委调到军委，从军委调到全总，再从全总调到法南区委。似乎没有了他，省委的工作就无法发展，而这还要美其名曰“教育同志”！

中央对于江苏党（当然其他各省的党有过之无不及）这种

纸头上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一刻也不能忍耐了。如若你们现在不用最大的力量去彻底改变你们的领导方式，那一切国际与中央的指示决不能得到实现，你们所能取得的至多也不过是一些零碎的成绩！

当然，这种纸头上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不是目前江苏省委的领导所造成的，而有它长久的历史的渊源。这是陈独秀、李立三统治时代所留给我们的遗毒，也是党处在长期秘密工作的环境中所培养起来的恶果。这种领导方式的破产，在目前革命形势急激发展的过程中，完全暴露无余了。过去的工作用最明晰肯定的言语告诉我们，新的革命任务只有应用新的领导方式才能完全实现！

中央认为新的领导方式的中心目标，是在使我们的领导机关不是同群众隔离的，而是同群众在一起的，一切领导的决定不是纸头上的空喊，而是实际行动的纲领，是在使我们的党真正变成中国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党！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认为必须立刻采取以下的办法：

一、我们的一切决定必须具体化，必须是从实际经验与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脑筋中推想出来的。因此每一决定，必须尽量征求下层工作同志的意见与提议，多多召集下层工作同志或积极分子的会议，经常同他们商量一切党的重要问题。要区委负责同志或外县负责同志轮流到省委会议做工作报告。

二、这些决定，必须从省委一直传达到支部。要不怕麻烦的在区书联席会议、县委区委会议上、支书联席会议上、支部会议上详细讨论，使每一同志真正了解这一决定的意义，而为了这一决定的实现而斗争。要经常组织外县，区委尤其是支部同志的流动训练班，利用星期日与晚上的时间，研究解释党的

重要决议，再经过他们向其他同志解释。

三、党的领导机关必须经常领导与监督全党同志去执行自己的决定。省委立刻应该吸收新的工人干部到省委各部工作（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职工部至少各一人），经常训练他们，分配他们参加各区的领导工作。这样，更可以减少常委同志的接头与跑腿，抽出一部分时间来，研究党内外的重要问题，规划全盘的领导工作，并监督全党工作的进行。

四、必须经常检查这些决定执行的程度，为决定上的每一条款的实现而斗争。要使省委与区委“接头”的时间，不是简单的听听消息，或是通知省委每一次的决定，而必须要检查他们怎样执行着省委的决议。为得要工作检查的深入，省委、县委、区委必须有自己的巡视员，直接巡视各支部（省委巡视员可以由省委各部干事负责，区委巡视员可直接利用一区内的积极分子担任）。并且必须建立个人负责制与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五、在检查工作中，必须发展自下而上的与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开展与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倾听下层工作同志与支部每一同志的意见与提议，以发展同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最坚决的打击与洗刷消极怠工的机会主义分子，大胆地把积极干部吸收到指导机关中来，经常教育这些干部。也就在这一工作中，来执行各支部的与各区委、县委的改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省委必须保证上海半数以上的区委书记是工人干部，一半的区委委员是工人。

六、为了尽量发展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省委必须立刻根据中央二月十五号的决议与这一指示信，组织革命竞赛与突击队的工作，尤其要在工会工作、武装工人与义勇军工作、士兵工作、失业工人与难民工作中、发展党员等的工作中，进行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坚决打击过去对于这种工作的官僚主义态

度（自己订的竞赛条例自己不管）与赶时髦的办法。

中央认为江苏党在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上，在工人运动与罢工斗争的领导上，在过去领导工作方式的彻底的转变上，决不能是简单的组织上的变动，决不是和平的“通知中央决定”，或是在“实际工作中去布置”一句简单的话可以达到目的。这里同样会碰到对于中央决定官僚主义式的敷衍应付的障碍，口头上以至纸头上接受一切中央的指示，实际上却是完全怠工。因此，中央责成江苏省委用最坚决的不调和的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去为了中央这一指示而斗争，要毫不客气的打击对于中央决议消极怠工的敷衍应付的机会主义的分子，一直到开除党籍。

同时，必须坚决打击因为残酷的自我批评的发展、党内工作的一切错误与严重性的揭发，而悲观失望的那些不坚定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惧怕残酷的自我批评、惧怕看到自己的病态的没有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队伍内是没有位置的。中央坚决相信，为中国共产党先进部队的江苏的党，必定能够最坚决的勇敢的征服一切困难，为了中央所给与他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斗争，使江苏党真正变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党，去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书

——反对上海设立中立区，反对帝国主义
与国民党进攻工农红军，打倒投降
帝国主义的国民党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全中国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

国民党政府自从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现在又把上海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了。上海的和平会议上，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已经完全接受了日帝国主义的要求与各帝国主义强盗们的“调停”，把十九路军退出的区域，一部分送给日帝国主义作租界，一部分送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作中立区，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屠杀中国民众、镇压中国革命运动的报酬。

十九路军士兵与全国广大的劳苦民众，为了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为了要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牺牲生命财产，同日帝国主义军队血战竟月。然而这种流血这种牺牲，只是造成了国民党军阀蒋光鼐、蔡廷锴等的投机事业，只是造成了国民党政府新的投降与无耻的出卖！

上海事变更一次的告诉全中国的民众，国民党是不会抵抗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

它只会帮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协同帝国主义屠杀中国的民众，与镇压中国的革命运动。

看呵，出卖民族利益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现在除了奴膝婢颜地在国际联盟的强盗前面表示恭顺，引导这些强盗们来瓜分中国之外，做些什么呢？

全中国反日的民族解放运动，是遭到了国民党各派政府的残酷的压迫。一切反日的革命团体都被国民党的军警所封闭，一切反日的革命领袖与群众都为国民党的军警所逮捕与屠杀。尤其对于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省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进攻表示努力与积极，一切国民党的军队，现在都在“反日”的名义之下，调动集中于各苏维埃区域的周围，进行对于苏维埃与红军新的“围剿”，而且公开的宣布“剿共即所以反日”！

一切国民党的政府的军队，不论是南京政府的或是广东政府的，他们对于一切帝国主义的侵掠只有退却与投降，但是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则死命的进攻。因为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恪尽它的走狗作用，才能给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做清道夫。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才不至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全中国的民众们！在十九路军士兵与广大的工农民众同日帝国主义军队血战竟月的时期中，唯一反对帝国主义到底的中国的工农红军，怎样愤怒到万分，准备到上海联合全中国革命的民众与革命的士兵，与日帝国主义的军队血战到胜利。然而那时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把它们军队调到上海，协助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进行革命战争，反而在反日名义之下，向反对帝国

主义的中国的工农红军进攻阻止它的前进。请看，国民党的政府，怎样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呵！

全中国的民众们！不打倒国民党，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不打倒国民党，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强盗集团，国际联盟与它的代表团，现在因为国民党的敦请与引导，已经到中国来，预备更进一步的瓜分中国了。不打倒国民党，中国民众将永远变为帝国主义者的奴隶牛马！

全中国的民众！几个月内反日的血的教训，证明只有共产党的主张，是自始至终正确的，证明只有共产党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到底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才能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全中国的民众们！中国共产党继续号召你们武装起来与革命的士兵联合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继续与扩大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到底！

继续与扩大总同盟罢工！

驱逐日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境！

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中国！

打倒瓜分中国的强盗机关——国际联盟！

驱逐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出境！

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与上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

拥护中国唯一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政府！

拥护中国反帝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三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信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同志们：

职工运动的严重的不可忍耐的现状，我们在组织与领导强烈发展中的工人群众的政治经济战斗上的消极与无能，与赤色工会领导中之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警惧。

共产国际执委以最清晰与尖锐的形式在党的面前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最重要的任务：建立真正的铁的红军，建立强固的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在非苏区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共产国际执委特别着重地指出了：必须坚决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屡次着重的指出：“发展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是共产党和赤色职工会在目前发展阶段中最重要的任务”。“必须动员群众去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把这些日常要求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总要求联系起来。增加工资的问题——正当现在银钱跌价，物价腾贵，资本进攻来减少工资的时候；工作时间的的问题——正当着现在苏维埃区域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之后；社会立法的问题——正当苏维埃实行这些立法之后；失业津贴的问题——正当着现在失业增加的时候；还有劳动条件，工人待遇以及一切关于工人的问题——都

可以并且应当成为斗争的出发点。现在工人武装队的问题，当工人群众看见红军正在生长的时候，自然和以前更不同了。黄色工会内部的工作，赤色工会的扩充会员，共产党的征收党员，可以并且应当比以前更不同的去进行，因为苏维埃的胜利，以及一般政治经济的环境，都提高了工人的斗争情绪”（共产国际）。“目前最主要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最大的工业中心组织无产阶级的群众，吸引他们加入赤色工会，及扩大阶级争斗。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对苏维埃运动最实际的帮助，巩固它的胜利，并且把苏维埃政权发展到主要的工业中心去”（赤色职工国际）。

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这些指示到中国已经一年多了，党和赤色工会实现了这些决议没有？在这猛烈的罢工巨浪中赤色工会到底领导几个重要的罢工？和怎样领导了这些罢工？赤色工会的发展和巩固怎样？争取黄色工会会员群众的方面有什么成绩？在黄色工会中建立了几个有力的反对派？对于迅速增加着的失业工人的群众中，进行了些什么工作？怎样组织他们的要求失业津贴的争斗？怎样组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争斗的联合战线？赤色工会怎样地去组织和领导了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目前极端顺利的环境之中，我们对于武装工人具体地做了些什么？假如这样的考查我们的职工运动，那么就不能不承认目前赤色工会的工作是在极端严重的绝对不能再忍耐的状况之中。

首先从罢工战斗的问题说起。客观环境是十二分的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的，革命危机正在全国的范围内以极大的速度生长着，开展着。工人罢工争斗的强烈的浪潮与革命危机一般的增长密切地互相综错着，而成为革命危机生长的组成部分与主要的标志之一。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

的加紧，空前的水灾，中国的经济危机深入到国民经济的总浩劫，帝国主义及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正以一切经济浩劫的痛苦的重担放在工人阶级与劳苦群众的身上，企图以更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榨取与剥削劳苦群众的血汗与骨肉来抵偿经济危机的损失与找寻经济危机的出路。资本疯狂般地进攻着工人的生活水平线，减低工人的异常微小的不能一饱的工资，取消月赏年赏，延长工作时间，大批的开除与掉通班。这使几十百万的工人群众失业、流浪、饥饿，使别的几百万在业的工人在机器的轮子与皮带压榨之下度着半饱的生活。这不能不唤起工人群众的愤怒、抵抗与争斗的决心。别一方面，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光荣的胜利，苏区工农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更加提高工人群众的战斗的情绪，给他们以争斗的信念与决心。苏维埃与红军以自己的光荣的争斗给全国工人阶级指出脱离灾荒、失业、饥饿与资本剥削的革命出路，吸收中心城市的产业工人走入坚决的战斗中去。最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的侵略，国民党的出卖民族利益与投降，直接地击打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满洲、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军事行动与日厂的关闭，使几百万的工人与其家属失掉生活的维持和简陋的住室，号泣在风雪之中，承受着空前的灾害、饥饿、疫疠与死亡。这不能不使工人群众与失业工人的经济战斗，十分密切的关连到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统治的总的争斗上去。

国际与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的环境决定了目前全国工人阶级的罢工争斗的有力的高涨。恰恰与机会主义者的在经济恐慌之下不能罢工的胡说相反，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队伍（上海的纺织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唐山的矿工，天津的市政工人与纺织工人，河南的兵工厂工人，津浦与北宁路的铁路工人，外洋与长江船的海员，四川的盐井工人与纺织工人）都卷

入于汹涌的罢工浪潮之中。在许多产业部门之中爆发产业的同盟罢工（上海丝厂、招商局海员、唐山五矿），在别的一些部门之中正在成熟着（上海、天津的纱厂与市政工人）。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黄色工会的一致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罢工的浪潮粉碎了国民党政府接二连二的禁止罢工的命令，冲破了警察的弹压与黄色工会官僚的破坏，而在全中国的重要产业中心与部门中震荡着。争斗带着极大的坚决性、坚持性与顽强性，常常转变到与警察肉搏与冲突。在某些罢工中，罢工工人甚至企图解除那些去弹压罢工的军警的武装（如吴淞、永安等）。工人阶级依持着自己的团结、坚持与英勇，在许多罢工中得到了胜利或者部分的胜利（北宁路、唐山五矿等等），无情揭破了赤色工会中某些领导者的在经济恐慌之下罢工或一二工厂的单独罢工不能胜利的胡说的机会主义性质。在高涨着的罢工浪潮中，一切经济的争斗都带着很尖锐的政治性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在个别的城市中爆发了反日的总罢工（太原），在日本经营的企业中不断地发生反日的罢工与退职。所有这些都证明着，不管在剧烈的经济恐慌之下，罢工依然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罢工在整个的革命时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罢工斗争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重大的决定的作用与意义。无产阶级不仅以罢工这个工具来击碎资本对于工人生活水平线的进攻，而且只有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才能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的争斗与失业工人运动以信心、决心与革命的持久性。“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区之中不仅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因此在我们赤色工会的领导者之中流行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在经济恐慌之下只能进

行总同盟罢工或同盟罢工而不能组织个别工厂罢工与个别工厂的罢工是不会胜利的观点，是极端危险与极端有害的。同样是腐朽的机会主义的观点——陈独秀主义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的争斗在现在的阶段上只有对资本进攻的防御的性质，或者工人群众不愿意争斗，即使争斗时亦只进行合法的争斗。不坚决无情的打溃这些可耻的机会主义的观点，那我们便不能在“非苏区之中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争斗，并且在这斗争的过程之中去组织群众”这方面前进一小步。

而且我们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正陷于这种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因之使赤色工会不能成为猛烈高涨中的罢工争斗的组织者与发起者。极大部分的罢工成为自发的，没有我们的领导。有一部分的罢工并且在出卖工人的黄色工会的“领导”之下，赤色工会机会主义的领导的消极与无能帮助了黄色工会官僚，可以用假的领导来使斗争失去真正的领导，来阻碍争斗的发展与引导争斗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有一小部分的罢工争斗是赤色工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但是这些争斗多数是失败了——不仅在争斗的直接物质上的结果方面，而且最主要的是在争斗的过程之中去提高群众的政治自觉方面。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罢工的准备与进行之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许多“左”的右的机会主义的犹疑和动摇。

真实的布尔塞维克的准备工人阶级的战斗是没有的。党与工会的领导机关没有成为罢工的组织者与发起者。在我们队伍中间，还存在着领导罢工是赤色工会的任务，不是党的任务的观念。工厂支部或者一般的没有提出与讨论罢工的问题，或者只抽象的总的讨论罢工的问题，而不与该厂的实际的条件配合起来，甚至在许多时候，支部在罢工争斗紧张的时候，还站在

争斗的旁观地位。工会的指导员常常轻视支部，不经过支部去“领导”争斗。因为没有企业中的艰苦工作，因为支部没有经常的讨论罢工问题，因为党和赤色工会没有成为罢工的组织者与发起者，所以罢工争斗常常成为自发的，出于我们意料之外。党和赤色工会只有事变已经采取了锐利的性质的时候，才想到准备罢工。而机会主义者却在争斗已经极端尖锐的情况之下，以罢工须有长期准备的口实来阻碍罢工的爆发。我们必须打击罢工不须准备的观点，以及以准备罢工的口实阻碍罢工的机会主义的企图。党和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应该成为罢工争斗的组织者，工厂支部应该成为准备和领导工人阶级战斗的堡垒。“准备罢工首先就是与一切工人和女工讨论一切使他们不安的问题，拟定具体和清楚的要求，创立选举的争斗机关，吸引一切利害相关的工人和女工来决定与罢工有关系的问题，提拔最好的最积极工人参加罢工的领导机关，发动革命职工运动的一切力量”（洛佐夫斯基）。

清楚，具体，为每一个罢工工人所了解的罢工口号与要求，这对于罢工的胜利有决定的意义。而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则常常表现着许多党和工会的领导者完全不知道怎样去提出具体而清楚的要求，常常不去深入群众，不小心地了解一切工人不安的问题，不仔细地考查群众的要求，不经过群众，不依持在群众的积极性上，而在脑子中或者亭子间中来替工人群众决定罢工要求。以党的总的政治口号强制地“联系”在罢工要求之中，要工人为他争斗（如神州国光社的罢工要求中，兵工厂的罢工要求等），甚至在这些口号与要求之中，可以完全的抛弃工人的日常的小的或大的要求，而要求工人为着那些机会主义的政治口号而争斗（如工反三月五日的口号，没有一个经济要求而放着许多机会主义的政治口号，如工人劳苦群众自

动接收反革命武装等等），这当然不是领导争斗而是破坏争斗的最好的方法。许多党部和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还不懂得党的基本的政治口号、赤色工会纲领与每一个具体的罢工要求的区别，常常将他们混合在一张纸上而成为不可分辨的糊涂账。在提出罢工条件的时候，常常有愈多愈好的倾向，以致每次罢工的要求至少有一二十条，使工人不知道为哪一条而争斗，实际上是这些领导者不知道工人真正的要求是什么。罢工要求常常是最空洞、模糊、浮泛的空条件，如“年关双薪”不说多少时候，一月？一星期？甚至有“增加工资到能维持一般生活费”（上海女工代表会议的要求纲领），“反对工头与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海总），“反对无故开除工人”之流的谁也不懂得的要求。一般的情形之中，青年女工的特殊要求是没有包括到罢工要求之中的。罢工要求常常是不经过群众讨论的，或者是在所谓“赤色群众”形式地讨论一下就算了事。

经济争斗带着明锐的政治性质是目前罢工浪潮中的显明的特点。所以和经济争斗相关连的正确的政治口号之提出，对于罢工争斗之政治化有极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许多的错误，常常将党的总的政治口号强制地放在罢工的要求之中（在河南兵工厂的罢工中，省委提出的要求中将“打倒出卖中国工农给帝国主义的国民政府”、“打倒压迫中国工农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及“组织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等等口号，都一起的放在罢工要求之中；又如上海神州国光社的罢工要求中有“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总同盟罢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共管上海及建立反日宣传刊物”、“反对社会民主党主张”等五六条，这一类的例子是很多的；许多同志认为这就是政治口号与经济要求的联系，这是使罢工政治化，实际上这是糊涂账，这是破坏罢工）。我们的任

务并不是在把每一个党的基本的政治口号强制地放在罢工要求之中，而是在于“用一些具体的政治口号（或者是对于这些罢工的有显明联系的，或者对于所提出的经济要求有显明联系的）来扩大斗争的纲领，以更能加强经济罢工的争斗，并提高他的革命意义。”

群众选举的和群众密切联系着的罢工委员会，是罢工胜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罢工委员会应该是群众选举出来的，它每天应向罢工工人报告，它一分钟也不能脱离群众，它应该知道罢工工人的情绪，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一切运动的强处和弱点，只有这样，罢工委员会才能领导罢工走向胜利。但是在我们职工运动的实际中，常常不发动广大的群众来选举罢工委员会，而由少数的工人选举之，或者简单的委派之。即使由大多数工人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我们亦不会去团结他们，使他们与群众密切的联系起来，而是轻视他们，忽略他们，由我们赤色工会的“工作人员”来英雄的包办与代理一切，即使最小的技术的工作亦不让群众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来做。这种不相信群众的委派与包办的“领导”，在工反中发展到不可忍耐的地步。这种机会主义的轻视群众，官僚主义的对付群众间真正的领袖，是在赤色工会的领导者中广大地流行着。他们悲观失望地叫喊“干部恐慌”，而几千几百罢工浪潮之中涌现出来新的干部、积极的工人，却被机会主义的重担压制着不得发展。

在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方面，情形同样是十分恶劣，特别与敌人组织之中的会员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与工厂中的统一战线。在许多罢工中间，我们对于熟练工人常常采取蔑视的态度，因而使罢工不能够得到胜利的结束（海员、公共汽车）。在黄色工会与其他敌人组织中的反对派的工作还没有真正的开

始，这里表现着或者是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黄色领袖，主张在赤色工会领导之下的罢工委员会去加入黄色工会（上海），派自己的会员去加入为工人群众所激烈反对的“官僚机关”中去……建立“赤色小组，革命反对派，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哈总），与黄色工会委派的代表团建立统一的战线（上海永安）；或者是表面上“左”的而实质上一样机会主义的放弃争取黄色工会会员群众，主张以少数的赤色反对派自动退出黄色工会（上海大东），与宗派主义的敌视一切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反对黄色工会的领袖的争斗，常常仅仅限制在最普遍的一般的空话，他们是出卖工人利益的工贼等等，反而对于黄色工会官僚的具体的出卖工人的行动和把戏不加丝毫注意。而实际上，我们应该最具体的揭破黄色工会官僚的每一个提议、每一个具体步骤，不使他们能够休息，使他们难于玩把戏。在一切地方，在企业中，在工房中，在黄色工会中，我们应该将革命的职工运动的政纲和策略与国民党的政纲和策略对立，将群众动员起来，环绕在工人运动的许多基本问题的周围，“并且将这个问题与国民党的一切政策联结起来（土地问题，反帝国主义问题，反苏联问题）”。广大的在群众中宣传解释苏维埃的法令（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等），将他们与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对立起来——在组织工人群众的争斗上，在揭破黄色工会的官僚上有决定的意义。因之，特别有害的是那种轻视苏维埃法令的机会主义观点，以为劳动法是争取工厂法实施的“参考材料”（全总党团），这是公开的向国民党与黄色工会的投降。

赤色工会应该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反对派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目的绝不是占领黄色工会的机关，绝不是单纯的反对或驱逐几个黄色领袖，而是争取在

黄色工会中的广大的会员群众。在坚决的反对与揭破黄色领袖的叛卖工人利益的时候，我们必须以同志的态度对待黄色工会的普通的会员，将黄色领袖每一个把戏、活动、言论，在这些会员面前揭破他们，争取这些群众到反对派方面来。必须在统一的争斗纲领上与黄色工会及其他敌人组织中的会员群众进行下层统一战线，一分钟也不放松反对他们的叛卖工人的领袖。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坚决的为着工人的经济的日常的要求而争斗上，在坚决反对叛卖工人的改良主义的领袖的争斗中，赤色工会才能够夺取大多数的黄色工会的会员到自己方面来。

赤色工会是党与群众联系的主要的桥梁，巩固现有的赤色工会的组织，把散漫的各厂的组织集中起来组织地方的生产工会，用一切力量与革命的速度去征收会员，建立新的工会及其工厂的小组——特别是大的重要的企业之中，这是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目前的赤色工会没有能够完成这些任务。在罢工争斗极端尖锐的现在，赤色工会的会员的数量是没有增加，许多地方反而削减了，与群众的联系非常薄弱，组织上的散漫混乱的状况依然存在，赤色工会的工作没有深入到企业中间。在重要产业部门中，赤色工会的发展是特别的恶劣。全总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绝对没有了解巩固和发展赤色工会的重要性，存在着许多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观念，认为工人反日会就是赤色工会，以为秘密的赤色工会是不关紧要的，因而主张取消赤色工会，取消全总，甚至提议恢复立三路线的组织方式。

利用目前的顺利的环境，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存在，组织工厂委员会和一切附属组织来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个任务在目前是比任何时候来得急切。但是机会主义者对于这个任务的执

行是消极的。他们不去为着实现这个任务而斗争，反而提出各种奇怪的机会主义的主张，提议组织介于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之间“公开工会”（灰色工会）。最坚决无情的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观点，艰苦地去创造与组织地方的生产工会，巩固赤色工会的组织，发展会员，组织工厂委员会与一切附属组织，是真正的保证党及赤色工会对于开展着工人争斗领导的前提，是保证在黄色工会内工作开展的先决条件。

取消主义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取消女工与青工工作方面，不管在轻工业之中女工与青工占工人成分的绝对的大多数及他们的积极性的增长。机会主义者对于青工女工在阶级战斗中的作用不可允许的轻视，而且表现厌恶青工与女工的态度，认为女子与小孩子是没有用的。全总在几个月的过程中不与青工部发生任何关系，工反的章程上没有一个字说到青工、女工，女工代表会选派自己五个女工代表到工反理事会去，工反认为无事可做而拒绝了。这些情形是再不能忍耐的。党、赤色工会和青年团必须以极大的力量为征取广大的青工与女工而争斗，为提高青工、女工在争斗中的积极性及他们的政治自觉而争斗。

在严重的经济恐慌的打击之下，几千百万的工人群众被赶出了工厂。在这广大的饥寒交迫的失业工人之中，赤色工会的工作是非常薄弱的，领导失业工人争取失业津贴的争斗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没有有系统的领导失业运动，没有定出失业工人的要求纲领，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争斗的联合战线完全没有建立，在罢工的要求之中没有包括失业工人的要求，没有吸收失业工人参加罢工的领导机关与纠察队等等。没有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一致的联合战线，则罢工是不会胜利的，这在许多痛苦的经验上已经证明了的（公共汽车，阿坦姆船），但这还

没有被赤色工会的领导者所了解。在上海关厂的日本工厂的失业工人中的工作，虽然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在这个工作亦发展着机会主义的路线，将失业工人的争斗限止在募捐与要米的争斗，而不将群众争斗引导到反对整个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上去。

机会主义者从对于目前革命情势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走到企图复活早已破产了的立三路线的组织方式，最后，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的将经济与政治分开，走到纯粹的经济主义，拒绝参加和领导政治的争斗。对于蓬蓬勃勃在全国范围内高涨着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工会的机会主义领导完全采取了冷淡与旁观的态度。在全总的《职工指南》——指导职工运动的理论刊物上，没有一篇关于组织和领导工人的反帝争斗的论文，甚至在上海民反要求工联去参加与领导的时候，工联的机会主义者回答说：“我们忙于经济争斗的领导，没有工夫！”这完全不是偶然的现象。工反的领导可以用发米的口实来抛弃“三八”纪念的工作，“二七”纪念可以在因为是旧历新年而没有任何工作。甚至在日本的巨炮隆隆声中，下层的工会组织中在繁琐地争执着用经济的口号去组织罢工呢？或是反日的口号？而全国总工会呢？在一个月之久曾经开了一次会议，任何具体的组织与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步骤是没有讨论的。当然很明显的，一切国际和党所提出的许多战斗的任务：利用目前的情势，开展反日罢工，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组织以工人为骨干的义勇军，开展独立的抵制日货运动，广大的在群众中进行拥护红军和苏维埃的宣传，反对进攻苏联等等头一等任务，机会主义者也是不了解的、忽视的，丝毫地没有进行任何坚决的争斗来实现这些

任务。

上面所说的便是在工会领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这个路线是与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机会主义者采取惯用的两面派的手段来对付国际和党的指示。当着中央和省委批评工会领导者的错误时，他们口头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完全同意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而实际上则对于执行这些指示完全怠工。机会主义者同时又用官僚主义的压制手段来对付工会中的下层积极分子的真正的自我批评。

这就是目前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这机会主义路线是阻碍职工运动彻底的转变与造成目前工会工作的严重现状的真实的原因。向着右倾机会主义，集中布尔塞维克的火力，是实现国际和党的总路线的先决的前提。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对于倾向的嫉恶，来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及对他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之斗争，反对一切对于目前情形的估计不足，反对一切对于职工运动的悲观失望的情绪。

中央认为职工运动的真实的彻底的转变，应该在“工厂、工会与罢工”的口号之下进行。应该将我们的工作深入到企业中，建立我们在企业中的坚固基础；应该将党和职工运动的注意力集中到建立赤色工会，发展赤色工会会员及争取黄色工会会员群众方面去；应该将一切我们的力量用来准备和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的罢工上去；一切党和赤色工会的组织应该成为工人群众经济政治战斗的组织者！

中央坚信：全党同志将一致的团结在国际和党的路线周围，给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克服这些机会主义的动摇，开展着对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战斗的领导，走向中国无

产阶级和中国革命的新的胜利。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的信

——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瓜分中国与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运动周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各级党部：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战争更加紧迫了，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日本帝国主义已在满洲成立了满蒙共和国，组织了大批白俄为进攻苏联的先头部队，强迫霸占中东路，派送大军到苏联边境挑衅，这种计划正在各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和赞扬之下进行着。此外接近苏联的东欧各小国也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加紧准备反苏联的战争。很明显地各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与革命危机的生长，日夜都想从进攻苏联方面得到出路。这种万分紧迫的形势，是一刻也不容许我们忽视的。另外一方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进行同样是万分紧急的关头，上海及沪宁路一带已成了帝国主义直接管理的区域，在法美英日帝国主义直接指挥进行着的所谓“上海和平会议”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分赃的会议，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国民党政府已经答应了一切的卖国条件，为的是要进攻猛烈发展着的中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镇压蓬蓬勃勃的反帝运动、罢工运动与一切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自然日趋死亡的帝国主义与国民党

无论如何疯狂地挣扎，结果必然要受到革命势力有力的回答，而归失败以至灭亡。但是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责任绝不能有一点的等待，我们必须认清目前的紧急关头，把拥护苏联与中国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任务提到最高的限度。坚决地反对一切对这一任务的消极怠工与估计不足。

为着实际执行上述的任务，青年团的中央已经决定，上海在四月五号至十二号，外省在四月二十三号至三十号，举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瓜分中国、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运动周。党中央认为这个运动周虽然主要的是由青年团来发动，但各级党部必须积极领导和参加这一运动，绝对不能以为这是青年团的工作，采取旁观或应付的态度。同时红色五月已经逼近，为着更有成绩的进行五一和五卅运动，我们更应抓住这个运动周，利用这个运动周作为红色五月工作预先的总动员，因此，各级党部从今天起就应该积极准备和领导青年团与一切群众组织来进行这个运动周。在工作过程中与结束的时候，必须有严格的检查，并将检查的结果报告中央。

（同时要参考团中央关于这一运动周的决议）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直下漳州泉州方能 调动敌人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恩来同志：

(1) 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

(2) 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

(3) 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

(4) 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

(5) 我明日去旧县晤谭张⁽¹⁾。

泽 东
三十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谭震林、张鼎丞。

毛泽东关于直捣漳泉部队 必须更迅速更集中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

恩来同志：

1. 我昨日到上杭，商应敌布置。拟阳（七日）去白砂和林聂^{〔1〕}会合。

2. 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赴会昌筠门岭，间经武北湘坑、官庄、白砂，于十四日到龙岩。

3. 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

4. 三军团行动如何，统盼电示。

泽 东

二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聂荣臻。

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 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 机会主义的动摇^{*}

(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张 闻 天

(一)

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反帝运动的急激发展，工人运动反攻与进攻的浪潮的高涨与全中国千百万农民、灾民与兵士群众的革命斗争，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成熟，并且把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用它们的武装力量，瓜分中国，积极的企图着把中国从苏维埃的“洪水”中，拉到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去。

在全中国阶级斗争这样紧张剧烈的时候，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拥护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革命派别，更加疯狂般的向着中国唯一革命的、唯一领导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到胜利的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

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进攻。它们不但用白色恐怖破坏我们的组织，逮捕与屠杀我们的同志，而且在思想上利用种种造谣污蔑的手段，利用一切它们公开的报章杂志，利用中国共产党内的叛徒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派等向我们进攻。因为它们很明确的了解到：不消灭发动、组织与领导全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做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斗争的共产党，它们的灭亡是必不可免的事。

在全中国阶级斗争这样紧张剧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正在动员全党的同志，发动、组织与领导全中国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向着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做积极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自从四中全会之后，克服了立三路线，粉碎了罗章龙所领导的右派小组织，在执行四中全会的国际路线中，巩固了党内布尔塞维克的统一与团结，改变了党内的成分，巩固与扩大了中国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领导了白色区域工农兵士灾民等广大的群众斗争与反帝运动。这些成绩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更有阵地的向着统治阶级与一切反革命派别进攻，更有力量的打击党内一切机会主义者，更广大的发展自我批评，更彻底的转变一切我们的工作方式，使我们的党更能适应目前的革命环境，更能顺利的去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战斗任务！

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危机中革命与反革命在生死斗争的过程中的中心特点。

然而这种特点，还没有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全党同志所了解。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与反革命的武断宣传，不能不影响到了我们党内一部分最不坚定的同志，使他们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党所提出的许多中心任务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以致走到悲观失望与消极怠工的道路上去。这类机会主义

的动摇，对于中国党实是目前最大的危险。因此同这类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实是中国党完成目前他的中心任务的先决条件。而且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才能使全党同志更能清晰的了解我们的任务，为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

(二)

从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出发，来检查我们党内的思想，那我们立刻可以发现非常严重的机会主义的思想，在许多地方障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这种思想，主要的表现在对于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估计不足，即表现在对于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虽是有时这种机会主义在“左”的词句的掩盖之下。

在世界革命方面，右倾机会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在对于目前两个世界的对立，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了解不足。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猛烈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从没有像现在暴露得这样鲜明”（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这些同志也不了解：“两种制度间这个天天生长的矛盾，现在成了国际关系的核心，影响到帝国主义世界许多矛盾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能了解：“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间，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间各种矛盾的发展，极端地加强了武装进攻苏联的危险”（同上）。因此我们的同志放松了动员广大群众拥护苏联的战斗任务。

譬如满洲事变之后，山东省委认为这一事件：

“发生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遭受美国的重大

打击，自然要企图培植军阀以与美所御用的南京政府相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眼见着华北固有的势力，被美帝国主义日渐削弱，眼见着自己所养的军阀被蒋^[1]系所打倒，在这忍无可忍的当儿，便不能不御驾亲征了！便不能不揭破一切面具，向南京政府及张学良开战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大纲》九月三十日）

山东省委在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到日本占领满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进攻苏联。因此山东省委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在日本占领满洲的开始时，各帝国主义表示了一致的赞助与拥护。因为看不到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所以山东省委在拥护苏联的工作上，表示了机会主义的消极。

河南省委从锦州失陷一直到上海事变，在一切决议上无数次的提到“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已箭在弦上”（见省委二月为上海事变及宁政府迁都决议），但从没有一字提到“在反对苏联战争的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见中央关于争取革命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不但如此，而且在省委《检查过去反帝工作决议》上，对于省委在满洲事件的通告中关于“日本以武力占领满洲……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准备的实际侵占满洲，进攻苏联，压迫中国革命的开始”的分析，反认为是错误的。

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认为“日本出兵占领奉天、长春、厦门、烟台是为着威吓张学良反蒋，同时取得在华的根据地”（见泽鸿^[2]给中央报告）。同时这个负责同志还说：“从去年十一月起，世界状况已有一个转变，帝国主义内部恐慌已达极点，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结果是无产阶级要起来革命。在这一情形下，敌人

是无法进攻苏联和革命的”（见三月二十七日君鹤^[3]给中央的报告）。

从这许多例子上分明的看出，我们的同志对于目前两个世界对立的形势，如何的不了解。他们只看到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而看不到目前“国际关系的核心”是两个世界的对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是动摇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与推进世界革命的最有力的因素，看不到苏联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因此不了解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不了解帝国主义者正在加紧准备反苏联的战争中，找求着他们内部日益生长着的矛盾的解决与出路。

对于两个世界对立的不了解，也就是对于世界革命的估计不足。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必然会发生对于苏联的力量的不信任，不相信苏联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会胜利地走向前去，以致对于世界革命的前途消极悲观。这种估计，也就是使得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不了解共产国际所放在各国共产党前面“拥护苏联”的战斗任务的意义，对于这一任务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这种消极怠工，不但在山东、河南、中央苏区等地表示出来，而且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同样的危险。请问不同这种倾向作斗争，不使全党同志明晰地了解目前国际关系的枢纽在哪里，这一工作的转变是可能的吗？

（三）

对于中国革命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是对于中国目前两个政权的对立的·不·了解·或·估计·不足。我们的同志还不能了解或不很了解，国民党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崩溃与死亡，苏维埃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巩固与发展。我们的同志不了解，或不很了解：

“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苏维埃与红军的组织，他们的领土内有千百万的户口，因此中国遂站在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前线。……从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苏维埃与红军，正在以苏区的具体经验，引起产业中心的工人与农民群众来加入斗争，没收地主的封建财产，分配土地于农民，消灭反革命国民党刽子手的政权”（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

“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建立给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以总的领导，更能顺利地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中央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存在是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标志，苏维埃政府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所以，工农兵政权与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对立，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在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上与相互关系上有决定的意义。不了解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这一特点，必然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主要原因，是进攻中国革命尤其是对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的一致。

就是因为这原因，山东省委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完全是为了日美的冲突，同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丝毫关系。还有其他省委或多或少都犯有这种错误。甚至有些同志，如像中央职工部的负责同志，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满洲不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满洲省委在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失业工人运动决议上，也只是说：“今年二七纪念与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失业工人斗争日，正在日帝国主义占据满洲，继续扩大残暴行为，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加紧进攻苏联。”而没有一句话说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攻。中央苏区在他们去年十一月党大会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没有一句话讲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尤其是苏区与红军的进攻问

题，似乎帝国主义对于苏区是没有关系的。

对于两个政权的对立的不了解，也必然会发生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以为国民党军阀内部的战争是无法免除的，以为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国民党决不敢再向苏区与红军实行进攻。犯这种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能了解：虽是国民党军阀内部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决不因为他们内部矛盾的紧张，而停止他们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他们正因为苏区与红军的发展与巩固，所以他们正在“团结一致”向苏区与红军进攻，在加紧他们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中，找求他们内部间矛盾的暂时解决。

在三次革命战争之后，中央苏区的负责同志认为：

“三次革命战争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向苏区红军的进攻，我们是防御战，今后是我们进攻敌人，所以提出四次革命战争是不正确的。”（见泽鸿报告）

这类估计，当然很值得我们惊奇的。因为这里面，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种估计没有法子使我们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在苏维埃的周围，使我们能够在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新的血战中得到新的胜利。也就是因为这种估计，所以使中央区的同志从容不迫的去打“土围子”，而把扩大红军与改造红军等的中心任务放在脑后。

很明显的，这类估计实际上是对中国苏维埃政权估计不足。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不能明晰的了解两个政权的对立，在中国革命中有何等重大的意义。陕西省委在过去曾经“号召全党，号召群众，说工农红军在第三次‘围剿’中，受到了暂时挫折和部分的失败，苏维埃运动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头”（见省委十二月政治决议），表示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丝毫的信心。广东省委在十二月十日《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目

前阶段中的任务》的通告上，简直没有一个字提到扩大广东的苏区与红军，以为这是广东党所不值得注意的问题。甚至在中央宣传部最近所印出的《上海三次暴动五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上，在列数“无产阶级领导一般劳苦群众的当前任务”中，也没有提到巩固与扩大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这一中心任务。

这类机会主义的观点，当然不能动员全党同志去为了扩大与巩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去动员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新的进攻，把这一工作当做我们党目前的战斗任务。

（四）

在另外一方面，对于另一个政权即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反革命政权，许多地方表示了过分的估计。在疯狂般的白色恐怖前面，在国民党调动数十万军队向鄂豫皖苏区与江西苏区实行新的进攻的前面，我们的有些同志就对于革命力量表示了怀疑，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缺乏信心，以致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于党的任务消极怠工。

一些同志不能了解或不愿了解，虽是国民党这样残酷，这样积极的向着革命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进攻，然而这种进攻，同去年三次“围剿”时已经大不相同了。中央在《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上，很清楚的写着：

“估计着目前的形势，必须指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

全中国的水灾，国民经济的总崩溃，反帝斗争的普及全

国，工农兵士斗争的开展，苏区与红军的伟大胜利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扩大，对于国民党当然有绝大的影响。国民党在广大民众前面的“威信”已破碎得不堪的了。国民党以及其他在野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的范围是大大的缩小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完全宣告了破产。甚至国民党政府所依靠的武装力量，经过这样一个激变的时期，也在急速动摇崩溃的过程之中。整连整营整师以至整军（二十六路军）的叛变，投入红军，已经是常见的事。

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是愈加感觉到“棘手”与困难了。然而这愈是使他疯狂的利用白色恐怖与血的屠杀来压迫革命运动与进攻苏区与红军。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的崩溃，因为他表示出消灭中国革命运动、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的无能，所以帝国主义加速的瓜分中国，“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火军费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的公开的武力干涉”（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在白区，对于统治阶级力量的过分估计，对于这一阶级力量对比的辩证法的变动的不了解，是我们常见的事。我们从各级党部的文件中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这种估计只会造成对于目前形势的悲观失望，对于党的任务的消极怠工。在苏区，这种估计造成了对于苏区与红军的取消观点、保守主义与等待主义。

我们在这里想把苏区的一些例子拿来，指明出我们的同志对于敌人力量的机会主义的估计。湘鄂西苏区的一部分反对中央分局的布尔塞维克领导的潘家珣与万涛同志，他们认为在敌人猛烈进攻苏区的情形之下，必须缩小红军，将红军化为地方武装，化为游击队，把红军的向外发展看成逃跑右倾，而把巩

固苏区看成“庸俗的保守主义”（见湘鄂西省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对于潘万二同志的批评）。鄂豫边的负责同志，在敌人进攻的情形之下，不去坚决的组织群众，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却号召群众实行“总退却”，而且自己却不得中央与边特的同意逃跑到上海。赣东北苏区的一些同志在敌人炮垒政策之下，表示张惶失措，主张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作战。中央苏区在去年十一月党大会的决议案，对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只是这样的写着：

“统治阶级为要挽救其死亡，正在企图团结与联合，以求一致进攻革命。现在这种企图虽然没有达到，但是他们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准备与计划是毫不放松的。不过反动统治内部的矛盾和崩溃，并不因此而消灭而减弱，而革命力量一定能够战胜反动统治无数次更疯狂更野蛮的进攻，而在这些无数次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与数省的首要胜利”。

中央苏区的同志似乎在这里讲到国民党的崩溃，讲到国民党的一致进攻，以至相信在无数次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与数省革命的首要胜利。然而很明显的，中央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由于对于反动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的。

不是没有原因的吧！中央区同志在他们的决议上，没有一句话讲到在国民党新的进攻苏区与红军中帝国主义的作用的扩大，在许多地方帝国主义准备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向我们进攻。

他们也不能了解，国民党正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削弱，愈是公开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把重要的中心城市交给帝国主义共管，明显的表示出了它是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清道夫。

也就是对于反动统治力量的过高估计，使他们不能了解：

“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为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中央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当然，在我们反对对于反动统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对于反动统治的一些“左”的估计。

满洲省委在《为反对国民党统一政府的宣言》（一月二十七日）中说道，“国民党各派的和平会议、全体会议与统一政府的成立，这是国民党统治中国宣告最后破产的一幕”，是国民党“企图挽救已经绝气的统治”。河南省委认为，“怒潮般的反日运动当中，群众所得到的教训，以至最落后的群众，都认识国民党各派、新月人权派、第三党等等的真面目，表示不满意了，最后的幻想已绝望了，都环绕在共产党的周围”（关于广暴纪念通知）。满洲省委甚至在二个月的工作计划上写着“在辽西、哈尔滨、东满、珠河把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起来，首先在辽西、哈尔滨开始”这类荒唐到万分的条文。当然，这些“左”的估计，并不阻止这两个省委对于目前的群众斗争表示悲观失望，放弃放在他们前面的许多战斗任务。

就是鄂豫皖苏区省委在正确的了解中央决议的精神之下，也不免犯了对于国民党力量的“左”的估计。他们在今年二月七日省委会的政治决议案上说：

“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

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所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与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

这种“左”的估计，当然同我们上面所说的，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这种估计，会使我们看不到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看不到国民党的军队在目前还是我们正面的敌人。这必然会使我们放松反国民党的斗争。

然而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五）

在我们党内现在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方面，不论在土地革命方面，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没有明晰的了解，甚至根本忽视这一问题，而实际上这一问题正是中国革命问题的中心的中心。

如若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自从九一八满洲事变起一直到现在止，我们的反帝工作没有得到应得的成绩的中心原因，那不能不指点出，这是由于我们党内许多负责同志还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一反帝斗争去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我们的许多同志或者是在“争取公开”的名称之下，做国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或者是在“左”的口号之下，根本放弃这一工作，采取了消极怠工的关门主义。在《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上也曾经这样说：

“在各地的反日工作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两个不能容许的极端：或者是完全的关门主义，不参加任何反日运动；或者是所谓完全的‘公开主义’，变为国民党的俘虏。譬如陕西省委，过去对于反日运动完全消极，后来改正了这种错误，即转到了另一极端，使我们的反日运动变成了和平的公开运动。再譬如四川省委，当广大群众起来反日时，我们主张反帝不反日，但后来自知错误，即另趋极端，组织‘援马^[4]委员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的保护，并且在刊物上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合作”。

满洲省委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后，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对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的口号一字未提。对于蓬勃发展着的东北义勇军更是不闻不问，更说不上组织东三省各重要企业中的反日罢工。江苏省委对于反日罢工、义勇军的组织以及抵货运动等也表示消极怠工。广东省委公开在《两广实话》附刊上发表“反对救国义勇军，学生军等的组织”，认为“抵制日货是消极的不中用的方法，而且一方面必然要扩大英货的市场，是英国最得意的一件事”（白希^[5]同志十月十五日为广西工作来信）。此外河北省委、山西省委也有同样的观点。山东省委甚至把铁路支部一个工人同志开除，因为他提议组织工人义勇军。

很明显的，我们的同志还没有了解深入到各种形式的反帝运动中去争取反帝运动的领导，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与武装工人，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对于中央很久以前所提出的“以民族的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境”、“以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的反日的中心口号表示怀疑与动摇，甚至对于“民族”二字表示畏

惧。一直到现在，在各省的文件上与工作上，这一口号还没有成为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中心口号。这些同志还没有了解到，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帝革命中的中心的中心。他们不了解，只有这一领导才能使反帝革命扩大深入，才能推动中国革命运动到更高的阶段。

在苏区的我们的党，对于这一问题，同样的没有明确的了解。在过去，苏区的党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现在在有些苏区，如像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对于苏维埃是中国唯一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工农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军队，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能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这一点，在很多同志中间还是不很了然的。这里我们又可举出中央苏区的例子。在他们的政治决议案中：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加紧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为要发展反帝运动必须坚决反对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帝运动的右倾观念。必须使全党认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要利用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宣传与鼓动。最近要切实利用日本出兵占领东三省的事件，进行广大的反帝运动，并须在这个时间内成立苏区的反帝同盟的组织”。

这就是中央苏区对于反帝运动的全部了解！这里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苏维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唯一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去保卫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侵掠的政权，是唯一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的政权，虽是他们一般的指出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这里，显然的，把争取民族革命的领导问题放到脑后去了。

苏区的党不但在反帝运动中忽视了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而且在土地革命中也同样忽视了这一问题。几个苏区，如像赣东北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中央苏区等对于怎样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运动中绝对领导权的问题，可以说完全忽视。在分配土地上，中央苏区过去提出“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的观念，不用说是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即去年八月的土地问题决议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也还是机会主义的。然而十一月的政治决议却认为这一决议是正确的。在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上，没有一句话讲到保证在红军中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与工人骨干的问题。关于党内工人分子的吸收与工人干部的提拔问题，始终没有注意。在苏维埃政府中工人成分的增加，以及苏区工人运动与工会工作的发展，完全表示了消极怠工。甚至在十一月党大会所通过的《苏区工会运动决议案》上这样说：

“现在苏区还未包括有大的中心城市，还缺乏产业工人。农村工人群众主要的是雇农、手工业工人和苦力”。

“苏区不断的在敌人包围封锁和残酷的战争中，经济受着极大损害，最大多数手工业停闭，手工业工人随之而失业，雇农在土地革命后都已经分得了土地”。

照中央区的同志这样说来，他们过去完全忽视工会工作与工人运动，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他们那里根本没有工人。这些同志一方面根本不了解，中国苏维埃运动是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中国的苏维埃不是农民的苏维埃，而是工·农·民·主·专·政，而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经在国家政权的萌芽中巩固了起来”（国际十一次全会决议）；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了解如何在发展工人运动、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提拔工人干部等工作中去巩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领导。

在《共产国际》杂志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的社论上曾经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员愈鲜明的估计到现存政权的阶级基础，则中国共产党对于苏维埃的领导愈坚固，愈强健。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动摇，都马上要反映到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日常具体的政策上，而使革命具有很大的危险与破坏。所以中国共产党用如此强固性与坚决性去揭破了和揭破着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李立三同志忽视了一种根本上重要的情形就是：苏维埃的一切革命办法，应从现存政权的两个阶级性之估计出发，应从运动现阶段上过早的社会主义的办法之不可容许中出发，同时应从巩固无产阶级在这个政权中的领导作用，而有坚忍的有系统的有纪律的工作之责任之估计中出发（建立正式的工农红军，并有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指挥骨干，在苏区的城市中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苏维埃专政的一切机关中有系统的提拔工人）。所以凡把中国苏维埃当做似乎只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等等的，也是同样的危险。这样把无产阶级融化在劳动者的一般群众中，这样把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加以抹杀……”

但是：

“如果指出这一点便心满意足，以致甚至连一分钟减弱为巩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而作的坚强的稳固的斗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极端危险的”。

这种“极端危险”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农民苏维埃”的观点，与对于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忽视，在中国党内是分明存在的。不同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中国革命将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也没有法子使中国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去。只有像猷新同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

者”才会在“论革命转变问题”中，可以一句话都不讲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见《布尔塞维克》四卷四期）。

同上面所说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即是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的估计不足。中央职工部、全总以至上海工联的一些负责同志的言论与行动，差不多给了我们以最好的例子。

在去年十一月中央通过职工运动决议时，中央职工部刘^[6]同志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的估计，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目前工人的斗争是防御的与反攻的，刘同志等更认为在经济恐慌资本进攻的条件下，罢工不能得到胜利，罢工不容易发生，他们甚至说工人惧怕罢工。在中央职工部关于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曾经这样说：

“资本家与国民党帝国主义更加联合一致来压迫工人的斗争，更加采用一切的暴力与残酷的方法来镇压斗争的工人，黄色工会更与资本家国民党打成一片来破坏工人的斗争，因此使斗争遇着很大的困难。罢工的失败经常威胁着压迫要求斗争的工人，赤色工会还没有来得及准备群众的力量去克服客观上所给予的这一切困难”（见《红旗周报》三十一期）。

“国民党资本家压迫和破坏工人斗争这一切的系统，是非常严密的，是从工人群众的内部与外部齐来的。在工人一方面如果不能击破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的进攻使之失败，那斗争的胜利就是很难的。试问在工人群众一方面，在赤色工会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对付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进攻呢？”（同上）。

“资本家是什么都好，无产阶级是什么都坏”，这是职工部报告的全部精神。在“工会组织问题”上，职工部刘同志更说到工人积极分子如何动摇畏惧，工人群众如何在斗争中胆怯与没有办法，如何“在胜利之后，切忌领袖个人的骄傲，并且还要注意到群众的骄傲”（见《红旗周报》三十二期）。

对于中国工人运动这种悲观失望的估计，当然会使这些同志所领导的全总与工联走到消极怠工的路上，当然会使这些同志放弃组织罢工与领导工人群众的反帝罢工，并且使经济斗争政治化。这种观点，当然会使全总的党团书记鲁深^[7]同志觉得全国的“工作没有对象”，使工联的黄^[8]同志感觉到“什么也没有”，以致使工会工作深深的陷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间。

对于工人运动的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在各省也是同样的严重。这里最有趣味的例子，是山东省委巡视员与铁总特派员李芳歧的争论。机会主义者李芳歧，虽是在他算子下面发生了津浦路与胶济路的罢工，然而对于他，这是“工人运动低落”的表现。但是在省委巡视员的结论中也同样的表示出对于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他说：“认为工人害怕，不敢斗争”，这自然是右倾，“不过在津浦路中虽然现在正有斗争的可能，也有若干自动的组织，但这一路没有斗争的历史，群众受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少。我们不要忽视了，要领导工人经济斗争革命化，没有广大群众围绕与拥护，那是很难可能的”。

不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去取得广大的工人群众，去使斗争革命化，而是先要有了群众，然后能领导斗争。这不是很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吗？这种先组织后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差不多在很多地方发现过。就是中央职工部的仲篪^[9]同志也有过这样的意见。

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估计的不足，使我们的同志不能坚决的去准备罢工、组织罢工与领导罢工，使我们的同志不能深入到企业中去开展与领导罢工斗争，用最大的力量去建立工厂委员会与赤色工会以及黄色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使我们同志不能了解：

“罢工依然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罢工在整个的

革命时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罢工争斗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重大的决定的作用与意义。无产阶级不仅以罢工这个工具来击碎资本对于工人生活水平线的进攻，而且只有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才能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的斗争与失业工人运动以决心与革命的持久性。‘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区之中，不仅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因此在我们赤色工会的领导者之中流行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在经济恐慌之下，只能进行总同盟罢工或同盟罢工，而不能组织个别罢工与个别工厂的罢工是不会胜利的观点，是极端危险与极端有害的。”（中央为职工运动告同志书）

不同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估计不足以及在工会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的观点作斗争，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工作的彻底转变是不可能的。只有这一工作的转变，我们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使斗争更有持久性与组织性，使斗争走到更高的阶段，使我们的党真正变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七）

最后，我必须讲到对于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革命不平衡论，在去年赣东北苏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上，曾经这样说过：

“在目前整个赣东北群众斗争的发展中，还仍然有很大的弱点。最主要的，如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苏区周围如皖

南、浙西、景德镇、鄱阳等处的农民运动，不但没有达到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程度，即使有些农民群众的斗争亦多是自发的散漫无组织状态”。

照这一观点看来，就是在赣东北苏区内城市的工人运动与乡村的农民运动、赤区的农民运动与靠近赤区的农民运动都是发展不平衡的，而且这是赣东北苏区群众斗争中最主要的弱点。

这种观点，不但在苏区的党内，就是在白区的党内，也是同样存在的。一般的，大家认为城市的工人运动是落后于农民运动，北方的革命运动是落后于南方的革命运动。这一革命不平衡论发展到极点时，甚至说上海沪东的一个纱厂的工人运动落后于沪西的另一个纱厂，因此在上海工厂与工厂间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上海工联同志）。

河北省委在反帝运动的决议案上，认为：

“华北反帝运动有许多弱点：主要的是没有取得工人群众的积极参与与领导，学生运动的反日斗争没有同工人农民的斗争很好的联系起来。学生群众的反日情绪，大部分只表现在‘请愿’方面，未能不断的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反日斗争没有像南方那样的激烈，未能很好的转变为反国民党军阀的斗争”。

陕西省委在去年十二月七日的政治决议上说：

“目前有些区域内农民的武装斗争的政治经济客观条件是已经成熟了……同时我们特别要深刻了解目前农民运动还有许多严重弱点：农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还是没有的”。

依照这许多革命不平衡论专家看来，在北方决不能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因为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因为北方的农民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

还是没有的。如若谁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谁就是立三主义者。

我们认为这类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了解，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这种理论除了给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以辩护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

以为中国目前的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我们认为完全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在苏维埃运动方面必然要以为中国目前的苏维埃运动是农民的运动，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是农民的苏维埃。然而事实上，像《共产国际》杂志所说的：

“中国现在所存在的苏维埃（虽然它们还没有把自己的政权普及于国内的各个工业中心），无论如何，不能视为只是农民的苏维埃。如果这样看法，那么这无异于只看到现象的表面而已。还在一九二七年，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农民的要求，规定了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革命的纲领，同时又提出了根本重要的口号，如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土地给农业工人、贫农和中农，然后进而（在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决定一切的领土内巩固起来的时候）国有土地。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以及直接的派了自己的最好的队伍为红军中英勇奋斗的部队，而集中了农民散漫的游击队，造成了和造成着红军中自己的工人的共产主义指挥的骨干，造成了和巩固着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如果没有这种纪律，那么红军也许不会有最伟大的胜利了。中国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党而指导工农红军的战斗，指导苏维埃，而且在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无条件的占有了大多数”。

只有反革命的取消派，才会污蔑中国的苏维埃为农民的苏维埃，中国的红军为农民军，而不知道没有无产阶级在苏维埃

红军中的领导，就不会有现在的苏维埃与现在的红军，就不会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同时也只有反革命的取消派，才以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直接起来武装暴动之后，工人运动才算不落后于农民运动，而不知道中国革命的特点正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把苏维埃政权从乡村推进到城市，从小的城市到大的城市。

可见，以为中国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是机会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同我们的观点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

此外，这种观点在白色区域内也完全是不正确的。在中央为职工运动告同志书中，这样描写了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

“中国无产阶级最主要的队伍（上海的纺织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唐山的矿工，天津的市政工人与纺织工人，河南的兵工厂工人，津浦与北宁路的铁路工人，外洋与长江船的海员，四川的盐井工人与纺织工人）都卷入于汹涌的罢工浪潮之中。在许多产业部门之中爆发了产业的同盟罢工（上海丝厂，招商局海员，唐山五矿），在别的一些部门之中正在成熟着（上海天津的纱厂与市政工人）。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黄色工会的一致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罢工的浪潮粉碎了国民政府接二连三的禁止罢工的命令，冲破了警察的弹压与黄色工会官僚的破坏，而在全中国的重要产业中心与部门中震荡着。争斗带着极大的坚决性、坚持性与顽强性，常常转变到与警察肉搏与冲突。在某些罢工中，罢工工人甚至企图解除那些去弹压罢工的军警的武装（如吴淞、永安等）。工人阶级依着自己的团结、坚持与英勇，在许多罢工中得到了胜利或者部分的胜利（北宁路、唐山五矿等

等)，无情揭破了赤色工会中某些领导者的在经济恐慌之下罢工或一二工厂的单独罢工不能胜利的胡说的机会主义性质。在高涨着的罢工浪潮中，一切经济的争斗都带着极尖锐的政治性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在个别的城市中爆发了反日的总罢工（太原）”。

请问除了闭着眼睛胡说工人运动落后的反革命的取消派与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谁能说在白色区域内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呢？这种观点，必然会走到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发生怀疑，而向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取消派投降。

至于说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的革命运动，像现在一般同志所说的，是完全错误的。北方的工人运动，如像天津、唐山、北宁路、青岛等各大中心城市的工人运动不但不比广东、香港、武汉等地落后而且超过。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并不比江苏、浙江的落后。当然在目前，在北方，没有像湘鄂赣数省那样的苏维埃与红军，然而这种苏维埃运动也正在向着北方发展。并且红军二十四军曾经一度的在北方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事实证明，“红二十四军的失败，最明显的告诉了我们，不是在山西没有创造苏区与红军的客观条件，而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葬送”（中央三月九日给河北省委的信）。事实证明，不是陕西的“农民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还是没有的”，而是陕西的党还没有决心与勇气，去发展陕西的土地革命，去创造北方的苏维埃区域。事实证明，如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去向农民群众宣传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不去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转变到夺取土地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农民是不会单独的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

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现在是明显的提在全国党的前面。然而我们的同志却想以北方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革命运动的不平衡理论来掩盖他们对这一战斗任务的消极，想以我们党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的主观弱点与错误放到客观的身上。

当然革命发展不平衡在全中国是存在的。但这种不平衡不是在于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北方落后于南方，如像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所说的，而主要的表现在有些区域已经有了苏维埃与红军，而有些区域还没有。但是这种革命发展不平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的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特权，是因为中国各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党的基础与党的领导。譬如赣东北苏区附近农民群众还没有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起来斗争，红二十四军的失败以及北方还没有苏维埃与红军等，这许多不平衡的事实的基本原因，当然不是由于客观条件，而是由于我们党的主观力量的薄弱与机会主义的错误。

立三主义者根本不顾一切客观的与主观的条件，空喊暴动，如山东省委同志空喊创造山东苏维埃，而放弃工人、农民、灾民与士兵的工作，即为最好的例子，而同时却有些同志想以“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来解释他们自己的消极怠工。这在表面上虽同立三主义者的“左”的盲动相反，但其为机会主义则一也。布尔塞维克指出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原因时，首先就应该指出党的正确的领导与正确的策略是消灭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认识这个世界，而且要改造这一世界”。这种革命者的精神，当然同一切机会主义者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

不同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革命不平衡论作斗争，我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就不能有

坚决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动员一切力量去发展、领导与组织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配合已有苏区与红军的发展去创造新的苏区与新的红军，而只有等待革命条件的自然成熟了。

(八)

对于上面这许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或不了解，无疑的是妨碍我们党动员全党同志与千百万群众去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战斗任务的主要危险。不同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开火，我们的党决没有法子去完成我们在目前中国革命危机中所负担的重大责任。

同时为得要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为得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斗争深入到全党同志中去，我们也必须同那些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主义或者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作斗争。

对于倾向的自由主义或调和主义在我们党内也是非常严重的。在我们不少同志中间，往往缺乏一种对于倾向的仇恨与同倾向斗争的积极性，以为一点点的小错误是可以马虎过去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点，就是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调和与自由主义的态度。譬如北平同志甚至与取消派反革命分子做朋友，上海党内团内也有同志以为托洛茨基主义在理论上是还可以在党内讨论的东西。鄂豫皖苏区曾中生同志的自由主义，曾经造成了红四军内整个反革命的组织。

这种对于倾向的调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我们中央党报的编辑同志与宣传部的一些同志，有时也不免表现出来的，像猷新同志的《论中国革命转变》的文章，包涵有许多严重的非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甚至有些地方偷运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然而布报的编辑者却“马马虎虎”的把它发表出来了。贯雷^{〔10〕}同志的“世界经济恐慌”的小册子上也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在有些地方偷运了立三主义的私货，然而我们却不加任何注解，而把它出版了。此外有些含有个别错误的一些文章，我们也没有能够加以详细的审查，而把它们发表了出去。这种现象当然绝对不能再行继续下去！

为得要使全党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有明确的了解，使他们为了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我们必须要绝不调和的同一切这些机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在斗争中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理论水平与警觉性，以巩固党在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使我们党能够领导全中国千百万的群众向敌人实行胜利的进攻。

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即余泽鸿。
- 〔3〕即胡均鹤。
- 〔4〕指马占山。
- 〔5〕指邓拔奇。
- 〔6〕指刘少奇。
- 〔7〕即卢福坦。
- 〔8〕指黄平。
- 〔9〕即刘少奇。
- 〔10〕即沈贯雷。

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 岩永今后工作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

恩来同志：

1. 龙岩胜利，差员答复。赣州撤退□□，入漳应有一战，若能消灭张贞大部，便是剪除粤敌一翼。

2. 昨日胜利原因是：

甲、白砂休息一天，团结兵力。

乙、不顾坎市，直取龙岩。

丙、大池宿营，不去小池，击敌不备。

然未置全胜，则四十五师解决敌之前哨过缓，否则敌□八团及其旅部可望全获。

3. 在此地驻两天，会合九师即直下漳州。

4. 岩永工作，应站在迅速造成战场的观点上去做，因此要加强领导，加以红军主力在前方，总政治部似宜移到龙岩，总经理部应迅速移龙岩管理运输，并做衣服。

5. 十二军除任争取杭武外，还须侦察大埔、平和敌情，此点关系甚大，已要谭震林亲率电台并一团人去永定，向埔、和游击，时通消息。

6. 黄任寰有人赣南说，到寻乌的似即该部。粤闽边界似由黄质文守备。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

我军人漳，必能诱动该敌。

泽 东

十一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

各苏区党部：

帝国主义从隐秘的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火、军费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公开的武力干涉与完全瓜分中国的政策，国民党政府的无耻的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新的伟大的胜利及它在群众间的威信的增长，开展了中国的千百万劳苦群众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斗争的新的阶段。这在中国共产党以及他的光荣的英勇的苏区的组织面前，提出许多伟大的历史的政治任务。

中央曾经屡次着重的指出：“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日渐崩溃，促使帝国主义者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费、军火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公开的武力干涉，这便产生了日本的武力占领满洲的事变。同时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目前的形势显然是：在反对苏联的战争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它们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的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冲突与矛盾。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公开的压

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策略的中心。对于中国劳苦群众之掠夺与瓜分中国是在急剧的进行。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将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的武力广大的武装冲突的历史是在面前”（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决议）。事变的发展完全的证实了这个分析的正确。

掠夺中国，瓜分中国，将中国殖民地化的战争，正在进行着。不仅满洲的广大的旷原，践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无数千百万的中国的及满洲的劳苦群众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之下流血死亡；而且在中国无产阶级中心的上海的闹市中，彻响着七十五生的大炮的雷鸣，人烟稠密的闸北、吴淞变成一片焦土；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不仅在满洲与上海的近郊横暴地屠杀着中国劳苦群众，并且大量的军舰与军火向着接近苏维埃区域的口岸方面集中。在上海、汉口、汕头、福州、九江及其他政治与军事的要点，齐集着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准备任何时候进行“必要的保护侨民”的紧急举动，帝国主义直接的武力进攻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危险是异常的紧张起来了！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哈尔滨之后，更进的向着苏联的边境进发，炮火在苏联边境上震响着。白俄的组织积极地活动，他们公开的声音，在日本的帮助之下企图夺取远东的边境各省，组织“中立”的国家。环绕在中东路及其他问题周围，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政策层出不穷。苏联政府提出的缔结日俄互不侵犯的条约，日本帝国主义六个月不给任何回答，日本政府的领袖人物公开的主张进攻苏联的战争。所有这些证明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

一切帝国主义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行为的助手，它们一致的赞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压迫中国革命运动，并鼓

励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反苏联的军事冒险，虽然在它们内部为着分配中国的富源上发展着极紧张的冲突和矛盾（首先在日美之间）。但是，美法英意各国的战舰，竞争似的向着中国的重要的工商业及无产阶级中心集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共同的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帝国主义军队的调遣，明白揭露它们一致的进攻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阴谋，揭露它们包围和封锁中国苏维埃的企图。在上海“和平会议”的幕后及伦敦四强会议的讲价中，清楚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疯狂般的进攻苏联的准备。

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国民党的统治，最无耻地屈服与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污辱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不仅对帝国主义不敢作任何的抵抗，而且在进行无耻的出卖满洲与上海。举行着的上海“和平会议”与建立上海自由市的计划，最清楚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它们不仅断送了满洲与上海，并且正在进行出卖全中国的劳苦群众给帝国主义强盗奴役剥削和屠杀。对于中国劳苦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国民党统治采取了血腥的屠杀政策，枪杀反日的民众，封闭民众的反日团体，拘捕和枪杀反帝争斗的战士；对于帝国主义者它们完全的屈服、投降，答应一切日本强盗的蛮横的要求，向着国际联盟——瓜分中国的组织者、强盗战争的准备者——乞求，向着帝国主义强盗的巨头——美国帝国主义哀求主持公道。国民党统治是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是国际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清道夫，同时它们更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来进攻中国苏维埃。屈服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国民党卖国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在中央苏区方面，南京与广东的统治者调动了新的十几师的兵力，在进行一致的共同的进攻。在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苏区方面，国民党同样的以全部力量来向着已经脱离帝国

主义羁绊的苏区与唯一反抗帝国主义到底的工农红军进攻。

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的广大的劳苦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有力高涨。帝国主义的积极的侵略与国民党的出卖中国，引起了广大的劳苦群众的忿怒、憎恨，走上保卫中国的完整与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吸引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贫民的参加。有力高涨着的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给了这个运动以坚决性、持久性与胜利的信念。红军和苏维埃的胜利，鼓励国民党区域中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增长，指出了脱离帝国主义羁绊与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反帝国主义运动走上民族革命解放战争的道路。与红军的积极行动相应着的，是关外的义勇军的英勇的战斗和上海十九路军士兵的自动的抵抗日本的进攻，虽然由于这些队伍的失败主义的领导及卖国的长官，而没有能够得到胜利。然而，它给全国的劳苦群众指出了，在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千百万的武装的民众将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他能够战胜帝国主义者，求得中国的完全的独立、解放与统一。红军和苏维埃的威信是大大的增长了，广大的劳苦群众逐渐的了解，只有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是能够抵抗帝国主义进攻与保卫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力量。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党的任务：便在用一切力量开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及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瓜分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统一。号召、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民来消灭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消灭这个反革命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权，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从这里，在苏区的党的组织面前放着极端重要的光荣的任务：

一、领导工农红军与千百万的劳苦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族的革命战争，巩固现有的根据地，利用目前有利于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发展的形势，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斗争。为着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十倍的加紧扩大红军及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使每一个劳苦群众及红色战斗员了解：只有在土地革命产生起来的、得着千百万劳苦群众热忱拥护的工农红军，是唯一的能够统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及保障中国民族解放的力量。使他们了解：帝国主义者是三次“围剿”苏区的主要的组织者与指挥者。使他们了解：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力进攻苏区的危险。使他们了解：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土地革命的胜利是不能巩固的。扩大红军，增加一倍红军的数量，应该成为每一个苏区的战斗的任务。应该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几千几万劳苦群众加入工农红军”的口号之下进行最广大的群众运动，应该在“保卫土地革命的利益及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战”、“击溃阻碍工农红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一寸苏区不让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队蹂躏”、“扩大苏区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等口号之下，来粉碎敌人的进攻与进行革命的进攻，尽量的扩大苏区，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二、巩固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及各省的苏维埃政府，使得全国反帝国主义的群众得到领导政治中心与鲜明的旗帜。要坚

决地实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土地的、劳动的法令，使着广大的劳苦群众更明白感觉到只有苏维埃政府是真正的唯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是解放劳苦群众的政府，而更加增加他们消灭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统治的决心。苏维埃政府应该用一切力量来结合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争斗，帮助国民党区域中的一切罢工运动、灾民争斗与士兵的争斗。每一个苏维埃区的政权应该成为环绕着他的国民党区域的群众争斗的领导的政治中心，帮助这些区域内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日常经济争斗，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为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而争斗，为着民族解放而争斗，为着苏维埃政权而争斗。

三、在苏区之内，应该进行最广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应该最残酷的揭露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面目。应该向红军战士及劳苦群众说明，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满洲的占领、上海战争及帝国主义军舰集中在附近苏区的城市是来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镇压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帝国主义者过去是以供给反革命军队军火、军费、军事顾问组织反革命的进攻苏区来干涉中国革命，现在因为国民党军队屡次惨酷的失败，他们准备直接的武力干涉中国革命；说明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是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每年费几万万的钱所养的军队，不去与帝国主义作战而来进攻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得到了解放的苏区，与真正的反帝国主义的武力——工农红军；说明只有苏维埃和红军是真正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是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及保卫中国与民族独立的力量；说明在苏维埃政府组织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解放战争，有着最广大的劳苦群众的参加和拥护，是能够战胜帝国主义与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解放的。

四、应该在这种宣传鼓动的基础上来战斗的动员与组织苏区中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应该广大的发展反帝国主义同盟的组织，坚决地实现去年中央关于反帝同盟的决议。同时应该以最大的力量来发展与创立苏区的工会与贫农团的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是保护工人、雇农经济利益的机关，而且应该成为组织和领导苏区的反帝运动的骨干。党和团的组织应该更大的发展，吸收新的几千几万的工人、雇农入党和入团。群众的武装组织赤卫队与少先队尤其应该广大的发展起来，并战斗地动员起来。

五、在今年的红色五月中应该进行最广大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应该与拥护苏联和红军的总动员，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密切地联结起来，应该组织广大的有力的苏区的武装示威与附近白区中的示威与游击行动，应该组织一部分红军与地方武装的检阅。红色五月的运动应该加紧地进行工会的工作，使他得到真正的转变。要反对一切忽视苏区工会工作的机会主义观点。在红军中，红色五月应该是用来加强红军的战斗力，扩大红军与提高红色战斗员政治水平及开展胜利的进攻。

为着实现上面指出的任务，必须真正的开展两条战线上的争斗。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这些右倾机会主义是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危险，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轻视中国革命的民族解放的任务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苏区的危险，不相信工农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于庸俗的保守主义，甚至个别的情况之下，提议解散红军编为游击队，实际上这是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完全的投降。同时对于“左”倾机会主义亦不能

一分钟的放松。这些“左”的机会主义表现在：以“左”的空话来掩饰机会主义的消极，忽视国民党进攻苏区的危险，以为国民党已经不是苏维埃运动的正面的敌人。只有对着这些倾向尤其是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才能够使苏区的党完成历史放在他身上的任务！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宣布对日战争宣言^{*}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与其各派军阀，本其投降帝国主义的惯技，接连的将东三省和淞沪各地奉送于日本帝国主义，任其随意屠杀中国人民，现更借和平谈判，实行出卖整个中国，促进各帝国主义迅速瓜分中国。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则尽其压迫之所能，解散反日团体，压迫反日罢工，屠杀反日群众，强迫自动对日作战之淞沪兵士和民众的义勇军撤退，用机枪扫射抗拒撤退命令之十九路军的英勇兵士，以表示其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他们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只能倚靠某一派帝国主义反对另一派帝国主义，企图挑起世界大战，以便帝国主义强盗在大战中来解决瓜分中国问题。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国民党军阀则宁肯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红色中华》。

将东三省上海及整个中国送给帝国主义，对于真能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之中国工农红军，则不断的以其最大的军力来进攻，企图消灭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这明显表示国民党政府和其各派军阀的一切欺骗，无非想掩饰其出卖中国、污辱中国民族的行为，实际都是帝国主义直接压迫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工具，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进行的障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直接的毫无障碍的与日帝国主义作战，才能使民族革命战争在全国大大的发展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所以不推翻国民党统治，就不能实行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正在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摧毁国民党的统治，这正是实际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直接对日帝国主义作战的前提。我们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成立工农红军。要认识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领导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是真正实行民族

革命战争的民众武装；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苏联，才是真正能联合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力量。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的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区各地自动武装起来，推翻反动的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建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红军，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苏联，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进攻上海以来，苏维埃中央政府迭次宣言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将东三省完全殖民地化，上海事变将成为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中国的具体表演，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只有更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镇压全国民众的反日反帝运动，绝对不会有任何真正求得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抗日行动。现在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估量的正确。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上海的和平谈判，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上海、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由于英勇士兵自动对日作战的压迫、不得不以抗日相欺骗的某些国民党军阀，现在也都原形毕露：马占山做了满洲政府的军事部长，蒋蔡^[1]等军阀参加了帝国主义瓜分上海的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更是随时都准备接受国际联盟宰割中国民族的指令，他所谓“长期抵抗”的宣传，一方是以此来欺骗全国反日的民众，另一方是企图以此来取得别一派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而挑起世界大战，好让帝国主义强盗在大战中来解决瓜分中国问题。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几月来的最努力的，还是秉承帝国主义意

旨，在各地解散反日团体，压迫反日罢工，屠杀反日反帝群众，用机关枪扫射自动抗日的英勇士兵，并严禁民众义勇军的活动，特别是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更是用最大的兵力来对付。这一切，都表示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完全是帝国主义直接压迫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工具，他们不但永远不会进行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并且是民族革命战争进行的根本障碍！

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现在全中国被压迫民众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之下已不甘受国民党的污辱，愤起为反日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实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革命任务起见，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向全中国被压迫民众指出：苏维埃区域久已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国民党军阀却在帝国主义的领导和指使之下，绝不放松的向苏区与红军进攻；要不是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所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现在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向外夺取中心城市，摧毁国民党统治，正是实际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直接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色统治各地要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直接对日作战，并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士兵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的军官，自动对日作战，成立工农红军推翻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成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

政权；这样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因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除以通电宣言发表这一对日宣战的主张和行动方针外，更对全国工农红军、全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给以下列的指示：

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苏区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即军事部）应对于全体红色战士实行对日宣战的动员，要使每一个红色战士都能了解：积极发展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的部队，向外夺取中心城市，摧毁国民党的统治，正是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前提。国内革命战争愈发展，国民党军阀愈崩溃，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机将愈迫近，全苏区红色战士应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动员对日宣战，绝不是要等到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开火时才做，并且现白色统治沿海各地的英勇士兵与民众义勇军久已不受国民党军阀的指挥，自动的对日作战了，他们迫切的需要苏维埃和红军的领导与援助，所以动员对日宣战与积极向外发展革命战争绝不能割裂开来，而应认为动员去发展革命战争，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就是给白区反日群众和英勇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军事的动员要做到每个红色战士非因伤病不能离开队伍，开小差的要受到惩罚与群众的耻笑。地方武装要执行红军中一样的纪律，不脱离生产的赤卫队要加紧军事训练。军事委员会要宣布和检查全苏区的赤色戒严，要加增兵工厂的生产，要在交通要道设立粮站与运输站，要屯集一部分谷子准备米荒，要节省经费准备战役的持久，要在发展区域的边境设立向外推进的警戒工事，要准备筹款的武装队伍（政府的税收自然主要部分也是供给红军），使主力红军得以继续其作战的任务，要组织大批游击队从苏区各边境向外发展，

在接近中心城市与帝国主义势力直接统治的地方，可由游击队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实行游击行动。

二、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应在红军与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要在《红星报》及其他红军刊物上经常不断的揭露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瓜分中国、屠杀和榨压中国民族与国民党出卖中国、污辱中国民族的事实，激励起全体红色战士对日宣战的热忱与勇气，鼓动起他们向外发展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阀及其统治的决心。并要编印各种小册子和画报，要提出联系到目前实际行动的宣传鼓动口号，特别要注意于红军新发展区域尤其是接近中心城市的地方的政治工作。

三、当着工农红军还未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红军的作战任务首先是要消灭与帝国主义勾结一致的国民党军队。放着当前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不去消灭，这是给国民党军队配合帝国主义武装以消灭红军的极便利的机会，这是紊乱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步骤，而不是真实的去进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当着红色游击队向外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则应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自动的武装起来，实行游击运动，直接对日作战，吸引白军士兵，自动对日作战，共同组织指挥这一行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脱离和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

四、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首先要加紧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向外发展革命战争，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要动员全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首先是加入不脱离生产的赤卫军和少先队，要使全苏区劳动群众不论男女，都有接受军事训练准备对日作战的热烈要求。要努力动员执行巩

固苏区根据地的工作，要加紧实行赤色戒严与地方自卫，要节省经费粮食帮助红军，要屯集公谷供给红军，要动员群众努力耕种充裕今年收成，要整理赤色邮政厉行修桥补路以巩固苏区交通，要立即征收累进的商业税准备收土地税以开辟政府的收入，要动员工农劳苦群众，提高红军用品的生产（如制造被服、鞋帽与兵工厂的生产等），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劳队帮助红军作战，实行红军优待条例，帮助红军家属耕田，耕种红军公田。

五、这一训令一直发到工农红军地方武装的下级组织与城乡苏维埃，要根据这一训令定出自己的动员计划，中央革命军委会更应发布自己的动员计划。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英

张国焘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光鼐、蔡廷锴。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上海三次暴动 宣传大纲”暨“红五月口号” 错误的声明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九日)

党报编辑部同志：

三月十八日本部所发的上海三次暴动宣传大纲与四月一日所发的红五月口号，有下列的政治错误，应当指出：

一、宣传大纲上的错误是：

(一) 在大纲第一段说到“当前的任务”时，完全没有提到拥护红军苏维埃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围剿”的任务，这是不可允许的错误的。因为这个任务，是目前最迫切而最基本的任务之一，不把这个任务明确的提在第一位，那就忽视了目前纪念三次暴动的最大的一个任务。虽然大纲的最后一段说到“我们的具体任务”时，也说到“我们应当特别加紧拥护红军的宣传”，但是首先没有把这个任务当作是“当前的任务”，那就不明了何以“应当特别加紧”了。

(二) 在大纲中说：“在红军保卫之下的苏区，再没有地主资本家存在”，这种说法是不对而且有害的。不错，在平分土地的口号正确实现与土地革命获得彻底胜利的地方，就没有地主阶级存在了。但是我们绝不能说“再没有资本家存在”，因为现在我们并没有提出消灭资产阶级、富农阶级的口号，哪里

会没有资本家呢？而且事实上资本家也是存在的。像大纲上这样说法，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会使人忽视苏区反资本家与反富农的斗争与对于苏区阶级斗争的领导。所以，这种说法是有害的。

（三）在大纲中认为“这次暴动……是技术上完全成功的一个例子。……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不可多得的模范”。这样一来，把三次暴动的技术上的准备估计得太好了。这样一来，把大纲第六条所说的以及其他技术上准备不充分的事实，完全抹煞了。这样一来，使我们以后准备胜利的上海四次暴动及其他的暴动，只限于学习这个“不可多得的模范”就够了！这样的过分估计，使我们不能正确的研究这次暴动的教训，去教育群众，指出如何去准备将来胜利的四次暴动。这样的估计，掩饰了当时党内对于这次暴动的机会主义领导，对于暴动没有充分准备的错误。这种过分估计，应当坚决纠正的。

（四）在大纲中对于当时的上海市民政府，估计成为“工人领导的革命的上海市政府”，“上海工人领导的革命政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这种估计是过分的。因为在当时的上海市民政府中，无产阶级虽然有绝对必要与可能去领导这一政权，排除动摇畏缩而且反动的资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影响，使这一政权真能够保护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和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以至形成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但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没有而且不愿意使无产阶级得到领导权，反之，他们极力要请出大资产阶级来领导，使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劳苦群众的在血战中所创造出来的组织、所得到的胜利品，拱手送给无产阶级的敌人。所以当时的市政府，不论在政策上，在行动上以及阶级成分的组织上，都不能表示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像大纲中那

种说法，实是掩饰了当时断送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领导，这是很大的政治错误。

二、“红五月口号”中的错误是：

(一) 在宣传部所发的“红五月口号”中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实现五一、五卅全国总同盟政治罢工”。这个口号，在目前显然是立三主义的空喊，与中央所提的口号没有相同的地方。在上海事变的前夜，中央曾提出“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作为主要的政治行动口号之一，在当时这个口号对于上海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工人在要求年赏等切身问题与反日的斗争上是严密的配合着向前发展的，并且沪西已经爆发了几个日本纱厂的罢工。失业工人与灾民不断地聚集到马路上来，形成极端骚乱状态。反帝运动日趋紧张，群众示威，打退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企图，士兵群众也自动起来进行坚决的反日战争。在上海，国民党的统治在群众革命的怒潮中，表示了充分的无能和摇动，所以在这样形势之下，总同盟罢工的口号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上海的这种总同盟罢工后来没有实现的缘故，主要的是由于工会中的机会主义领导，对总同盟罢工消极怠工，而并不是什么客观的原因。可是，现在形势已经变了，在饥寒交迫与国民党工贼的压迫欺骗之下，一部分工人已经复工，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革命的步伐也更加一致了，战争的显明的状态目前也不存在了。所以目前总同盟罢工的口号应当取消。宣传部不仅没有了解这种情形，并且把这总同盟罢工的口号普遍到全国范围中去，空喊“全国总同盟政治罢工”，这样必然要放弃真正组织罢工斗争的任务。当然我们不否认某些产业部门（如上海的纱厂等）同盟罢工形势之存在，但不能因此提出上海总同盟罢工，或甚至全国总同盟政治罢工。宣传部这种错误口号应当马上纠正，应当提出“罢工、示威纪念五

一、五卅”的口号来。

（二）在红五月口号中，忘记了“沪西的反日罢工运动”。这个错误与前一错误有密切关系，因为既然空喊全国总罢工，就必然要走到忽视真正的罢工斗争。领导与扩大罢工，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因为只有努力完成这一工作，才能实际完成目前许多最中心的政治任务。如反对进攻苏联，反对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拥护苏区和红军，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这一切，都必须从组织与扩大罢工斗争做起，并且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中心政治任务在斗争的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保证其彻底完成。沪西的反日罢工，就是目前领导罢工运动的中心工作，因为如果放弃这个包含几万人、坚持二三月、具有这般明确的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意义的斗争，则所谓领导罢工毫无疑问的只是空谈而已。所以红五月口号单上没有提到这点，这决不只是简单的忘记，而是根本忽略我们中心任务的右倾机会主义。

中央宣传部所犯的这些严重的错误，表示它对中央政治路线是动摇的，对偷运私货的同志也未能作彻底的斗争，对于党提出的无情的两条战线斗争不能坚决执行。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现象。中央组织局所提出的严重批评和在组织上的相当警戒，我们是完全接受，并决心在以后工作中来了解和改正自己错误，为中央的正确路线而斗争，利用这一经验彻底转变自己的工作。

中央宣传部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 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

一、在空前的灾荒与农民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陕甘边的赤色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英勇战斗中得到了许多新胜利，而且日益壮大起来，他正走向与三原的农民武装队伍汇合起来而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陕甘边农民游击队的英勇的战斗与胜利，粉碎了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北方落后论”，给了“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争斗的勇气和决心”的机会主义的胡说以致命的打击，证明了党提出的“要在这些武装争斗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去发动那边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在北方，更要特别注意兵变发展的区域，使这些兵变配合着当地的农民与工人的斗争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中央九月二十日决议）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

二、估计到目前陕西的农民反抗捐税、反对高利贷、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土地、灾民分粮抢粮的斗争普遍与紧张，估计到陕西士兵的哗变的潮流的增涨，估计到陕甘游击队及三原农民武装队的力量及该区敌人武力的薄弱，最后估计到全国革命危机的成熟，应该清楚的提出：在积极的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

三、为着实现上面的任务，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开展。”这在今天陕西的经济与政治的环境中是更加明显与迫切的。“红军的社会成分应当是工农的，主要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要有坚决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着，要有最靠得住的指挥者，要有铁的纪律。”因之，在组织陕甘边的经常的红军时应该注意到：A. 以武装农民为新的红军的主要的成分，最大限度的吸收贫农和雇农参加。陕西省委必须从西安动员大批的工人群众去参加红军，建立在这部队中的工人的骨干。B. 从游击队中选拔最可靠的党员与工农分子来担任红军的指挥员，即刻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红军行动，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即刻开始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C. 立即开始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指令可靠党员为政治委员与政治指导员，实现中央制定的红军编制、政治工作、政治委员、政治部、党和青年团的各种条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是红军中苏维埃政权与党中的代表，他对于部队的纪律、政治觉悟与战斗力的加强等等与军事指挥员负同样的责任。党的团的组织的任务是提高红军战斗员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的纪律与战斗力，他们应该在政治委员的指导之下工作。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D. 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一师（按照红军编制法，即该师应有三团，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期间达到红军二师。该部队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E. 红军的军械军需及给养的补充的来源，只能把军阀的军队作目

标。为着这个目的，可以而且应该实行游击敌人后方的辎重队和交通队。

四、在目前游击队行动的区域中，必立即彻底的执行下列的任务，以便将这个区域造成红军与游击队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些任务是：A. 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他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之下分得一份劳动的土地。土地应该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平均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顾念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念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及租税应立即废除。B. 彻底的摧毁当地的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应该从当地的群众组织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的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革命委员会必须宣布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一切决议与法令，并努力实现这些法令。他应该根据苏维埃的组织法来组织乡、村、县以至全边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在苏维埃政权之中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及党的领导。C. 解除边区内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武装，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组织农民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这些队伍的任务是与苏区内部的反革命作争斗，保护苏区边界，参加一般的政治和组织的工作，他们同时应该是补充红军的后备军。迅速的彻底的实行上面的任务，才能创立真正的巩固根据地——目前游击队的行动的区域三水、正宁、三原这一带，有着建立这样根据地的优点（农民斗争的紧张，与三原、长安等中心城市等等），应该首先巩固这

一带区域作为我们陕甘边苏区向前发展的根据地。

五、经常的红军部队与巩固的根据地的创立，绝对不是说要来取消或减弱游击战争的开展，相反地，应该用更大的力量开展这个区域及其附近的游击队的行动。要记得，如果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没有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的胜利的。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苏维埃运动的开展与苏区的巩固的保障，因之，在三原、同官、蒲城一带去开展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为迫切的任务。游击队的主要任务，要在敌人后方动作，消灭敌人的小部队夺取枪械，发动当地的农民斗争摧毁反动的乡村或县城中的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等等。游击队应该是土地革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游击队应该吸收当地的农民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并努力从游击队生长成为正式的红军。红军的指挥员应该努力指导游击队的动作，并将他与红军的作战任务联系起来。红军的动作在任何情况之下（进攻或防御等）都应采取绝对的积极性，在目前对于敌人（井岳秀、民团等）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但是在今天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如省委的提议），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能胜任的。这种情况，在将来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的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但是在今天是不适合的。红军目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二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的力量，创立较大的根据地。

六、红军的基本任务：除了以武装对付国民党的军队之外，还要用红军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去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联欢会等等去夺取白色的士兵群众，并应该派遣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他们投入红军。这种工作要与红军的武装战斗同时并进。同时中央责

成陕西省委去加强在杨虎臣及其他军阀的中心部队中的我们的工作。

七、在苏区及红军中建立强固的党的委员会与党的组织上的中心任务。这些党部要能够保证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游击队与红军和区域内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的领导。中央责成陕西省委及中央组织局采取必要的办法来加强陕甘特委的领导，现在的渭北特委应该移到苏区中去。在红军根据地与游击队的区域中，应该最大限度的发展党的组织，吸收雇农、贫农及优秀的中农分子入党，严格的防止富农及阶级异己分子混入政权机关及党内来。最大限度的加强党员群众的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使党的队伍能够适合于向前发展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环境。必须立刻在这区域建立群众的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的组织，发展他们工作上最大限度的积极性。中央责成团中央及陕西省委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来创立这区域中的团的组织，并改换与加强团西安市委的领导，应该考虑建立强有力的团的陕西省委的问题。党及一切群众组织应该在深入土地革命、创立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及扩大红军及游击队上，发展其极大的积极性，应该利用其他苏区的经验来进行广大的拥护红军扩大红军的运动（慰劳、收集粮食、打草鞋、动员到红军中去等等）。

八、陕西省委必须以最大的力量来开展西安等中心城市中的工人的罢工运动与反帝运动，及蒲城、富平、渭南、凤翔的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动，组织士兵的革命兵变以及灾民分粮抢粮的斗争，“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的发动，这在非苏区之中不但是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陕西省委及陕西党的组织必须十倍的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对于目前情势的估计不足，认为陕西没有发动游击

战争与革命兵变的可能，认为“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政权及土地革命争斗的决心和勇气”，忽视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等等。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能够顺利的克服这些部分的动摇游疑，而在坚决的实现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在光荣与勇敢的斗争中，创造成新的广大的强固的陕甘边苏区与英勇的红二十六军！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今后中心 任务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恩来：

1. 南靖一战，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因此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

2. 粤敌有从永定、平和或诏安入闽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期向北杭、武、岩、永四个全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以期迅速入赣北上。

3. 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

4. 已与邓子民^[1]见面，据云：南靖、平和、云霄、漳浦、龙溪五县相交之龙溪圩，距漳州八十里，有一红色游击区，群众约四万，漳州南乡有一个六十人的红色游击队。现决以龙溪圩为中心，向南、平、云、浦、龙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其他白区的工作纲领是：（1）公开宣传。（2）秘密组织。（3）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漳州

是否建立临时政权机关，以资号召，待数日后看群众斗争情形及环境需要而定。反日宣言速颁示。

泽 东
二十二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邓子民，可能是邓子恢、蔡协民之误。

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刘 少 奇

“建立阶级工会”这一口号，在各苏区都提出来了。但是执行这一口号，首先就要确定加入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必须是工会的组成分子，尤其是他的领导成分，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成分，然后才能保证工会的阶级路线的执行。现在各苏区的工会，都发生了这一个问题：哪些人是应该吸收入工会的？哪些人是应该从工会中清洗出去的？因为中国乡村中间的复杂情形，和乡村中间许多半无产阶级的成分，及苏区土地革命后的情形的变动，把苏区许多同志的脑筋弄糊涂了，各个苏区的工会对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不一致。这里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态度，来辨别乡村和小的城市中的劳动者，哪些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这里，我们不说到阶级地位很明显的工厂、作坊、矿山中的工人，也不说到“驱逐资本家、富农、地主残余、和尚、道士及 AB 团等出工会”的口号，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不同的意见。

在过去全总的文件上及现在各苏区来的文件上，都可以看到“独立劳动者”这个名词；并且认为“独立劳动者”不是工人，是小资产阶级。因此，一致的提出“驱逐独立劳动者出工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五月二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三十九期。

会”的口号，和驱逐 AB 团、富农、老板出工会的口号列在一起。只有湘鄂西总工会决定“独立劳动者”加入工会，因此，洪湖不雇请工人的独立捕鱼的渔民，也加入工会。此外，在鄂豫皖总工会正在清洗所谓“中农工人”及“富农工人”出工会。在赣东北及中央苏区对于雇农苦力在分得土地以后是否应该退出工会这一问题，不能解决。在中央苏区还提出了驱逐“师父”出工会的口号。

所谓“独立劳动者”所指的是一些什么人？这在许多文件上都没有明显的界说过。湘鄂西的同志们是把一切个人独立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看作“独立劳动者”，渔民、手工业者以及贫农、中农都是。但是这就没有理由允许这些人都来加入阶级工会。中央苏区的同志们对于“独立劳动者”的界说，可以在下面一段文字中看出来：

“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组织，彻底洗刷非阶级分子出工会，这里对于独立劳动者要有明确的划分：只是自做自卖，以及沿门卖工，中间不经过资本家剥削的，是不属于独立劳动者（如裁缝、剃头、木匠、泥匠、篾匠中之一部分的个人劳动的），不是工人，不能加入工会；只有资本家的工厂，老板的作坊、工厂中，卖劳动力换工钱的方算工人。要从阶级上去团结工人群众，才能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

这里是把一切“沿门卖工”的个人劳动的裁缝、剃头、木匠、泥匠、篾匠等手艺人，都看作“独立劳动者”，不是工人。凡不在“资本家的工厂，老板的作坊、工厂中，卖劳动力换工钱的”都不算工人，都不能加入工会，要彻底洗刷出工会。这样一来，如是散在乡村和城市中间的手艺人、雇农、苦力、短工等，都要被驱逐于工会之外。工会里面只留下在“资本家的工厂，老板的作坊、工厂中，卖劳动力换工钱的”

工人（连在苏维埃企业，国家机关做工的工人都除外了）；同时又说：在苏区简直没有什么工厂作坊，工厂作坊都关门了，资本家老板都跑了。如是，工会就只有取消。这当然不是什么阶级路线，而是雇主喜欢这样做的。

我以为凡属“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都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都应加入工会；不管他出卖劳动力的形式怎样（整年整月的卖，或是一天一天一刻钟一刻钟的卖；卖给工厂作坊固定的主人，或者是零碎卖给其他的个人；很多人集体的出卖，或者是散在乡村中个人的出卖），或者还有很少的自己的工具，作为他出卖劳动力的必需的条件（他有自己的工具，不是为着经营独立的生产，而是为着便于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为他没有资本，没有原料，没有地方出卖商品，单有自己很少的工具，还是不能从事独立的生产）。

散在乡村中的裁缝、木匠等，天天带了自己很少的工具，到雇请他的人家去做工（即所谓沿门卖工），原料是雇主的，缝好的衣，做好的台子（生产品——劳动的结果），也交给了雇主（不是属于他自己所有），得到了工资的报酬（年底月底或当日付给，或者是货币，或者是自然品）。这难道不是卖劳力的工人吗？是工人！

乡下的散漫的剃头匠，天天到农民家里去剃头，有时就在他自己的家里给人家剃头。结果他得到工资（哪怕怎样零碎），靠工资过活。他也是工人。

乡村中及小城市里面的小车夫、挑脚、抬轿的苦力，他们也有自己的小车和扁担等，但他们也是十分不固定的出卖自己的劳力，只要他们主要的是靠着替人家挑脚、抬轿和推车的收入来过活，他们也是工人。

乡村中的泥水匠、建筑工人，是乡村无产阶级重要的一部分（除开极少的包工头外）。我们完全不能设想世界上会有“盖好房子出卖”的泥水匠和建筑工人，盖房子和建筑工程是可以由“个人劳动”来“独立生产”的（除开小的修葺）。但是中央苏区的同志们认为泥水匠是“独立劳动者”，要“驱逐泥水匠出工会”。这难道不奇怪吗？

我们应该明白的认定，乡村中“沿门卖工”的那一部分“个人劳动”的裁缝、剃头、木匠、泥匠、篾匠等，有许多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是无产阶级的成分，是应该加入工会的。中央苏区的同志们认为这些人都是“独立劳动者”，都要驱逐出工会，是错了的。这些“沿门卖工”或零碎卖工的工人、雇农、苦力，就不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吗？不然，一样的是要受到雇主的剥削的，不管雇主是什么人。

但是乡村中间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必须注意下面的几种情形：

一、乡村中有许多木匠、篾匠、鞋匠、裁缝等，他们一方面出外替人家做工，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家里生产一些商品出卖，或者做一些“定货”，或者还有自己的一块土地自己耕种。这些人的阶级地位，的确是不明显的混合的。那就应在个别的情形下面来辨别他们。如果他们的收入主要的是靠替人家做工出卖自己的劳力得来，就应加入工会。如他们的收入是主要靠出卖生产品或做“定货”，或经营土地得来，出卖劳动力只是附带的，就应加入手工业者联合会或贫农团。同样的半无产阶级雇农（他生活的来源主要的是出卖自己劳力得来，经营土地只是附带的），应加入工会。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他生活的主要来源是经营土地得来，出卖劳动力只是辅助的收入），就应

加入贫农团。

二、在乡村中有很少一部分手艺人，虽然他们自己也到人家去做工，但是对于同行伙计进行一种“工头式”的剥削，又剥削学徒，或者还做“定货”，还出卖生产品，或者经常向人包工，做包工头，剥削伙计。比如甲的手艺很好，资格也很老，乡下的人大家都要请他去工作，徒弟都要向他学手艺，如是他有很多徒弟，有很多雇主，有工做不了，他就相当的“垄断”了乡村中的雇主。同时他的同行伙计乙，因为手艺和资格都不好，很少人去请他做工，他就常常闲着没事做。这种情形就使乙去找甲，跟甲一道到甲的雇主那里去做工，即所谓“做甲的雇主”，如是甲就从雇主那里把乙的工资领来，再付给乙，甲就从中剥削一部分（约十分之一二）。同时因为甲有很多学徒和伙计，他常常从雇主那里包些工作来在自己的家里做。甲又有机会去买些原料来做些“定货”，或生产一些货物出卖。如果有比较大一点的困难一点的工程，雇主总是要找甲去计划和指挥，或包给甲（因为他是有了信仰的），如是甲就常做包工头。这在乡村中的裁缝、木匠、篾匠、泥水匠中是常有的。我们或者把甲这类人叫作“半工头”。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一定对伙计有剥削的。比如当甲忙不开的时候，甲可以请乙来帮忙，当乙忙不开的时候，乙又可以请甲来帮忙。在泥水匠中有时是甲做包工头乙做伙计，有时又是乙做包工头甲做伙计。工会在乡村中要反对这种“工头式”的剥削。苏区工会更应根据劳动法来消灭这种“工头式”的剥削和包工头。因此对于这种带有很多“工头式”的剥削的，又剥削很多学徒的，或者经常向人包工的“半工头”，在目前是不允许他们加入工会的，即令在苏区这种剥削消灭以后的一个时期。

三、在乡村经济中及城市中还有其他一部分劳动者，虽然

他自己也劳动，但他同时又剥削伙计。如城市中的理发店的主人（伙计并不是雇请来的，伙计赚来的钱与老板是四六分账或二八分账），有些成衣店的主人，有些运货物的大车、帆船、驳船的主人（有许多也是四六分、二八分），在湘江和赣江有些小码头上的老码头工人（霸占了两根三根“扁担”，常常把自己的“扁担”租给别人），城市里有些洋车夫、小车夫（他自己有一辆车，自己拉半天，又租给别人拉）等，工会也是应该反对这种剥削的。那些有自己的作坊，有自己的工具，同时又利用自己的作坊或工具来剥削伙计的人，是不能加入工会的。但是有些洋车夫是自己从车房里租一辆车，自己拉半天再转租给别人拉，又有些码头工人、小车夫仅仅在自己病了或有事抽空时才把自己的“扁担”和小车租给别人，这种人还是不能把他们摒之于工会之外。

除开上面几种情形以外，还可以说到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师父”。在我们的乡村中并没有一种专门带徒弟的师父。原来行会的行规，是徒弟三年出师，加入行会之后，就有做工带徒弟的权利。乡下手艺人一生完全不带徒弟的是很少的。但实际上总是那些手艺好资格老的“半工头”，手工作坊的老板等，大多数是经常带徒弟的，甚至有好几个徒弟。师父对于徒弟有很厉害的剥削和虐待。工会要为解放徒弟而斗争，苏维埃也应颁布保护这些学徒的条例。这里，对于反抗苏维埃政府条例剥削徒弟的“师父”，是不能加入工会的（或者开除他一个相当的时期）。但一般的提出“驱逐师父出工会”的口号是不对的。乡村一切手艺人都是可以而且应该带学徒，只要他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律待遇学徒，是可以加入工会的（那些“半工头”和老板当然在外）。尤其被雇在工厂、作坊、店铺中的“师父”，是和学徒一样被工厂、作坊、店铺的主人

所剥削的，这些“师父”并没有剥削学徒，工会绝对不能把这些“师父”驱逐出工会。

第二，家庭工人。有些工厂、作坊不把工人完全招到工厂里来做工，把一部分原料甚至工具分发给附近的农民、贫民去做（如火柴厂把盒子分发给厂外的去糊）。这些家庭工人，应该组织在工会之内，联络他们一致向工厂作坊主人作斗争。但他们加入工会组织的条件是要“变通”的。如果他们一家人男女老幼都是做工的，都要加入工会。不能因为他们一家的生活主要来源不是由做工得来，就不把他们组织在工会之内，他们对于工会所交的会费等应比一般的会员不同些（照他们做工的多少来计算）。但这种家庭工人中常发生有“工头式”的剥削。有些人到工厂领回许多工作，自己一家人做不完，如是就把自己的亲戚及附近的人招来工作，或者再分发给其他的家庭去做，从中剥削。如是经常进行这种剥削的人就不能加入工会。工会是要消灭这种中间剥削的。

第三，还有一种家庭手工工人。如家庭织布工厂、织袜工厂，差不多已经普遍到了中国的乡村。有些家庭从商人那里把原料买来，自制工具或者从商人那里把工具买来租来，一家人从事生产。生产品向城市和乡村的商人出卖。他们受商人的剥削是非常厉害的，有些就是一个商人，供给他们原料，供给他们工具，同时又购买他们的生产品。商人的这种“供给”是以借贷的形式，更有一种利息的剥削。这种独立的家庭手工业者，应该组织在手工业者联合会里面，反对商人的剥削。被雇在家庭工厂做工的手工工人，就应加入工会。

第四，季候工人、临时工人。如乡村修堤、筑坝、修路、春季采茶、冬季伐木等，常常有很多的工人聚集在一地工作，这种工人大半是农民，临时被雇来的。工会应该去帮助这些季

候工人、临时工人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工会应派人到这些地方去召集工人大会，选举他们的领导机关，讨论他们的劳动条件，并帮助他们进行工作。不管在这里的工作只有一个月或几个月，都要将工人组织起来。但组织这些工人是要用比较特殊的方式，要使在这个地方做工的全体工人，都能加入。

第五，独立生产的小手工业者。不雇请工人（或者有一个学徒，或者雇请一个助手），有自己的工具和原料，用自己的劳动力生产商品，或做“定货”，主要的以出卖商品或“定货”来维持生活。他们是应组织在手工业者联合会里面。

一切以剥削别人为生的剥削者，不能让他们加入任何组织。一切被雇佣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学徒、助手，都应加入阶级工会。一切不雇请工人的独立从事生产的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加入手工业者联合会。一切摊担小贩，不雇工人的卖肉的屠夫等，加入小贩联合会。不雇请工人的洪湖独立捕鱼的贫苦渔民，组织贫苦渔民联合会。判别一个劳动者是否属于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标准应当是看“他的收入，生活的来源是否主要的从出卖自己的劳力得来”出发。

苏区的许多同志过于重视“有没有自己的工具”这一个条件，他们认为凡是有自己一点工具的工人，都是独立劳动者，都不是工人。在他们看来，码头工人有一根扁担，外国的建筑工人和中国大工厂的许多机器匠，常常有自己值百元以上工具，都不能算是工人。他们看不见这些人的简单的工具，仅仅是为着便利自己出卖劳动力的一个条件，而且“独立劳动者”这个名字，是一个太笼统的名字。

在苏区土地革命胜利之后，在经过工人群众激烈的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及劳动法实行之后，情形就会有很大的变动。很多工人、雇农、苦力分得了土地；工头、包工头的剥削，师父

对于学徒的剥削，消灭了或减到最低限度；许多生产合作社劳动公社组织起来等。这些对于工会的会员成分，是有些影响的。在这里所发生的问题有：

（一）雇农苦力在分得土地以后，是不是应该马上退出工会呢？不。雇农苦力虽然在土地革命中得到了一块土地，但他还是完全没有保证保住这块土地；因为他没有工具、资本及经营土地的经验技术，时时都有丧失这块土地的可能。工会不能在他分得土地以后，马上就要他退出。但在这里是应该有一个限制的，就是雇农苦力在分得土地以后，经过了两年三年，还是继续专门经营土地，完全不做工了，这就应该退出工会了。因为他这时候对于工会的要求和劳动法等，已经不感觉什么兴趣了，他感觉兴趣的是另外的东西。中共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及目前的工作决议上说：“工会会员在六个月至一年完全不做工，变为经济独立者（如经商、经营土地等），亦不能再留于工会组织”。这里是不是与决议的上述条文冲突呢？不，决议上说的是：因为乡村的阶级分化，极少数的工会会员，以种种原因，个别的脱离了工人阶级。所以只在一年之后，就应该退出工会。这与土地革命中雇农苦力骤然得到土地的情形，是不同的。现在我们的苏区里面，因为敌人的封锁，经济的破坏，工会没有去发展工人的经济斗争，劳动法还大部未实行，工人生活的改善还非常少，使得乡村中的阶级分化不是很快的进行。所以雇农苦力还不是很快的就抛了自己那块没有味道的土地。这时候保留这些雇农苦力在工会的会籍，是应该的。从这里就批评道：

（二）鄂豫皖总工会的“凡一年做一百八十工以上可加入工会”的规定，是否正确？凡一年做一百八十工的工人可以加入工会，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已是全年的大部分时间（除

去疾病、休假等）出卖劳力。但把“一百八十工”作为加入工会的唯一标准还是不妥当的。因为（1）有些工人虽然每年没有做到一百八十工，但其收入已经是他全年生活主要来源了。短工、季候工、苦力大半是夏天工作赚钱作冬天的用途。尤其在北方他们常常是做不满一百八十工的；（2）有些工人是因为疾病、失业及其他原因而做不到一百八十工，而其收入是要作为全年开支的；（3）在这一规定之下，已经把分得土地的雇农苦力等，一下子全部弃之于工会之外了，而且即使他还做雇农，只是每年不到一百八十工；（4）工会会员发生很大的流动，而这种流动不是代表会员中真正阶级地位的变动。从工作上来观察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固然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能这样机械的规定。一个工人原来是工会的会员，他在一年之内虽然只做了很少的（两三个月）工，但工会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还可以保留他的会籍。我们不能那样害怕着，工人会变成小资本家（这总是工人中的极少数）。但吸收新会员来加入工会的条件，就应该是这个工人的工人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了的时候。若是组织家庭工人和季候工人，简直还不能用这种条件来限制。

（三）鄂豫皖总工会的报告上说：

“在鄂豫皖区的手工业工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农村经济密切联系着，在这种带有农民性的手工业工人，他一方面在农村中有土地，一方面在农闲的时候去做手艺，他有土地又做工，所以他家庭经济地位多属中农，而且有的是富农者。这种带有农民性的手工业工人，是否可以加入工会为会员？……现在各地工会已在清洗的口号之下开始清洗所谓‘中农工人’，有些地方还根据着以前‘每年做一百八十工以上者可加入工会’的原则，仍保留所谓‘富农工人’……”

鄂豫皖的“中农工人”、“富农工人”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在土地革命后，“他有土地又做工”，所以他的收入多一点，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们的同志害怕工人生活过得“太好了”，就认定他已经是“中农”或者“富农”，把他赶出工会之后，好来打他。鄂豫皖的同志仅仅从这个人收入的多寡，生活的好坏，来判定他的阶级地位，而不是从这个人是否被人剥削，或剥削别人的观点上来判定。我以为这样的手工业工人，只要他的收入主要的是从卖工得来，他不雇请工人（或者只是帮助的性质），是应该留在工会里面的。他对工会及劳动法是感到兴趣的。为什么在土地革命中得了一块土地，就要被清洗出工会呢？难道他不应该得这块土地吗？但这种人的收入比较丰足，每年或者还有些剩余，有的就开始放高利贷，或者又雇请雇农来种地，对于剥削和投机事业感到了兴趣，逐渐变成了乡村中的剥削分子，这时期将他驱逐出工会是应该的。

清洗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成分出工会，这在苏区工会是绝对必需的。但这不是官僚式的决议案所能做到的，这是需要发动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彻底去改良工人生活，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各种复杂的情形，进行坚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够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从消极方面去清洗，从积极方面来发动群众斗争，是必须相互联系的。而且这是目前苏区工会的经常的工作，在苏区应提出积极的建立手工业者联合会等口号。清洗小手工业者等出工会的口号，和驱逐 AB 团、富农、老板等反革命分子出工会的口号，是不能摆在一起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扩大红军工作必须注意 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王 稼 祥

一、扩大红军必须成为群众运动，必须在群众中创造出“当红军去”的热烈空气。为要实现这个目的，各方面都需要一个大的动员。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必须加紧自己的工作，抓紧苏区发展的事实和红军的新胜利，现在尤其要抓紧着红色五月的运动，来进行最耐烦的、最坚忍的扩大红军的工作。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要把扩大红军的各种问题及材料经常的提到各种群众团体的会议上，使各个群众团体能够不断的组织扩大红军的工作。扩大红军的宣传应当扩大与深入，使群众了解，要保障土地革命和其他一切已得的利益，必须向外扩大革命战争，必须消灭进攻苏区的敌军尤其是粤军，必须扩大红军，创造铁的红军。在目前尤其是要扩大宣传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以及我们争取苏区扩大，争取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开始江西与邻近省区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

* 这是王稼祥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的《关于红色五月扩大红军工作的指示信》的一部分。

二、必须与群众斗争的发动密切联系起来。要从每一个群众斗争的发动上，来动员工农劳动分子到红军中去，保障他已得的胜利和阶级利益。拥护红军委员会与红军派到地方上去做扩大红军工作的人，不但要向群众去做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并要站在群众地位帮助和发展群众的阶级斗争。要使群众在斗争的发展和胜利中，来认识自己的力量，来认识政权的重要与红军的保障，而自愿的到红军中来。特别是当红军发展到新区域时，更要绝对禁止命令群众分配土地、命令老板增加工资来代替群众斗争的发动的错误办法，要相信群众斗争愈发展愈深入，扩大红军愈能得到成绩。

三、必须彻底肃清扩大红军的一切错误路线，加紧拥护红军的一切工作。扩大红军路线上的错误，如强迫、欺骗、收买、引诱、“要兵”、“抢兵”等等的错误，是扩大红军的最大障碍。因为这些错误是使群众自愿当红军的积极性减低，使群众对当红军产生恐惧，使一些不是为了参加革命战争而是为了取得一些经济利益的观念不正确的分子混入红军，使新战士中的逃兵数目增加（并且这是逃兵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错误必须立即肃清。各军派到地方做扩大红军工作的同志与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必须受地方党部的指导，必须帮助地方党部与群众团体来做扩大红军的工作，而不能“坐在政府要兵”。红军与地方武装“抢兵”的错误要立即停止。至于由地方武装中吸收战斗员到红军中去，必须估计到地方环境与地方武装需要的程度。我们固然要反对“拥兵自卫”的观念（在赤色腹地以及地方武装比较多的地方，可以而且必须吸收一部分到红军中去），但我们同时必须反对只顾扩大红军反而削弱甚至取消地方武装的错误观念，因为这种错误是使地方群众受到大的摧残，同时也是阻碍了扩大红军的工作。

在扩大红军中必须严格注意阶级成分，地主、富农、商人及一切剥削者都不准其混入红军，只有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及一切劳动者，才有当红军的权利。在过去三、四个月中，我们间或遇着阶级异己分子混入红军的事实，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提醒的。

扩大红军的动员是要建立在广大群众斗争的发动的基础上。关于加入红军的征求，可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在各种群众示威和纪念会上，用自愿报名的方法来征求。当着广大群众面前，要给报名加入红军的新战士以热烈的欢迎和鼓动；在他们动身到红军去的时候，更要开热烈的欢送会，以提高他们的勇气，激励工农劳动分子继续加入。

拥护红军的工作必须加紧。除了发动帮助红军作战、运输、卖粮食给红军、慰问红军外，拥护红军委员会必须协同政府帮助退伍的以及残废的战士同志，还必须帮助害病的、落伍的红军士兵，设法送他们到医院及红军后方机关中去。

拥护红军的最重要工作，就是执行《红军优待条例》。拥护红军委员会必须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优待条例，并要在各种群众团体的会议上，经常的提出执行优待条例的各种实际办法，尤其是在现在春耕的时候，代红军家属耕田，耕种红军公田，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必须动员广大群众来进行这个工作。拥护红军的另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与逃兵作斗争，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必须与地方政府及群众团体协同来进行这个斗争。在斗争中，要坚决反对地方上保护逃兵，鼓励逃兵的一切错误。过去红军中的逃兵，地方上时常把他们去当干部，这是错误的。一方面使地方上充满着一些从红军中逃出来的不好分子为干部，这是奖励逃兵；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时常拘捕逃兵很久不释放，这同样是不对的。以后拥

护红军委员会要帮助地方政府执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逃兵问题给地方政府的训令，凡是携带武器的逃兵一定要押送军事机关；凡空身逃回家的要向他解说，要他回队，并须在群众中宣传逃兵是逃避革命斗争，是可耻的事情。此外，许多被红军开除的分子流落在地方上，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也要帮助政府来清查他们，给这些分子一个处置办法，主要的是要看他的阶级成分来定处置的办法。

四、红军各级政治部应加强对扩大红军工作的注意。政治部必须加紧在工作区域及游击区域中的扩大红军的工作，要经过广泛宣传来吸收贫苦工农来加入红军。在这种工作中必须特别注意考察加入红军的成分，不让阶级异己分子及白军的侦探以及一切反动分子混进红军中来。各级政治部派往地方上去做扩大红军工作的同志，如能力太弱、错误太多的同志应当调回，而改派一些比较得力的同志去担任这个工作，并且要把扩大红军工作的路线问题，向他们解说清楚。

此外，各级政治部必须特别进行对新兵的政治教育。要知道这些新战士是刚从农村中出来的农民，他们的政治认识还很幼稚，他们还未过惯有组织的有纪律的军队生活，所以要以政治教育来引导他们变成很好的战士。对他们的政治教育要从最浅显、最通俗的问题讲起，而不能与原来的部队混在一起。对他们的管理要特别注意，要时时刻刻帮助他们解决一切困难问题，在管理中军阀残余习气的任何微小表现都是极端有害的。我们要以政治教育、正确的管理方法来消灭新战士中的逃兵问题。

毛泽东关于政治估量、军事战略等问题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

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1〕}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去年的战略，要用到现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

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他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东路军今后的任务，是要坚决的打击粤敌，要马上集中十四军、三军的第八师、十二军的三十六师于猷岩，白区作战与赤区有很大不同，和粤军作战又与打张贞有很大不同。南靖之敌因在白区，兵力不够分配，以致左翼包抄不能派出，张贞残部不能消灭。十四军、第八师、三十六师的集中，是完全的必要，江西方面有大量地方武装是足够分配的。

毛 泽 东

三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

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是更加无耻与露骨的在进行。五月五日国民政府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签订所谓停战协定，这个协定是完完全全的出卖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心的上海，在协定中允许日本长期屯集上海无数的海陆空军，而上海的周围永远不驻中国军队。实际上，这是无限的扩大了上海的租界区域，这是实现将上海变为国际共管的自由市的具体的步骤。

这种无耻的投降与公开的卖国，更明白的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而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集中一切力量来进攻早已得到了解放与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的苏区，与企图妨碍阻止工农红军的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进行。在上海谈判与协定签订中间，更明白的揭露了国际联盟是瓜分中国的组织者，而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助手与瓜分中国的发起人。

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在全中国劳动群众面前宣告：他代表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四十一期。

全国的劳苦群众，否认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谈判与密约，否认五月五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协定；号召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坚决的起来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与清道夫——国民党政府，来保卫中国的领土的完整，来求得中国完全的独立与解放。

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号召全中国劳动群众斗争起来，武装起来，拥护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进攻，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坚决地彻底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为着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而斗争！为着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

五月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

(一) 党大会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有了进步的作用，但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虽然当时中央屡次去电指示，但是没有为中区的领导同志所严重注意。

(二) 在中区工作中，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没有给以严重的注意，特别对于工会工作是一贯的忽略了。大会的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以不正确的苏区没有工人的理论，来阻碍着工会工作的彻底转变。

(三) 对于苏维埃工作中、扩大红军中、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及白区工作的忽略，都没有明确的指出来。总之，没有造成这些工作的即时的必要的转变的前提。

(四) 对于反帝，尚没有确切的认识三次“围剿”的组织者是帝国主义者及目前帝国主义直接进攻苏区的危险性的增长，没有坚决地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及国民党。

(五) 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

误与缺点。

(六) 伍豪^[1]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

(七) 目前的情形正是反苏联战争的前夜，瓜分中国正在彻底进行。红军在这几次空前伟大的胜利，正是全中国劳苦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干涉与反国民党的胜利。而国民党的无耻的出卖污辱中国，也更加的揭露了。全国工人争斗与反帝运动的风潮般的高涨，中国革命的危机不仅是存在而且是发展的。

(八) 在目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从新进攻苏区亦在疯狂的进行，国内战争的范围更是扩大了，帝国主义在组织进攻苏区中的作用，增加了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的危险。在目前，国民党统治急速崩溃，军阀内部紧张的冲突，更有利于红军，但绝不能认为现在处在军阀混战大爆发的前夜，他们已无力进攻红军。一切四次“围剿”不可能的理论，应该受到严厉的打击。

(九) 应该明白的估计到，现在全国力量的对比，是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了，是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有利于革命的。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红军的行动要更加能够呼应与互相牵制敌人，特别应该从各方面来动员准备群众与赤色战斗员，去为反帝国主义的武装而斗争。口上的苏维埃的讨论是机会主义的讨论。

(十) 为着开展胜利的进攻，改造与转变党、团与苏维埃工作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是一刻也不能迟缓的。扩大红军，

加紧红军的政治教育，成为头一等的任务。中局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来改善领导工作。这些首先应该依据党内发展自我批评及下层群众的积极性上来进行。中央相信中局全体同志能够团结一致的像一个人一样的，在中央这一指示之下，为了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注 释

〔1〕即周恩来。

中共中央给各苏区的军事训令

(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

各中央局：

敌人对于进攻苏区的计划已经有了新的布置。蒋介石自任鄂皖豫“剿匪”总指挥，李济深为副。胡宗南第一师已调安庆出合肥，徐庭瑶第四师坐镇蚌埠，防止红四军进占安庆，并保持津浦路交通。目前利用全力向湘鄂西苏区进攻，预备击破这一方后转向红四军后防进攻。调往汉口得力军队为八十八、四十七、五十四师以及川军三十六团。对于中央苏区，蒋系仍在吉安、吉水、万安、泰和、遂川、安福一带，共有七个师，保持赣江流域；抚州、南丰一线有四个师。这两线军队一方面相互呼应向兴国、广昌、宁都苏区进攻，另一方面同湘军、粤军联合包围湘赣苏区与三军团。闽赣“剿匪”总指挥何应钦近指定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预备完成这一任务。入赣粤军有两军两师仍在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南雄一线；入闽粤军有三个师以上，仍在上杭、武平、永定三城；福建方面，已指定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

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取

吉安，同时应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红十二军应向闽北发展与赣东北苏区打通，并留一军力量于闽南，防粤军深入。

赣东北苏区应首先与闽北苏区联成一片，并向南发展与红十二军配合行动。在皖南应该发展最广大的游击运动。

湘赣苏区除与三军团配合行动击破入赣粤敌、巩固与发展赣南苏区外，一、八两师应积极在永新、莲花、宁冈、遂川、萍乡、宜春、安福、万安、吉安、泰和一带积极活动，牵制中央军援粤部队。

湘鄂赣十六军主力，应加紧在鄂东南尤其应该在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活动，响应红三军与红四军，破坏武长路线的交通，并阻止汉口援赣部队的移动。

湘鄂西红三军除以一部分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配合红四军消灭徐源泉、萧之楚主力，造成鄂中一片苏区，与鄂豫边苏区打成一片。

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萧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此电望各中局与军委讨论电复。

中 央

一九三二、六、五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 “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

(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

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居”的竞争，在世界经济恐慌深刻化与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功之下，已经决定了社会主义世界的胜利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失败。帝国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的急激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帝国主义各国间矛盾的尖锐化，使世界帝国主义要在牺牲苏联、牺牲本国无产阶级、牺牲殖民地民众中来找求危机的出路，要用战争来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帝国主义分配世界的战争的危险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这样急迫的了。而且实际上战争在中国已经开始。“一二八”上海的浴血之后，在满洲正进行着对于东北义勇军与千百万劳苦民众的血的屠杀。为了进攻苏联，为了瓜分中国，为了消灭中国苏维埃运动，日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在一师团一师团的向着满洲与苏联的边界移动，帝国主义的军舰正在不断的集中到太平洋、中国沿海各地与长江沿岸，帝国主义的军械、飞机、毒瓦斯以及一切新式的杀人利器正在一船一船的、一火车一火车的向着东方输送。

没有宣布战争，然而战争已经开始。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

疯狂般的动员军事力量准备反苏联的战争。在严重的经济恐慌中，独有军事工业表现着它的繁荣。在西方战线上，英法帝国主义者正在经过多瑙河联盟计划、军缩会议、洛桑会议、世界经济会议尤其是国际联盟，经过它们的走狗社会民主党，利用一切方法组织着反苏联的战线。在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拉夫等一切都已准备完毕，只等着法国总司令部的进攻命令。世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大战已经是箭在弦上。

中国的统治阶级，地主资产阶级的中国国民党，也是这一战争的参加者。它把东三省、把上海以及许多重要的城市交给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进攻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根据地，它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把整个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它帮助帝国主义镇压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尤其是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它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之下，正在动员它的全部力量向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进攻苏维埃与红军的战争正在大规模的进行着。

反对中国劳苦民众，反对中国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战争，在东方是已经开始。这一前哨的接触，将爆发出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然而这一战争爆发的迟速与它的胜负，还是决定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民众的革命的斗争。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民众，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用罢工与示威，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进攻中国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与瓜分中国。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于苏联是他们的祖国的信仰，是日益巩固着。他们在苏联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宣誓着要用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去拥护他们的祖国，直到最后一滴血。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日益高涨，在许多国家内革命危机正在成熟着。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家

内，正发展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剥削与屠杀的民族革命战争。尤其是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进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围剿”中已经得到了伟大的光荣的胜利！一切这些，使我们坚决相信，在两个世界的决死斗争中，我们将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全世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在这种形势之下，今年的“红色八一反帝战争日”，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将是牵制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推迟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的重要因素。所以中国共产党为得要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为得要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必须更积极行动起来，在今年的“八一”动员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团结在“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维埃与红军！”“以民族的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以革命的战争打倒出卖民族利益，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拥护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争取湘鄂赣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等几个基本口号的周围，为这些口号的实现而斗争！

为得要完成这一任务，中央认为：

一、必须最坚决的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苏联、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造谣污蔑，与它们在和平主义的欺骗宣传之下，对于准备与组织进攻苏联、进攻苏维埃与红军的积极作用。一切托陈取消派关于莫斯科的消极、苏联的和平政策即是对于帝国主义的让步等的无耻谰言，必须给以最严重的打击。必须揭破中国一切反革命派别在中俄复交的武断宣传之下进攻苏联的作用，指出他们的“非战运动”实际上是为得要团结一切反革命力量进攻苏区与红军。

二、必须最明显的告诉广大群众，只有苏维埃与红军的积极行动与胜利，只有开展千百万工农民众的反帝斗争，领导东北义勇军英勇的抗日战争和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农民灾民的分粮、抢粮、吃大户的斗争与游击战争，以及白军士兵的日常斗争与哗变，我们才是真正的反对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我们必须告诉广大群众，只有革命的战争，我们才能消灭反革命的战争！

三、各苏区的党必须最广泛的开展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进攻苏区与红军与瓜分中国的运动，立刻讨论并执行中央最近的军事计划，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互相呼应地消灭宁粤四次进攻的主力，争取湘鄂赣一省与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从现在起到“八一”止，必须尽量扩大红军，为增加四分之一的红军而斗争，为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夺取几个中心城市而斗争。苏区的反帝大同盟应召集反帝战争的代表大会，扩大反帝组织，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与武装的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

四、非苏区的党应十百倍地加紧对于拥护苏联、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要尽量利用苏联、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在中国工农民众中的深刻影响，成立并发展“苏联之友”与“红军之友”的组织。在八一节尽可能的召集一个地方的这些组织的代表会议，经过这类代表会议，以扩大募捐运动与征调运动，扩大这些组织，扩大关于苏联、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捐助一个铜板给红军”、“捐助一架飞机给红军”、“大批工人到红军中去”等的口号，应更广泛的散布出去，成为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政治运动。应该更具体的、更切实的宣传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的内容与意义以及中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与他的对日宣战等通电，提出他的反

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作用。

五、扩大反帝斗争。利用日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暴行、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压迫中国革命以及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中国的一切事实，成立各种各样的反帝组织。一切反日会的组织应该深入到工厂、农村、兵营与学校中去。满洲、河北省委必须加强对于东北义勇军的领导，造成东北义勇军中的中心部队，把这一战争的领导权拿到我们的手里。各地党部应该发起“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北上决死团”等组织，武装群众、动员群众尤其是工人到东北义勇军中去。抵制日货与没收日货的斗争应积极开始。各地反帝大同盟必须于“八一”召集几个省的代表会议，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

六、加紧对于目前汹涌澎湃的工人斗争的领导，加紧厂内活动，发动与组织“八一”那天一厂与几个中心厂以至一业的全盟罢工，反对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这里必须正确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八一”前，尤其应该注意铁路、海员、兵工厂的工作，准备那里的“八一”罢工。应该拿“兵工厂工友们！不替国民党军队制造一枪一弹去进攻苏区与红军！”“海员铁路工友们！不替帝国主义输送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去进攻苏区与红军！”“罢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等口号动员他们，去拥护苏联、苏维埃与红军。全总党团、海总党团应立刻加紧这一工作，使全总与海总真能成为群众的总工会。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去、义勇军与游击队中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应该是“八一”以前的战斗任务。

七、党在目前急速发展的农民、灾民与士兵斗争中的工作，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各省委应该具体的布置灾民、农民斗争与士兵斗争的汇合，使这些斗争转变为游击战争，走向创造新苏区的道路。对于已有的陕甘边与徐海蚌游击战争的区域，党必

须加强在游击队中党的领导作用与工人的骨干，彻底执行深入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策略。在目前兵变潮流的形势之下，党更须十百倍地加强在士兵中的工作，尤其是蒋介石、陈济棠的“剿赤部队”中的工作，领导士兵哗变到红军中去。

八、估计最近几次示威运动不能有很大成功的经验，必须特别指出各地党部在领导斗争中加紧准备与组织“八一”的罢工与示威的重要。必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成立真正有群众基础的“八一”反帝战争的筹备委员会与“八一”行动委员会，坚决反对把“八一”运动限制于秘密的狭隘的范围内的关门主义的倾向。一切宣传品标语必须事先有充分的准备，宣传队、标语队队员必须加以特别的训练。必须彻底的检阅发行工作，不论文字上与口头上的宣传，必须深入到工厂、农村、兵营与学校的群众中去。

九、这一决议的讨论必须深入到支部，必须根据这一决议决定各级党部本身的具体工作计划，并经常检查这一计划的执行。团中央必须坚决执行“冲锋季的工作计划”以准备“八一”工作与国际青年节的工作。党必须加紧对于团的政治领导，转变各地团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为增加一倍党员而斗争，转变党的工作方式，尤其是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开展仍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对于目前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对于“北方落后论”或“北方特殊论”，以及对于党的路线的执行的消极怠工，必须给以最严重的打击！

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 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 首先胜利的决议

——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
中央苏区党的目前中心任务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七日)

目前时局的特点是：世界上两种不同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和矛盾，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猛烈发展，国内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的尖锐，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苏联社会主义之胜利的建设，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危机之加深与尖锐化，世界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涨，以及满洲事变所增强的反苏联的挑战性，使帝国主义强盗——不管它们中间的矛盾如何加强——对于反苏联武装干涉的准备，正在更大的战线上，同时，在反中国的武装干涉上，疯狂般地进行着。现在正是反苏联战争爆发的前夜，全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切秘密的公开的活动，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又在满洲、东蒙所采取的一切积极行动，都是要把全世界的一切力量团结为一，来反对正在建设新世界的苏联。在中国，经济危机的深入，已到了国民经济的总崩溃的形势，苏维埃与红军的不断的伟大的胜利，全国革命运动猛烈的发展，国民党

在其与革命作斗争中的破产，及其统治的日益崩溃，于是帝国主义强盗遂由隐藏的武装干涉转到直接的公开的武装干涉，来反对中国民众，来彻底进行新的瓜分中国。日本以武力侵占满洲与进攻上海的事变，便是这一反中国的公开的战争的开始，并得到各帝国主义的同意和赞助。现在上海的“休战协定”已签字了，这表示帝国主义强盗要越快越好地来瓜分上海、瓜分中国，以便集其全力对付中国革命、对付苏联。国民党反革命在这“协定”之下，是无耻地出卖中国、出卖民族利益，更露骨地听候帝国主义的驱使，做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清道夫，加紧压迫中国革命运动，特别加速调动了全国范围的军队来进攻苏维埃与红军。因此，帝国主义强盗在瓜分世界、瓜分中国上，是孕育着开展着他们中间的矛盾和冲突，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府也日益分崩离析，但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准备，武装瓜分中国的进行，帝国主义国民党加紧进攻中国革命特别进攻苏维埃与红军，实是目前反动统治策略的中心。

经济危机的加深，苏维埃和红军的不断胜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进攻中国革命的急进，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危机的更加成熟。最近工人罢工有力的高涨（全国邮务工人、上海丝厂工人、报馆工人、电话工人的同盟罢工，天津纱厂工人的罢工，汕头码头工人的罢工等），反日运动的发展，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的觉醒与反帝的热忱，农民、灾民斗争的开展，白军士兵的革命化，尤其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宣布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各地工农红军在进攻中的全线的伟大胜利（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河西以及中央区），这更加领导着全国群众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土地革命的两大革命潮流，日益汇合在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走上苏维埃的道路，为着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解

放而斗争，为着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乃至全国的胜利而斗争！

这一切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中央对于时局的分析与屡次对于苏区党的指示的正确。中央在争取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决议上，曾经指出：“党的任务是：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护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来争取中国的统一。……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拿着对于这一党的总任务的执行如何做标准，来检查苏区党的工作，中央苏区的党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中央局过去领导的错误。

自从去年三次革命战争胜利后，苏区中央局在其对时局宣言（一九三一年十月）上，便表现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估量不足，竟认定“日本出兵东三省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中国，重新分割一切殖民地的战争的开端”（宣言），而根本不认识主要的是为的进行反苏联反中国的武装干涉，对于革命的发展完全没有认识采取积极进攻策略的重要，反而说“敌人现在是无力求来进攻我们，……我们现在正是积蓄力量，准备将来的斗争”（宣言）；向着中心城市发展，还认为是“冒进”与“冒险”。于是红军行动的中心，便放在“打土围子”与“创造新战场”上，以等待敌人的新进攻，以“关闭”来创造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右倾的估量与保守主义的错误，一直影响到苏区党大会与党大会以后。

苏区党大会是继续中央局扩大会以来的向着国际路线的转变，是一般的接受了中央当时的指示（八月来信），他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是起了进步的作用，他彻底揭发了过去苏维埃运动中立三路线的错误，他开始纠正了当时苏区党内所缺乏的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他并领导了党大会以后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与扩大苏区上，在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上，在巩固红军与加强地方武装上，在开始注意地方党的工作上，有了相当的成绩。但这绝不能掩盖了党大会所犯的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大会对于当时政治形势是估量不足，决议案上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积极进攻的路线，没有明确的肯定的指出；对于日本侵占满洲，没有一句话提到日本帝国主义是要将他完全殖民地化，是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始；更根本没有认识帝国主义在三次“围剿”中强大的作用，与帝国主义直接的公开的进攻苏维埃与红军的危险性的增长。因此在实际任务上，便没有积极向外发展夺取中心城市的规定和行动，便没有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并首先加紧进攻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甚至没有一语提到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中央苏区一向忽视巩固苏维埃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特别是职工运动在党大会前完全是取消状态，党大会上虽与这取消主义作斗争，但职工运动决议案上又将反对经济主义倾向、工会代替政权等等不是很普遍的错误放到重要地位，掩盖了反对那不发动不领导工人群众斗争的中心的错误，在成分上又排斥了沿门卖工的于工会之外，并且还给了不正确的苏区没有工人（说产业工人缺乏，手工业工人失业，雇农分了土地，女工很少等）的理论做基础，来阻碍职工运动的彻底转变。在苏维埃中，在红军中，保证无产阶级与党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没有引起党大会的注

意，在决议案上没有一句话提到加强工人成分到苏维埃政府中，没有着重提到红军中工人骨干与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反而笼统而又消极地说一句“党的包办应当取消”。没有提到宣传土地国有的重要，更没有一句话提到革命转变问题。对于过去苏维埃工作中，扩大红军中，土地问题中，尤其是肃反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白区白军中工作的忽视，党大会都没有能给以明确的足够的批评，没能造成这些工作的及时的必要的转变前提，尤其是对于揭发肃反工作错误的机会主义的顾虑，使大会不能认识这一错误的异常严重性。对于中央局八月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没有批评它的绝对平均主义与反对以人口劳动力混合为分配土地标准的严重错误，反而承认它是正确的。特别是对于自我批评与工作检查，党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正确的积极的领导和充分的发展，并且要指出当时中央局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大会上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和事务主义的倾向虽是需要，但没有将这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根源指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国际的，并且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掩盖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所有这些，都是苏区党大会中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党大会后，尤其是今年一月开始攻赣行动以后，中央局关于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转变，但因为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仍然估量不足，没有估计反苏联战争与反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的主要危险，反而过分的估量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大战危机，认为在上海事变中将要一触即发（二月中央局决议案），这就影响到夺取赣州的战略与战术的错误，影响到红军向外发展的行动。还不能达到最高限度的积极化与全国红军互相呼应，常常束缚在“分散”筹款、“分散”做群众工作的任务上，而没有得到解除，影响到

苏区工农劳苦群众。对于参加和发展革命战争的工作，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与武装拥护苏联的运动也就不能广大的动员起来，相反的，反助长了苏区中农民落后意识与和平保守等待观念的发展。

党大会后半年来，中央局对于过去有些错误如肃反问题中、土地问题中、工会工作中的严重错误，虽已经给了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扩大和巩固红军工作上，在建立苏维埃政府工作上，在开始注意地方党的工作上，有了相当的转变，但对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工会工作的加强，雇农工会、贫农团工作的建立，白区白军中工作的建立，党的改造与支部生活的建立，尤其是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都还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甚至完全忽视。一切工作还都没能深入到下层，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尤其是因为对于党大会中的错误没能给以揭发，这就障碍着向着国际和中央路线的彻底转变。

中央局对这一错误的造成，主要的是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反革命力量过分估计，对目前两个世界与中国两个政权的对立的了解与估计不足，对于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中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忽视——这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不彻底揭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不坚决地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开火，便不能坚决地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迅速地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但如果以为有了这些严重错误，便是中央局整个政治路线错误，这也是不正确的右倾估计，因为这将否认了掩盖了苏区党大会与党大会以后的进步和转变，同样要模糊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央局以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号召全苏区党来彻底纠正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首先就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实行彻底的转变。

根据目前形势的开展，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任务，是迫切地放在中央苏区党的全部工作上面了。最近几次全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特别是鄂豫皖苏区空前的伟大胜利，正是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对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与反国民党的胜利的回答，这更加促使国民党军阀在更大的范围内来进行对苏维埃红军的全线总进攻。全国反动统治已经动员了他们所能调动的一切军事力量与社会力量，单对中央苏区就集中了湘赣闽粤四省四十师以上的军队来“围攻”，一切反革命派别现在都在反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活动起来。现时必须估计到，国内战争范围的更加扩大使战线的延长已经到八九省，特别是帝国主义在进攻苏区中的组织者的作用是更加强了。国民党军阀愈加在进攻苏维埃与红军中表现其不断的破产，帝国主义武力与中国工农革命运动和红军的直接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阶段将愈益迫在面前。苏区党的任务，应战斗的动员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战士，开展全国各苏区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胜利的进攻，积极的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与进攻苏联，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来争取中国的统一。

估计目前形势的发展，更必须指出：现时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大大的不同于去年三次战争时了，国民党统治是在急剧的崩溃，军阀内部的冲突是日益紧张，国民党各系军阀的力量都在削弱和瓦解，反动统治的民族武断宣传与欺骗是日益在群众面前破产。相反方面，工农革命运动的力量是增强了，苏维埃与红军的迅速发展与扩大，成为领导和组织中国革命的坚固的力量，党及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亦加强了。最近红军的全线新胜利，更造成了包围武汉、南昌、吉安、赣州等大城市

与交通要道（赣河、襄河、长江流域与京汉路线）的有利形势。当然，革命发展不平衡在全中国目前还是存在的。如果以为国民党军阀已经无力进攻我们与新的“围剿”不可能，这是极有害的“左”倾辞句，掩盖着对于积极进攻敌人的消极。但是右倾的夸大敌人的力量，认为国民党军阀将要爆发大混战，不相信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伟大，及其给予全国工农革命斗争的影响与领导作用，而不坚决的执行积极进攻的策略，这是最主要的危险。要认识目前的形势是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更有利于革命的。中央苏区党的任务，应领导红军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配合和响应全国工农革命斗争与各苏区红军的行动，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使红军行动达到最高度的积极化，迅速的向外发展，消灭敌人武力，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进攻，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尽量的扩大苏区，发展和深入土地革命，将湘赣、湘鄂赣、赣东北与中央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为着实现这一总任务，中央苏区的各级党部应环绕着发展革命战争的中心，迅速的执行下列的具体任务：

一、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必须达到最高度的积极化，必须与其他苏区红军更加有互相配合，互相策应，互相牵制敌人的行动，以达到革命战争在全战线上的一致和继续的胜利。为着这一任务的实现，全国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系统必须建立起来，红军的主力必须集中，必须最大限度的迅速行动，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当然不是说红军不做群众工作），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

人武力。依据中央新的军事训令，中央苏区红军应迅速的求得赣江流域的连续胜利，以夺取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目的，来配合目前尚隔断着的几个苏区，以开展江西的首先胜利，以配合和响应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在平汉路两边及长江流域包围武汉的胜利行动。湘赣、湘鄂赣两苏区应联系一起，造成威胁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的形势，以策应中央区红军在赣江流域的积极行动。西河苏区应迅速的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扩大赣西南的苏区到南康河两岸及湘粤边境，造成夺取赣州更有利的条件。湘赣苏区更应注意湘东南苏区的发展和扩大，以克服湖南在湘鄂赣三省中的落后。湘鄂赣苏区应更积极的在鄂东南活动，以响应红二军团与第四方面军，以牵制敌人进攻其他苏区的部队。闽西苏区除尽力扩大苏区到广东境内恢复和发展饶和埔苏区，并与闽南游击区域努力求得联系外，应以主力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

二、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求得迅速的连续的胜利，要求我们百倍的努力来扩大和巩固红军，这是苏区党头一等的任务。二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五个月内扩大红军主力一倍的计划到现在还差得很远，红五月的突击也没能达到预定的数目。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党及苏维埃政府没能将扩大和拥护红军看成是战斗的任务，党团员不能做群众到红军中去的表率，反而怕到红军中去，红军中政治工作也没能达到必要的成绩。现在必须立即实行转变。中央苏区（包括江西、闽粤赣、湘赣、湘鄂赣）要在三个月内（七、八、九）达到扩大红军一倍的业绩，要在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进攻、几千百万劳苦群众加入红军的口号之下，进行最广大的群众运动。各级党部要规定三个月内自己的扩大红军的计划与数目，一定要达到和

超过。要反对扩大红军中命令主义的错误，特别是机会主义的消极。各县或几县应联合成立红军补充团，以更有系统更有训练的方法去扩大红军。巩固红军成为铁军，党大会后确有相当的成绩，但不能过分估量，尤其是过去对于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与工人骨干的问题的忽视，现在必须立予改正。党及工会要从各方面动员工人成分到红军中去，要选派工人干部到红军中做领导工作，到红军学校去受训练，以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要十倍的加强红军中政治工作特别是党的支部生活，要使党的支部成为巩固红军的堡垒，每个党团员都能成为红军战士的表率，而更加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政治委员条例必须无条件的实行，凡是对于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的，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红军中政治军事训练的加强，纪律的巩固，指挥的集中和统一，后方工作的建立和整顿，游击队习气和军阀残余习气的肃清，都是巩固红军的必要条件，并在这一基础上，消灭所有反革命派破坏红军的阴谋。闽西红军中逃兵现象的严重，决不能说这是由于农民家乡观念重无法克服，地方党及苏维埃政府要从领导扩大和拥护红军执行优待红军条例上，红军本身要从加强政治工作与党的领导上，用大力来消灭这一现象，并要与说闽西群众不能当红军的倾向作严厉的斗争。

三、领导工农红军与千百万劳苦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是苏区党极端重要的光荣的任务。过去苏区的许多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府（甚至福建省苏），竟将领导革命战争看做是军事机关与红军的专门任务，而自己只站在帮助的地位，这是极端错误的。党及苏维埃政府一定要认识自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要举全力动员群众到前线去参加作战，派工作团随红军出发，要最大的努力执行后方工作，并充分准备和供给战争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条

件，好更有力的粉碎敌人的进攻，进行革命的进攻。党及苏维埃政府要放弃过去对于战争的庸俗的机会主义见解。要广大的发展群众的地方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先队、游击队等）。要派得力的干部领导独立师、独立团特别是游击队，去到白区中和敌军后方积极行动，侵蚀并破毁敌人的根基和武力，组织农民暴动，号召并组织白军兵暴，普遍的繁殖新的游击队，发展新苏区，破坏敌人交通，劫夺敌人辎重，袭击敌人部队，来配合和策应主力红军作战——这些，都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实行全线出击、协助主力红军胜利的必要的条件。苏区党要坚决改正过去地方武装在苏区“守口子”不去进攻敌人的保守主义，要使独立师、独立团、游击队担负起到白区中筹款，供给红军给养，与依着红军胜利的开展，去做扩大苏区的工作，使主力红军得以用其全力于决战方面。组织游击队、工作团积极向外发展，去到白区工作，不仅是边区，也是赤色腹地党的领导责任。各级党部必须坚决地纠正过去忽视白区白军中工作的错误，为着扩大苏区，为着夺取中心城市，更需要中央苏区的党迅速的选派和训练得力干部，去到苏区附近的中心城市、交通要道与敌人军队中，进行群众工作与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中央局二月关于白区白军中工作的训令及各省委自己规定的计划，必须求得全部实施，以造成争取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的有利条件。

四、苏区内应该进行最广大的反帝国主义与武装拥护苏联的宣传鼓动，应该最残酷的揭露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面目，尤其应该从各方面来动员组织广大群众与红军战士去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斗争。应该使每个工农分子与红色战士认识：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逼在面前，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敌人，满洲上海事变以来特别是上海

“休战协定”签字以后，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公开的来干涉和镇压中国革命，并准备以武力来直接进攻苏维埃与红军。应该使他们认识：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土地革命胜利是不能巩固的。应该使他们认识：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现在正举其全力来压迫全国反日反帝运动，进攻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苏区与真正的反帝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应该使他们认识：只有共产党和苏维埃才能真正领导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是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武装力量；只有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才是真正能联合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力量。更应该使他们认识：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武力，夺取中心城市，正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实际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必要前提，是武装拥护苏联的实际行动。各级党部应该在这些基础上，来战斗的动员与组织苏区中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劳苦群众，极广泛的吸引他们到反帝大同盟与拥护苏联大同盟之内，最广大的发展苏区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援助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反帝运动与罢工斗争，来彻底的肃清过去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与武装拥护苏联的运动的忽视。

五、为着巩固苏维埃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苏区职工运动的加强是再也不能一刻迟缓了。为着苏区工人斗争纲领百分之百的实现而斗争，为着拥护苏维埃劳动法全部实施而斗争，为着普遍的订立集体合同、劳动合同而斗争，为着改造与健全职工会的组织、争取全体工人加入职工会而斗争，为着巩固工人阶级在土地革命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领导而斗争，为着在工人中扩大红军选举积极的工人干部去到苏维埃和红军中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斗争——这些都是苏区党及职工会的战

斗任务。过去苏区党及职工会对于领导和发动工人斗争的消极，对于沿门卖工的排斥在工会之外的错误，现在必须立即纠正。必须严厉的打击那种说苏区没有工人，说职工运动主要错误是经济主义，主张降低工人要求，对女工运动忽视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党及职工会必须坚决执行去年十二月职工国际及中共中央对于苏区职工运动的决议，必须在广大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基础上，来消灭工人中行会主义的倾向，来提高工人阶级对政治斗争与参加苏维埃和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与领导力量，来扩大和加强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使之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柱石，以准备“由现时的民主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雇农工会的工作必须加强起来，要使它成为领导贫农团、领导乡村消灭地主残余、反富农斗争与团结中农的中坚力量。为着防止资本家投机商人怠工和破坏苏维埃，为着工人学习管理生产，苏区职工会必须在企业中、在手工业作坊中组织工人监督生产委员会（不是监督资本），要雇主经常的来向工人报告企业的生产量与营业状况，以便工人实行调查与监督。为着目前总任务的执行，党及职工会更必须迅速派人到苏区附近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去做工人运动，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与夺取黄色工会下的群众，特别是交通工人中的工作。

六、中央指出：“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在提高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在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上有决定的意义”（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决议）。中央苏区关于土地问题，一直到党大会后，苏维埃土地法令宣布，才得着彻底的正确的解决。去年八月土地问题决议案是进一步的解决了土地问题，但决议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承认以人口为平均分配土地标准（富农在内）是正确的，并肯定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土地革命中一个成绩，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机会主义错误。现

在地方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实际解决，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错误。如随着红军胜利发展的新苏区，一般的多是命令式的分配土地，没有发展农民自己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以致许多富农还分有好田，甚至地主家属还拥有土地。在老苏区，过去单纯以人口为分田标准的地方，富农的好田还没有完全被收回，地主的财产也有未没收的，红军公田还有分得荒田的，并且无人耕种，一般的中农的利益还多被侵犯，强迫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错误还没有纠正过来。这一切都证明土地革命的利益还没有完全落到贫农、雇农与中农的身上，各级党部必须用全力来改正这些错误。在今年秋收前，苏区的土地问题必须得到实际的全部的彻底解决，地方上全部的重新分配或部分的收回调换，要依照当地情形与基本农民群众的要求来决定。土地上的设施，党应领导苏维埃政府开始注意和实行，主要的要得到农民群众的帮助，最急需的还是发动农民保护秋收，帮助红军家属收获，增加生产，多种杂粮，政府举办谷仓，提倡与组织信用贩卖合作社，以充裕群众和红军的粮食，以救济米荒。土地国有的宣传，党应看做当前紧急任务，应向农民群众指出：只有土地、水利收归国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之后，农村经济才能有最高度的发展，农民生活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从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出发，党及雇农工会要十倍的努力进行组织贫农团、团结中农的任务，贫农团的工作必须认真的建立起来，要使他真正能起乡村苏维埃政府的柱石的作用，并团结中农在自己的周围，要坚决的反对反中农的倾向。

七、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苏大会后，福建、江西两省苏大会的成功，给了两省苏维埃改造以总的领导，现在必须加紧进行下级苏维埃改造。要坚决的肃清政府中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化分子，要严厉的

打击政府中官僚主义、机关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消极、涣散、怠工与塞责的恶现象，对于政府中和平建设、不发动群众、不领导革命战争的错误必须立即予以纠正；要发展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选拔得力的工人干部到苏维埃机关中工作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成分。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和决议必须求得全部实施，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建立各部与自己的日常工作，城乡苏维埃代表制必须坚决的实行，并要吸引苏维埃代表和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各部委的实际生活，经常的召集分区分乡的选民大会做报告，以密切政权与群众的联系，以建立苏维埃在群众中的信仰。苏维埃一切政策必须以发展革命战争的利益为出发点，过去中央区对于租税政策的规定，不仅是累进税率过轻，应当改正，且对于征收商人的营业累进税，也迟到现在还未执行，以致苏区中一切战费的开支还完全倚赖于红军自己筹款，这是再不容许继续的现象。现在必须节省地方上的一切开支，将捐税的重担加在最有财产的阶级的身上，努力到白区去筹款，并发行相当数目的苏维埃国家纸票。在十分必要时，更可举行对富农、商人的临时征发，以供给红军，使革命战争能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苏维埃政府一切工作的加强，必须密切的联系到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影响的增加与提高。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不仅要号召而且要实际去领导和组织全国的革命斗争，以更有力的来争取与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革命首先胜利。

八、在国民党统治日益破产的情形之下，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更加积极起来，用尽欺骗的口号，企图和缓群众的革命斗争，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这是革命开展中最危险的敌人，尤其是陈托取消派。同样，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愈加扩大，愈加发展到中心城市，这些反革命派别更愈加要利用机会

钻进苏区来活动，用阴谋来破坏苏维埃与红军，因此，肃反工作不仅不能松懈，而且要更加紧张的进行。中央苏区过去破获AB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的教训，鄂豫皖、湘鄂西对改组派的破获，都警戒着我们要十二万分的加强党及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和红军中的领导，要最广大的发展反对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与群众教育工作，要最大限度的发展群众对于肃清反革命派的积极性与自觉，来检举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在国内战争环境中，处置反革命派与反革命的活动必须严厉，肃反不容许乱捉人，也不容许漏网一个反革命分子。必须根本改正最近中央苏区对于肃反工作的消极，但同时要防止重复过去的错误。

九、在组织上，发展改造和巩固党的组织，成为目前扩大苏区、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重要前提。这里，必须首先纠正过去机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努力向工人、雇农、苦力开门，大大的增加党内新的成分，洗刷党内腐化与异己分子，加强党员的政治教育，引进并训练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改造地方党部，改善各级党部的领导工作方式，加强对团的领导，改善党与团的关系。要把一切问题集中到支部去，改造并建立支部生活。党内生活必须是活泼而有生气的，必须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和经常的工作检查，最大限度的发展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使党的决议与一切工作都能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中去。关于发展党和改造党的工作，中央局另订工作大纲，责成中央苏区各级党部认真的讨论执行。

十、为着执行苏区党当前的战斗任务，必须无情的坚决的进行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要从彻底揭发和改正党大会和中央局过去的错误做起，然后才能保障国际和中央的路线的彻底的执行。目前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这

主要表现在：对目前革命形势和敌人崩溃形势估量不足，对目前两个世界与中国两个政权对立的不了解与估计不足，过分的估量了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忽视反苏联战争的主要的根本危险，忽视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认识帝国主义武力直接干涉苏区的危险，对领导扩大与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消极，不了解红军积极化的重要，对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当作是前途而不是目前行动的方针，将对夺取中心城市迟疑，主张向偏僻方向发展，对扩大红军、反帝运动、拥护苏联与工会工作忽视，对发动群众斗争、白区白军中工作与肃反工作消极，对苏维埃政府工作注意不足，对富农让步。这一切，都是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须集中火力来反对。“左”倾的危险表现在：忽视目前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帝国主义已无法进攻苏联，国民党已无力进攻我们，“围剿”已不可能，“轻敌”必“盲动”，反中农倾向，以及一切立三路线的残余等，也应给以严厉的打击。同时，要反对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与口是行非的两面派。要了解放松任何一种倾向在党内存在，就是帮助敌人，动摇革命的战线，同时也就要助长苏区农民落后意识、保守观念、太平思想大大的发展起来，障碍着积极进攻路线的执行。所以对于倾向的自由主义，对于反倾向斗争的调和态度，都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对不容许的。苏区党在不调和的斗争中，坚决的进行目前的中心任务，一定能迅速的取得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 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失败之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在进攻中得到了空前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全中国革命运动急速发展的基础之上获得的，这一胜利更给了全中国的革命运动以有力量的推动，使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化。

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即是中国工农民众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胜利，即是中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最有力的回答。这一胜利，使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形崩溃动摇。这一胜利的继续发展，无疑的将根本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使中国数万万劳苦民众继续遭受到压迫、剥削与屠杀，为了要使中国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中国民众变为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奴隶与顺民，为了要造成全中国更大的经济浩劫与水旱灾荒，以至为了要造成进攻苏联的巩固的后方，自然不能不更疯狂般地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行新的“围剿”。

二、国民党的四次“围剿”的正式开始，依照全盘“围

剿”计划，而开始积极行动，是在它出卖了东三省，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国联调查团详细“调查了”南京、汉口、平汉路与津浦路之后。在这一“围剿”开始之前，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中间曾经有过不少的协商与谈判。这一“围剿”的组织者无疑的是世界帝国主义者。

世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前面表示了绝大的恐怖。他们认为如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现在对于如火如荼的“赤祸”在目前不加以打击，“那一年之后，共产党的中国将变为实际的可能”。所以他们主张“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他们，必须不顾一切的代价去应付他们”（见六月十五日《大美晚报》评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们以大批的军事顾问、大批的军械去供给“剿赤军”，他们愿意国民党以停付一年外债的二万万万元去做“剿赤”的费用。他们利用一切他们政治的、财政的、军事的力量，动员国民党军阀去一致的进攻苏区与红军。没有帝国主义这些作用，国民党的四次“围剿”是不可能的！

为了要更进一步表示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与它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中的清道夫作用，为了要取得帝国主义对于它的欢心与信任，国民党必然要更积极的更凶恶的向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攻。只有继续积极的无耻的出卖中国，向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攻，国民党才能得到帝国主义的拥护，维持它自己的统治。

三、为了要用一切力量去进攻苏区与红军，为了要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决死的斗争，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现在又决定蒋介石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向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进攻了。蒋介石的中心部队现在都向汉口与蚌埠输送。胡宗南的第一师已经开到安庆、合肥，徐廷瑶的第四师则在蚌埠

与正阳关一带，蒋鼎文的第九师则正在从浙江调往皖西。开于汉口的已有俞济时的八十一师，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卫立煌的第十师，蒋伏生的八十三师。同时川军除已有三十六团外，还正在不断的向湘鄂西开拔。总计现在云集在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周围的军队有三十师以上。

在长江以南，在闽粤赣湘四省内，南京政府用尽种种方法与粤方妥协，集中兵力向闽赣、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进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南京政府曾任何应钦为“闽粤赣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司令。在湘粤赣三省边，何应钦已指定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协力向湘赣苏区进攻。十九路军各师已经开到闽西，协同入闽粤军向闽西苏区进攻。第八军的赵观涛已被任为“赣东北剿赤总指挥”，向赣东北苏区进攻。总计目前敌人方面进攻闽粤赣湘的部队已在三十五师以上。

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了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决死的斗争，已经动员了它所有的中心部队向着各个苏区进行它的四次“围剿”。

四、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四次“围剿”，显然同三次“围剿”有着很大的不同，帝国主义在这一“围剿”中的作用是大大的增加了，这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庐山会议与北平会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更进一步的出卖中国，更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助力，去进攻苏区与红军。参加作战的军队，比了三次“围剿”增加了一倍以上。粤军、湘军以至西北军（如刘镇华、商震等军队）都被动员参加战争。“围剿”的范围也愈是扩大，战线从广东一直到河南，从福建、安徽一直到湖北四川。国民党是更其拼命的残暴的凶狠的向着苏区与红军进攻了。

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三次“围剿”与四次“围剿”的中间，存在着全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大风暴，扩大到十八省的水灾饥荒，空前的国民经济的浩劫，工农兵以及灾民、难民的斗争的伟大发展，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一切这些，不能不使这一次的“围剿”比较第三次也更为困难了。

四次“围剿”的最大困难，是在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大大削弱与工农民众革命力量的大大增加。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首先表现在它的民族的以及其它的武断宣传范围的缩小。自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真面目与它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的作用，是更为全国民众所了解了。国民会议、国难会议以及国民救国会议等的把戏，已经完全宣告破产。对于救济灾民、振兴实业、开发水利等等的欺骗，完全为铁的事实所粉碎。因此，虽是国民党现在正在利用一切方法，散布“发展匪区农业”、“建设匪区道路”、“改善农村经济”、“抚绥流亡”等的欺骗宣传，而且主张“大部分要在政治上解决共匪问题”，然而这一切很少能够在政治上动员群众，去进攻苏区与红军了。因为民众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出卖中国、造成全中国国民经济的浩劫与水旱灾荒的，完全不是“共匪”，而是国民党的统治！

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许多反革命派别如像第三党、“社会与教育派”等对于这一次的“围剿”表示怀疑与悲观。他们认为“不发展匪区经济”，“不安定匪区民生”，“匪”不但是“剿”不完，而且将愈“剿”愈多。甚至有人主张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建立“民众武装，民众政权，以发展农村经济”，以根本消灭“共匪”（见第三党《民众

导报》十五期)。更有人认为在目前“对外重于对内”，故主张“如共党肯放弃暴动政策，一致对外，则共党可以合法存在，红军可以改编为国军”（《新创造》第一期）。这类武断宣传，现在差不多在很多报章杂志上都经常的发表出来。他们一致的目的，是在用更聪明的方法在政治上准备进攻苏区与红军，用更狡猾的方法来欺骗民众，说破坏民生、破坏经济、帮助帝国主义者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好这样来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这些武断宣传，也很少能够引起民众的同情。因为事实证明，只有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我们才谈得上经济建设，真正能同帝国主义实行民族的革命战争。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其次表现在它的财政的深刻的破产。即以南京政府每月军政的经常费而论，即有一千二百余万元的不足。在“围剿”时期，这种费用的大大增加是毫无疑问的。即如收买十九路军军官，把十九路军兵士运往福建，就须用去五千万元。那这一费用的浩大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收入的来源，当然除了借债之外，非拼命剥削民众不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无奇不有的苛捐杂税，正在一天一天增加。一切教育费、堤工费、赈灾费等，现在都一齐搜括来作为“剿匪”之用，甚至为了“剿匪”更进行着鸦片公卖。

然而全中国的经济的浩劫，与普及全中国的灾荒，以及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残酷的剥削，使全中国的民众大批失业破产，流离死亡。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国民党如何敲诈剥削，然而收入的日益减少已成为经常的现象。而且全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三千万人口的东三省则已为国民党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那里海关一项的收入每年就有四千万元。国民党财政的毫无出路，

已是再明显没有的事了。国民党一切“开源节流”的办法，只会增加广大民众的新的负担和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愤恨与反抗。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第三表现在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崩溃动摇。因为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影响，因为他们本身生活的痛苦，在国民党军队中经常发生士兵反抗官长、要关饷、要清算伙食账、要改良待遇的斗争，大批的哗变投入红军的事已经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在邻近苏区的白区中。工农红军在国民党士兵中有着绝大的影响，他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是正在增长着，更大规模的兵变潮流还在前面。在国民党调动的七十万士兵中间，真能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肯拼着性命同红军作战的，当然是少数。

最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还表现在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涣散与冲突。虽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使地主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一致的团结起来，向苏维埃与红军进攻，使他们内部不能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战争，而且常常在加紧进攻苏区与红军中来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然而，他们内部的冲突与矛盾还是存在着。在苏维埃革命怒潮前面他们表示了张惶失措，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他们能够战胜工农红军与消灭苏维埃运动。孙连仲、李鸣钟、陈调元等部队的覆灭，已经给了一切“剿赤军阀”以最大的教训。他们在“剿匪”中都想牺牲别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们内部的指挥是不统一的。这次蒋介石的出动武汉，并没有引起各方的拥护，而且宁粤的冲突正在新的方式中开展起来。

五、然而这次“围剿”的最大困难，是在于工农民众革命力量的大大增加，首先是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

自从三次“围剿”之后，闽赣苏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巩固。赣南的上犹、崇义、南康、信丰，福建的宁化、清流、上

杭、武平、龙岩，都加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红军在作战中间，扩大了一倍的数量，补充了一、三军团，创造了新的五军团。在漳州的占领中间，击溃了张贞的六团与陈国辉的三团，在军火上给养上都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鄂豫皖的红四军对于敌人在“九一八”之后所布置的“围剿”采取了积极进攻的策略。在鄂东方面，占领了黄安城，消灭了六十九师赵冠英全部，击溃了李鸣钟、萧之楚、夏斗寅各师。在豫南方面，占领了商城、固始、潢川等县，消灭了白军第二师，击溃敌人五六师之众。六安、霍山、霍丘、正阳关的占领中，把陈调元、岳盛宣、王均等主力完全消灭。最近在豫南方面又消灭了郜子举的新二十师与张钫的全部。第四军已扩大为四方面军，人数亦有一倍以上的增加。鄂豫皖苏区已完全打成一片，得到了绝大的扩大与巩固。

其他在湘鄂西在湘赣在赣东北等苏维埃与红军都有很大的发展与巩固。红二军在鄂中天门、京山、应城一带，曾经消灭了徐源泉一旅、萧之楚的一部，缴得了敌人机关枪二十余架，步枪千余支。在六月初，在潜江一带更击溃了川军张邦本、郭勋两旅，范绍增师全部，夺获步枪二千五百，机关枪三十八，迫击炮十五门。

英勇的工农红军在与敌人长期的作战中间，在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三次“围剿”之后，已经得到了丰富的战斗的经验，走上了铁军的道路。在各苏区内，一般的都正确的解决了土地问题，肃清了AB团、改组派与社会民主党等的反革命，转变了苏维埃与红军中的工作，加强了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与红军中的领导。党在群众中的权威与信仰是大大的提高了，群众对于自己的力量信念是更其坚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更给了各苏区以总的政治上与

军事上的领导。

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作战的红军，已经不只是江西的一部分，而是所有的红军，还有成千成万的赤卫队、少先队与童子团都加入了战争。战争的区域，已经不单是江西，而是福建、广东、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作战的区域，已经不在苏区旧的根据地，而在新的苏区了。红军的行动，比较从前更有集中的领导，更能互相呼应地向敌人进攻！

在全中国的民众中间，苏维埃与红军的权威、民众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信仰与拥护是大大的提高了。党所领导的拥护红军胜利的运动，在群众中尤其是工人群众中已经得到热烈的反响。大批的工人要求到苏区去参加革命战争。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很快的了解到苏维埃与红军是全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苏维埃政权是他们从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铁蹄之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

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次“围剿”中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同三次“围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力量已经有了百倍的增加。

六、在非苏区内，反日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进到了更高的阶段。这一斗争，现在已经不再是对国民党政府的请愿，不再是以学生为中坚的罢课与示威，而已经是工人的罢工与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进行了。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正在东三省很大的开展起来，这一反日战争当然同时也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与反国民党的战争。

工人阶级的罢工怠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与反对中外资本家的斗争，正在全中国开展着。斗争从轻工业一直扩大到市政、兵工厂、轮船、铁路与矿山，从一厂的扩大到几厂的以至一业的同盟罢工。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是大大的提高

了。农民、灾民的斗争，从抗租抗税、分粮抢粮，一直到同国民党军警与民团的武装冲突。兵士的斗争与哗变的潮流正在加速度的开始。这些斗争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发展到游击战争与新的苏区的创造。陕甘边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创造，燃烧起了北方苏维埃的火把！

革命危机在全中国是存在着。在这一革命危机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是大大的增加了。苏区的扩大与巩固是在中国共产党唯一领导之下而成功的。苏维埃区域内将近一万万的工农群众，相信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热烈的拥护着中国共产党。即在非苏区内，广大的群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而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党，要求共产党的领导。

为全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斗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虽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下，进行着艰苦工作，虽是为一切反革命派别所造谣污蔑，然而它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在执行共产国际正确的路线之下，已经大大的扩大与提高了。这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得到胜利的唯一保障。

全中国汹涌着革命的怒涛，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冲击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最后的堡垒。这一怒涛，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互相呼应着，从这一怒涛中正在涌现出新的苏维埃区域！

七、清楚的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之后，我们可以断定我们不但能够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四次“围剿”，而且将从新的胜利中取得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我们必须最严厉的打击那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一“围剿”前面，表示张惶失措的，那些无气节的，对于革命力量没有信心的小资产

阶级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与忽视这一“围剿”的特殊意义，以为这不过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照例的进攻，以为苏维埃与红军照例可以得到胜利，而不去动员一切力量去反对这一“围剿”的“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

我们必须最明确的看到，同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冲突的阶段是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的前面放着最伟大的历史任务，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

国民党这一次的失败，必然会使帝国主义者不再相信国民党有征服“赤祸”的能力，必然会亲自出马，动员它所有的一切海陆军同苏维埃与红军作战。帝国主义者在目前已经调动了大批的军舰与陆战队在中国沿海与沿长江各口岸，准备着直接的武装干涉，这种干涉在东三省是早已开始，而其他的区域是同样会来的。回想到红军占领漳州时，帝国主义军舰集中于厦门、海口的就有三十多艘，那就可知道帝国主义这些大炮机枪是向着谁瞄准的了。

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的力量，我们也不能有过分的估计。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现在是在普遍的经济恐慌中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极大的发展。在西班牙，在智利，已经存在着革命的危机。在德国、波兰等国家内，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正在成熟着。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功，与它对于反帝国主义的组织与领导作用的加强，将不能使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中国不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且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还是丝毫的找不到解决与出路。

我们坚决的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军械虽不及帝国主义，然而我们有的是广大的千千万万的民众，这些民众将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为了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进行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在长期的艰苦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将是胜利者。

但是，无疑的，世界帝国主义是我们更有力的更凶暴的敌人。要战胜这一敌人，我们必须要有最大限度的努力与牺牲的决心。而且只有战胜这一敌人，我们才能创造出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中国！

八、为了要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为了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的冲突与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认为在苏区与非苏区的党必须执行下列的战斗任务：

（一）苏区的党必须立刻动员广大的群众，召集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解释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意义，提出“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保卫苏维埃根据地”、“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打倒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干涉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去”等口号，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红军、赤卫队、运输队、交通队、担架队等，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动员一切力量来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二）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各苏区的红军必须更有计划的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决执行中央最近军事计划，以造成占领南昌与包围武汉的形势。但绝对不能以进攻策略，解释为军事的冒险，或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

（三）尽量扩大与巩固红军。中央区除完成预定计划外，

扩大三分之一，鄂豫皖二分之一，湘鄂西三分之一。湘鄂赣十六军，赣东北第十军，必须编足两师。湘赣二十一军编足三师。闽西十二军与赣南二十二军，必须充实起来。尽量吸收雇农与工人加入红军，加强红军中工人阶级的骨干，并提高红军士兵的政治水平。红军优待条例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与射击飞机的演习。必须最大限度的发展地方武装，有计划的进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以保护苏区根据地，扰乱敌人后方，扩大苏区。

（四）坚决的转变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吸收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具体的切实的帮助当地民众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举行秋耕与秋收运动，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建立苏维埃各委员会的工作。必须征收土地累进税与营业税，统一苏维埃的财政。坚决实现劳动法，改善工人生活。用一切方法保证苏维埃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各苏区应互派代表交换苏维埃建设的经验。

（五）更坚决的广泛的动员群众进行反日、反帝、拥护苏联的工作。必须清楚的了解到苏维埃政权不但是土地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现在立刻应该准备“八一”工作，更响亮的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武装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必须清楚的告诉群众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接近与到来。反帝同盟与苏联之友的组织必须更广泛的深入群众，在“八一”应该举行盛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拥护苏联的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举行各苏区的反帝同盟与“苏联之友”等的代表大会。

苏维埃不但是苏区工农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且也是非苏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因此，各苏区的党必须有

计划的选派党员团员到环绕苏区周围的白色区域，首先就是武汉、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平汉路、南浔路、武长路、株萍路等工人、灾民与士兵中去建立工作，加紧白色区域工作干部的训练与加强对于已有组织的领导。在苏区根据地的周围，必须创造许多游击的区域，并加强对于已有游击队的领导。对于白军士兵的工作应该更有计划的来进行。

（六）非苏区的党，必须立刻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宣传国民党在这里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作用，更具体的宣传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政权与武装力量。号召群众的罢工、关车、飞行集会、车间会议、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反对四次“围剿”。利用苏维埃与红军在群众中的深刻影响，组织群众对于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积极性，更广泛的扩大“红军之友”，吸收积极的工人分子进去工作。募捐征调等工作必须变为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政治运动。应该抓住国民党借债、取消教育经费、水利赈灾费、加捐加税、鸦片公卖等具体事实，组织工人、失业工人、学生、灾民、难民、城市贫民与乡村农民反国民党的斗争，把这些斗争同反对四次“围剿”密切的联系起来。

（七）发动组织与领导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准备与组织一业的同盟罢工。转变赤色工会的工作，建立几个真正有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会，首先是纱总、海总、铁总、矿总、市总、五金总。在邮务工会、报界工会、出版业工会中建立革命反对派。真正开始失业工人的工作。特别注意铁路、轮船与兵工厂的工作，尤其是在平汉、津浦、沪杭、沪宁与运兵轮船上的工作。全总海总党团应该更具体的布置这些工作，应该有计划的那些地方进行破坏。

（八）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来进行白军士兵中的工作，尤

其是蒋介石、陈济棠的中心部队与十九路军。领导士兵为关饷、要求改良待遇等的日常斗争，准备有计划的革命兵变。发展与领导各省的农民灾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配合哗变兵士，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来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与分散敌人进攻中心苏区的力量。陕甘省委与江苏省委应特别加紧在陕甘游击队与徐海蚌游击队中的工作，采取建立新苏区的路线。

（九）更应十百倍地加紧反日反帝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的工作。更具体的依照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去布置工作。各地党尤其是河北与满洲的党，应该动员大批的干部到东北义勇军中去夺取反日战争的领导，把这一战争同土地革命汇合起来。

（十）应该特别加紧揭破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指出一切他们的“和平建设消灭共匪”的理论以及“非战运动”实际上都是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又一办法。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之后，才能和平建设，才没有战争，只有革命的战争才能消灭反革命的战争。一切这些反革命派别都是国民党的后备队与国民党统治的拥护者。

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有坚固的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必须明显的看到党的组织力量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党的一切工作还远落在革命发展之后。各地的党必须更广大的做征收党员运动，提出“成千成万的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为增加一倍党员而斗争”等口号。必须更彻底的转变支部工作、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提拔新的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中来，加紧对于新党员的教育，帮助团的工作的建立与转变，与它的冲锋季工作计划的完成。更无情的打击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北方

落后论”，对于革命没有信心以及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的空谈，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必须重复的说，坚固的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唯一保障。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为十九路军调闽 给福建各级党部的信

——争取十九路军与红军共同抗日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苏维埃运动猛烈的发展，工农红军英勇光荣的胜利，更加兴奋与推动全国千百万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与建立苏维埃政府而斗争的热情与勇气。

闽西红军光复龙岩，占领漳州，近迫厦门，高树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土地革命”、“进行民族战争”的苏维埃红旗，使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惊慌失措与发抖。

为维持着他们剥削与压迫的统治，帝国主义、国民党协同一致的调动一切力量向苏区红军进行残酷的战争，除英美日大批军舰集中厦门外，国民党在签订卖国协定出卖上海之后，已将反日的十九路军士兵开到福建去了。

十九路军是一个较有战斗力的部队，一般士兵群众在江西即受到土地革命的影响，在上海反日群众高潮激动之下，十九路军坚决的反抗官长的命令，自动起来与日军作战，发生了有名的一二八事件。一般兵士群众受到国民党的压迫与剥削，不断的爆发斗争。这一次调来福建，更惹起了士兵群众极端的愤

激与反抗。你们应该以布尔什维克的热忱，努力的去进行这一严重的工作，实现争取十九路军士兵到红军中去、“哗变到红军中去”的战斗任务。你们对十九路军士兵工作，我们有以下意见供给你们：

（一）加紧宣传国民党无耻的投降与揭破他们对于兵士的欺骗；同时要加紧苏维埃红军反日反帝的宣传，利用各种公开团体名义，组织宣传队与冲锋队，向士兵作广大的宣传与鼓动；在士兵营附近散发传单，写贴标语，赞扬士兵英勇的反日，说明苏维埃政府是反日的领导者，红军是反日的铁军。同时必须指出：国民党军阀出卖满洲、上海，出卖士兵反日战争。利用刚开到的时机，在士兵驻扎的区域举行群众会议与示威游行，以掀起兵士群众对国民党的愤慨与拥护苏维埃的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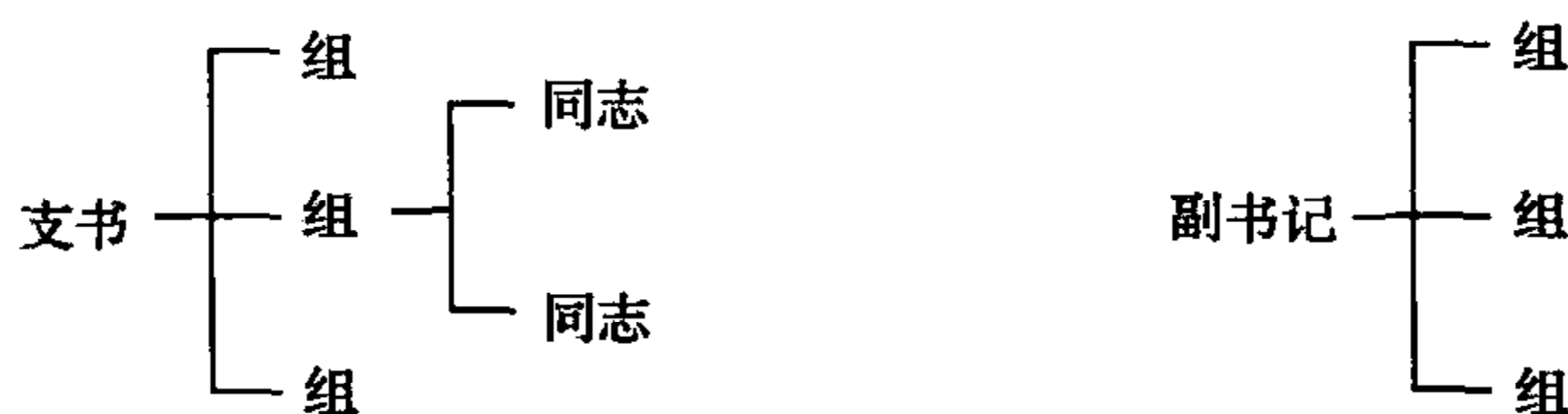
（二）训练士兵工作干部至少五人，至少动员二十个以上的赤色群众，告诉他们士兵工作的任务、方法与技术，利用一切可能及打入十九路军部队中去展开党的兵士工作，切实领导与组织士兵日常斗争与哗变。同志及赤色群众与十九路军有关系的，必须特别指定他们专门来进行这一工作。

（三）准备组织十九路军士兵斗争与哗变问题。你们应当了解，争取十九路军士兵到红军旗帜之下，为目前最紧迫任务。因此，你们应运用营内营外的一切活动，抓紧十九路军士兵的情形与要求——反对克扣军饷、发鞋袜、反对吞没慰劳品和捐款、虐待伤兵等（详细斗争要求另附），发动群众日常斗争，开展广大的哗变。但是你们必须了解，每一个哗变发动以后，首先的任务就是坚决的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自己在政治上的使命，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掩蔽，才能发动起群众的游击战争。前次闽南某部两连兵变之失败，必不是游击队没有好的配合，主要的就是他们没有去坚决的执行政治

任务，这样教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四) 健全兵委的组织。瓦解敌人部队，是党、团及赤色群众最主要的工作。因此，你们必须将士兵工作做一严格的检查，把兵委切实组织起来。首先是厦门、福州最少要有三人专负责。推动党团及赤色群众进行工作，经常讨论士兵工作。目前兵委应将一切力量来开展十九路军的兵士日常斗争与组织哗变（福州党同样的应将刘和鼎部工作切实加紧建立起来）。

(五) 因为军队是有严密的组织的，因此，我们在军队中的党与群众组织的方式，应当特别注意到严密。党在军队中只有支部的组织，支部直属于地方党部之兵委（支部以连为单位）。每个支部只有直的关系，绝对禁止横的关系。如下图：



每一小组至多以三人为限，如人数更有发展，则可指定一候补书记，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另可成立三个小组。但我们应当注意：A. 每连当中，同志只宜有二十人左右，如更有发展，则可将一些同志设法调往他连或部队内工作；B. 部队内党的组织较大而开往某处或前线时，兵委可派一特别员随军队，或指定支部中一特别好的同志为特别员，以便指挥工作；C. 支部会议须完全利用各种环境的可能，进行个别谈话；D. 一连中人数过多时，应把同志分散到其他连中去。

你们要接到中央这一封信后，须刻不容缓的召集会议，定出切实计划，坚决的执行。同时，你们必须集中火力打击忽视士兵工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执行的经过须详细报告中央。

中 央

附：我们对十九路军士兵目前的标语口号

1. 反对进攻红军的混蛋命令！

A. 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签订卖国协定，甘心断送上海调我们到福建来，是禁止我们士兵英勇的反日战争，阻止红军的反日反帝战争！誓死不打反日的红军！我们要继续反日战争！

B. 帝国主义大批军舰集中厦门，直接要同“反帝红军”作战，反日兵士誓死不打红军！拥护红军的民族革命战争！

C. 反日红军是反日士兵的好朋友！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敌人！

D. 国民党不派一兵一卒救助上海反日士兵与东北义勇军，无耻的出卖上海、满洲，现在却强迫我们用飞机大炮去轰炸屠杀中国红军与苏维埃区域的民众，反对国民党的混蛋命令！永远不打红军！反对进攻苏区！

2. 反日士兵与反日红军联合起来！

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A. 红军是反帝的铁军：红军到哪里，帝国主义都得滚蛋！（没收帝国主义一切银行工厂，自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B. 日军怕反日士兵，更怕反日红军！反日士兵与反日红军联合起来！定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回上海、满洲！

C. 反日士兵拥护红军对日军宣战！

D. 一切帝国主义都怕反日义勇军与反日士兵！更怕反日反帝的红军，反日义勇军的反日士兵要与红军一起向着帝国主义开火射击！

坚持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

3. 组织与拥护士兵委员会士兵反日会！

争取自己的切身利益与政治自由！

A. 反对克扣军饷，要求增加月饷！

B. 反对虐待伤兵！吞没慰劳品和捐款！力争死亡兄弟的抚恤金！

C. 不吃带沙子带酸味带毒气的粗米与饭！

D. 要发鞋袜！

E. 反对横暴打骂，士兵说话行动自由！组织与拥护士兵委员会！

F. 组织士兵反日会！加入民众反日会！

4. 转掉枪头枪毙一切反动长官！

拥护与加入红军！

A. 国民党军阀完全押扣军饷，虐待残废伤兵，吞侵慰劳品和捐款及死亡弟兄的抚恤金，要我们吃带沙子酸味带毒气的粗臭米饭，不发鞋袜，不许说话行动自由，不许组织士兵委员会、士兵反日会，不许我们进行反日战争，一次两次的强迫，还使用机关枪扫射！不许我们援助义勇军，强迫我们进攻反日反帝的红军，士兵弟兄们，大家一致团结起来，掉转枪头枪毙一切反动长官！

B. 士兵兄弟们树起我们红旗！枪毙反动长官！保证反日反帝一切革命运动，打开监狱，解放一切革命战士！解除反动武器武装革命民众，帮助工人一切斗争罢工，没收地主豪绅财产分配给劳苦农民与士兵！实行与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建立工农兵苏维埃！

C. 只有在红军中才是士兵一律平等，投到红军中的孙连仲部队的士兵兄弟，现在与红军兄弟一起，杀绅豪分田地痛快

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我们要解放要痛快要中国独立自由，只有哗变到红军中去！拖枪到红军中去！

5. 打倒国民党政府！

拥护苏维埃政府！

A. 国民党政府是军阀、地主、豪绅、资本家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的爪牙！是屠杀压迫和剥削劳苦群众的刽子手！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汉奸！

B. 苏维埃是工农兵自己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死敌！是劳苦群众解放运动的旗帜！

C. 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

拥护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共产党！

D. 国民党是压迫士兵群众，压迫反日反帝及一切革命运动，进攻红军，破坏民族革命战争，士兵要解放，民族要独立，必须首先打倒国民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反帝斗争纲领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央苏区
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一) 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中国。

帝国主义为维持在中国的统治，派遣大批海陆空军到中国，直接的屠杀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与进攻中国革命。为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一切海陆空军以及警察等武装力量，没收帝国主义一切军事设备，如飞机场、无线电台、兵营、仓库、修械厂、海军船坞等。

(二)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及其他企业等。

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是直接榨取中国广大工农劳动群众血汗，使中国工农劳苦群众陷于饥饿痛苦的地位，这些企业又同时增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的与军事的统治的作用，因此对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及其他企业都须一概归苏维埃国有。只有某些个别的企业，在目前完全服从苏维埃法律和命令的条件下，才能重新另订租借条约，继续生产。

(三) 争取中国独立和统一，收回帝国主义租界与租借地，取消领事裁判权。

帝国主义强占中国土地，划为租界和租借地，并利用领事

裁判权，建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苏区工农为要争取苏维埃新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全独立和统一，须收回租界与租借地，反对帝国主义设立自由市，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政、司法和警察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

（四）取消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法律的保障，要废止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首先须否认并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五）否认一切外债与赔款。

自满清政府以及北洋军阀政府直至国民党政府，在一贯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下，订立屈辱条件，承认无数万的赔款，这无数万的金钱都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血汗。反革命政府又向帝国主义举借外债，这些外债只有助长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加重剥削中国工农群众，帮助军阀混战的发展，压迫革命运动，并中饱军阀、官僚私囊。对这些赔款和外债及举借外债时所订立的条件，须一概否认。

（六）收回帝国主义侵占的海关、盐税等。

帝国主义为要尽量的剥削中国工农劳苦群众，阻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海关的管理、税率的决定操在自己手里，形成了对中国经济的垄断，强销帝国主义工业品，并榨取廉价的原料；同时将盐税亦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剥削中国盐的消费者——广大的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因此必须将帝国主义掌握的海关、盐税，收归苏维埃国家管理征收，一切税率由苏维埃政府自己决定。

（七）反对与帝国主义亲密结合的封建势力，彻底完成土地革命。

中国大多数群众同土地和乡村生活联系着。帝国主义维持中国的封建势力，经过地主与高利贷者实行对广大农民的封建

的掠夺，所以农村经济的命脉，就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因此更加速农民的穷乏化。为要推翻帝国主义在农村中的掠夺，必须彻底没收地主一切土地，消灭地主阶级，反对富农。将良好的田分给贫农、中农、雇农，分给富农以坏田，彻底完成反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

(八) 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没收帝国主义在华教堂、学校和一切文化机关及其财产。

帝国主义除了进行政治军事与经济的侵略以外，又进行文化的侵略和宗教的麻醉，施行欺骗和迷信的宣传，企图阻碍中国群众的革命思想的发展。帝国主义办理教育的目的，在养成奴隶的买办人才。帝国主义的宗教教堂遍布在中国穷乡僻邑，更尽其帝国主义间谍和侦探的作用。中国工农群众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传布的宗教，反对文化侵略，主张没收由剥削工农血汗所得的教会和文化机关的财产，以最大的积极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文化教育工作。

(九) 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

帝国主义为维持其武力的统治，发展军国主义，实施对工农劳苦群众特别是青年工农欺骗或强迫的军役和军事训练以进攻革命；同时在目前帝国主义经济日益崩溃的历史条件下，更采用法西斯蒂主义的统治形式，施行极端的白色恐怖，组织恐怖的队伍，并以全民和职业代表等的思想，遮掩资产阶级直接的彻底的专政。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在全世界阶级斗争两极化日益尖锐的时期，到处抬头，更特别利用社会法西斯蒂——社会民主党及托洛茨基派等以维持反动统治；对于殖民地施行彻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武装干涉，这更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的特征。中国工农群众反对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反对社会法西斯蒂，反对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军国主

义化、法西斯蒂化，如组织“剿赤”义勇军、民团、靖卫团、保安队、童子军等。反对中国军阀混战与强迫兵役（如抽丁）和征发（如派捐、派款、拉夫、封船等）。

（十）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政治派别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反对民族武断宣传。

国民党是投降帝国主义的，一切反动政治派别（国家主义派、取消派、社会与教育派、人权派等）都是拥护反动统治的。他们在群众的反帝怒潮中，传播民族的武断宣传——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民族改良主义、全民武装、军国主义、国民会议等的反动思想，这些手段的主要作用是企图阻碍群众的阶级的觉悟，和缓群众对反革命的斗争，以维持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是更进一步准备进攻苏联的战争和进攻苏区红军。因此必须坚决的暴露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的真面目，与这种反动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十一）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反对国民党上海休战条约及与帝国主义的一切密约协定。

在目前全中国苏维埃政权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日益尖锐。国民党在其与工农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作斗争中，已不断的宣告破产，帝国主义遂由暗中进行的侵犯转为公开的战争。自从日帝国主义出兵东三省，以至完全占领东三省与进攻上海，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的出兵中国边境与沿海、沿江各口岸，最近共同签订上海休战协定。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公开的直接的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行动是日益急进了。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必须武装起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反对国民党上海休战协定及与帝国主义的一切密约协定，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压迫中国革命。

（十二）联合世界革命大本营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

苏联。

全世界政治形势亦表现两种政权与两个经济系统的对立：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兴盛，五年计划完满成功，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已开始；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已走到穷途末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的猛烈发展，成为目前国际关系的核心，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危险亦极端紧张了。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的世界革命大本营，中国和苏联工农劳苦群众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上是兄弟般亲密的团结。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指导下，将得到苏联无产阶级伟大的帮助。中国群众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而斗争。

（十三）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强盗战争。

目前国际政治的中心，是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爆发前夜，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因此，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危险是主要的根本的危险。但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便会减轻了，它们中间的战争危险便会消灭了，相反的，它们的矛盾仍然增长，战争的危机仍然是存在和发展。因此对于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危险，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必须加以坚决反对。因为这一战争如果爆发，必然葬送全世界的工农群众于血泊炮火中。

（十四）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

国民党是和帝国主义武力结合起来进攻苏区和红军，因此发展革命战争，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消灭国民党的统治，正是驱逐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搏斗的必要条件，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前提。

（十五）扩大民族的革命战争，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

宣战，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已经宣布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苏区工农群众须一致的拥护中央政府的决议，首先消灭国民党的武力及其统治，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十六）拥护与扩大中国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

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是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在几年来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残酷斗争中，显示了无比的英勇和坚决。苏区工农群众须一致拥护红军，扩大红军，实际的参加战争，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十七）统一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

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实际领导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和帝国主义斗争，只有苏维埃区域才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只有在苏维埃区域里工农群众已经从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压榨下解放了出来，建立了工农自己政权与新的政治生活。苏维埃政权要在全中国工农群众的拥护和英勇的斗争中统一全国，使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获得中国的整个的独立和自由。

（十八）援助和领导白区的反帝斗争。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是在疯狂地进行，白区工农群众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愤激亦日益深切；特别在苏维埃红军不断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无产阶级罢工斗争的领导之下，使全中国反帝反国民党斗争更加有力的高涨起来。为要配合和领导他们，苏区工农劳苦群众必须从实际斗争中，特别从革命战争的发展中，并从精神和物质的援助中，使全国反帝斗争更扩大深入起来，为驱逐帝国主义、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范

围的胜利而斗争。

(十九) 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掠夺和压迫，反帝国主义的营垒中，包括无数万万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这个伟大的群众醒觉，雄厚的斗争力量，必然淹没帝国主义的统治。而且苏联无产阶级的胜利已有十四年，充分指证了反帝斗争的光明前途。中国革命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国际团结的斗争和拥护中，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促成世界革命的成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 刊印。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北方
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基本通过)

(一)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开展着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在更加的紧张与尖锐；经济危机影响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与一切生产部门；贫困，失业，生产缩减，工厂与银行的倒闭，财政的危机统治着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奠定了它的基础，五年计划的四年完成使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伟大的工业的建设，集体化的成功，富农阶级的消灭，劳苦工农生活的改善与积极性的增长，使苏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能够为着“最后消灭资本主义的成分，最后消灭阶级，完全取消产生阶级及剥削制度的根源，克服经济中及人民观念中的资本主义的残余，将劳动群众全体转变为社会主义无阶级社会的觉悟的和积极的建设者”（联共十七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令）而斗争。这就空前的尖锐地暴露了建设着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间争斗，胜利毫无疑问地是属于社会主义方面的了。这不能不引到帝国主义反苏联反革命的战争危机的空前的紧张。反苏联战争的危险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的危急。在满洲被摧残与蹂躏之后，在上海浴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正是向着苏联的边境前进，大炮的雷鸣轰响

于邻近苏联的满洲的边境；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了派遣大批的军队在满洲之外，更武装了日本在满的侨民，组织屯田军，武装白俄，在韩国建立了极大的兵工厂，改造松花江的商船为兵舰，建筑许多的飞机场，利用在它卵翼之下的“满洲国”的政府来作反苏联的工具。其他帝国主义者集中大量的军队来进攻苏联与中国苏维埃。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同盟者法国帝国主义正在疯狂般地进行组织与扩大反苏联战争的西方战线，进行最无耻的挑衅的行为（戈洛罗夫事件等），英国帝国主义正在企图恢复英日同盟，美国帝国主义积极的赞助与组织反苏联的战争，法意协约的订立，多瑙河同盟计划等等都是最明白说明帝国主义者积极的准备反苏联战争的冒险正在狂热地进行。裁军会议与社会法西斯蒂的和平主义的空谈，只是掩饰战争准备的积极进行与社会法西斯蒂的公开无耻的参加反苏联战争的热忱。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国民党的统治，最公开与无耻的出卖中国给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它们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用枪口向着中国苏维埃与苏联。它们公开的出卖淞沪，使日本帝国主义者能够将大批的军队去进攻苏联，它们出卖满洲给日本帝国主义作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所谓“开发西北”、“充实西北边防”，实际上是国民党准备在这方面进攻苏联的步骤；所谓牛兰案件的武断的煽动以及一切国民党报纸的咒骂与挑衅，南京的禁止登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消息的密令，都显然是反苏联战争在中国的舆论的准备步骤。最后，应该记得国民党新的对于苏区的总进攻是帝国主义在积极准备武装进攻苏联行动中的不可分离的必要的步骤。一切反革命派别——特别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无耻的宣传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冷淡及否认反苏联战争的危险的存在，实际上是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来进行反苏联战争的舆论的准备，企图阻滞在全国劳苦群众中增长

着的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同情与信念，企图麻痹群众动员拥护苏联的警觉。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矛盾的尖锐是目前国际关系的核心，同时它极大地加紧了资本主义本身的一切矛盾的紧张，它激起千百万的无产阶级起来争取危机中的革命的出路。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极猛烈的发展着，造成了许多国家间的革命危机的成熟。在经济恐慌的面前，各个帝国主义列强间为着重新分割市场（特别是在瓜分中国问题的周围）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亦在增长起来。这种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与冲突不但不能减弱，反而只有增加它们共同一致的进攻苏联的争斗，企图牺牲苏联，求得从危机中解脱起来。

在紧张的反苏联战争危险的面前，在中国共产主义者面前放着伟大的历史的任务：积极地组织领导广大的千百万工人与劳苦群众起来反对反苏联战争；反对战争的争斗，应该首先是十倍百倍的发展与加强在苏区与非苏区之中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战斗，扩大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消灭阻碍民族革命的胜利与投降帝国主义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同时，应该用最大的力量来组织军事工业、铁路、海员、兵工厂的争斗，从拒绝运兵、运械直到他们的同盟罢工，千百倍地加强在国民党、“满洲国”及帝国主义在华的海陆军的工作。

北方会议认为，在我们反对反苏联战争危险的争斗的程度与速度远不能赶上帝国主义准备战争的程度与速度。反对反苏联战争的宣传煽动工作还缺乏经常的系统的进行，在我们的队伍中还存着对于反苏联战争的机会主义的轻视，而在目前反苏联战争危险空前危急的时候，对于这种危险的估计不足是最有害的最可怕的机会主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干涉者及社会法西斯蒂的思想在我们队伍的影响，因为它将麻痹阻害我

们的战斗的动员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来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

北方会议指出：在紧张的反苏联战争危险的面前，特别的加重了北方各省共产党的组织的保护苏联的任务。因为一方面，满洲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之后，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前线，另一方面，在“开发西北”、“充实西北边防”的武断煽动之下，明显的看到国民党军阀将从这方面企图反苏联与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冒险。所以，我们必须十倍百倍的加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满洲国的反苏联的企图与挑衅，开展广大的群众的保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运动。这个任务的执行，是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组织工农劳苦群众的争斗与创立北方的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是不能分离的。

（二）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专政与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尖锐的对立。这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核心，这是全国革命危机生长的最主要的标志。增长着的苏维埃运动在蓬蓬勃勃的发展着。在冲破三次“围剿”之后，工农红军在进攻的战斗之中，在一切战线上获得了决定的胜利，击溃了敌人十几师的兵力，缴获了敌人四万余支步枪与几百挺机关枪与迫击炮、几架飞机，夺取了许多城市，大大地扩展了苏维埃区域，在漳州、汀州、龙岩、六安、正阳关、霍丘、潜江、应城、华埠等等城市飘荡着赤色的大纛。

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更加尖锐地表现出了两个政权的对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不仅是它统治着的近一万万人口的区域中的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且是全国的革命运动领导者与组织者。经过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中国无产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是更加巩固了。

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红军坚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

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了自己，大踏步地向着铁军的道路上猛进。由于胜利的扑灭内部的反革命组织，与立三路线的错误政策之肃清，苏维埃政权的改造与巩固，苏区是大大的巩固了，它克服了灾荒、饥饿与敌人的进攻而开始了新的苏维埃建设的初步。由于没收来的地主阶级土地的平均分配与劳动法的坚决实行，工农的生活是有了初步的改善，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苏维埃与红军的威信在全国劳苦群众中是大大地增高了。在广大的劳苦群众之间，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热忱是在增长着，成千成百的工人群众要到红军中去，募捐、慰劳红军的运动是猛烈的发展着。

（三）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巩固和扩大面前，在整个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半殖民地反动统治动摇的面前，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更加积极地起来直接干涉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与瓜分中国。满洲的占领，上海战争，法国的侵入云南，英国的组织藏兵侵入西康，都明白证明帝国主义者公开的最后的瓜分中国的政策是在积极的进行。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是瓜分中国的参加者、日本暴行的同谋者与共同犯，国际联盟与其调查团更明白的是瓜分中国的机关与组织者。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完完全全是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与清道夫。它们以“不抵抗”、“逆来顺受”将满洲的千百万的劳苦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践踏、屠杀与剥削，当着上海十九路军士兵自动的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时，国民党政府及军阀自觉地采取失败主义的政策，以枪杀与恐怖来逼迫抗日的士兵退却，以后并公开地无耻地签订停战协定出卖淞沪，且与帝国主义者一致地进行大上海的计划——就是说将中国无产阶级中心交给国际帝国主义共管。

帝国主义侵略的激进，国民党统治的无耻的卖国，引起广

大的千百万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强烈的高涨。反帝斗争吸引新的千百万群众的参加，群众的反帝运动的多少开展马上就转变成为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斗争，与军警的剧烈的冲突与捣毁国民党的统治机关（上海、广州、福建、山西、河北等）。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初的阶段，虽然工农群众积极性是剧烈的增长，而表面上这个运动以学生运动表现得更加激烈。在目前的阶段上，这种情形已经改变了，沪西纱厂工人的罢工战斗，十九路军士兵的自动抗日，满洲义勇军的英勇战斗，明白的表现出来工人阶级与农民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而英勇的工农红军的光荣胜利与上海战争的教训，更加证明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与推翻了反革命的国民党统治之后，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够得到彻底的胜利。因之满洲的义勇军运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与完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满洲。在中国的面前放着两条路：或者是被帝国主义瓜分而沦于悲惨的殖民地地位，或者独立自由解放的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平民式的消灭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劳苦群众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经济浩劫、饥饿、贫困、死亡的唯一道路。

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派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国民大会决定对日宣战”、“断绝邦交”、“对日经济绝交”等等，在实际上不过是掩护国民党的出卖与投降的烟幕弹，而且实际上是同样的出卖民族的失败主义的道路！集中火力打击这些反革命统治的支持者，断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真正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唯一的领导者，它的各省组织都成为群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唯一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北方各省党的组织在积极的领导反帝斗争中

亦得到了许多成绩，但是在这方面依然是有许多错误缺点与机会主义的动摇。这里首先表现在满洲党的组织机会主义的忽略争取发展着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个别党的组织在反帝运动中或者拒绝反日运动的领导的关门主义——实际上是取消反帝运动的倒过来的取消主义（如陕西），或者是公开的向资产阶级的投降，放弃党的独立的领导与彻底的革命的纲领和口号（如河南与陕西有些县委）。

今后北方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开展北方的反帝国主义争斗；用一切力量争取群众的领导权到我们的手里，揭破国民党改组派的欺骗，动员大批的工人和得力的干部去参加和领导满洲的反日战争；要十倍努力的组织工人群众的反日罢工，发展抵货运动，将抵货运动的领导争取到我们手中来；发展与创立反帝的与反日的广大的群众组织，保证在这些组织中的无产阶级的骨干与领导，武装工人与劳苦群众，开展、组织、领导、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最广大的告诉群众，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够顺利的实行民族革命的胜利，与求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

（四）国民党五年来的统治，不仅以自己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引导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与中国的完全遭受它们的瓜分；而且以自己的反动的经济与政治的方策，引导到全国的国民经济的浩劫与几万万劳苦群众的饥寒与死亡。轻工业的部门（丝、纱、烟、面粉、火柴等）完全处于衰落与恐慌的状况之中，重工业更加的非民族化而完全处于帝国主义的垄断之下。由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的罪恶而造成的空前的灾荒，使农村经济的崩溃更加的急剧而猛烈，几千万万亩的土地、几千万栋的房屋完全地被大水所冲没，几千万农民完全处于非人的饥饿、寒冷与死亡的境地。地主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

府更利用灾荒与“赈灾”的名义来加紧对于农民的剥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将满洲的许多城市及上海的工人区域（闸北）变为一片的瓦砾场，使着千百万的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在国民经济总浩劫的情况之下，资本家更利用此种情况来向已经极端恶化的工人生活进攻，工资是大大的减少了，赏工、米贴等等许多地方亦是取消了，工作时间许多是延长到十六小时以上，对于学徒与青工的奴隶的剥削是更加加紧了。劳苦群众的生活是绝对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

同时，统治阶级亦是到了不能再“照旧统治”的形势；财政的危机发展到极端严重的状况，统治阶级虽然用一切的力量来加紧对民众的剥削来企图挽救，但是由于苏区的扩大与国民经济的浩劫，使他们在在这方面亦是更加的困难了。由于反革命统治的危机与帝国主义间矛盾的紧张，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冲突与矛盾是在增长，这表现在反对南京政府的政客的活动与军阀间冲突的紧张，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将更削弱他们的力量与造成对于革命势力发展的有利的条件。同时应该清楚明白的知道，在野的反革命派的假的“激进”的词句或“反”国民党统治的把戏，实际上是为着怎样更好的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军阀内部的矛盾不会减弱他们对于进攻苏区的积极，相反地他们正在企图从进攻苏区中获得自己本身间矛盾之解决。

在这种情形之下，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它的下层分子之革命化，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已经到了革命危机的阶段，革命危机是在日益增长与尖锐化起来！

国民经济的总崩溃与劳动群众生活的绝端的恶化，在北方的各省是更加锐利而猛烈。在陕、甘、晋、豫、直、鲁各省，由于历年来的军阀混战、封建剥削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

长期的延长到四五年的灾荒，田地荒芜，广大的农民群众饥饿、死亡。而且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在农村中更因灾荒而繁酷起来。工业与手工业的破产，商业的停滞，物价的高贵，随着满洲事变、天津的扰乱与上海战争而更加尖锐起来。在天津、唐山、青岛、郑州等等大城市及铁路工人的生活，亦更是不堪设想的恶化，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欠薪、取消加点等等，残酷地打击着工人的生活。由于小军阀割据的局面，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与冲突亦是十分紧张，军阀间的冲突和战争是没有间断过（如陕西）。财政的恐慌与困难在北方亦更加的厉害，苛捐杂税在北方是更多更凶。国家主义派及其他的反革命的派别亦积极的在北方活动。因之，会议最坚决的指斥北方“特殊论”与北方“例外论”，这是没有根据的机会主义的胡说，实质上是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北方的存在。

（五）在这种情形之下，罢工争斗疾风暴雨般的高涨着，高涨着的罢工争斗的浪潮波及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主要队伍。工人阶级以罢工的武器来回答资本的进攻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罢工争斗给全国反帝运动、灾民农民争斗以坚定的信念与胜利的决心。争斗带着极大的坚决性、坚持性与顽强性。上海沪西日本纱厂三月之久的坚持罢工在中国革命史写下新的光荣的一页。虽然，争斗极大部分是经济的性质，但是经济与政治的口号的密切的关系，与罢工的革命的意义是更加的明白。反日与反国民党的政治罢工（沪西纱厂、全国邮工）亦在增长起来。在工人争斗的紧张的情况之下，黄色工会不管他在工人群众中影响的削弱，而他们积极性亦增长了，他们用一切的方法来阻碍和破坏工人的争斗，常常更用领导争斗来使争斗失去真实的领导以便出卖争斗。正因为赤色工会——尤其是他在黄色工会内工作的薄弱，在许多情况之下他们能够时常的运用这个策

略。党和赤色工会在领导罢工争斗上虽然是有了一些成绩，但是许多的罢工还是没有得到我们的领导，罢工战术上有许多错误，使着开展着的罢工争斗，有一部分因为没有我们的领导或领导错误而失败。

在农村经济崩溃与群众生活的恶化、工农红军的胜利与罢工浪潮的影响之下，农民与灾民的斗争亦如野火燎原一样的爆发起来。高涨着的农民争斗是很快的从抗租与分粮的争斗转变为革命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开展配合着工人与士兵的争斗，迅速的生成成为新的苏区与新的红军的队伍。同时有许多农民的争斗因为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党的工作，虽然开展到极大的群众运动（如长乐甚至占领了县城），便很快的消散或失败了。更有一部分的农民争斗还在富农或小地主的领导之下，带着明显的原始性与缺乏明晰政治旗帜与土地革命的彻底的口号。虽然，许多党部（如陕西党）领导了许多的农民争斗与发动了农民的游击战争，但是，一般的说来，党的工作是极大的落后于农民的积极性的增长，个别的党员与党部还有害怕游击战争的发动与企图联合富农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工农红军的胜利，罢工争斗的高涨，土地革命的影响，不能不促进国民党军队的瓦解，兵变的潮流极大的开展着。接近红军的区域与民族革命战争开展的区域（满洲），士兵的叛变是更加多，范围亦更加大。国民党军事力量之瓦解与兵变，是红军与革命争斗发展的有利条件。

革命运动在中国的北方各省亦是突飞猛进的发展着，唐山、天津、青岛、郑州、沈阳、哈尔滨的罢工浪潮是汹涌的高涨，满洲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进行着残酷的反日战争，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主要特征。罢工从重要的城市普遍到偏僻的区域与小城市中去。罢工潮流的激

越，工人群众的顽强坚持，经济口号与反帝反国民党的口号的密切联系，重工业的产业里爆发着同盟罢工（铁路、矿山、邮务）。农民灾民的争斗在北方各省在最广大的范围内开展，从陕西到山东，从满洲到河南，都一样到处爆发着分粮吃大户、抗租、抗税、夺取土地与农民游击运动。在满洲的反日义勇军中，在北方其他各省的红枪会、大刀会、黑旗会……等组织中，包括着许多破产失地的农民。士兵哗变的潮流在满洲、陕西是特别的猛烈，苏维埃运动的烈火在黄河流域的平原上燃烧起来，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海州、盱眙、河南游击运动的勃发，创立了北方新苏区的最初的根基。

革命运动的发展向党迫切的提出了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北方会议号召各省的党部为实现北方苏维埃区域而斗争，指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已经放在北方各省的工作议事日程之上，坚决的指斥“北方落后论”的机会主义实质。所谓“北方落后论”，是实际上企图将中国的南部与北部间隔与对立起来，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中国北方的存在，企图曲解正确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论为北方的革命运动的完全消沉。这种理论的结果必然要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

（六）革命危机的紧张，红军苏维埃运动的光荣胜利与扩大（这胜利是全中国劳苦群众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使帝国主义直接的武力干涉的危险更加增涨起来。满洲事变是帝国主义从隐秘的干涉到公开的武力干涉的开始，而目下帝国主义军队集中汉口、厦门、汕头等口岸及漳州占领后，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厦门，都明白的指明，在工农革命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历史阶段是摆在前面。同时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完全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了满洲、淞沪，同时更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集中自己所有的力量，向着早已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苏

区与红军作新的第四次的总进攻。新的第四次“围剿”的特点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在“围剿”中的作用的更加加强，战斗范围更加扩大，战线更加延长。国民党将一切主要的军事力量（近一百万的军队与全部的航空队伍）向着各个苏区进攻，这与三次“围剿”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时是大大的不同了。而另一方面，新的“围剿”是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化的情况之下进行的，这就是说：国民党的财政危机更加剧烈，内部的冲突更加紧张，军事力量一般的比前削弱，及全国革命争斗风暴般高涨的情势之下，国民党在进行新的进攻。显然，在目前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上，优势是在红军和苏维埃方面的。英勇的工农红军在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得到全国的工农群众的拥护，将无疑的能够击破敌人的新进攻，并且必然地要用向敌人进攻的路线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

会议指出：发展最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进攻红军的运动，是一切党的及革命的群众组织面前最紧急的战斗任务。组织工人群众的反抗的关车罢工，拒绝替国民党运输军队与军火，反抗一切用来进攻红军的捐税，组织邻近苏区的游击战争与破坏工作，瓦解进攻红军的白军部队，组织革命兵变，这些是一刻不能延缓的工作。会议特别指出，河南在进攻红军中的特殊的地位，号召河南同志发展最高的积极性，组织劳苦群众，来反抗国民党的进攻和响应红军的英勇的战斗。会议号召陕西的同志与工人群众，用一切力量来帮助甘陕游击队的发展，反抗国民党进攻红二十六军，到红二十六军中去！

在地主资产阶级向着红军苏区及全国革命运动作新的总进攻之中，在野的反革命派的积极活动成了这新的进攻的支流。这些反革命派别（孙科派、第三党、社会与教育派、国家主义

派、托陈取消派）玩弄“左”的辞句，以民主政治的烟幕弹来维持反革命的统治。它们的“国民大会”、“取消党治”、“实行宪政”、“全民政治”与“国民会议”，实际上都是企图吸引群众不去进行革命的争斗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是去与反革命的统治妥协。它们更企图在“对俄复交只要苏俄不帮共产党捣乱”、“允许共产党公开，只要共产党不暴动与解散红军”等等的无耻的武断煽动之下，来帮助国民党作进攻苏联与中国红军的偏师。所有这些反革命派都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奴役统治的拥护者，同时它们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残酷的无情的揭露它们，不消灭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工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七）北方会议认为，在中央的正确的领导之下，北方各省的党的组织与党员群众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之中进行了百折不挠的争斗，并获得一些成绩：在陕西，在坚决的残酷的争斗中创立了甘陕边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与红军，发动与领导了柘邑、三原、蒲城等地的农民争斗与陕西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组织了几次士兵的兵变；在河北，恢复了屡经破坏的组织，创立了唐山的党和赤色工会的组织，组织与领导唐山同盟罢工，组织与领导了北平的反帝示威与创立群众的反帝同盟的组织；在山东，在最近的时期中，在撤换机会主义的领导之后，加强了在中心的产业区域与工人中的工作，领导了许多罢工争斗与反帝运动；在河南，领导了孝义兵工厂的两次争斗，发动了豫中的游击战争；在满洲，虽然由于机会主义的领导没有可观的成绩，但是许多的党员在积极地英勇的进行抵抗日本侵略的争斗。但是这些成绩是丝毫的不能满意的。党的工作一般的落后于群众积极性的增长，工作中有许多严重的缺点错误和机会主义的动摇。这里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对于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争

取的忽视（满洲），在领导反帝斗争中缺乏明确的阶级的立场，常常修改与曲解党的口号与纲领（河南、陕西、满洲），对于反苏联战争危险的估计不足与实际的反对反苏联战争的斗争的缺乏，党的组织一般的没有成为罢工运动的组织与领导者，对于组织游击战争与兵变的消极无能，以及对于反革命派别斗争的极端不充分，在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不深入，领导方式的恶劣，培养提拔干部的不足，与严重的关门主义的现象。所有这些，在革命危机增长的现在，成为极端危险的现象。

会议认为：必须巩固和发展我们的成绩，纠正和肃清我们的缺点与错误，根据目前全国革命危机的尖锐化与北方革命运动的猛烈的发展，为着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创立北方的新的苏维埃区域，为着进行真实的拥护苏联，拥护中国苏维埃红军的斗争，夺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北方各省的党的组织必须：

1. 加紧的准备组织工人阶级的反对资本进攻与帝国主义侵略的罢工斗争。没有任何时候罢工斗争比现在更有严重的革命意义的了，“无产阶级不仅以罢工这个工具来击碎资本对于工人的进攻，而且只有罢工斗争才能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斗争与失业工人运动以信心决心与革命的坚持性”，“罢工依然是革命斗争的主要武器，罢工在整个革命时代是无产阶级斗争主要的武器之一”。经济斗争意义在目前特别的重大了，因为“只有经济斗争，只有为着自己生活状况即刻的直接改善的斗争，能够激动被剥削群众的落后阶层，给他们以真正的教育，在革命时代在几个月内将他们变成为政治战斗员的军队”（列宁）。中国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领导权的巩固，应该由红军苏区的巩固与罢工斗争的范围来决定。因之对于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应该给以最无情的打击。这种机会主义表现在：

“从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走到企图复活立三路线的组织方式，最后，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将经济与政治分开，走到纯粹的经济主义，拒绝参加与领导政治斗争”。同样是机会主义的变形，就是对于工人经济斗争的忽视与轻视。反对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小心的准备组织与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战斗，广大组织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内的革命的反党派，是目前的战斗的任务。与这个任务不能分离的，真正的开始在广大的失业工人群众之中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工作。

2. 发展农民与灾民群众的各种各式的日常斗争，发动革命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的在游击队的积极行动之中创立新的红军与苏区。在灾荒极端严重的状态之下，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之下，一切的农民与灾民斗争都迅速的转变到武装的斗争上去。党在组织与领导农民斗争时应该清楚的估计到这个斗争发展的前途。畏惧与企图阻止农民的游击战争的开展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自然，这不是说党不应该为着农民的日常要求与利益而斗争，相反地，党应该是农民日常要求的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同时为着斗争的开展与胜利，党对于农民中各种社会阶层必须有正确的关系，即使在斗争开始时对于富农有任何幻想与妥协，这将是断送斗争的可耻的机会主义。估计着在北方许多“大刀会”、“红枪会”与其他一切秘密宗教性的农民团体的积极活动，党必须参加这些组织中间去，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猛烈揭露他们的领导分子的反革命的面目。在满洲、陕西、晋北，特别应该注意到少数民族——韩、回、内蒙古——的工作，吸引他们积极参加土地革命。

3. 组织国民党士兵的革命兵变，瓦解反革命的武力。兵

变潮流的开展，在党面前放着这个严重的任务。这里首先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部队，组织“剿匪”军的大部队的叛变，是给苏维埃与红军最有力的帮助。在其他的部队中的工作与组织兵变，必须有准备的使他们能够与当地的工人与农民的争斗配合起来，开展与帮助农民的游击运动。应该严厉的反对以勾结军官来代替艰苦的士兵工作的机会主义。同时，对于轻率的盲动主义与无准备的进行兵变，亦应该加以严厉的反对。

党在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游击战争与士兵叛变之中，“应该用一切力量在宣传鼓动之中，解释各种争斗形式中的关系。用一切力量来准备三个争斗的支流：工人爆发、农民暴动、军事‘叛乱’，汇合成一个巨流”（列宁）。北方新的苏区的创立，主要地是要依赖于这三个潮流的汇合。在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组织与领导这些争斗，并将他们汇合起来，是对于进攻苏联与武装干涉苏区的国际帝国主义有力的打击，将是真正为着脱离帝国主义奴役与经济浩劫的苏维埃道路而争斗。

为着真实执行这些严重的伟大的任务，必须实行党与群众组织的队伍的彻底的改造。这里首先应进行最坚决的两条战线上的争斗，粉碎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和犹豫，发展广大的自我批评，揭露一切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为着工作的转变与其速度而争斗。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广大的发展党和群众组织是极端严重的任务。一切关门主义对于革命是极危害的，应该尽量的把千百万的劳苦群众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应该最大限度的吸收几千几万的觉悟的工人、雇农、贫农到党里来。同时，消灭官僚式的僵化的领导方式，创立活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仔细倾听群众意见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是保证顺利执行党的战斗任务的先决的前提。

* * *

北方会议号召全党的同志，在共产国际与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之下，用绝不倦怠的工作，来为着拥护苏联与中国苏维埃，为争取脱离帝国主义奴役与经济浩劫的革命的苏维埃的道路而争斗。工农革命运动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夺取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许多主要的堡垒，创造了将近一万万人口的苏维埃中国，我们今后将更进的，不惧艰难，不怕牺牲，不知倦怠的工作，将更加团结几千万的群众在党与苏维埃的旗帜的周围，实现独立、自由与完整的苏维埃中国！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 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

在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務之下，彻底的保障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实行，才能胜利的完成。这个任务的实行，在目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开始，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政策的暴露，苏维埃红军巩固与扩大，无产阶级领导着的全国反帝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斗争有力的高涨中，更加迫切提出了北方党与赤色工会必须彻底完成的几个主要任务：

(一) 坚定的独立的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组织和扩大罢工运动。

全国反帝运动的发展，苏维埃红军的胜利，工人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北方工人斗争激烈的发展。目前北方的工人运动正处在一个汹涌高涨的浪潮中。北方的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残酷的进攻中，是沉沦在死亡、失业、饥饿的地狱：满洲、天津、北宁路等工人大批的丧身在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炮火里，千百万的失业工人从工厂、矿山中每日如潮水般的被驱逐出来，工人的工资急剧的减低，不仅在一般的企业里，并且扩大到邮务、兵工厂、铁路工人中及员司中去（邮务取消米贴，孝义兵工厂减津贴四分之一，京汉路工人取消加

点的工资，北宁路员工按八成发给等），延长工作时间，加重工作（如唐山三人工作二人作，兵工厂增加工作，京汉路取消加点，抚顺矿工由八小时增至十二时，加一倍生活等），取消旧有的条件（特别是满洲工人）……这些残酷的剥削，伴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大批的屠杀拘捕，反动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政治经济的恐怖来进攻工人，使工人到了不能再加忍受的地步。

无产阶级是以有力的反攻来回答资本的进攻，罢工的浪潮使各种产业都卷入到斗争中（铁路、矿山、兵工厂、纱厂、丝厂、烟厂、印刷等），主要的产业里爆发了同盟罢工（唐山五矿、津浦路铁路工人、安东的丝厂、各地的邮务），在其他产业中也酝酿同盟罢工（矿山、铁路、纱厂等），有的地方举行政治同盟罢工（如太原）。罢工的斗争从主要的城市扩大到偏僻的区域，罢工大部分得到了胜利。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反帝运动密切的联系，斗争发展和阶级觉悟的速度的增高，罢工表现了极大的顽强性、坚持性，在斗争中常常是与国民党军警武装冲突，工人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剧烈的发展，以自己的团结打碎了国民党的罢工禁令，冲破了白色恐怖，失业工人的斗争激烈的发展着。罢工运动的发展将随着反帝斗争、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必然进到更高的阶段中。

所有这些，将机会主义经济恐慌中不能罢工、“帝国主义来了，已无罢工的可能”、一个厂不能罢工、罢工得不到胜利、“北方落后论”、“经验论”打得粉碎，同时向党与工会更迫切的提出了独立的领导和发展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组织与扩大罢工运动的任务。

北方的党在领导罢工运动中，最近是有显著的成绩：在唐山、天津、青岛、枣庄、河南、满洲等地发动了一些罢工和斗

争（如唐山矿工，天津北洋、地毯，青岛的富士、铃木、大康，枣庄煤矿，河南兵工厂，沈阳烟厂、纱厂……），在许多斗争中得到胜利，在斗争中相当的建立了党与群众的组织，提高了支部的积极性，表现了党的进步。可是，在这广大的罢工浪潮里，党与工会还远落在群众的后面的，许多罢工斗争是自发的，没有我们的领导，甚至控制在反革命的黄色工会的手里。这主要的原因：首先是许多党部对于工人斗争的估量不足（如满洲、河南等），对于困难屈服（如保定），以至走到放弃罢工的领导（如满洲、河南）；在另一方面，存在着极有害的忽视日常经济斗争，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以宣传鼓动罢工代替了真正厂内活动有系统的组织罢工，因此便不能坚定的领导和参加自发罢工，独立的有准备的组织罢工。在罢工的战术和战略上表现了许多错误，在决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主要条件上——组织和扩大赤色工会没有努力，对于在黄色工会内争取群众，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的组织，是没有在实际工作中提出，这便使我们的工作远远的落在工人斗争之后。必须坚决的与机会主义的投降屈服、放弃罢工无情斗争，同时打击“左”的空谈罢工斗争，是职工运动的转变的前提。

在工人斗争愈激烈的发展，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更加残酷的向工人进攻。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黄色工会工贼走狗联合一起分工合作的来破坏工人斗争，它们用一切政治经济的恐怖来破坏罢工（如屠杀、拘捕、组织武装的法西斯蒂队伍、关厂、开除、分裂工人等等），而且采用具体的方法（如帝国主义在邮务罢工中的国际邮局等），采用“左”的手腕（如领导罢工、破坏罢工，答应一部分要求，上工后突然进攻）来破坏罢工。在破坏罢工中，资产阶级的先锋队理论家——托

陈取消派极尽其工贼的作用。在这种残酷的进攻中，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屈服，而是更要加紧去时时的准备广大群众工作的基础，有准备的组织罢工，更要有完善的罢工战略来领导罢工。考查我们在罢工中主要的弱点，便是不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罢工，没有面向群众有准备的组织罢工，常常是事变已经到了尖锐时，我们才去准备罢工，甚至已经上工了，我们才动员群众。这主要的原因，便是没有在日常工作中去加紧厂内活动，没有抓住群众的日常经济要求，与群众的联系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因此领导罢工的战术上、罢工的准备上，我们就表现了许多错误。群众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的同志是不了解的。提出群众的要求，不是“在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讨论之下而规定”，而是背着群众（满洲省委连支部中都不讨论）替群众决定要求，甚至提出极错误的口号（如无故不得开除工人等）；不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几个工人阶级明了的基本要求上”，从斗争的过程将与斗争有关连的政治口号有机体的联系，提高罢工的政治化，而常常是条件愈多愈好，将党的政治口号机械的加到工人的要求里。“要在罢工之前，就决定这次罢工之直接指导者的成分，罢工委员会应当由所有工人群众中选举出来，要使每个工人都将罢委认为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六次大会决议）。而北方党与工会对于这一决定罢工胜利的先决条件，是极不注意的，在罢工中罢委常常是没有去组织（如兵工厂两次罢工），或者是用极少人去组织（满洲英美烟厂由七人选出），将罢委及罢工群众的积极性视为不重要的，由我们来代替。纠察的准备，同情的援助，罢工基金的募集，我们是不在罢工前、罢工中去努力，罢工的时期从无考虑和选择过的。这样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破坏之下，在罢工未发动以前，就决定了它失败的前途。必须“坚决的反对不预先精密的估计具体

条件及没有在群众中作到的准备工作就宣布罢工”（职工国际八次会议决议）。而更要反对主要的危险，借口没有准备而放弃罢工，或者以此作为拒绝参加自发罢工的口实。

“在目前的环境下，为工人阶级生活程度的斗争，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斗争”，日常经济斗争是工人团结战斗的初步学校，是夺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到革命阶级斗争方面的出发点。北方党部中许多地方对于领导日常经济斗争是不可允许的忽视（如满洲空喊同盟罢工，青岛市委过去只要作大的斗争以及天津等）。正当着资本家、国民党、帝国主义裁减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取消旧有的条件，大批的开除工人，加重工人工作时；正当着每个工人都酝酿着不满的情绪，每个工厂、每个车间都充满着劳资间的冲突，党的任务是加紧厂内活动，“利用劳资间冲突（即使最小的）来发展广大的经济斗争”，“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罢工，把日常的要求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总要求联系起来”。不在日常斗争中去团结群众，我们便永远落在群众斗争和罢工浪潮的门外。党与工会必须巩固我们罢工中已得的成绩，坚决的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克服我们的弱点和错误，在下列的工作积极努力：

1. 坚决领导日常经济斗争去组织工人的反攻，将我们的工作集中到重要的企业里，深入到重要的产业——尤其是铁路、海员、兵工厂、矿山、纱厂、丝厂、市政等工人中去，深入到青工女工广大群众中去。在广大的工人女工讨论与参加之下，提出各业各厂各间的简单清楚迫切的要求，动员党的支部、工会的小组加紧厂内活动，依据着每个厂的具体条件和环境、战斗力的对比，去采取各种斗争方式来动员工人群众为经济要求而斗争，抓住很小的斗争、部分的斗争、一个车间的斗争，努力扩大到各车间全厂的工人中去，把斗争从最低形式转

变到较高的形式（如从怠工到完全的罢工、示威、提出政治口号等）。党与工会要向群众证明不仅是领导罢工，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并且是无产阶级日常生活经济利益的唯一拥护者。要无情的打击忽视日常经济斗争的倾向，把放弃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人当作“在客观上是帮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样的指斥，坚决的打击将斗争交给黄色工会去办（如保定），必须严格的和彻底的实行独立领导经济斗争的路线。

2. 有准备的独立的组织罢工，努力去参加自发罢工，以扩大罢工运动。在上面指出的产业里，不是一般的空洞的布置，而是选择中心产业、中心厂，集中我们的力量去发动罢工，在罢工前和罢工中要完善的准备罢工中群众基础的工作，在工人完全明了迫切的几个要求上，将工人女工动员起来，讨论要求和决定一切罢工的问题。要组织所有群众选举的罢工委员会，这种罢委人数要包括一百到二百的委员，要有坚强领导的干部，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团结广大群众在罢委之下，吸引青工女工来参加一切罢工的工作，坚强的组织纠察队的组织，利用各种的组织把群众动员起来——如代表会、下层的小组、宣传队、募捐队等，充分的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并且使其在组织上巩固起来。慎重的选择罢工的时期，捐募罢工基金，发动同情斗争，将罢工领导的中心放在赤色小组与党的支部里。

党必须认为努力参加领导自发罢工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坚定的在每个罢工中积极的参加进去，不管事先我们有无组织关系，要用各种方法（如利用其他厂去发生关系、公开的慰问、同情的援助等）到群众中、去工房中去接近他们，提出我们的主张，以自己的努力取得罢工工人的信仰，驱逐黄色领袖，使群众为自己条件坚持罢工，在罢工中建立我们的

组织。

在罢工中提出具体的政治口号，这些口号或者是对于这些罢工有显明联系的，或者对于所提出的经济要求有显明联系的，或者在罢工过程中发育出来的（如工人被捕等），来扩大斗争纲领。提高罢工的革命化，在目前政治经济的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要坚决的打击不努力提高罢工的政治化，而只束缚在经济的范围里（如天津裕大）。

3. 在几个产业里（如矿山、铁路、纱厂、市政等），在群众共同要求之下提出具体的要求纲领，准备群众的工作的基础去组织产业的同盟罢工。必须利用过去的经验，抓住中心厂去有准备的组织罢工，同时积极在其他厂活动，以中心厂的罢工去推动其他厂的罢工，组织总的罢工委员会来统一领导，使各厂的罢工团聚在一起，“不要在总罢工时建立青年和妇女委员会来分散罢工的领导”（职工国际八次会议决议）。要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共同签订同盟罢工的合同，来团结各厂群众。目前河北党必须坚定的组织和发动唐山五矿的同盟罢工，争取五矿罢工的胜利。

4. 必须严重的打击对于青工女工运动的取消主义，使全党的同志了解目前青工女工在罢工中英勇的斗争和积极性（如青工在兵工厂、烟厂等斗争中，女工在安东丝厂、和记蛋厂等斗争中），女工青工在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努力的去深入青工女工群众中去，动员他们参加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罢工，提出青工女工单独的特殊的利益的要求纲领，领导他们为特殊利益而斗争，从斗争中吸收他们到赤色工会里。在罢工中应组织工人的妻子妇女，吸引她们参加到罢工斗争里。

5. 估计到罢工的尖锐，阶级斗争的残酷，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武装压迫，党与工会必须努力去建立工人的武

装的组织，吸引广大的群众，组织工人纠察队，抵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装压迫，保护罢工，保护工人的组织。要真正的武装起来，加紧政治军事的训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武装斗争中，要去夺取反动的武装，武装自己（特别是在满洲等地）。纠察队要成为工人自卫的经常的组织。

6. 在每次罢工中或罢工后，召集罢工工人、赤色工会、党的支部来讨论研究罢工胜利与失败的教训，决定下次斗争的方式。在罢工的胜利后，要加紧群众的团结，巩固扩大我们已得的成绩，时时不要忘记资本家在罢工后的进攻，就要立刻的准备和组织第二次的斗争。当然罢工失败时，要公开的在工人面前承认失败，而不要企图说失败为胜利，自慰的政策是有害的，因为它使群众难以了解失败的原因，这就等于解除和减弱他们与资本家斗争的武装。

（二）加紧的发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组织反日反帝的罢工。

工人阶级的罢工浪潮在反帝运动中积极的表现了先锋领导作用，他成为反帝斗争、苏维埃运动的主要动力。北方工人高涨的罢工运动，推动着满洲革命民众的反日战争与陕甘边红军游击运动的发展，有些地方爆发了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同盟罢工（太原），许多工人自动到义勇军中去。在这种形势下，更迫切的提出了北方党要十百倍的努力去准备和组织反日反帝的罢工，领导反帝运动与拥护苏维埃的斗争密切的联系。北方的党在反帝运动中表现了相当的成绩，但普遍的现象是没有在反帝运动中先锋队——无产阶级中进行坚定的工作，特别是放松组织反帝的罢工，不了解工人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如陕西），对于工人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估量不足（如满洲、河北等），因此不能在工人中扩大反帝斗争，组织反日罢工，

这种现象是一刻不能允许的。必须：

1. 在各地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将工人的经济要求与反帝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运用公开路线的活动，在各厂里建立反帝的组织，发动反日的罢工。特别在满洲、天津、青岛等处的日厂中提出工人的要求，组织日本厂的罢工，努力使罢工扩大到其他的企业中去。估计到工人斗争的形势、具体的环境和条件，去争取反日反帝的总同盟罢工。

2. 根据天津裕大斗争的教训，我们必须加紧组织关闭的日厂群众中的斗争，领导工人群众一方面向帝国主义资本家斗争，提出具体的要求，要求关厂期间工资照给，要求开厂，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同时向国民党坚决的斗争，要国民党按工资发给救济，开办免费食堂，将没收的日货发给工人。不向帝国主义资本家斗争或不向国民党斗争都是错误的。

3. 在一切罢工中要加紧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在斗争过程中与反帝运动密切联系。在城市里，特别是工人区域里组织反帝的示威，召集反日的群众大会，夺取黄色工会中反帝的群众。

4. 大批工人自动到义勇军中去，武装成为工人迫切的需要。党与工会要坚决的组织工人到东北义勇军中去，加入反帝的战争，争取兵士的领导，要将组织工人义勇军视为反帝运动最中心的任务。

5. 党与工会要更广大的组织工人的纠察队，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来救济罢工与失业的工人，将检货运动夺取在无产阶级的手里。

6. 经常的揭破国民党黄色工会“抗日救国”、“长期抵抗”、“一致对外”等欺骗来压迫和剥削工人的面具，宣传只有革命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推翻国民党

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因此必须：

7. 将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与拥护红军拥护苏联密切的联系起来。北方党对于这一重要任务是放松的，以宣传工作来代替了实际。必须：（1）加紧作拥护苏区及红军胜利的宣传，组织工人拥护苏维埃红军、拥护苏联的斗争，在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中，发动不运兵、运械、制枪、制弹去进攻红军和苏联的斗争罢工，在一定的数目下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组织红军之友，组织工人中一个铜板的募捐及赠送红军东西。（2）派干部到陕边红军游击队中去。（3）宣传苏联的和平政策、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功，组织苏联之友，在“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大本营”的口号下动员群众。

（三）组织失业工人的斗争。

千百万的失业工人呻吟在死亡、疾病、饥饿的惨境，工人不仅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救济，并且由国民党下令驱逐出境，这使得失业工人不能不从死亡中选择革命斗争的出路，积极向帝国主义国民党斗争。北方的失业工人激烈的斗争，正与罢工浪潮的发展互相呼应。资本家、黄色工会利用广大的失业工人向在业工人进攻，黄色工会对在业工人“呈请开除”，同时向失业工人作生意（卖位子），用各种方法来煽起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冲突。组织这个广大的队伍，向国民党资本家斗争，将失业运动与在业工人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是党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

而北方党在这一个任务上是没有成绩、没有努力的。从失业运动日的工作中可以看出：有些党部是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接受中央决议，可以用“广包无遗”来取消自己的努力（过去的山东省委），许多地方决议上都是空泛没有内容的（如河南）。

虽然河北省委失业运动日的示威是成功了，但“参加者大部是学生”，我们在失业工人中是没有进行系统的经常的工作，许多党部不了解失业工人要什么，常常提出没有对象的要房子、要救济的口号，甚至认为向国民党斗争是机会主义（天津市委某同志）。一般的政治口号代替了群众迫切的要求，但各地差不多一致的又不提出号召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失业工人的组织的建立只是写在决议上。必须立刻纠正这些错误去进行：

1. 根据中央及职工国际最近的指示，在各地的实际情形之下，根据所有失业工人的讨论和意见，提出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失业工人最迫切的具体的日常要求的纲领，号召失业工人为自己的要求而斗争，利用种种的斗争方式（如示威、包围、骚动、坐守、不出厂、不下船等）来发动斗争。

2. 要组织失业工人的示威，向国民党资本家提出要求，要国民党、资本家经常发给救济费，要政府为失业工人办免费食堂，失业工人不交房租，反对驱逐失业工人出境，反对开除工人，恢复被开除工友的工作等。组织失业工人不出工房，占据政府的公共房屋，没收政府及大资本家米栈、米船的粮米分给失业工人与难民，将失业工人的斗争与饥民的斗争联系起来，在群众强有力的压迫之下改善失业工人的生活。

3. 广大的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代表会。失委会必须是广大失业工人所选举的，一般的是以失业工人的住处来组织，但刚关厂的失业工人中必须是将关厂的工人组织在一起，领导他们要求开厂的斗争。失委会要经常召集大会，在失委会下建立各种组织，来吸引广大失业工人在失委会的周围。

4. 组织失业工人检查日货队，没收日货救济失业工人，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反帝斗争，组织义勇军到满洲去。

5. 在半失业的工人中要反对开三日班，要求按原来的工

资发给。失业工作要与在业工人联系，要号召工人反对关厂拆灶，反对开除工人与生产合理化。失委会要与当地的赤色工会发生密切关系。

6. 必须经常的揭破国民党、黄色工会、资本家压迫和欺骗的罪恶，指出工人的失业是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真正的解决失业问题，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广大的号召和组织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

（四）为瓦解黄色工会，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而斗争。

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领导目前北方工人激烈的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不是空喊咒骂、站在群众外面可以进行的。必须承认现在黄色工会中，还有着很大数量的群众。黄色工会在北方的活动年来是增长了，主要的产业都有黄色工会的组织，个别的地方还建立了下层组织，许多罢工还是在黄色工会欺骗控制之下。在北方的罢工浪潮中，黄色工会起了破坏罢工的极大作用。认为黄色工会的影响没有了，这只是掩盖着去争取黄色工会中的群众的怠工。

黄色工会影响增长的主要原因，正如职工国际所指出的：“残酷的白色恐怖，大批的失业，以及破产的农民、妇女、儿童代替老的无产阶级的干部，变更工人的成分，黄色工会在国民党极端狭小的合法范围中所处的垄断地位，由政府及工厂主的赞助与承认，剥削者对它部分的让步，广大的施用社会的民族的武断宣传，工头走狗的拥护，赤色工会的错误及薄弱等”。但必须指出北方党对于黄色工会中夺取群众，是采取了极有害的消极。真正的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是没有实际工作中努力。这无疑的是帮助了黄色工会发展的。这里表现了有些地方的投降黄色工会的机会主义（如保

定) 和将黄色领袖与普通工人视为一样, 站在群众外面空喊的关门主义。在中央职工运动的信中所指出的错误, 在北方还是没有彻底的纠正, 特别是没有在揭露国民党黄色领袖的斗争中, 将群众动员起来建立自己的基础 (反对派的组织), 没有在反黄色工会的斗争, 更加紧反对国民党, 发动驱逐国民党的代表秘书的斗争, 使群众与国民党尖锐的对立起来, 与国民党断绝关系。结果便是在国民党用改组工会的欺骗之下, 以一批没有被揭露的黄色领袖来代替某些破产的黄色领袖, 甚至接近我们的群众也逐渐变为黄色领袖 (如天津宝成)。不动员群众建筑自己的基础, 刻苦的进行反对派的工作、彻底的反国民党, 黄色工会是不会瓦解, 革命的赤色工会——工人自己的工会是不会从空喊中出来的。

但罢工的浪潮日益揭穿了黄色工会反革命的面具, 黄色工会与国民党资本家一起来破坏罢工和反帝斗争, 用请愿、仲裁、法律、禁令来压迫工人的斗争, 用恐怖手段来对付罢工, 将罢工的领袖“呈请开除”送到国民党的牢狱, 这样引起了工人激烈的愤恨。在北方工人中, 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是激烈的发展 (如在唐山、天津各地, 工人与黄色工会武装冲突, 自动捆起黄色领袖, 不交会费, 殴打黄色领袖及其机关等), 组织自己的工会的要求在工人中是非常迫切, 黄色工会的影响在工人斗争的浪潮中是一天天缩小下去, 使国民党不得不改组工会来缓和群众, 黄色工会不得不更用“左”的手腕以领导罢工来破坏罢工, 国民党各派、取消派、右派不得不积极的活动来破坏工人的斗争。所有这些, 是给予党的工作更顺利的环境。努力的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 建立反对派的组织的任务, 也更加严重与迫切。因此必须克服我们过去的错误, 努力的去进行下列的工作:

1. 必须努力的领导和参加日益发展的斗争和罢工，从领导群众的斗争中去反对黄色工会，夺取黄色工会中的群众。因此要动员我们在企业里所有的力量，在积极拥护群众日常要求的基础上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去团结群众。下层统一战线不是改良主义和革命策略之间一种中间的东西，而是为发动反对资本家黄色工会斗争的工人的团结。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我们的主张口号来与黄色工会出卖斗争对立。利用黄色领袖每一事实欺骗与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具体的揭露它的面具，使群众在自己的利益上和黄色工会的裂痕尖锐起来。

2. 抓住黄色工会、国民党一切的罪恶——如由工资中扣会费，出卖位子，“呈请开除”，将工人送到监狱里，强迫工人读“遗嘱”以及国民党指派秘书、指定委员等——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提出反对克扣工资，拒绝黄色工会征收会费，反对开除工人、卖位子，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联合起来向国民党、资本家、黄色官僚走狗斗争，恢复被开除的工作，立刻释放被捕工人，驱逐国民党代表秘书，驱逐国民党官僚走狗、黄色领袖出工会，反对国民党改组工会，工会机关应由工人自己选举，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等口号，来动员群众与国民党黄色领袖作斗争。

3. 在罢工中将赤色工会的主张、策略与国民党黄色领袖出卖罢工的阴谋对抗起来，将每次黄色工会请愿、国民党仲裁调解的结果指示给群众，揭破黄色工会牺牲工人的利益（如邮务），揭破黄色领袖破坏罢工的阴谋，反对黄色工会秘密谈判及签定条件，组织工人选举的罢工委员会来领导斗争。要根据每个厂的环境、每个黄色工会的活动，来细心的决定我们与黄色工会针锋相对的策略，把这些策略详细的与我们的群众讨论，经过支部及职工反对派深入到群众中去。

4. 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的组织，是党、工会最主要的任务。在大多数产业中都有黄色工会的组织，在北方，更是特别重要的。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是要在黄色工会中内部去进行革命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中工作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最近的目的——是夺取黄色工会会员到阶级斗争方面来，组织无产阶级的反抗与反攻。”因此，我们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主要的是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揭破官僚走狗的罪恶，扩大我们的宣传，吸引广大的群众来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瓦解黄色工会，独立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当大多数工人团结在反对派周围时，就可以与黄色工会分裂，而组织赤色工会。反对派的组织必须是吸引广大的群众从斗争中来建立，党的支部必须是加入革命反对派的组织，起领导作用。

5. 反对派不仅是揭露黄色工会的面具，并且要独立的领导斗争。当群众提出要求时，不是将群众的要求请黄色工会去办理，或者说“威迫黄色工会去执行”，而是要利用群众斗争的要求来揭破黄色工会的面目。反对派要争取群众、领导群众，独立的为实现群众要求而斗争。当群众对于斗争还有依赖黄色工会去办理的幻想时，反对派应极力向工人解释黄色工会破坏罢工、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指出只有以自己的力量和团结，才能争得斗争的胜利。同时不是与工人对立，而是极力领导群众在各种事实上会议上揭露黄色工会的面具，发动工人群众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消灭工人对黄色工会的幻想，将斗争的领导夺取在反对派手里。

6. 与反黄色工会、国民党的斗争，政治上不可分离的是加紧反对改组派、取消派、右派作斗争。在广大的群众中，揭破国民党各派的罪恶，指出它们有时利用罢工来欺骗工人作它

政争的工具，无论改组派、南京政府、北方政府、广东政府、汪精卫、孙科、胡汉民，如蒋介石、张学良一样是屠杀工人的刽子手，指出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等帮助资本家剥削工人破坏罢工的具体事实。不是仅仅简单说取消派、右派是工贼就可以了事，而是要将他们的主张和事实，一件件的使群众了解它们的反革命的面目与工贼的作用。

7. 在黄色工会中加紧拥护苏维埃红军、拥护劳动法的宣传，坚决去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同时利用它个别的条文（如八小时等），用革命的方法自动的实行。

（五）加紧发展巩固并扩大赤色工会是决定阶级斗争胜利的战斗的任务。

现时北方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是完全不能适应领导正在发展着的罢工浪潮。北方会议认为创造发展与巩固赤色工会的组织，是决定阶级斗争战斗的任务，同时指出北方的党虽然在某几个地方有些成绩，但一般的情形下是将发展赤色工会的战斗任务放弃与忽视的。首先是满洲的党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消极，没有将这任务成为党的工作的重要日程，在广大的反帝运动罢工浪潮和顺利的环境中，在几十万产业工人中，没有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在有的企业中有党团的支部，而没有建立赤色小组，把“无作用的人”选到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中去（均见满洲代表报告），这种现象必须严重的指斥与肃清。有些地方是以附属组织来代替赤色工会（河南、河北），不在斗争中去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不相信群众，惧怕群众，同志不加入赤色工会，甚至有的同志把建立赤色工会的任务认为只是工会的，不去领导支部同志组织广大群众，将党的团的支部同志拉来成立空洞的上层机关，敷衍了事（如满洲），这完全是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另一方面，有的同志不了解赤色工会是

群众的组织，而企图定出许多政治的条件的限制，来拒绝群众加入（如天津黎^[1]同志）的关门主义。这些“左”右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必须受到无情的打击。必须清醒的认识现在北方的赤色工会是极端微小薄弱的，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完全不能适应目前客观环境的要求；北方党与工会是从来没有经常的有系统的作过征收会员的运动，在斗争中日常的生活里，赤色小组是没有加以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会员是极大的流动的，没有造成领导斗争必要的前提。党与赤色工会的工作是没有深入到企业里，尤其是铁路、海员工人中去，这些对于目前职工运动是极端有害的，要以十百倍的努力来纠正这些错误，巩固与扩大我们已有的阵地。同时在广大的工人中，在每个企业和产业里——尤其重要的产业里去发展、创造、恢复赤色工会的组织是北方党一刻不能延缓的任务。要达此目的必须是：

1. 要坚决的开展反对取消赤色工会、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的斗争。在坚定的领导日常经济斗争和罢工运动中，大胆的勇敢的吸收广大的群众，发展与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把我们全部的工作集中到企业里（尤其是铁路、海员、矿山、纱厂、市政等），深入群众中去，加紧厂内活动，去有系统的经常的进行征收会员的运动。使一切同志和会员了解发展和巩固赤色工会的组织，吸收广大的群众到赤色工会和职工反对派来，是扩大和顺利的进行工人斗争以及实行党在职工运动重要任务的主要前提。要动员全党来执行这一任务，要将这一任务的中心放到工厂支部与赤色会员和小组上去，并且以革命竞赛的方法来检阅发展的成绩，将这一任务作为各地党与工会职工运动检查的尺度。要坚决的反对赤色工会不要多的主张，反对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任何一个工人，“只要他知道阶级的团结，接受工会的章程，都可以加入赤色工会”

（六次大会职工决议）。

2. 必须将赤色工会的工作的中心移到工厂中去，以极大的努力巩固赤色小组。工会的领导机关、地方党部必须与会员支部的同志的生活打成一片，建立工会的生活，与他们建立经常亲密的关系。建立下层核心日常具体的领导，实行工会广泛的民主化，加强小组在工厂中的活动和领导群众的作用，使广大的群众围绕在每一个赤色小组里。在日常生活中加紧小组会员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以加强和扩展我们的阵地，消灭会员的流动性。必须认为失掉了一个会员，便是我们极大的损失。动员同志、工会工作人员到生产中去，经常给以教育。

3. 在征收会员、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中，在现时罢工运动的发展，应该打破狭隘的范围。不仅是个别的介绍，并且应该吸引整个车间整个部门的工人加入（自然工贼走狗是除外的）。不仅是秘密的活动，而且应该在群众大会中公开的征求。加入工会是要群众自愿的，赤色工会的任务不是强迫工人加入赤色工会，而是在积极的拥护工人的利益上加紧赤色工会纲领的宣传，吸引工人自愿的到阶级工会中来。

4. 以产业的原则去建立赤色工会，建立群众的铁总，建立邮务反对派的组织，建立纱厂工会和革命反对派，在几个重要的城市（青岛、天津、哈尔滨等地）建立有群众的地方的各工会联合会的组织。这些任务必须在北方党与工会面前提出，要在企业中去努力建立下层组织来完成这个任务。在吸收广大群众加入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时，必须去加紧征收女工青工到工会的组织里，建立青工部女工部的组织。

5. 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是日加迫切重要的任务。在个别地方（如河北）虽然有时建立了这样的组织，但不去领导它巩固它，使

其经常存在，而是让它自生自灭，一般的情形下是没有去建立的。必须严厉的纠正这种现象，努力在领导经济斗争、罢工运动，抓住群众共同的要求，利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去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去克服工人中帮口的冲突。工厂委员会要巩固它，使之经常存在。吸引群众到赤色工会中去，必须广泛的建立附属组织，在其中进行群众工作，经常的领导它，纠正它，把广大群众吸收到阶级工会的运动中去。

6. 加紧的训练干部，这是团结群众、夺取群众的桥梁。必须从斗争中提拔新的积极勇敢的干部，举办训练班加以教育。各地工会的训练班要经常的进行。吸引新的最好的干部到工会的领导机关里，时时给他帮助和教育。

7. 各地要举办工人的报纸和工厂小报，组织通讯网，组织读报小组，利用报纸去组织群众。只有去吸引广大群众来参加报纸的工作，才能够保证报纸是群众的。

(六) 加紧厂内活动是夺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唯一道路。

在企业中加紧我们的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的重要任务。从工作过程中证明，能够把工作中心集中到企业里去，了解厂内的情形，巩固党的工厂支部，在工厂里车间里去组织群众，便可以得到许多成绩（如青岛富士）。站在群众外面空喊罢工，背着群众、背着支部去决定问题，便会与群众脱离关系（如满洲省委）。工厂是我们的堡垒，只有加紧企业中的工作，我们才能夺取工人大多数。厂内活动不是写在决议上的，而是要真正的深入群众，为日常经济要求动员群众去作斗争。刻苦的建立工厂的支部小组，吸收积极的工人入党或工会，积极的训练干部，把我们的力量配置到各部门里。有系统的审查企业中工会下层机关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审查征收会员的方法、准备斗争的形式。动员群众举行车间会议、工厂会议，来讨论

他们不安的问题，耐心的去说服群众，不停的向群众解释只有斗争才有出路，启发同志和会员的积极性，教育他当某一事件发生（如一人被罚工钱、被打或被开除），我们应该怎样来对付，如何组织群众来抗议。将一切的生活去发展经济斗争和在这个基础上去实行夺取工人大多数的任务。必须了解“不管职工运动是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在企业中的工作过去是现在也是各地革命工会最主要的任务”（职工国际八次会议提纲）。

（七）在铁路、海员等重要企业中，各地党部几个共同的任务。

正当帝国主义、国民党积极的向中国苏维埃红军进攻，进行反苏联战争，积极的向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剥削、屠杀、进攻；正当着铁路、海员工人经济斗争、反帝斗争激烈的发展中；正当着铁路黄色工会在天津举行八路联席会议，计划来破坏工人斗争中，加紧铁路、海员、兵工厂的工作，领导和组织他们的斗争和罢工，是更加迫切起来。但北方党在铁路、海员中的工作是放松了的，必须认清这些产业中工作的重要性，纠正我们的错误，去执行下面的几个主要的工作：

1. 河南、河北的党必须共同的去布置京汉路工人的斗争。要提出全路共同的要求纲领，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人不运兵、不运械去进攻红军的斗争和罢工。同时河北、满洲、山东省委必须共同计划北宁、津浦等路的斗争，要抓住工人迫切的具体的要求，深入到各路的群众中去，特别是每条路的机务大厂中去，组织领导他们的斗争和罢工，并且将斗争与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拥护苏联、拥护红军的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

2. 为得进行这一工作，河北省委应该召集这几路的联席

会议。全总党团应该召集各路的工作人员会议，来具体的计划、准备、组织，并且要将建立群众的铁总提到各地党与工会的日程里，迅速的去完成这一任务。

3. 满洲省委必须坚决反对工会工作的机会主义，彻底转变职工运动的工作，去组织满洲各路尤其是中东呼海路斗争。在经济要求的基础上，在拥护苏联的口号下，来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反日反国民党，拥护苏联的罢工，组织阻止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进攻义勇军的斗争罢工。

4. 必须纠正过去各地对于海员工作的放弃，大连、营口、松花江、天津、青岛、烟台等地要努力打入海员的群众——尤其是日本船的工人中提出海员的具体要求，发动海员的经济斗争和拒绝运兵、运械去进攻苏区红军和苏联的罢工，指定专门人而且是与海员有联系的做海员、码头、驳船、船坞的工作，并且将工会的工作与海总发生密切关系。

5. 在兵工厂的工作，河南党必须深刻的研究过去的错误教训，努力去恢复工作，发动兵工厂工人继续斗争，反对开除工人，反对加重工作，反对裁减津贴，反对制造枪炮子弹进攻红军。满洲党应向同志及群众公开承认错误，积极的发动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组织他们到义勇军去。陕西党必须立刻纠正放弃工人运动的严重的错误，应把党的工作深入到工厂中去，首先打入到兵工厂的工人里。山东同样要加紧到兵工厂中去组织群众。

(八) 领导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的斗争，建立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的组织。

在满洲，许多的雇农及农民自动的组织义勇军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陕西正在发展着广大的红军的游击战争。各地的农村工人在灾荒、死亡、饥饿中爆发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形

下，党必须在坚决的进行农村工人中的群众的工作，领导他们斗争，加强农民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顺利的进行完成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进行这一工作：

1. 首先要将我们的工作集中到红军游击的区域及苏区的附近（如陕甘边、豫南、陕南等），集中到反帝战争的区域（如满洲），集中到各铁路的附近、农民斗争激烈及灾荒的区域里。在这些区域里，组织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来反抗地主、富农、资本家、老板的压迫剥削，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迫切要求而斗争，向国民党、地主、资本家要饭吃、要救济，没收国民党、地主、富农、资本家的粮食，领导农民抗租、抗税、抗捐、分粮食大户等一切的斗争，在斗争中去建立雇农工会、苦力工会、手工业工会等组织。

2. 组织农村工人的反帝斗争，建立反帝委员会的组织，组织义勇军，动员广大的雇农、苦力及手工业工人到义勇军去，进行反帝的战争。将反帝运动和工人与地主资本家的斗争密切联系，这在满洲的党更应特别努力。

3. 动员雇农领导广大的农民进行武装的斗争，发展游击战争，解除地主豪绅反动的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

4. 雇农工会组织的建立，首先要确定明确的阶级路线，保障工会是完全保护工人自己利益的阶级组织。一开始就必须将剥削者的分子——地主、富农、老板等——排斥出去，工会的领导机关必须是广大群众所选出的从阶级斗争过程中起来的积极工人干部领导着。对于雇农妇女及女工、青年工人，吸收他们加入到工会的组织，尽量吸收女工、青工的干部到工会的机关中去。

5. 在陕甘边游击区域内，放松组织雇农工会是极大的错

误。必须立刻为领导雇农、组织雇农工会而斗争，组织广大的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与地主、富农、老板作残酷的斗争，动员雇农到红军及革命委员会中去，加强和改造红军的成分，巩固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的领导，动员雇农工会去领导农民彻底的分配土地。

6. 彻底的揭破国民党、豪绅、地主、富农的欺骗，加紧宣传苏维埃红军的胜利，深入劳动法、土地法的宣传，在红军的游击区内要立刻进行劳动法的实施。

7. 积极的提拔农村工人的干部，加紧的训练教育。各地方党部应举办训练班及流动训练班来经常的培养干部。

8. 雇农工会、苦力工会与产业工人的工会之间，不独应当有兄弟团体的关系，而且产业工人的工会必须去领导它、帮助它，如举行产业工人工会与雇农苦力工会的联席会议等。

上面是北方党在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问题。所有这些任务，要在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拥护并发展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的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之下，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之下去执行。

所有这些任务的执行，必须是坚决的执行中央职工运动的决议、为职运致同志的信、职工国际最近的决议的一切指示（特别没再重复的指出的），彻底的转变职工运动，加强党的职工部的工作，改造一切工作的方法，用新的工作的速度，提拔新的干部，使党与工会一切的工作和领导适应于迅速变化的事件及汹涌的罢工运动新的前途。为要顺利的实行职工运动的彻底转变，必须加紧去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取消罢工、放弃斗争和罢工，投降屈服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左”倾的空谈罢工，与一切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关门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才能彻底的完成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

数，彻底的保障实行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土地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黎玉。

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 北方苏区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北方
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基本通过)

一 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与北方新苏区的创造

目前由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占据、瓜分与轰炸、屠杀，连年不断的灾荒（大旱、大水、虫祸、黑霜、雹风），国民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压榨、奴役与剥削，不断的军阀战争，尤其是他们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使正在遭受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北方劳苦民众完全陷于饥饿、悲惨、流离、死亡的境地。

北方劳苦民众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的在开展着。农民抗捐税，抗租债，分粮食，吃大户，武装冲突与包围县城，汹涌的反日反帝怒潮，深入到北方的穷乡僻壤，极广大的劳苦民众都卷入这个战争。成千成万的劳苦民众自动的武装起来，组织反日义勇军，英勇的前仆后继的开展着游击运动，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白军士兵的觉悟一般的迅速的增长，斗争哗变的潮流巨大的发展，枪毙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长官，部分的整个部队的大规模的投入红军和游击队，或参加反日战线，或到乡村中去汇合农民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北方无产阶级特别是他的主

要部队，蓬勃的、顽强的、普遍的斗争与罢工，成群结队的自动武装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及游击运动，充分显示着无产阶级在北方革命运动中的领导。

同时，两个世界尖锐的对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成功，给予北方劳苦民众以直接的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两个政权的对立，国民党反动统治急剧的崩溃，工农红军光荣的胜利，在全中国面积四分之一与将近一万万人口的地域上，已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更兴奋了北方千百万劳苦民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勇气与热忱。群众斗争往往一开始就有广大群众的参加，与带着非常急剧的性质（如骚动、暴动、火烧城门、攻入县城、解除反动武装等）。日常斗争迅速的发展成为游击运动，有的地方成千成万的群众自动的树起苏维埃的红旗（如陕西山阳及豫中等处），要武装，要土地（如陕甘边、南满等处），要政权，已成为目前北方群众斗争的特征。在荒僻的陕甘边境，红二十六军的生长与新的苏区的创造，必然要如火燎原的广大的开展起北方苏维埃运动，配合全国苏维埃运动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显然的，不仅革命危机在南方存在着，而且也在北方。

然而革命危机转变到革命的速度，完全是决定于无产阶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北方的党一般的由于对于客观革命形势估量的不足，以致把握不住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伟大的劳苦民众的斗争浪潮前面，充分的表现束手无策和无能；甚至有些地方将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曲解为北方“落后论”、“特殊论”，以掩盖自己富农路线的实质；公开认为“北方群众没有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土地革命还不是今天的任务”、“游击战争只不过是可能的前途”、“北方工人尚缺乏伟大斗争的经验”等等，并且这一右倾机会主义的富农

的思想，在实际工作的领导上，使有些地方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遭受到了障碍和损失。

北方会议一致认为北方党应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百折不挠性，来粉碎这一右倾机会主义的“落后论”与“特殊论”，并在实际工作中彻底的克服它，以顺利地完成自己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的光荣任务。

二 北方游击运动发展中的错误与教训

在北方劳苦民众斗争烈火般的发展当中，党的领导与工作一般的虽然是加强了，但因为富农路线的影响与障碍，使党的领导远落在群众积极性增长之后，最大部分的斗争还带着自发的性质，甚至许多斗争的领导还落在地主、豪绅、富农手中，使这些群众斗争遭到消散与失败。有些群众斗争，虽然已发展到极广大的范围，但因为缺乏党的及时的正确的领导，而不能迅速的开展与深入，以至发展游击运动，创造新苏区。

在北方目前乡村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情形下，农民极小的日常斗争迅速的发展成为广大与剧烈的群众行动。北方党对于有准备有组织的发动与领导农民日常斗争，表现着忽视与消极，或拘束在日常斗争的范围内，不去抓紧群众剧烈斗争的形势有计划的发展游击运动，而只停留在所谓“准备”中，甚至借口“暴动条件尚未成熟”无法发动游击运动。在游击运动已经开展的区域，则又不能坚决的开展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创造苏区。所有这些，都充分的暴露着富农路线对于北方革命运动危害的实质。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与轰炸屠杀及国民党的无耻投降的斗争过程中，澎湃汹涌的开展着义勇军运动。由于广

大劳苦民众民族觉醒及其斗争要求的迫切，满洲许多很小很小的义勇军部队，异常迅速的汇合着自动武装起来的广大工人与农民及哗变过来的士兵、警丁而发展成为极大的力量。目前义勇军的领导最大部分还落在国民党、军阀、豪绅、富农、胡子土匪手中，但由于广大群众反日情绪的热烈与高涨，他们的英勇活动已弥漫着满洲全部，他们坚持的再接再厉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给予了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有力的反抗。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一方面认为义勇军是胡子土匪而消极不理，或企图以上层的勾结利用来代替真正的艰苦的群众工作；另一方面，则空喊组织“真正的土地革命的反帝的游击战争”与“变义勇军运动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却拒绝广大群众要求武装斗争的领导与放弃利用一切可能打入已有的义勇军中去，树立我们的革命工作，以致至今光荣的义勇军运动尚缺乏正确的领导，不能彻底实行反帝纲领与土地革命。尤其不能满意的，有许多义勇军热烈的迫切的要求我们去领导，甚至自动打出我们的旗帜，有不少地方实际上是在我们个别同志和赤色群众领导和影响之下发动起来，可是我们并没有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与方法来开展我们的工作与树立我们的领导。直到今天，在满洲尚没有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之下的任何部队，就在我们工作最有基础的区域，同样的也没有显著的成绩。

但在“闭塞”的陕甘边苏区的创造中，我们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的教训。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的拥护之下，由于赤色战斗员的英勇与坚决，陕西党一般领导的正确，由陕甘边游击队生长的红二十六军正在为开展陕甘边苏区而斗争。它教训了我们，不仅在南方，同样的也在北方，只要在坚定的阶级路线与正确的群众工作之下，游击队能迅速的成为红军，只要毫不延缓的开展群众日常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广大劳

苦民众为自己政权而斗争，游击区域是能够巩固的奠定新苏区的基础。同时昭示我们，只有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百折不挠性，经过不断的残酷斗争战胜一切困难，克服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方能顺利地实现新苏区的创造。然而必须严重的指出，所有那些反对立即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反对加紧反对富农与实行土地革命，反对迅速彻底改造游击队的社会成分，树立工人的骨骼与切实开始党的政治工作，反对采取进攻袭击的战术，而一味的逃避退却或冒险攻坚等等观点，都完全是障碍革命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使革命力量遭受到不必要的挫折和损失的，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

士兵斗争哗变潮流（不仅杂牌部队而且白军的中心部队）广大的发展，特别是临近苏区区域群众斗争发展的区域与反日战争的区域，显明的指出我们有充分便于夺取士兵群众的客观条件，有极大可能大规模的瓦解白色部队，吸引广大士兵群众参加到苏维埃运动与反帝战线上来。但应该明白的记着，只有坚决开展士兵日常争斗，只有有准备有组织的兵变，只有配合与开展当地群众斗争，只有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与反帝纲领，方能更有力的帮助苏维埃运动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方能成为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新的苏区的巨大力量。过去红二十四军失败的主要教训，就在于它拒绝与放弃实行它的政治任务，它根本没有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与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而只企图在偃旗息鼓的流窜中去找出路。

最后，必须严重的指出，目前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方能获得彻底的胜利。许多地方在开展游击运动中，完全缺乏充分的必要的城市工人及雇农中的工作，拥护苏联和苏区的工作，特别是对于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到游击队与义勇军中去，表现着不可容许的消极，甚至可耻的拒

绝工人要求武装斗争的领导（奉天）。显然的，所有这些都是不了解或根本忽视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的重要意义。

三 为创造北方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在北方革命运动烈火般的发展中，在开展游击战争领导义勇军运动、创造新的苏区以争取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中，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是：

第一，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

（1）在边区首先应当发动广大劳苦群众百倍的开展和深入群众斗争（农民反地主、雇农反富农），巩固与加强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要绝对保证党在这临时政权内的领导）。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与号召之下，立即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依照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和中农，摧毁与肃清边区一切反动势力，武装广大劳苦民众，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广大的建立与发展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土地法、劳动法等）与最大限度的实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劳动妇女青年参加一切组织与活动。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之下，在游击区域巩固与扩大之下，在红二十六军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卫之下，革命委员会应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2）在已开始生长成为红二十六军的游击部队中，应该毫不延缓的征调大批工人与吸收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进去，坚决淘汰土匪流氓分子，以彻底改造它的社会成分，必须依照红军的编制改编它的队伍与立即切实开展红军政治工作，以绝对保证党的领导。在战术上，红二十六军目前虽仍可以广大利用

进攻袭击的战术，但同时即须逐渐学习阵地战、平原战等，以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在边区四周特别是在陕西渭北及西路群众斗争剧烈发展与我们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如三原等县），应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对于白军尤其是杨虎城的直属部队，应特别加紧我们士兵工作。

（3）为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须百倍的发展雇农工作，建立与开展城市工作，特别是中心城市（如西安），大批的征调工人到苏区中去，在红军中在苏维埃机关中切须有一定的工人数量，以保障工人骨骼的领导作用。

（4）广泛宣传党的政纲，猛烈的发展党的组织与吸收大批雇农贫农入党，派遣最可靠的有能力的政治坚定的同志到红军苏维埃中去开展党的工作，同时必须吸收边区有威信的积极的雇农贫农同志参加边区特委组织，以改造与健全党的领导。

（5）北方党应即开始在广大劳苦民众中，进行关于拥护陕甘边新苏区的运动（宣传、征调、捐助等）。

第二，开展义勇军运动与树立党的领导。

（1）在义勇军活动区域的党，首先是我们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如延安、磐石等）应努力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开展和深入反日反帝运动，由抵制货物、殴打汉奸发展到没收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商店企业，没收一切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灾民、难民、失业工人与作为义勇军的军费。加紧组织工人斗争与罢工，积极领导农民日常斗争，发动游击运动，开展反动部队中的士兵工作，公开成立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反日会，百倍的扩大党的反帝纲领与苏维埃红军的宣传鼓动，广大的发展工人义勇军，号召劳苦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解除与夺取反动武装。指定得力同志专门负责进行组织民众义勇军的工作（如在反日会下成立义勇军委员会）。

(2) 应该有计划地选派干部及赤色群众打入义勇军中去，组织义勇军委员会或反日会，揭发上层反动领袖的欺骗，以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同时应号召广大群众组织侦探队、交通队、输送队、破坏队，以实际帮助义勇军的作战，而扩大反日战争。在义勇军到达与占领的地域，则必须立即举行群众大会，组织慰劳队、救护队、宣传队等向义勇军战士进行广大的政治鼓动工作。在这里党应该采取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路线，以领导反日战争。它应该依靠在群众武装力量之上，逮捕与枪决一切反动军官与汉奸。

(3) 在我们能够领导的义勇军中，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使义勇军的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的联系起来，毫不迟疑地依靠在义勇军的武装力量之上，没收地主、豪绅、军阀、资本家的土地，把它分配给当地的贫苦农民与义勇军兵士，尽量吸收工农的干部加入义勇军，彻底改造义勇军的成分，建立义勇军中的政治工作，使义勇军转变为工农红军，创造苏维埃的政权。在有些我们工作比较有基础的地方，我们可直接发展游击战争，创造强有力的游击队，来影响与团结广大的义勇军在它们的周围，来开展反日与反国民党的夺取政权的斗争。

(4) 开展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应成为北方党目前中心工作之一。必须最大限度的发展群众反日反帝的斗争与行动，广大的组织义勇军特别是工人义勇军，征调与号召他们到东北战线上去，争取满洲义勇军的下层群众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或在当地实行检货、抵货，参加与保护一切群众革命战争与示威游行，同时募捐慰劳与救护的工作亦应切实开始进行。

第三，开展农民日常斗争，发动与扩大游击运动。

(1) 抓紧农民迫切要求（抗租、抗债、分粮、吃大户等）发动与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加紧反对富农，坚决的克服富农

路线的一切障碍与破坏，成为发动游击战争的枢纽。应充分估计到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条件下，许多极小极小的斗争往往异常迅速的发展到武装冲突与骚动暴动。因此在准备斗争以及斗争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巩固与发展广大农民的组织与其武装工作，以便在群众斗争剧烈发展的情势下，立即发动游击运动。北方党对于灾荒区域内工作的建立与开展，必须予以更大的注意。

(2) 北方党对于目前可能发动游击运动的区域（如接近苏区及游击区域地方，斗争十分尖锐且我们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应集中力量开展与加强我们的工作，努力发展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发动广大群众到斗争战线上来开展游击运动，解除一切反动武装，摧毁一切反动机关，建立革命委员会，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及一切劳苦民众，实行创造新的苏区。无论在农民日常斗争中或在游击运动中，农妇与青年农民表现着极大的作用，应特别注意发展他们的积极性，并吸收他们参加一切革命组织与活动。

(3) 对于农民自动的骚动与暴动，对于农民原始的团体与武装组织（红枪会、黑旗会等），必须设法打入与领导，提出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有组织的开展群众斗争，以加紧揭破一切反动领袖的欺骗，而争取广大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上层的勾结与利用，只有使斗争失败与丧失党的威信。

第四，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建立与加强外兵工作。

(1) 几百万的白军士兵，因为生活的极端恶劣与痛苦（军饷永远押欠，七折八扣，以致一文不发，只有伙食费，吃红高粱粗小米，官长任意打手掌、打屁股，完全没有出入行动的自由等），革命运动发展特别是苏维埃红军伟大胜利与反帝运动高潮的影响，使士兵群众斗争哗变潮流普遍的、广大的、继续

不断的开展着。明显的指出士兵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之后，更是一点也不应该忘记，目前国民党在反苏维埃的战线上，调动了将近百万的士兵，在群众斗争尖锐高涨的地方，到处驻扎着白色部队，在满洲的反日战线上也有十数万的士兵群众。发展党的军事的政治组织工作，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叛变到苏维埃红军与游击队方面来，哗变到乡村中去汇合工农斗争，开展游击运动，逮捕与枪毙一切国民党反动长官，拥护与赞助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北方党目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之一。

(2) 百倍的加强我们对于士兵群众系统的宣传与煽动。征调广大赤色群众与同志给以适当训练，送到白军中去尤其是白军中的主要部队，树立与加强我们的营内活动。在广大发展士兵日常斗争的基础上，普遍深入党的政治影响，建立严密与巩固的党的支部与士兵的群众组织，真正有准备的有计划的谨慎的进行组织广大士兵的哗变，以帮助与扩大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或汇合当地劳苦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不从开展群众日常斗争上，不从政治上（如仅仅以月饷二十元等经济要求作号召）组织上技术上，准备兵变而空喊组织兵变与轻率盲动，或依靠于上层勾结与军官路线，都只有取消兵变的革命意义，以至遭到溃散与失败。

(3) 仍然丝毫不应放松“满洲国”军队的瓦解破坏工作的进行，目前尤其主要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争取反日战线上的士兵群众（如北满等地），应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实现国际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

(4) 数十万日军满布在东三省，行动于苏联边境，日本士兵工作绝没有像现在的紧迫与严重了。日军士兵生活的痛苦（日饷一角八分、官长蛮横的待遇等）与政治的觉醒，充分给予我们以瓦解日军的顺利条件。满洲、河北等地党部必须利用

一切力量与可能，建立对于日兵的系统的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开展日兵斗争与哗变。

四 在创造北方苏区中党的领导的决定作用

只有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党，才能保证创造北方新苏区光荣任务的顺利地执行！党能同一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拥护者国家主义派以至托陈取消派进行残酷的斗争，最大限度的实际的开展拥护苏联拥护苏区与红军的政治运动，建立与加强城市工作，发展工人运动，争取千百万劳苦民众在它的周围，党才能为实现创造北方苏区的每一工作而斗争。

北方的党应抓紧自己工作的中心，适当的配置自己的力量，大批吸收工人、雇农、贫农入党，发展与巩固农村中兵营中党的支部的组织，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加强地方党部的领导，各省省委组织亦必须扩大与健全。同时，任何官僚主义的领导与工作方式应受到全党最残酷的打击与指斥。

北方会议坚信，北方英勇的中共的布尔塞维克的队伍，在反对一切“左”倾关门主义与空喊（空喊组织苏维埃等），特别是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北方落后论”、“特殊论”、富农路线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定能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国际与中央正确路线领导之下，在北方千百万劳苦群众英勇斗争中，在如烈火般的革命运动发展中，完成北方党“创造新的苏区”的光荣的历史的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朱德关于各级指挥员应及时 准确报告军情的训令*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

一、在战斗间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灵机应变的处置，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地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这是我各级指挥员应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战中如三军团误报大余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改变作战目标；又五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我军追蹶不及，致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不能迅速歼灭该敌，延长战局至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计不足，亦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必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特此通令。希各级指挥员以后报告敌情务要精确，遇有可疑之处亦须说明，俾上级容易判断而处置。

二、军与军的联络，师与师的联络，团与团的联络更为缺乏，不能使战线一致行动毫无缝隙可乘。如三军与十三军之间缝隙太大，敌即乘隙而出。十二军攻击上前，不知三军在何地

* 这个训令是朱德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的。

点。此等联络不确实，实有最大危险。望各级以后对于联络应当切实注意。

三、无论命令、通报、报告，首先要写明发出的时间及地点，特别是在情况急速变迁时，常在短时间内下达两种不同处置的命令，若不将时间、地点写上，则收信者便不能从发信的先后来判断应当执行哪一个指示。此次水口之役，参谋部对三军团所发的指示信便犯了这种错误，以后必须注意纠正。

四、指挥阵地及指挥机关应审慎地选定。在战时不容许随便移动，若已移动必须通知各级指挥机关，以免失掉联络。此次战役，总部位置常为各军团找不着，这显然是失掉了战场指挥的效能，以后必须改正。望各级指挥员亦须注意此事。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朱德军事文选》刊印。

周恩来、毛泽东等 关于当前作战方向问题给中共 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央局：

(一) 赣江敌情：粤敌除张枚新师回韶关整顿，叶肇两团留赣州外，十七师八团仍集结雄余两处，并有部分开向新城、南康说。五十二师在新城，十四师在南康、上犹两地，二十八师一部在赣州、一部在万安，四十三师在遂川，陈光中一旅在曾前，泰和以下为五十九、九十各师。

(二) 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

(三) 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①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但此行动须极迅速秘密，我们决后方开始集中行动。望秘电中央。

(四) 过去行动中错误与缺点望即告。

周毛朱王^②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陈诚、罗卓英。

〔2〕指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等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此种办法如何，飞电复。

周毛朱王^{〔1〕}

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关于南雄水口 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信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中局：

在来于途中，得到你们关于行动及组织的复电。因我已先一日赶到于都，明即转往兴国，复电当俟军委到兴国后再讨论答复。兹将我个人意见答复你们。

为使答复你们的意见明了起见，须先将这次前方关于池江、水口两役战斗的初步总结，报告你们。

一、水口之役，系粤敌因三军团南下并有东渡企图，并因李振球在塘江与三军团七军接触的时候受了重伤，故留叶肇两团守赣州，李振球一师四团及叶师二团共六团人向大余退。这时，三军团正由杨眉寺逼近新城、池江，发现敌军撤退，下令给五军截击敌军，这表示又是截尾巴的办法，故未调七军增加。敌军发现三军团在其侧背截击，立即回转去打，故成一场恶战。结果敌败退节节掩护，我五军衔尾猛追，直逼近大余（此事过去军委并未电告中局），竟一弹未获。这一役的最大错误，在未以全力对付粤敌，仍想用过去在苏区内的办法截尾巴，这仍是对敌人进攻估量不足，没有下最大决心消灭敌人。

二、南雄、水口之役，当主力军开入南雄境后，闻三军团

已在池江打响即伸入中站，并占领大小梅关，以断绝余、雄交通，这是对的。但初因估量大余退南雄可能，故以为在梅关、中站可求得仗打。嗣至大余，侦察地形，知不可硬打。当晚（四号）又得三军团及围余之十五军不确实报告，余敌已退，三军团已西进，于是四号晚乃始改围南雄，五号执行。五号佯攻一天。六号知道张枚新已由信丰开动，晚间从南雄撤围。七号布置一天。八号又未以全部出击张枚新。只以五军团由水口北岸逼乌径，途中发现张枚新由水口南岸退南雄，五军团转身追张敌，下午始在水口圩南北岸开始战斗。战场布置：五军团三军及十二军分开使用。十三军当正军，三军实行迂回（从我军左侧进攻敌之右翼），但两军火力又隔断数里，接触至晚，五军团竟报告张师已退，同电中又说如今晚不能解决战斗即撤至北岸。当时前线最高指挥机关竟相信敌人真个撤退，未决定增援。至第二日（九号），敌人陆续增援，因十三军支持正面难攻，改以全力冲十三军，三军退下。另一方面，调一、三军团。第三日，一军团本应从右翼向敌之左侧背施行包抄，断南雄的路，但一军团抵战场又变计划，决从我左翼增援（因闻三军退下）。追十五军移至我左翼后，四军后至，在我右翼已打响。四军一冲，敌人大部（是时敌军已有十三团，计张枚新四团、陈章两团、李汉魂三团、张达三团、香翰屏一团，又一说张达有两团及香翰屏一团守城内）即退，三军团亦未令其由南雄至水口大道插入南下增援，亦是开到正面增加，及由中站、梅关开到，只七军赶上追击。追击时，十二军追了几里而回，四军追二十里，未缴到械。敌人节节掩护退却。反是独三师还缴到一部分械。总计缴械不满五百，敌死伤据说近三千。我伤兵有一千三四百，死亡四五百，以三军为多。三军团池江一役，坚守新城^{〔1〕}，但并未计划立即进行第二仗。因当时已顾虑

到三军不整顿不能使用，粤敌顽强，不便远离苏区到始兴去作战，赣敌五十二师又已到沙江坝，余、雄交通已通，以及伤兵甚多等等条件，于是便有撤回信丰意。当时泽东^[2]主张在水口留几天，引退粤敌，再回信丰，这当然更不妥。结果，总部回信城，一、三、五军团布置在南康、大余、南雄边境，信南及龙南、龙源坝一带，一军团并有一部占领龙南城，独三师在固陂一带工作。我到信之日，前方正下令十二军及独三师开往王富一带，向赣州、石埠一带行动，以引动南康敌人，企图由新城上下渡河。这一战役主要的错误是行动迟缓犹疑，分兵应敌，未用大力先解决张枚新，想用过去在苏区作战方法讨巧，反倒引起敌人分进合击，以致不能乘胜直追，不能继续开展当时胜利局面。这仍是对敌人进攻估量不足（如几次轻信敌退，而不重视与估量敌之增援），与过去游击战略及苏区内部作战战略未能转变缘故。其他在战略战术上亦对敌情估量不正确，报告不确实，各部队联系不好，机动未能配合，尤其是最高指挥机关在组织上、在布置上均有许多缺点与错误。至粤敌顽强难缴枪，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在白军中工作尤其是在粤军中工作完全没有的缘故。

因此，遂造成目前在南康、南雄、大余、新城、池江、上犹、塘江、赣州一线敌人集结兵力围我的形势。现在蒋介石已将十四师（在上犹、南康）、五十二师（在新城、池江）、二十八师及王东原师归余汉谋指挥，陈济棠委余汉谋为第一纵队总指挥，计划以赣州为中心向于都进攻。香翰屏为第二路总指挥，计划向信丰进攻，桂军五师因已到韶关，这一计划是针对我主力军在信丰定的。处此情势下，在赣州上游渡河成为不可能，如准备与敌人作战后再渡河，则敌又有凭河而守以稽延我军行动的可能，并且在信丰停顿待敌人进攻尤其要不得。同时

敌人更计划从北路进攻，以吉安陈诚为总指挥，指挥十一师、四十三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张英）、九十师（吴奇伟）各部向兴国进攻。现在二十八师有两团驻万安，四十三师驻遂川、泰和，十一师一旅在吉安，一旅在水东、泰和，河东亦有一两团，五十二师驻永丰、乐安，张英在吉水、樟树一带，九十师在樟州、峡江一带。我们必须估量敌人是向我们进攻的，只要我们向外积极行动，必然遇到敌人打。你们说河东决战可能极微，是不尽然的。只要行动迅速，必能给敌人各个击破。如硬要等敌人力量加多始打，这次水口战役已证明其错误。当着敌人固守据点，在赣州撤回以前，犹可说非到河西不能找到敌人打；当着敌人大举“围剿”的时候，只要我们出到白区行动，敌人没有不来围攻的，三军团在河西的遭遇及这次敌人四攻于都计划便可证明，不过，向苏区进攻是迟缓的。红军到白区行动向白军进攻是迅速的。因此，渡河是第一目的，如不能渡河，决不能说去河东便无敌人可打。万安之后，泰和、河东小团州公^[3]也有敌人，水东有十一师一旅，吉水、樟树均有敌人。为着夺取吉安、南昌，必须以主力过河西，但不说先攻下万安、吉水，这对于吉安的夺取有帮助。不过，最紧要的还是能渡河，必须以最大决心迅速渡河，地点决限于万安。现已在万安上下游击，集中与掩藏船只。

关于组织问题，军委会原指主席团，但仔细想仍不好。我原意是在提高军委信用，故出此。现在我想是否可改为最高军事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4]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

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须帮助。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疑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故此，银宝塔式的指挥权，必须改变。我觉得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再考虑一下，如同意，可先电兴国告我。

我后早（三十一日）可抵兴国，军委会要二日才到。匆匆，致以布礼。

周 恩 来

七月二十九日

两次战役总结前方仍要讨论，批评上次战役做总结。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 原件此处缺三至四个字。
- 〔2〕 即毛泽东。
- 〔3〕 原文如此，可能有误。
- 〔4〕 指朱德、王稼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和创造 北方苏区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

陕西省委：

根据北方会议及你们最近的决议，中央认为对于你们的工作，有特别指示的必要。

现时世界政治形势之最中心问题，是两个世界——即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极度尖锐的对立。最主要的危险，是帝国主义世界要以干涉战争，来破坏正在消灭人剥削人的基础和原因、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生活及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无产阶级的祖国，来求其垂死的出路。

在中国，则两个政权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之尖锐的对立，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崩溃。而汹涌全国的罢工浪潮，日益扩大深入的反日反帝斗争，和农民、灾民以及兵士斗争之继续不断的开展，特别是红军与苏维埃区域之伟大的胜利与巩固的发展，更加深了革命危机之程度。

这一政治的特征，在陕西决不是例外的，陕西工人斗争之活跃（如西安日报社工人的反对开除工人，机器局工人的要特别工资与酝酿着裁工减薪，盐滩工人与挑水工人之几次的罢工斗争等等），农民斗争之汹涌澎湃，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

党统治（如杀委员、打差人等斗争之普遍开展，关中道二十余县的“游农围城”，三原、富平、韩城等处的农民斗争等等），白军士兵的不断的哗变（如山阳地方红军独立师与警备师两次自发的兵变，“围剿”部队特务团两连，冯钦哉部两连的哗变等等）与逃亡以及零星的投入红军，尤其是陕甘边游击区域的建立，红二十六军的胜利的发展，这一切更加推动陕西革命危机的前进，推动了反帝反国民党的怒潮（四二六惨案及其发展），开辟了创造北方新苏区的有利的大道。

但是，在这里必须严重指示的，是陕西党过去对于这一形势的估计是完全不足的，对于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是极不坚决的，因此障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障碍了群众斗争之更高潮的前进。躲藏在“北方落后论”或“陕西特殊论”之中，不去领导并组织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不去组织并领导反日反国民党的罢工，甚至完全的取消了城市工作（没有一个产业支部），这自然使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得不到工人阶级的顽强的骨骼，使斗争日益扩大来配合游击战争，来创造新苏区。对于农民、灾民的汹涌澎湃的斗争潮流，更是犯了富农路线之错误，作了自发斗争的尾巴、国民党的俘虏。“创造”“陕西农民没有夺取土地的决心与勇气”的可耻的“理论”，提出十足的国民党的口号“杨虎城不出兵抗日，我们不给出款”（三原），阻碍了农民为土地革命而斗争之发展与扩大。在士兵工作中，犯了完全官长路线之错误，使几次计划的兵变遭到悲惨的失败，造成了非常可耻的屈辱（如领导兵变兵士回归原属部队，而尽遭国民党之屠杀）。对于继续不断的兵士哗变，不知所措。对于扩大深入的反日反帝运动，起初则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关门主义，不去争取反帝斗争的领导权，继则完全依赖学生的反日斗争，没有能够积极的深入到工人阶级之中，深入到农

民群众，以掀起更伟大更持久的斗争。对于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之胜利与苏区之伟大的发展与巩固，不晓得动员并组织群众来举行庆祝和拥护，以开展并提高群众的斗争决心，以扩大陕甘边境之游击区域。对于建立游击区和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是完全动摇不定，放弃了巩固根据地的任务，采取了可耻的逃跑主义（维汉^{〔1〕}同志领导下的时期）及截断渭河交通、攻取三原等的“左”的计划。

中央不得不严重的指出并唤起陕西全党同志的严重注意，所有这一切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一切“北方落后论”或“陕西特殊论”只不过是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外衣，只不过是党的工作落后之粉饰与遁辞。不打击这种“落后论”的落后观点，不消灭这种“特殊论”的特殊观点，不改变富农路线，不改变官长路线，不坚决地打击对职工运动怠工的取消主义，总之不立刻坚决地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陕西的党是不能完成领导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而创造北方新苏区之伟大的历史任务！

但同时，中央还须着重的指出，陕西党在四中全会后，在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是有了一些不可否认的进步。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创造了红军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域，部分的领导并组织了农民的分粮反帝斗争（三原、富平），组织了农民的反日救国会、反日义勇军的武装组织（三原），建立了农民的群众组织（三原、富平和蒲城），组织和布置了几个部队的革命兵变，反对了杰夫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开始了陕西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领导，实现了西安的罢课，党的组织也有了部分的改造（三原等）。虽然这一些进步与成绩是极其微小，远远的落在革命斗争的后面，但这些成绩是不能否认的。因此认为陕西党的路线完全在于“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

义”的泥坑中（陕西省委最近关于省委工作检查与两条路线斗争，彻底改造的决议草案），认为陕西党是“这个整个路线之下”（同上）是过火的，是自杀的自我批评。这种估计，是不会认识正确的路线及过去的错误与教训，来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彻底的转变，来实现北方会议所赋予的创造北方新苏区、建立全国苏维埃之神圣的历史任务。

清楚的认识陕西党的错误与缺点，深刻的接受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央和北方会议正确的决议之下，努力去转变并开展党的工作，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苏区与红军和巩固并扩大陕甘边游击区域为中心，积极的去领导并组织工人斗争、农民斗争、士兵斗争以及广大劳动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坚决的执行中央路线，反对一切“左”右摇摆的机会主义，特别集中火力去打击右倾机会主义，是陕西党目前在创造新苏区中最迫切的中心工作。

陕西党必须在这一两条战线斗争的开展中，去坚决的执行下列的基本任务：

（一）巩固陕甘边根据地创造新苏区。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的加紧这一工作，首先第一，必须坚决的没收地主阶级与祠堂庙宇及土豪劣绅的土地，按照劳动力与人口，平均分配给雇农、贫农以及中农。在分配土地过程中，不许动摇中农的利益。富农的土地亦必须没收，在他们不反革命的条件之下，把坏的劳动份地给他们。同时要尽可能的做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以彻底肃清封建的残余，但这必须使基本的农民群众了解并在自愿之下来执行的。第二，为巩固这一革命起见，必须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使之成为拥护并支持土地革命的基本队伍，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实现真正的工农民政权——苏维埃政权。第三，立刻成立红军一团，进行广大的征收红军战士

运动，要动员工人、雇农及贫农加入红军，积极改造士兵的成分，红军士兵必须分给土地，按照红军优待条例，给予特别的待遇，决不能借口特殊情形而忽略这一真正改造的实施。同时，必须成立赤卫队、政治保卫队等以武装当地农民。第四，红军必须开始有计划的游击运动，以枸邑、淳化、邠州及正宁为中心，扩大游击区域，以与三原、富平为中心的农民斗争相配合。第五，加强边区党的工作，吸收并提拔新的大批干部，特别要对广大的工人、雇农及贫农开门，吸收新的坚决的分子入党。红军士兵之中必须建立健全的支部生活，根本的改造过去的土匪成分。第六，要进行广大的拥护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运动，扩大红军胜利的宣传，以提高广大群众斗争的情绪，以开展边区的工作。第七，为实现这一任务，边区的党必须严重的打击过去逃跑主义的残余，肃清放弃根据地的倾向，坚决的执行在巩固并扩大边区工作中创立新苏区的路线。（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在目前继续有效）

（二）创造产业支部，开展支部斗争。放弃职工运动，不理解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与反帝斗争中的领导权，这是陕西党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不消灭这种错误，不立刻进行并开展职工运动，一切的工作势必成为空谈。中央严重的指出这种错误，要陕西党立刻在实际工作中克服这一错误。第一，省委必须在最短的时期内，以冲锋队的精神，在西安修械厂、华阴兵工厂、西安印刷厂、报馆及洋车夫工人中，恢复并创造支部，要责成蒲城县委集中力量去扩大盐滩工人的组织。建设健全的产业支部，是陕西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之一。第二，要发动并组织日常斗争，抓住工人切身的要求，发动罢工斗争，在斗争中吸收勇敢坚决的分子入党。第三，要组织工人反帝反国民党的

罢工，增强无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使广大的农民学生以及一切劳动群众之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得到无产阶级的骨干。第四，要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公开的半公开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运动，扩大红军胜利的宣传，提高工人对红军的认识与热情，在这些运动中要特别征调工人到陕甘边去。领导创造新苏区的斗争，实现工人阶级在红军中的骨干作用。第五，要在兵工厂、印刷工人中，首先建立赤色工会或黄色工会的革命反对派。第六，为造成工运干部，省委必须开训练班，训练大批干部同志以保障我们职工运动之彻底的转变。

（三）肃清富农路线，开展农民斗争。陕西五年来的灾荒，使农民群众死亡流离，愤恨国民党军阀统治到了极点。汹涌澎湃的农民灾民斗争，是土地革命成熟的主要标志。陕西党对于这一形势的估计，是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仅没有提高农民的斗争决心，反而障碍了斗争的发展。因此，为要彻底的开展农民斗争，党必须把把持领导机关的富农分子清除出去，肃清富农路线的残余，积极并大胆的领导农民抢粮、分粮一直到分土地的斗争，去开展游击战争，与边区配合起来。首先第一，要积极领导并组织渭北农民的分粮斗争，以三原为中心开展这一斗争，一直到发动土地革命，与陕甘边苏区打成一片，并与西路的灾民斗争联合起来，调派得力的农民干部去进行这一工作。第二，积极的领导自发的斗争和骚动，提出我们的斗争纲领，打碎豪绅、富农的欺骗面具，夺取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下。第三，对于三原现有的农民武装组织必须特别加强，转变成为农民游击队，开始游击战争。同时，富平、蒲城及韩城的党，必须开始去建立农民武装组织，响应三原的农民游击战争，争取与陕甘区打成一片的前途。同时在汉南方面，要迅速派遣得力干部去组织斗争。第四，所有这一切群众组

织，必须打破狭隘的方式，广泛的吸收农民加入，纠正过去的严格主义，改变群众组织与党的组织混合不清的方式。三原的农民联合会，富平、蒲城的穷人会、同心会等组织，必须成为群众斗争的领导机关。第五，在灾民中成立灾民自救团、自救军的组织，领导抢粮分粮、包围救济机关、吃大户等斗争，提高他们的斗争情绪，一直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土地的斗争，在西路方面，应以礼泉、乾州为中心来发展这一斗争。第六，要扩大拥护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与一切斗争联系起来，宣传土地革命的利益，组织参观团、代表团和慰劳团等去参观苏区，进行广大的募捐援助红军运动，并与创造陕西新苏区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

（四）肃清官长路线，保障士兵工作的发展。省委必须清楚的认识，在士兵工作中的官长路线是陕西党严重的错误，他不仅障碍了士兵斗争，而且断送了几次三番的兵变，造成了可耻的投降记录。在士兵运动中，必须用最大力量，打击这种官长路线的倾向，要严密保存我们组织的秘密，绝对排除与官长的勾结，禁止横的与不必要的关系。积极的去组织兵变与领导自发的斗争，以与游击队相配合。省委必须严重的注意瓦解敌人的部队与组织革命的兵变，是冲破敌人围剿与发展新的游击区与苏区之一个主要力量。因此，第一，彻底的纠正过去官长路线的错误，在敌人的主要部队内进行真正的士兵工作，抓住兵营的一切机会，发动要关饷、要改良待遇、不许官长辱骂和殴打等等的斗争。来开展我们的组织，吸收新的积极勇敢的士兵同志，改造成分，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任务。第二，在这里，对于第十七、第四十二及警备师的工作，要特别加紧十七师和警备师方面，必须派人去巡视，加紧对他们的领导。运用第三旅革命兵变的经验，组织这几个部队的革命兵变。对于兵变条

件已经成熟的部队，如警备师第四团要坚决去领导，配合汉南的农民斗争，去建立川陕甘边的苏区，迅速的向鄂北发展，以便与豫鄂边苏区取得联络。第三，在王志远部队中，首先要坚决的对官长路线作斗争，组织这一部队的兵变，向边区发展。第四，省军委必须加以改造，以加强对士兵工作的领导，对于士兵工作的干部必须有计划的来训练。

(五) 扩大并深入反帝斗争。反日反帝的斗争，陕西与全国各地一样，正在扩大与深入。党必须加紧对这一运动的领导。四二六惨案以来，广大群众是更加明白的认识了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的真实面目，更加认识了一切军阀是屠杀反日反帝民众的刽子手。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情势，扩大并深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与创造新苏区的运动紧密的联系起来。在这里，首先第一，必须指出，只有工人阶级为中坚的反日反帝运动才能使反帝斗争更尖锐的发展下去，因此，打击对于组织反日反帝罢工之机会主义的怠工，组织工人反日救国会，武装工人成立工人义勇军，是扩大反帝斗争中最主要的当前任务。第二，依照三原农民反日武装的组织，在各地成立农民反日救国会，积极的武装农民，响应学生的反帝斗争，并使之与发动土地革命连在一起。第三，要汇合工人、农民、士兵及学生中的各种反日反帝组织，建立领导全陕西反帝运动的大同盟，推选代表参加全国的反帝组织。第四，要加紧检查日货、没收日货分配给失业工人、灾民、难民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经常不断的暴露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假抵货以至实行畅销日货的面目，使斗争继续不断的开展下去。第五，要抓住国民党的每一出卖行为，抓住帝国主义的每一暴行与进攻，在目前特别要抓住上海自由市，日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山海关，英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西康与青海，以及帝国主义进攻红

军的事实，来发动并组织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第六，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必须密切的与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联系起来。动员并组织群众为拥护苏联而斗争，应该揭破国民党最近发展西北的计划实际上是要把西北变成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新的根据地。

但是中央必须重复的指出，只有在加紧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方能完成上列的这些任务。陕西省委过去虽也曾经反对了杰夫同志机会主义的路线，并且给了它以相当的打击，然而这种与机会主义的斗争，还不过停留在上级机关的中间，而没有深入到下层去，也就是这一原因，说明了在陕西党的组织内还充满了这样浓厚的官长路线与富农路线。况且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省委本身还是犯了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不足与机会主义的动摇。像我们在前面时已经指出了的。

中央坚决的要求陕西省委立刻讨论北方会议的一切决议案与中央这一指示，最坚决的揭发陕西党在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党的中央的正确路线能够真正传达到县委区委与支部中去。在斗争中彻底改造党的组织，撤销那些无可救药的老机会主义者，提拔新的积极的分子来担任指导工作。中央对于陕西省委过去对于中央一切重要决议与文件的那种忽视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一刻也不能容忍的。不研究不讨论中央的一切决议的省委，当然决不能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

严格检查省委最近时期的工作，那我们可以说，省委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为领导的中心。省委本身没有什么集体的领导，许多重要的问题，省委还不能在集体的讨论之下给以明确的解决。宣传部、组织部直到现在还没有成立，以致根本谈不上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省委对于下面的情形了解得非常不清

楚，许多地方表示出了脱离群众的现象。对于下级党部的领导，表示出了浓厚的官僚主义，而且没有同这些组织中浓厚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决心。对于屡犯机会主义错误而且事实上证明不能执行省委路线的同志，常常采取了腐朽的自由主义的态度。

省委在领导中表示出了不可容忍的迟缓与敷衍塞责。“红五月的决议，四月二十六号才发出，五一的宣言，五二才发出……到五月二十九日才讨论五卅的工作。”这很显然的，省委只是因为“五一”、“五卅”是照例要纪念的日子，所以不得不照例讨论一下，照例通过一个决议，至于这些决议如何执行、能否执行，那当然不是省委的事！这种敷衍塞责的办法，中央认为只能从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不足与机会主义的动摇出发，在这种情形之下通过的决议当然不会是“还没有什么错误”的。如像你们寄来的红五月的决议，在我们看来，那不是决议，而是梦呓！在这些决议中间，丝毫的战斗精神也没有！

中央认为陕西省委必须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在领导群众的斗争中，彻底转变省委的领导方式，改造省委的组织。一切省委的指示必须最迅速的传达到支部，而且必须经常检查这些决议执行的程度，并监督这些决议的执行，省委必须拿很大的力量去了解下级党部的情形，进行下级党部的改造运动。必须开展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启发下层同志的积极性，尽量引进工人、雇农、贫农的积极分子到领导工作中来，同留恋旧干部、不信任新干部的现象做最严重的斗争。必须坚决反对党员同志同一切反革命派别发生社会关系，一直到开除党籍。而且省委对于反革命派别的斗争必须十二万分的加紧。

中央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像陕西党现在这样稀少的党员

数量是不可能的。陕西党在开展群众斗争中必须尽量吸收新党员，尤其是工人、雇农与贫农分子入党，把陕西的党变成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陕西党必须用革命竞赛的方法，提出增加一倍以上的党员的口号，同时应该特别注意加紧对新党员的教育训练的工作。对于 C. Y. 的领导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必须使团中央的冲锋季也能够在陕西实现出来。

最后中央认为，省委六月十八日通过的“关于省委工作检查与两条战线斗争，彻底改造的决议草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然这些错误的揭发与自我批评是十二分必要的。然而在这一决议中，显然还不能从整个革命形势出发，从省委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与机会主义的动摇出发，对于创造陕甘边苏区的问题还是没有显明的提出，而且省委以后到底应该如何来具体的转变一切工作也没有一句话，我们认为，这还不是省委转变一切工作的战斗的决议，而这不过是算账式的忏悔录。

关于甘肃回民中的工作，中央要唤起省委同志的严重注意，陕西省委现在就应该担任创造甘肃省委的工作。过去把甘肃的工作限制在士兵中的倾向，中央认为是错误的。为了加强陕甘边区游击队的工作，中央同意××同志为陕甘边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省委书记中央决定××同志。×同志在几天之后，即可出发前来。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高维翰，又名李杰夫。

中共中央关于肃反问题 给湘鄂西分局与省委的信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

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

读了你们关于肃反的一些报告与决议，及与×××同志的谈话之后，我们认为湘鄂西党在这次肃反工作中所执行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而且正因为湘鄂西的党能够坚决执行国际与中央的指示，能够依靠在湘鄂西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热烈的拥护上，所以他在肃反工作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毫无疑问的，湘鄂西反革命派别活动的积极化与他们的破获，是由于全国革命危机的增长，是由于苏维埃红军的发展与胜利与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动摇，是由于党真能把国际与中央的正确路线深入到群众中去的结果。这次肃反的胜利，是湘鄂西苏区进一步发展与巩固的最有力的保障，并且给湘鄂西党造成了更顺利的深入国际与中央的路线到广大群众中去的顺利条件。

然而，看到这次肃反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不能不同时指出这一次的肃反工作完全暴露出了湘鄂西党过去工作的主要弱点，与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在领导中所犯的主要错误。这些弱点与错误的指出，将更加警醒你们，使你们能够在克服与消灭这些弱点与错误中去彻底执行国际与中央的政治路线。

这次肃反的经过告诉我们，湘鄂西的党过去工作的最大缺

点与错误，是在于没有能够把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传达到下层群众中去，没有能够把两条战线的斗争深入到党的下层组织与支部中去。许多党的决定虽是一般的正确，然而只能传达到县委，能够传达到区委的已经比较很少，至于传达到支部那更是说不上。中央分局与省委对于自己的决定在群众中的如何执行、执行到如何程度，缺乏经常的检阅。这就使地主富农的反革命分子与机会主义者能够利用两面派的态度与一些空头的报告，来蒙蔽领导机关，抵制这些决定的执行。以致在有些苏维埃区域，平均分配的土地一直到现在还不到百分之四十。党对于这些分子的两条战线的斗争非常不够，许多斗争不过停留在机关里，得不到具体的解决与结论，而且没有能够在斗争中加紧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

这种情形，当然使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与一些机会主义者能够一方面敷衍上级党部的指示，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指示的执行怠工，以致执行完全相反的路线，以造成群众对于党对于苏维埃的不满意，然后再利用这种不满意来反对党与苏维埃，来进行反党的与反苏维埃的斗争。这种情形，也使得这些反革命的与一些机会主义的分子能够提拔他们认为是好的干部，来巩固他们在党内与苏维埃内的地位，来进行反对党与反对苏维埃的工作。

因为国际与中央路线的传达与两条战线的斗争的不深入，因为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深切的了解党的一切决定在群众中执行的程度与监督这些决定的执行，因为党与群众中间还没有分离不开的密切的关系，同时更因为反革命分子的捣乱与阴谋，所以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能够从革命斗争中把一切反革命分子与消极怠工的机会主义分子赶出去，提拔积极勇敢的工农分子来代替他们担

任党与苏维埃的领导工作，来保障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

关于工农干部的培养与提拔问题，中央曾经一再促起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的注意，然而你们对于这问题始终采取了维持原状的态度。这一次肃反的经过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过去为湘鄂西主要干部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大多数是经过各种关系混入苏区的地主富农分子，甚至红三军的干部也大都以拖枪俘虏来的为主，而不是从当地土地革命与革命战争中所提拔起来的积极分子……

一切这些告诉湘鄂西的党，要克服我们过去工作的主要弱点与错误的唯一方法，就是更坚决的来执行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使这一路线不在纸头上而在实际行动中。为了这一路线的执行，更坚决的开展与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彻底转变党过去的一切领导方式，建立党与群众中间最密切的关系，尽量发展下层群众的积极性与提拔在斗争中积极勇敢的工农干部，并且有系统的去培养他们。

这次肃反的胜利无疑的给湘鄂西党这一彻底转变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湘鄂西的党应该利用这一肃反工作，来执行我们上述的中心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你们还没有能够使这一肃反工作充分变为广大群众的政治运动，还没有能够在肃反中间充分发展群众拥护党、苏维埃与红军的积极性，使肃反工作变为大批工农分子加入党与红军的运动，而且在有些地方还犯了严重的错误，如像把肃反工作简单看做是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以为肃反工作就是对于犯人的审问，而且还有单靠犯人的口供、不搜集其他证据来逮捕与定罪等的倾向。

在目前肃反工作中，湘鄂西的党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到群众中去，向广大的群众宣布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罪恶，把党与苏维埃的基本策略解释给群众听，使群众了解反革命派别与共产党

的根本不同，自动的帮助党与苏维埃来进行肃反工作。党必须就在这一时期内坚决的迅速的把没有分配的土地立刻分配，没有执行的红军优待条例立刻执行，彻底改造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工作，进行新的党与苏维埃的改造与改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胆的提拔新的工农积极分子来担任领导工作，立刻把省委与省苏的领导建立起来。这样来根本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别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认为你们对于工农新干部的提拔还是不坚决的，你们在这一方面还表示迟疑与恐惧，因为恐怕提拔起来的又是反革命分子，以致想依靠中央来解决你们的“干部恐慌”问题。甚至有人因为干部的恐慌而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提拔干部，不是随便去拉一人来充充数目，而是真正提拔那些在斗争中尤其目前在肃反中表示积极坚决的分子，这种分子决不会是反革命的分子。而且即使有人供他，党也不应该立刻相信，而应该看他在工作中的表现。在百万人口的湘鄂西苏区找不出干部，或甚至说没有干部，这自然是对于群众力量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自然会走到悲观消极的道路上去！

中央认为湘鄂西苏区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十分困难：一方面是川鄂军的包围，一方面是内部的肃反。然而这一困难的出路，只有在发动群众的斗争与群众的积极性上，只有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央认为中央分局与省委在这种困难情形之下，应该以铁的手腕，同小资产阶级的无气节的动摇失败的情绪作斗争，坚决反对以为只有红三军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或中央的大批干部的派送，才能解决他们的困难。中央在可能的条件之下，当然可以派送一两个干部给你们，然而这只是一两个而不是大批的，大批的干部需要你们自己去提拔。

关于三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师的观点，在目前显然是错误的。这不但不能巩固与扩大苏区，而且在目前蒋介石的四次“围剿”之下，这种会师会使四方面军有抛弃根据地的危险。必须清楚的了解红军行动的互相呼应，是在行动方向的配合与行动的积极化，而不在集合，所以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移师麻城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在目前白军猛烈进攻皖西北苏区的形势之下，四方面军再从皖西北行动也是不可能的事。

湘鄂西的红三军应该在这一肃反工作中，在敌人包围的情形之下，进行最广泛的动员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坚决实现“动员一万人到红军中去”的口号，而且在这一万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党员。尽量提拔下级干部担任团长、师长的职务，给他们以特别的政治军事的教育。这些干部是最可靠的能够保障红军为工农军，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的。当然在最初，这些干部的军事知识是不充分的，政治水平是不高的，然而不用一切力量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就不能有任何干部。必须最坚决的打击那些以为过去的红军是改组派的军队、肃反后才是共产党的军队的胡说，指出正因为红军执行了党的基本任务，所以反革命派别用尽一切力量来破坏红军。然而党必须用更多的力量来改造与扩大红军，使红军走向铁军的道路上去。

关于其他许多问题，中央过去的指示还是适用。至于更详细的指示，将在得到你们的详细报告之后。此致
布礼！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九一八” 一周年纪念的通知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

各级党部：

“九一八”的一周年纪念快要到来了，我们必须立即开始以下的各种工作：

一、利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平津、并吞满洲等的一切事实，组织与发展反日运动与反日组织；

二、有计划的组织“九一八”日本企业的反日罢工与同盟罢工，如像上海沪东、沪西的日本纱厂与青岛的日本纱厂等。满洲党必须特别加紧在南满路、中东路、抚顺煤矿的工作，组织那里的罢工斗争。此外必须进行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中被难与失业工人中的工作；

三、组织以工人为骨干的北上决死团、义勇军后援会，号召广大群众来实际的进行援助东北义勇军。满洲、河北的党更应十百倍的加强与争取对于东北义勇军的领导，并且扩大义勇军的组织；

四、领导开展着的农民运动与游击战争，组织农民反日会与抗日义勇军或反帝同盟军。用最大力量去进行张学良、汤玉麟等军阀主要部队中的士兵工作，组织士兵反日会，杀掉卖国长官，自动的去进行抗日战争；

五、在日货如潮水般输入的条件之下，最坚决的开展抵制日货的工作，经过群众组织日货检查队等，并且使这一工作与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密切的联系起来；

六、最具体的指出日帝国主义的并吞满蒙与进攻苏联的联系，指出日帝国主义在满蒙的行动是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具体步骤，必须更明确的、更具体的、更积极的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七、指出日帝国主义并吞满洲的成功，是直接由于国际联盟与世界帝国主义尤其是英法帝国主义的帮助，使反日的斗争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并且暴露英美法等瓜分中国的一切具体行动；

八、指出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是直接得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拥护的，反日反帝的斗争决不能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分离开来。用最具体的事实告诉群众，国民党如何不但不把所有的军队拿去抗日，却去进攻唯一反日反帝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

九、在开展反日斗争的基础上，更积极的进行拥护苏区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

十、在反日斗争的开展中来准备“九一八”那天的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朱德、毛泽东关于消灭 乐安之敌的训令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

一、据守乐安城之敌系二十七师之一旅，共有两团兵力，城附近高地筑有工事。

二、我军有迅速消灭该敌，占领乐安城之目的。拟于明（十六）日向守城之敌攻击。

三、令林彪同志为攻城总指挥，聂荣臻同志为政委，所有第一军团、独立第五师、特务营及以后参加攻城军统归其指挥。

四、第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十六）日位置于南村附近。

五、第三军团十六日到达徐庄、荫水坪之线，十七日到达水口，十八日到达牌路港，监视宜黄、崇仁之敌，并策应我攻城军。

六、兵站医院在招携开设。

七、各军要择适当地点开设野战医院。

八、总经理部及各军后方统归范^[1]部长指挥，明（十六）日进至望仙附近候令。

九、总司令部明（十六）日在望仙。

右令

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范树德。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敌情和我军作战部署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中央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

中央局并转中央：

(一) 北向行动方针乃见前电。红一方面军已于十五日到达招携、东韶一带。

(二) 敌情：孙连仲部一师分驻宜黄、乐安，一师驻崇仁、抚州；朱绍良部毛^[1]师在南丰，李^[2]师在南城，许^[3]师在其中；吴奇伟师一旅在永丰，一旅在吉水、吉安，一旅在樟树、新干；陈诚部十一师在吉安，十四师回泰和。五十九师在峡江、安福，四十三师在遂川、泰和，二十八师在万安及赣河西岸，五十二师亦有回吉安讯。赣东北赵观涛部五师，西北谭道源部及湘军五师，赣南粤湘军八师，尚未见移动。

(三) 我军决以迅速坚决秘密的行动，先攻乐安、宜黄，消灭孙连仲大部，乘胜攻南丰、南城消灭朱部，开展赣东一面，求得巩固的向西迎击陈、吴等师增援部队，以更有利的取得赣江下游中心城市，造成夺取南昌的形势。

(四) 现部署已毕，战斗明晨开始，期以连续胜利达到目

的，并配合全国红军行动。

周毛朱王^{〔4〕}

十五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指毛炳文。
- 〔2〕指李云杰。
- 〔3〕指许克祥。
- 〔4〕指朱德、王稼祥。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苏区职工运动 给全体同志的信^{*}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为要巩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为要纠正苏区各级党部直到现在还继续着的忽视职工运动的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必须使全苏区党的同志百分之百为实现国际及党中央路线而斗争，必须“依据党内发展自我批评及下层群众的积极性上来进行”（中央五月电示）。因此深刻的揭露过去苏区党对忽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和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提醒苏区全党同志的集中来注意和正确的了解这一问题，这对于职工运动向正确路线的转变，是非常必要。尤其是当着中央为反对全总党团和中央职工部在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而发布了致全党同志信（三月）以后，苏区的党更要在中央这一指示之下，无情的彻底的揭发苏区职工运动中一刻也不能容留的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

党中央在“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决议”的开首第一句就以最清楚和尖锐的形式向全党提出：“只有彻底的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区域，争

* 本文原载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职工运动指南》。

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胜利前进”。共产国际更以最警惕的形式向中国党提出：虽然“中国的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党指教红军的战斗，指导苏维埃，而且在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里无条件的将有大多数，如果指出这一点便心满意足，以及甚至连一分钟减弱为巩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而作坚强的稳固的斗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员是极端危险的”（见《共产国际》杂志三十一期社论——《实话》三期）。

建立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健强的领导权，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现在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党员占着大多数，能够实现对农民思想上和国家组织上的领导……这固然是很重要很好的条件，但还是不够的。必须党在“苏维埃区域之中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群众”（共产国际为反立三路线致中共中央信），发展与领导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与政治的斗争，“应当用一切方法去开展和组织工人的创造性，把这种创造性用以建设还属薄弱一些的，但是已经不能克服的苏维埃，用以组织团结纪律化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农民群众、城市贫民的散漫的斗争”（《共产国际》杂志三十一期社论）。布尔什维克的深入的群众工作，努力组织群众的政治经济的斗争，建立真正铁的红军，建立强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这就是共产国际提向中国党的三位一体的最重要的任务。

但苏区党在对于职工运动的领导上，实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不再重复的指出，在党大会以前苏区党对职工运动是一贯的取消主义与执行非阶级路线——这些错误是曾经中央所明确指出的。苏区党大会虽然在一般的接受中央八月来信的指示下，与这对职工运动的露骨的取消主义作了斗争，他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起了进步的作用，但在职工运动问题仍包含许多严重的错误与缺点。

由于忽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错误，党大会对职工运动遂不能集中火力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相反的，党大会反供给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认为苏区的工会运动有他的特殊情形，这个特殊情形就是苏区没有工人或工人很少，“现在苏区还未包括有大的中心城市，还缺乏产业工人，农村工人群众主要的是雇农、手工业工人、苦力等”，“苏区不断的在敌人包围封锁和残酷的战争中，经济受着极大损害，最大多数手工业停歇，手工业工人随之而失业，雇农在土地革命后都已经分了田”（党大会工会运动决议案）。这样的说法，一方面正好以苏区没有工人的掩盖并辩护过去党对于职工运动领导的机会主义消极，另一方面反暗示着在苏区经济被封锁包围的环境中，领导工人经济斗争的困难以至于不可能。这种说法是和国际和中央的指示绝不相同的。为了要健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国际指出“苏维埃区域的无产阶级就是很少也必须组织到工会里来”（共产国际为反立三路线致中共中央信），在说明苏区发展经济斗争的重要上中央更清晰的提出“即使在苏维埃区域经济严重破坏之下，工会亦应该用种种方法来保障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减少工人的痛苦，提出许多方法，经过苏维埃把经济恐慌的重担加在富农资本家身上去”（中央关于苏区工会任务决议）。我们看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和党大会决议对于苏区职工运动观点是相同的吗？

党大会“未曾发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未曾集中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而将反对经济主义倾向、工会代替政权等等不很普遍的错误放到重要地位，掩盖了反对那不发动不领导工人群众斗争的中心错误”（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决议）。

党大会工会运动决议对于建立真正阶级工会组织，一方面

排斥了沿门卖工的于工会以外，一方面又认为“只有在资本家的工厂、老板的作坊工场中卖劳动力的换工钱的方算是工人”（全总执行局组织大纲亦是同样的语句）。虽然这样规定并未在执行中发生绝对的效果，苏维埃国有企业中工人还是加入工会，但很明显的，这样的决议不曾积极的提出建立苏维埃国家企业中职工会工作的任务，不曾排斥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阻抗，这也就助长了对于国家企业工会工作忽视和放弃的倾向之发展。

由于在中央去年十二月苏区工会任务决议指示之下，中央苏区职工运动在中央局领导之下，是有了相当进步。这无论在中央局对职工运动的注意上以及职工会对工人斗争的开始领导上，在工人生活的相当改善上，在职工会组织的阶级基础的健全上，在江西、福建、湘赣省职工会的成立上，以及职工会有计划的输送工人到红军中去的成绩，都足以证明这些进步。但根源于党大会整个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错误而产生的工会运动决议，是障碍着苏区职工运动的彻底转变。党大会后，中央局未曾揭发党大会对职工运动的错误观点，特别是未曾发展下层群众的积极性，一切工作未曾深入下层，因此，全苏区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与加强工会工作还是一般的忽视。首先要指出苏区各级党部对于领导职工运动的消极，是已经处于不能忍耐的境地。自省委以下的各级党部，简直未曾将职工运动放在他们的主要议程上。不但大多数的区委县委是如此，即江西和闽粤赣省委对于职工运动的领导亦是非常薄弱的，两省委的职工运动委员会未曾发生作用。江西党的省委在五月中，虽曾成立了接受中央局批评的决议，但缺乏对工会工作实际的加强，致下级党部对职工运动的消极仍然极少转变。福建省工联的党团最近开始成立，省委对工会领导和注意亦差，对党内

存在着反工人倾向的斗争尤极缺乏。团对于青工运动领导的情形亦是同样恶劣，团的江西省委几个月来讨论职工运动只有一次。自然在这样忽视工运的机会主义领导下，是不会引起下级党部、团部对职工运动的注意的。

我们的工厂或作坊支部，应该成为领导和组织工人斗争的堡垒。但我们党一方面不能大量的吸收积极工人入党，另一方面将支部生活和工人实际斗争隔离起来，没有经常讨论工人斗争问题，下级党部特别是区委和支部一般的是不过问工会工作。特别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就是将最普遍最危险的不发动群众斗争的右倾消极和所谓经济主义相提并论，而对于经济主义的认识又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了解所谓经济主义，主要的是离开政治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但苏区的党对于经济主义的认识，只是以为是工人经济斗争中要求过高的问题。固然在工人斗争的开始，过高要求是不免的，这种要求对于苏区经济和在某些情形下对工农联合是有妨害的作用的，但我们党必须清楚认识，只有发动工人的斗争，改善工人的生活才更能提高工人政治积极性，才更能吸引更多广大工人参加政治战斗。我们就各处的报告来看，所谓经济主义倒并不是普遍的情形，相反的，职工会里不领导群众斗争，以至于阻碍群众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却在发展着生长着，以致拿巩固工农联合来掩盖他对发动工人斗争的消极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各区各级党部的领导不能正确的了解经济主义离开政治斗争的右倾实质，却对于“要求过高”表示极端机会主义的害怕，这不但是江西省委修改江西工人斗争纲领，使低劣于劳动法的规定（女工哺乳期间半年休假等），而且在各处都发生同样性质的事实，湘赣省职工会对于全总执行局的报告认为“工人增加工资没有正确的执行，有些县份（赣南遂川等县）不按照当地生活程度

骤然增到原有工资十分之五”，照这样的说法如果有一学徒原有工资一元要求增加半元，亦一定为湘赣省工联同志所不能满意的。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不约而同的为职工运动机会主义者所接受而实际应用，全总执行局的李文棠同志在漳州的工作就以为工人原有工资十元要求增加六元为经济主义，“命令”减为要求增加一元，学徒原有工资三元亦只能增加一元；福建省委张思垣同志就以为工人“斗争”是错误的，工人增加工资就会腐化享乐（见闽粤赣省委机关报《红旗》），因此，就同意纸业店员的工资以十七元减至十四元，以为这样是纠正错误的经济主义。这种倾向更反映到全总执行局的负责同志，对于汀州工会工作的见解上，亦曾经表示动摇和不正确的意见，以为经济主义是工会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当然这种错误已经迅速的纠正，但这样“公平的”、“合理的”主张实际上只是拥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离开了自己的阶级立场。

必须再三记住共产国际对苏区赤色工会工作问题上的警惕语句：“假使在还未收归国有的本国企业中不发展罢工斗争简直是最大的危险，这在中国特别重要，武汉时期的经验证明当时党与赤色职工会简直阻碍经济斗争的发展”（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决议）。在我们努力执行国际和中央路线的现在，这种经验可以重复发生吗？因此，对于以反经济主义为借口而掩护右倾机会主义的企图，必须集中火力宣布无情的斗争。

这种阻碍经济斗争的企图更表现在将工人的经济斗争放在次要的或不重要的地位。六月二十三日江西青工代表会议是在少共省委领导之下举行的，他的决议充分表示机会主义的观点，在这决议上没有半句揭发过去领导青工斗争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一个字说到应该领导青工经济斗争，更没有说到领导

青工为实现劳动法而斗争，更没有说到青工文化和教育问题，只是很不清楚的在反帝工作之后附带的说：“要定出具体的斗争纲领来领导青工斗争”。一个青工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以这样一句话来号召并领导全省青工的经济战斗？他们不了解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还须最坚决的发展保护工人阶级日常经济利益的要求，工会决不能把这工作看为‘附属的’或‘次要的’任务”（赤色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运决议）。江西工联和江西少共省委对于这次青工大会的领导，是完全忽视全总执行局对江西工联的指示，陷入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且决议全文又极缺乏实际工作的规定。

苏区工人除城市工人以外，农村工人的生活还未有很好的改善。即在城市里虽然工人生活有相当的改善，但发动工作依然做得非常不充分，命令主义的倾向还很普遍的存在着，一切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及斗争纲领并非经过群众的详细讨论，多是由工会规定，特别党的支部失却核心作用。因此经济斗争不能成为汹涌的浪潮，劳动法执行的程度很小，因之工人群众的政治自觉和斗争的积极性也不能充分的猛烈的提高起来。

工人斗争纲领应该成为工人斗争行动的号召，工会应该动员工人为实现这些纲领而斗争。对于纲领和全部劳动法的内容，职工会要经常向群众宣传，而且要时时检查其实现的程度。现在江西和福建两省工人斗争纲领虽早已规定出来了，但因为宣传工作非常不够，以致在群众中的影响非常微弱，而使纲领在许多的地方成为纸上的东西，不能在实际斗争中起领导号召的实际作用。

工人的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虽有些地方订立，但在订立合同时非常缺乏群众斗争的拥护，所以有些资本家在订立合同后并不履行，而职工会并没有领导斗争要资本家立即履行的决心

(汀州)，另在有些地方（瑞金、永定等处）以及农村工人中则迄今未曾订立。

说到雇农工会情形更是恶劣。雇农是无产阶级中最接近农民的一个阶层，党要领导贫农中农为彻底消灭地主阶级，为反对富农、高利贷者及一切剥削者的斗争，那么领导并组织雇农的斗争是“最主要而不可推诿的任务”（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共在工运中的任务）。但我们苏区各级党部对于雇农工会及斗争问题，就加以根本忽视和放弃，“雇农分了田”、“没有斗争对象”的机会主义理论仍然普遍的存在着。最明显的例子，江西省委在接受中央局批评的决议，就没有一句说到雇农工会的问题，福建省委对雇农工会工作更是没有一点指示的。而“这个雇农联合会（雇农工会）应该是实现无产阶级在现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反帝国主义革命中的领导的重要工具之一”（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共工运决议案），但我们苏区各级的党部将这样武器随意抛弃了。在雇农工会的问题上，又更证明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忽视，雇农工会对土地国有的宣传既未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的前途亦未宣传。

党对于雇农工会运动既加以极端忽视，雇农工会的负责同志（福建）更虚诬腐朽的谰言胡说，如说雇农不肯加入雇农工会是因为贫农只加入贫农团，对于这些胡说我们再用不着加以指斥了。我们只指示一种不根据事实的错误估量，如认为农村中大多数消灭地主、反富农斗争是已经完成了的估计。事实上农村的地主残余是无时不想在政治上经济上复活，富农更常常积极的阴谋破坏革命，即就福建省雇农工会扩大会议的报告，长汀、水口、白沙、永定等处富农分得好田仍是一般普遍的现象。深入和发展消灭地主残余及反富农的斗争，必须是目前职工会的主要任务！

在土地革命深入和发展中，要保证党能领导主要的农民群众，反对破坏土地革命的富农以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那就必须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充分发展其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就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组织贫农于贫农团之内，而使雇农工会、贫农团成为苏维埃政府的柱石，团结中农在贫农团周围，使土地斗争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只有群众运动的向前扩大和深入，才能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雇农、贫农以及中农身上。但苏区各级党部对于这一问题是一般的忽视，不在土地革命中尽最大可能发展群众组织力量和斗争积极性，在新发展区域分配土地时亦没有充分的发动群众消灭地主，特别是反富农斗争还非常微弱。因此雇农工会成为架空的机关，贫农团是非常缺乏生气的，而苏维埃亦就不能成为有活力的强有力的政府，甚至于有些地方的政府更进一步的离开土地革命的实际，将地主的财产变卖而一点不分给雇农、贫农，甚至于将耕牛屠杀自己吃掉（安远县等）。由于忽视群众斗争的发动，所以江西省委就将工人斗争纲领修改，将雇农向地主、富农斗争的纲领变为向苏维埃政府请求的条文。

由于机会主义对工人利益的忽视，所以职工会为争取工人文化及物质的生活的提高的工作都一般的停滞了，失业问题在苏区有些地方（永吉太、永定、宁都等）仍成为主要的问题，职工会应该和苏维埃政府共同商定救济的办法，但职工会对于这一问题完全表示消极和无能。失业救济金在各城市已开始征收，而失业津贴则除汀州外迄今未曾支给，甚至发生市侩的见解，将此项保险费储蓄起来而不发给失业工人，反向上级工会提出“为什么要将这钱用掉呢？存起来不好吗？”的怪问题（瑞金）。在文化教育方面，职工会虽向资本家征收工资百分之一的教育费，但亦同失业保险费一样，只有收入并无支出，职

工会单独的设工人补习学校只有汀州一处。职工会对于工人宿舍房屋是一向放弃不注意的，因之如在汀州没收地主房屋的斗争中，职工会便未曾起着任何领导作用。在合作社运动方面，职工会未曾领导工人积极参加，在江西方面虽有相当的进步，但在某些合作社仍然带有行会主义垄断的性质（缝业）或含有投机剥削的意义（汀州的），且组织不合法的（常常合股商店冒为合作社）更是非常之多。

职工会在对于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方面做得非常不够。要使农村手工业工人从久远的行会主义思想习惯上解放出来，必须深入阶级的斗争，加紧阶级教育，以促进和加深阶级关系的分化。在过去为“反经济主义”所遮掩的右倾机会主义钝钝阶级矛盾的锋芒，因之，反行会主义的斗争亦无由开展。

在职工会组织方面，苏区党亦发生错误的领导。首先我们将农村中沿门卖工的手艺工人认为所谓“独立劳动者”，排斥出职工会外。沿门卖工的手艺工人为改善自己生活要求增加工资，是绝对需要的，固然过高的要求将损碍农民的利益。职工会的任务是要说服农民加以赞助，更重要的是要加紧领导沿门卖工的手艺工人积极参加革命战争。为完成此任务，组织沿门卖工的手艺工人于职工会之内更为必要。反对手艺工人增加工资和争取利益的立场是错误的，特别是党并未努力领导手艺工人为取消行会的“包头”的剥削、为废除手艺学徒封建剥削而斗争，而集中疑惧于增加工资，更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提拔积极工人干部，对于加强职工会工作有很大的作用。工会内负责干部必须是工人领袖分子，这就要从斗争中提拔积极工人分子参加工会工作，加紧对于这些分子的训练与教育，以加强职工运动的领导。但过去各级党部对于这一工作是非常忽视的。从全总执行局所揭发的工会负责同志贪污腐化的事实

来看，从张克明（零都）起以及蓝作兴（汀州木船）、江胜如（汀州纸业店员）、陈廷元（汀州工会委员长）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违反阶级的利益，事实证明他们参加工会负责工作，并不是从斗争中提拔出来。尤其是党未曾对于这些分子加以教育和监督，未曾在腐化倾向开始发展时就予以无情的斗争，特别未曾发动群众对于工会工作人员实行督促更是非常明显的。这样不负责任的提拔上来，又打击下去，这是提拔干部吗？相反的，而是以提拔工人干部为儿戏。

职工会组织方面还有许多弱点，直到现在产业系统的组织还不是处在主要的地位。固然在目前苏区交通阻滞而工人又不集中，地方性的组织还有很大的作用，但职工会仍应逐渐转变以产业系统为主要的组织形式。

职工会的民主化虽然口号提出很久了，而成绩非常微弱。“使工会有生气的基本条件，是他的群众性质和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赤色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运任务决议），这对于苏区工会是特别重要。苏区职工会缺乏生气的原因，就因为没有站在广泛的民主化的基础上，工会机关没有实行广泛的自我批评，没有经常召集群众会议做报告，没有将工会一切问题提向群众讨论，没有发展职工会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工会民主化的缺乏，使职工会不能成为真正群众自己的工会，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便不能发展，而且也就是障碍职工会路线转变的主要原因。

上面说的是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忽视保护工人阶级日常经济利益的工作的机会主义。这里表现党的领导是反映着农民落后的意识，以为工人分得田又免税还要加工钱，或是工人加工钱是出在农民身上等，来反对工人生活的改善，障碍着工人阶级斗争积极性和政治自觉性的发展。苏区职

工运动的机会主义者，不能了解如何“动员群众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把这些日常要求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总要求联系起来”（共产国际为反立三路线致中共中央信），不能像赤色职工国际所指出的“工会工作必须依照列宁主义的路线去进行”，这就是“只有工人经济地位已改善了的时候，群众才能卷入运动中去，积极参加它、重视它，并发挥其英勇、无畏、顽强性与忠诚到最高限度”（赤色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运任务决议）。

同时，我们对于职工会领导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也不能不加以严重注意。

我们看赤色职工国际对于中国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之最肯定最具体的指示：“在现阶段上，工会最主要的任务是为最坚定的执行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而斗争，以加强并扩大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为达此目的，工会必须积极参加苏维埃的建设，在群众工作中，在实现工人的监督生产中，在反对地主、资本家、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斗争中，鼓动群众拥护苏维埃，加强苏维埃和国家机关，但在这里工会决不能代替了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作用。”（同上决议）我们对于上列工作任务的实现到了什么程度？

首先要说，职工会不能引导工人参加苏维埃建设和红军，使职工会成为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柱石，使无产阶级成为铁的红军的脊骨，是目前职工会工作的主要危险。在过去往往将不甚普遍的个别下级工会与政权对立的倾向放在重要地位，而减轻对苏维埃政府的右倾消极的无情斗争，这是极端错误的。

党大会后，只在上级的苏维埃政府和少数的县市苏维埃政府提拔工人干部参加苏维埃的指导工作，虽然又往往以职工会委员长兼劳动部长模糊政权与群众团体的关系。但在下级政府，特别是区或乡的苏维埃政府，工人成分的稀少情形仍未有

改进，甚至如永丰龙岗区、兴国均村区，苏维埃代表会议竟没有一个工人的代表，这完全忽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的严重效果的实际证明。不仅如是，在整个职工会和政权联系方面，更表现不能允许的严重错误。

职工会对于苏维埃政权关系的松懈在种种方面都表现出来。在土地斗争中，在肃反斗争中，在选举运动中，在苏维埃建设事业中，由于过去党对工会工作的机会主义消极，使职工会都未曾显示出独特的作用，而这些工作如没有群众运动特别是职工会的领导是不会彻底完成的。亦说明因为这一原因，使苏维埃中央政府一切正确指令决议不能获得百分之百的效果的，而下级政府常常成为空洞的事务的机关。也就因为这一原因，工会、贫农团、苏维埃缺乏工作的连锁而成为缺乏生气的组织。

特别是苏区受敌人的包围封锁，地主、资本家、投机商人在失了政权以后的阴谋破坏，职工会要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必须努力加强苏维埃的经济战线，而苏区职工会对于这些问题都是忽视和无能。于是工人失业问题便无法解决（如宁都夏布工人、会昌矿工、福建木船工人），合作社亦不曾普遍建立，更不能站在争斗的意义上，像共产国际所指出，“企业之中的工人委员会应该在与资本家的怠工作斗争所必需范围之内实行监督生产”（国际东方部关于苏维埃经济政策草案）。虽然在三月间的江西工联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全总执行局指导下，对于这些问题都有相当的决定，但实际工作的成绩是非常微弱的。

在革命战争中，职工会亦未曾显示出独特的作用，缺乏组织的领导。在中央局提出在职工会内组织战争动员委员会之前，职工会本有工人武装委员会的名义，但没有实际进行组织

和工作。工人参加红军虽有相当的人数，但非常不够，特别是在城市中如汀州等处工人参加红军的积极性仍未曾充分发展起来。对于赤卫队、少先队工作，工会仅在最近才开始注意。党在组织地方武装不能着重于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如对汀州工人赤卫队，汀州党的注意是非常不充分的，也就证明这事实。

职工会对于国家企业工人的组织工作是非常薄弱。兵工厂工人工作没有很好的整理，邮务工人的工会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在印刷局中虽曾组织义务劳动并提高生产量，但因为未曾领导工人求技术上的进步，并发展工人生产的最大积极性，所以成绩亦就微少，只是石印部门最近印刷革命战争公债票的发动却收了很大的成效。职工会对于组织国家企业的工会所遇到的官僚主义的抵抗（兵工厂）未曾予以坚决的斗争，这就因为未曾把这一任务看作非常迫切的任务。

职工会对白区工作一向是忽视的。全总执行局白区工作训练班的计划也没有以求实现，只是表现一种等待主义的消极。这对于发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上是不能继续容许的现象。同时过去对白区工人斗争的宣传与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一般的表现非常不够，这也是应当纠正的。

职工会对于青工、女工工作亦是同样的忽视。在苏区，青工的数量占工人全体数量的半数，在政治与经济斗争中，青工的积极性表现格外明显。但因为各级团部对青工运动领导的消极，各级职工会的青工部和青工委员会不能起强健领导斗争的作用。对于女工运动更继续着取消主义的倾向。在苏区缺少工人或没有工人的理论基础上，女工更少或绝无女工的推论是非常自然的，虽然汀州（纺织）、瑞金（缝衣）、兴国（刨烟）等处女工有相当的工作，但在一般说来，女工工作是被忽视

的，男女工资不平等的现象，仍有个别的发生。

职工会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亦是非常薄弱。无产阶级应该成为土地革命、反帝运动、互济运动、拥护红军运动的领导者，团聚农民及劳苦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成为农民和劳苦群众斗争的组织者。现在贫农团、反帝大同盟、互济会、拥护苏联大同盟、拥护红军委员会及劳动妇女代表会议，都还未成为广泛的群众的斗争的组织，这是同样的因为苏区党对群众工作还没有执行彻底转变的缘故，而党未曾领导职工会在这些群众团体中起领导作用，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有许多地方职工会对于反帝大同盟以包办代替领导，这也是不正确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在苏区里，我们对城市贫民缺乏领导是非常显著的弱点，对于这一弱点的克服，也只有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才可能。赤色职工国际指示职工会“要造成直接执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与广大劳苦群众之间的联系”（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运任务决议），这一指示是应该全党同志加以深刻的注意。

除了职工会工作以外，我们更要批评党对于苏维埃关于劳动问题的领导。显然的，劳动法没有在广大群众中作广大深入的宣传，现在各级苏维埃劳动部的工作还未很好建立，劳动检查员的工作亦未普遍开始，对于怠工的资本家、失业救济、工人房屋等问题，苏维埃政府亦未曾在群众斗争发动的时候，加以必要的行政方法的协助。而且在苏维埃里还发生有害的倾向，如反工人的倾向（胜利县禁止工人组织合作社），对于劳动法表示反对的意见（江西省苏大会的某些代表）以及将劳动部的工作当做仲裁机关，而这种仲裁并不是站在工农政权的立场上（福建省苏劳动部负责同志曾有此种倾向）。党对于苏维埃的领导还不能集中力量反对此种官僚主义的见解。

我们就上述的事实来看，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的错误是何等严重的问题！全总执行局党团在中央局领导之下，虽对于这些错误有相当的纠正，但因为对于错误的揭发还不充分，特别是由下而上的发展职工会两条战线的斗争更是薄弱，以及全部工作的推动还是非常软弱、松懈和迟缓，中央提出的新的领导方式还不能为执行局党团所全部应用。更由于中央局过去对党大会的错误未曾揭发，对于职工运动未曾给以应有的注意，下级党部的机会主义遂未能及时的迅速纠正过来，因此，障碍党在职工运动中任务的进行，障碍着向中央和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

中央局认为要使职工运动真实的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党同志一致动员来纠正不能容忍的消极和忽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与违反阶级利益的观点，排斥农民落后意识，每个同志都应坚决地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而奋斗。

党和职工会应该集中注意与广泛的发展与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引导工人参加苏维埃与红军的建设，大量的输送工人到红军中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在土地斗争反帝斗争中，特别是日益发展的革命战争中，进行白区与罢工工作中，职工会要成为群众的组织和领导者，使职工会成为苏维埃的柱石。为完成此一任务，必须每一个同志为工人斗争的领导者，每一支部成为党在群众中间的堡垒。每一级党部要将职工运动放在主要的日程上，首先反对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的忽视和消极。

在目前胜利的进攻的环境下，为争取与完成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必须强健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布尔塞维克的顽强和坚定性加强苏维埃区域的职工运动实为迫不容缓的任务。中央局相信，全苏区党的同志必能团结在国际和中央路线之下，克服

机会主义的消极，发展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群众工作，领导工人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以争取赣鄂湘革命首先胜利以至于全国范围的胜利。要认识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准备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胜利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

中 央 局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周恩来关于乐安宜黄战役后的 军事部署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信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央局：

自北上后，凡重要事均已电告，兹略述其未及各事如下：

一、此次北上的作战方案，已交弼时^[1]同志带去，后在行军过程中又拟有更具体的方案，大致已电告中局，即是首先消灭敌二十七师，取得乐、宜，乘胜东击毛、许、李^[2]，取得南丰、南城，然后西向迎击陈、罗^[3]、吴主力，在有利条件下，可先取抚州，然后过河。这一方案是在敌情未变动前定的。当我们攻下乐安，敌情无大变化，我们乘胜迅速攻下宜黄，这是依照既定方案坚决执行的效果。等乐、宜相继攻下，直接震动了抚州、南昌、樟树，敌情已起大变化，且毛、许两师已仓猝放弃南丰，我们仍固执原定的计划去攻南城，便犯了不机动的错误。本来过去军事行动向无方案的，所谓长于机动而不果决，这次我们力矫此弊，本着方案去做，实现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收获伟大成功，这完全是正确的。这一成功，完全以迅速、坚决、秘密地执行进攻策略达到的，方面军由兴国、于都两点出发，行军八日，只休息一天，到招携。一军团配合六十五师连夜行军六十里去攻乐安，十六日围攻，十七日攻下，将高树勋二十七师之两团一营全数俘获，自旅长直至伙伙

无一逃去，唯旅、团长遍查不出，恐躲藏人民间或山沟内被逃逸掉。俘虏兵三千多，一军团补入四百，伤病兵六百多，余下两千多编成补充师，准备到五军团。这一战役只一军团及六十五师参加，五军团未使用，三军团因由于都出发未及赶上。十七日攻下乐安，十八日即调三军团由黄陂、河口之线攻宜黄，一军团（只留十师在乐安休息两天）随即由凤冈、官仓前之线前进，五军团为预备队，一、三军团沿途驱逐了宜黄的警戒部队，一军团在凤冈并与崇仁援乐安之骑兵师一团遭遇，当即将其击溃。三军团乘胜逼近宜黄城下，十九日夜即开始进攻，二十日一军团由西路赶到会攻。二十日夜爬城，一军团首先攻入，三军团继入，高树勋率败兵溃逃，城内外俘获数百，枪数相等。三军乘胜直追，直达龙骨渡（向抚州大道），俘虏一千六七百，缴获枪支相等，城内并缴获辎重无数。高树勋师只五团，乐、宜两仗，共消灭其五千多人，缴获四千多枪，残部只千余人，窜退抚州。

由于这两次胜利，尤其是宜黄之占领，敌已大震动。正确地估量当前敌情，应在宜黄不停留地改向抚州前进（自然从兴、于至宜黄行军作战十四日，相当疲劳是有的）。即使抚州因南昌与贵溪第五师增援之速及城内外工事之坚不易急切攻下，但首先迅速增援的必为南丰、南城方面之毛、许、李三师及贵溪之第五师。我们能以迅速行动，乘胜以两天行程由宜黄迫抚州，以两天之力攻下，则占领抚州后迎击敌之增援部队，声势更大。赣江下游敌人全数或最大部以及武汉敌军大部必将群趋南昌、樟树，否则抚州纵两三日攻不下。我们在运动中先打击毛、许、李三师或周浑元第五师，然后再迎击陈、罗、吴等师亦较有利。唯当宜黄攻下时，因我们已获得何应钦连令毛、许、李抽调兵力来援宜黄，敌情纵有变化，我们料其已在

途中（谁知毛、李并未执行命令），故竟未采取直攻抚州之上策，而仍准备休息一日即东向先攻南丰、南城之毛、许、李三师。孰知二十二日先得谍报知毛、许两师并未来援宜黄，且退南城。继则十二军确报，敌得二十一日早红军占领宜黄讯，星夜向南城退去，十二军及六十四师二十三日早即占南丰，缴获米面、汽油无数，并即跟踪追蹶。至是曾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仍向抚州前进，但已迟二日，周浑元师已抵东乡（两日行程可到抚州），何应钦令陈、罗、吴等三师于二十二日集中戴坊（在乐安、永丰之间），南城毛、许、李三师已经集中（毛、许两师于二十一日夜以一夜半日行程二十二日上午即到达南城附近，一百二十里是汽车路易行，两日行程可到抚州，一天是无把握的），是不利的，故这一意见未被采取。另一种是直取崇仁（当时只一骑兵师，实只四团，守崇仁），离南城、东乡既较远，西边敌人还未集中完毕，我可先攻下崇仁，然后迎击敌之增援部队，给以各个击破。这一计划（剑英^[4]提出的）原是根据敌情变动而提出的，我们因为坚守原定计划，且企图先消灭朱绍良一路，故未被采用，这确是不善机动的错误。

我们在攻南城的途中，继续得到谍报，始知敌人确估计我们下宜黄后将攻抚州，故毛、许两师仓猝放弃两年来固守之南丰，迅速集中南城，吴奇伟、周至柔两师迅速改向樟树方向集中，五十二师、十一师跟进，周浑元由贵溪以最快速度经东乡至抚州（今日更知胡宗南第一师都由武汉被调动来南昌、樟树，并有向抚州说）。我军除二十二日在宜黄休息一日外，以两日行程赶到南城附近。即至，侦察敌情、地形始知敌人集结十七团兵力坚守城内外工事，城北小高山有碉楼四，有土围一，城西有土山环城，亦有坚固工事，敌人并在增筑。土山前为开阔地，城南亦为开阔地，而城墙则凭高地建筑，城东则傍

抚州河，且有一泌河，渡河石桥在敌人手。我军阵地西北高山（山多绝壁），山前则须经过开阔地，始能达敌之据点，城南亦须经开阔地。而敌人守城工事则更坚，河东则在敌人，一切接济均便利。我逼近城旁一天，敌人并未出击，显然敌人须等我攻城疲劳后出击或增援部队到后夹击。因我兵力集结城外，在准备敌人出击时，敌立即出击；则颇不利于敌，故当时形势将成相持之局。坑道作业因敌人城外有工事，亦难进行，旷日持久，于我极不利。故决定不攻南城，暂将方面军撤至南城至南丰至宜黄两线，工作几天，不过早显露我军企图。准备东进敌人（陈、吴等师）进至相当地点，即给以迎头痛击。现已侦得陈诚率十四师、九十师于今日（二十八日）逼近乐安，五十二师或十一师跟进，周浑元第五师已到崇仁、抚州两点，第一师胡宗南部已到南昌，有开抚州、樟树讯。因此，决定后日全方面军开动西向迎击敌人，这是继续作战的计划。

周恩来

八月二十八日夜于里塔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即任弼时。
- 〔2〕指毛炳文、许克祥、李云杰。
- 〔3〕指陈诚、罗卓英。
- 〔4〕即叶剑英。

朱德、毛泽东关于打击 陈诚部队的训令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综合各方情报：敌陈诚指挥十四、九十及五十二师之一旅（或十一师全部）向乐安前进，其前锋十四师、九十师于昨（二十八）日均距乐城约一日行程。刘绍先师二十八日到八都，周浑元第五师抵抚州、崇仁两点。另据我一军团在南城附近捉获新自抚州来的敌人司书供称：敌第一师胡宗南师由豫调赣，已抵南昌，有开往抚州说。现在抚州驻军仍有孙连仲残部，南城之敌仍为李、毛、许^{〔1〕}三师困守着。

判断敌军对我作战企图，因我东攻南城及在南城附近工作，故首先要恢复已失的据点乐安、宜黄，以抑制我军北上企图，跟着集合各方兵力与我主力作战，因此陈诚部有即日进袭与占领乐安的可能。敌得乐安后，将采取预期与我主力在宜黄境内决战的姿势，配合崇仁周师甚至胡师及南城李、毛、许三师实行分进合击（此时力量对比是二十个师与三十六个团甚至四十二个团之比）。假使我军放弃乐安、宜黄而集中主力于南丰方面，无疑的该敌要继续向南丰前进，达到与我主力决战目的。

二、我军为要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赣东苏区巩固地向前发展，决心首先打击敌之一翼，即远道东来的敌军陈诚部，乘胜掩击崇仁会合之敌，再行相机进取，以求得革命战争的继续

胜利。

这次作战的开端，在宜黄城附近，而决战方面预期在凤冈圩、源头一带，但有可能的以一部引诱敌之主力于宜黄方面，我军集结主力由黄陂山道袭击乐安之敌陈诚的后尾。

三、根据上述目的，我方面军应于八月三十日起，开始集中到适当位置，须于三天之内（九月一日）全部集中完毕。其集中计划如下：

部 队	经过路线	集中地点
第一军团	一、由新丰街、上游、子规、永兴桥、二都之线。 二、由里塔、永兴桥、二都之线前进集中。	二都、杏坊一带
第三军团	由宜黄城过桥至鹿塘。	鹿塘、宜黄城一带
第五军团	由神冈、党口、五都、河口之线前进。	河口及其附近地区
总司令部	经永兴桥、二都之线前进。	杏坊附近之南候
附记：一军团在二都，五军团在河口。渡河地点要预先派人选择，并尽可能架设桥梁。		

四、在集中期间各部应执行任务如左：

（一）第三军团驻宜黄城部队，应派队到通抚州方向之龙骨渡及通崇仁方向之官仓前以北地区游击。

（二）第十二军应跟着三军渡河，其任务是在监视南城李、毛、许三师行动，因此该军兵力配备要能对南城通南丰道路（新丰街、里塔圩大道）、南城通宜黄道路（一由茅排、潭坊通

宜黄，一由李三陂、君山通宜黄）给予严密的监视，因此十二军军部及直属队并三十六师之一团，应位置于李三陂向麻源及茅排、里溪两方游击，以牵制南城之敌，三十六师（缺一团）位置于罗家坊（上游通李三陂道上）负责向株良、新丰街方向游击，以妨碍南城敌军向南丰的活动。

（三）第六十四师（缺一团）即日开到凤冈圩，主力向乐安迫进，努力刺探乐安方向敌情，以一部向崇仁方向游击，监视崇仁之敌。

该师留驻南丰之团，暂归十二军政治部谭^[2]主任指挥，应立即渡过南丰河西岸位置于里塔、新丰街之线，监视南城之敌。

（四）第六十五师须在乐安方面，监视陈诚部队的行动，如该敌占领乐安时，应在乐安南部以游击牵制该敌行动，如敌由乐安向宜黄前进，应袭击与扰乱敌人后方。

五、关于各军团行进道路之侦察及桥梁的架设，要有计划的进行，以克服行军中的困难。

六、沿途要派专人负责收容落伍的，重病号可送黄陂兵站医院休养。

七、各军团到达集中地区后，应立即建设电话，以利联络。分段担任如次：

一军团担任鹿塘、杏坊线。

三军团担任宜黄、鹿塘线。

五军团担任河口、杏坊线。

八、总部三十日到永兴桥宿营。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毛泽东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指李云杰、毛炳文、许克祥。
〔2〕指谭政。

中共中央紧急通知

——关于日帝国主义的新进攻

(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

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的侵略是在剧烈的疯狂般的进行。大炮与飞机猛烈地轰炸着热河、榆关，大量的兵力集中于平津，举行了各种各色的示威与挑衅。在上海，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准备着再次的血洗。情况是极端的紧张与危急，中国与千百万劳苦群众正处在紧急关头。同时与这相关联着的是反苏联战争危险性的空前未见的尖锐。

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最无耻的执行其清道夫的作用，残酷地镇压群众的反帝运动，用所有一切力量去进攻苏区与红军；同时正因为它们在第四次“围剿”中受了残酷的失败，国民党更加露骨与无耻的出卖中国，蒋介石、汪精卫直至汤玉麟、周大文、吴铁城都匍匐于日本帝国主义面前，允许更残酷与血的镇压一切革命运动，来替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清除道路。

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清晰明白的估计情况的严重性，最迅速敏捷的动员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以无产阶级的抵抗与回答。最小的轻视目前情况的严重性，与执行积极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口号的动摇，应该看做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是不抵抗主义在我们队伍中的影响。中心的口号应该

依旧的是：“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对于上海、天津、北平、唐山的党的组织提出“总同盟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是适时的战斗的口号。中央号召全党同志用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与敏捷来执行下面的工作：

（一）在工厂中、厂门口、工房中与失业工人中进行各种各色的群众会议、露天大会与飞行集会，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新的进攻与国民党新的投降的情况，号召工人群众准备总同盟罢工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广大的组织工人纠察队、自卫队与义勇军。

（二）上海的党应该集中一切力量去组织在日本资本家关厂威胁面前的日本纱厂工人的同盟罢工，提出“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同盟罢工回答日本资本家关厂的阴谋”的口号。应该特别集中力量，去组织在一二八事变中英勇斗争的沪西日本纱厂工人。应该详细的告诉工人群众：日本资本家的关厂的宣言是日本帝国主义总进攻中的不可分离一部分，组织每一个工厂中的反对关厂委员会——它应该是最广大的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组织。这个反对关厂委员会应该有它的区与全上海的代表会，来做战斗的领导反对关厂与总罢工的组织。赤色工会必须最积极参与与领导这个委员会，并且加紧与加速在准备中的纱厂工人代表会来成立上海纱厂总工会。

（三）组织工人自卫队、纠察队、义勇军等群众的武装组织，是有十分严重的意义。必须提出“组织工人自卫队来回答日本帝国主义海陆军的挑衅”，这种组织应该是广·大·的·群·众·的武装组织，它应该把一切武器（从石子、小刀、棍子到手枪、

步枪等)武装起来,它应该积极参加一切群众运动,首先是抵制日货与保卫工房。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他们必须进行对日本军队的袭击,与近郊农民及革命士兵联合起来,开始反日的游击战争。对于现有这些组织,必须考查每一队的具体工作与生活,将他们积极化起来。

(四)一切反帝及反日的组织必须集中与巩固起来,用各种名义依持着群众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公开存在,吸收最大的工人、兵士、农民及学生群众参加,成为群众的反日代表会议的组织。应该将它成为群众的革命争斗的领导组织。

(五)一切党、团、工会的组织应该十倍的努力去进行在士兵、巡捕与巡警中的工作。号召士兵同民众联合起来,号召他们参加反日代表会。组织在士兵中的革命委员会,来反抗反革命的长官,与日帝国主义的进攻作坚决的抵抗。

(六)在上海、北平、天津、唐山的近郊农民中的工作应该看做十分重要的工作,动员工人群众及武装组织到农村中去工作,开展农民的争斗,发动反日的游击战争。

(七)外国海陆军特别是日本军队中的工作应该加倍努力的进行,争取他们与中国的工人及劳苦群众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八)最大限度的开展拥护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的运动,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英勇的工农红军正在打破敌人的包围,走向与帝国主义武力的直接作战。最广大的散布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的通电与告诉群众,只有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是唯一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号召他们与苏维埃及工农红军联合起来!

立即以布尔塞维克的革命工作来实现党的正确的决定,这将保证我们能够站在千百万的劳苦群众面前,领导他们

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获得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征收党员的九一八号召

(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

全上海的同志们!

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正是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疯狂般的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一年，正是国民党统治最无耻的出卖中国的一年，同时这一年正是中国苏维埃及工农红军得着空前的伟大胜利的一年，正是中国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积极的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苏维埃政权胜利的一年。因为党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因为几十万中国共产党党员英勇的不惧困难、不怕牺牲的争斗与工作，我党在这一年大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的威信，党的政治影响是百倍的增加了，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团集在党的口号周围进行坚决的革命争斗，成千成万无产阶级的领袖与先进分子是在敲着党的门！这在无产阶级中心的上海是更加清楚明白的表现着！我们的任务是在组织上来巩固我们开展着的政治影响，吸收成千成万的先进的革命工人到党的队伍中来，将最广大的工人、失业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组织到工会、失业委员会与一切革命的组织中去，不应该让一个积极的革命工人站在共产党的队伍之外！中共中央号召每一个革命的工人、失业工人、士兵与劳动者，加入共产党来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帝国

主义走狗国民党！争取苏维埃中国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社会民族的彻底解决！中共中央号召上海全党同志在革命的实际工作中实现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号召！

上海的无产阶级正在紧急严重的时机中纪念日本占据满洲的周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疯狂般准备进攻热河、平津与二次血洗上海，正在预备以关闭日本纱厂来对付革命的工人，进攻中国。国民党政府无耻更加出卖中国与上海！一切中外资本家正在以最惨无人道的进攻工人的生活水平，求得经济危机的出路，几十万的失业工人正在饥饿流浪！同志们！目前的时机更要求我们以布尔塞维克的奋勇的工作来准备、组织、领导一切工人，失业工人与劳苦群众的革命争斗，反抗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资本进攻，争取劳动条件的改善，争取失业津贴，特别是要求我们在开展日常争斗的基础上来准备日本纱厂的总罢工与总同盟罢工！完成中央的九一八号召，绝对不能把征收党员与实现党面前的总任务分离开来，绝对不能同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争斗分离开来，我们征收党员应该在争斗的准备与进行中而且为着争斗。

中央号召全上海的党的组织与每一个同志，紧急地动员起来，实现中央的九一八号召，征收新的几千的工人入党纪念“九一八”。

为着实现九一八号召，中央号召全上海的组织与每一个同志，将中央号召的意义，经过一切大小的会议，经过党报、工报、小报与壁报，传达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工房、每一处失业工人聚集的地方、每一个革命的工人，这是这个工作成功的先决条件，每一个党的报纸与壁报应该动员起来为着这个任务而争斗。每一个同志至少介绍一人入党，应该不放松一切公开和半公开可能的利用。省委和区委必须经常的监督与检查帮助

每个支部实行这项工作，供给一切必需的材料与解释，革命竞赛的一切方法必须最广大的采用。中央决定于十月初总结这个号召所达到的成绩。中央坚信：上海的组织——我党最好的组织之一，必然能够在省委的坚强的领导之下完成这个号召。

中央号召，上海的党在发展组织中坚决的为着下面的口号而斗争：

变上海的党为强大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党！

反对关门主义，欢迎上海无产阶级入党的潮流！

我们的组织到市政和重工业的工人中去！

征收几千几百女党员！

不许一个纱厂没有我们的组织！

愈是黄色工会和一切反动派别活动的地方，愈是应有我们的强固的堡垒！

不许失去一个新同志！每个新同志都应成为党的最积极的战斗员！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

一、全中国经济的浩劫，农村经济空前的破坏，普遍全中国的水旱灾荒，再加以国民党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重重剥削，帝国主义的侵掠与搜括，使全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不但失去了他们的耕牛耕具，而且失去了他们所有的财产，以至他们所依靠生存的土地。在目前状况之下，全中国大多数的农民都陷进了破产失业、流离失所与饥饿死亡的地狱中。

全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现在已经走到了不能照旧生活的状态。只有革命的斗争，才能给他们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同时在苏维埃区域内数千万农民群众在推翻国民党统治、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平均分得了土地，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的事实，给与了全中国农民群众以最大的兴奋，指示出了他们求得解放的方法与解放的大道。大城市中间广大的群众的反帝斗争与工人阶级的罢工浪潮，更给了乡村农民运动以有力的推动与坚决性。

二、目前的农民运动，虽是在各省还是不平衡的，但是这一运动是泛滥于全中国的。就是号称富庶的江浙两省，抢米、分粮、吃大户等的斗争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参加斗争的群

众是日益增加。大批的农妇与青农都积极的参加了斗争（在江浙两省许多抢米分粮的斗争都以妇女青年为主）。一个斗争中参加的群众往往达到数千以至数万（如福建长乐，安徽宿县、灵璧等县，陕西三原、富平，河北赞皇、容县，河南孟津、正阳、信阳，山西夏县等等）。斗争表现得特别剧烈与尖锐，而且带有极其浓厚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政治性质。如像福建长乐的农民几次同国民党军警冲突，解除他们的武装，一直到占领长乐县城。每一次广大的群众斗争立刻变为同地主豪绅的团防与国民党军警的直接武装冲突。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反帝斗争的阵线。在满洲广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东北义勇军（尤其是王德林与宫长海的部队中），同日帝国主义进行着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帝斗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开始汇合了起来。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游击战争，到处都在爆发着（满洲各地，江苏盱眙、通海，山东青州，安徽宿州、灵璧，福建漳浦，陕西三原、富平，河北蠡县、高阳等），这些斗争的发展正在走向新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创造（如陕甘边）。

斗争的中心要求显然是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虽在许多斗争的开始是抗捐抗税、抢粮分粮与吃大户。在民族革命战争特别发展的满洲，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在从反帝斗争走向土地革命。斗争的组织性是特别加强了，每一斗争的开始，农民就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斗争组织（如河北赞皇的农民联合会，江苏各地的麻雀会，陕西的穷人会、齐心会等），比较有组织的进行抢粮分粮与抗捐抗税的斗争。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加强了。这一方面表示在大批城市失业工人回到农村中领导斗争，乡村中雇农苦力的积极化，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党的领导作用的增强与党的政治影响与权威的扩大。

蓬勃发展着的中国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危机的有机的一

部分，它正在同城市的工人运动、士兵斗争等汇合起来，走向新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创造。

三、农民运动的普遍的发展，给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极有力的打击。在许多地方农民运动与士兵运动的配合，已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根本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走向新的苏维埃区域的创造（如陕甘边区，江苏盱眙等）。不断的广大的农民的群众斗争，不但根本动摇国民党在乡村中的统治，减少它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收入，而且对于它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四次“围剿”的后方也是绝大的威胁。在这一形势之下，国民党必然要用一切力量来镇压与缓和农民斗争。

国民党对于农民运动的白色恐怖的压迫，现在是特别的加紧了。它经常的举行清乡，把大批的军警散布在主要的乡村中间。它利用调查户口、连环保、良民证等方法，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它用极大力量鼓励地主富农组织联庄会、民团等反动的武装，来镇压一切农民的革命运动。轰炸、血洗与屠杀，是国民党地主豪绅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最平常的手段。

在另一方面，国民党还利用一些改良欺骗的办法来缓和农民的斗争。它设立什么赈灾救济委员会、收容所、施粥厂、借米委员会、借粮委员会等来“救济”难民灾民，而同时国民党的官僚军阀利用这些名义，进行他们对民众的搜括与剥削。他们利用以工代赈的名义，要民众给他们建筑公路与碉楼，挖掘战壕，无代价的无限制的剥削农民的劳动。甚至国民党内政部最近又提出“保障佃农租田办法”，谈到过去说过无止千万遍的“二五减租”（见七月二十一日上海晨报），蒋介石在汉口也一再提到改良农民生活，免除“匪区”（即苏区）捐税等问题。在许多地方他们利用“一致对外”的口号，来阻止土地革命的发展（这尤其是在满洲等抗日战争发展的区域）。

四、虽是国民党尽量利用一切方法欺骗民众，然而这种欺骗的效果，却是非常微小。因为国民党要维持它的统治，要进行它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它不但不能减少对于农民群众的剥削，而且只有加紧这种剥削。旧的捐税声明取消了，新的更重的捐税又来了。每一次新的花样，对于农民群众只是一种新的负担。在这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当然不能不借重于在野的一些反革命派别的助力。

这些反革命派别（特别明显的如北京的“独立评论”派、第三党的“新创造”派、“民众导报”派以及过去《申报》主笔陈彬和等）欺骗农民群众的方法是更为巧妙的。他们认为要消灭“共匪”，必须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必须在政治经济上想办法，这些办法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的解决，甚至他们中有人提出“土地农有”或“土地公有”的主张。他们更主张保持“匪区”内土地的现状，即暂时保持农民在苏维埃政权下所分得的土地。这些反革命派别为了要“绝匪”，为了要保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不利用这类武断宣传来欺骗农民群众，缓和农民群众的斗争，争取农民群众到他们的领导之下。

此外，反革命分子更在土匪以及各种各样农民的原始组织中积极活动，团结农民群众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他们在这些组织中，利用农民对于统治阶级的某种不满与切身要求，来实现他们在农民群众中的反革命作用。小地主与富农的分子则更常常在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中出卖斗争，使斗争走上和平合法的道路，使斗争完全失败。

五、在中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一切反革命派别用一切方法来镇压与缓和这一运动的状况之下，只有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唯一领导者。在以工农的武装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民众政权的苏维埃区域内，几千万劳苦

的农民群众已经分得了土地，取消了一切军阀官僚的苛捐杂税，改善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存在告诉全中国的民众，只有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道路，是农民群众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苏维埃与红军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影响是扩大了，许多农民的斗争找求着我们党的领导，或是已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

中国共产党自从四中全会之后，在领导农民斗争中虽是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成绩，但这主要的还是在苏维埃区域内。对于非苏区农民运动的领导虽是有着个别的成绩，如像江苏党领导了盱眙、皖北的一些抢粮分粮抗捐的农民斗争，陕西党领导了渭北、三原、富平、蒲城等抗捐的分粮的斗争，河北党领导了赞皇农民包围县政府的斗争，山西党发动了夏县农民抗捐的斗争，福建党领导了闽南的一些农民抗捐税的斗争，满洲党领导了磐石韩国农民反日反“国民府”的斗争等等。而且也有些区域如像在满洲、江苏、福建、陕西等处，已经开始了游击战争，以至新苏区的创造。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党是远远的落在农民运动的后面。大多数的非苏区的农民斗争都是自发的，没有得到我们党的领导。在许多地方，我们党还站在农民斗争的外面。正因为这些斗争得不到我们党的领导，所以给了反革命组织如土匪与红枪会等以扩大影响的机会，使反革命得以在有些地方以欺骗宣传来缓和农民的斗争。

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运动的领导，对于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带有决定的意义。领导千千万万农民的日常斗争，领导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大规模的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使这些斗争转变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使这一广大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士兵运动等汇合起来，成为一个巨大的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

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潮流，应该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六、要使千百万的农民群众环绕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周围，把他们的斗争走向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引导他们到推翻地主豪绅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上，我们的党首先就应该领导他们一切的日常斗争，从抗捐抗税一直到分粮抢粮。只有当我们使农民群众在实际斗争中相信我们是他们的日常利益的拥护者，他们才会走上我们所指示的最后解放的道路。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各地党部必须立刻动员起来到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去，领导他们的一切斗争。我们应该依据农民的要求，提出简单明显的斗争纲领，在目前更应该提出秋收斗争与冬荒斗争的纲领，最广泛的宣传这些纲领，来发动与组织农民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特别开展的区域（如满洲、热河），党的任务不是在空喊组织真正的红军或创造几个地方的苏维埃政权，而是真正的到广大的农民士兵群众的义勇军中去，领导与组织他们的反日战争，并且领导他们去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粮食，共同分配，解除地主豪绅的武装武装自己，以武装的力量推翻地主豪绅的统治，分配他们的土地，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有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有机的联系起来时，战争才能得到胜利。

必须拿我们的斗争纲领来团结广大的农民群众，来争取在反革命派别领导之下的农民群众。对于土匪、红枪会、黑枪会、大刀会等的下层群众，必须坚决的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应该派我们的干部打入这些反动组织中去，根据一切具体的事实，揭破他们的头脑们的欺骗与对于他们的压迫与剥削，

来争取他们到我们的领导之下。应该绝对反对同土匪头子、红枪会领袖等进行上层的联合，坚决反对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土匪路线。

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造谣欺骗，揭破他们所散布的武断宣传。尤其应该着重打击第三党等“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纲，指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之下，希望国民党来实现耕者有其田，实际上不过是欺骗民众缓和民众斗争的把戏。指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之下，只有全国经济恐慌的加深，农村经济更大的破产，新的水旱灾荒与千千万万民众的饥饿死亡。

对于以农民为基本群众灾民难民的工作，党应该根据他们的特殊情形提出他们的要求。党必须领导他们向商会、赈灾机关、国民党政府提出紧急救济的纲领，要求立刻发冬衣、发粮食、发救济费，并腾出公共场所给灾民难民居住。党更应该主张没收粮食堆栈，日货分配给灾民难民，充公卖国贼张学良、蒋介石等一切军阀官僚的财产来救济灾民难民，把国民党一切内外债基金、海关的全部收入以及“围剿”苏区与红军的全部军费拿来救济灾民难民。党应该在这些口号之下动员灾民难民群众进行抢粮分粮、吃大户、占领公共房屋，反对以工代赈的斗争，使这些斗争变为直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拥护苏区与红军的斗争。

七、但是估计到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一开始常常是同国民党民团军警的直接武装冲突，党在这些斗争的领导中必须特别注意农民的武装，在斗争一开始就应该号召农民用各种各样的武器（梭标、刀矛等均可）自动武装起来，必须在斗争中坚决的解除民团军警的武装武装自己，这样来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应该坚决反对那些空喊游击战争与武装暴动，而不领

导农民日常斗争的“左”的立三主义者。但是党应该同样的反对那些把农民运动限止于日常斗争，而不在斗争中开展游击战争的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游击队是从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中产生的，它不但不能脱离群众斗争，而且只有发展群众斗争，依靠群众斗争才能扩大与发展。游击队必须有它的明确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帝的土地革命的斗争纲领，为了这一纲领的实现而斗争。游击队的成分主要的应该是工人、雇农与贫农，一切成分非常恶劣的游击队必须在领导农民的斗争中加以彻底的改造。党必须以最好的最坚定的干部去领导游击队，而且必须用一切方法保障我们党在游击队中的领导。脱离群众斗争的游击队，没有斗争纲领的游击队，没有健全的工农成分与我们党的坚强的领导的游击队，必然会遭到失败，或走到土匪的道路上去。江苏通海与徐海蚌、山东青州、福建闽南的游击运动以及山西红二十四军的失败，完全是这些原因所造成的。

党在游击战争的开展中，应该最坚决的执行创造新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路线。中央给陕甘边游击队的指示信，对于其他区域也是有效的。

在反日运动发展的区域，尤其是满洲、热河、河北等地，党直接可以用反日的口号来号召农民群众，组织反日的义勇军与决死队等，把他们武装起来去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但党必须使这些义勇军同时执行反对地主豪绅与国民党军阀官僚的任务，使反日的义勇军同时是土地革命的发动者与组织者。

在农民群众中，党必须用一切力量宣传苏维埃政权与红军。务必处处把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对照起来，使农民知道苏维埃政权为了农民做了什么，农民如何在苏维埃政权下消灭了地主阶级，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并且免除了一

切苛捐杂税等等。必须在每一农民群众的大会上报告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与行动，号召并组织他们到苏区去参观，援助苏维埃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但一切这些亦必须与农民反日反帝以及一切日常斗争联系起来，使每一斗争变为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并且转变为为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八、要使千百万农民群众环绕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周围，我们必须加强农民的组织。除了雇农、苦力组织他们自己的阶级工会之外，农民的基本组织是农民协会，党在农民协会中必须组织党团，雇农等应该组织他们的小组。用一切方法禁止土豪富农等加入农民协会，在斗争中把已有这些分子洗刷出去。除了农民协会之外，党必须在每一斗争中组织吸收广大农民群众的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不是什么上层的组织，它应当在日常的斗争中与农村的基本群众及农村无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争取农民群众最切近的利益，要实际上成为农村中最有力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上要集中一切农民群众之革命的精力。在这种斗争，农民委员会要引导所有的农民群众加入革命的农民协会而巩固他们的基础。同时农民委员会要成为夺取反动组织中的农民的重要工具。”（一九二九年六月国际决议）

农民委员会是为了某一斗争（如抢粮分粮）由全体农民（富农除外）大会选举出来的。一切它的工作应该完全采取公开的民主的路线，而且应该经常向大会报告它的工作，从大会上得到各种指示。在这种委员会下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部门，如交通队、自卫队、宣传队等，尽量吸收广大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党应该组织它的党团，在中间实现它的领导。在没有农协的地方，党应该使农民委员会转变为经常的组织。但不论在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中间，党必须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贫农身

上，所以贫农团在这些组织中是不需要的。

农民反日会的组织应该更普遍的发展起来。这种反日会除了进行反日工作外，必须领导农民的日常工作，使农民的反日斗争与他们的日常工作联系起来。这样反日会才能变为广大农民群众的组织，农民才会了解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他们自己的事。

当然党在乡村中还可组织各种各样能够吸收农民群众的附属组织，如像游戏班、青年男女识字班等。

在灾民难民中，必须组织灾民委员会或灾民自救团等，并且保障雇农、贫农在中间的领导，坚决反对地主与富农的“灾民”与“难民”的内奸作用。在这种组织下面，必须组织灾民自卫队，反对军警的压迫，保护群众的斗争，并且时刻准备解除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来发动游击战争。

九、党对于农民各阶层的基本路线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同时应该明显的指出：在中国乡村中的主要矛盾依旧是广大的农民群众（雇农、贫农与中农）与地主豪绅。

但是党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始终是乡村中的工人群众（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要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党一刻也不容缓应该把乡村工人组织起来。党必须领导乡村工人去做反对雇主、改良他们的生活的斗争，把他们组织在雇农工会、苦力工会、手工业工人工会中间。对于这一工作，除了个别地方（如河北直南的清丰县）党有过个别的成绩外，在白区的党是完全忽视的。各地党部应该明确的了解，这种组织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第一，农业无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它在农村中的先锋队伍；第二，中国革命中心问题之一，就是土地问题，中国农业无产阶级在土地问题的革命的解决中，必须负起无产阶级在领导反帝的土地

革命当中的先锋的绝大的政治任务；第三，中国农业无产阶级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参看国际雇农委员会秘书处《关于中国雇农工会的决议案》）

不发动乡村工人的斗争，领导他们，组织他们，提高他们斗争的积极性与政治水平，那一切关于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都会变成纸上的空谈。各级党部必须立刻讨论国际雇农委员会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开始乡村工人中的工作。必须依照各地具体的情形制定雇农、苦力等的斗争纲领，并且训练一批专门做这一工作的干部派到乡村中去。

党必须大批吸收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来转变目前乡村党部中恶劣的社会成分。

十、但是要完成上面这些任务，我们必须最坚决的反对党对于目前农民运动的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特别严重的，是乡村党内的富农路线。因为这种估计不足，所以许多地方党部对于各地不断爆发的农民斗争，表示了旁观态度与机会主义的消极，而且每一斗争发生之后，在斗争的群众性与尖锐性上，常常超出于我们同志的预料，使他们远远的落在群众积极性之后，而变为群众斗争的尾巴。党内的富农路线更使农民的群众斗争走到和平请愿，把斗争停留在抗捐抗税或分粮抢粮上面，阻止农民的自动武装与游击战争的发动，使农民斗争走到失败。这种富农路线的危害，更因为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表现得明显了。

小地主与富农在我们党内的影响是特别浓厚的，而且我们在乡村中的党的领导机关内，还充满着这些地主与富农的分子，地主与富农经过这些分子来影响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毫不足怪的。甚至有些地方，地主、富农为了要保持他们对于农民的欺骗使农民不致反抗他们，有意加入我们的党，以领导农民

斗争的方法来出卖斗争。这些机会主义者以至反革命的地主富农的分子，当然有时更会采用一些“左”的空谈，如像“只要大干不要小干”、“无条件发展游击战争”等的空谈来掩盖他们的富农路线与他们对于领导农民日常斗争的消极怠工。

必须最坚决地开展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党才能顺利地转变对于农民运动的领导，在这一斗争中彻底改造各地的党部，尤其是各省的县委、乡村的区委与支部，洗刷地主富农的分子，提拔雇农、贫农与产业工人担任领导的工作。同时要使这一斗争不是决议上的与口头上的，而是使我们党走到农民群众中去的斗争，那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清谈的倾向，立刻开始对于农民日常斗争的领导。

党必须经常的动员城市的产业工人同志或工会会员，给他们以短时期的训练后，把他们派到农村支部与工会中去工作，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各地党部必须详细的了解各主要农民区域的具体情形，仔细的研究所有农村中的事实、所发生的一切过程，经常的有计划的讨论这些区域中的工作，给当地的党部以各种具体的指示与帮助。外县巡视员的经常出发，是完全必要的。此外，还应该尽量的利用同农民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铁路、矿山、内河的工人去进行工作。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周恩来关于前线上的地方工作问题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七日)

中央局并转江西省委：

由兴国出发整整一个月了。前线上更看出地方工作对于以战争为中心的观念缺乏，尤其是中央来信所指斥的白区工作之糟，真为各苏区冠，也真是中区工作中最坏的一个。我在这封信中，就专门来谈前线上的地方工作。

这次北上，由兴国，经宁都，到乐安，出宜黄，转南城，回宜黄，经南丰，退宁都，约摸走了七八百里，走路日子多，休息作战日子少。过半的时间，是在白色区域统治中，从地图上看，西从古县，经招携、肖田，东达甘竹——这一线以北，在永、乐、崇、宜、南、抚、丰、黎之间，有一块极大的地区，纵四五百，横七八百里，还完全没有赤化。在这里，首先有一个观念问题，即是我入苏区直到北上以前，每讨论到向北发展时，总听到各负责同志讲，这块地区太狭窄，敌人逼近，不容转动，故论到河东发展，就必归结到只有到东北去，否则就只有过河西去。自然为最后完成江西首先胜利，红军主力军必须消灭南浔路上及袁水流域的敌人增援与后续部队，才能巩固的取得南昌、九江以至萍乡。但河东这块地区并不是不能与敌人主力决战的，而且必须争取这块地区上消灭敌人主

力，才更易于过河西去。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这次方面军未能乘胜消灭陈罗吴周^{〔1〕}，是因为我们的战略错了，并不是因为河东施展不开，更绝对不是敌人主力不来河东，相反的，敌人主力恰由大庾、崇义沿河而跟随我们找我们主力来打了。不到河西，便到东北；反对到东北，便要立刻过河西。这两种错误观念，已被眼前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了。

由于对于红军对外发展的方向有了错误观念，影响到地方工作上，也就有了这样的观念，以为夹在抚河、赣河之间的地区，只有靠主力军与敌人从血战中才能争夺过来，敌人坚守永、乐、崇、宜、南、抚、丰这些据点，我们便很难以游击运动与秘密工作从敌人手中夺取这块地区。所以过去（也是直到现在）省委军区以及地方党部对于向北发展游击战争、实行全线进攻的指示，只是眼看着古县、招携、肖田、甘竹一线以北的那些据点，如牛田、增田、太平圩、东黄陂、四都、五都、新丰市、神岗、党口、三溪、三坑、河田、岗、原都那些据点，要地方武装向其进攻甚至简单的要其占领（最近江西军区还要永吉地方武装占领八都），而完全忽略了这些据点附近的广大地区的争取和赤化，因此遇到这些据点为敌人所坚守或是为敌人所袭击，我们的地方武装便不得不由出击而缩回到苏区来。固然争取这块地区，是与夺取这些据点有密切关系的，但绝对不能说这些据点没有攻下，这些地区便不能争取。事实上告诉我们，这块地区之大，山林之多，隘路狭窄，据老于游击战争的人说：这是一块最好的游击区域。我们主力红军，由东到宜，由宜到南城，由南城转到南丰，由宜黄回到苏区，都是经过这样山林多、隘路窄的地方。这还是仅就地势来讲，若论到根本的群众问题，到这些地区是受过老红军影响的，对白军统治虽小资产阶级的城镇贫民乃至中小商贩都深恶痛绝。只有

赤色游击队乱打土豪的地方，群众见红军来，才有登山的现象。游击队没有到过的地方，倒反毫不惊慌的欢迎红军。这也证明赤色游击队若是领导非其人，简直不是去发展苏区，而是断送苏区。

从观念说到工作，招携、甘竹、肖田以北的一片地域，除掉书仙、来陂、横石外，不仅找不到小块苏区，并且还不是游击区，有些地方游击队、独立团之流简直连走都没走过。游击过的地方坏的影响多，好的影响少，坏虽没坏到“赤白对立”那些极严重的现象，但乱打土豪已成为这几县游击队、独立团的通病。地方武装如得不到党的正确领导，如不注意无产阶级成分的领导与加强，则农民落后意识的发展，可以走向“土匪行动”。再举一个事实例子，南丰占领后，宁广赤卫军去了八九百人，由甘正吾同志领导，十二军政治部要他们去三溪、三坑乘胜肃清靖卫团，他们不去，开到南丰城；要他们担任拆城墙、毁工事的工作，他们又不做，天天在街上乱打土豪，实际是乱抢东西（公谷是分给他们了），一件工作不做，最后饱载而归，演成长沙、吉安教训后之第三次农民入城的教训。这难道怪群众吗？绝不！只须看一看谭政同志的报告（泽洪^{〔2〕}已有报告提及此事，另抄上），便知道甘正吾同志是在领导上犯了如何严重的错误。我已写信通知泽洪、昭良两县书，望省委严查此事，必须给领导者以严厉的处分以教育全党与地方武装。

游击队是一般的不得力了，而且又不懂得游击队的动作，所以在军事上一遇到强敌，便要受损失、丢枪，工作上更不以发动群众斗争，没收地主土地，分田分谷，没收土豪财产，肃清反革命，搜缴团匪枪支，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党的组织为其中心任务。于是打土豪、筹款、分伙食尾子，便成为游击队的中心工作。游击队外更无所谓白区工作，过去永乐宜广所

说派到白区工作的人，不知派到何处去了！？白区完全没有工作，是这次方面军攻下几个孤零零的城而不能够巩固它的胜利的主要困难，战略战术的错误还是其次。

红军连续胜利前的白区工作既没有了，我们再看胜利后的白区工作又如何？乐宜丰三个城在五天内先后占领了。但当然使省委措手不及，但中局在兴国开会时，已经谈到北向发展的工作团问题，并且我曾指出不仅永乐宜须得准备工作人去，南广方面，也要准备向前推进。这里，我也做了一个错误，即是同意留洪时^③同志在万太几天，而不是立刻交代，立刻北去，这就是使乐安工作在红军攻下后不能立即趁热打铁起来。洪时去晚了，泽洪去得更晚（据他自己来信说，是因为省委五天五变其地点，最后又要其等陈毅会面，而陈毅又迳往东陂），陈毅亦来得迟，以致直等到方面军由宜黄撤回，地方工作才得到中心领导。原有的地方工作同志，实在太弱了，而且简直不能配合战争胜利的开展去开展工作，乐安余甲生同志的领导非常懈怠，我们过招携，经过政治部与他详细讨论了半天，分配和规定了许多工作，单只一个随总政治部出发的工作团直到乐城攻下的下午才赶到几个人，其他的事则多是没有下文。据说到是妇女劳苦群众对于慰劳红军甚热烈，为伤病兵铺门板，做饭，晚间驱除蚊虫，则为各地所无。余同志则在乐安攻下第二日，我们快开动了，才再见着他，那时他还没到乐安城去。宜黄李靖同志似比余为好点，但能力弱，工作人员少，布置不开，且亦不甚抓住工作中心，故对宜黄城及宜黄以南的工作，十余日并没有建立什么！城内工作，还是三军团的政治部二十一师政治部以及军委会政卫分局做得多点。军委政卫分局做工作太注意秩序，缺少极猛烈的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甚至容许与命令商人自己开会，这是一个严重错误），三军团政治部又

去得太晚了，不到四天，就可遇到敌人的袭击，南丰工作则完全是十二军政治部在做（见谭政报告），余泽洪没赶来，聂昭良同志原是南广县委书记，南丰城占领了十三天，他在广昌城连看也不来一看。至于工作团，宜乐黄三城的，我们都未及看见。（工作团不能随总政治部及各军团出发，是最大损失！）听说广昌派赴南丰的工作团，一到南丰，便跑光了，宁都去的工作团也跑了一些，泽洪由广昌去南丰的路上，又收容了一些。各地工作团的成分，都没能如我们向省委的提议，以后方得力的工作人之半数来前方（省委原是同意了），相反的，竟是支书支干以下的干部——这证明地方党部对于“巩固战争胜利，争取苏区扩大”的中心任务，是完全没有理会。在这里，省委也要负注意不力、督促不紧、指示不周的责任和错误，这也就是中央所指斥的实际工作与政治任务不求吻合的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工作作风！

我们必须以面向白区的口号，来转变我们忽视白区工作、忽视争取苏区扩大的错误观念。三次战争后，中央苏区扩大到两倍以上，但是近半年来，却除掉恢复龙岩苏区、发展闽南游击区域外，竟没有任何地域的扩大——这是极严重的政治损失啊！

我们必须以新的工作方法，来转变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要说得到，要赶得到，要使政治任务上所规定的、决议案上所写的，立即有实际工作去布置，很迅速的很得力的干部去布置，以求得与革命战争胜利的开展相配合。

从工作团再回到地方武装来说，宜乐南广的地方武装微弱得很，从战斗力说宜黄独立团强些，南广独立团则其领导之坏到了极点，团长与政委相仇视到不肯共居一地，致受到靖卫团袭击的损失。我们在宜黄要武装一部分斗争群众，李靖同志回

答，有了枪没人背，他不敢接受，可想见群众工作之差。宜黄的苏区固然很小，但东韶、南团、洛口都是有广大群众的地方，且受白军的摧残极深（即以烧毁房子一事而论，群众对国民党军阀已恨之入骨，从黄陂、小布以上，我们所经过的灾区，连二三百里，这是国民党军阀自己宣布自己死刑的地方）。发动群众并不是很困难的，而结果竟如此，我们已当面批评了李靖同志。地方武装不能随着战争胜利的开展而扩大，这对于“巩固已得胜利开展新的局面”将碰着很大的困难。很明显的，这次陈罗吴三师由西边袭来，假使地方武装已经在新区繁殖了新的游击队，何致为敌人袭人而事前不得知道，且在新区若没有武装游击队做消灭反动武装的开路先锋，地方工作团便不能很顺利的发动群众。所以繁殖游击队与发动新苏区是绝对关联的。

论到争取苏区扩大，我再回到红军本身工作来说。白区白军中沒有工作，是赣州撤围直到南雄战争中很大的教训，在赣州撤围后，总政治部曾训练和派遣一批到白军中去工作的干部，省委也派遣了一些，但这次战役仍然没收到什么效果。孙连仲的二十七师中，的确有我们很大影响（溃退下去的兵，见了红军追上便不跑了，有的还派代表来接洽投诚），但这不是由于我们在这里边有什么工作，而是由于宁都暴动与从五军团回家被高树勋又截留起来的士兵在里边起了的作用（相反的，不满意宁都暴动跑出来的分子反对红军也更坚决些，但这多是干部）。在毛许李^[4]三师中，我们便没有组织影响（我们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毛许队伍中士兵有唱打土豪分田地的）。我们要了南城比到了赣州城下还要困难些，因为敌人的工事与南城的地形，使我们强攻既不可，坑道战不仅时间不许可，地形与敌人在城外的工事，使我军很困难的接近城边，而城内与白

军中一无工作，使我们不能从这方面得到任何帮助，这在堡垒战中是更增加了困难。

红军占领城市后（注一）很迅速的又要进行第二个战役，战斗中的群众工作，在红军政治部很难担负起完全责任。但红军中阵地宣传是万分不够，这也要指出（红军中政治工作，特别是战斗中政治工作真是惊人的薄弱——注二）。在进军时，红军政治部没能预先准备好到占领地区的宣传品，后方对于前方关于宣传品布告的供给也不够，也不能按时送到，到占领地后，各级政治部又要忙于运送伤兵，收容俘虏兵，对于战地群众工作也就不能以最大力量来进行，同时也不会最大限度的利用战斗员与非战斗员去到群众中进行个别的宣传鼓动工作。至组织工作与发动群众斗争（分谷物、分田、烧田契借约、肃反……等等），则一两天的停留，常是顾不及的。最多亦只能做到分谷子、分土豪衣物给与贫民群众。驻扎两天以上的地方（如南丰十二军、宜黄二十一师及三军团，乐安二十二军），各政治部便有了相当成绩（南丰工作见谭政报告），然一般说来，仍然异常不够。过去红军以三大任务——作战、筹款、做群众工作，为其轮流的工作中心，是错误的，因为工农红军原是要做群众工作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不仅是战斗员，而且随时随地都是政治的宣传员与组织者。但红军做群众工作却不能妨害其作战任务，不能在红军行动中，照例划出一部时间专门来做群众工作，且分散开做群众工作，将做群众工作看做是每一个战术后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这种错误必须纠正的。尤其是筹款，在红军中更不能与群众工作对立，更不能拿他做成红军的中心任务，这只能看做在红军中的附带任务（有时为着专门筹款来一个临时行动，虽也是必要的，但决不能认为是中心任务）。因为纠正这些错误，现在又走到另一偏向，即是红军一

般的对于地方工作，大大的忽略起来了——这是使红军脱离群众一个最好的方法。再加上筹款，虽不认为是中心工作，但实际上需要的急迫时，红军竟会以筹款为中心，而更加忽视群众工作，这将是红军更加脱离群众。这种偏向与错误的发展，正是这次红军在阵地与占领地区的群众工作，没有做或没有做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于拥护红军与其他参战动员的工作，在这次战役中也看出许多错误与缺点。第一，扩大红军工作是极端令人不能满意的。中央局决议与计划，七八九三个月在江西应扩大红军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一二军在内），省委增改为七月到八月十五先扩大七千五百人到主力红军，现截至八月底止（两个月了）前方只收到四千二百三十五名，离中局要求很远（闽西的扩大情形恐比江西更坏）。在质量上，还有些欺骗来的，实际情形已告总政治部另做报告。第二，发动担架队、输送队的长伕问题。据省委电告，两月内来前方的不下万人，但实际到方面军的不出四千人且来来去去，非常流动，有些半路上便跑了回去。举例，如宁广一带发动到南丰挑战利品的有三千人，实际上到南丰的不到一千人。这当然不是群众参战不踊跃，而是领导工作不得力，甚至没有——地方上宣传鼓动的工作异常缺乏。“指派”、“命令”甚至“强迫”的事都还有，三军团报告宁都征发富农当伕子，不去则须用款赎，甚至贫苦群众亦有缴款不当伕子的，广昌发动分子，农民登山，这是严重到十二万分的问题!!! 第三，边区拥护红军胜利运用简直没出。招携医院找伙伕招呼兵找不到，俘虏兵则有钱弄不到饭吃。东洛一带，对红军落伍兵常不收容，发动临时伕子抬伤兵，一般的都是困难。慰劳红军在东洛、黄陂、小布、平田这些苏区，都还没有热烈的成为一种运动，其他各地截到今天止也很少来的，

最成问题的是宁都田头区竟有强迫劳动妇女五个人做一双鞋，不做，则罚交花生豆子的。这种事实恐不只田头一区。第四，边区各县对于侦探带路的工作做得极少。宜乐南广一带，很少向红军探报敌情的。南广县委甚至连找一个带路的带宁都游击队去向白区游击，都找不出，这是如何惊人的事情。第五，国家纸币的使用，公债票的购买，在边区各境各县做得也极不踊跃。东洛、黄陂、小布竟发生拒绝使用纸币的事（自然红军经理部没能及时兑现，红军战士没能引创立纸币信用为自己责任，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地方上对于这种事的宣传，可说少到极点。田头区甚至发生派捐的事（据一个归家的红军战士报告）！第六，边境各地赤卫军都是有名无实。少先队间或看见一些（如宜黄的吴村）。第七，保护秋收，特别是加种杂粮，乐北边区一线也做得很差，宁都荒地甚多，甚至在通胜利、瑞金的大道上（由赖村至田头数十里大道）都是田荒草满。这种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土地分配得不当，或还未彻底分配（田头区的田还未分，最近方举行调查，宁都石上农民还有因未分田而租田种与私自交界的事），以致贫农不信任苏维埃政权，不愿意甚至不得耕种多的土地。第七，赤色戒严在北边这线好像是没有这回事的，乐宜最差，宁都非常，数十里通行没有人管。第八，肃反工作，许多地方是忽视了的。边境一线，如永丰的“铲共团”、永乐的勇敢队、宜黄的难民团、广昌的大刀会，地方上还很少以正确的策略来争取他们欺骗下的群众，一般的还是以武力去打，致深刻了赤白对立、相互烧杀的严重现象。第九，关于发展合作社运动，特别是预储盐谷，抵抗敌人的封锁（注三），在边境各县都还没有注意到，省苏对他们也没有单独合乎他们实际的指示与帮助。总之一切动员与参战工作，都是异常薄弱，地方党、地方政府简直表现

不出这些工作上的强固的领导作用。

工作与时间，不容许我再续写下去，我现在以具体的提议结束这一个报告。

一、全苏区必须以“面向白区”、“面向群众”的口号，来彻底转变忽视白区工作与不深入群众的严重错误。

二、北向发展，决不仅是红军的任务，而是全苏区党的任务，江西党与政府必须将苏区腹地（兴、胜、雩、瑞、宁以至赣、万）的半数得力干部（区委、区苏、区工会）派到北边这线来工作。单单依靠洪时、泽覃^[5]、泽鸿三数个中心干部无论如何，是忙不开交，而且是做不好的。

三、江西省委现在训练中的二百多干部，应以一半送至总政治部，分给各军团政治部组织地方工作团到白区去做工作。另一半首先分给宜黄及南广两中心县委，这种干部继续训练与派遣，省委须负全责。

四、中央局须准备以自己党校学生中三分之一派到这一线做工作，以集中火力来争取这一块苏区的扩大。

五、省苏须训练自己的工作团派到各县苏、区苏来加强工作，中央政府须增加随毛泽民同志来的工作团的人数，以便分布到各县各区去调查土地与整理财政。毛泽民同志为整顿北一线的财政与随着红军到白区筹款，目前应随着总政治部出发一时期，至少以一个半月为限。

六、省委、省苏必须改变过去高高在上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必须派巡视员经常来北边这几县巡视，但必须选那一县最好与最坏的区直巡视到乡，并与群众党员作个别的调查。过去正人^[6]代表省委代表中央政府到宁都巡视，都还是只看县一级的表面，没有深入到乡一级的群众中去。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必须坚决改正与肃清。富春^[7]能抽出时间来到胜利或赣

县、永吉泰去巡视，是非常之重要的。因此，我坚决提议，省委必须加进新的成分。一个工人干部做组织部，准备洪时到省委做宣传部（以步青^[8]去代洪时）（我的提议不只一次了），这样才能建立起集体的领导，才能使富春有可能到下级多看一看，多做的实际的督促帮助与检查。

七、中央局如可能，应从昌生、小超^[9]、严重三人中抽出一个做中局组部的巡视员，首先来宁广做一两个月区乡的工作检查与改造。中央政府如可能，也须分一人来宁广宜乐进行政府工作的实际检查与转变。

八、自然，在北向发展中，省委、省苏不能忽视西向与南边的两线工作，相反的，只有加紧这两线的工作，才能巩固向北发展。因此省委、省苏目标要更须以充分的注意力去争取这面苏区的扩大与巩固。西沿赣河的城市工作，也应放在党的重要地位。

九、关于扩大红军，省苏、军区必须看做是一等的经常的任务，必须一直到乡去实际领导这一工作的进行。赤卫军的组织与进行，必须当做宣传义务军役的最实际的行动试验与准备。必须在征调党十分之一当红军的运动中，广大的宣传义务军役的重要。省委计划在九月中扩大红军四千人，实在太少了。但现在已为日无多，三个月的突击成效还少于今年上半年，省委必须对于这一工作给以总检查，并决定扩大新的计划。我提议这次检查不是再召集各县委书记又到省委来开一次会批评一下，便算检查，而应改为分人到各中心县委，更实际的去检查下级扩大红军的实际状况。最好中局也派人帮助省委，要能在南广、宜乐、永吉泰、会寻安、赣零胜宁等中心县都有得力负责人去实地检查。闽西对这一任务的执行更差，应同样举行严格的检查。（注四）

十、关于游击队的组织与增加省委军区，要多从后方得力的区域征调一批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先队来充当，单靠边区自己产生是来不及的，同时必须以最好的干部来领导各边区应如何分配。望省委、军区自己规定，并与陈毅电商。

十一、关于伕子问题，以后统由总政治部与省苏直接电商，其他机关可不必负直接调动的责任。据古柏报告，中央局曾经在宜黄、南丰占领后，还要宁都送伕子到招携，而且以快信通知他们，故许多伕子跑到招携无所用的跑散，并白费了伙食费。以后关于集中人数、时间与地点，应统归总政治部与省苏通知。伕子鞋费一角五分一天，多是多了。但许多县份的通令现已发出，前后方应一律适用。过去一时期后，或可酌减到一角一天。苦工队与长伕待遇是不同的。总政治部关于担架运输苦工各队事情，有一通令，你们当已见到。

十二、关于苏维埃国家纸票的使用，首先须建立与巩固它的信用。现在除严密督促红军各级经理机关随时设临时兑换所外，边区地方政府必须负责设县与区的兑换所，中央政府与省苏应拨一笔现款做纸票交换的基金给边区各县，或即由他们求得的款中拨用。（注五）

十三、关于其他动员与参战工作。省委、省苏、军区必须经常的注意，必须以动员最好与最坏的例子随时宣布出来（可登红的江西与红光），教育全党、教育群众并教育领导机关。其中严重的现象必须找出根本的原因，立即予以改正。中央指示我们“……为着胜利的进行革命战争，我们最大限度的开展这些工作（指党的、苏维埃的、群众组织的工作——豪注），根本的改善这些工作，最大限度的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央今年七月指示信）。省委、省苏、军区乃至中央局、中央政府应坚决的执行中央这一指示，以巩固革命战争胜利的

进行。

这一封信，就结束于此，其他关于战略、关于红军问题、关于全中央区工作布置，当另找时间陆续写出寄上。

此致

布礼

周 恩 来

九月十七日于宁北之小元

注一、红军在城市的工作，就这次乐宜丰三城看来，“真正惊人的薄弱，出人意外之糟”，详情另函告。

注二、红军中政治工作的检阅，一方由总政治部负责报告，一方由罗欣然同志面述这次政治工作会议的经过。

注三、敌人现正在各方进行封锁，尤以北边这线为最严。甚至敌军开进苏区边境时，亦须领有购买证才能买到盐，我们对于反对封锁的运动与抵制封锁的办法都执行得非常不够，有些地方简直没有。

注四、关于扩大红军，另有一信报告。

注五、地方政府腐化的现象，非常严重，甚至有吃鸦片的。如零南塘坑乡苏正副主席，当红军到时，困在床上，一吃一烧，宁南田头区乡苏主席，也吸鸦片，副主席是道士。这些材料，俟整理后再补做报告。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

〔2〕即余泽鸿。

- 〔3〕 即陈洪时。
- 〔4〕 指毛炳文、许克祥、李云杰。
- 〔5〕 即毛泽覃。
- 〔6〕 即陈正人。
- 〔7〕 即李富春。
- 〔8〕 即霍步青。
- 〔9〕 指余昌生、邓颖超。

中共中央关于非苏区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日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

根据目前国际及国内的政治形势，关于今年的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的运动，同时亦便是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的周年纪念的运动，中央提出下面的具体任务来进行这个政治运动：

一、进行最广大的书面与口头的宣传鼓动，解释五年计划实行的成功与第二次五年计划的政治的意义与内容，特别是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苏联工农生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提高，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及中国国民经济浩劫及工农生活的空前的恶化对立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最广大的解释苏维埃的道路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脱离经济浩劫与完全的殖民地奴隶地位的唯一出路。

二、特别应该着重地在最广大的工人及劳苦群众面前指出反苏联的军事干涉的危险性的极端紧张，组织最广大的群众的拥护苏联的运动，举行各种各色的集会、飞行集会，印发各种传单、标语来开展这个运动。与这个相关连着的便是进行最大的群众动员到东北义勇军中去，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便是最有效的武装拥护苏联的方法。在上海、满洲，党应该组织驱逐白俄出中国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必须

将白俄在反苏联战争中无耻的先锋作用与他们破坏工人斗争的卑鄙龌龊的工贼行为密切联系一起，动员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在这个口号周围进行各种的具体的行动。

三、党应在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与革命的知识分子中，进行广大的选举代表到苏联去参观的运动，组织苏联参观团的运动应该成为群众的运动，在一切广大的群众会议上进行苏联参观团的选举，并且应该依靠着群众的力量达到到苏联去的目的，并在这个运动中发展苏联之友社的组织。

四、关于中国苏维埃政府一周年纪念，党应最广大的宣传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及他们的光荣胜利与苏维埃建设的成功及工农生活改善的具体事实，最清楚与明显的将苏维埃政府的外交、土地、劳动及一切政策与国民党政策对立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更广大的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与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运动（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去，募捐慰劳红军，完成上海工人号飞机等等）。

五、应该组织伟大的有力的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与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一周纪念的示威。地方党部应该根据当地的具体环境，来决定这个示威是全市的总示威或者分区的示威。必须根据八一与九一八示威的经验，郑重的集中力量来准备这个示威。事先最充分与广大的动员与准备示威的中心队伍与纠察队、口号队、交通队等等组织，来保证群众的争取街道的斗争的成功。

六、在河北、满洲、山东与福建，必须在这个纪念运动中进行广大的征收党员的号召，三倍的扩大党的组织，吸收新的几千几万工人入党，建立在工厂与企业中我们坚固的基础，应该成为战斗的任务。这个运动不应与执行一切党的总任务分开来，应该在准备组织领导工人的斗争中，

为着争斗来发展党的组织。中央组织局必须根据上海九一八号召的经验，给外省党部以详细的指示，与保证中央对他们的直接领导。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 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建议 转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旬)

中央局急转鄂豫皖分局：

寒电悉。

(一) 此次敌集结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打稳扎。

(二) 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三) 这三次战斗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四) 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的两次胜利，这次一方面军

向北发展的胜利的开始，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湘鄂西应在打击敌人一方的便利条件下，以一部分兵力向京汉路西行动。

中央局在前方的 周 毛 朱 王^{〔1〕}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 对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问题的意见 转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旬)

中央局转中央及鄂豫皖：

(一) 鄂豫皖红军在敌人密集的分路合击与深入苏区的情况下，一月余激战三次，仅击败敌人，未能消灭敌人一路，而我受损失大，补充不易，结果仍须自动放弃新集、七里坪。这在战略上仍未抓紧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敌急追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他，以争取便于消灭他的有利条件。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

(二) 目前移师皖西是对的，我们唤起你们注意这一战略的运用，要努力争取消灭一面敌人的胜利，以达到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围剿”的目的。

(三) 伤病兵近万，反动派捣乱医院，须请中央用大力送自己的医生去。作战行军顾及战士疲劳，可以减少疾病。烂脚

病都由拂晓行军，在战场不洗脚以及蚊虫传染而生，勤洗擦干可以减少传染。

周毛朱王^{〔1〕}

于前线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目前军事行动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中央局并转中央：

(一) 目前敌情：在十八军解决张英五十九师后，十一师回吉安，十四师在吉水、新干，四十三师在永丰，九十五师在乐安。宜黄有二十五师及第五师之一旅，抚州有孙连仲残部及五师另一旅，南丰、南城仍为毛许李⁽¹⁾三师，有一旅在里塔、新丰。五十二师驻地不明，大约在吉安、吉水、安福一带。赣江泰和以上为粤军。分散驻扎闽北之建宁、泰宁、邵武、光泽仍为周志群部。一般的是缓进，赣南、闽西敌人则较急进。

(二) 目前红军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三) 现在因敌人固守白区城市据点，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南丰、黎川一线城市周围，还有广大区域未曾赤化，加以过去我们战略错误所造成的困难条件，致攻城打增援部队必须时时顾及敌人分进得以合击，又红军因疾病离队之多，补充不及，在白区还不易打击与消灭敌人三个较强的师的靠拢行动。故如再打乐安宜黄两城，两三天内东西北三面敌人可集中至少五个师兵力来增援合击。同时吴奇伟、周浑元也

决不如高树勋之易攻。如攻里塔圩，敌力较弱将退入南丰城，南丰工事甚坚，可据守以待更大的援兵，届时援兵过多，将使我不能击敌一面。攻永丰城则更逼近敌之大量增援部队。

（四）因此，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布置，以大部兵力放在南丰之西直到乐安附近，以一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经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北苏区求得联络。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

（五）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去作战，同时在工作中也决不丝毫忽视敌人进攻的布置与小部队的随时袭击。

（六）我们决定后日出动，如中央局有新意见，望火速电告。

周毛朱王^{〔2〕}

二十三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毛炳文、许克祥、李云杰。

〔2〕指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关于亟须解决 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问题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信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中央局：

我二十一日晚由宁都回总部，次晨托锡龙^{〔1〕}同志带去一信，想收到。

行动计划已电告，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办法。当然敌情不是不变的，敌情一有变迁，我们仍当迅速地找住敌人弱点，实行攻击其一方，以便各个击破敌人。

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立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因在军事行动中，不比在平时可以多想多说，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机断专行，在前方可用之于日常事务上，而无法用之于临时紧急处置上）。但因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这样一来，已定的方案与原则又改变了，又须另在一种标准下进行，以致许多行动并非在一致的路线下执行的，且行动定了、做了，又人各一见，各异其解

释。自然到了检阅时，可以做其结论，彼此竟不相侔，结果对于新的方案的执行，也就更不能有一致的见解了。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须解决的问题！

本来利用目前行动的环境，我可以回后方一行，可以将前方对于群众工作的心得贡献到中局，并可以更具体地规定动员群众的办法。但稼祥^[2]同志坚决主张中局来一人到前方开会，泽东^[3]同志则主张任、项^[4]两人来。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地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否则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

前方每遇商榷之事，动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定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持一见，不如抽出人来做前线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这还是到后方来，否则亦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恩 来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 即张锡龙。
- 〔2〕 即王稼祥。
- 〔3〕 即毛泽东。
- 〔4〕 指任弼时、项英。

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洪易^[1]同志并转赣东北省委：

审查了你们寄来的一些文件，认为你们在执行过去中央所给与你们的指示上，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尤其显著的是闽浙赣苏区的发展与巩固，红十军行动的积极化，苏区内工农群众积极性的提高，以及白区群众工作与游击运动的开展。党在红军、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是很大的加强了。无疑的，赣东北省委是坚决的积极的为了实现国际与中央的路线而斗争着。

对于你们的一般指示，我们认为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需要，因为这种指示在过去的指示信上已经一再说及。中央方面正在汇集苏区方面的各种材料，准备以后在每一个问题上（如像工会会员问题、肃反问题）给你们更具体的指示。这封信不过指出就你们寄来的文件中所看到的一些缺点与错误，以唤起你们对于这些缺点与错误的注意。

第一，必须指出你们对于苏维埃工作的注意是非常不充分的。在你们寄来的所有报告与决议中，你们很少说到苏维埃的工作。譬如在你们《关于发展红军胜利进攻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的决议》（五月二十九日通过），你们说到了红军，说到了游击队等。但是对于苏维埃的工作只是附带的说道：“在苏区内苏维埃政府必须严格的执行劳动保护法，切实保卫工人阶级的

利益，以兴奋苏区与白区广大工人群众拥护苏维埃斗争的热忱”。除此以外，就没有一个字讲到如何转变苏维埃的工作，使苏维埃变为广大民众的政权机关，使苏维埃不但是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在你们《为打破敌人新的进攻计划的具体工作布置》的紧急通知（六月二十二日）上，在《关于红色五月工作的决议》（四月五日）上，以及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二月二十五日）上都是一般的，没有能够把彻底转变苏维埃的工作放在全党的前面，采取一切办法使苏维埃更进一步的变为群众的政权机关。

我们没有得到你们关于苏维埃工作的报告，我们不能有什么更具体的批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若苏维埃政权不能在一切工作上表现出它是工农民众的政权机关，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在工作中教育成千成万的民众自己管理自己，那苏维埃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第二，关于肃反问题，我们虽是已经一再说及，也已经唤起了你们的注意，而且你们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成绩，然而我们认为在赣东北苏区反革命组织的总的领导机关还是没有破获，估计到反革命的改组派与 AB 团等，罗章龙、王克全派等在赣东北的活动，以及他们过去的力量，我们不能相信在赣东北苏区内没有像闽西、中区、鄂豫皖、湘鄂西各苏区那样总的领导机关。零星的破获固然需要，然而我们必须从这种零星的破获一直追踪到总的领导机关。比如关于弋阳县委的事件（见你们六月十七日的决议），我们认为对于县委这种行动，不能简单的以官僚主义来解释。这是最露骨的反革命行动。敌人所以能够黑夜长驱深入直达县委机关，当然不单是还有外人告密，而

县委委员中某些人也是这一阴谋的直接参加者。对于这些县委的委员，省委当时应有极迅速的行动，严密的从这些委员那里寻找更多的线索，而不能以留党察看三个月了事。

我们认为在肃反方面，除了你们在肃反决议案中所说的，还需要更多的无产阶级的警觉性与坚决性，不放松在每一事件中反党与反苏维埃的分子，而把一切可疑的事件追究到底。这一工作是同为了国际与中央路线的彻底执行，为了苏区内一切工作的彻底转变，而反对一切“左”右机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完全不能分开的。对于反党的与反苏维埃的分子，必须最严厉执行党的纪律与苏维埃的法律，最公开的同他们作斗争，在斗争中教育广大的党员群众与工农群众。一切腐朽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不但帮助了“左”右的机会主义的发展，而且也帮助了反革命分子与反革命派别的活动。在机会主义者的背后常常站着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组织，这在苏区肃反中已经是完全证明了的。

但在另外一方面，必须使肃反不但不造成群众的恐怖情绪，而且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不但不使群众惧怕党与苏维埃，而且使群众更积极的来拥护党与苏维埃。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把加紧肃反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发展密切的联系起来。依据苏区肃反的经验，反革命分子一般的都利用党与苏维埃工作等的缺点，来影响群众或者有意曲解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来造成群众的不满。因此同反革命分子或组织作斗争，必须同时发展下层工农群众的自我批评，来同党与苏维埃一切缺点与错误作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孤立反革命分子与组织，使我们更容易的去根本消灭他们。

这是在肃反方面赣东北的党所特别应该注意的。

第三，在白区（或“灰区”）的群众工作中，我们认为你

们对于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注意是不够的。虽是你们对于白区工作有了很大的注意，开辟了五大游击区域，然而你们在白区的工作中，许多地方还限止在游击队的军事行动方面，而没有使游击运动与群众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你们给各白区县县委的指示信中虽是讲到游击运动与群众斗争的联系，然而这只是一般的与附带的，还没有把开展对于广大群众反苛捐什税、抢粮分粮等的斗争放到第一位。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有些地方的群众斗争（如余干）往往由游击队来代替，或由党去包办，而没有群众参加。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现象。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群众组织赶不上党。

同时，我们认为你们把贫农团当做“农村中群众的基本阶级组织”的观念（见你们五月九日给鄱阳县县委的信）是不正确的。依照国际与中央的历次指示，白区农民群众的基本组织应该是农民协会，而不是贫农团。这种组织应该吸收乡村中广大的中农、贫农与雇农等加入。党必须在内部组织党团来领导他的一切工作，雇农应该在内部组织他们的雇农工会小组。这种农民协会应该禁止土豪劣绅与富农加入，在斗争中把这些分子洗刷出去。

除了农民协会之外，党必须在每一斗争中组织吸收广大农民群众的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不是什么上层的组织，它应当在日常的斗争中与农村的基本群众及农村无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争取农民最切近的利益，要实际上成为农村中最有力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上，要集中一切农民群众之革命的精力。在这种斗争中，农民委员会要引导所有的农民群众加入革命的农民协会而巩固他们的基础。同时农民委员会要成为争取反动组织中的农民的重要工具”（一九二九年六月国际决议）。

“农民委员会是为了某一斗争（如抢粮、分粮）由全体农

民（富农除外）大会选举出来的。一切它的工作，应该完全采取公开的民主的路线，而且应该向大会报告它的工作，从大会上得到各种指示。在这种委员会下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部门，如交通队、自卫队、宣传队等，尽量吸收广大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党应该组织它的党团在中间实现它的领导。在没有农协的地方，党应该使农民委员会变为经常的组织。但不论在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中间，必须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贫农身上，所以贫农团在这些组织中是不需要的”（中央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九月十五日）。

你们把贫农团当做“农村中群众的基本组织”，你们自然把农村中其他分子如中农、雇农排斥在农民基本组织之外，你们自然不能执行农村中的下层统一战线。这种关门主义的策略，不能使我们在农村中团结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我们的周围，领导他们的斗争，一直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在你们给余干区委的指示信（四月十日）上，更说到“要使贫农团能切实领导斗争，在未公开前实际的掌握农村中的政权，在公开后即是苏维埃的骨干的组织”。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根据上面我们所说的，在白区乡村中领导群众斗争的，应该是农民委员会与农民协会。至于我们能实际的掌握农村政权（不论公开前或公开后）的机关应该是革命委员会，既不是农民委员会或农民协会，更不是贫农团。当然在革命委员会之下，我们才能开始组织贫农团，但这是地方的贫农积极分子的组织，它不能如工会一样，有它独立的组织系统。

无疑的，不论在白区或苏区，我们在乡村的策略是依靠贫农，但这不是说因此要组织贫农团，像你们那样所做的。贫农团的组织只有在有苏维埃政权之下，它的任务是帮助苏维埃执行苏维埃的一切法令。

开展白区农民群众的广大的日常斗争，组织吸收最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农民委员会，使农民的斗争与游击队运动的开展密切的联系起来，这是赣东北党在白区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四，我们认为在加紧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与红军中的领导工作上，赣东北的党是做得非常不够的。中央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到赣东北党关于工会工作、关于如何动员工人雇农参加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的报告，而且在有些地方，表示对于中央前信所指示的苏区工人群众的拥护苏维埃政权是站在最前线的一点表示怀疑。

在你们四月五日所通过的“红色五月工作的决议”中，没有能够把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危机中的领导作用的加强特别提出来。在具体工作的布置方面，也没有特别提出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去、到苏维埃中间去的口号，以加强无产阶级在中间的领导作用，只是一般的说到“积极的发展赤色职工运动，加强工会的领导，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已。在白区工作方面，也只是一般的讲到发展工人斗争，而且错误的提出了在重要城市中加紧“建立工人苏维埃”的宣传鼓动。至于领导赣东北苏区周围的哪些工人斗争，集中我们的力量到哪些地方去，在哪些地方建立我们的工会，则很少说及，甚至完全没有说及。许多决议案中说到普遍的建立贫农团（其错误，上面已有批评），然而没有一个字说到普遍的建立雇农工会，也没有一个字说到在农民组织中加强乡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显然不简单的由于同志们的善忘，而是由于对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忽视与对于目前工人斗争形势的估计不足。

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你们的工作，应有很大的转变。不论是在苏区或白区，省委应拿更多的注意来讨论如何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与发展工人斗争与工会工作的问题，更具体的

来布置你们的工作。对于劳动法的实行应该更加坚决，并且应该用更多的力量给不了解的农民群众做解释工作。

（下略）

中 央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注 释

〔1〕即曾洪易。

周恩来、毛泽东等提议在前方召开 中央局全会讨论作战行动问题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中央局：

电^[1]悉。

(一) 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二) 如攻乐安，以过去经验，急切不易得手，必引起西路强大增援，内外夹击，将陷于不利。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无作用，无法打增援部队。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即宜黄仅驻孙连仲部，五师有开贵溪说，如属实当可以牵制东西两面敌人。强攻宜黄，消灭孙连仲部为第一步计划，但必须俟敌证实才能开动，如此将延长在苏区待机日期，不确则必虚耗时日。

(三) 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

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具体布置，我们更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的准备，随时打击东西进攻，或宜、乐、丰的袭击部队。这样才能胜利地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

（四）中局如同意这一布置，请即刻电复，以便明晨开动。如必要我们待机攻宜黄，则只能在此等候不动，因开近宜黄而不能打，将更加错误。

（五）无论中局同意哪一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日期以三十日开为好，三天赶到宁北的小塘。

（六）如何，待电复。

周毛朱王^{〔2〕}

二十五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电报说：“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进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电报还说，我们认为红军主力应积极出击敌军，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并求得消灭此敌，如不易得手，则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

〔2〕指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 行动部署与中央局开会地点问题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央局：

昨电悉。

(一) 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十六军现退出上高，转向萍乡方向发展，八军电报不通，配合行动不能使之牵制赣河主力，因此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

(二) 现方面军向边区开动，待宜黄敌情弄清后，如只孙连仲部，抚州五师大部又到贵溪，我坚攻宜黄以开展局势；如宜黄有重兵不便攻，则只有执行原定计划，布置宜、乐中间一带战场，争取群众以调动敌人。

(三) 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1]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为妥。

周毛朱王^[2]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指项英、邓发。
〔2〕指朱德、王稼祥。

朱德、毛泽东关于敌大举进攻前 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对全苏维埃与红军第四次“围剿”的策略，在他行动中表现是：以优势的兵力向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与红军积极急攻，而对我中央苏区的进攻，目前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于其据点附近游击进扰，镇压群众，同时非常积极地准备着全国反动力量，以求很快地向中区实行大举进攻。在此时期，对于赣东北与湘鄂赣进行积极的摧残，以便利其大举进攻中区时无侧后的顾虑。

二、在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一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至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

* 由于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这个训令提出的方针，训令中的部署未能实行。

件，来夺取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三、执行和实现这一任务，须有具体准备工作，特别是布置战场的工作，对于军事上的要求，更须积极准备。现详细规定是：

（一）预定战场的地区

预定我军目前的战场是要适合两个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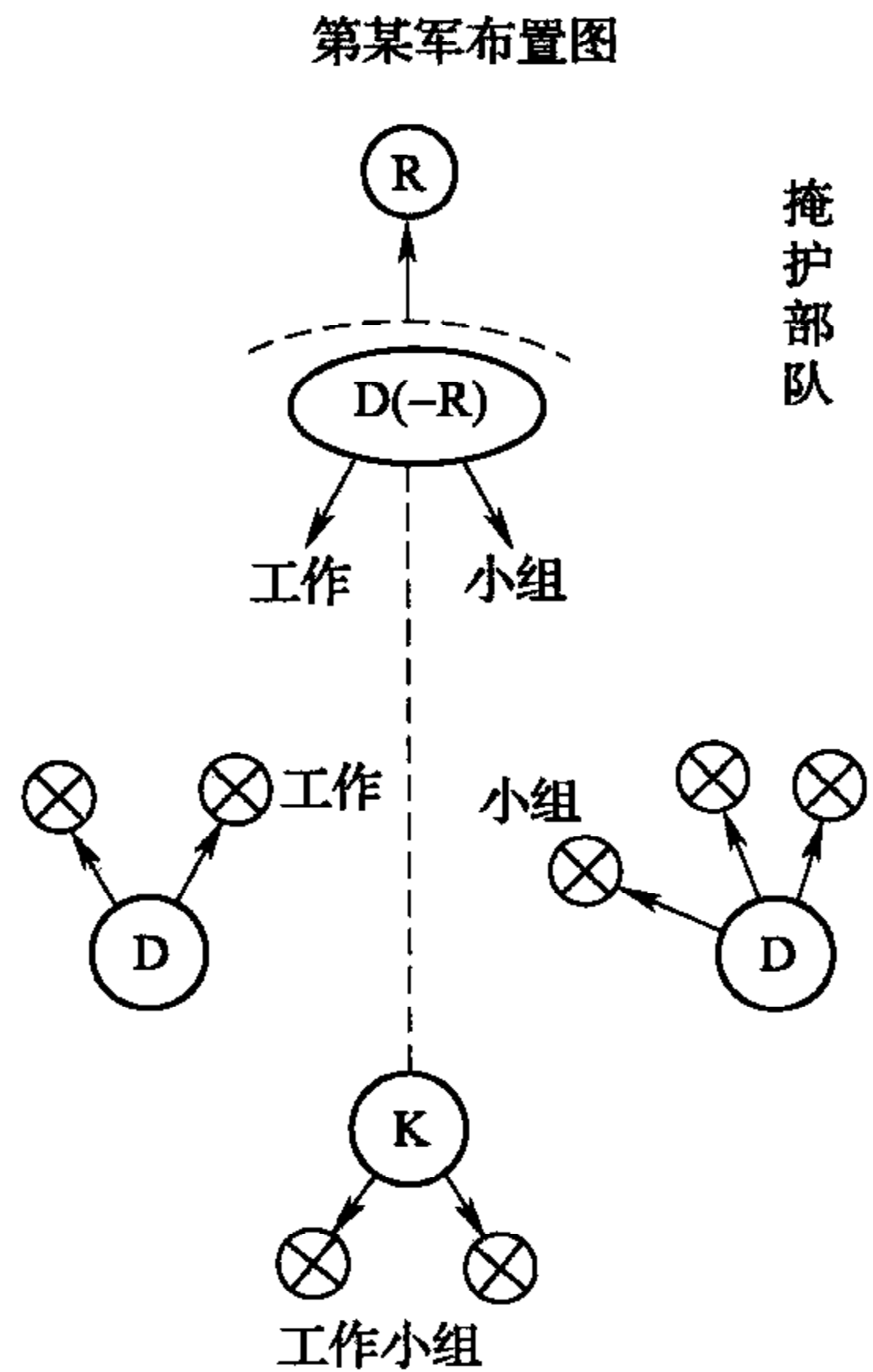
1. 为要坚决执行胜利的北上任务，必要迅速地肃清宜、乐、南丰一带拦阻着我军北上的白区地主武装，使我军可以巩固地迫近宜、乐、南丰各城市，有把握地夺取据点，消灭援敌，胜利地北上。

2. 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地在宜、乐、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即以猛烈追击乘胜夺取抚州、吉安，开展江西局面。因此决心在宜、乐、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

（二）战场布置的组织

1. 我军的工作部署，每个军要以师为单位分开，要派一师为掩护队，各师分在适当地区工作及训练，其分散要领如下图：

2. 掩护部队必须派出有力部队担任（要有战斗指挥比较强的率领），要进出工作部队的前方约一天或半天行程，先要占领巩固阵地（施行必要的工事）。其主要任务是掩护后方工作部队的安全。其部队除派警戒部队并



须以一小部向前游击外，主力须适当集结在一地从事训练，在情况许可下可以派出工作小组在驻扎地邻近做群众工作。在派小游击队向敌人方向游击时，不能削弱其掩护作用。各军掩护队得到紧急敌情，不但须迅速通报本军各部队，还须直接通报邻军各部队。

3. 工作小组。由各师（或军部）直接派出该师工作人员，有时可附属必要的警戒队，直接保护工作小组之安全工作。

各师（除工作小组）须尽量的集结训练，如以各种原因不能全师集中而要以团为单位分驻时，各团驻地最好能向敌方前后重叠起来（前后距离各团不能超过十里以上）。如地形不许可，必须摆成一横线或梯形时，各团距离不能超过五里以上。

4. 各军团要根据过去作战经验，针对着本身弱点加紧各种训练，各军团要自订军事训练计划。

师以上各级指挥机关应经常派出巡视人员到下级去巡视，严厉地督促执行任务，并将巡视结果报告上级。

5. 参谋旅行团。参谋旅行团以军团为单位组织之，任务是：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所到地方必须将工作结果制成书面及图表，准备报告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详细工作计划另定）。该团应该调查和登记事件规定如下：

（1）社会调查

人口数目及乡村中革命领袖姓名。

房屋多少。

给养状况。

特别出产。

当地阶级关系。

有无各种斗争历史。

有无反动政治组织。

（2）地理调查

四至道路状况。

附近河川状况。

桥梁船只数目。

森林。

地势。

（3）军事调查

附近地主武装。

地方武装。

前面敌军及团匪情况。

6. 各军团如遇敌人集中向我进攻（敌人小游击队的进扰不在内），须有掩护有计划地向着指定地点（东陂、新丰市、甘竹）迅速集中准备作战。

（三）工作期间内主力的行动

我为要布置战场计，在工作期间，我军主力应集结在工作地区适当位置，施行训练为有利。

（四）部队分散和集中

1. 作战区域的划分（如附图^①）

在工作开始，应择取在我军军事交通的需要上，沿着路线附近先行工作，然后再向其周围推广。其主要道路（如图所示）各军团及军可按规定地区妥为分配后报告总司令部。

（1）第一军团以东陂为中心，其工作区域包含水口、登仙桥以东，苦竹坪、东陂、朱坊以北，五六七都、水南以西（附图）。

（2）第三军团以新丰市为中心，在水南、朱坊、五六七都以东（不包含朱坊、水南）新丰市之东北工作，包含有朱坊、甘坊、三溪、杨坊、党口、神冈等（附图）。

(3) 第五军团以甘竹为中心，东至罗坊、白舍、瑶陂，西至洽村、沙坪（附图）。

(4) 第二十二军以南村为中心，东至水口、苦竹坪，北至登仙桥、罗山街，西至增田以西直至水南，南与苏区打成一片（附图）。

2. 方面军的集中计划另行规定。

四、各部队在工作期间，应设递步哨以便取得互相密切联系，特别是在最前线的掩护部队，当其派出的游击队得到敌情时，须马上用电话互相通报（横的电话线须迅速架设）。

五、工作期间总军医处应在水口设立临时医院，收容工作部队伤病兵。

各军团应在军队未分散以前，对于军队卫生如传染病的隔离及对饮水注意放毒等加以详细的说明。

六、各部队进入工作地区后，应将该处给养状况详细调查电告总部。如给养不够，须从工作区以外设法筹办，以免工作区顿起粮食恐慌。

七、工作期间总司令部在吴村。

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原文无以下各附图。

周恩来、毛泽东等关于鄂豫皖 应选敌弱点歼其一部的意见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九月三十日)

中央局急转鄂豫皖并转中央：

一、据几日来侦察，敌十四军进袁家坳、长山冲，已伸入燕子河、西界岭之间，第一军二师到罗田之固家河，逼近西界岭，张印相所部到闵家河，但三十一师在宋埠，郝梦龄到肖家坳与其靠拢，王均到霍山，其先头部队在麻埠，梁冠英亦在霍山，上官云相在英山，十三师在黄安之河口，陈耀汉在胡头坳，戴民权在张老埠，四师在金家寨，八十九师在新集，张钫在商城。

二、第一师仍在武汉，四十八师在鄂西之宝塔湾，此间尚未侦得有何敌人开向黄广潜。

三、据此，敌似以十四军、一军两纵队为挺进队，以三十军、三军、二十路军为堵击队，四师、八十九师为工作队，并组织上官云相为五纵队，有逼我四方面军于长江边决战的形势。

四、我们认为与敌决战，必须具备消灭与击破敌之一方的把握，以转变目前不利局势，并准备继续作战的力量。因我们必须估计红军补充的速度，在现时苏区条件下尚赶不上敌人继续求战之快，若仅击败敌人，而不能消灭敌人，不能缴获枪

弹、俘虏，不能继续作战，这将不易变更现有局势，他苏区援助亦难消灭敌人，不易调动进攻鄂豫皖敌军。中区现正处于敌坚守据点，积极布置大举进攻，攻则集三师以上兵力来援，颇难取得在运动战中消灭他的环境。

五、因此，鄂豫皖在现时必须选择敌之弱点，首先消灭敌之一部，如无此把握而苏区尚能活动，应勿急求战，多疲劳敌军，俟造成更有把握的决战。

六、我们意见如此，望考虑电复。

周毛朱王^{〔1〕}

三十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王稼祥。

土地问题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编)

中国的土地关系与农村中各阶级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土地关系，曾经指示出“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这种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的剥削，虽然部分的存在（譬如满洲的农场公司中资本家对雇农的剥削），然而这种剥削在整个农村经济中占很小的地位，主要的剥削方式却是封建的、半封建的。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最明显的，就是地主对农民高度地租的剥削。中国的农民向地主租得一部分土地耕种，收获的时候，缴纳地主有百分之五十、六十甚至八十的地租（如江苏召山一带）。这种地租，大多数是用农产物或小部分用货币缴纳，不过不论农产物或货币，在本质上没有变更他的半封建的剥削性质。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除上述的地租外，劳役也是一种很普遍的方式。中国农村中到处还保留着旧式劳役制的残余，农民对于地主每个月内必须尽若干日的劳役，帮他的地主耕田、种菜、打扫房屋……等，稍有怨恨或反抗，即遭鞭打，地主可以随便处置农民，甚至监禁或屠杀他们。

提到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的剥削关系，我们这里必须

特别指出商业资本的作用。商业资本一般的说来，并不代表一种生产方法、生产关系，他只是商品流通的媒介，哪里有商品流通，哪里商业资本便起作用，商业资本的作用和发展，不能决定某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恰恰相反，前者是由后者决定的。商业资本在中国有了很长久的历史，差不多自秦汉以来，商业资本就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商业资本一直到现在二千多年，不但没有破坏旧有的生产方式，反之却在旧式的生产方法基础上面更加残酷的剥削农民。怎样讲呢？就因为商业资本家不管生产的方法、生产的技术，他们的目的只是把商品拿到手里，转卖到别的地方去，别不同。在地主方面来说，商业资本的发展，更加强了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因为以前自然经济的时期，生产目的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有一定的限度，但是自货币关系打破了自然经济以后，便不同了，地主需要金钱一天天增加，对于农民的剥削一天天厉害。商业资本家、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密切的勾结着——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中国的商人借款给农民取得高度的利息，或者先以货币给农民廉价预定原料及其他农产品来剥削农民，并且中国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往往是三位一体，地主给农民土地耕种取得地租，同时又出放利息做投机生意，收买农民的原料等。自帝国主义的商品侵入中国以来，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更进一步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帝国主义勾结着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来残酷的剥削中国农民劳苦群众。

在这种半封建的农村经济中，便形成了广大的农民群众（雇农、贫农、中农）与地主剧烈的阶级斗争，这是现在中国农村中最主要的阶级矛盾。中国的土地大多数集中于地主手中，而且大地主很少，小地主特别多，这种小地主对于农民剥

削更加残酷，所以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一天天尖锐。至于富农呢？中国的富农多半是兼半地主的封建性，资本主义性的富农很少，因为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残酷的剥削之下，农村经济不容易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富农如其以自己的资本去经营企业公司，还不如投资于土地、放高利贷、做投机生意获利得多，所以中国的富农大多数是和地主、商业、高利贷的剥削密切的勾结着，在阶级斗争中，富农同样是农民劳苦群众的敌人。

取消派的理论家如托洛茨基主义者及陈独秀、彭述之叛徒们，对于中国的土地关系，完全否认了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关系的存在，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封建势力已经没有了，农村中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理论完全是错误的。上面已经指出中国农村经济半封建的剥削关系，如地主、商业、高利贷的剥削，所有这些客观的事实，取消派的理论家们，都硬闭着眼睛而空口抹杀一切，这真是表示出他们是封建地主的辩护士，实际上完全取消了土地革命。

中国各党的土地政纲

首先我们来看国民党的土地问题的政纲。国民党的土地政纲，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什么是平均地权呢？照孙中山的意见，就是：要地主按照他所有的土地价格，缴纳政府一笔土地税作为公费用，政府可以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作为国家公地。这是说“平均地权”，并不是把地主的土地没收过来均分给劳苦的农民群众，而只是要地主缴纳一部分土地税给政府，因之“平均地权”实行以后，地主阶级还是存在，地主的土地丝毫没有动摇，而农民的生活一点没有改

良。至若地主缴纳政府一部分土地税，这对于农民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政府仍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工具，并且政府得了这些土地税以后，更加重了他们对劳苦群众剥削和压迫的经济能力。总而言之，国民党的“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纲，完全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欺骗和麻醉劳苦群众的诡辩罢了！

国民党除上述的“平均地权”土地政纲以外，曾提出“二五减租”的口号，即减少些地主对农民地租剥削，这十足改良主义的办法。“二五减租”丝毫没有动摇地主的土地，不过是想减轻些地主残酷剥削的程度，其实这种口号，国民党自一九二七年叛变以后便取消了。近年来自称国民党的“左派”的改组派，重新又提出了这“二五减租”的口号来麻醉劳苦群众。改组派所以提出这个口号目的是想群众知道改组派对于农民群众是“来同情”的，要农民起来拥护改组派夺取政权，可是当改组派勾结了军阀，组织了国民政府的时候，连这口号也不曾实行。这证明改组派的“二五减租”的口号，十足是麻醉欺骗农民群众的诡计；证明“二五减租”在实际上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农民只有把地主阶级消灭，才有出路。

提及中国各政党的土地政纲，我们必须指出中国第三党——社会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中对于群众的欺骗。自以为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三党——社会民主党，也同样的和国民党一般的想向群众欺骗麻醉一番，他们在土地政纲中提出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主张。这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比较国民党“激烈些”、“革命些”。然而实际上同样是一套欺骗把戏。“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口号，固然是好似比“平均地权”好些，但是究竟怎样去没收呢？用钱去收买或者以工农革命的手段去没收呢？第三党——社会民主党对于这一点完全混淆过去不说，实际上中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国民党、改组派，同样是提出“二五

减租”的改良主义的口号，来麻醉欺骗劳苦群众（如闽西苏区的社会民主党正是用这一个口号在农民群众中宣传）。这更证明他们与国民党同是一丘之貉。

总结起来，不论国民党南京派也好，改组派也好，第三党——社会民主党也好，他们的土地政纲同样是剥削阶级来欺骗麻醉群众，企图缓和农民群众对地主反抗的革命运动罢了；彻底的革命的土地政纲只有中国共产党有。因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革命的政党，他是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把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没收。被没收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权限，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分得土地，富农的土地也要没收分给坏田，一切水利、江河、湖泊、森林、牧场由苏维埃政府管理，便于农民耕种，至若全中国重要区域土地革命胜利与基本农民群众拥护之下，土地及水利宣布为国有，这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政纲，这是最革命的最彻底的土地政纲，现在中国各省苏区已经实行，和千万农民劳苦群众热烈拥护的。

土地问题是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性的；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而土地革命正是进攻地主阶级，捣毁帝国主义在中国剥削基础的唯一办法。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群众，最主要的靠山就是土地，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依靠着地主阶级，因此土地革命的成功，无疑的将消灭一切封建

势力，同时也就是消灭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

土地问题在目前中国革命发展中，更因为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而更增加它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农产品占全国总产额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生活不能改进，革命不能够成功。

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整个革命运动被推动着向前发展，譬如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土地革命占着了很重要的地位，土地革命深入的地方，如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省，也就是革命运动最发展的地方。近二年来各苏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同时推动了各地革命运动的高涨，没有广大的反帝运动，便不能有土地革命彻底胜利的保障，没有广大的土地革命的潮流，也不会有真正的反帝运动。所以土地革命深入的地方，不但遭受着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残酷的“围剿”，而且也遇着帝国主义直接的进攻与镇压，一方面土地革命的发展，不但巩固了当地工农革命的政权，而且兴奋了各大城市的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群众，激起了他们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斗争热情。譬如最近三次革命战争的胜利，各苏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影响了各大城市革命斗争的发展，便是一个证明。

取消派的理论家，他们就是不了解这一点。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时候，没有认识土地革命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提过土地问题的政纲，来动员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且当一九二七年初及夏天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农民斗争高涨，到农民自动积极的起来没收地主土地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不但没有帮助他们深入土地革命，反之勾结国民党军阀来破坏镇压土地

革命，借口农民“过激”的幼稚病，来掩饰自己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这证明他们完全对中国革命的盲目。

现在取消派更进一步的否认土地革命的存在，以为中国的封建势力没有了，农村中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更证明取消派公开取消土地革命，代表封建势力做辩护士。在本书的第一节中我们已经说明，中国土地关系是建筑于半封建的剥削上面，因之土地革命是广大农民劳苦群众迫切的要求。国民党统治以来，这种剥削关系不但没有消灭，或变成“残余的残余”（取消派的话），而且渐渐相反。因为国民党公开的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更加巩固了封建地主的统治，加重了地主、豪绅对于农民群众的剥削与压迫，因之土地革命，虽然因国民党的叛变遭受了一时的打击，必然要重新高涨，近二年的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取消派对于这些事完全闭着眼睛不看，这正是表示他们与改组派陈公博否认中国土地革命存在，一样也是无耻的反革命欺骗。

过去土地革命的错误

近二年来土地革命得着广大的发展，尤其是闽、赣、湘、鄂、粤省苏区更加深入。这几年的土地革命的确有了莫大的成绩，它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了土地。这一来大大地提高了农民劳苦群众的斗争热情，巩固了苏维埃的政权。但是在过去土地革命过程中，除上述的成绩以外，仍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如果不迅速纠正，土地革命的深入，将遭受着极大的妨碍。

过去土地革命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首先这种错误表现于右倾机会主义。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呢？所谓右倾

机会主义，就是指在执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忘记了雇农、贫农、中农劳苦群众的利益，而与地主、豪绅、富农剥削阶级妥协让步。譬如有些地方组织了苏维埃政权好久，然而没有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土地，有些地方散布着只没收五十亩以上地主的土地的口号，有些地方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平均分了一切土地，但是按照生产工具来分配的，或者照普通的办法即“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去平均分配的，即把土地分给“乡村一切男女”，不论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一律平均分配土地。结果，反革命的豪绅地主及其家属除逃去赤色区域与被苏维埃法律处决以外，都分得了土地，而且常常保留原有土地的一部分。

至于富农的土地，很多地方同样是没有没收，只是采用了对地主阶级的同样办法“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在分田的时候，富农与中农、贫农、雇农同样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田，实际上往往好的田保留在富农手中。总而言之，“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没有使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果实，反使富农甚至一些地主能够偷取土地革命果实。此外在过去立三路线统治下，许多地方不但没有平分一切土地，而且雇农、苦力及当红军的不能分得土地。这同样是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

过去土地革命另外一种错误，便是“左”倾的机会主义。什么是“左”倾机会主义呢？这就是形式上假装着极力代表雇农、贫农的利益，而实际上没有估量到中国革命目前的阶段性，没有估量联合大多数农民劳苦群众，所以结果只有破坏了革命的联盟，障碍了土地革命的深入与发展。“左”倾的错误表现于各方面，譬如，把没收了的土地不分配给农民，而叫他们起来组织集体农场，结果妨害了生产，使苏维埃脱离了群

众；或者在执行土地革命的时候，提出非阶级的“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把中农、贫农的土地一齐没收，妨碍了土地革命的深入。

“左”倾现象表现得浓厚，而且最严重的，便是对中农关系问题。过去各苏区常常看得见反中农的倾向，譬如没收地主土地的时候，把中农的土地也没收了，拿来平分，又如分田的时候，主张“富农分坏田”、“中农分中田”、“贫农分上田”。他们所以这样做是没有认识中农的本质和革命作用。有许多地方负责的同志，把富裕的中农即生活稍为好些的中农当做富农或叫做初期性的富农看待，这样便往往在反富农斗争中，损害了中农的利益，而不能争取中农，巩固贫农、中农的同盟。

“左”倾的现象同样的常常发生于反富农的斗争中。有许多地方反对富农提出“消灭富农”、“打富农”甚至“杀尽一切富农”的口号，想用武力的方法来铲除富农（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行说明），结果富农没有打倒，而倒往往打错了中农。

总结起来说，不论右倾或“左”倾都是错误的。右倾忘记了雇农、贫农、中农的利益，与地主、豪绅、富农妥协让步。“左”倾则假装着拥护雇农、贫农的利益，而实际上破坏了贫农与中农的革命联盟。结果二方面同样是障碍了土地革命的开展与深入。

怎样去正确解决土地问题

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坚决的执行阶级路线，反对一切对于地主、豪绅、富农的让步与妥协。什么叫做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呢？这就是说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时候，时时刻刻要注意保障贫农、中农的利益，反对富农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更

明显些说，土地革命应该是贫农、中农的，而不是富农的。关于这一点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上写着“土地革命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开展土地革命的力量应当是雇农和贫农，他们和中农有巩固的联盟。而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之下，必须坚决的打击富农的企图——应当实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没收教堂、寺院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依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富农的特性是兼半地主或高利贷者，所以他的土地也要没收。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些总括起来，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就是没收一切地主及大私有者的土地及富农的土地，依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分给愿以自己的劳动力来耕种土地的富农以坏的“劳动份地”。

为什么不应当侵犯中农的土地呢？这一点须特别说明。所谓中农与富农完全不同。富农是剥削阶级，而中农却是一个不剥削他人劳动，不放高利贷的自耕自种的小生产者。中农虽然有时做做买卖，甚至有时也放放利息，然而这不是他的经常生活，这些收入对于中农不占主要地位。因此中农在民权革命中是革命的阶级，他的利益不应该侵犯，所有一切反对中农的“左”倾都是错误的。

分田的时候，要注意豪绅地主及其家属不能分得任何土地，过去分了的应即收回。而或有少数参加革命的地主子弟，不应当分配土地。封建制度的附属品，和尚、尼姑、道士、阴阳先生等，凡是以宗教事业为主为生活的，概不分田，至于以农为主、以宗教事业为副的分子和受压迫受剥削的和尚、尼姑等，在大多数农民群众允许之下，可以分得土地。商人不应当

分得土地，已经分得土地的应当收回，但只限于专门经营商业的商人，至于以农为主、以商为副的不在此例。流氓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时，可以分得土地，如果分得土地而自己不去耕种，使土地长期荒芜，在大多数农民赞成的条件之下，可以实行收回其土地。参加反革命活动及反革命团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的分子，凡属于地主、富农、商人等阶层者，皆须没收其全家土地财产，凡受欺骗加入这些活动及这些团体的工农分子的土地，则不须要没收。至于贫苦工农分子在反革命团体中充当坚决分子和领袖时，则他本人的土地应当没收。至若雇农、苦力当红军的，同样的可以与贫农、中农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田，当红军的分得田后，家中无人耕种或劳力不够时，当地政府应组织农民帮助耕种，同时政府应该划出一部土地作为红军分田，分给在赤色区域无家属的当红军的士兵。至若分田的方法，要按照各地实际情形来决定，大致雇农、贫农、中农以人口为标准，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劳动力为混合标准。

总而言之，土地革命应当按照阶级路线执行，要制止一切地主、富农妨碍土地革命的企图，使土地革命的果实全部落在雇农、贫农、中农的身上，这才是彻底的。

最后土地国有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彻底的办法。土地国有可以彻底消灭农村中一切封建关系，并且使农村经济更加迅速发展。可是实行这种办法，只是必须在中国重要区域土地革命胜利与基本群众拥护国有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在目前革命阶段上土地国有只是宣传的口号。因此现在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买卖（过去禁止是过“左”的错误），不过政府同时应严禁富农投机与地主买回原有土地的企图。

土地革命中的反富农斗争问题

在没有提出反富农的问题前，我们必须首先说明富农的特性。究竟中国的富农与西欧的富农有何种重要的区别，我们认为中国的富农是兼半地主高利贷者，资本主义性的富农虽有，但是很少，西欧的富农是资本主义在农村经济的代表，或者称之为农村中的资本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为什么中国富农会具有这种特性呢？这一点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经济性质是封建的，地主、商业资本家、高利贷，在旧有的农业土地生产上来剥削农民，帝国主义在起初虽然打击了封建的生产方法，促成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然而后来又倒过来勾结着旧有的半封建地主、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障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维持他们在中国的统治。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不能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富农在这个时候，很少投资到工业里去，因为以半封建的剥削——地租、高利贷……的剥削，比投资到工业里得的利益还多些。所以中国的富农是和封建地主密切的勾结着的——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的富农始终是反革命的（过去有些同志把富农分开为资本主义性与半封建性的二种，因此以为资本主义性的富农是可以革命的——这是错误的。中国富农是兼半地主及高利贷者，这一点已经决定了富农的反革命性，至若少数资本主义性的富农，也因他和封建地主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矛盾，更加以农村阶级的分化，老早就已经与地主勾结在一起反革命了）。过去苏区斗争的经验完全证实了这种论断，当群众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及财产的时候，富农总是站在地主的方面来反对，有些富农口头上赞成土地革命，实际上则破坏土地革命。

譬如分田的时候，反对平分一切土地或主张以生产工具为分田的标准，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此外，富农常常混入苏维埃及红军中来破坏革命，勾结白军团匪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来捣乱，企图消灭红军及苏维埃政权。

根据上面的分析，所以我们在执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必须加紧对富农的斗争，要制止富农偷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要没收富农的田，分坏田给他耕种，废除富农放出的债务，要肃清富农政治上的影响。但是我们这里必须坚决的纠正过去反富农的错误。过去许多地方在反富农斗争中，提出了“左”倾的口号，如“打富农”、“消灭富农”，甚至“杀尽一切富农”——这种倾向，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该知道，现在中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的任务并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且革命客观上给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有生长的可能。所以现在我们不能消灭富农，并且自封建地主、军阀、豪绅的统治推翻以后，同时又允许自由贸易及土地买卖与转租，富农在这种条件之下，不可免的要产生与发展。消灭富农只有转变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组织国有工业、建设集体农场，才有可能。譬如苏联自十月革命成功后十二年即一九二九年，才提出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便是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打富农”、“消灭富农”，而是坚决的反对富农。怎样去反对富农呢？反对富农的方法，应该首先组织和巩固雇农工会、贫农团。雇农和贫农是反富农斗争的基本力量。我们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中农在他们的周围，来和富农斗争。其次我们要肃清政权机关及群众团体里面的富农分子，并取消富农的各种政治权利，如富农没有选举权，不能参加各种群众团体，如合作社、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及革命武装组织等等。同时，我们必须向群众宣传富农的半封建的剥

削阶级性质，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富农，制止一切富农违反苏维埃法律的种种剥削行为及反革命行动。没收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及反革命团体的富农的全家土地和财产，分配给雇农、贫农。

总而言之，反富农斗争是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不是呼呼或用命令方式可以完成的，只有广大的动员和组织全体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这种斗争，才能够完成我们反富农斗争的任务。

土地国有问题

土地国有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彻底的办法，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土地政纲的焦点。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在全中国重要区域苏维埃革命胜利及大多数农民群众拥护国有的条件之下，必须宣布一切土地归为国有。在目前土地国有只是宣传口号。为什么没收了一切地主的土地，平分了一切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以后，又要把一切土地归为国有呢？这一点首先必须说明。

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分了一切土地，推翻了数千年来地主对土地的垄断，解放了几万万的农民劳苦群众，这无疑的是土地革命的莫大成绩。但是平分土地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土地平分了变成各人私有的，在提高农业技术、增加生产力的立场上，是有妨碍的。要消除这种障碍，只有把土地收为国有。土地国有以后，政府可以统一的改良农业的技术，如关于土地的灌溉、虫灾水旱的防备等。所有这些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在土地私有制度之下，是不能够实现的。土地国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免除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现在各地分田有多有少，多的每个农民分了五担谷田或十担谷田不等，但自

土地国有以后，这种不平等便取消了。因为那一个时候，每一个农民劳苦群众都可以向政府领得一样多的田去耕种。

土地国有一般的说来，并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土地国有，只是废除了绝对地租，推翻了封建地主的剥削基础（绝对地租是由于地主垄断土地而来的）。等差地租（等差地租是由土地资本化的程度来决定的）还是保留了。不过土地国有本身仍有很大的意义。在中国，土地不但是封建地主剥削农民群众唯一的靠山，而且是资产阶级强有力的一个工具。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地主大多数是有密切联系的。资本家有一部分是兼地主，占有广大的土地，投入许多资本于土地中，而且土地买卖是中国资产阶级经常事业之一（地产交易是各大城市民族资本家基本生意之一）。因此把一切土地归为国有，不但推翻了封建地主剥削的基础，而且给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此外在农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来说，土地国有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现在苏联农业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土地国有是一个强有力的基础。因此，土地国有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经济进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先决条件。

中国农村经济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问题

但是土地国有仍不是解决农民生活彻底的办法，因为土地虽然国有了，而农村中的阶级仍然存在，雇农、贫农的耕具仍不能改良，肥料、种子仍不能办好，富农还是比雇农、贫农占优势。总而言之，农民劳苦群众的痛苦仍没有彻底的解除。如果想根本的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转变于社会主义革命，一步步组织国有工业，建立集体农场，使农村机械化、电气化，使用新式机器来耕种与收

获，使用科学肥料，用科学方法改良田地和防止灾害，如现在苏联一样，农民问题才完满的解决。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提出土地革命的前途问题，也就是中国农村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前途问题。

中国农村经济究竟是向哪里发展呢？这里可以用二种的回答，即完全殖民地的奴隶化，或者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一条道路是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纯粹的殖民地，群众将更加破产，后一条则是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彻底解放劳苦群众。这二条道路究竟哪一条可能呢？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是可能的，因为现在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均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转变。如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恐慌的加剧，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的崩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胜利，以及全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在国内方面，共产党近几年已经成为唯一革命的政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建立了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中央政府，并且苏维埃政权已经有了相当的巩固，土地革命已经有了大的发展与深入，反帝运动的巨大的发展，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已经起了领导作用等等，更加国民党的统治已趋于崩溃死亡。这些都是保障革命转变的重要条件，并且中国国内的经济条件也提出了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必要。现在因为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互相勾结而统治之下，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差不多全部崩溃，农业方面更因为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也破产的非常利害，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转变于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得办法。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坚决的争取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加倍的巩固党的领导，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加紧组织工人斗争，发展反帝运动。在乡

村中我们必须特别巩固雇农工会和贫农团的组织，领导他们和富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转变，争取最后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 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

一、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党必须尽量的把它利用，以加强群众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来反对反革命的国民党及国民党政府，它帮助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它积极的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进攻中国苏维埃，它公开的接受李顿报告书的提议为“谈判的基础”；来反对增涨着的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强盗侵略是战争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是反苏联战争的第一步。

我党是唯一的代表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群众利益的政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时，便提出了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从开始时便坚决反对对于国际联盟的幻想及国际联盟——这个世界帝国主义与瓜分中国、奴役中国的组合，这个战争制造者的同盟。我党是唯一的政党从国联调查团第一天到中国时，即提出了驱逐瓜分中国的执行者——国联调查团出中国的口号。因此，我们更应该在最广大的劳苦群众面前指出李顿报告书的凶残的面目。这个报告是国际强盗分赃集团——国际联盟的最公开、最无耻、最不要脸的文件。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在一切文字与口头的宣传鼓动之中，必须着重的

指出下列各点：

1. 这个报告书的主要的路线是企图造成帝国主义强盗（日本亦在内）的统一战线来瓜分中国，巩固与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地位，同时给别的帝国主义者一些让步，为着解除满洲及全中国的民族革命争斗的武装，为着镇压中国的苏维埃，为着狂热的准备反苏联战争。

2. 这个报告书主张“依据孙中山博士之建议，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内部建设”，即是说，公开地主张实行与扩大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国际共管。

3. 这个报告书“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实行“满洲自治”，提议召集顾问会议，组织新的傀儡政府，“指派外国顾问”及“较多的日本顾问”等等，这便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的武力的占领满洲，经过国际联盟强盗集团的承认与装潢，而成为合法的永久的占领。

4. 这个报告的目的是在完全的解除中国被压迫民众的武装，与镇压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争斗。因此它认为：那以刽子手的血腥与残酷来镇压屠杀一切反日反帝运动的国民党政府还“未曾充分制止抵货运动”，而要它“切实担保有组织之抵货运动不再发生”。因此它提议镇压满洲义勇军，解除一切满洲境内中国军队的武装，并在帝国主义的管理之下组织特别宪兵来镇压工人与农民。

5. 镇压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维埃是报告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在报告书中公开的赞助、指示、鼓励国民党政府对于脱离了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苏维埃进行绝望的进攻（报告书上说：“中国之所谓共产，则实系对国民政府为实际的对抗者，不特此也，由共党产生之扰乱，则更因中国正在内部改造困难时期而增加其严重……盖共党问题之在中国实一较大之问题，

即国家改造之问题，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因为镇压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维埃是帝国主义更进瓜分中国的先决条件，因为苏维埃红军共产党是唯一的反帝国主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6. 国际联盟在过去一年来是完全的赞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样的，国际调查团用一切方法来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以及在全中国的地位。在这个报告书中，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强盗行为是正确，根据下面的根据：（一）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需要（“吾人承认满洲在日经济发展上之必要性”、“日本不仅需要满洲市场，即全中国市场亦在需要之列”）；（二）政治上与战略的需要，即是说，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三）保护“和平与秩序”及镇压“排外宣传”与抵货运动，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在满屠杀无辜的千百万工农是认为秩序和和平之维持；（四）共产主义之存在成为国民政府的“实际的对抗者”与镇压共产主义之必要；（五）苏联的存在并将满洲转变为反苏联战争的军事根据地。

7. 但是，因为其他帝国主义在满洲亦有巨大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日本的占领满洲仅仅是更进一步的侵略中国，抢夺中国其他部分土地之第一步，所以他们提议日本应该允许别的帝国主义参加对满洲的管理与剥削，它劝告日本军阀“可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须代价而获得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更佳”。并且告诉它日本目前的政策可以“引起国际间之争夺，此种国际争夺如与相异的社会制度间之冲突，同时发生则将更形激烈”。在报告书的这部分中明白的表示出，帝国主义者恐怕在它们主要的目的——镇压中国苏维埃与瓜分中国——没有达到以前，由于自己内部因分配中国的财富不均而引导到自己间的战争。所以它提议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政府为着共同的利益来反对中国革命与进行反苏联战争。

二、强烈的揭露李顿报告书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更进一步，是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反对中国民众及中国苏区的强盗战争，是进攻苏联的准备。同时必须指出国民党的及其政府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我们必须把下面的事实在广大的群众面前指出来：

1. 国民党政府积极的参加了报告书的制定（顾维钧之参加调查团、汪精卫在北京与李顿之会面等等），他们已经完全接受国际调查团的报告，认为可以作“谈判的根据”。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及外交领袖们，都声称国际调查团报告之“公正”、“高尚动机”等等，某一些小小批评只不过是掩饰卖国工作之烟幕弹。

2. 国民党政府为着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进行绝望的进攻中国苏维埃区域的战争，来企图消灭唯一的能够与帝国主义作战及统一中国的力量。国民党的“九一八”宣言，最明白的表示将满洲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与动员一切军队来“剿共”。

3. 国民党政府阻碍与镇压义勇军的活动与被压迫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4. 国民党政府禁止与镇压抵制日货运动，特别是群众的积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货运动。

5. 国民党政府在红军因战略关系而退出的苏区中，残酷的屠杀工农，恢复地主、富农的统治。国民党政府屠杀工农、共产党员，禁止一切革命组织，非人的剥削奴役工人、农民与儿童。

同时应该强有力的火力应该集中来反对一切在野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派别，最无情的揭破他们领袖们的无耻的帝国主义走狗作用，而同志地以具体的事实与证据说服被他们影响的

群众。关于李顿报告书，我们必须指出：一些反革命派别的领袖（如与国家主义密切合作的人权派领袖胡适等）已经公开的不保留的接受报告书及其提议，别些反革命派的领袖（如孙科等）则竭力的宣传报告书中一二句词句之“公正”，并用许多激烈的批评的言辞攻击报告书某些部分，实际上亦同样是“接受报告书为谈判基础”而加以某些修正与改良。同时应该说明改良主义派别在罢工争斗中的工贼作用，在苏区中与国民党在一起进行反革命的破坏苏区的作用等，来争取广大的还没有完全消灭对于他们幻想的群众。

三、党必须使广大的劳苦群众清楚的了解：李顿报告书之后，在我们面前放着极大的新的瓜分中国的危险，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满洲、热河并上海及其他中国中心城市中的新的军事动作与进攻的危险。对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一致的努力之下将更加凶残，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在增涨——不管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报纸怎样企图否认这种危险的存在或减弱。党应更加广大的传播与为着下列的口号而争斗：“武装民众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保护和扩大中国苏维埃区域”、“为着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胜利而争斗”、“拥护苏联，实行中国劳苦民众与苏联的社会联盟”。在这些口号的周围，在揭破李顿报告书的运动中，党必须坚决地顽强地为着加强群众的反帝反日运动争斗。这里最主要的任务是：

1. 创立广大的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密切地同工农劳动者的日常要求的争斗联结起来。这个下层统一战线应该在一切的反帝争斗的形式之中实现起来（民族革命战争、抵制日货运动、反日会与某一具体行动的委员会、武装民众、组织义勇军、游击战争与群众示威等等）。缺乏广大的反帝的下层统一

战线，是上海战争党的工作的结果的薄弱及“九一八”周年示威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正因为这样，使我们不能创立在反帝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领导。我们必须看到在这方面的两种危险：第一是，机会主义的放弃无产阶级与党对反帝运动的领导，及不愿意将运动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上去。第二，关门主义的忽视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将一切不能完全接受我们的纲领与拥护苏维埃的群众，当做不能够同我们在一定的事件与我们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曾能将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领袖与他们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追从者分别开来，常常称这些追从者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走狗，而不去用同志的态度根据他们的经验，以一定的具体的证明与说话来说服他们，吸收他们参加积极的争斗。

党除了为着扩大广大的群众的抗日反帝联合会的组织而争斗外，必须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工作，到一切组织中去工作，不仅要看到这些组织的会员的多寡，而且要注意他们的影响的群众。到这些组织中及一般的在广大群众中提出我们的路线、纲领、行动纲领、提议等等，来动员群众积极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根据这个基础与按照群众的经验来加强反对卖国的国民党与一切民族改良主义者。

2. 用我们一切力量来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必须把中央最近的抵货运动决议完全的实现起来。党、青年团、工会、反帝同盟必须积极的领导这个运动，去争取排货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我们必须组织在码头上、车站上与堆栈中的工人监督委员会。我们必须广大的组织检货队检查日货，我们必须组织群众的没收日货来分配给失业工人难民。我们虽然不陷于小资产阶级的对于这个运动的幻想，但是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主要的武器，因为我们所组织的抵制日货运动是无产阶级与城市贫

民小资产阶级的行动的联系的桥梁，他可以加强反帝斗争与揭破国民党及总商会的出卖中国的面目，他可以使群众确实了解只有共产党是在各方面进行有效的反日斗争，他可以帮助我们吸收群众参加总的革命斗争。

3. 为着扩大与加强反帝运动与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去注意到在工厂与作坊中的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首先是日本工厂中的罢工斗争。在上海及其他地方的日本工厂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略及其对于工人生活的残酷进攻，造成我们活动与组织罢工的最好条件。必须仔细地努力地各方面去准备组织领导这些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并且应该最尖锐的提出武装民众首先武装工人的任务。必须把义勇军运动、组织北上决死团运动变做广大的群众运动，具体的去检查改善和领导每一队义勇军的工作与生活。必须更广大的提出援助东北义勇军的运动，并且尽力的去扩大与积极化东北义勇军的运动，争取义勇军的领导。正因为李顿报告书中企图解除义勇军的武装，正因为国民党镇压这个义勇军。

4. 在更加残酷的向着苏区进攻的面前，在增加着的反苏联战争危险的面前，我们必须一方面在苏区中进行最广大的群众动员、加强红军、改善苏维埃的工作，与创造对于中农小生产者的正确关系，来加强反对反革命进攻的力量，来积极化红军的运动，来进行胜利的攻击，来保卫与扩大苏区；另一方面，最广大的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中扩大拥护苏维埃与苏联的工作，广泛宣传苏维埃的成功与苏联的五年计划，组织各种各色群众的积极性，最密切的与准备十月革命的工作联系起来，特别应该加强在白区与接近苏区的农村中的工作，来真实的给斗争着的红军与苏区帮助。

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准备新的更大的战争来侵略中国、反对苏联，国民党政府正在用全力向苏区作绝望的进攻与镇压一切中国革命运动。只有吸收新的几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的群众争斗，只有将一切群众争斗的形式（革命战争、游击运动、罢工、抵货、兵变等等）发展与联结起来，才能击溃帝国主义强盗及其刽子手——国民党政府，才能够保护和扩大苏区，才能够阻滞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战争！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革军委关于 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

在工农红军不断的胜利与全国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帝国主义国民党用尽一切军事的、政治的及一切社会的力量向革命进攻，而我们工农红军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消灭敌人军队、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任务之下，亟应从卫生上保持全军人员的健康，来与工农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作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特此训令各级指挥员、政治人员与卫生人员，要切实的鼓励起在 frontline 摧毁敌人的精神和勇气，从卫生上来消灭现行的疟疾、痢疾、下腿溃疡等时症，要运用卫生标语、传单、讲演、戏剧、竞赛各种方法来进行卫生运动。各伙食单位的卫生委员会须立即组织起来，并建立起经常的工作，由各级卫生机关直接指导，要具体的做到下列各事：

- 一、禁止吃辣椒、水酒、生水及苍蝇息过的饮食物；
- 二、禁止赤脚（不打绑腿）、裸体，晚上必须用温水洗脚；
- 三、禁止随地便溺、解大便、吐痰，要自挖厕所；
- 四、要经常洗澡、洗衣、理发、剪指甲、洗牙，衣服、鞋袜打湿了要搭干的；
- 五、要打绑腿穿草鞋（作战部队每月发洋四角），可能时

并要穿袜套；

六、睡前要熏蚊虫，睡觉要用高铺，不要受凉、受湿；

七、要提倡各种运动、游戏、娱乐与大扫除；

八、凡患疟疾、痢疾、溃疡及其他传染病，必须离开部队入医院，或随卫生机关休养。无论因何项病症而不能随队行进者，均须设法收容安置，不得遗弃路上；

九、凡到医院或随卫生机关休养之伤病战士，每日伙食大洋二角，每天伙食尾不能超过两分；

十、凡途中到各宿营地时，各队同志及地方政府均要招待吃饭睡觉，扶助病人。

右列各项是最低限度的卫生方法，必须迅速的百分之百的去做到。以后各部队的疾病现象是否减少，即证明各级指挥员与卫生人员是否严格的实际的去执行这一卫生运动的训令。望各努力为要。此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蔷^{〔1〕}

彭德怀

总军医处长 贺 诚

十月十日于广昌城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
工作·文献》（1）刊印。

注 释

〔1〕即王稼祥。

中共中央关于 组织失业运动日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

中国经济浩劫的深刻化，加以战争灾荒深重的打击，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党统治残酷的剥夺，资产阶级疯狂的进攻，使中国工人失业问题现在已发展到空前未有的范围，使全国千百万的劳苦群众从工厂、矿山、作坊、农村，潮水般的驱逐到失业、寒冷、饥饿、死亡的地狱。而中外资本家企图把危机的重担转嫁在工人的身上，借口“产业衰落”、“沪战损失”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大批的开除工人，关厂，掉通班，与取消工人的劳动条件，同时国民党一再发表罢工禁令，宣布进一步压迫工人的“强迫仲裁”的法律，命令军警拘捕屠杀，用尽一切手段来镇压在业与失业工人的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更引起失业工人斗争猛烈的发展。这些斗争常常由和平请愿的方式，很快的转变到占据工厂，包围写字间，拘留资本家，以至与国民党军警直接冲突（如上海的三友、云裳丝厂、南市公共汽车等）。目前失业的斗争将随着饥饿、寒冷的冬天而更高涨起来。如果认为现在失业斗争已经停止，都惨遭失败，这是绝对错误的。

但是，必须严重的指出，党与赤色工会对于领导失业工人

斗争、组织失业工人是远落在失业工人斗争的积极性的后面，党对于失业工人的联系是它最弱的一环。各地党部是没有执行中央关于失业决议的指示，彻底的消灭对于失业工作机会主义的消极，没有动员整个党、团和赤色工会的组织去坚决组织和领导失业工人的斗争，因此，失业斗争在上海、北方及各地虽然是激烈的发展，但大部分是自发的、独立的、个别的而没有联系，没有得到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所以有些斗争仍然可以被国民党黄色工会用请愿调解与仲裁等方法来压迫缓和和出卖了的。斗争还没有由个别的汇合起来，反对资本家走到反对整个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社会局、工部局、中外的商会要经常的救济和完全工资的工作。党容许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停留在自发的无组织的状况中，还容许国民党黄色工会在失业工人中玩把戏，不去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根据某地的具体环境，提出具体的口号（如要米、要救济、要开厂恢复工作、反对驱逐出工房、反对自来水加价、没收日货等），坚定的有系统的去组织去领导失业工人的日常斗争，动员千百万的群众向着整个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斗争，在斗争中揭破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欺骗，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消极。因此，使国民党社会局、黄色工会还能够装作失业工人的“朋友”的样子，发一点米票来企图缓和失业工人的斗争，发一些船票来企图将失业工人由城市驱逐到破产的农村中去饿死；使国民党还能够对上海三友失业工人的斗争宣布“养电”，企图在“强迫资本家开厂”的口号之下解除三友工人的武装，将他们真正的开除出去；黄色工会还能够玩着假装要宣布同盟罢工来援助三友，以及在商务书馆工人中欺骗工人去打官司等把戏，来消灭工人斗争。而最近国民党又宣布欺骗工人的对于工人毫无救济的“失业救济计划”，来企图解除工人

的武装，将日益发展的失业斗争缓和下去。

中央重复的指出失业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在目前饥饿寒冷已经到来的冬天中，失业工人饥寒交迫的痛苦是更加残酷，他们将更要在饥饿死亡里、从斗争中寻求革命的出路。共产党员的任务是要坚决的与对于失业工人运动机会主义的消极作斗争，抓住失业工人的痛苦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组织领导千百万的失业工人为要米、要工作、要救济、要棉衣被服、要房住以及反对赶出工房等日常的斗争，领导他们斗争的火力向着整个的国民党、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作斗争，将失业斗争与在业工人的年关斗争、反对开除、年关双薪等一切日常经济的斗争、罢工联系起来，去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加强反帝斗争，争取党在无产阶级中最穷苦最受压迫的广大的失业工人，是党目前一个主要的任务。为着真正开展党在失业运动中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发展失业斗争到更高的阶段上去，中央决定在来年一月十八日（即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全国的失业运动日，动员千百万的失业工人为反对饥饿、寒冷、失业、死亡而斗争，动员广大的失业工人向国民党、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举行群众的示威，争取失业工人实际的得到救济。

失业日主要目的是：提高失业斗争到一高度，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围绕着这一任务，把这天当作推动失业救济的要求到最前线的一个集合群众的中心。不要把这失业日看为失业运动的顶点，不要看为只是一个示威，必须用尽力量发展失业群众的斗争，在建立失业工人群众坚强的基础上来使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有组织的群众的示威运动。因此，一切党、团、赤色工会的组织应在这个运动中动员起来，到群众中去，动员广大的群众来完成这个任务。

二

在准备失业日的工作中，必须根据两个月的经验和教训严重的指出党对于失业工作的错误与缺点，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纠正这些错误，集中火力反对对于失业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和关门主义，这是完成失业运动日斗争的前提。

中央通过了失业工作的决议以后，各地对于失业工作是没有真正的进步，虽然各地是接受了中央的决议，但实际上依然是没有改正对于失业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这必须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警惕的。两个月的经验中表现出主要的弱点在哪里？

（一）没有动员党、团、赤色工会整个的组织来进行失业工作。这不仅是没有将下层的工厂支部每个同志、赤色小组、失业会员的极大的积极性、创造性动员起来，依靠着他们来完成这一任务，而且上层的指导机关也没有以整个的组织来执行这个工作（如江苏及各地的省委、全总工联党团、青年团），而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将失业工作交给几个指定的工作人员，而整个的组织是站在失业工人斗争外面的。两个月的工作严重的警告我们，不动员党与群众整个的组织，不动员下层组织的积极性，是不能执行这个任务的。

（二）党的决议案只停留在纸头上，并没有执行到实际的斗争中去。现在还有些党部、团部、工会党团、工厂支部是没有详细讨论的，或者只是上级党部知道和讨论，但并没有根据在各工厂各工房内失业工人的斗争与群众的经验，使党的团的下层单位来讨论和贡献意见，使上级的决议充实起来变为实际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见各省委、上海工联和全总的

党团，根据中央的决议纲领去与广大的群众讨论，定出一更具体失业工人的要求纲领，坚定的方针及具体的计划，根据一些重要的斗争（如上海的三友、商务、公共汽车等）去单独的提出更清楚的纲领，使党、团、工会的群众在一个一致的纲领之下行动起来。

（三）没有将我们最坚强的力量放在中心的斗争中去（如上海三友、商务、丝厂、公共汽车、兵工厂等），积极的去领导这些斗争，夺取斗争的领导在党与赤色工会之下，没有去坚定广泛的组织各区各工房广大失业工人群众中的日常斗争、部分斗争。许多斗争我们是放弃了的（如上海兵工厂、南市公共汽车等），如上海的党与工会对于组织上海失业工人向社会局要米、要救济的决定，根本没有采取一些具体的办法，没有动员群众，以致这工作完全落空。党、团和赤色工会没有领导失业工人向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工部局、中外商会去坚决的斗争，以斗争的力量去实际得到救济，放到工人阶级的前面。

（四）失业工作不是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采取最广大群众路线，争取公开的活动，用具体的口号去动员千百万的失业工人起来斗争，利用各种的方式在工厂中、工厂的周围、工房、弄堂、失业工人居住的地方、登记处、码头、茶馆等地建立广大的群众的失业委员会，而是采取关门主义的路线，狭隘的组织几个人的失业小组（如上海青年团所组织的），甚至找几个同志和赤色工会的会员来成立。失业工作不是建立在广大群众的基础上，而是限制在上层的党内的几个工作人员和工作委员会里，惧怕群众是走狗、流氓、AB团（如商务），甚至我们所个别领导的胜利的斗争（如上海日华工房、反对自来水加价、英华里反对驱逐工人出工房），也不去成立失业工人

的组织。

（五）失业工作只是偶然的进行，不是继续地坚持的去作。各地的失业工作除上海外，各地是还没有开始。上海党、团、工会担任失业工作的专门的委员会，有许多地方党部还没有成立，即使成立起来的，也不是去发展和领导一个广大的失业运动，也没有去动员党的团的工会的每个组织去进行工作，却将失业运动都交给失业工作委员会去作。而失业工作委员会的本身，也是空洞的没有什么工作与计划，而是脱离群众的（如全总的失业负责同志也不了解商务和南市公共汽车斗争的具体情形），工作方式还是命令主义包办群众斗争的。

（六）在在业的和失业的斗争之间没有充分的联系（在上海尤其是在纺织工业里，在公共汽车的罢工中也是如此）。

（七）没有以没收日货来救济失业工人来动员失业广大群众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这一工作坚决真正的执行，无疑的能够动员广大失业和在业的工人群众的斗争，加强反帝运动，能够动员广大小资产阶级拥护失业工人的要求与在抵货运动中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的。

（八）关于失业的群众的宣传材料是极其微少的。没有将我们的斗争纲领口号通俗化的深入到群众中去，没有为失业群众出版一种经常刊物——《失业工人》（这种刊物可拿三友、商务等工人实际的斗争做该刊物的中心材料），虽然全总是有过决定。

党、团、赤色工会必须彻底的克服我们的弱点和缺点。只有与失业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关门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彻底转变失业工作的领导与动员，才能完成失业运动日的任务。

三

要完成这个运动，中央提出下面的几个主要的任务：

(一) 一切党的组织和工厂作坊中的工会，应该讨论失业日斗争的纲领，应该认识中央的决议是一个全国的总的指示，各地应该按照每个工厂作坊、失业团体、工房等特殊情形定出具体的计划，以发展各地失业工人的斗争。这些斗争要在下列的基本要求的周围将广大的群众动员起来：(1) 要求由国民党政府、雇主与帝国主义者出钱给一切失业工人的失业保险。(2) 立刻由国民党政府、市政府、厂主发给现金、食品、衣服的冬季紧急救济（这个要求在每一个区域、弄堂要变成特殊的形式，要使它适合于当地的当时的条件）。(3) 失业保险与紧急救济的基金应由下面取得：（甲）一切进攻苏区的军费；（乙）拒付一切外债与战债；（丙）没收军阀及卖国贼的（如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等等）的财产；（丁）国民党进攻苏区的美麦借款五千万元，付给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的一百万元，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的四十万等，应该立刻全部移作紧急失业救济金；（戊）没收大堆栈的粮食交给失业工人；（己）没收日货交给失业工人。(4) 反对开除工人，反对关厂、掉通班，减少工作时间不得减少工资；反对加重工作，限制工作的速度，要求工作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禁止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劳动，这些儿童应由政府维持其生活（揭露虚伪的国民党的工厂法）。(5) 不准因为不付房租而驱逐失业工人出屋，要求政府给失业工人付房租。房主的大房东的房屋要求根本不付房租。(6) 要求给失业工人工作，得完全工资。假使不在他经常工作的地方，那应该给失业工人特殊的工作——如建

筑失业工人及其家属的工房、饭堂、医院、收容所等等由国民党中央及地方政府出钱。反对强迫劳动，反对修筑进攻红军的“公路”。

各地党部及工会的党团必须根据这些中心要求，根据各地情形，与广大的失业工人群众讨论各地各厂的具体要求纲领，组织工人在这些要求之下坚决的斗争。在发动失业日的示威运动中，不是把我们所有知道的要求提出，而是要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集中到几个最中心的目标上去，而实际的得到救济。

（二）失业的斗争，失业日的示威运动的发展，应当是有组织的进行。发展失业运动最好的方法，是要在工厂中、工厂周围、工房中、弄堂中、码头上、登记处、失业工人居住的地方、去领救济金的地方（发米处等）以及茶馆等地，组织几十个几千百个失业工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不是几个人的小组，几个同志，而是应该包括在一定地方的一切失业群众的委员会，团结他们在要求紧急救济的周围。他们应该讨论和定出具体的要求，由群众选举一个委员会来领导群众的斗争，发展一个为示威而有的胜利的运动。失业委员会不是临时的，也不仅是为示威的组织，而是要成为领导群众作斗争、拥护全体失业工人利益的组织。各地党部应当认为失业运动日是各地广大的组织群众的失业委员会，建立及加强失业委员会工作的一个总的动员的日子。

无论在任何地方，应该产生在业和失业工人的工房委员会，以领导在业与失业工人为反对开除、要求减房租等斗争。各级的赤色工会、革命反对派应该组织失业工作委员会，来吸收失业工人参加工会和反对派，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发展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斗争的统一战线，争取失业工人的要求，帮助失业工人到处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以及动员在业工人来

参加失业日的示威运动。

发展失业日的斗争和示威，必须在下层的坚强的失业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各地方各区域的失业代表会议，这是各单位代表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代表会应该包含各失业委员会选出的代表，赤色工会、革命反对派以及其他工人阶级组织的代表。代表会必须统一各该区域的各个失业委员会的工作，领导与指示他们的工作，并且应该成为在业工人斗争与失业工人斗争间的密切联系的组织方式。代表会的目的，是指导各区失业斗争到广大的范围中去，发展和领导该区全体失业工人的示威，团结广大的工人在直接要求的范围，并且向着总的失业要求、总的示威而斗争。他方面，加强这一区的工作到广大的以至全城市范围的基础上去，同时须给该区的每个失业委员会的斗争以密切的注意。

为了领导团结千百万的失业工人群众向国民党政府社会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致的斗争，为了领导总的失业日的示威运动，在重要的城市里（如上海、唐山、北平等地）必须建立全市的失业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要包含各区的失业代表会，而全市的整个产业的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必须派代表参加。这个代表会应该计划各区城市范围的斗争，提出向市政府的要求，定出为总的要求的斗争纲领，发动全市工人总的斗争，准备和领导全市失业工人总的示威运动。

在建立失业工人运动的这些组织时，首先必须要严重的打击关门主义的错误。必须无情的打击惧怕群众，认为失业工人是流氓、走狗、AB团、第三党，不去以同志的态度来对待和说服群众，而将黄色工会一切反革命的领袖和被欺骗的群众看为一样的东西。凡是有失业工人群众的地方都要去进行我们的工作，不管它是哪一个黄色工会的领袖和哪一个反动派别所组

织的，不管它和我们现在还没有联系，我们要把一切的失业的群众吸收到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去建立失业工人的组织，建立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必须纠正我们的包办命令的方式，要坚决的吸引失业工人的积极分子来进行领导的工作，要启发失业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党的领导不应束缚这个运动，而是要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来进行这一运动。

（三）在我们的一切组织中和斗争中，我们应当为失业工人群众获得真正的救济，地方的和全国的斗争都应当朝向这一目标进行。发动各地的失业工人来参加失业日的斗争，不应该只是一个一般的煽动反对失业痛苦和反对国民党能够完事，而是必须指示和领导失业群众达到获得救济的目标，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部分斗争而取得胜利，这样，我们才能夺取更广大的群众来参加失业的斗争，参加失业日的示威运动，在运动中创造一个顽强的力量来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和提高失业运动到更高的阶段中。因此我们在总的斗争的要求纲领之下，我们必须根据地方的条件，制定许多直接的部分的要求，去吸引更多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斗争。这些要求一般是：（1）立刻发给年关的现金救济、食米、棉衣棉裤、鞋袜、被褥；（2）由政府、厂主创立饭堂、收容所、避寒所，由工人自己管理；（3）给失业工人家族以经常的金钱的救济；（4）公共的住房给无家可归的失业工人居住；（5）发给燃料煤炭；（6）关厂停工的期间工资照给；（7）反对一切押迁出屋，减少或免除一切房租及租税；（8）要求国民党社会局、黄色工会等手中的救济金账目公开，工人创立工人委员会来管理支配。

在进行这些斗争中，不是我们总的和部分的要求一般的提出，而是要抓住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将要求集中到一个两个最简单最清楚的要求上来，动员群众为日常利益而斗争。从日常

部分斗争中，从实际的得到利益的斗争中，扩大汇合群众的斗争到总的要求和斗争上去。

(四) 在进行失业日的工作中，我们必须特别加紧抓住各地的中心斗争，建立我们真正的坚强的基础去推动其他的斗争。如上海三友工人在失业运动中有了特殊的地位（罢食，国民党养电，黄色工会号召同情罢工的把戏，一切工人有真正的群众的同情，国民党法庭的欺骗等），我们应该定出一个特殊的大纲以吸收他们到失业日的准备中来，并且在那一天实际参加我们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在三友工人的里面外面进行坚定的工作，三友的同志必须加强他们的鼓动，揭穿那个“饥饿仲裁”的阴谋，号召一切失业工友站在一个统一战线上要求救济，要求全体复工。赤色工会和党必须为三友斗争发出单独的纲领和宣传品，指出他们被出卖，指出国民党养电和仲裁的欺骗，和告诉他们以斗争的正确道路。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发展一个广大群众的运动，这种运动会帮助他们得到要求，他们不可单独斗争，而是要为反对饥饿反对开除的更顽强的进攻起见，必须与其他有组织的失业工人建立统一的战线。在商务、公共汽车、兵工厂工人中，我们也必须集中力量去进行。估计到丝厂年关照例的停厂和纱厂年关大批的开除，应该从现在起去努力进行工作。在外省也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抓住几个最中心的斗争（如上次中央所指出的）去推动整个的工作。

(五) 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的革命反对派必须提出要求救济、要求工作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揭破国民党“救济失业计划”的欺骗、仲裁、调解的把戏，揭破黄色工会骗子的黑幕，指出他们如何帮助国民党使工人继续的饥饿下去。在每一个黄色工会中，反对派必须定出一个救济失业工会会员的纲领，号召他们起来自动的建立失业委员会，与国民党、资本家、黄色

工会斗争，吸引他们参加我们的失业日运动。党与工会尤其是革命反对派，必须在每一工会如上海的邮务、药业、商务、码头、丝厂、报馆、电车等工人中作特殊的宣传，号召他们参加失业日示威。为了这缘故，我们必须召集赤色反对派的党团和赤色工会所领导下的各个革命反对派的会议，讨论失业日工作，把党的决定运用到黄色工会的群众中去。

（六）在一切斗争中，我们最大的注意力要吸引失业的和在业女工、青工和童工到斗争中去。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为他们提出特殊要求，领导他们在斗争中实现这些要求。中央责成青年团、全总党团必须将过去已经提出的要求，在广大的群众讨论中，吸引下层组织的所贡献的意见，迅速的充实和完成。

（七）发动失业斗争，必须与在业工人斗争的密切联系。党与赤色工会革命反对派必须加紧去发动在业工人、女工、青工的年关斗争，领导工人反对开除、关厂、掉通班、开三日班，反对减少工资、加重工作，要求年关双薪，要求社会保险等斗争和罢工，与失业的斗争密切的联系，吸引广大的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一起来举行示威。

（八）完成失业日的运动，真正的动员党、团、工会下层组织的积极性，有决定的作用。（1）首先要在党的组织中——尤其是工厂支部中来讨论这个运动，动员每个党的单位应该集中力量组织一个以上的失业工人委员会，动员每个同志去进行失业运动，组织失业工人的斗争。不仅上层的机关要真正的执行中央上次的指示，而且在每个工厂里、工房里、弄堂里都要由支部同志指定专门进行那些地方的工作。（2）在赤色工会革命反对派的组织、青年团的组织中也要同样的进行，并且更要将党的纲领使它通俗化。（3）在下层的积极性的基础上，去深入

到广大的失业群众中，召集失业群众的各种会议（群众会、代表会等）来讨论这一运动的纲领，发展群众的日常斗争。（4）汇合各失业委员会的斗争去进行地方的斗争，在各区进行广大的群众大会、飞行集会及分区示威运动。要在这些工作的艰苦的进行上，去进行失业日的一个中心的总的示威运动，提出群众的要求，向上海市政府工部局斗争。在外省如果有可能也这样的进行。党与赤色工会必须认识失业日不是斗争的顶点或结束，是创造失业工人争取实现要求的更伟大的斗争标志。

（九）我们必须坚定的建立失业工人的刊物（如《失业工人》等），在每个方式的群众鼓动工作加以最大的注意——失业刊物，传单，标语，口头煽动，喊口号，工厂会议。我们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失业委员会，不应仅只推广一般的党的宣传，而且必须各自发展他们单独的传单，以对付在他们的区域中关于失业的地方的以至最小的特殊问题。整个的城市必须如洪水一般的充满失业日的宣传。

在这些宣传中，我们不仅将要求通俗化，指出工人斗争的出路，并且要指出在国民党白区失业工人的状况和苏区工人生活来相互对照：苏联没有失业工人，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有五千万以上的失业工人，在中国更有几千万的失业工人和灾民，说明这是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提出反帝的口号，揭发李顿报告书，反对瓜分中国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耗费千百万元去进攻真正将工人从失业死亡中解放出来的苏区，而看着白区的千百万的失业工人饿死。使失业运动与反帝斗争、拥护红军苏维埃、拥护苏联的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

这一决议，各级党部必须详细的讨论，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形，具体的决定各地的工作计划，尤其要使之更通俗化、简单化、具体化，召集各种的会议（如区书联席会、区委会议、支

书联席会、支部会议、党团会议等)，保障这一决议真正的深入到支部和群众中去。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红一方面军建黎泰战役计划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

第一，情况判断：

照一般说来，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反动统治阶级，进行对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是利用各苏区联系不易，配合差欠的弱点，逐次转移重兵来实施其各个击破的计划。我们看敌人逐次对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等转移攻势，虽未能如其所愿，然而他上述的计划实已显明。敌人对鄂豫皖进攻的部署，是于某些方面扼守支点，某些方面使用并列的几个强大的挺进纵队，深入苏区，寻找我主力求战，再以其政治工作的兵团，逐步推移。这一部署，是敌人在每个苏区屡遭红军各个击破和消灭的结果。在目前敌人迅速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时，转用到中央区是极有可能的，并且现在已开始要调动部队增援江西。可是，对中央区的这一部署未完成以前，各方大半都是扼守支点，以小部进扰苏区，阻我主力出击，企图以包围阵势配合经济封锁，遂行其合围并进的“围剿”计划。

现在敌军配置（略）。

第二，战役纲领：

本方面军为要策应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作战，乘敌人上述部署未完成的时候，击破敌人一方和联系东北红军起见，拟出敌不意迅速而同时地消灭建宁、泰宁、黎川的敌人而占领其地域。占领泰宁的兵团，并于占领泰宁时即刻发出一个相当的兵

团直趋邵武，沟通崇安红军。该兵团任务完毕，即归还建制，其余各兵团在达成以上这些任务后，应赤化所在地域及征集红军所需的资材，以利于此后的战役，但须集结主力，常作战斗准备和集中姿势。

为遂行上述任务时，敌人如从南城、南丰方面（甚或伸到广昌）并列向黎川进攻，则我军向建宁集中而攻击其右翼侧；敌人如从北向南并列进攻苏区时，则我军向建宁集中与之决战于广、石、宁中间的地域。

其他沿苏区边境之作战地区的军队，都应向敌人后方，特别是沿其交通干路的后方，普遍发展游击动作，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瓦解敌人军队来减弱和消失敌人进攻苏区的能力。这些军队的干队，须集结游击于敌人的交通干路。

第三，诸兵团前进开始的地位：

1. 第一军团——头陂。
2. 第三军团——广昌。
3. 第五军团——甘竹。
4. 第二十二军——巴口桥。
5. 总司令部——广昌。

第四，纵队区分及其应取的道路：

1. 第二十二军为右纵队，应具有消灭梅口铺、泰宁敌人，并出一部兵力直趋邵武，沟通崇安红军之目的，取道尖峰、客坊、均口、梅口铺向泰宁前进。

2. 第一军团为中央纵队，应具有消灭建宁、里心敌人，并派一部兵力到康都向南丰掩护建宁之目的，应：一经广昌、水南、里心向建宁前进，一经白水、尖峰、客坊、黄泥铺、水溪口向建宁前进。

3. 第三军团为左纵队，应具有消灭黎川敌人之目的，取

道千善、康都、西城桥、横村向黎川前进。

4. 第五军团为战役预备队，应具有援助一军团第二十二军消灭建宁、泰宁敌人之目的，取道千善、傅坊、蛟洋、建宁、楮树下，于十九日到达梅口铺以西地区，策应二十二军的行动。

5. 总司令部随第一军团取道水南、里心道路前进，占领建宁后，拟移建宁北之安仁。

第五，诸纵队前进的实施：

诸纵队统于十月十六日各从所在地开始前进，其并列前进的日期、地区，如诸纵队向作战地域前进计划表。

方面军诸纵队向作战地域并列前进计划表

日期	部队地点	左纵队	中央纵队	右纵队	总司令部	总预备队	附记
十六日		石咀	广昌、白水之线	客坊	广昌	千善	中央纵队一路在广昌及其以东地区之线，一路在白水、营前之线。
十七日		西城桥	癸洋、客坊之线	均口	长桥	宁家源	中央纵队如癸洋房子不够，一部应进至癸洋以东宿营。
十八日		黎川	建宁	梅口	马鞍道	建宁	
十九日		黎川	建宁	泰宁	建宁	梅口	
二十日		就工作地区	就工作地区		安仁	泰宁	
二十一日		同上	同上		安仁		

第六，预定兵站线：

兵站线暂时仍旧，不过由广昌延伸到建宁一段，应取道总司令部所经过的路线，此后应筹备下述的两条兵站线：

1. 安远市、石城、固厚、曲阳到后方办事处。
2. 安远市、宁化、沿冈圩、壬田到瑞金。

第七，赤化所在地域和征集资材应注意事项：

1. 这一战役达到主要任务后，应以一部实行赤化所在地域和征集红军所需之资材的工作，而主力应集结备战。

各军团主力集结地域及其分布地域。（略）

2. 各兵团除一般侦察外，应有计划地派出侦察队接触敌人，以利适时集中。

3. 应有计划地繁殖游击队，并使之健全起来，成为巩固当地苏区的主要条件。

4. 征集资材以不妨害发展阶级斗争为主旨。

附记：

1. 各兵团须各就行动地带，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并应便道消灭路上的白军匪团。

2. 各兵团须注意对空防御，尤其是要隐密我军企图。

总司令 朱德

总政委 毛泽东

代总政委 周恩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 关于宁都会议经过的简报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周朱王⁽¹⁾同志：

此间起草下列致中央电稿，特征求你们同意拍电，望即电复你们意见以便拍电。中央局在宁都所开之全体会议经过，简要报告如下：

(一) 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中央局在今年六月根据中央指示电所通过之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决议的全部精神与指示信吻合的。

(二) 认为在今年采取积极向外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策略，以及六月决议揭发过去党大会前后中央局所犯错误后，中央区一般的表现有相当进步。

(三) 对二月后几次战役的估计，认为攻赣州和南雄、宜乐战役，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攻赣州本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致未能克城而撤围。

南雄战役中，对敌迅速增援估计不足，特别是犯了分兵错误。乐宜战争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

利，且遭敌在宜黄之袭击。以前三军团过河西也犯对形势估量不足及分散主力的错误。最后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但经过中央局反对已停止，并未执行。会议中批评泽东^[2]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

（四）由于苏区与红军胜利，白区革命斗争急剧发展，敌人在四次围攻中，现正布置大举进攻中区。会议中经过讨论后，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认为需立即有紧急充分动员，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五）为着实现这一战斗任务，主力军须首先向北面敌之弱点出击敌人，包围一面，争取充分动员准备工作开展胜利的进攻敌人，艰苦动员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以最大努力扩大和巩固红军。十月到十二月三个月内方面军增加战斗员二万三千人，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独立师团三个月内增加新战斗员二万三千一百人，以大力扩大与巩固苏区。特别向北一线发展组织，建立广大游击队，深入白区游击，创造新苏区，并打通赣东北及与河西联系，加强对河西及湘鄂赣的领导，整顿和扩大赤卫军、少先队与游击队。筹款三个月战费，除收足土地商业税、加紧节省运动外，并准备再发一次公债票。前次公债票于十一月内可由土地税项收回。建立巩固后方组织，加紧肃反工作，切实建立白区白军中工作。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同时要反对不认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忽视与放松充分动

员群众工作的严重错误。

(六) 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到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周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因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周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在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中 央 局

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朱德、王稼祥。

〔2〕即毛泽东。

中革军委关于节省经费， 战胜敌人进攻的训令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建宁)

由于中国工农红军不断的伟大胜利，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日益发展，全中国革命运动的猛烈增长，帝国主义者现在正更公开地、直接在那里指挥与帮助中国的地主与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阀，在四次的“围剿”苏区与红军，积极的布置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

充分地动员准备一切力量，坚决的、胜利的进攻敌人，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以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我工农红军及全苏区工农群众当前的主要的紧急战斗任务。

广大地征集资材，各方面地积极充裕消灭敌人的作战经费，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充分的总的动员力量之一。因此，节省经费在目前实有很伟大的意义，现在后方各苏维埃机关及群众中正在那里进行广大地节省运动。为了这一工作，他们正努力实行缩减公费，减食一日两餐；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开销，并且在群众中进行广大的节省一切费用捐助红军的工作。

在前方的各红军部队，近来各项开支常有超过规定数目的，这在目前实为不可容许的现象，现在应该即刻进行节省运动。兹特规定节省经费的办法如下：

1. 尽量减少特别费及杂支，除急需品——如制冬衣之棉花、布匹及无线电用之汽油……等外，可不必购买。超过二元

以上之特别支出，连、团及师直属队，须事先得师长及政治委员之许可与军需处之同意然后开支，军及军团直属队须事先得该级主管指挥员之许可与该级经理机关之同意然后开支，否则概不准报销。

2. 西药仍须由本会总军医处统一购买，各级军医处和卫生队事先非得本会军医处之许可，不得自行购买（特别情形在外）。

3. 马匹超过规定数目的和弱小不能用的，统送后方，以节省马干费。

4. 各部担子数目，非系重要办公用品，不得自由增加超过本会以前训令内所规定的数目，以减少伏费。

5. 各部队夜间灯盏，于吹熄灯号后，除留特别需要者外，须一律熄灯。在苏区内洋油异常缺少，价值昂贵，除非高级指挥机关办公及夜间传达外，一律用茶油点灯，不要用洋油，以节省办公费（另外节省洋油的意义还能留作无线电充电用，白区内洋油很多的地方，价值比茶油便宜，当然点灯可用洋油）。

6. 各部队之办公费，应按本会经字第六号训令规定之数目使用，绝对不能超过。

各部队接此训令后，望切实执行，并望更具体地规定一些节省办法，并须作广大的宣传，在所有战斗员中造成广大的节省运动。这样来集中我们的经济力量，用于胜利的进攻敌人，以消灭敌人进攻的决战方面，以完成我们目前的伟大任务。

此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蔷

彭德怀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革军委给各作战地域 指挥部的密令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为着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和对中央区的大举进攻，我们一定要在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之变化愈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运用去年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改正过去许多战役中的错误和缺点，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同时必须估计到敌人与我红军作战，兵力增加多了，且接受过去许多惨败的教训，尤其是得到帝国主义更多的帮助和指示，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紧张和努力地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在这一切部署中，我们不应只看见军事力量的对比，“专凭红军打天下”，而应深刻注意从政治上动员苏区内外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瓦解白军，争取白军士兵，一致来参加和发展民族革命战争；不应如以前只注意布置苏区内的工作，而应加紧布置白区的工作；尤其不应只管中央区红军的行动，而应注意全国苏区红军，特别是赣东北、湘鄂赣、湘赣等苏区红军的配合。我们要了解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和对中区的大举进攻，与消灭敌人军队，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任务。

二、目前敌人还没有完全布置好对中区的大举进攻，但正在加速这一布置，如敌人现正用大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并更加紧地进攻赣东北与湘鄂赣，十九路军进占龙岩，粤军一、二两师向赣州集中，蒋介石有调两师敌军增加到江西来的消息，北面敌人集结着准备随时可以阻止我军的出击，并且敌人更加速地修筑包围与侵入中央苏区的汽车道，建筑沿苏区四周的坚固的工事，加紧组织苏区边境的民团，努力摧残环绕着中央苏区的游击区域与赤色支点，实行最高度的经济封锁，派遣大批敌探与组织反革命派侵入苏区，用金钱来诱惑我革命队伍中极少数的动摇的阶级异己分子，不断地向苏区群众散布欺骗的武断的宣传品，以及迅速地解决他们自己队伍中非嫡系的部队，尤其是表现动摇不满的士兵群众。这一切都是敌人大举进攻中区的重要步骤，并表现与三次战役时所采取的步骤有很大的不同，敌人正在各方面加速这一布置。我们要认识阶级战争的严重性，要采取一切方法来破坏敌人进攻的准备，来争取这一战役的全部胜利。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以集中的力量给敌人弱点以最重大之打击，来各个击破敌人。同时在各个战线上，须根据现有根据地迅速武装全体劳动群众，建立和布置各个基干部队与指挥系统，才能创造更广大的防御线，来组织防御，以击破敌人进攻，消灭解除敌人武装，并组织在白色区域的战斗，去阻止敌人，使它不能集中过大的力量来进攻我们。这样，才能达到尽可能的消灭更多的敌军，争取动摇与不满的白军士兵、白区群众，扩大苏区，并与各苏区红军求得密切联系。对于后方，我们更应建立在巩固的得力的地区，并准备必要时的迁移。我们要保证必要时后退路线的完成与安全。

三、根据上述任务来部署军事，首先要了解红军兵团与地方武装的运用。红军兵团特别是基干兵团（如方面军），应依

照国内革命战争的要领，集结而灵动地逐次给敌人弱点以致命的打击，各个消灭敌人。地方武装则应武装全苏区劳动群众，分布在各个战线上，钳制敌军，分散、疲惫与瓦解它的兵力，使红军各兵团，得以行动自如，更容易完成它的任务。

四、我们估量敌人这次用兵的大概方向如下：

1. 南昌、抚州、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到瑞金是北面敌人最重要的主作战线，由广昌经石城到瑞金，是其支作战线；

2. 抚州、宜黄经东陂、洛口是向宁都的支作战线；

3. 乐安经招携、中村、黄陂是策应攻宁都的支作战线，或经君埠、良村是策应攻兴国的支作战线；

4. 沿赣江下游吉水、吉安经富田、东固、崇贤是赣江敌人进攻兴国的主作战线；

5. 永丰经荇田、沙溪、龙冈、约溪、良村是进攻兴国的支作战线；

6. 万泰经沙村、老营盘，是进攻兴国的支作战线；

7. 赣州向兴国进攻是粤敌的主作战线，或赣州向于都进攻，以策应信丰的进攻；

8. 由信丰向于都进攻，以三南入安远为其策应的作战线；

9. 经寻乌、会昌，是进攻瑞金的支作战线；

10. 由上杭向汀州是粤敌协同闽敌进攻瑞金的主作战线；其由武平经闽赣边境是其进攻瑞金的一个策应部队；

11. 龙岩经杭连向汀州是闽敌主作战线；

12. 其余则为闽北一些进扰苏区与红军的部队。

在上述各线中，以一、四、七、十二为赣、粤、闽三方敌人之主要进攻方向，宁都、兴国、于都、汀州是其主要进攻目标，瑞金是其前后的、共同的目标，其中尤以南丰、广昌、宁

都一线，依地形与反动势力尚未肃清的条件看来，当为北面敌人最便于利用的进攻方向。

五、依据中央区现有的根据地与敌人这次用兵的大概方向，我们划分下列三个作战地域：

第一、东北作战地域，以宁都为后方，由总指挥×××、政委×××负责，指挥以下两个分区作战，并组织与巩固宁都全县，尤其是宁都、广昌、石城间之后方的防御：

1. 南、广、建、泰、黎分区，指挥部设广昌；
2. 宜、乐分区，指挥部设招携。

第二、赣江流域作战地域，以兴国为后方，由总指挥兼政委×××负责，指挥以下两个分区作战，并巩固兴国、胜利及于北之后方的防御：

1. 永、吉、泰分区，指挥部设水南；
2. 于、信、赣分区，指挥部设于都。

第三、东南作战地域，以瑞金为后方，由××负责，指挥以下三个分区作战，并巩固瑞金卫戍区，尤其要组织与巩固瑞金、石城、宁化、汀州之间后方的防御：

1. 会、寻、安分区，指挥部设会昌；
2. 福建军区，总指挥部设白沙，除直接指挥新、岩、永、杭地域作战外，并指挥汀连与杭武两分区，汀连分区，指挥部设河田，杭武分区，指挥部设官庄；
3. 宁、石、清分区，指挥部设宁化。

上述三个作战地域之卫戍区、军分区、红军兵团、各县军事部等，在作战的部署与命令上，须绝对服从各作战地域的总指挥、政委，在经常行政上于各地域交通未被隔断时，仍应隶属其原军区或中央政府。

六、各作战地域之最高作战指挥，应统属于方面军总司

令、总政委，但各作战地域，均应独立作战，勿庸依赖红军基干兵团，因为红军基干兵团是常移转突击方向求得消灭敌军的。在各作战地域之分区或军区，亦应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和决心，各分区（或军区）应依据其指挥的基干部队及广大的地方武装，来部署积极运动的防御进攻的战斗，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到敌人的翼侧后方动作起来，钳制和调动敌人许多部队来疲惫它、分散它、削弱它、瓦解它，夺取它的辎重，破坏它的交通运输，争取它压迫下的士兵群众，争取白区的工农劳苦群众，扩大苏维埃版图，并取得其分区及红军的联系。这样来组织防御，组织战斗，一定可以在各个战线上击破敌人的进攻，消灭和瓦解敌人更多的武装，来取得这次战役的全部胜利。在这里应认识所谓运动的防御，决不是死守口子，坐待敌人进攻的消极防御，而是以坚固的防御线，在敌人进攻前，层层向敌人进逼，敌人进攻步步抵抗，使敌人时时展开，以阻碍它的前进，同时运用基干游击队到敌后方去扰乱截击，更须集结基干兵团，灵敏地选择敌人弱点，给以致命的打击，以击破敌人的进攻。

七、各作战地域应根据实际情况，将其作战线分为主要的与次要的方向，而将其基干队运用于主要方向。各作战地域所包含统率的兵力应是：

1. 红军兵团（如十二军、二十一军、独立师、独立团等）；
2. 游击军（分基干的和一般的）；
3. 赤卫队、少先队（亦分基干的如模范营、模范少先队和一般的）。

同样，在分区（或军区）方面，也应依上述三种兵力部署于自己作战线的主要或次要的方向。为要使这些兵力分布得好，江西、福建两军区总指挥部必须在作战委员会的计划和帮

助之下，确定扩大和强固各作战地域与分区的红军兵团、基干游击队。各作战地域的红军兵团，大致规定如下：

1. 东北作战地域——独立第四师，南广、建宁、宜黄、乐安各独立团（必要时加调独立第七师）；

2. 赣江作战地域——二十一军独立五、六两师，永丰、公略、万泰、赣县、信丰各独立团，江西军区特务团；

3. 东南作战地域——十二军，独立三师，会昌、寻乌、安远各独立团，中央警卫营，红军学校及闽西各独立师、独立团。

各分区指挥部应负责组织强大和巩固其所率领的全部兵力，并确定他的基干部队。

八、敌人在大兵团作战中，为要灵敏地移动军队，前送械弹、粮服，后送伤病员起见，一面是利用河流交通，一面是赶筑汽车马路，我们从此可以判断敌人的作战线及联络线的所在，这些作战线及联络线是敌人的血管和神经系统，是我们各作战地域的作战目标和用兵的主要方向。我们要抓住这些主要方向，从政治上、军事上布置工作，发展我们的游击战争到这些方向，破坏它的马路、桥梁，截断它的河流交通，袭击它的防守部队与兵站，截取它的辎重运输，尤其是要广泛发展包围这些主要方向的游击区域与新苏区，以断绝敌军前进的供给和后方联络，减弱和消失它进攻苏区的能力，以造成消灭敌军，夺取中心城市的更有利条件。

九、各作战地域除使用一般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向次要方向发展外，应即以基干的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积极活动于敌人的作战线与联络线上，经常出没于敌人的翼侧后方，施行袭击，联合运用军事上、政治上的动作，来分散敌军、疲惫敌军、麻醉敌军、瓦解敌军。至在掌握中之红军兵团，则在其主要方向集结，灵活地突击敌军。

十、各作战地域应于此刻敌人大举进攻尚未完全布置好的时候，根据上述各项原则，积极向外发展，实行全线出击，建立与扩大积极运动的与巩固的防御，以破坏敌人进攻的准备，造成消灭敌军、夺取中心城市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敌人已经侵入苏区，我们也应以若干兵力，向白区的敌人后方活动，钳制敌人兵力，以便利我红军兵团乃至红军基干兵团选择敌人弱点实施突击，以各个消灭敌人。一切等待的、消极的、堵口子的防守的办法，都是有害的纯粹防御路线，必须在战争领导机关与一切军事布置上完全肃清出去！

十一、各作战地域必须以最大力量来巩固与加强作战地域后方的防御，并准备必要时的迁移与极安全的储藏。

各作战地域的后方，大致规定如下：

1. 东北作战地域应在宁都河东岸迅速布置后方，但在河之西岸亦应布置第二后方；

2. 赣江作战地域应在兴国、胜利一带布置后方，并协同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整理与巩固原有的后方，并施行必要的迁移；

3. 东南作战地域应在瑞、石、宁、汀之间迅速布置新的后方。

各个后方的巩固与安全，要不仅着眼于军事上的设备，最主要还要依靠于群众的力量。要以广大的群众的地方武装布置宽广而又严密的防御线，务使敌军即使侵入苏区，但因为群众与地方武装所给予它们的困难和打击，使它们不可能来摧残我们的后方。这一巩固后方防御的工作又与加紧肃清反革命派和反革命的活动有密切关联的。

十二、对于军事上的后方联络线，各作战地域须负责完成并保证它的安全，现规定各线的干线如下：

1. 东北作战地域：建宁、南丰——广昌——宁都线，建宁——石城——宁都线，东陂——洛口——宁都线，招携——黄陂——宁都线，瑞金——宁都线；

2. 赣江作战地域：宁都——兴国线，荇田——沙溪——兴国线，水南——兴国线，沙村——兴国线，田村——兴国线，信丰——于都——兴国线，会昌——于都——兴国线，瑞金——平安寨——兴国线；

3. 东南作战地域：石城——瑞金线，清流、建宁——宁化——瑞金线，白沙——河田——汀州——瑞金线，四都——瑞金线，安远、寻乌——会昌——瑞金线，于都——瑞金线。

以上干线或与以上干线平行的一些支线，亦统由该作战地域及分区依此大体划分去自行规划，并求得这些路线的迅速完成和保证它们的安全。

十三、各作战地域，对于十一、十二两项所规定的后方与后方联络线，特别是在支线上，应发动群众与合作社储备必要的柴、米、油、盐，红军公谷亦应核价储藏起来，以便红军经过或驻扎时，贱价卖给红军，在这些路线上的军事征发（如担架、运输、交通、慰劳、照护伤病兵等），各作战地域及分区应自定切实的分配计划。

十四、各作战地域总指挥部，特别是分区指挥部、红军兵团指挥部，对于所在地域的特别是作战线上的敌情和地形，应有计划地进行秘密的侦察（入敌境的便衣侦察）及部队的侦察（运用游击队）和发动工农群众的报告，使敌情、地形都能了如指掌，这样才好袭击和消灭敌人。同时要加紧赤色戒严，断绝敌人交通，散布迷惑敌人的消息和布置疑兵，使敌盲目和迷惑起来，而更有利于我军作战。

十五、战斗间所夺获的枪械、弹药，由各作战地域各分区

有计划地立刻武装新成立的队伍，或转给红军，或武装当地工农群众，总以不转落敌人手为要则。

十六、关于治疗伤病战士的问题，除交由已有的后方医院外，各作战地域总指挥部，应筹备本身的野战医院和必要时寄医民家的计划。

十七、战斗间所捕获的俘虏士兵，各作战地域总指挥部应有计划地首先进行政治鼓动和宣传，放还一部分回白军白区中去，起瓦解敌军的作用，留一部分好的补充我军，但须实行分编和加强他们的政治教育，并须注意考查。

十八、关于赣东北、湘鄂赣、湘赣各军区及红军的配合行动，另以单独电令指示之。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蔷^{〔1〕}

彭德怀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于建宁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王稼祥。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张 闻 天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所以一直到今天没有发展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文化运动中一些做领导工作同志的右倾消极与“左”倾空谈。

不论在介绍世界无产阶级的文艺、尤其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文艺上，不论在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上，不论在开展群众的革命文艺运动上，更不必说在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上，我们都很少成绩。我们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一天到晚讲着文艺的大众化，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这一方面的真正努力。通俗的白话小报、工农通讯、壁报、报告文学等等的大众文艺运动简直还没有开始。许多工作讨论了，决定了，然而对于自己决定的执行，却表示出非常迟缓与不充分，甚至消极怠工。

无疑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文艺运动中同样是目前的主要危险。

但是，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换句话说，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我们同样的看到了以“左”倾空谈掩盖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现象。

试翻阅最近一些文艺杂志上关于文艺性质与文学大众化等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斗争》第三十期。

问题的讨论，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同志中间所存在着的非常严重的“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不克服，我们决没有法子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

这种关门主义，第一，表现在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

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因为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抛弃我们无产阶级的立场，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混淆起来。却正相反，我们的任务是在正确的估计那些小资产阶级文学作家的革命方面，给以鼓励与赞扬，使小资产阶级文学中的革命性发展起来，同时指出这种文学中所存在着的一切弱点，使他们在我们的具体指示之下（决不是谩骂！）走向革命的斗争。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斥，不是谩骂，而是忍耐的解释、说服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这种“左”的关门主义，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观点，显然把文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了，显然大大的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

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中间，有不少的文学家固然不愿意做无产阶级的“煽动工具”或“政治的留声机”，但是他们同时也不愿意做资产阶级的“煽动工具”或“政治的留声机”，他们愿意“真实的”、“自由的”创造一些“艺术的作品”。对于这类文学家，我们的任务不简单在指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文化政策之下，不能有文艺的创造的自由，指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决没有超阶级的自由，而且还要去领导这些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了解到我们所指示的道路的正确，而走到我们的道路上来。

此外，在“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中固然有文艺的作品，然而决不是一切宣传鼓动的作品都是文艺的作品。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甚至许多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某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品，而只是因为它们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托尔斯泰的作品伟大处，并不在托尔斯泰宣传了代表统治阶级的无抵抗主义，而正是在他正确的描写了当时俄国的农民。许多揭破现社会的矛盾、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没落的作品，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但可以有价值的文艺作品。

无产阶级文艺批评家的任务，正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去批评所有的文艺作品，正确的指出这些作品的阶级性与

它们的艺术价值（或无价值），而不是把一切这些作品因为它们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就一概抛到垃圾堆里，去痛骂这些作品的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拿所谓超阶级的观点去批评艺术（如胡秋原），但同时他也不是疯狂的宗教的信徒。

我们在左翼文坛上所需要的，就是这类的批评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只有依靠这类批评家，我们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革命文艺界中的领导作用。

最后，必须说到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文艺应该大众化，左翼艺术家为了要实现宣传鼓动的目的，应该采取各种通俗的大众艺术的形式，通俗的白话文，写出能为大家所了解的文艺作品，这完全是正确的。然而因此认为只有这种作品才是文艺作品，只有利用这种“有头有脑”的说部、唱本、连环图画之类的形式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观点，无疑的是错误的。我认为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艺术的形式是进步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当然应该利用这种新的形式。

至于说这种形式，工人看不懂，那就是“有头有脑”的《红楼梦》与《水浒传》等，工人何尝看得懂。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抛弃现代艺术的形式与技巧，而是提高工人的教育程度，使工人们懂得这些艺术品。

然而在现社会下对于工人这种教育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以为在现社会之下可以把工人的教育怎样普及或提高，使他们能够赏鉴文艺的作品，这当然完全是社会民主党的幻想。所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第一步的任务是在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的斗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民众的政权。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实行普及教育，教育广大的工农群众，使他们能

够赏鉴高尔基或绥拉菲莫维支以及托尔斯泰等的作品。

所以左翼作家在目前集中力量于阶级斗争的宣传鼓动的工作，利用一切通俗的文艺形式号召工农阶级起来斗争，是完全应该的。因为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是他们目前的中心任务。但这绝不是说，只有这种宣传鼓动的通俗作品，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而且事实上这种作品的大多数却并不是文艺作品。这当然不是左翼作家的耻辱。

我们对于不能像我们一样做的文艺家，应该给他们以“自由”，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法子强迫他们像我们一样的去做。我们的任务是在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把他们团集在我们的周围，而不是把他们从我们这里推开去。

对于革命的文学家，就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我们都应该爱护。马克思对于海涅、列宁对于高尔基那种亲爱的态度，应该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在目前中国这种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就是产生中国的高尔基，他的作品也没有法子为大多数工人所阅读。然而我们决不说，因此中国现在不要高尔基。中国现在不但需要高尔基、绥拉菲莫维支，而且需要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这些人的作品，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都有极大的革命的作用。

* * *

要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坚决的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在文艺界中革命统

一战线执行，比在工人运动中，要求我们更多的细心，忍耐，解释，甚至“谦恭”与“礼貌”。因为这里，我们工作的对象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群，而且是小资产阶级中最敏感之群。

然而我们必须重复地说：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变成文艺上的自由主义者，投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如像在许多情形之下，那些叫喊“马克思主义”的“左”的艺术家常常所做的那样，而是应该领导革命的艺术家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这里所需要的，正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 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地方党部紧急 动员工作检阅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因为中央区是全国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帝国主义国民党有过三次进攻惨败的教训，这一次向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是下了最大的决心。目前敌人正在加紧对于中央区大举进攻的动员与布置，增调新的军事力量，筹划充足军事费用；加紧进行对于中区左右翼——赣东北、湘鄂赣苏区的进攻，以造成对中区进攻的便利条件；加紧在中区四周修筑军用马路堡垒和工事；改编与组织豪绅地主武装向苏区进扰；严紧对于中区的经济封锁政策；扩大其改良欺骗的武断宣传；派遣侦探，组织各种反革命派的阴谋破坏，收买利诱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异己分子；迅速解决自己内部不可靠的队伍，肃清白军中表示动摇不满而倾向革命的成分……这些都是敌人积极准备更长期进攻的周密布置。

二、我们应看清这一次敌人大举进攻形势的严重性，同时认清全国革命危机日益增长尖锐化，国民党统治更形动摇崩溃。目前革命阶级力量的变化是有利于革命，在坚固的胜利的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实话》第十期。

信心之下，充分紧急动员领导组织所有的革命力量，采取积极进攻路线，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敌人，在各个战线上向外扩大游击运动，组织白区的战斗，争取动摇与不满的白军士兵与白区群众，扩大苏区，打通与赣东北、湘赣以及东江苏区联系，采取一切方法来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准备，以布置在积极进攻的基础之上，组织强固的运动的防御线的配合红军积极进攻行动，进行并准备与敌人的长期艰苦斗争，求得消灭更多的敌人，争取这次战争的全部胜利，去夺取中心城市，完成江西首先胜利，是我中央苏区党当前的中心策略和任务。

三、中央局根据各级党部文件和极少数的工作报告，检阅过去一个月战争紧急动员工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动员非常迟缓、不普遍、不深入而极不能令人满意的。

甲、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没有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一般的表现群众没有认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形势。苏区腹地群众仍然表现浓厚的太平观念，边区群众则表现浓厚的恐惧、动摇以至逃跑主义。没有积极的发展群众的阶级斗争，更加提高群众的积极性，造成群众紧张和热烈一切为着战争的情绪，这证明我们的政治动员是异常不够的。

乙、因此照旧工作的状况是很普遍现象，甚至有些地方的工作比以前的进步速度还要差。十月份扩大红军除胜利县是继续兴国的冲锋精神表现很大成绩，闽西的上杭县有相当进步外，其他各县仍是照旧速度去进行，甚至比上几月的成绩还少，因此江西还未达到原定数目，闽西与原定计划相差还远。九十两月征调十分之一的党团员除少数地方特别是兴国比较的相当成绩外，其他各地因动员不够而未收到应有的效果。中局决定结束江西、福建的征调运动，各地关于这一工作应作一个总结报告中局。

丙、党政府及军区对于赤卫军、游击队及独立师、团、少先队的扩大整顿，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培养，政治军事训练的加紧等，还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许多的地方武装在十一月七号检阅以后停顿起来，这表示还没有认清广大地方武装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作用。特别是游击队，除赣县万太伸入白区外，没有积极坚决的向外去组织白区的斗争。边区的地方武装一般只是守口堵敌，没有积极执行进攻路线去破坏敌人布置，表现对敌人大举进攻动摇恐惧的纯粹防御保守等待的严重错误。

丁、对于扩大苏区，除红军在新的胜利中赤化了广大的新区域以外，其他方面因为没有积极向外扩大斗争，在这一时期是没有成绩。白区白军中的工作始终是为各级党部所忽视，没有认清这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的重要条件。对于新区域及基础不强固区域的巩固、迅速分配土地、肃清残余地主武装、建立和巩固政权群众组织与党的基础等工作，进行得很迟缓，而且表示党特别是闽西党对这些区域迅速巩固的注意仍是非常不够的。

戊、对战争紧急动员中经济动员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引起严重注意与努力。土地税缴纳与公债票推销异常迟缓，节省运动虽在各级机关中引起注意，但未成为群众运动，特别是加种杂粮没有成绩，苏维埃纸币还未能能在群众中建立巩固的信仰。这表示没有认识长期艰苦战争必须有充分物质准备的重要意义。

己、肃反工作、赤色戒严还没有引起严重注意，一般表示忽视消极与怠工。地方武装与政权组织中洗刷动摇异己成分的工作没有坚决执行，思想斗争的发动仍然被各地所忽视，其他修路、拆毁工事城墙工作进行很迟缓。

四、总结过去一个月动员工作，除江西扩大红军获得相当

成绩外，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动员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表现我们党在战争紧急动员的领导和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中央局认为，进行与准备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动员工作没有获得应有成绩，是由于下列主要原因：

甲、对于这一次帝国主义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严重形势的认识不足。中央局在最初一时期同样没有深刻的认识，江西、闽粤赣省委动员文件未明显提出大举进攻形势，有些县的动员文件仅只一般的提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有些地方党部文件中虽提出了大举进攻的问题，但实际工作的布置极不充分。这种对于大举进攻形势估计不足与忽视的错误，是放松一切动员工作最重要的原因。这里表现更严重的，就是有些地方党部特别是边区党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表现机会主义动摇恐惧、失却胜利信心，不了解积极进攻路线的整个内容，是要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努力去巩固和扩大苏区，积极向外发展斗争，扩大苏区，去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准备与布置，而走到偏重秘密组织坚壁清野的准备以及守口等待的纯粹防御路线之错误，这都是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所产生的结果。

乙、中央局特别指出在这一次战争紧急动员当中，党内、团内的动员是异常不够的。党内特别是下级地方党与团的指导机关中，反映着浓厚的落后农民的和平保守以及失败情绪和意识。一般党员对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认识薄弱，对敌人大举进攻形势不了解，缺少胜利的信心。尤其是有一部分党员表现可耻的躲避战争，因怕当红军惧怕担任战争紧急动员工作，走到消极怠工不参加党的会议，甚至表示愿意脱离党。我们应该认识党内、团内动员不充分，党团员对于动员工作的消极甚至落在群众积极性后面，是这战争紧急动员工作没有收到应有成绩

的一个重要原因。

丙、工作方式没有适用战争紧急动员环境而转变。支部不能在每一工厂作坊、农村街道中起积极有组织的领导作用，没有充分运用政府和群众组织——工会、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去有计划进行宣传 and 一切鼓动的工作，各种会议没有充分准备与具体决定和实际分工（中央政府紧急动员令，许多区乡甚至县苏没有详细甚至完全没有讨论和具体布置工作），成为形式主义的应付，一切宣传鼓动不能很好联系到群众的实际生活，没有很好运用革命竞赛方式到下层党部中去，缺少工作的经常检查与督促。没有真正执行面向支部、面向群众的工作方式，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强迫群众、命令群众（特别表现在推销公债中）的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意的工作方式，是目前极严重的危险现象。不去以群众斗争与充分的政治上去动员群众，照旧的工作方式、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主义等，与我们不能动员群众是有极重大关系的。

五、帝国主义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形势益加紧张，红军正抓住敌人布置还未完全的时机，采取积极进攻策略，突破一方面，以求得各个击破敌人。地方各级党部应以最大限度的积极与努力转变我们战争紧急动员的工作。关于这一任务的实现，中央局更有以下的决定：

甲、为着领导群众全部实现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令的工作，首先在党内必须充分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要集中火力打击一切忽视敌人大举进攻严重性，特别要打击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表示动摇恐惧、失却胜利的信心、消极悲观、不去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而走到守口等待纯粹防御路线的右倾主要危险。要不放松打击轻视敌人大举进攻力量的“左”倾观点。各级党部直到每一支部应立即召集一次动员工作检阅会议，在充分的

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斗争基础上，根据本决议对于过去工作作一次检阅，并定出具体工作计划。在支部大会与活动分子会议中详细解释目前革命形势，使每一个党员正确认识大举进攻形势和党的中心策略，具有胜利信心，而积极的自觉的努力执行一切动员的紧急任务。要认识这一党内充分动员与转变，是每个动员工作或转变的先决条件。

乙、必须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抓紧目前敌人加紧布置的时机，努力向白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以最大决心与努力去建立白军白区工作，以一切方法去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准备与布置（破坏敌人修路工程，组织这些路工的反抗斗争，破坏敌人运输线的桥梁道路与辎重，向敌人不断的游击以分散疲劳敌人……），以阻止敌人进入苏区，配合红军主力消灭敌人。努力在深入土地斗争，发动工人斗争，提高群众积极性，肃清残余反动武装，去迅速巩固新发展的区域和基础不巩固的苏区。加紧肃反工作，坚决洗刷地方武装中动摇的异己成分，发展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一切改良欺骗宣传，巩固革命队伍的力量，这都是积极进攻路线的具体紧迫的任务。

丙、充分运用政府与群众组织——特别要抓着贫农团、工会、赤卫军、少先队、城乡代表会——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使全苏区的工农劳苦民众正确了解大举进攻形势和任务，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提高他们积极性到最高的限度来参加战争紧急动员一切工作。在这一基础上以最大的努力去扩大红军，特别是党团员应自觉的踊跃加入红军，完成劳战委员会扩大红军的计划，扩大整顿地方武装（应立即实行县区党部书记担任赤卫军政委，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迅速缴纳土地税，销售战争公债等中心工作。苏维埃纸币有些地方尚不通行，党应注意在群众中巩固苏维埃纸币的信仰。

丁、要以最大的努力与决心去转变动员群众的工作方式，肃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与作风，这些都是取消政治动员、脱离群众，可以引起群众反抗的危险现象。一切动员工作应放在支部身上，支部应以最大努力去领导贫农团、工会的支部、城乡代表会及赤少队的工作，这是我们一切动员工作的基础。各级委员会切实了解支部工作和支部周围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区委应以极大力量去帮助指导督促支部工作的健全与建立，上级党应派人去支部中巡视检查，经常指导督促所属党部的工作。每一次党或群众政府的会议必须事前有充分准备，有具体工作决议和分工及工作检查。要注意在工作方式转变的经验中，去创造新的紧张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式。

这一决议，各级党部直到支部均应提出讨论，并向中局报告讨论经过与执行情形。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关于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王 稼 祥

巩固与提高红军战斗力，发动战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参战，瓦解敌军，争取敌军中的士兵到红军方面来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些都是战胜敌人最主要的条件。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各级政治部在红军战地群众及敌军中进行不疲倦的政治工作。

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启发敌军中工农出身的士兵的阶级觉悟（这些是白军中士兵的主要成分），号召并指示他们来反对他们的阶级敌人，转到革命方面红军方面来，这样来根本瓦解敌军。

检阅我们对敌军的政治工作，必须指出：这种工作是非常薄弱，非常令人不满意的，现在正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加速准备向我们大举进攻的时候，我们必须彻底纠正我们的错误，加紧我们对敌军的政治工作，并与一切忽视对敌军工作的观念作坚决的斗争。要知道：争取白军中不满的与动摇的士兵，瓦解敌军是我们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时也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之一。

目前国民党军队士兵的不满与动摇日益加深，在士兵中革

* 这是王稼祥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的训令。

命影响日益扩大。因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党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国民党在白军中的欺骗武断宣传的作用减少；因为国民党财政破产，局部的军阀战争不断发生，白军士兵的生活更加痛苦。最重要的是因为全国革命大发展，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和反帝运动的热潮；白军，尤其那些进攻红军的及参加上海战争的白军士兵，更受了土地革命以及苏维埃与红军的深刻影响，更受了反帝热潮的影响，因此最近各地白军不断的发生兵变与投入红军的事情。这一切都是我们瓦解敌军，争取不满与动摇的士兵到红军来的有利条件。一切认为白军士兵是流氓、兵痞无法争取的理论，都是放弃对白军的一切工作的机会主义的谰言，我们必须与之作坚决斗争。

为要向敌军进行政治工作，我们必须考察白军每个部队的政治状况，因为不知道每个部队的具体情形，我们便不能进行对该敌军的具体的宣传鼓动。考察白军的政治状况主要是：

1. 考察该部队的历史属于何派，部队内有何派别。
2. 士兵的社会成分，何省、何地人居多，大部分士兵当兵年限。
3. 士兵的政治情绪与受革命影响的深浅。
4. 敌人反动的政治工作如何，欺骗宣传的主要内容，这些欺骗对白军士兵影响如何？
5. 士兵的物质生活。生活的痛苦与官长对士兵的压迫和士兵的一般动摇情形。

收集这些材料的方法是：（1）向知道这些部队的同志调查；（2）询问俘虏的白军官兵；（3）阅读敌人的各种文件和宣传品，派遣专门政治侦探。

这些材料是我们对白军做兵运工作、宣传工作和俘虏兵工作的具体根据，没有这些材料我们的宣传鼓动一定不能具体实

际，不能抓住士兵的切身问题，而只能限于一般的抽象的宣传，这种宣传往往不能发生很大的效力。此外这些材料须向我们红军战士说明，使他们知道白军士兵的情形。

各级政治部必须经常收集这些材料报告上级，由总政治部汇集编印，以供各级政治部使用。

对敌军的政治工作可分为：（1）白军兵运——即派人到白军中去工作；（2）对白军的宣传鼓动；（3）对俘虏兵的工作。

对白军的兵运工作，各级政治部必须经常的注意挑选适宜的人才，给以训练。在前方部队，可能时由军团或政治部办训练班，在不可能时则给以个别训练，派往白军去进行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以至领导他们兵变与兵暴。我们必须从部队中选择成分好的、政治坚定的、有活动能力的，最好是从白军中拖枪过来，多少有兵运经验的同志。在训练中要将白军的情形以及兵运的路线策略和秘密工作的方法详细说明（依照中央局二月训令）。各军团、军政治部每月必须至少派出十人去。江西、福建军区政治部要经常不断的开办训练班，每月各要派出三十至五十人。在派人到白军中工作时，闽西要特别注意十九路军，江西要特别注意广东部队。各分区政治部每月至少派五人出去，特别注意派到地主武装及一心会、大刀会、勇敢队等等中间去。各军团、军及军区政治部在派同志到白军某部队工作时，必须说明该部队情形，并给以工作的指示。各政治部必须登记所派出的人数，每人的成分、履历、活动能力等等，按月报告总政治部。各级政治部必须切实的认真的执行这个工作，绝对不能敷衍塞责。

对白军的宣传鼓动的内容是根据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路线与口号，但是必须时时刻刻联系到白军的政治情绪、生活情形以及他们的动摇与不满。

目前宣传鼓动的中心内容是：

1. 说明中国国民党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忠实走狗、代理人，它的政策是保护并巩固地主资本家对工人、农民、士兵的压迫与剥削，镇压与屠杀工农革命群众。揭露国民党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东三省、上海，出卖中国的真面目。

2. 说明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成立了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并且已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的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说明苏维埃的一切政权与苏区的工农生活；说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说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时并揭破国民党军阀对共产党与苏维埃的一切污蔑造谣与武断的胡说。

3. 说明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他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为了解放工农兵而战斗；说明红军是受苏维埃的各种优待和群众的拥护与爱戴；说明红军的一般生活情形，同时并揭破国民党对红军的一切污蔑以及武断宣传。

4. 说明国民党军队是地主资产阶级军阀的军队，国民党所进行的进攻红军的战争，完全是违反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样是违反白军士兵群众的利益；说明攻打红军，对于白军士兵没有任何利益与必要，相反的白军士兵应当来参加红军，一同去打帝国主义国民党。同时要揭破国民党对白军士兵的一切武断宣传的反革命实质。我们更要抓紧着白军士兵反帝情绪的高涨与对生活的不满，来进行我们的宣传鼓动。

我们要在这样的宣传鼓动的工作之下，要在我们对白军士兵的中心口号之下——“工农出身的士兵不要打工农红军”、“白军士兵暴动起来参加苏维埃的革命”、“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白军士兵拖枪回家分田”、“白军士兵暴动起来同红军一同打帝国主义去”——来号召并组织白军士兵的暴动，拖

枪到红军中来；来号召白军士兵不上前线打仗自动的缴枪等。过去对白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太简单化、太庸俗化了，时常只是简单说“红军生活好，大家自由平等，不受压迫”、“打土豪分田地”等等，这些不是从政治上来启发白军士兵的阶级觉悟的宣传鼓动，必须立即纠正。

对白军士兵的宣传鼓动的方法：（1）在白军要过的或红军退出的地方写标语，贴传单、画报；（2）经过革命群众送传单、画报到白军去；（3）教育战地工农群众来进行对白军的宣传工作与兵民联欢的方法，借以发展白军士兵秘密组织；（4）在火线上进行口头宣传，叫喊呼口号等等。

我们对白军的宣传品，必须通俗、实际、简短，针对着每个部队士兵的实际痛苦与其情绪递送宣传品，必须在每个环境下想出许多的实际方法。

对俘虏兵的工作。对俘虏兵工作的目的是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争取他们到革命方面来，教育他们成为为苏维埃而斗争的自觉的红色战士。

对俘虏兵的关系必须是阶级的友爱关系，不准搜他们的腰包、谩骂等等。俘虏兵的给养必须处理好，要坚决反对那些怕麻烦、敷衍了事的观念与行动。

俘虏兵一到即须将官长与士兵隔离开，使官长不能再影响士兵。对俘虏兵的成分、当兵年限、政治情绪，进行初步调查。俘虏兵一到则须进行初步的宣传鼓动，宣传鼓动的内容与上述几点相同，宣传后即组织成队送往后方。

各军团、各军政治部在每次作战前，应准备一批政治干部以及管理人员，准备在把俘虏兵组织成队时派他们充当政治工作人员。

在俘虏兵人数较少，不需要到后方时，则由各部队进行工

作。训练一时期后，除一部分觉悟的、自愿当红军的可编入红军外，不愿当红军的可宣传他们留苏区分田，如愿意时，则负责送就近的苏维埃政府。对要回家的或回白军的，要给以很深入的宣传鼓动，使他们能散布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到白军士兵中去。要坚决纠正不经过训练立刻把俘虏兵编入红军的办法，要坚决反对怕麻烦而只想迅速把俘虏兵送走的放弃白军工作的机会主义。对俘虏兵工作，除上政治课讲话外，还须组织联合会、同乐会、参观，同时要发动红色战士向他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对白军中拖枪过来的，必须进行热烈的欢迎与进行成分、思想检查和教育工作，同时挑选一部分给以专门训练，派往别的白军中去工作。对拖枪过来的，同样的必须严防反革命派利用这个方法派人到红军中来破坏工作的企图。

此训令发到政治部为止，各级政治部接此训令后，必须切实讨论，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执行这个训令，并按月报告本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红一方面军为粉碎敌人 第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一训令发给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一直发到连长、独立排长及各政治指导员，并要在全体红色战士中解释这一训令，实行这一训令。

（一）此次我方面军在东北一个月行动，连占七城，赤化建宁、泰宁、黎川，扩大苏维埃领土数百里，击败周志群，两次战胜两南敌人，直逼浒湾、南城，击溃白军三、四师，缴获过千，俘虏无数，相当地解决了冬衣与给养问题，打通闽北苏区，建立邵光独立团，联系赣东北，威胁延平、抚州、南昌，调动了东北与西南各方敌人，同时我独立第七师及中央警卫营也在这一胜利的配合下，连续地占领清流、归化和连城。这一伟大胜利，的确是配合全国红军特别是赣东北与河西红军的行动，破坏了敌人大举进攻的封锁和包围的布置及其各个击破我们的企图。

（二）正因为这一胜利的威胁，敌人更要很快地进行激烈的战斗。现在，蒋介石已动身来赣。以朱绍良为右翼，率领在湘鄂赣及湖南的八个师；以蒋、蔡^[1]为左翼，率领十九路军及毛（炳文）、刘（和鼎）、卢（兴邦）、赵（观涛）八个师及戴岳一旅；蒋自任中路，率领陈诚十八

军及吴（奇伟）、孙（连仲）、李（云杰）、许（克祥）十个师，并预备从湖北调两个师，从安徽调徐庭瑶第四师来赣。现第五师、十一师、十四师、九十师均已移动，赣南粤军亦有配合行动的布置。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

（三）我方面军在击破敌人向金溪夹击的计划后，现正集结主力，逐渐转移作战目的，到其他地带，准备配合全苏区各作战部队的全线出击，在适当地域消灭敌人大举进攻的基干部队，以利于各个击破敌人，完全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四）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目前的战斗将关系到苏维埃中国的胜负，要为拥护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兴奋起布尔什维克的勇气与热忱，要提高战斗情绪，下拼死的决心，要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抛弃一切动摇，来争取战争胜利到底。

（五）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动摇、犹豫与迟缓，要以坚决、迅速、秘密与有配合的行动，来实现每一战役的全般意图，即使遇到敌人一营一连，也须以坚决勇猛的行动去消灭它，这才能消灭到敌人全部，提高起红军无上的战斗热情。全方面军与全苏区各作战部队须团结成一个人一样的一致，这就要实行政治上的动员，要从加紧阶级的政治教育上巩固全体红色战士的阶级的自觉与团结，加强其对于胜利的确实信念，发展其革命精神与牺牲的决心，更严肃红军的纪律，以集中一切精神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全方面军及各作战部队更要以最大的兴奋和努力解决一切困难，注重部队卫生，减少疾病，扩大红军，普遍组织赤少

队，建立基干游击队，巩固与加强训练新来的战士，用全力看护伤病兵，争取伤病兵迅速归队，奖励红色战士的英勇果敢，与部队中游击习气和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这样从各方面来巩固和提高红军战斗力。

（六）要最大努力地提高对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注意与学习，对于瞄准放枪，对于白刃冲锋，对于伪装隐蔽，对于防空防毒，对于通信联络，对于侦察警戒，对于夜间动作，对于胜利后迅速追击与防敌反攻，对于适合情况的行军速度与宿营配备，对于火力与运动的配合，对于遭遇战的夺取先机，对于阵地战的精密计划，对于游击战的灵动敏捷，对于战斗的协同动作……都必须依照原则来加紧训练，尤其对于战术的使用与学习，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地形来求得灵活的运用。

（七）加紧作战地域的群众工作，争取新占领区域的赤化与争取动摇和不满的白军士兵到革命方面来，是顺利进行战斗，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有力条件，是每一红色战士一日不可忽视的政治工作，尤其是消灭作战地域的反动武装，建立与繁殖新区的赤色游击队，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如金溪、资溪的改组派，建宁、广昌间的大刀会等）的武断的欺骗以至迷信的宣传，争取其中被欺骗的群众，更成为目前紧急任务。即使红军与各作战部队在该地只有一天的停留，也必须尽可能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来求得红军与当地群众有力的配合，以争取全局胜利。

（八）各部队要认识征集资材的重要与急迫，在目前形势下万不容我们从容分散、从容布置、从容工作，要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学习游击队的动作，即使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两天的停留或一日的游击，也必须注意到筹款与解决筹款和购买的

问题。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周恩来
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光鼐、蔡廷锴。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的 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指示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朱周王^①：

中央致鄂豫皖电转如下：

鄂豫皖分局：

听了陈赓同志的报告，我们认为：

(一) 虽然在临城战役中，红军获得伟大的胜利，击溃敌人九师主力坚强了自己，但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崩溃过分估计，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四次“围剿”严重性的估计不足，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原有的根据地，这是很大的游击战损失。

(二) 现在任务是要红四方面军在豫鄂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发动当地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给红军主力整理补充并尽量扩大红军，以准备向敌人反攻。继续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

(三) 迅速与红第二军团取得联系与行动的呼应，特别是在向敌人反攻准备期，这有极重要的意义。

(四) 帮助领导鄂豫边区，恢复鄂豫边苏区，发动在这些区域中的游击战争，最高限度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斗争，这是创造与巩固鄂豫边苏区的不可分离的步骤。

(五) 红军主力整理休息补充之后，应取更向回发展的方向，造成时时威胁襄樊及武汉形势，所以与鄂豫皖苏区取得密切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六) 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建立与中央的密切关系，经常的经过电信交通告诉我们一切情况情报。陕豫党的关系在建立否？

中 局
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

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

——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最近检查各地执行紧急动员令的成绩，非常令人不满，除劳战会给各地的一封信中已一一指出外，人民委员会更严重指出，形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政治上认识的错误：

(一) 一般的是忽视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和反映群众中最落后的太平苟安的意识，以为敌人还未来，依然照旧工作，当然就不能去执行紧急的任务。

(二) 在边区的地方，受敌人的侵扰，又走到惊慌失措，这是没有认识目前有利于革命的形势，缺乏对于革命的自信心，失败的情绪阻碍了动员工作的执行。

(三) 对于进攻策略的认识错误，以为这单是红军的任务，而自己坐望红军胜利，在边区更表现依赖红军，而自己不积极向外进攻敌人。这种等待观念，就不能从各方面积极去进行进攻策略，必然放弃了一切紧急动员工作。

人民委员会号召各级政府和地方的军事领导机关，坚决的同这些政治的错误作无情斗争，反对对于敌人大举进攻的忽视，尤其是太平苟安以为敌人还未来的落后意识；坚决反对那种对敌人进攻的惊慌失措和等待保守的观念，这些是最危害粉

碎敌人大举进攻的紧急动员工作的进行。

人民委员会严重唤起各级政府和地方军事领导机关，深刻的来认识目前敌人之积极筑建汽车路，组织兵站运输，组织与扩充地主武装，在苏区四周发展反共团、“铲共”义勇军，收刮大批军费，增调大数量的军队。特别是加紧进攻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苏区，这是表现敌人更周密在布置对于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和准备长期挣扎。必须深刻的认识这次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是长期的最艰苦的残酷斗争，是阶级决斗的重要关节，我们必须以一切的力量去为争取这次战争胜利而奋斗。

同时要指出敌人这次进攻，虽在帝国主义直接帮助之下，武装力量是加大了，但在政治上和敌人的内部是比三次战争大大削弱了，在敌人进攻苏区的军队中充满了不满与动摇，尤其是全国革命的发展，同时苏维埃红军的扩大与加强，这都是有利我们的条件。我们能够动员一切力量去为战争的利益而牺牲，是能获得这次战争的全部胜利，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在检查动员工作中，发现另一种严重现象，即是不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上发动群众，完全采用强迫群众、命令群众的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同时这种方式发展，是与上面的政治错误有密切关系的：

一、因为不认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自然不能认识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没有站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去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工作。

二、各级领导机关对于下级的官僚领导方式，只下一个命令，做一决议和计划发下去，对于一切执行的具体方法和动员群众各种方式，也不加以指示和检查，甚或简单的命令去做，或以处罚和威吓，这样更促成了下级强迫群众、命令群众的现象普遍发生。

三、表现散漫无组织的工作方式，不去运用选民大会、代表会议及一切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加强动员群众的力量，必然走到强迫群众、命令群众。

四、由于官僚式的工作方式，必然不能很刻苦去进行群众动员，为图便利的，就以强迫、命令来代替。

这些现象表现在紧急动员中是很浓厚的。最显著的，对于中央的紧急动员令，没有召集选民大会、代表会议、赤卫军、少先队大会、各群众团体大会，作详细的报告和解释，充分进行政治鼓动工作，直到现在群众中，还有大多数不了解敌人的大举进攻。这自然使一切动员工作都不能在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充分的实现起来。如扩大红军，就不能完成规定计划，就不能使壮年的男女工农群众踊跃的自愿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反而用处罚来强迫下操。特别是完纳土地税、发行公债，事前没有做充分的政治宣传，使每个工农分子了解为什么缴纳土地税、购买公债。当征收和发行的时候，又不召集各种会议和运用城乡代表去鼓动群众自愿缴土地税、多买公债，群众发生疑问时，不去作详细的解释，反而用强迫富农、资本家的方式，施之于工农群众，于是造成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事实上是增加征收土地税和发行公债的困难，更影响其他一切动员工作，这是何等的严重问题！

这种强迫命令的方式不仅表现于紧急动员中，而且充满了苏维埃的各种工作中，助长这种工作作风的发展。由于各领导机关在领导上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对于上级命令的接受和执行，不是照例的转发，就是原封包存，没有开会，按当地的情形详细讨论执行具体方法，来指导下级的工作。对于执行结果从未加以检查，不问成绩如何，只求敷衍了事，执行的基础完全建筑在简单的命令上。任何时期，任何工作，都是照旧的工

作，照例开会，这是十足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强迫命令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这种官僚主义侵入到苏维埃政府：（一）由于中国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之传染。（二）由于农民散漫性的笼罩，缺乏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三）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只图一时便宜，使官僚主义侵入到苏维埃机关，日益生长起来。

人民委员会号召各级苏维埃机关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致的与官僚主义作最坚决斗争，来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驱逐不可挽救的官僚腐化分子，以巩固工农苏维埃的政权，同时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这就必须要：

一、一切工作要建筑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谁抛弃动员群众工作，必然是脱离了群众。

二、法令与决议的实施，不单靠命令，主要还是依靠提高群众阶级觉悟与热情，来拥护法令的实施。

三、动员群众要靠政治上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

四、动员群众的方式，要运用苏维埃各种组织以及一切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城乡代表会选民大会是直接动员群众的工具，工会是动员群众的柱石。

五、每一个决定要合于实际能够实行，反对一切空泛不具体的决定及毫无准备和结果的照例开会。

六、执行命令要注意发动群众的方法，同时要注意群众中的意见，以作决定实行办法的参考。

七、接到上级的命令和决议，马上应该开会作详细讨论，规定自己执行的具体方法。

八、在执行工作中，应该随时检查自己的工作，看做到了

没有？有些什么错误和不妥的地方？

九、对于一切工作，要根据工作的关系来适当的分工，这不仅是每一部每一个工作同志应该如此，就对于下级指导都要根据情形来分配工作。

十、对于下级的指导，要切实，要具体，多有办法的指示。

十一、不要随便发文件，多用巡视指导，巡视员不是走马看花，不是站在旁边批评，而是负责的检查工作，帮助下级来解决工作的困难。

十二、组织工作团去直接帮助下级工作，工作团的责任是将该处工作做好，不是空口批评人家而自己不做。工作团的工作方式是集中力量先做好一个地方，然后再到第二个地方。应当要分工，每人担一种工作，到一处就要将一处工作做好。

十三、不要随便开会，开会要有准备、有结果，要实际去做。

十四、开群众会事前要有充分准备，每一个政治鼓动必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联系群众本身的利益，说话要简单明了，多带鼓动的作用。

苏维埃的工作作风是群众化、实际化、组织化、纪律化，是具有艰苦斗争的坚忍性，一切脱离群众的办法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

人民委员会号召各级苏维埃机关，紧急动员起来，反对一切对于敌人大举进攻的错误认识和懈怠行为，肃清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去为创造苏维埃的工作作风、迅速的去完成紧急动员令的一切工作而奋斗。

各苏维埃机关——由省直到乡——接着这一决议，应马上开会，来检阅自己的工作，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暴露

一切工作中的错误，具体规定执行办法，并将讨论的结果向中央报告。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根据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红色中华》
刊印。

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张 闻 天

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是同我们的群众的宣传鼓动的工作不能分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给以充分的注意。大家都还以为宣传鼓动工作决没有像组织工作那样重要。然而事实上，没有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就不能有群众的组织与群众的行动。

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把宣传鼓动工作的转变提到全党的前面，还没有充分了解到，宣传鼓动工作的转变，是转变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是使我们党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最主要条件之一。

像目前我们所做的宣传鼓动工作，当然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首先，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方面。我们所采取的宣传鼓动的形式大都不外是传单与标语，所以每一次我们检查某一运动节中我们所做的宣传鼓动工作时，我们总是说我们发了多少传单，多少标语。这差不多是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全部。当然，在上海党的各区委下面，我们现在也出版了各种小报，在个别的工厂内，我们还有工厂壁报。然而这些工作还不过是在开始。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的《斗争》第三十一期。

可见我们所采取的宣传鼓动的形式，大都是限制于死的文字的。由于中国一般文化程度的落后，中国工人识字的百分数是非常低的。因此，这种宣传鼓动的方式，也就不能变为群众的，而常常是限制于少数人的。

我们的党以及群众团体还没有能够打破宣传鼓动工作中的这一传统的藩篱，而尽量的去采取与创造新的宣传鼓动的方式。关于宣传鼓动队的组织与作用，我们是早已提出了，然而并没有引起所有我们党的组织，尤其是党的宣传部的注意。利用图画，利用唱歌，利用戏剧等许多群众的宣传鼓动方法，向广大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我们还没有有系统的开始。图画、唱歌以及戏剧等的宣传鼓动的方式，事实上已经证明更为群众所欢迎，更能吸引广大群众，然而我们并没有把这些方法充分的应用。

在我们的左翼文艺家中间，有着不少图画家、音乐家与戏剧家，然而我们并没有充分的去利用他们，使他们的天才能够与群众的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蓝衫团的戏剧虽是已经证明是最适合于广大工人群众需要的东西，每次的上演可以吸引几百几千工人参加，然而我们却让其自生自灭，没有给以充分的领导与帮助。

在左翼文艺家中间现在固然正在热烈的讨论着如何使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主张用通俗的白话文著作、连环图画、报告文学、说部与唱本之类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过是在讨论罢了，真正大众文艺的著作，我们还没有看见。

就是讲到我们所发的传单的文字吧，也大都是不通俗的，缺乏煽动性与群众性的。我们的宣传员，实际上也不过是照例的写传单，至于传单如何写法才能动人，那是很少为他们所注意的。他们也没有真正到群众中去学习群众日常所用的白话，

用这种白话来写他们的传单。

旧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传统与习惯，是深深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这里需要极大的斗争与创造性来转变我们的工作。

只有利用一切这些活泼的、群众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达到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兵营中的广大的群众中去，我们才能用更多的方法来动员群众。

其次，在宣传鼓动的内容方面，我们往往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笼统武断的。我们在这一方面缺乏具体性、时间性，缺乏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的工作。

我们同志在这一方面的特点，就是“党八股”（又名“十八套”）。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止。我们不管群众是否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却必须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来，方才痛快。像这样的宣传鼓动，当然没有法子动员广大的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

要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首先必须提出群众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迫切要求，抓住这些具体要求来动员群众参加斗争。因此这里所需要的是带有时间性的、具体性的、适合于群众目前斗争的要求的宣传鼓动，而不是“党八股”。谁想在这种情形之下背诵“党八股”，谁就没有法子争取到广大的群众，而且这种背诵只会使群众离开我们。只有带有时间性、具体性的、适合于群众目前斗争的要求的宣传鼓动，才能把最大多数的群众，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的不同，团结在统一的战线之下。

在某一工厂所发生的罢工斗争，如若是为了每天增加一分的工资的斗争，那我们的宣传鼓动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动

员一切我们的力量，为了这一要求的实现，进行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我们在这里的第一步的中心任务，是动员最大多数的工人群众参加斗争。然后我们在斗争中逐渐提出为工人群众在斗争中所切身了解的口号，逐渐把这一为了一分工资的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如若在这里我们一开始就是那么一套，那比较落后的大多数工人，就会退出斗争，以至下层的统一战线遭到分裂。

这种“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实际上是由于脱离了群众，由于不知道宣传鼓动的对象是什么。这样的宣传鼓动，自然只能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了。这样的宣传鼓动，自然会变成学院式的、没有生命的、缺乏群众性与煽动性的了。

同时，这种“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常常是笼统武断的。对一切反革命派别或是黄色工会的把戏，我们只是说这是“反革命派别的欺骗”，我们笼统的提出“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别”、“打倒黄色工会”等这类口号。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所了解的群众也是了解的，所以只要“打倒”或是说一句“这是欺骗”，就什么都完了。

其实，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许多在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没有问题的事情，在群众中就会发生问题。比如黄色工会的调解仲裁，我们知道这是欺骗，然而在工人群众中会发生相当的幻想，甚至在某一企业或工厂中，大多数工人会认真相信这种欺骗。因此笼统地说“这是欺骗”或是高喊“打倒”，不但不能使群众相信我们的正确，而且会使群众对于我们发生反感。这里需要我们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工作。我们必须根据一切事实，在群众的面前揭破黄色工会出卖工人的行为，使群众在他们自身的经验中，了解到黄色工会的欺骗，而起来反对黄色工会。

这种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的工作，就是在我们党内也是同样需要的。笼统的一百零一次的背诵“右倾是主要危险，但是不要忘记‘左’倾”这一套党八股，并不能丝毫帮助我们去同“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这里必须经常不断的同党内发生每一具体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细心的解释这些倾向的机会主义的内容何在，这样才能真正的打击机会主义与教育同志。

不论是“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或是“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统治中国”这类简单的真理，都同样的需要许多事实的证明与细心的解释。而我们党八股的宣传鼓动工作却完全不注意这些事。

此外，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只能是秘密的与狭窄的，它决不想法子去利用公开可能与争取公开。我们党八股的宣传家无论到哪里，从不想用另外一种方式，用许多具体的事实来说出我们所要说的话。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十八套”完全拿出来，方才痛快。因为不如此，不足以表示他们的革命。一种公开的刊物如不许我们投稿则已，假使我们能够投稿，那我们就非把“十八套”完全拿出不成，非使这一公开刊物不能继续出版不成。因为在他们脑筋中，只有秘密的东西才是革命的东西。

事实上，虽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但是如若我们能够彻底的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那就可看到我们还有许多公开可能没有利用，还有许多地方能够争取公开。比如反日反帝的报纸、拥护东北义勇军的报纸的公开，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反对国联报告书的演讲队、蓝衫团等等还可公开的去进行工作。总之，只要我们能够活泼的利用每一具体的事变，利用公开的可能去开展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我们的活动范围，一定可以十倍的百倍的扩大。

最后，略为说一下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的联系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虽是无数次的重复的说过，然而实际上，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与组织工作脱离的。宣传部的任务似乎只是写写传单标语；组织群众，那似乎是组织部的事。在这种宣传鼓动工作同组织工作分离的情形之下，决没有法子使我们的组织变成群众的组织，也没有法子使我们群众的宣传鼓动变为组织群众的主要武器。

必须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就是组织群众的工作。在反对李顿报告书的宣传鼓动队的周围，必须组织起反对李顿报告书的委员会。每一张传单，每一张报纸，每一队蓝衫团，必须是群众的组织者。同时一切我们的组织，不论是上反、工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等，要使它们变为广大群众的组织，那就必须用很大力量去进行它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更狭义些说，就是宣传工作的本身，也就是组织工作的一种。不论是宣传鼓动队，不论公开的或是秘密的报纸，都需要有计划的与具体的组织工作。如何去组织宣传鼓动队，如何召集它们的会议，如何扩大它们的组织等等，没有组织工作，是没有法子前进进一步的。创办一种报纸，而不去解决如何组织编辑委员会，如何募集捐款，如何组织通讯网与发行网，如何发展与教育通讯员等等问题，这种报纸决没有法子变为群众的报纸。

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大群众的左倾化，需要我们重新审查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更进一步的为了这一工作的转变而斗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红一方面军关于加强无线电队 建设与管理的命令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

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主要通讯工具，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目前，必须使电队之组织与工作更加健全起来。现决定各队经常随带两个月用的洋油，望随地收集并择健壮之运输员拨至电队，增加人数达七十至八十名。电队监护兵须调足一排，尤其要注意解决电队管理上之困难，希即日遵照执行。在此残酷斗争中，技术人员中难免发生动摇，应该加紧政治上的争取与物质上的优待。军团、军区及军的政治委员尤应负全责，注意译电人员必须以阶级坚定的积极分子，最好是工农分子充当，还须经过政治部的负责考察，切勿以其为技术人员而加以丝毫的忽视。至要至要！

右令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周恩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

(一) 哪些人的土地应该没收

1. 豪绅地主大私有主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以及一切出租的土地，须一律没收。
2. 祠堂、庙宇、公堂、会社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一律没收。
3. 经证明确实反革命组织（如 AB 团、社会民主党等）的富农的土地及生产工具，全家没收，房屋可以调坏的给他住，但其家属经过苏维埃政府考察，确未加入反革命组织，又无反革命行动，并向政府恳切表明与其家中反革命分子脱离关系，而当地群众不加反对者，得由政府酌量发还其按照富农地位，在土地法上应得土地的部分。
4. 富农的土地应该没收。

(二) 哪些人应该分配土地

5. 凡是雇农、贫农须一律平均分配土地，中农是否与雇

农、贫农一律平均分配土地，以中农群众自己的意见来决定。如中农群众中多数愿意平分，即使有少数不愿意，应即实行平分；如中农群众中多数欲保存原有土地，不愿意平分，应不实行平分，少数愿意平分者，仍给那少数人以平分的权利。但本省各县，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对于中农的土地已经平分好了的，不应再行变动。

6. 乡村工人苦力的家属，须一律平均分配土地。本人失业的，亦应该同样分得一份土地（失业指一年中多数时间失业，若只有少数时间失业，是临时失业，不在此例）。

7. 独立劳动者（没雇工而带徒弟的亦在内）、医生、农村教师、失业半年以上者，要分配土地（他的家属如是贫农、中农的，自然与贫农、中农同样分田；不是贫农、中农的，可以按照实际需要，酌量补助，补助之额，每人不能超过平均分田每人所得三分之二）。

8. 乡村中老板及其家属不分田。

9. 富农按劳动力与人口混合原则分坏田，即有劳动力者，按照当地每人分田数量，分以坏田。无劳动力者，酌量补以坏田，所补之田，不能超过当地分田每人数量三分之二。

10. 豪绅地主及加入了反革命组织和自动领导群众反水的富、中农的老婆、媳妇、女儿，同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结婚的，本条例公布以后，不得分配土地。

11. 凡属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妻女，用抬郎的办法与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结婚，企图保存原有财产者，政府仍应将其财产、房屋一律没收。但在分配房屋财产时候，结婚的工人、雇农、中农、贫农应分得本人的一份。

12. 豪绅地主及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富农，过去所抚养旁人的或买来的儿女在生活上教育上与豪绅地主一样的，绝对不分

配土地。如果专为豪绅地主当奴隶的，本人可以分得土地。

13. 和尚、道士、尼姑、斋公、算八字的、地理先生等封建残余，及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神父，本人是专以宗教为职业吃饭的，不得分配土地，过去分了的土地应收回。如果是以宗教为副、以耕田为主的，经群众赞成者，可以分配土地。这些人的家属，如果不靠上述职业为生，而是工人、雇农、贫农、中农或是富农的，仍依照工人、雇农、贫农、中农或富农的地位，分配土地。

14. 凡贫苦工农收容的豪绅地主的子女，自此条例公布以后，不能分配土地。

15. 豪绅地主及其家属与自动领导反水的富农，全家不得分配土地，过去分配的应收回。

16. 在革命以前，乡村小商人以做生意为主，而谋供给全家生活的，不分配土地，过去分配了的要收回。如果革命后失了业，可按照独立劳动者办法分田。

17. 小圩场的商民失业的，应该分配田地。

18. 凡妇女出嫁时，土地由本人自由处理。

(三) 土地怎样分配法

19. 应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但据贫农、中农大多数意见，要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时，亦得以村为分配土地的单位。

20. 雇农、中农、失业工人、失业独立劳动者，应按照人口，将田地好歹均匀、多少均匀的去分配。但必须按照自愿的原则。

21. 茶山、竹木山、杂粮山可算成田亩或确定价钱，按照当地情形平均分配。富农只能得荒山。大森林应交苏维埃政府

负责管理。

22. 矿山须由国家管理，由政府决定租借或组织生产合作社开采。但目前应以租借为主要办法。

23. 鱼塘可作田亩或作价或合股养鱼去分配，只分养鱼不分水。塘水以灌田为主，养鱼为次。

24. 富农多余的耕牛、房屋、农具须没收，按照贫苦工农需要（没有或缺少）来分配。

25. 豪绅地主及自动领导反水的富农的房屋、财产、农具、用具没收后，除留一部分交苏维埃及革命团体应用，一部分救济红军家属、被难群众外，其余的分配给劳苦工农。

26. 政府及各革命团体工作人员，如果不是雇农、贫农、中农、失业的工人、苦力与独立劳动者，一律不能分配土地。

（四）红军土地怎样分法

27. 红军家属土地的分配与贫农、中农一样，但须分得附近与不太远的地方（离红军家属家里）。

28. 留红军公田标准：每乡每人分得五担田以上的，每乡须留红军公田三人到五人。如田多的地方应多留公田，田少的地方（分不到五担的）亦必须留出至少二人的公田，山林木梓不要留。红军公田主要的是发动群众耕种，耕牛、肥料、种子由群众自愿供给，必要时再由政府帮助。如果在某种困难条件之下，可以出租，租额由租田人与政府商定。

（五）租借、买卖、承继及其他

29. 土地分配后，可以租借，但不能租给豪绅地主家属；

租谷多少，由双方议定。

30. 土地分配后，可以买卖，但不能卖给豪绅地主家属；土地价钱，由双方议定。土地买卖，须报告当地政府登记。

31. 土地分配后，实行家人承继。生的不补，死的不退。但死者无家属的，其土地由政府收回。

32. 凡属经过分配土地，土地革命的利益确系雇农、贫农、中农得着的地方，即在当地群众大多数不要求重新分配的地方，不应重新分配土地。在这些地方，有与新的决定和法律不符合之点，可按照新的决定与土地法令，将不符合的部分加以抽补。只有土地革命的利益未为雇农、贫农、中农得着，而为富农得着的地方，便应动员雇农、贫农、中农群众重新分配土地。

33. 被迫反水群众，除反水首领外，余者一律分配土地。如耕种时，仍未回家时，可由其亲属代为耕种。回来时，作为租借论。但一年不回者，其土地得由政府收回。

34. 当白军靖卫团、保卫团士兵的，一律分配土地，其家属亦一律分配土地。但豪绅、地主、富农出身的，不能分配土地。对靖卫团、保卫团、警察队团丁士兵，限期叫他回家来耕种，过限期后，可由政府收回。

35. 被欺骗加入反革命组织（如 AB 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的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等自首自新分子，照样分配土地；现在拘押者，尚未判决者，除富农外，仍须留田。

36. 现有荒田，应尽先奖励雇农、贫农、中农耕种，可由政府准许若干年岁不收租，不收土地税。雇农、贫农、中农租不完的荒田，可以租给富农耕种，酌量减租或免税，但减租、免税的年限，须较雇农、贫农、中农为短。只有上述各种人租不完的荒地，以及尚未开垦的荒田，无邻地移民的需要，或移

民使用有余，当地群众不反对，并在乡政府与群众严密监督之下，才可以租给豪绅地主家属耕种或开垦，但不得减免租税。并且这只限于赤色腹地，边区不适用此种办法。出租荒田、荒山的租期、租额和税额，由当地政府规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红一方面军关于 军事政治训练的训令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

我们工农红军在与敌人——帝国主义指使帮助之下的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做不断的残酷斗争的条件下，很难得到平静时间来实施军事政治的教育。因此，红军的军事政治教育，主要是在实际战斗中，其次则利用战斗间断及配置后方的一瞬间内，来实施训练和讲评。这样的教育状况，如得到一切的军事干部及政治干部深刻的注意、冷静的判断，来解答实际的需要，则红军军事政治的进步，将愈迅速愈切实。

现在，红军的政治动员很不深入，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战斗间断的瞬间，拟予以迫切的训练，望一切干部、人员切实执行下述事项：

一、阶级的政治教育，是健全和坚强部队最主要的元素。望将十一月二十四日所发的紧急训令，并抓住实际情况，来阐明这一训令，使战士们深刻了解在这一艰苦战役中所负之阶级的政治责任，来提高军事的技能，坚定牺牲的决心和团结致胜的信念。

二、要一般战士们善于使用武器，就是要求其射击准确，

刺杀熟练，以及抛掷手榴弹的命中，万不可耍无聊的花样。并于每班战士中（开始从每排做起）选定射击好的为特等射手和眼力好的为观察员。这特等射手是在战斗间专门射杀敌军的长官、机关枪射手和极有利的目标；这观察员是在战斗间观察射击的成绩和敌情的变化。这两种人都还是战斗员，此不过分工命名而已。

三、要一般战士们善于目测距离，特别是五百米以内的距离。这是要就所在地附近测定几种距离，用草把或堆土做成跪靶或卧靶，使每个战士对之目测，对之瞄准。

四、要一般战士们善于利用地形地物，特别注意伪装夜间动作，以便于秘密而无损害地接近敌人射击之或刺杀之。

五、要学习一般的行军，就是要定出保养体力的方法，如行一点二十分钟停十分钟的小休息，在长距离的一日行程后半程，停一至二小时的大休息，睡足八小时，按时给养，打裹腿，洗脚及小休息时高举起脚来舒回血脉，沐浴，调节行军步幅，不作无益之行止等。

六、要学习机动——火力与运动配合，特别是冲锋或反冲锋的火力准备和火力援助，以及实施斜射、侧射、交叉射的火力效用。

七、要学习遭遇战斗占先机之利的迅速动作和对防御的敌人进攻之接敌、进攻和冲锋的部署。

八、要学习决定进攻的主要方向和次等方向，而分出主力的突击方向和一部的钳制方向。

九、要学习进攻胜利后，火力和运动追击，迂回和包围敌人收容队，使其无整顿的余暇，同时整顿自己部队，出动机关枪防止敌人的反冲锋。

十、要学习建立顺畅的通信联络，使能在上级单一意志之

下与部队协同动作。如通讯联络断绝时，尤须本上级企图和实际情况，机断专行。

十一、要学习劣势兵力兵器的军队对优势兵力兵器之敌军作战，要能以迅速秘密的手段，在相当的地点和时间内，集中一切力量，干脆地消灭敌人，使敌人运转不灵，援助失效，被我各个击破。

十二、要学习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而下决心，并坚决实现此决心，不可有一成不变的处置，尤不可有三心二意的犹疑不决。

十三、要学习各种侦察和各种警戒。

十四、要学习山地战斗。

十五、要学习现代的战斗，是由小部队的战斗胜利开拓大兵团的战斗胜利，也就是消灭敌军一连一营即成为完全胜利之因子。

以上各项仅举其急需学习者，其余则由各兵团各部队按本身迫切需要者教育之。一切教材以红军学校教程（附注）为标准，而以其他为参考，并望将本此训令规划并实施教育情形具报总部。

右令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周恩来

附注：

主要的是：步兵战斗条令，步兵教程，单个战士教练，步枪班战术教练，连教练前编，步兵连怎样冲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

满洲省委：

听了中央巡视员及最近某同志的口头报告，研究了你们最近的一些文件，中央有以下几个问题的指示：

一、中央认为新的省委虽然在扩大会一般的接受了北方会议的决议和中央对满洲党的指示，改组了省委的组织，召集了外县的会议与一些外县建立了关系，初步的揭发了过去省委的错误，开始与这些错误斗争，在某些工作上开始转变，并且得到了一些部分的成绩（如磐石、巴彦、汤源等地义勇军的发展和建立，领导印刷的罢工、飞机厂韩国工人的斗争，创造了灾民委员会领导灾民斗争，建立了哈市电话、东铁的一些关系，发展了近郊农民支部及兵士支部等）。然而，必须指出你们在转变满洲工作中对于明确的路线的了解是不充分的，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是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

二、摆在满洲的几个严重的问题是：

（一）彻底的揭发过去省委的错误，是转变满洲工作、执行北方会议决议的前提。

要转变满洲的工作，这首先要了解过去省委的主要错误在哪里？扩大会及决议指出了过去的错误，但是错误的最中心问题是没有彻底的揭发，而是在一些错误中模糊起来。错误的中

心是什么？

北方会议很清楚的指出：

“这里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对于民族革命战争领导的忽视（满洲），在领导反帝斗争中缺乏明确的阶级的立场。”

“一方面认为义勇军是胡子土匪，而消极不理，或企图上层的勾结利用，来代替真正的艰苦的工作，另一方面则空喊组织‘真正的土地革命的反帝的游击战争’与‘变义勇军运动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却拒绝了广大群众要求武装斗争的领导与放弃利用一切可能打入已有的义勇军中去树立我们的革命工作，以致光荣的义勇军运动尚缺乏党的领导，不能彻底实行反帝政纲与土地革命。”

过去的省委在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左”倾的空谈下，否认了满洲的民族革命战争，放弃了武装民众、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因此他在一切的工作上就不能前进一步。中央几次的指出这问题的严重，而省委是没有能改正的，而是“左”倾的空喊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放松艰苦的在群众中领导的工作；没有能够抓紧满洲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的一切斗争与切实加紧广大群众的反帝运动和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因此便不能真正的去实行北方会议所指出的一切任务。

在扩大会议没有根据中央所指出的彻底的揭发过去放弃民族革命战争的错误，同时如何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没有详细的讨论，将具体的意见提出，虽然通过的决议是说到了这问题，然而我们可以看见在会议中是没有提起同志们严重的注意。

同时过去省委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对于民族革命战争视为“前途”并且根本是否认取消的，这是过去和现在主要的危险，但同时一毫不能放松

“左”的危险，立三路线的残余，空喊苏维埃政权，空喊总同盟罢工与革命的游击战争等“左”的错误。严重的关门主义成为满洲党一切工作进行的主要障碍，在“左”的空喊与关门主义之下，使我们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尤其是在反帝运动、义勇军的工作、职工运动表现得更加清楚。然而关门主义，“左”的错误，在扩大会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这不是说你们对右倾错误是已经彻底的揭发了）。

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你们扩大会的讨论中是没有严重的提出，扩大会决议案是一字没提，这是极错误的，这使你们转变满洲的工作失去了前提，这一错误必须立刻改正。将北方会议的决议深入到支部的每一个同志中去，唤起全党同志起来彻底揭露过去的错误，清醒的暴露过去省委放弃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在反帝斗争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放弃对于职工运动等罪恶，坚决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同时坚决的一点也不能放松的“左”倾的空谈盲动和严重的关门主义斗争，这便是你们转变满洲工作执行北方会议决议的前提。

（二）真正的去开展群众的反帝运动，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北方会议坚决的打击了北方党部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指出了革命危机在北方的存在，并且指出了创造北方新的苏维埃区域的任务，然而北方会议很明显的指出，要完成这一任务，北方的党必须是真正的到群众中去，坚决的领导群众的斗争，把群众斗争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中去。积极的去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从领导群众的斗争中，积极的进行和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中，去创造苏维埃区域，这里如立三路线的空喊全国总暴动，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

最近国际十二次执委会指出领导民族革命战争是中国党目

前的战斗任务，指出满洲党在加紧去执行和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中、积极的发动工农的斗争中，在满洲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的任务，这更证明了北方会议正确的指示。

满洲党必须清醒地坚定地把握着你们目前紧迫的中心的任务，动员、组织和领导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开展群众的反帝斗争，千百倍的努力义勇军的工作，真正的去争取义勇军的领导，广大的武装民众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积极的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中去完成国际及中央所指出的任务。

目前满洲的民族革命战争日益广大的激烈的发展，全满洲——尤其是北满的义勇军积极的行动，海拉尔、富拉尔基、齐克线、呼海线、宁安及沈海奉山线各地义勇军激烈的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进攻，罢工的浪潮、农民灾民的斗争，普遍到满洲的各城市和乡村，在水灾后更加汹涌，广大的工人农民投到义勇军中去；中东路工人一面做工，一面到红枪会里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许多满洲国的军队兵舰杀死反动的长官投到义勇军中去，满洲的民族革命战争是如火如荼的发展，工农劳苦群众热烈的迫切的要我们领导甚至自动的打出我们的旗帜，在广大的中东路工人和农民所参加的红枪会，对于国民党的将军们的勾结都置之不理，“他们便积极的设法找共产党，要求共产党改编。”

“他们英勇的活动已弥漫着满洲的全部，他们坚持再接再厉的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给予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压迫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打击”（北方会议决议），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更凶残的轰炸、屠杀满洲的义勇军和工农劳苦群众，动员大批的军队向北满进攻，积极的进攻热河、华北。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在李顿报告书公开宣言之下，更进一步的来进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强盗行动。这一切新的事实，更证明国际及

中央指示的正确，更加要求满洲党在这紧张战斗的环境中，将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看成你们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是你们一切工作最中心的环子。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区，建立满洲的民众政权，创造北方的苏维埃区域，都要从这一中心去完成的。

然而我们在许多文件上看到，你们还没有将这一任务提高到最高的程度，深刻的把握着这一中心任务。在许多文件上表现了你们常常是以一般的注意来代替了这一任务的战斗的动员（如水灾决议等），在有的文件中表现空谈“苏维埃的满洲”、“满洲苏维埃的政权”。最明显的，是你们扩大会的告同志书，那里根本没有为了进行和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去动员全党的同志，动员全党同志去积极从领导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中、参加和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中去实行北方会议的决议，而只是说：“建立满洲苏维埃的政权早已提到满洲党的面前，满洲党的工作日程早已应该为建立满洲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这里很明显的表现你们对于北方会议的决议的了解还是非常不够的。新的省委必须清楚的认识，布尔什维克的北方会议的决议决不是立三路线的空喊，坚决的反对离开群众的斗争，离开领导满洲的广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一切右倾和“左”倾的倾向，握着国际及中央给你们的中心任务，真正的去实行北方会议所指出的：

“今后北方党在这一方面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开展北方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用尽一切力量争取群众的领导权到我们的手里，揭破国民党改组派的欺骗，动员大批的工农和得力的干部去参加和领导满洲的反日战争；要十倍努力的组织工人群众的反日罢工，发展抵货运动，将抵货运动的领导争取到我们的手中来；发展与创立反帝的与反日的广大的群众组织，保证在

这些组织中的无产阶级的骨干与领导，武装工人与劳苦群众开展组织，领导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最广大的告诉群众，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够顺利的实行民族革命的胜利与求得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这里必须特别指出加紧义勇军的运动，省委必须以战斗的动员来进行这一运动。要坚决反对对于义勇军工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投降，做国民党地主豪绅的俘虏（如磐石、庆城及马占山、唐聚五的队伍，珠河等处），同时必须反对“左”的空喊、严重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将义勇军中的广大的反帝的工农劳苦群众与反动的国民党改组派的领袖、地主豪绅视为一样的东西，甚至将广大的工农参加的红枪会完全视为法西斯蒂的组织，提出“打倒红枪会”的口号，认为群众“都是糊涂不得了”（珠河），或者以为“人多了没办法”等等的错误，予以严重的打击。省委必须严重的讨论这问题，提出义勇军运动的纲领，采取独立领导和公开群众的路线，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来进行这运动。目前必须：（1）抓住和选择工作的中心（如北满的义勇军、王德林的部队、中东路红枪会、唐聚五的队伍等处），组织和选派我们的干部和工农群众打入进去，提出我们纲领，揭破反革命的欺骗妥协与出卖的真实面具，建立我们的领导。（2）在我们有基础的地方，如磐石、巴彦、汤源、延边等地，不是和平的保全武装，而是要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开展反帝斗争，扩大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广大的强有力的队伍，来影响和团结广大的义勇军在我们的周围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使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的联系。省委必须对于这些地方的工作详细的讨论，派得力的干部去领导和帮助工作。（3）开展拥护和援助义勇军的运动，进行募捐、慰劳、救护等工作，出版反帝的拥护义勇军的报纸刊物……总

之，中央责成省委将北方会议对于“开展义勇军运动与树立党的领导”的全部指示，真正的实行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加紧的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斗争，真正的开展拥护苏联的运动。

反苏联战争的危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危急。在满洲被摧残与奴役之后，在上海浴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在向着苏联的边境前进，大炮的雷鸣轰响于邻近苏联的满洲的边境。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了派遣大批的军队在满洲之外，更武装了日本在满的侨民，组织屯田军，武装白俄，在韩国建立了极大的兵工厂，改造松花江的商船为兵舰，建筑许多的飞机场，利用在它卵翼之下的满洲国来作反苏联的工具，勾结与驱使马占山、苏炳文等军阀积极向苏联边境推进，在李顿报告书发布之后，在我们面前更放着极大的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危险，一切这些情形都更加重了全党尤其是满洲党保卫苏联的巨大责任。北方会议着重的指明了你们过去忽视以至放弃组织与开展反对反苏联战争的实际斗争的错误与罪恶。你们必须清醒的认识满洲党在这一伟大任务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号召并组织广大的劳苦群众去参加义勇军与最大限度开展民族革命战争，要加紧组织兵工厂、铁路、海员、飞机厂工人反对进攻苏联、屠杀义勇军的斗争和罢工，以群众力量破坏铁路和军事运输，阻碍日本军队的前进，真实的去进行反对反苏联战争。

开展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这是强有力的阻止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实现的中心任务，因此党及一切群众组织必须用更加十倍的力量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然而这并不是说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保卫苏联的工作，在这里，首先要经过我们一切报纸、传单、标语及口头的宣传鼓动，经常的去警醒工人阶级及

劳苦群众，以反苏联战争危险性的紧急，揭破帝国主义造谣污蔑的事实，甚至他们都将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满洲国”所造成的水灾推到苏联的身上去，我们要在群众面前无情的揭露（你们的水灾决议都没有指出），并广泛的解释苏联的和平政策，宣传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内容和意义。必须扩大反对白俄的运动，组织工人群众抗议拘捕中东路苏联工人的斗争，召集专门的会议、群众会议来解释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李顿报告书的罪恶，组织广大群众的苏联之友等组织去团结群众开展拥护苏联的运动。必须了解西安煤矿工人，在工人群众中自动的宣传拥护苏联，广大群众充满着拥护苏联的热情，而过去的省委是根本没有去进行这一运动。

还要着重的指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中国苏维埃区与红军是他们进攻苏联的不可分离的步骤，要最密切的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苏联的运动与反对四次“围剿”与拥护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斗争联系起来。你们最近有拥护红军的决议，我们希望你们将决议执行到实际工作中去。

（四）组织和领导年关斗争和冬荒斗争。

要真正的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党必须是十百倍的去组织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尤其是要彻底的转变党的职工运动，组织和领导工人的斗争和罢工，来加强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执行这些工作，省委就必须加紧去组织和领导年关斗争和冬荒斗争。满洲党应该清楚的了解今年的年关也正是满洲工农劳苦群众的死关，他们的生活比任何地方痛苦，他们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一年的屠杀、轰击，他们遭受普遍了满洲的洪水的淹没，他们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疯狂的屠杀与剥削之下死亡、饥饿、寒冷、失业、破产，陷入了悲惨死亡

的地狱，这便使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不得不从死亡中更坚定的去采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革命出路。因此党的任务更是要去领导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准备和组织工人的罢工，加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努力去领导农民灾民的斗争，加紧扩大义勇军运动，组织兵士的哗变和斗争，从这些工作中去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执行这一工作。

1. 首先要彻底转变满洲党的职工运动。这里关于职工运动我们要给你们专门信件的指示，这里只说到在年关斗争中几个中心问题：（1）必须纠正过去省委是放弃工人运动，空喊同盟罢工、反帝罢工，完全脱离群众，脱离工人斗争的严重的错误。目前你们必须真正的抓住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加紧厂内活动，根据中央年关斗争的决议及各企业具体的情形，提出年关斗争的要求纲领。要抓住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去组织他的斗争和罢工，这里不仅是一般的注意而是要抓住几个中心产业和地方，去集中力量的组织和准备。因此（2）你们就要将工作集中到铁路、矿山、兵工厂、飞机厂、市政和纺织中去。集中到哈尔滨、沈阳、抚顺、大连及东铁、奉山等去，在这些产业和中心的城市中抓住几厂加紧的活动，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改造我们的工厂支部，发展和扩大我们的组织。（3）必须去深深了解北方会议对于职工运动的决议，坚决的开展反对取消赤色工会，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的机会主义和极端严重的关门主义，反对放弃黄色工会中夺取群众的工作，要真正的在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和罢工运动中吸收广大的无组织的群众，发展女工青工，扩大群众的赤色工会的组织，在企业中黄色工会中真正的去建立广大的强有力的赤色小组和革命反对派的组织，这是组织年关斗争，转变职工运动的前提。（4）在组织年关斗争中必须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用我们的纲领和同志的态度

去说服反动派别和黄色工会所欺骗的群众，在群众共同要求上去团结群众，建立年关斗争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罢工委员会等组织，来团结和领导广大群众女工青工作斗争，在群众的日常斗争去与反帝运动密切的联系。

2. 关于失业工人的运动，你们是没有开始，在你们的组织里是存在着严重的对于失业工人运动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中央责成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迅速的来进行这一工作，这是你们在职工运动年关斗争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尤其是在几乎全部工人阶级失业的满洲的环境里。我们要求你们真正的详细的去讨论中央两个失业决议，把这决议深入到支部和群众中去，要求你们在党与工会的组织里指定专门人负责，组织失业工作委员会，而尤其重要的是你们要把握着这一中心任务，去紧急的动员和组织失业工人运动日（见中央失业运动日的决议）。请先将你们的失业运动日的具体计划迅速的送给我们审查。

3. 关于组织灾民农民的冬荒斗争，中央有农民运动的决议、年关冬荒斗争决议，同时你们已提出了水灾的决议，这里不再重复。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你们，千万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就完了你们的任务，实际上通过了决议是运动的刚刚开始。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将中央及你们的决议真正的深入到群众中去，执行到实际工作中去。你们要将那些决议中所提出的要求使之个别化、具体化，能够真正的抓住群众的要求去广泛的组织灾民委员会，建立灾民的组织，发动广大灾民的斗争，组织灾民的饥饿示威，使灾民运动与义勇军的反日战争密切联系。要加紧在农民的运动，广大的发动农民的斗争，要坚决的反对富农路线和关门主义，在年关斗争、反帝运动中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进行抗租抗税、反对政府一切命令的斗争，建立广大的农民委员会的组织和雇农工会，尤其重要的要深入到中国的农民

雇农中去进行坚定的工作，领导他们的斗争与韩国的农民联合在一起。要了解过去我们不能创造独立的广大的义勇军的队伍，我们在农民中没有工作与工作的薄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4. 估计到广大的兵士的痛苦，激烈的反帝情绪，各地爆发着兵变的潮流，加紧兵士工作，组织他们的斗争与工农群众联合起来，积极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再着重指出北方会议所指出的：

“丝毫不应放松满洲国军队的瓦解破坏工作的进行，目前尤其重要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争取反日战线上士兵群众（如北满等地），应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实现国际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

“满洲、河北等地党部必须利用一切力量与可能，建立对于日兵的系统的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开展日兵斗争与哗变。”

（五）实行党的队伍的彻底的改造，加强扩大党的组织。

“党的组织的薄弱，是党在许多大的斗争——罢工、游击战争、农民运动之中不能取得领导的根本原因。”这一指示完全适合于目前满洲党在组织上的严重现象。现在党的基础局限在韩国同志方面，党员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韩国同志。尽管在开展着的反日战争与广大群众革命斗争中摆着很好的吸收新党员的条件，然而过去满洲党在全部工作中是没有提到过为增加一倍党员而斗争，特别是在中国的革命工农群众中没有进行坚定的工作，关门主义成为满洲党在组织上非常严重的现象。实行党的队伍彻底改造与加强无产阶级基础，是目前满洲党面前极端严重的任务。现在一方面必须用最大力量巩固党已有的产业支部，改正过去领导机关对于支部的关系，真正把北方会议的决议深入到支部中去极大的启发同志的积极性、创造性，加紧训练支部中的干部，建立支部的生活与工作。同时必须最大胆

的向广大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群众开门——尤其是中国的革命群众中、重要的企业中，在组织上来巩固我们开展着的政治影响，吸收成千成万的先进的革命工人到党的队伍中来，不应该让一个积极的革命工人站在共产党的队伍之外。号召每一个革命的工人、失业工人、农民、兵士、义勇军群众加入共产党，使满洲的党成为真正强大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的党。你们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具体的立刻开始这一征收党员运动。

同时，你们必须彻底改造党的组织，进行改造支部的工作，吸引新的积极的工农干部到指导机关，彻底的去改造外县的党部（如磐石等），保证国际与中央的路线顺利的执行。加紧党内教育工作，严密自己的组织，立刻消灭组织上许多非常的现象（例如新民支部选举非同志做支部书记，在中东支部中组织整理委员会，省委巡视员一去不返，团里开除的同志随便入党等），彻底的改变领导方式，这是你们巩固党发展党最主要的任务。

过去满洲省委的领导方式可以说是全国党部中最恶劣的了：自我批评没有结果，对于中央的文件只是搁在省委机关中研究参考，而不设法传达到下层同志中并在实际工作中去执行，把工作错误推到下层同志身上，压制下层群众积极性，工作混乱，普遍主义，没有中心，没有活泼的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已经一刻不能容忍下去，应该用最大的火力来执行转变。首先要铲除脱离同志、脱离群众的现象，开展两条战线斗争一直深入到支部中去，倾听下层工作同志的意见，启发下层同志与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立刻开始运用许多新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发展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为实际执行党的决议而斗争。尤其要深刻的注意是建立外县的领导，保证与那些组织经常的关系，因此省委必须立刻建立巡视工作，改变那种空洞

的敷衍的巡视的方式（如庆城巡视员的报告）。同时中央决定××特委、××由中央直接指导，他们与省委发生横的关系，同样的经常给省委报告，省委对于他们可以给以指示。这在满洲今日交通关系的阻隔上，使指导工作的灵敏上，是十分必要的。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周恩来关于集全力 引动敌人、求运动战中解决之 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

(甲) 十五日我方面军(欠十五军)前卫占领攻击邵武城阵地后，敌集十一团之众固守城内外工事不出，光泽敌亦退集邵河北岸。十九路军到邵，化十余日，已筑好全部工事，堡垒、壕沟均新式，城墙亦修好。我军如猛攻须大损失。城外山地占领后，敌仍可扼城固守。我过去对邵武工事估量不足。

(乙) 因此，我军决回黎川迎击西来之敌，今日已开始运动，明日可至黎川适当地点。

(丙) 邵敌今日仍未出工事，西南之敌则因我邵武行动，今日已有出动讯。

(丁) 两月来红军行动完全立于中央来电所指示的“不等敌人集中全力，即先机制敌”的主动地位，只是敌因此便固守坚固堡垒工事，集结兵力待机出动。月初我军逼近南城，这次进攻邵武都因敌出此策我乃须另变战略。故中央电示求攻南城之敌，我们正集全力引动敌人，求于运动战中解决之。如直攻

南城，则敌集重兵于此，地形工事较邵武尤险，攻之于我不利。

恩 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关于地方武装编制问题的密令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甲、为了在这次战争中，更多地消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
大举进攻，争取江西首先胜利起见，必须以最大努力去坚强地
方武装的力量，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我们
争取战争全部胜利的必要条件。

乙、为了击破敌人进攻的集团战略与所采取的十个战术，
就需要地方武装强有力地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使敌人的企图
全部归于失败。同时，要使地方武装的组织力量特别加强起
来，能有力的便于执行任务。

丙、根据现有的地方武装组织完全是依照正式红军来编制
的，这不仅因为地方武装的武器以白刃居多，而且军事干部缺
乏，赤卫军、小队更是群众的武装，没有建立起正式军队生
活，训练、给养都比红军感觉困难，并且在行动上协助主力
红军作战，所采用的战术主要的是游击战术，这就决定地方武
装的组织要适合于这些条件来编制，主要的原则是短小精悍，
便于行动的敏捷、突击有力。因此旧的编制太过庞大，不便于
执行任务。

丁、在游击战术中主要的是袭击敌人，在战斗上是以白刃
战为主。就我们地方武装的武器来说，那是最有利于我们采用

这种战术和战斗的，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这一种优越条件。但是最近脱离生产的武装，普遍的只要步枪，鄙视梭镖，这是不对的。固然加强火力是重要，但所有地方武装的步枪，绝大多数没有刺刀，因此在袭击敌人与实行白刃战斗时不仅减少解决战斗力量，有时反受敌人的白刃威胁而退，以致影响任务的执行。

戊、赤卫军、小队之武器，梭镖作主干，但各地编制时往往将少数步枪集中编到模范营、模范小队中之一部，不能够使火力与白刃配合，削弱赤卫军、小队特别是模范赤卫营和模范小队整个武装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

己、根据地方武装的特殊条件和任务，现决定地方武装新的编制原则如下：

一、独立团能照红军编制，但武器配置上以三分之二为火力，三分之一为白刃（梭镖），混合在排内。

二、游击队基本编制，采五班制，内分火力三班，白刃（梭镖）二班，不设排，直属于队部，加队副二人。挺进游击队仍照红军编制。

三、模范赤卫军和模范小队的编制以每连采三排六班制，以十一人为一班。三连模范赤卫连、一连模范小队为一营，每区一营，三营为一团（三区合编为团），每县三团到五团，编一师。

四、赤卫军采用三班一排，四排一连的编制，以三排为战斗排，一排系救护排（以壮年妇女来编制）。在作战时，战斗排在前面作战，救护排担任战时救护和后方勤务。四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三团为一师，三师到五师为一军。乡最少编一连，二乡或三乡编一营，一区成立一团，每三团成立一师，

每县成立一军。

五、少先队因系青年群众半军事组织，仍照原定编制。

六、在游击队和模范营的班之下分为两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在作战时可成为一个战斗群，便于进攻和退却。

七、模范赤卫军和模范少队的武器配置每班步枪三支，班长、组长各一支，队员系梭镖八支，连长、政委、排长步枪各一支，每连共步枪二十三支，梭镖共四十八支。

八、赤卫军、少先队武器配备如模范营同，但以鸟枪、土炮来代替步枪。但土炮可合编一排，直属于营部。

九、梭镖长度一律定为五尺二寸。每一赤卫军、少队都应备一种武器。

十、除一般编制外，如步枪仍多的时候，模范营每班可增加二支到四支，每连增加到三十五支至四十七支步枪。

十一、政治委员制度在这次改编时一律建立起来，赤卫军及模范少队，连设政委、指导员，营团师均设政委。如连单独担任任务，临时委任政委。一切指挥员、政委由军区、军分区、军事部和其政治部委任。

庚、限定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内改编完毕。

辛、在改编时如游击队独立团在出击的时候，须等到回苏区后再改编，未出发的立即改编。

壬、模范营之改编，可按旧有的编制人数为基础来增减，不应采用混合改编，以免延迟时日。

癸、各种武器（如梭镖、火药）须动员群众从速集齐，同时，改编好后一切训练要注意实际的战斗教育和演习，彻底废除过去一切形式的非战斗的教育和训练，完全实施劳战会所规定的教育计划。

以上各项望各级政府、军区、军分区、军事部严格遵照执行。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 关于肃反工作检阅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 因为苏维埃革命运动胜利的发展，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帝国主义国民党有了三次进攻革命遭受惨败的教训，知道凭军事力量的进攻是不能收到“成效”的，所以在四次“围剿”中特别注意政治上的进攻。在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之下，这一次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和红军，我们应估计到除以极大兵力准备持久围攻外，必然要特别注意政治上的欺骗与阴谋，蒙蔽白区的工农群众，特别是要打入苏区内部来破坏革命。而这种政治上的欺骗与阴谋的主要方法，除在白色区域用抗日的欺骗来掩盖其出卖民族利益、帮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实质，制造“剿共”胜利的消息，组织“匪区视查团”等，传播一些苏区如何“残酷”的谣言，企图减低白区工农群众为着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勇气，在苏区边境用“优待俘匪”、“按口授田”、“农村合作社”等类口号，企图欺骗和动摇苏区内的工农群众外，在苏区内部，必然而且正在用一切方法进行下列进攻革命的阴谋活动：

1. 以金钱来收买利诱革命队伍中动摇异己分子，打入红军政府、地方武装和党及群众组织中，来破坏革命力量。
2. 用一切方法组织苏区内部豪绅、地主残余和资本家、

富农等反革命力量，来进行反抗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活动。

3. 指挥组织发展 AB 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改组派、罗章龙右派等反革命派别在苏区内部的一切反革命阴谋破坏的活动。

（二）我们应估计到，以上一切必然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攻中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时七分政治的内容。各级党部必须根据党以积极的进攻进行和准备长期艰苦战争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总路线，以最大的努力加紧肃反工作。必须认识肃清苏区内一切反革命活动与组织，断绝一切敌人各种反革命派别思想的传播，巩固革命的队伍与后方，是我们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战争全部胜利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

（三）中央局检阅过去半年来中央区的肃反工作，认为在今年一月中央局决议发布后，各地大体上均已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缺乏明确阶级路线的错误，消灭了在群众中恐怖的现象。在较老的苏区以内，在红军中建立起各级保卫局的组织系统，破获了季黄等反革命案件^{〔1〕}，最近拘捕了江西 AB 团的领袖段起凤，有些地方举行户口的清查，一部分是相当地发动了群众等，这是我们肃反的成绩。然一般情形，各地对于肃反工作表现机会主义消极与忽视状况，尤其是最近二月来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战争紧急动员中，各地党和保卫局缺乏或者是完全没有认识肃反工作重要性，继续过去忽视这一工作的状况，这是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

（四）过去这一时期中肃反工作的消极与忽视，很显然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认识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中特别注意从政治上来进攻和破坏革命的严重性，而反映着农村中落后的和平保守意识，认为反革命势力和派别已受到了严重打击，在革命胜利的向前发展中，不能再有积极活

动；不知道苏区内被推翻的豪绅、地主及富农和反革命派别余留的势力，必然要随时企图和进行其反革命的阴谋，因此放松对于肃反工作的注意，忽视在广大群众中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没有经常有系统去揭发一切反革命思想与阴谋活动的内容，更没有充分去运用群众路线，以广大群众力量去严密监视豪绅、地主、富农一切反革命活动，举发一切反革命派别和分子在苏区内的阴谋破坏革命的行动。甚至有些地方与个别同志发生一种对反对反革命派的斗争采取了妥协、调和、姑息和自由主义的立场，更严重的有些区委区乡苏及支部同志签名担保豪绅、地主与富农的现象。各级保卫局和边区肃反委员会组织和工作的多不健全，特别是区一级的特派员经常更换，缺乏单独工作能力，侦察网没有普遍建立，侦察技术薄弱。地方党表现还没有深刻了解保卫局工作是巩固革命胜利镇压和肃清反革命活动、防止一切反革命混入革命队伍中来的重要工作，因此党与政府很少讨论肃反工作，对肃反机关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巩固没有负其应有的责任。

（五）由于这一切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就给了苏区内反革命势力和派别抬头活动的机会，以致在江西、闽西时常发现反革命标语、神教性的反革命组织（江西）和地主、富农的秘密组织与活动（闽西有富农做草鞋准备慰劳白军），甚至在群众游行示威中叫出反动的口号（长汀），地方武装中发现拖枪叛变的事实，甚至企图举行反抗苏维埃政府的暴动（宁都事件），以及红军中郭炳生等可耻的叛变，带枪反水的个别现象时常发生。这一切事实指明反革命派别和分子抬头活动的严重情况，党如不以极大的注意去肃清和防止一切反革命的组织与活动，在长期而更艰苦斗争中必然要演成更严重恶果的。

（六）在目前战争紧急动员当中，各级党部必须认识肃反

工作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战争全部胜利的重要部分。这首先应在党内发动思想上的斗争，反对一切由于对目前形势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忽视肃反工作倾向，严厉打击一切对于反对反革命派别斗争的妥协、调和、姑息和自由主义的错误，同时要防止一切不相信群众基础而过分估计苏区内反革命派别力量的机会主义和过去肃反工作错误的重复产生，纠正过去各地把肃反工作简单看成是肃反机关——保卫局和边区肃反委员会——责任的错误观点，根据以前中央及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决议，依据群众路线与阶级路线，使肃反工作适应目前战争形势而有彻底的转变。

（七）为着肃反工作的彻底转变，中央局指出下列工作必须切实的执行：

一、在各种刊物及群众会议上，指出敌人在这次大举进攻中以极大力量来欺骗群众、破坏革命力量的策略，经常注意揭发敌人和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改良欺骗造谣及其收买利诱、阴谋破坏革命等罪恶，扩大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加强群众政治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与政治坚定性，加深群众对于阶级敌人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阶级仇恨。

二、必须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发展群众的阶级斗争，特别注意发动群众举发一切有反革命活动和嫌疑的分子，以供保卫局和其特派员来侦查。要注意以群众力量严密监视豪绅、地主、资本家和富农的行动，切实执行对于这些成分和有反革命嫌疑的户口清查。必须认识，只有广大群众积极自觉的参加肃反工作，才是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阴谋活动最有力的保障。

三、对于因破获而被拘捕的反革命分子，应根据中央政府第六号与十一号训令，按照阶级路线迅速解决。对于阶级异己

分子，有反革命证据者，应经过公审严厉处置；对于工农分子，因受欺骗而加入了反革命组织而未负重大责任者，应许其自新，从轻迅速处理，并注意宣传被欺骗的工农分子自首。边区肃反委员会对于显著而重要的反革命分子，要迅速严厉处置，因为这对于群众斗争的发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四、各级党部应根据中央政府训令与中央局通知，领导各级政府检举委员会，并发动群众，严格去检举政府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以防止反革命的利用和混入。在其他群众组织的机关中——如工会、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等——亦须发动群众检举这类分子，撤换其工作。红军中必须加紧思想斗争，继续坚决撤换异己动摇分子，特别要注意提拔工人干部担任政治和军事责任。凡是经过自首或自新的工农分子，恢复选民资格者，在原则上是有参加武装组织的权利；但在目前革命战争剧烈发展的时候，对于工作不积极政治上表示不坚定的分子，仍应拒绝其加入武装组织，已加入的应洗刷出去，特别是游击队独立师团和红军中更应迅速加以洗刷。可吸收到其他群众组织，加紧对他们的政治教育，以争取他们积极来参加革命工作，而不致重犯错误。

五、中央局责成各级党部选派一部分最好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以健全各级保卫局和边区肃反委员会的组织，并在支部中及群众组织中找出一部分政治上坚定的分子介绍给保卫局，来建立周密的侦察网。特别要注意城市及边区的侦察工作，因为这些地方是反革命最容易混入和隐藏的地区。

六、中央局责成国家保卫局负责同志于最近时间详细审查各级保卫局干部成分、政治坚定性和其工作状况，坚决撤消一切消极怠工动摇异己分子，严厉纠正各级保卫局对于肃反工作所表现的非常照旧的消极应付的现象，这是没有认识在敌人大

举进攻中肃反工作的重要性。以后国家保卫局应经常加紧对各级保卫局工作上的督促和领导，特别注意保卫局工作干部的训练，尽量求侦察技术上的进步，根据所得材料迅速去破获反革命全部组织。

七、各级党部——直到支部最近应讨论一次肃反工作，对过去一时期肃反工作作一次检阅，订出以后工作的具体实现的方法。各级保卫局虽是有集中系统的组织，在省县及区党部对于同级保卫局及区的特派员工作应负起政治上领导的责任。中央及省县保卫局工作委员会以后应定期举行会议，经常检阅肃反工作的进行。

中 央 局

十二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注 释

〔1〕季，指季振同，原为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七十四旅旅长；黄，指黄中岳，原为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第一团团团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与全军将士一起举行了宁都起义。起义后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并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黄中岳任第五军团十五军军长。由于当时“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央苏区最高人民法庭将季振同、黄中岳错误判罪，并于长征前夕处决。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平反决定，为季振同、黄中岳恢复了名誉。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关于 选敌弱点进攻、避免同强敌决战 给孔荷宠等的电报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孔黄^[1]并省委、省苏：

二十六日电悉。

甲、你们必须认识目前敌人大举进攻江西各苏区的严重性，必须各方面动员来破坏敌人之进攻。十六军是主力，决不应分散使用。应以独立师组织挺进队、游击队到敌人侧后方，广大地发展和繁殖游击战争，号召群众斗争，瓦解敌军。应发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从各方与敌人进行小的战斗，以便十六军集结兵力，选择敌人弱点进攻，以避免同过于强大的敌军决战。至攻击方面应由你们依实际情况决定，但必须时时处于主动地位，并积极动作。

乙、四个月计划中心应扩大十六军一倍，与发展各个战线上的小战斗，尤急于本年内。这必须全苏区动员，望党及苏维埃切实进行。

丙、中革军委前几次电示极关重要，望坚决执行。

周朱王 于前方

二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黄志竞。

中共中央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 热河华北给河北省委的信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河北省委：

关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华北，中央上次信中已经有具体的指示，最近接到你们的来信，中央有下面的指示：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平津的强盗行动，是正在剧烈的疯狂的进行。六个师团以上的兵力的动员，大批飞机军舰的出动，组织汉奸便衣队等武装，沿着锦朝线、北宁线、开鲁一带，向热河、平津积极进攻，在南方长江的军舰也积极的活动，飞机大炮的凶焰，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帮助和国民党的投降出卖之下，拼命的向着中国的劳苦群众轰击，使热河、榆关的民众“死亡甚重，村庄炸没”。

在中国革命危机的发展上有着革命形势的存在，反帝运动的高潮发展到中国各地，在很大的地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工农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猛烈的发展和苏联在中国民众中政治影响急剧的增长，使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国民党更加企图从瓜分中国、镇压中国、进攻苏联来求得其绝望的出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平津的强盗行动，是在国际联盟——尤其是英法帝国主义直接帮助之下进行，企图扩大进攻中国革命与苏联的根据地到热河、华北、蒙

古去，以更进的实现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目的。这一事变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问题，更提到了极端危急与扩大的形势，同时也极度的紧张化了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尤其是日美的冲突。中国与华北的千百万劳苦群众正处在一个生死的紧急关头，他们将在帝国主义的大屠杀中受到没有尝过的痛苦、蹂躏和血的牺牲。

国民党在这一事变中，更加露骨的无耻的出卖中国的民族利益，将热河、华北恭送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手里。汤玉麟已经是完全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将热河变成满洲国的一部。张学良已经与日本的土肥原秘密签订出卖华北的条约，准备由北平逃到保定去。许多军队向平汉线秘密移动，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广东政府、蒋介石、张学良及一切国民党军阀都是匍匐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面前，残酷的进攻红军苏区，瓦解破坏东北义勇军英勇的斗争，镇压屠杀一切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来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其清道夫的作用；同时散布着“坚决抵抗”、“剿匪胜利”的烟幕弹来蒙蔽群众，以帮助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来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的进攻，无疑的要更加引起中国民众强有力的反日的斗争来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一斗争，在华北、热河、平津必然更加卷入广大的劳苦群众，而无产阶级是这一运动领导的先锋。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在广大群众前面，比任何时候都更充分的揭破了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真相，使广大的群众日加脱离国民党的影响走向民族革命斗争，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要将很迅速的的生长成为更广大更普遍的武装的反帝斗争。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没有党的强有力的领导，没有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的工作，华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不能顺利地发展与成功。

河北党应该清楚的估计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热河平津的严重形势，应该认识过去中央一再次的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华北的正确指示，最坚决的去动员全党执行共产国际十二次执委的决议，“在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斗争，争取中国之独立统一的口号之下动员群众”，最迅速的动员广大的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华北，自动的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向广大的劳苦群众具体的指出，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彻底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组织群众的强有力的广大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工人的反日罢工经济斗争，在天津、唐山、北平等地估计到当地的条件，适时的提出总同盟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加紧去发展义勇军、兵士、农民、学生的运动，组织广大的群众到民族解放战争中，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热河的强盗行动，保护中国革命和北方的劳苦群众。

在执行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中，必须坚决反对以为国民党汤玉麟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不立刻领导我们所能够领导的义勇军对日作战（河北报告内蒙同志的意见）的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使最小的轻视目前情形的严重性，与执行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的动摇，应该看作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中央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新的进攻的紧急通知）。但同时我们必须严重的指出，在河北党的队伍中空喊民族革命战争、空喊同盟罢工、地方暴动等立三路线的残余是存在着。河北党过去工作是有些进步和成绩，但是必须指出你们主要的弱点，就是对于群众没有密切的适当的联系，党还□不从坚定的进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是系统的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广大的发动

农民抗捐抗税等斗争，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的组织，建立农民委员会的工作，将广大的群众团结在反帝的组织里——尤其是工人阶级。有的同志以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总同盟罢工”的口号就算完事，以为这些口号可以不必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即可成功的，因此使大的产业区域内（特别是天津、唐山等地），在那里，我们的缺点在现在的形势下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党与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的联系和对于工人斗争领导的薄弱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党没有对于群众的反帝斗争给以必要的无产阶级骨干的领导，不能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上广大的有力的开展反帝运动。

河北省委必须清楚的估计这些严重的弱点。要十分引起你们警惕的是，不艰苦的进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深入广大的群众中——尤其是工人群众中，去组织群众，领导和发动群众的斗争，是不会真正的实现民族革命战争。同样的不艰苦的有系统的进行厂内活动，组织工人群众和失业工人为日常的最小的要求而斗争，改善我们对于群众的联系，广大的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的组织，加强和扩大赤色小组，真正的进行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的工作，我们就不能实现同盟罢工。正因你们对于领导日常斗争估计不足，放弃了厂内活动的努力（北平市委对于工厂支部是经常没关系的），所以你们喊了许久和定了许多的同盟罢工，是从来没有在你们的领导中实现过的（这是我们上次信中再三的严重的指出的问题）。所以在现在的事变中，省委必须坚决的与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空谈、立三路线的残余作坚决的斗争，必须在坚定的开展群众工作的路线上来进行和实现民族革命战争。下列的工作，中央要求省委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努力执行：

1. 在动员广大的劳苦群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上，党必须广大的有系统的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发表宣言，出版刊物，在工厂、矿山、码头、学校、兵营、农村中进行各种的会议（群众大会、代表会、露天会议、飞行集会等）。指出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屠杀中国劳苦群众的罪恶，利用具体事实揭破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面具及一切反动派别反革命的态度。真正的指出劳苦群众只有自动的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才是革命的出路。扩大拥护红军反对国民党“围剿”的宣传，将中国劳苦民众与苏联社会的联盟的口号通俗化的深入到群众中去。各级党部必须具体的规定他们行动的纲领，将中央的口号具体化、地方化，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动员群众到民族革命斗争的战线中去。

2. 必须十倍的开展反帝反日的群众工作，真正的广大的组织义勇军的队伍，发展义勇军抗日战争，开展抵货运动，将抵货运动的领导抓在我们的手里。组织和争取在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群众中公开和半公开的反帝的组织，这些组织应该是包含广大群众的，这里必须是坚决的彻底的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北平的反帝组织、内蒙和各地义勇军的队伍，省委必须加强他无产阶级的骨干，具体的领导扩大加强他们的组织，改善他们空泛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的组。在一些反动派别所领导的反帝团体，我们必须打入进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夺取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目前要加紧准备和组织“一二八”的示威运动，把进攻热河、华北与上海事变密切的联系。

3. 要真正的加紧厂内活动，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有组

织的去发动反日罢工和年关斗争，努力的在工厂、作坊、矿山、铁路、码头的广大工人群众里进行反日委员会及各种反帝的组织，发展和建立赤色工会和反对派的组织，把这些组织变成真正广大群众的组织，坚决的反对关门主义，以适应目前群众斗争和反日斗争的环境。有系统的去建立工人义勇军、自卫队的组织，动员广大工人群众武装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唐山矿工、北宁路、天津的日厂及纱厂市政工人、铁路海员工人中要百倍的加紧我们的工作，在日常斗争反日斗争厂内活动的基础上，去争取和准备反日的总同盟罢工。我们再重复的指出，脱离了群众的日常斗争，不去真正进行反日的群众工作，是不会实现同盟罢工的。省委必须在组织工人的反帝组织中坚决去执行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的决议：“执行下层联合战线的策略，在军火工厂中、码头、工厂、铁路、轮船上建立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警备委员会及行动委员会，发展群众行动，很小心的准备抗议的罢工和经济罢工，阻止运输军队和军火，提高广大工人群众在这些斗争中的积极性”。省委必须了解过去你们是没有真正的执行职工国际对中国的决议和中央北方会议职运决议，那里关于组织反日罢工（很清楚很具体的指出的）、领导群众斗争和罢工、组织赤色工会、征取黄色工会的工人群众等等决定，中央要求省委彻底的执行。

4. 必须组织和领导失业工人与灾民的斗争，加紧失业日的运动，使之与反帝运动配合起来。中央失业运动的几个决议已具体的指出，这里不再重复。

5. 加紧士兵中的反帝运动，建立兵士中反帝的组织，反对不抵抗的官长，要求兵士有参加反帝运动的自由，反对进攻红军，抓住兵士的痛苦、反帝的热情，领导兵士群众的斗争，瓦解国民党的军队，动员他们与民众一起去参加抗日战争。同

时在国民党及各种反动派别所领导的义勇军中，我们必须派同志和赤色群众打入进去，夺取我们的领导，提出“反抗一切不抵抗的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张学良、汤玉麟等的一切财产”、“选举自己的长官”等口号去争取群众。在日本军队中要进行瓦解的工作，教育群众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无产阶级国际的一致。

6. 在农民运动中，要积极的去建立农民委员会和反日会的组织，揭破国民党、地主、豪绅出卖华北的面目，组织农民抵抗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捐税，发动抗租抗债等农民日常斗争、冬荒斗争，加紧农村中的反帝斗争，建立义勇军的组织，特别是加紧京东一带及唐山、天津、北平四郊的农民运动，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去很好的准备组织开展游击战争。

7. 省委必须十分的加强天津、唐山、北平、内蒙的领导，要派巡视员到这些地方去帮助他们的工作的布置。要改变过去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要将职工运动视为你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中心的任务，将党的组织要能适应于这战争的环境，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能够与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在群众战斗的风暴上扩大公开活动的范围。但同时他又是在地下里，省委要十分注意秘密工作，很好的保存党的支部。然而同时必须注意，即使在最严重的时候，也不失掉与群众的关系。

我们认为，过去给你们信中已经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问题详细的指出，现在仍是有效的，这里不再重复。此外，我们还有对于职工运动专门的指示（我们看见了北平市委对于职工运动讨论的记录，觉到他们对于职运是放弃了的，这种现象恐不只北平一地）。关于组织问题，游击战争有专门的信给你们的。

各地党部根据他当地情形，参考此信，努力去执行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工作。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 第十二次全会决议的决定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政治局讨论了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决议之后，完全同意十二次全会的一切决议，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一切组织用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与顽强性，把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起来。

二、政治局委托书记处按照政治局的讨论，起草接受十二次全会决议的决议。该决议应××××××××××××××××××××××××。

三、政治局责成中央党报及宣传部，一切党的地方组织，立即的开始在党内及群众中进行广大的解释工作，并依照国际决议案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论中国

(一九三二年九月)

一 资本主义稳定底完结和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资本主义底相对稳定已经完结了。但是，在最重要的和有

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没有直接的革命形势。目前这个时机，正是过渡到各阶级间和各国间巨大冲突底新周期去的过渡关头，正是过渡到革命与战争底新周期去的过渡关头。

（摘自《关于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国际关系中的相对稳定时期已经完结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法国完全和公开帮助之下，以及在英国暗中帮助之下，已经实行武力侵犯中国，这个武力侵犯，是帝国主义新战争底开端。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底结果，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已经更加剧烈起来，这个剧烈斗争底表现，就是帝国主义制度底一切矛盾都更加紧张。帝国主义营垒内的主要矛盾（英美矛盾）日益加强，美日冲突愈趋紧张，在凡尔塞制度底周围，德法斗争异常尖锐，波德关于但泽问题、关于东普鲁士问题的斗争非常加紧，意法帝国主义的斗争日形剧烈。因这一切事实而发生帝国主义列强力量底重新配合——所有这些，将引起新军事冲突底爆发。国际联盟对于日本进攻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又一次地显然证明了：国际联盟是英法帝国主义用来进行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工具。美国之所以反对日本占领东三省，是为要达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公平地”在远东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日内瓦会议、洛桑会议、鄂大瓦会议，并不能消灭帝国主义者中间的矛盾。

.....

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帮助之下，已经把东三省变成进攻苏联的根据地。

（摘自《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日本占领东三省和进攻上海，已经把美日英以前关于

规定在华势力范围的协定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与法国勾结和得到英国实际帮助之下，把东三省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把武装瓜分中国和武装干涉苏联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面。国际联盟根据法英底意旨，拥护日本帝国主义。美国抱着自己在远东的帝国主义目的，公开拿拼命扩充军备来威胁对方。太平洋矛盾底总和，便是新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底主要来源。

（摘自《关于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二 革命高潮底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底当前任务

自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以来，革命高潮底增长特别表现在以下各国：

在中国，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日益高涨，苏维埃运动日益扩大，英勇工农红军获得伟大成绩。

……

……在中国，已经有革命形势，而在很大一部分领土内，苏维埃革命已经获得胜利。

（摘自《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热烈欢迎日本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地主资产阶级所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热烈欢迎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而进行的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今后也一定应该竭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白区民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

下述各项任务：更加扩大和加深苏维埃运动，巩固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将苏维埃运动与白区群众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广泛地和一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口号就是：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以便争得中国底独立、统一和完整。

（摘自《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有以下的特殊任务：

（一）在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底独立和统一；（二）发展和统一苏维埃区域，巩固红军；（三）进行斗争来推翻国民党政权；（四）坚决地实行把赤色工会变为群众组织和夺取国民党工会里的工人群众；（五）扩展游击运动，在东三省提出以下的口号：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捐税和政府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者走狗底财产，组织选举的人民政权；（六）普遍宣传苏维埃区域底成绩和中国工农与苏联工农亲密联合的口号。

（摘自《关于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三 中国无产阶级底经济斗争

在无产阶级经济斗争方面，革命高潮增长底表现就是：群众的罢工运动发展起来（西班牙、中国、波兰、捷克斯拉夫、日本、法国、比利时、保加利亚、英国、印度、美

国等等)，经济危机发展得最迟的国家内，无产阶级底新队伍也加入经济斗争（在比利时，有波里那时矿工罢工；在荷兰，有特维特纺织工人罢工；在瑞典，有阿大连制纸工人罢工；在瑞士，有苏黎支电气工人罢工），不大的经济运动迅速地变为广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布力克士、波里那时等等地方），在罢工斗争和失业工人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职工运动底比重增加，新的工人积极分子发现出来，他们违抗和违反改良派职工官僚底意旨，英勇地作反对资本家进攻的斗争。……

革命高潮底增长，改良派工会危机底成熟，以及日益逼近的伟大革命战斗，正在造成一切前提，以便认真地改善赤色工会底群众工作，以便巩固它们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中的作用。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指出，虽然赤色工会已经获得许多重大的成绩（在捷克斯拉夫、波兰、西班牙、日本），可是大多数赤色工会还是没有善于利用群众因为反对资本家的进攻而表现出来的愤怒底增长和阶级斗争底加剧，来领导罢工斗争和失业工人运动。……

在中国，虽然革命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是赤色工会底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组织者和领导者作用却曾经减弱过，只是在最近时期内才重新提高起来。……

自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以来，有些大罢工运动底经验（如在布力克士、在波里那时，如瓦萨电车工人罢工，上海电话工人罢工，东京地道电车工人罢工，特维特纺织工人罢工等等）表示出：共产党和革命工会在领导无产阶级底经济斗争方面已经获得成绩，而这些成绩之所以获得，是因为党和革命工会在一切斗争阶段上，都一贯地采用了下层统一战线底策

略，及时提出了为群众所感觉迫切的、为群众所了解的要求和口号，在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组织了他们，吸收了一切斗争工人参加领导罢工，坚决地揭露了改良派职工官僚底手腕，揭露了一部分人对他们所采取的轻信的和调和态度。

在具有群众法西斯蒂工会或类似的反动群众团体的国家内（意大利、中国），特别是在法西斯蒂工会占垄断地位的地方，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地和有组织地在它们内部工作，利用一切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机会，去吸收这些团体底会员群众参加阶级斗争，去在群众面前破坏这些团体底威信，巩固革命职工运动在群众里的势力。

（摘自《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工人斗争教训的决议案》）

四 中国与共产国际底各分部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承认，各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准备武装干涉这件事当中，的确是已经获得许多很好的成绩。可是，全会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没有善于用革命行动来妨碍向中国运输军队和向日本运输军火，没有善于唤起军事企业和运输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起来斗争，群众运动扩展得迟慢，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同志对于远东战争抱着机会主义的忽略观点，同时也是因为有同志对于战争问题抱着“左”倾宿命主义的轻浮态度。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指出：各国共产党没有善于解决以下的迫切任务：在企业内、铁路上、商埠中、轮船上建立依靠着群众的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监督委员会以及

秘密的行动委员会；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基础上，来动员那些加入改良派工会和其他工人群众组织中的广大工人群众，以便阻碍向中国运输军队和向日本运输军火；在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扩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的鼓动。对于那种轻视日本反对中国的战争的机会主义轻视态度，对于那种轻视帝国主义战争与武装干涉危险的机会主义观点，对于那种不了解现时暗中爬进新世界大战形势底一切特点的机会主义态度，对于那种离开列宁主义关于战争学说的个别和平主义倾向，对于那种消极对待战争问题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对于那种认为革命自然会从战争里面自动发生出来的定命论的机会主义心理，都未给以充分的布尔塞维主义的回击。

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它们用各不相同的方法来帮助帝国主义者准备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及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底共同任务有下述各项：

……积极回答反苏联运动底一切表现，加紧在广大群众中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成绩，动员劳动群众反对白俄党人，普遍宣传苏联底和平政策，动员群众积极保护苏联、中国和中国苏维埃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认为，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领导工农以及全体劳动者底斗争，来保护中国和中国革命，来保护各国工人底祖国——苏联，去反对日益逼近的武装干涉，保护资本主义各国底劳动者不致受到帝国主义新战争底危害。

（摘自《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五 中国与第二国际底各政党

第二国际及其各政党底领袖们，在远东战争时期内，随着本国资产阶级底要求而再三改变自己的策略。在日本反对中国战争开始时，他们号召工人拥护国际联盟，而说国际联盟和凯洛格公约是和平底武器。当时，他们拥护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底政策，只批评别国帝国主义政府，宣布日本之侵犯中国只是无关于欧美工人阶级利益的远方的殖民地的战争，劝导工人们向国际联盟及本国政府请愿，说这就是反对战争的斗争方法。他们或者完全不提到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或者直接欺骗群众，说苏联并没有什么被他人武装干涉的危险。而同时第二国际底各政党，还努力加强反苏联的造谣中伤运动，企图削弱苏联和平政策对于劳动群众的影响，拼命帮助各帝国主义政府掩饰得不很高明的侵略政策，以及反对苏联所提出的完全裁军的提案。改良派工会对反对军事生产和反对给日本运输军火的斗争曾实行怠工，反而说战争会消灭失业现象。与第二国际及黄色工会国际有联系的日本社会民主党，完全拥护了日本资产阶级底强盗战争，而认为这个战争是进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日本社会民主党底这种立场，便可以明白证明：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在发生新帝国主义战争时，将会采取如何的立场。

以后，在群众压力之下，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苏黎支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在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主张保护苏联，而由主张武装干涉和拥护对苏联作反革命发动的立场，转变到表面上中立和口头上保护苏联的立场。可是在事实上，第二国际底各政党，仍旧继续着反苏联的造谣中伤运动，援助俄国孟塞维克武装干涉者，对工人反对军事生产和反对给日本运

输军火的一切具体的行动都实行怠工，继续散布和平主义的幻想，希图使群众离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实际斗争，抵制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反战代表大会，参加准备和组织帝国主义战争与武装干涉，而在每一个国家内拥护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

（节录《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周年纪念的通知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二八”周年纪念，于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急进，国民党完全彻底投降、进攻革命中，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般的以重兵大炮飞机轰炸热河，积极进攻平津，同时在上海长江一带作狂暴的军事示威的紧急形势中到来。各地党部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性、顽强性艰苦的立即进行以下的工作：

一、抓紧日本与帝国主义目前一切狂暴的进攻与瓜分中国的事实，依据在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利用一切公开半公开的可能，以十百倍的努力去组织与开展真正是广大群众的反日反帝的运动与组织。

二、在组织广大群众在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求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的口号之下，去组织和领导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用群众的力量，开展反抗国民党的投降与对群众反日反帝斗争的压迫屠杀，进行恢复被国民党封闭的反日会，要求释放被捕反日战士，举行反日反帝的群众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组织反日义勇军后援队，作大量的武装群众等斗争。在城市中、工厂中、学校中、农村中，利用公开的半公开的可能，

广泛的用各种不同的名义，去发展建立反帝的组织，进行“一二八”的群众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基础上，去建立、恢复、扩大各地真正是群众的反帝同盟的组织。在这里，应该活泼的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进攻红军苏维埃的任务联结起来。

三、在扩大年关斗争、失业运动日的工作进行中，密切的与“一二八”运动的领导与鼓动联系起来。有计划有准备的在日本企业中进行反日罢工的斗争，特别是上海沪东、沪西的日本纱厂中，平津、青岛、满洲的南满路、中东路、抚顺矿山、奉天兵工厂等日本企业中。加强中心厂内的工作，准备行动中的各种组织，同时抓紧在“一二八”事变中遭受到失业失地的工人、农民中的宣传鼓动工作，组织真正有广大群众的“一二八”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厂内会议、关车纪念等等行动。

四、在一切反动派别的反日组织中、黄色工会中，党必须加紧的深入进去工作，艰苦的耐性的抓紧一切具体的事实，揭露他们的欺骗，无情的打击他们缓和斗争的一切企图，争取其影响下的下层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在他们组织的“纪念会”、“追悼会”中必须设法打入，去进行我们的工作。

五、用最大力量在白军士兵中，特别是十九路军的士兵中，张学良、汤玉麟、韩复榘等军阀军队中，以及“剿赤”白军士兵中，进行“一二八”的宣传鼓动，开展士兵参加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密切的与反对进攻红军苏维埃的工作联系起来。

六、在“一二八”运动的基础上，广泛的解释苏联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发展，与宣传中国苏维埃红军才是真正的反日反帝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扩大群众反日反帝反国民

党的斗争，积极的进行拥护苏联，拥护苏区红军，冲破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应该是不可分离的任务。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